

杭州市志

1986—2005

志 余

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方志出版社

《杭州市志(1986—2005)》志余 编纂人员名单

主 纂：高 丹

编 辑：王 苗 冯跃民 李忠民 张美虎 金利权 高 丹

(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撰说明

一、《杭州市志·志余》系在《杭州市志（1986—2005）》中未收录的资料基础上补充辑成。既是《杭州市志》和《杭州市志（1986—2005）》两书的阅读向导，又是从新视角展示杭州发展变化的资料性文献；既能作为两轮《杭州市志》的参考读本，又能引导读者认识杭州、热爱杭州、研究杭州；既与《杭州市志（1986—2005）》主体各卷相配套，又是相对独立的单卷本资料性文献。

二、本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全面反映两轮《杭州市志》的编纂内容；坚持修志为用，立足反映杭州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

三、为便于读者深度把握两轮《杭州市志》，尤其是《杭州市志（1986—2005）》的内容，全书共设导读（市志导读）、综述、口述、课题、附录（杭州历史纪略）5个部分，以这些资料作为《杭州市志（1986—2005）》的旁证，并与之相互印证。资料记述上限一般起于1978年，下限一般止于2008年。

四、本书导读部分以两轮《杭州市志》的编纂理念、思路、内容及过程为记述范围，对篇目框架设计、市情地情把握、时代特点展示以及篇章节排序、各篇内容、资料编排做了说明。其中，对《杭州市志》资料编排说明一般记述到章，重点篇章记述到节；对《杭州市志（1986—2005）》资料编排说明一般记述到节，重点篇章记述到目。

五、本书编纂坚持“事以类聚”的基本要求，除引用原文和口述部分以外，尽量以第三人称记述。同时，为忠实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体系，尊重口述者的意愿和表述，综述、口述、课题部分除内容、结构稍有删减和调整外，所使用的数据、结论一般不做改动。

目 录

编撰说明

导读

市志导读	(1)
------------	-------

综述

经济综述	(35)
政治综述	(62)
文化综述	(87)

口述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歌凯	(115)
仇保兴	(120)
毛玲甫	(137)
孔胜东	(140)
厉德馨	(143)
叶文玲	(148)
卢文舸	(150)
冯根生	(152)
吕文宗	(156)
朱炳仁	(161)
庄富泉	(164)
李金明	(167)
汪 晶	(171)
沈天仁	(177)
陈 峰	(180)
罗红英	(185)
单金发	(187)
胡来义	(192)
钟伯熙	(195)

曹 亮	(199)
程蔚东	(204)
楼一层、何 璟	(208)
课题	
杭州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与探索	(217)
杭州市迁移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协同研究	(256)
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态势及其对策研究	(278)
杭州居民生活研究报告	(298)
杭州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385)
新时期杭州社区党建工作	(469)
附录	
杭州历史纪略	(481)

市志导读

1986年10月,首轮《杭州市志》编纂工作启动。篇目框架依据杭州城市特点和地域特色设置,即杭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杭州是古今中外闻名的风景旅游城市,素有“人间天堂”美誉;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1988年《杭州市志》编纂总体设计形成后,经不断修改完善,确定为中篇结构,设38篇。至1996年,编纂工作进入总纂阶段,并陆续分卷出版。2002年10月,随着第十二卷索引出版,《杭州市志》共12卷、计895.30万字的编纂工作全面完成。

(一) 志书结构

《杭州市志》是社会主义时期杭州市第一部通志,篇目设置既关照杭州建制2200年的纵贯历史,又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谋篇布局从实际出发,体现杭州特色,方便读志用志,易于解读杭州。全志整体上分为三大块:卷首总述为全志之纲,概述市情总貌,以总摄全书;大事记为全书之经,纵述发展;中间各篇为全书之纬,是主体部分。此外,专设文献篇,与各篇形成文史印证、呼应,以体现杭州作为“文献之邦”的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索引压尾作为全志善始善终的标志,以备检索。全志有纲有目,经纬交织,构成一个排列有序、内容系统的有机整体。

篇目设置基本按照横分门类、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和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等原则,采取暗分大类、明分门类的方法。篇目的排列顺序既照顾人们观察、认识事物的思维习惯,又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第一层次的暗隐逻辑以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的顺序展开,第二层次以具体行业(事业)、社会分工或事物属性归类为篇,并与总述、大事记、索引一级并列。分志各篇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第一卷为环境,含凡例、序言、总述、大事记及建置、自然环境、人口3篇;第二卷为杭州地方特色的文物、风景名胜、旅游、民情风俗4篇;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为经济部类,分经济综述、工业、农业、经济管理、城乡建设、商业、财政·税务、金融、交通、邮政·电信、对外经济贸易11篇;第六卷、第七卷为文化部类,分教育、卫生、新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体育7篇;第八卷、第九卷为政治部类,分政党、政务、群众团体、政法、军事、民政、人事、劳动、外事·侨务·台务、民族·宗教10篇;第十卷为区县概况、人物2篇;第十一卷为文献篇、后记;第十二卷为索引。

(二) 内容编排

为突出杭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七大古都之一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的特点,第二卷将“文物”(记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内容)、“风景名胜”(记述西湖概况、西湖风景名胜景区景点和“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内内容)、“旅游”(记述旅游资源、旅游线路和特色项目、旅游设施内容)、“民情风俗”(记述经济、生活、礼仪、岁时、社会习俗和民间信仰、民间娱乐及杭州方言

内容)集中排列设立专篇并置于自然(建置、自然环境、人口)部类之后、经济部类之前,尤其是打破门类界限和事业产业界限,将新兴产业“旅游”与文化类的“文物”“民情风俗”和兼及自然、文化部类的“风景名胜”类以事从,平列设篇归为一卷,以彰显杭州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的独特、厚重。

《杭州市志》突破以往旧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编纂藩篱,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特征和客观事实,加大经济部类记述篇幅,设置11篇,紧接杭州特色卷——第二卷,以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3卷的分量记述杭州市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宏观记述杭州经济发展脉络、产业结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综合经济效益历史和现状的“经济综述”开篇,工业篇以杭州的相对优势行业——纺织工业、丝绸工业、机械工业、轻工业、二轻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电子仪表工业、食品工业排序,突出丝绸工业并设章加以记述。农业篇则以“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为第一章,纵向反映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发展而变化的脉络。第二章“大田作物”、第三章“园艺作物”的设置,体现了杭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突破长期比较单一状况的新趋势,将“优势”“特色”产业——茶叶、蚕桑、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与“大田作物”平列,作为“园艺作物”立章记述。“畜牧业”“水产”“林业”同时设章记述。并以杭州自然条件和地理因素形成的,农田主要为灌溉水田、望天田和水浇地的特点,以传统的“水是农业的命脉”和气象对农业巨大作用的具体实际,将“水利”“气象”与“大田作物”“园艺作物”平列为章加以记述。农业篇尾,将杭州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按概况、行业结构、经营管理横向列节,纵向记述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杭州为历代商业都市。1978年改革开放后,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杭州市商业市场日趋繁荣活跃。商业篇第一章“机构与体制”记述商业管理机构、专业经营机构、社会商业机构、商业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第二章及其后各章分别记述机构与体制变化过程中商业各门类的发展。立章记述杭州“土特产”和“名老店简介”,以及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逐步壮大或新兴的医药商业、饮食服务、集市贸易和仓储运输,体现时代发展特色。对外经济贸易篇对机构与管理、进出口贸易、海关税钞征收、外国资本、外经合作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的内容设节记述。金融篇侧重货币、金融机构、典当钱庄信用、保险业务、信托与证券交易、金融管理的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类城乡建设、邮政电信、交通诸篇,注意突出地域特色和专业特点,市政建设、城市绿化、环境卫生、市辖县邮电、公路运输、民用航空、航运和联合运输均有详细记述。

经济部类的经济管理篇、财政·税务篇主要从专业管理角度,对全市计划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管理、计量与标准化管理、审计、统计管理和财政、税务的基本发展脉络做了梳理,并透过管理看到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文化部类的第六卷、第七卷7篇,以教育开篇。第一章记述南宋国学、州(路、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展现杭州自古就有办学重教的传统和文化积淀。第二章始均以“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选介”4节为标题,记述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普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卫生、新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体育5篇从各自专业角度对杭州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记述。文化艺术篇则从文学、戏剧、曲艺·杂剧、音乐·舞蹈、图书、电影、群众文化角度较翔实地记述其发展变化。为突出“西泠印社”,在篇目设置上打破常规专为其升格立章,全面系统地反映西泠印社的历史与现状。又立“图书”一章,以“刻书业”“藏书家”“图书业”“图书馆”4节记述其发展变化,立体展示杭州历史文化

名城的文化底蕴和传承光大。

政治部类的第八卷、第九卷10篇,结合杭州市部门设置、社会分工和史实实际分类记述。政党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理念并兼顾通志纵贯古今的实际,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党派合为一篇,重点记述中共杭州市委带领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杭州建立、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政务篇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杭州市人民政府、政协杭州市委员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政治部类诸篇中,在“杭州市人民政府”章下专设“施政纪略”;军事篇专设“战事”章,记述历朝重大战事和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重要战事;民政篇专设“基层政权建设”,记述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派出机构、市辖区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市区人民代表选举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根据杭州地情专设“移民安置”章记述新安江水库移民、富春江水库移民、青山水库移民和支援宁夏建设史实。

第十卷区县概况篇分别对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半山区、余杭县、萧山县、富阳县、桐庐县、临安县、建德县、淳安县从自然环境、建置政区、人口、党派政务、经济、城区(乡)建设、科教文卫、名胜古迹等方面进行概括性记述,并突出各区县特色。

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人物称为“志中之髓”。旧志中人物志门类繁多,人物传内容所及反映了各时代的历史发展变化及其成功与失败,对于正确认识一方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有重要作用,故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杭州市志》人物篇编纂尽力拓展视野,加大遴选力度,精挑精选。人物篇设“人物传略”“家世人物”“杭州市区革命烈士英名录”3章,共收录人物1215名。“人物传略”下设“本籍人物”“客籍人物”2节,共著录人物613人,其中杭州籍(含辖县)491人、寓杭客籍122人。“家世人物”著录人物120人,选介家族46个。“杭州市区革命烈士英名录”列表收录1923年至1985年杭州市区革命烈士482人。

《杭州市志》为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加大人文记述比重,并将古今著述艺文以“文献”单独立卷(第十一卷),精心遴选诗文,所选内容多为上品。“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既取经要之篇入经传矣,又辑诗文与志可互证者”(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以文证史,见证杭州市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脉络。文献篇采取类目体,设“杭州地方文献”“著述目录”“文选”“诗词曲·歌谣·楹联选”“碑刻选”5个部分。“杭州地方文献”载有杭州地方文献提要(至1985年)234种;“著述目录”著录1912年至1985年间与杭州有关的文献出版物1050种,载杭州籍人士编、纂、著、校、译的古今书目1万余种;“文选”选载杭州地方党史资料27篇、政府文告13篇、古今散文205篇;“诗词曲·歌谣·楹联选”选载古今诗词曲604首、歌谣114首、楹联640联;“碑刻选”选载杭州(至1985年)碑碣刻石681石(处)。文献篇总文字量为91.5万字,占《杭州市志》文字总量(不含索引)的12%,在省内11个地市志书中列第一位。文献可读性强,具备为社会各层面读者、使用者服务的功能。由于入志内容是杭州珍贵文献,大多又是名家名作,能充分反映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脉络,突出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中小学生提供了解杭州、认识杭州的珍贵资料,从而激发人们热爱杭州、建设新天堂的热情。文献门类设置齐全并有所创新。在“文选”中设置“党史资料”“政府文告”,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并列设目,既体现这些资料的珍贵和特殊,又体现了时代特征,使人耳目一新。入选散文力求具备完整性、独立性,增加诗歌、楹联入选量。另外,为地方文献做提要,便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查阅、研究的人使用,这在新旧方志中都是不多见的。文献篇为文化篇、文物篇、人物篇的内容做了重要

补充,突出了《杭州市志》的地方特色,为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做了客观见证。

为方便读志用志,编制“索引”专卷,即专书索引——第十二卷(分为总目、索引和名录),使之成为 779.8 万字(不含索引卷)的《杭州市志》这座资料库的入门钥匙。索引编制,既符合索引编纂规范,又体现地方志特点,充分揭示《杭州市志》这一地方文献所包含的内容,把为读者利用市志提供一条便捷的信息检索途径作为索引编制工作中坚持的指导思想,将具有多面性、全面性、准确性和快速性功能作为索引编制宗旨。

索引为综合性内容分析索引,关键词包括目与子目、图、表、录和有检索价值的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事物、事件、风景名胜、名优特产品,以及概念、名词术语、书刊名等。按照关键词首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设置(汉语拼音)音序检字表和笔画检字表两个检索入口,以便于不同查阅习惯的人士方便而快捷地使用;将目与子目、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图、照、表及有地方特色的事件等关键词混合编排,不分专题,以尽可能将相关事物、事件等集合起来,便于读者查找,提高检索效率;采取复式索引的编制,即二级复式索引(一级主题之下设二级主题或三级主题),增加了市志内容检索的系统性,读者检索一个主题,同时可获得在此主题下与之有关的线索,从而形成完整、系统的认识;增加参照系统标目的数量(共设“见”和“参见”条目 1465 条),使得索引从平面走向立体,借以明确它们的含义和范围,为读者提供多途径检索的可能,从而获得最大的检全率和检准率;收录组织机构名称标目,通过此类标目使读者对它们的沿革变化及特定时期所起的作用有个明晰认识,但编制难度最大;对同一事物从多角度进行标引,以便使用者从不同角度切入主题;对反映杭州地方特色的事物、事件、风景名胜、名优特产品、古迹等关键词的专门提取,则体现地方特色。索引本是纯检索工具,除了被标引的主题词和出处(卷、页)外,本身不提供其他知识信息,此举给索引注入信息,让索引有某种知识信息的存在。如地名标引次数最多的是上海(300 次)、日本(189 次)、钱塘江(148 次)、拱宸桥(141 次)、北京(112 次)、中山路(109 次)等,就暗隐杭州市上千年里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与这些地名的联系和这些地方在杭州的地位、作用。人名、组织机构名的标引次数亦然,如人名、组织机构名标引次数最多的分别是钱镠(76 次)、苏轼(76 次)、周恩来(58 次)、杭州市人民政府(198 次)、浙江大学(140 次),就暗隐这些人和组织机构在杭州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作用,尤其是浙江大学与杭州市发展历史存在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另外,还设置了多种助检手段,配备了拼音检字表、笔画检字表,并在书眉标出索引款目首字,外切口处标出标目词(首字)拼音字母,为检索提供了方便。

索引卷共 678 页、115.5 万字,设条目 54813 条。其中,人名 16248 条(以事系人 15033 人、传 733 人、表录 482 人),地名 6757 条,组织机构名 15260 条,目与子目 8250 条,艺文、报刊、书目、美术作品 358 条,图 70 条,照片 1115 条,表 1250 条,与杭州有关的事物、活动 5180 条,植物 77 条,动物 34 条,特有名词、缩略语 187 条。

二

2002 年 12 月 30 日,杭州市二轮修志工作启动。2003 年 2 月,初订《〈杭州市志〉第二轮编修总体设计》,对编纂指导思想、编修类型、编纂方针、志书定位、续修断限、结构体裁、编纂原则、篇目设置、组织领导进行总体设计。编纂篇目和编纂思路依据杭州市城市定位和城市特点,即杭州

是国际风景旅游城市、“长三角”南翼重要中心城市、浙江省省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杭州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特色布局框架。确立“把握地情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浓墨人文特色,记好发展变化”的编纂思路。强化志书思想性,编出志魂,编出灵气。提出编纂精品佳作的“六精”要求:内容精确、资料精准、著述精深、体例精当、文字精练、印装精美。同年8月,制订出市志篇目。五易其稿后,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及全国各地13个方志专家审阅并征求意见。2004年10月29日,组织召开《杭州市志(1986—2000)》篇目论证会,根据专家意见并经市政府同意,将编纂下限由2000年下延至2005年。篇目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批准,于2005年3月由市政府办公厅下发。2006年,进入初稿验收阶段。2008年6月,进入分纂阶段。2009年,文化部类、政治部类进入总纂阶段。2010年2月,社会部类、自然部类、经济部类进入总纂阶段;12月10日,形成送审稿。2011年10月7日,完成试印本的印刷。《杭州市志(1986—2005)》主体部分基本定型,共6卷7册47篇,其中第一卷(自然)1册、第二卷(经济)2册、第三卷(政治)1册、第四卷(文化)1册、第五卷(社会)1册、第六卷(文献)1册。除索引、志余2卷外,全书1230万字,收入地图21幅、照片720幅,经4年打磨,均于2015年10月出版。

(一) 志书整体设计基本原则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四条指出:“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致。”王忍之在2000年7月26日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对篇目设置提出六点应注意的问题,即“一要体现记述内容的主次和轻重;二要体现事情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三要体现合理的领属关系;四要体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五要体现相关事物的关联性;六要体现续和修的统一。”这些要求和指导原则,也是杭州市志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对首轮修志篇目和兄弟省市志书篇目分析研究并对地情深入研讨的基础上起草出的《杭州市志(1986—2005)》编修总体设计中提出,篇目设置和志书内容要处理好与首轮志书的衔接,继往开来,力求创新,遵循“以特为主、不缺要项、归类调整、增新扩容、强化综合、丰富体裁”的原则。在志书设计上着重处理好三个环节:

1. 明确编修的类型是续志

“前志不废,后志为续”。首轮《杭州市志》是社会主义时期杭州市第一部通志。《杭州市志(1986—2005)》为社会主义时期杭州市第一部断代志。二轮志的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时期首部新方志下限的承接,又是对首部新方志内容的补遗正误和在首部新方志基础上的创新。补遗正误采取暗补(暗正)和明补(明正)相结合、集中补和分散补相结合的方式,以暗补(暗正)、分散补为主。

2. 明确志书的定位

既要保证所编纂的志书资料翔实可靠,又要保证志书“文约事丰”、控制篇幅,从存史、资政、教化和学者研究四个角度全盘考虑后,市志编辑部将志书定位为:以存史为主,兼顾资政、教化和研究,适应用志需要。在充分把握地情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浓墨人文特色、不缺要项和把握质与量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记好发展变化,从城市的特点出发写城市发展,从发展出发写因果关系,从因果关系出发写城市结构性变化的特点,从结构性变化的特点出发写城市运行机制的变革,反映杭州市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脉络。

3. 明确二轮志与首轮志的关系

二轮志是一部相对独立的断代志,是一部全面反映杭州市改革、探索、发展伟大实践与历史

进程的志书。二轮志与前志有连接,是同一地域历史延续的再记载,二轮志的上限紧接着前志的下限。同时,二轮志既是首轮志的续本,又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全面并相对独立的志书。因此,在篇目上妥当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关系,以保证全面完整系统地反映断限内的客观事物。同时,依据续志特性处理好四个环节,即续载、复载、补遗、正误。续载是主体,应有一部分“承前简述”,以彰明因果,因此二轮志的上限并非一律从1986年起,复载部分(如政区、自然环境和资源、旅游资源、民俗、方言等)基本在前志基础上精简改编,并增加新研究成果、新权威认定内容;补遗部分一般按事物发端记述;正误部分一般采取随文正(即暗正)或脚注形式记述。

(二) 志书结构与篇章排列顺序

《杭州市志(1986—2005)》采用分卷多篇的形式,为中小篇结构,总述、大事记、分志各篇、索引为一级并列。采用章节体,全书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篇作为全志结构的最高层次,篇下按类设章,章下设节,节下以目形式展开,一般以目为记述实体。分志各篇是志书的主体部分,总体按横分门类、纵书史实、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的原则,按行业(事业)、社会分工或事物属性划分门类,力求做到分类合理、归属得当。篇下设无题述,章下设无题小序,节下依据记述内容灵活处理。具体框架如下:

1. 全志整体上分为五大块

卷首总述为全志之纲,概述市情总貌,以总摄全书;大事记为全书之经,纵书发展;中间分志各篇为全书之纬,是主体部分;卷尾索引,以备检索;附志余,与正文内容相印证,为两轮市志的导读。全志有纲有目、经纬交织,构成一个排列有序、内容系统的有机整体。

2. 中间分志各篇,按中篇结构分类,共设47篇

篇目归类和排列讲究科学性和内在逻辑性,力求做到排列有序、层次分明。基本按照事以类从、避免交叉重复等原则,采取暗分大类、明分门类的方法。篇目的排列顺序:一是照顾人们观察、认识事物的思维习惯,二是突出时代特点,三是突出地方特色。第一层次的暗隐逻辑以地域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为顺序,大体上以先物质文明建设,再政治文明建设,后精神文明建设展开。第二层次以具体行业(事业)、社会分工或事物属性划分归类。按照先自然(政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即基础设施。自然环境同“人工环境”一起,构成人们生活的空间)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顺序排列。以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置于前面位置,集中记述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功能,即生态环境、投资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接着是经济部类,先经济总情,宏观记述杭州市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势大略、经济体系、特征结构及效益情况,以此统领经济部类各篇。经济部类按生产、流通、消费的次序,据一、二、三次产业划分的理论,在排序上大体以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的顺序。在经济部类之后,排政治部类,记述杭州市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脉络,展示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主导地位。然后是文化部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从历史和现状宏观记述和提炼杭州独特的文化特色,及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对经济、政治、社会的互动作用。接下来,排社会部类,社会生活是一域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折射出一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篇目分类排列如下:

自然部类第一篇至第十一篇,即政区、自然环境与资源、西湖、西溪、人口、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城乡建设、交通、水利、邮电·信息化11篇。经济部类第十二篇至第二十三篇,即经济总情、开

发区、农林牧渔业、乡镇企业、工业、贸易与经济合作、名优特产、社会服务业、旅游、金融、财政·税务、经济行政管理 12 篇。政治部类第二十四篇至三十一篇,即中共杭州市地方组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与工商联、人民团体、政法、军事 8 篇。文化部类第三十二篇至三十九篇,即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物、新闻出版、卫生、体育 8 篇。社会部类第四十篇至四十四篇,即精神文明创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社会·生活 5 篇。然后是区县(市)概况、人物、文献(含编纂始末)3 篇。最后是索引专卷,并附志余一卷。

(三) 重点处理的关系

志书资料与篇目力求把握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形式与内容、全面性与特色、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关系。

1. 行政隶属和行业分类的关系

篇目设置既要合乎科学分类的基本原则,又要照顾到杭州市管理体制和社会分工的实际,同时还要考虑二轮修志可操作的现实可行性。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现行管理体制和社会分工同科学分类有许多相悖之处,这给我们篇目设置和资料收集编纂带来了困难。

杭州市乡镇企业,从其规模上看,经济规模大的乡镇企业年产值数百亿元,远大于一般国有企业,而规模小的只是个体工商户;从产业上看,涵盖了种植业、养殖业、渔业、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各产业。按科学分类要求,应把乡镇企业的各种产业分别归并到一、二、三次产业的各个门类。然而 2001 年前设有杭州市乡镇企业局,归属“农口”管理,2001 年市乡镇企业局撤销后,全市乡镇企业划归市经委统一管理。《杭州市志(1986—2005)》下限为 2005 年,乡镇企业的情况、统计口径都与其他各业不相隶属。如分解归类,既使编写难度增加,又看不到杭州市乡镇企业的全貌,查阅利用也不方便。乡镇企业、个私企业的蓬勃发展很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不仅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致富一方百姓,还加快了城镇化建设。首轮修志乡镇企业归属农业篇,对此记述过简。从发展上看,乡镇企业将淡出原有体制,从存史和资治角度出发,应予全面完整记述杭州市乡镇企业兴起、发展、壮大,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篇目设置上,采取个性大于共性的事物适当归并组合的原则;特色鲜明、地方特有、个性大于共性的事物,按“类以事聚”的方法,打破常规,独立成篇。乡镇企业篇放在“农林牧渔业”之后、“工业”之前(因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89.6%),这样的处理兼顾社会分工的实际,相对合理,也相对科学。同样,名优特产篇中“西湖龙井”“杭州丝绸”章,文化艺术篇中“西泠印社”章,文物篇“史前文化”章中“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节也采取“类以事聚”的方法设置,以体现事物完整性。

社会服务业则坚持共性大于个性的事物适当归并原则,将首轮修志中归入商业的餐饮服务析出。因餐饮服务不属商品流通,不再归入商业,然而单独设篇又嫌单薄,因此与现代服务业内容归并。而现代服务业按产业属性划分,与大多数行业的服务内容存在着交叉,从可操作性着眼难以记述全部服务业。杭州市志从实际出发,侧重部分生活消费服务,并注意记述新兴的服务业,如装修装潢、中介服务和家政服务业,以及杭州独具特色的休闲服务业等。

2. 整体性和独立性的关系

因诸多门类既有独立性,又有统一性,故门类横分坚持立足整体、注重联系,尽量减少割裂肢解的现象,力求客观记述事物的整体概貌,准确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篇目设置上和资料

排列上,维护事物记述的整体性,考虑杭州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革实际,立足全志的高度把握门类设置和篇目安排,横排门类关联呼应,纵述史实系统有序,使全志形成一个既严谨、又协调的有机整体。

处理好市区与所辖县(市)的记述问题。确立“立足市区,涵盖全市;市区为主,兼顾属县(市);把握整体,注重特色”的资料处理原则,在篇目设计上以“大杭州”概念立目,以全市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不人为割裂市与县(市)的必然联系,又顾及县(市)的独立性,篇目留有一定的空间范围。设立区县(市)概况篇,为避免正文中出现交叉重复,在“把握整体,注重特色”的原则下,在章节设置上或在资料取舍中从全市宏观资料中突出各区县(市)特色。

坚持志书的整体性,强化综合性。篇目设计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宏观记述:

(1)在志首设总述,各篇之首设无题述,各章之首设无题小序,以宏观(总述)、中观(无题述)、微观(无题小序)梯级结构,力求站在历史的、宏观的、全局的高度,居高俯瞰。采用记论结合的方式,以记为主,边记边论(无题小序除外)。篇首无题述,记述起于事物发端,详述1986年后至2005年的大势大略,纵向脉络,横向联系;章首无题小序,记述一般起于1978年,勾勒改革开放后至下限事物发展变化及横向联系。三级概述体系纵横经纬,立体反映全市总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概略,浓缩各业精华,抉取大势大端,勾画特点,揭示规律,彰明因果,以增强志书的著述性。

(2)对于人口、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三大基本国策内容,分别在志书的前部,设专篇着重记述。强化反映事物的全貌,即整体性,作为人们认识杭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克服按部门设篇带来的资料分散性弊端。坚持科学地反映各门类的内在联系,使全书形成有机的整体。

(3)将“把握地情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浓墨人文特色,记好发展变化”编纂思路贯穿全志,以杭州深厚的人文积淀为内涵,以共建共享品质生活为主线,强化资料价值,提高学术品位,增强整体功能。以事物固有特性为基础,一是通过把握资料遴选内在深度的反映,二是通过编纂方式体例创新的体现,三是通过外在表现形式的展现。注意分志各篇资料选择运用的相呼应,既要在人文领域篇章重点挖掘,又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类目的各篇,尤其是人物篇、文献篇中,注意提炼、选择、挖掘资料,通过资料内在联系,不同角度地使文化在全志一以贯之。各部类各篇章相互呼应,以人证史,以文证史,形成全志整体性风格。

3. 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杭州市志(1986—2005)》是社会主义时期杭州第一部断代志。在志书设计上,既要考虑与首轮《杭州市志》的承接,又要坚持本轮志书的相对独立性;既要继承首轮《杭州市志》的优长,又要与时俱进、力求创新。

篇目设计遵循“以特为主、不缺要项、归类调整、增新扩容、强化综合、丰富体裁”的原则。既考虑篇目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又要兼顾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一是继承,保留原有篇目25个,占整个篇目的54%,但这些篇目的章节大都做了增新或重新组合。二是归类调整,如设“自然环境与资源”“人口”“邮电·信息化”“贸易与经济合作”等篇。三是突出地域特色和经济特色,如设“西湖”“西溪”“乡镇企业”“名优特产”“旅游”等篇。四是增新以突出时代特色,如“开发区”“社会服务业”“社会生活”等篇。五是强化政治部类记述,提高政治部类诸篇的记述层次。六是增设专记等新型体裁等。

(四) 时代特色

地方志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脉搏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新风格,关注地

域政治特色(历史时期、大政方针、重大事件)、思想特色(新思潮、新观念、新时尚)和发展特色(新目标、新任务、新成果)。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突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特色,二轮市志总体设计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 全志以“五大建设”为总体逻辑架构

突出自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一个地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以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记述框架,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自然部类占总篇幅的17.82%)。突出三大产业发展,包括基础产业在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建设。经济部类的篇数为全书篇数的三分之一强(经济部类占总篇幅的29.11%)。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人大、政府、政协以及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民团体在自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展示政治文明建设的轨迹,反映其为改革开放提供政治方向、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政治保证(政治部类占总篇幅的13.43%)。突出“文化大市”和“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发展战略,以及把杭州建设成浙江都市文化的龙头、精神文明的首善之区、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东南部的重要文化中心之一为目标的文化建设,反映杭州独特厚重的文化气息,展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传承与发展(文化部类占总篇幅的26.12%)。突出彰显社会建设脉络,体现“休闲之都”和“生活品质之城”的社会和谐、品质生活(社会部类占总篇幅的13.56%)。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个方面的建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贯穿杭州市20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是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这既是新时期的时代最强音,也是涵盖社会各方面的五大系统工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前提、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社会环境和条件的思路。按“五大建设”架构《杭州市志(1986—2005)》篇目,突出了新时期的特点。

2. 采取相对集中与分散记述相结合的方法反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二轮修志断限内的突出特点,也是推动杭州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发展巨变的基本动力。因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一场深刻革命,涉及方方面面,故在篇目设置中,采取相对集中与分散记述相结合的方法反映改革开放。相对集中记述但不单独立篇,只在“经济总情”和相关篇中以章节层次宏观加以记述。分散记述是将土地管理、农林牧渔业、工业、贸易与经济合作、金融、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体制的改革分散到具体记述单元中记述,并将专项改革放在各行业、事业章节之首,体现改革是发展的原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以突出时代特点。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均分散在各篇章涉及内容之中,全面完整系统地展现杭州市20年改革史、探索史、发展史。

3. 突出各个领域中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点和亮点

《杭州市志(1986—2005)》记载的历史是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政府管理由微观走向宏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许多新生事物和新兴学科、新兴行业都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分纂总纂中力求充分予以发掘,并注意突出各个领域中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点和亮点。如《杭州市志(1986—2005)》的鲜亮点即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和建立。市场经济首先要有市场,要形成真正的市场必须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而市场

主体要多元化就必须发展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必须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主要资源必须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杭州市具有良好的商业文化和历史传承,是经济大市更是市场大市,至2005年,商品交易市场达720家,数量居全省11个地市的首位。杭州市无论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还是在资源分配的市场化程度上,都是独具特色的。为全面记述杭州市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示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变化和成长历程,同时关注杭州传统老字号的变迁,专设社会服务业、名优特产篇,突出“工业”“贸易与经济合作”“金融”新变化、新亮点记述,增设“土地市场”“商品市场”“建筑市场”“房产市场”“货币市场”“证券期货市场”“保险市场”“文化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权市场”等章节,加强记述分量。

伴随改革开放新兴的信息业、证券业、期货业、小城镇建设、城中村改造、文化产业、会展业、广告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力量办学、普通话推广、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或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是社会发展的亮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根据不同情况设立了专门的章节,这既是突出时代特色,也是突出杭州的地方特色。

(五) 地方特色

对于杭州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地方特色,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特色,概括为两大类,即自然特色和社会特色。自然特色有自然条件、自然景观、地理属性、区位作用;社会特色为经济特色(资源、名产特产、经济状况)、文化特色(人文景观、社会习俗、风土人情)、工作特色(工作思路、工作重点、工作策略)。杭州市志在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分纂总纂中充分予以考虑并做好资料取舍。

1. “杭州依湖而兴、因湖而名、以湖为魂。没有西湖,杭州的兴衰就失去了依托,“人间天堂”的美誉就失去了内涵,历史文化名城就失去了根与魂”。“作为城市的根和魂,西湖已深刻地体现在杭州城市的发展长河之中,充分体现在杭州文脉的发展嬗变之中”^①。为了突出这一地域特色,专设西湖篇。“天堂湿地,湿地天堂”。西溪湿地是中国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这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幽雅、文化积淀深厚,素有“副西湖”美誉,与西湖、西泠并称“三西”。一千多年来,湿地内农事活动和人文活动频繁,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存和人文积淀,景观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斐然,体现“人文湿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地带。为翔实展示这一快被人们忘记的遗存,专设西溪篇。一年一度的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秉承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结合展示、交流、贸易、旅游,实现经贸、科技和文化的互动,连年载誉,已成为城市的盛典、杭州的“金名片”,故设专记“2000年—2005年西湖博览会”。

2. 1983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确定城市性质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其后,《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制定的发展目标为“构筑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为先导、都市农业为基础、优势工业为支柱、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大都市产业群”。这既是杭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又是杭州市志篇目设置的依据。旅游业是杭州最具特殊性、差异性的优势产业,是杭州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是杭州的重要支柱产业。因此,仍旧把“旅游”列为专篇,并以“大旅游”为视角,加大记述范围,突出人文气息。

^① 王国平:《保护西湖,申报“世遗”》,《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6期。

3. “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拥有堪称“国宝”甚至是国际著名品牌的西湖龙井，市域内各区、县(市)也有一批相当知名度的茶叶品牌，杭州茶产业、茶研究、茶学、茶文化、茶旅游独具特色，体现“中国茶都”的深厚文化底蕴；杭州作为中国“六大绸都”(2003年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上，中国丝绸协会授予杭州、苏州、嘉兴、无锡、湖州、吴江“六大绸都”称号)之首，丝绸历史悠久，在长期的丝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杭州丝绸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杭州丝绸”是杭州向世界亮得最响的一块金字招牌。从一家校办企业发展到中国民族饮料工业第一品牌、世界瓶装水产销冠军的娃哈哈，以及国内知名品牌——天堂伞、万向节、中策、传化、万事利、青春宝、华立等；还有一些杭州“老字号”、传统名特产，如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毛源昌眼镜、邵芝岩毛笔等。为突出这些传统与新兴特色，专列名优特产篇。

4. 杭州是一座“五水共导”的城市，集江、河、湖、海、溪于一城，面海而栖，濒江而建，傍溪而居，因河而兴，由湖而名。杭州5000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建城史，就是一部因水而生、因水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因水而强的历史，就是一部“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为全面完整系统地记述杭州这座江边、河边、湖边、海边、溪边城市治水兴水又与水和谐相处的历史与现状，专设水利篇。

5. 西泠印社是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含金量最高的品牌之一，它集国家级社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于一身，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可称“天下第一名社”，单独设章，归于文化艺术篇。

对于一些典型事物、突出事物或杭州地域的独有事物，在章节上都予以充分考虑，或以专记、附、附录形式加以记载，或置入志书的有关章节中，或附于相关章节目录后，以加强记述深度、深化志书主题，增强志书的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在政区篇中，设表记述断限内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快速推进而导致原有地名的消失情况，以及断限外首轮志书没有记述的资料，如“1972年—2005年杭州市区消失街巷情况表”“1981年杭州市区撤销、合并街巷地名情况表”“‘文化大革命’期间杭州市区更改地名情况表”。在自然环境与资源篇中，附“1912年—2005年杭州重大异常天气、气候事件”。在西湖篇中，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共杭州市地方组织篇中，设“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目和“‘96666’党政机关服务态度和效能投诉公开电话”节。在地方人民政府篇中，设“12345市长公开电话”节和附录“1992年—2005年杭州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十件大事”。在教育篇中，设专记“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情况调查”“杭州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在卫生篇中，设专记“推进‘四改联动’，解决‘看病难’问题”。在精神文明创建篇中，设附录“1994年—2005年杭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在民政篇中，设专记“余杭村民‘自荐海选’当家人”，设附录“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和有关新安江水库建成后淳安县移民问题的7篇附录。在民族·宗教篇中，设专记“1966年浙江大学学生带头保护灵隐寺纪实”。在社会·生活篇中，设专记“杭州破解‘七大难’问题调查”。

(六) 内容编排

《杭州市志(1986—2005)》卷首前环衬以杭州市委原书记黄坤明在杭工作期间专为市志撰写的《杭州赋》开篇。该赋从名城之路、山水之城、人文之颂、风物之表四个角度歌咏杭州，展示杭州特色，赞叹美丽杭州：“杭州之好，天人合一。山水江南，雅致温润，宜动偏静，有武尚文。其质如美玉，文如锦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代一代，筚路蓝缕，永为其好，永育其新。”

彩页首设插页《远眺杭州市区》(5折页),从西湖西面往东南俯瞰杭州市区,展现“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市区格局。插页背面以“江、河、湖、海、溪”5幅照片并列构成杭州城市特色图景,即“江、河、湖、海、溪五水并存的都市”。以上两面大型照片组体现了山水之城杭州三面环山、五水共导的城市形态以及杭州城市重要特征——城市与山水和谐共生。

接着是西湖十景、西湖新十景、三评西湖十景,其后按总述记述内容总览杭州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侧重自然,含基础设施建设照片。同类事物以年份先后排列,照片遴选与总述和本卷记述内容相互照应。其他各卷卷首照片一般按本卷篇章顺序,再以年份先后排列,力求点线面结合,与正文互为印证。照片共720幅。

地图21幅,其中杭州市在长三角地理位置图1幅,杭州市卫星影像图1幅,杭州市地势图1幅,杭州市水系图1幅,杭州市交通图1幅,杭州市政区图按四个“五年计划”终结年设1986年、1990年、1996年、2000年、2005年5幅,杭州市区图按市区区划变化较大年份设1986年、1990年、1996年、2001年、2005年5幅,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图(2001—2020)(“一主三副六组团”在图上示意)1幅,杭州市旅游景点分布图1幅,西湖地图(综合整治前和综合整治后)2幅,西溪地图1幅,杭州中心城区图(范围绕城高速公路区域以内,补市区地图涵盖内容不够详尽的缺失)1幅。地图按各专题图、政区图、地域特色图顺序,同类型图按时间先后排列,用地图展示杭州城市化、建成区、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等发展历程,与全志记述内容互为印证。

志书正文以总述开篇,纵向宏观勾勒起于10万年前的“建德人”、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至2005年杭州的历史发展基本脉络,重点记述1986年后杭州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变化,揭示杭州各项事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彰明因果,展示杭州市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本过程,以及杭州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在全省领跑、全国领先的情况,概述杭州地情总貌,以总摄全书。

大事记为全书之经,通过对杭州地域1986年至2005年大事要事特事的排列记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纵向反映杭州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脉络,起到全志“提要”和“大纲”的作用。

自然部类,包括政区、自然环境与资源、西湖、西溪、人口、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城乡建设、交通、水利、邮电·信息化11篇。记述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依山傍水、城山相连、五水共导”,“三江”、“两湖”、运河犹如缎带、明珠镶嵌其间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人工环境),充分展示杭州特有的自然生态特色、人文特色、景观特色、物产特色和城建特色;展示杭州最具魅力、最富竞争力的独特优势,战略资源的生态环境和城市独特的生态软实力;展示杭州市在城市建设、发展、管理和环境营造方面的运行工作模式;展示杭州注重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自然复合系统整体协调的发展方式。从而反映出全市的基本面貌、区位优势和投资创业良好硬环境,展示杭州独特的生态环境资源,体现“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新天堂环境优势,便于宣传杭州,便于招商引资,便于招揽人才。通过对为杭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的良好生态环境、生态型城市的记述,为接下来的经济部类展开记述做好铺垫。

全志主体以自然部类的“政区”开篇,下设“建制”“行政区划”“勘界”“地名”4章。为保证二轮志书的相对独立性,“建制”从杭州历史发端记述至下限2005年,下设“沿革”“吴越首府”“南宋都城”3节。第一节沿革,记述自10万年前古人类智人“建德人”始,至2001年2月萧山、余杭

撤市设区,形成杭州市辖8区5县(市)建制后的2005年止。第二、三节列专节记述吴越首府和南宋都城,以突出它在杭州建制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弥补首轮志书记述过略的缺憾。第二章行政区划,第一、二节记述市辖区和所辖县(市)的区划变化情况。着重记述杭州市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市区面积不断增大,辖区数量不断增多,所辖县“撤县设市”,以及全市扩镇并乡、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乡镇村调整、社区调整情况。第三章勘界,下设“界线勘定”和“争议线协调裁定”2节,记述断限内勘界情况。第四章地名,下设“历史地名”“街路”“广场和桥梁”“住宅区”4节,记述市政建设步伐加快形势下杭州市主要历史地名、主要街道名、广场、桥梁和主要住宅区名的变化,并设表记述断限内因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快速推进而导致原有地名消失的情况,以及断限外首轮志书没有记述的地名变化情况资料。

第二篇自然环境与资源,依据首轮志书基本框架和断限内杭州地域发生变化及最新研究、最新普查数据,从“地质”“地貌”“气候”“水系·水文”“土壤”“植被”“动物”“自然灾害”“资源”9章展开记述,展示改革开放后随着杭州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经济快速发展中,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同时揭示气温变暖、土壤沙化、野生动物减少的事实。专设“自然灾害”章,记述杭州断限内气象、地质灾害情况,并设附录“1912年—2005年杭州重大异常天气、气候事件”,可纵向看到近一个世纪杭州气象灾害的具体情况,弥补首轮修志因资料不足而缺漏的遗憾。专设“资源”章,据杭州自然生态特点,设“湿地”“水”“矿藏”“森林”“古树名木”5节,重点记述1986年—2005年发展变化情况。特设“古树名木”节,记述杭州作为林业大市古今相承的爱林护树传统及保存至今的百年、千年“树王”和珍贵树木情况。

将应属第二篇自然环境与资源中的“西湖”“西溪”升格为篇,即第三篇西湖、第四篇西溪。“西湖”首轮志书设为章,“西溪”未做记述,为弥补西湖、西溪内容,二轮续修均设置为篇。西湖篇记述起于事物发端,重要事物(工程)适当突破下限。设“自然环境”“胜景”“景区分布”“治理和保护”4章,按人们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一般规律,先自然环境,再景观,最后记述保护,即以“先静后动”的顺序全面展示西湖的历史与现状,展示西湖的自然山水与人文积淀,展示山水、文化、城市的完美统一。并列专节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湖治理,尤其是2002年起规模最大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和西湖“东热、南旺、西幽、北雅、中靓”新格局的形成,以及“一湖映双塔”“湖中镶三岛”“三堤凌碧波”世纪全景之梦基本实现的史实。西溪篇记述起于事物发端,为保证记述事物(保护工程)完整,适当突破下限,设“自然环境”“景观”“综合保护”3章,按西溪地域、湿地、国家湿地公园(即大、中、小概念)的时空顺序,或自然环境、景观(含人文)、自然人文结合和“先静后动”的顺序展示西溪的历史与现状。展示西溪由原生湿地演变为城市次生湿地,面积由60余平方千米锐减为10余平方千米,人文景观衰变,生态功能退化,至2003年8月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启动,2008年10月基本完成后,实现西湖、西溪“双西共舞”时代的综合整治实录。

第五篇至第七篇为三项基本国策的人口、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篇。记述人们生存地域、空间及人口20年的发展变化,揭示人口、土地、环境三者的辩证关系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历史印记。

人口篇分别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和流动”“人口管理”5章记述杭州市20年人口的发展变化情况。“人口质量”章着重记述人口质量变化,展示了杭州作为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全国省会城市人均预期寿命第一名城市

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口健康素质、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文化素质的优势和特点。尤其是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在城市化进程加快条件下形成的“人口分布与流动”分“人口分布”“人口流动”2节进行翔实记述。

以狭义的国土资源——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管理为记述范围,专设土地管理篇,弥补首轮志书将“土地管理”置于城乡建设篇“房地产管理”章中作为一节记述的缺憾。记述一般起于事物发端,设“土地资源”“土地利用规划和耕地保护”“土地使用制度”“地籍管理”“用地管理”“管理和服务”6章。立章记述杭州市土地使用制度,从“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储备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市场”4节记述用地制度改革的改革思路、工作理念,以及创新工作的地域工作特点。“土地市场”节记述了杭州市土地市场发展壮大的变化脉络。设专章“用地管理”,记述杭州市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矛盾紧张条件下社会关注热点的用地管理,分“建设用地审批”“征地拆迁”“征地补偿安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执法监察”5节记述。第六章管理和服务,下设“管理机构”“窗口办文”2节,记述土地管理部门发展变化及其服务社会的工作模式、工作特色。

将首轮志书“城乡建设”篇中的“环境保护”章升格为篇,依据环境保护工作流程的基本逻辑关系,设“环境质量”“规划编制”“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生态建设”“日常管理”6章,重点记述20年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质量变化和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噪声污染治理、工业“三废”综合利用、放射源监管)情况。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确立“以生态市建设为重点,推进‘环境立市’”战略。专设“生态建设”章,翔实记述生态示范区建设、生态市创建的史实。并列章记述“环境监测”(监测设备、常规监测、监测〈监理〉组织)和环境保护“日常管理情况”(管理机构、建设项目环保管理、排污申报、排污收费、违法查处、环保目标责任制、定量考核、检查监督)及发展变化。

第八篇至十一篇为基础设施(包括部分基础产业)部分,即“城乡建设”“交通”“水利”“邮电·信息化”4篇,集中记述杭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和管理,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设,优化杭州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居住环境的城市建设理念及其实施优化环境硬件软件的发展变化情况。

1986年至2005年,是杭州城市建设投入最多、发展最快、市容市貌变化最大的历史时期,也是志书记述较为翔实的部分。第八篇城乡建设,从“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市内交通”“城市绿化”“房地产业管理”“建筑业管理”“市容管理”“环境卫生”“城镇建设”11章展开记述,尤其重点对杭州市1978年后全面启动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整治,即以治房、治水、治路工程为抓手,逐步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同步发展历程的城市建设记述;对市政建设(道路建设、广场桥梁隧道建设、排水设施建设、河道整治、维护和管理)、公用事业、市内交通(公共交通、私用交通)、环境卫生和萧山、余杭、桐庐、淳安、建德、富阳、临安的城镇建设历史和现状做了翔实记述。第五章市内交通,通过对公共交通、私用交通20年变化的记述,展示杭州市内交通建设变化,尤其是私用交通快速发展给人们出行方式和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第七章房地产业管理,以管理的视角突出记述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5年民生关注的住房制度改革、拆迁安置、房屋管理、产权产籍管理、房产交易、物业管理的情况。第八章建筑业管理,下设“主要工程”“施工技术”“施工机械(机具)”“施工企业”“中介企业”“行业管理”6节,以管理的角度记述杭州建筑业20年迅猛发展的梗概。第十章环境卫生,以“环卫设施”“工具设备”“日常管理”3节记载了作为国家卫生城市的杭州市,环境卫生工作机制和工作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史实。

改革开放 30 年,在现代化建设推动下,杭州交通建设及交通运输业步入快速发展黄金期,经济发展为交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交通大发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设第九篇交通,列“公路”“水路”“铁路”“民用航空”4 章,分别纵向记述杭州市交通大发展大变化的历史,尤其对杭州市实现一个半小时交通圈、跨省高速公路建设和进入全国十强空港建设的历程进行翔实记述,同时对断限内交通运输、交通管理的发展变化也做了记述。

为弥补首轮志书将水利定位为“农业的命脉”、将水利设在农业篇中并从农业的角度记述水利的偏颇,二轮志书将“水利”单独设篇,集中于基础设施板块之中。记述一般起于事物发端。设“灌溉工程”“防洪”“治江·围涂”“河道整治”“水力发电”“水土保持”“水利管理”“防汛·防旱”8 章,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兴修水利、根除水患、美化环境、依水而居、因水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因水而强的历程。

在邮政电信基础上,将信息化内容归于此,组成第十一篇邮电·信息化。设“邮政”“电信”“信息化”“无线电管理”“软件信息业”5 章。重点记述随社会信息产业快速发展,“邮政”逐步萎缩和“电信”巨大发展变化的情况过程。设“信息化”章,对全市 20 世纪 90 年代后产业信息化、社会事业信息化、社会管理信息化、信息化保障体系进行翔实记述。专立“软件信息业”章,下设“扶持政策”“软件业”“电子商务·动漫产业”3 节,重点记述杭州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尤其是 21 世纪快速发展、壮大的软件信息业的情况,并列节记述杭州作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和“动漫之都”的发展历程。

经济部类设经济总情、开发区、农林牧渔业、乡镇企业、工业、贸易与经济合作、名优特产、社会服务业、旅游、金融、财政·税务、经济行政管理 12 篇。

第十二篇经济总情为经济部类的领头篇,宏观记述杭州市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1986 年后经济发展的大势大略,重点记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此统领经济部类各篇。

开发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诞生的一个新兴的特殊经济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生事物。杭州 4 个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的 17 年,正是杭州改革开放快速发展、跨越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通过开放带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开发区成为杭州改革开放的缩影和窗口、经济建设的示范区。特设专篇,并置于“经济总情”之后、各产业之前,以体现开发区作为一地经济建设的示范区和改革开放 缩影和窗口的特性。考虑到 4 个开发区的功能特点差异,开发区篇资料排列设置如采取事以类聚、横分记述,难以体现各自特点和事物完整性、系统性,因而采取按事物性质、大小顺序,下设“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其他园区”3 章,并以开发区名列节,再按开发区事物特点横分“建区”“基础设施”“产业经济”3 目记述。第一章国家级开发区,下设“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4 节;第二章省级开发区,下设“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杭州江东工业园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杭州南阳经济开发区”“浙江省余杭经济开发区”“浙江桐庐经济开发区”“浙江淳安千岛湖经济开发区”“浙江省建德经济开发区”“浙江富阳经济开发区”“浙江临安经济开发区”8 节;第三章其他园区,下设“市区园区”“县市园区”2 节,分别记述各级别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功能及发展轨迹。

第十四篇农林牧渔业,分别以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立章,分节记述其生产的基本过程及发展变化。

乡镇企业派生于农业,在改革开放年代发展壮大,是杭州市民营经济之发轫。杭州市乡镇企业的成功实践,成为杭州市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保证。乡镇企业首轮志书为农业篇的一个章。为完整系统记述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专设第十五篇乡镇企业,记述重点起于事物发端,止于2001年。乡镇企业篇下设“行业”“企业管理”2章,第一章行业,设“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5节,记述乡镇企业各行业萌芽、曲折、崛起、发展、壮大至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产权结构和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的历史实录。第二章企业管理,设“行政管理”“企业所有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横向经济联合”“企业升级”“劳动管理”“企业内部分配机制”“产品销售”“利润分配和使用”“科技管理”“质量管理”“外贸管理”12节,记述乡镇企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实践中成长,形成一套富有活力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运行机制,即创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自主快捷的决策机制、灵活应变的营销机制、自负盈亏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酬劳与效益挂钩的分配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历史进程实录。

1978年后,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杭州市工业经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总量逐年壮大,运行质量显著提高。1978年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44亿元,1984年突破百亿元,1994年超过千亿元。2002年2月,中共杭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确立“工业兴市”战略。同年7月18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业兴市”大会,颁布6个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当年全市全部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此后,每年突破新的千亿元大关,至2005年达6589.51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广州,居第二位。杭州作为浙江民营经济第一大市,非公经济实力居全省第一位;500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中,2003年、2004年杭州市均有53家企业入选,2005年有59家企业入选);在全市国有、集体、联营、国有独资等多种经济成分中,非公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均居全市第一位。杭州市的支柱产业中,机械工业总量规模占全省的四分之一;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015亿元;食品工业经济总量占全省近一半;纺织化纤服装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销售收入均突破千亿元大关。为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1986年至2005年杭州市工业发展轨迹,第十六篇工业基本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顺序排列,下设“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日用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建材冶金矿产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电力工业”9章,对工业各行业的兴衰起伏做了翔实记载,重点记述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纺织服装工业、食品工业的历史与现状。篇首无题述宏观记述工业所有制形式、工业结构、产业结构、品牌建设、工业规模、产值等的发展变化,各章以各工业行业微观纵述轨迹,以宏观、微观、条块结合的形式立体记述1986年后杭州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和资源小市,其工业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发展模式和工业特色。

第十七篇贸易与经济合作,立足于1984年杭州市流通体制改革后的发展变化,兼顾社会分工实际和可操作性设置篇目、排列资料。将首轮志书单列专篇的“对外经济贸易”(外贸)与“商业”(内贸)合为一篇,并把“区域经济合作”内容归于该篇。篇下设“商业贸易”“物资贸易”“粮油贸易”“供销合作社商业”“医药商业”“专卖贸易”“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电子商务”9章,重点记述改革开放后流通领域变化较大的商业、物资、粮油、供销合作社,体现杭州作为“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发展历程。在“商业贸易”章列专节“商品市场”,记述改革开放后杭州各类农贸市场和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商业街区发展、壮大、做强的变化过程。专列“电子商务”章,从“发展模式”“物资配送”“企业选介”3节记述杭州市电子商务兴起和逐步发展壮大至成为“中国

电子商务之都”的历史和现状。“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章下设“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利用外资”“国际经济合作”“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7节,“区域经济合作”章从“管理机构”“国内经济联合与协作”“国内招商引资”“接轨上海”“参与开发东西部”“山海协作工程”“国内友好城市”“外地驻杭机构”8节记述1986年后的发展变化情况。篇尾特设专记两篇——“1929年西湖博览会”“2000年—2005年西湖博览会”,翔实记述了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1929年西湖博览会胜景和杭州市政府于20世纪末挖掘历史品牌,恢复举办已停办70年的西湖博览会第二届(2000年)至第六届(2005年)的情况。其中,“1929年西湖博览会”是对首轮《杭州市志》的补遗内容。

为完整体现“中国茶都”“丝绸之府”美誉之底蕴,反映杭州老字号“老树发新枝”并成为新兴品牌大市的发展轨迹,以及众多知名土特产品长盛不衰的情况,创设第十八篇名优特产。记述起于事物发端,下设“西湖龙井茶”“杭州丝绸”“名优特新产品”3章,有代表性地记述了杭州市名优特产形成的历史环境及发展变化。第一章西湖龙井茶,下设“字号、产区与品质”“西湖龙井茶历史”“西湖龙井茶生产”“品种与栽培管理”“采摘与炒制”“销售贸易”“龙井茶文化”7节,并附“杭州十大名茶”,记述杭州茶业的整体发展情况。该章从农、工、商、文多角度立体地记述西湖龙井茶的品质及深厚文化底蕴。第二章杭州丝绸,下设“蚕桑”“丝绸生产”“丝绸贸易”3节,从农、工、商多角度立体地记述杭州丝绸的曲折发展及历史积淀。第三章名优特新产品,下设“土特产品”“名牌产品”“老字号产品”3节,记述杭州市各地知名土特产品和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的新兴品牌(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软硬环境、创品牌始末,以及杭州老字号延续辉煌的曲折历程实录。“老字号产品”节后设专记“杭州老字号今昔”,记述杭州老字号兴起、发展,再经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发展过程和兴起保护老字号品牌的情况,力求加强该章记述深度,起到资治和教化作用。

第十九篇社会服务业,是《杭州市志(1986—2005)》新设之篇。记述一般起于事物发端,既考虑杭州传统的住宿、餐饮、休闲和生活服务业,又突出新兴的家政、装修装潢、中介服务和改革开放后“重生”的特种服务业——典当和拍卖。以“休闲之都”——杭州的社会服务、品质生活、方便民生、促进消费为着眼点,以最终消费服务为特征的消费性服务业视角,专设“社会服务业”篇。由于该服务类型变化大、市场化程度高,篇目设置、资料收集和编纂难度较大,从可操作角度设置“住宿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家政服务业”“装修装潢业”“休闲服务业”“特种服务业”“中介服务业”8章。第一章住宿业,从“宾馆、饭店、招待所”“行业管理”“企业选介”3节,比较翔实地记述杭州自南宋客栈至2005年各类住宿接待单位(包括所有星级饭店、涉外饭店、招待所、社会旅馆等)3253家(星级饭店229家、一般饭店3024家),尤其是星级饭店数成为居北京、上海之后全国城市第三位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二章餐饮业,注重杭派菜系形成、发展和影响不断扩大过程的记述,下设“经营馆店”“杭帮菜”“行业经营”“行业管理”“名店选介”5节,对餐饮业发展特点、经营模式、经营规模变化,从1985年底全市餐饮企业8512家、从业人员25921人、营业收入1.5亿元,至2005年餐饮企业增加到1.58万家、实现营业收入100.86亿元的变化历程予以翔实记载。第三章生活服务业,设“美发美容业”“摄影彩扩业”“沐浴业”“洗染业”“企业选介”5节,记述传统的理发、照相、澡堂和新兴的洗染业随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嬗变和服务范围不断变化、扩大的情况。第六章休闲服务业,分别记述作为杭州传统的“茶馆”和20世纪90年代后新兴的“酒吧”“咖啡屋”3节,有点有面地记述了各自发展变化,展示作为“休闲之都”的杭州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融合、东西方风格各异、多元化需求和谐共存的休闲场景。第七章特种服务业,设“典当业”“拍卖业”2节,记述了其在全国绝迹30多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重新现身及赋予新服务内涵的发展变化,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功能。第四章家政服务业设“搬家”“保姆·钟点工”“企业选介”3节,第五章装修装潢业设“装修企业”“房屋装饰”“行业管理”3节,第八章中介服务业设“律师服务”“公证服务”“会计、审计、税务服务”“房产中介”4节,分别记述这些新兴服务行业随社会发展孕育而生及其发展壮大、规范服务的历程。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是一座山水、文化、城市完美融合的城市,既有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之精华,又有集宗教文化、名人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之广博的西湖文化。尤其是蕴藏“天人合一”理念的西湖文化,不仅体现了东方文化景观中的独特精神力量和魅力,而且铸就了杭州城市的根与魂,成为杭州城市文脉的象征。杭州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是“真山真水园中城”,优美的山水和厚重的人文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和踏访的胜地。二轮志书仍然将“旅游”设专篇(第二十篇),并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内容,以游、购、娱、吃、住、行“大旅游”视角构筑篇目框架和资料排列。旅游篇下设“旅游景区”“人文资源”“旅游规划与建设”“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旅游管理”6章,尤其重点记述了杭州市旅游资源的三个方面,即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和旅游服务资源(住宿、饮食、购物、交通、通信、娱乐等)及旅游市场。第一章旅游景区着眼于西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见西湖篇)、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见西溪篇)、“两江一湖”国家级风景名胜游览区、临安天目山等自然保护区游览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市区游览区,着重记述“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内富阳富春江游览区、桐庐富春江游览区、建德新安江游览区、淳安千岛湖游览区,临安天目山等自然保护区游览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两岸游览景观、文化广场、公园、运河六埠和已整治、新建的运河桥梁景观,以及萧山游览区、余杭游览区和上城、下城、西湖、江干、拱墅、滨江6区游览区景观,重点展示“旅游胜地”的风景名胜资源。第二章人文资源,着重记述文化遗址、博物馆(室)、古代书院、名人纪念馆(庙、祠)、名人故居、名人墓葬等名胜景观,重点展示杭州作为“旅游胜地”历史文化的厚重。以上两章记述旅游客体即旅游资源,是该篇的记述重点。第三章旅游规划与建设,设“旅游规划”“旅游风景区建设”2节,重点记述断限内西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见西湖篇)、“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建设,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市区重点景区(点)建设和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杭州旅游国际化等软件建设情况。第四章旅游市场,设“市场开发”“旅游产品”“旅游宣传”3节,记述1986年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杭州围绕“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目标,提出“大杭州、大旅游、大发展”的发展思路,实施“旅游西进”和推进旅游国际化战略,坚持一手抓入境旅游、一手抓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方针,积极推进国际旅游业和国内旅游业发展,加大投入,强化促销,使旅游市场开发不断深化并取得突破的变化实录。第五章旅游服务,设“旅游公司(集团)”“旅行社”“旅游交通”“咨询服务”4节,篇目以事物发展因果逻辑顺序排列。旅行社为旅游者代办各种手续出境,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安排食宿、交通、游览等活动,是旅游行业中的“龙头”,通过组织招徕中外游客发展自身业务,同时为旅游饭店、餐馆、商场、景区景点、娱乐场所提供客源,推动事业发展。通过对以旅游公司、旅行社为“龙头”和游、购、娱、吃、住、行“硬件”“软件”20年发展变化的记述,展示杭州市旅游服务资源丰富和运作规范的优势。第六章旅游管理,设“管理机构”“职能管理”“旅游业务培训”3节,记述管理机构、职能及教育培训的发展变化和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发展历程。

第二十一篇金融,设“金融体制”“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期货业”“其他金融业”“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管理”7章。第一章金融体制,设“银行体制”“保险体制”“证券(期货)体制”“投资体制”“其他金融体制”5节,记述体制改革历程、机构变化、职能转变,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各专业银行为主体,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等多种金融组织并存的金融体系。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期货业”“其他金融业”展开记述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发展提供前提及背景铺垫。第二章银行业,下设“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杭州分行”“杭州市商业银行”“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7节分别记述其在断限内拓展市场、拓宽服务功能、存贷款业务量不断增加的发展脉络。第三章保险业,设“保险机构”“保险业务”“保险功能”“保险行业自律”4节,记述杭州市保险公司由独家发展到12家,保险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指标居全省第一位的历史和现状。第四章证券期货业,下设“证券业”“期货业”“证券服务业”“证券投资咨询业”“证券投资者”“上市公司”6节,记述了杭州证券、期货业自1988年起步,发展至2005年有证券公司92家、上市公司33家,会计、法律、评估等服务公司近600家,投资者135万户,为全国期货机构最多的地区之一、总体规模居全国第一位的变化过程。第五章其他金融业,下设“产权股权交易”“风险投资”“担保”“典当与拍卖”“债券”“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6节,对以上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重生、壮大的金融业情况予以记述。第六章金融市场,下设“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产权市场”4节,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其产生、发展、壮大、做强及不断规范的历史进程。第七章金融监管和管理,下设“货币和宏观调控”“金融管理”2节,重点就断限内货币存贷调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外汇、利率、现金管理的发展变化进行记述。

第二十二篇财政·税务,依据杭州市社会分工实际和可操作性,兼顾科学合理原则设置章节,下设“财政”“国家税务”“地方税务”3章。以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运用数据、史实反映杭州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统收统支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模式转变的发展轨迹,见证了杭州市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时代变迁和杭州市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后焕发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第一章财政,下设“管理机构”“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企业财务工作”“国有资产管理”“财政对外投资”“会计管理”“财政监督”9节,重点翔实地记述断限内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历史和现状,记述杭州市财政收入自1986年的20.60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520.79亿元,财政收入跻身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三位、省会城市第二位的发展历程,以及进行财政支出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实施部门预算制度,建设政府采购制度,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加大对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7次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始末的实录。第二章国家税务、第三章地方税务记述税制改革、税收(规费)构成、税收征管、税源管理、税务服务,尤其详细地记述杭州市自2004年1月1日停止征收农业税、先于国家两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以人为本、方便于民、不断改进优化纳税服务方式的发展过程。

第二十三篇经济行政管理,下设“计划管理”“物价管理”“统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审计”“生产安全监督”7章,记述经济社会转型期间,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理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记述市政府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分别承担具体指导、协调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市场竞争规则,促进多

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各自履行职责的历程;依据法律法规,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对微观经济进行规制,逐步实现市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监督和调节,实现管理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展示经济管理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从管理的角度反映全市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脉络及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特色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情况。并在“生产安全监督”章下设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记述断限内全市典型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史实警示后人。

第二十四篇至三十一篇为政治部类8篇,即“中共杭州市地方组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与工商联”“人民团体”“政法”“军事”。集中展示在市委领导下,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及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法治建设,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等政治生态情况,记述政治文明建设和为杭州市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政治方向、政治稳定及稳定的工作创业环境、生活生存环境等政治保证、环境保证的基本运行轨迹。

第二十四篇中共杭州市地方组织,设“党员和党代会代表”“代表大会”“组织·机构”“重大决策”“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老干部工作”“教育培训”“党史研究”“保密工作”“机关党务”“纪律检查工作”13章。篇目坚持以人为本,按事物一般逻辑关系和事物发展一般顺序排列。先记述党的细胞——党员及其选举出的党员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产生后,要召开地方党员代表大会,党代会的召开产生市委和常委会,常委会产生后,进行正常的工作和决策,市委各职能部门设置并开展工作,工作运转中纪检监察部门发挥检查和监督作用。一环扣一环,体现各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及相互的连续性。记组织架构,兼顾基层党员、基层组织和由其产生的市委常务委员会、市委工作机构;记党的工作,兼顾宏观的市委“块块”工作——重大决策和微观的职能部门的“条条”工作。记述市委在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结合杭州市实际,加强党的建设,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抢抓机遇、创新发展、敢为人先的工作特色。专设“重大决策”章,设立“战略决策”“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效能建设”6节,记述断限内中共杭州市委依据杭州市城市性质和定位,以“发展、创新、稳定、为民”为总要求,带领全市人民奔小康,实现跨越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选取市委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建设的部分重大决策,这些决策的实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杭州特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专列“效能建设”节记述市委加强政府效能建设方面的决策——“12345”市长公开电话的推出和市直单位综合考评活动的建立过程,在地方人民政府篇“信访”章列节记述“12345”市长公开电话实施过程情况,在该篇“机关党务”章“作风建设”节列日记述市直单位综合考评活动的实施过程情况,体现市委在关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自身建设、政府机关效能建设和百姓呼声、建议。第五章组织工作至第十三章纪律检查工作,按其工作性质,分别记述其20年发展和变化情况。

第二十五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篇目设置坚持以人为本,按各事物间逻辑关系、内在联系及事物发展一般顺序思路,先记人大代表及其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产生后,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产生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产生后,进行正常工作,履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设置“人大代表”“人大会议”“人大组织”“人大常委会工作”4章。第一章人大代表列“代表产生”“代表名录”“代表活动”3节,记述杭州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构成和活动,体现代表的人民性、广泛性和代表素质,以及人大代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体现代表的重要性。通过代

表的地位、作用体现民主政治的成熟度。第二章人大会议、第三章人大组织,记述断限内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大常委会会议、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情况和人大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第四章人大常委会工作设“地方立法”“重大事项决定”“监督工作”“人事任免”“代表工作”“议案、建议与办理”6节,记述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能发挥的发展变化历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推进过程中,依法行使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的情况,反映人民当家做主风貌。重点记述了议案办理情况,展示杭州市社会发展、民主政治、法制建设,以及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议案、建议与办理”节下设附录“议案办理选编”,集中突出与市民息息相关的议案办理决议,体现人大代表关注民生,关注城市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履行权力的实例。

第二十六篇地方人民政府,以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为记述视角,展示杭州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和秉持“为民执政、科学理政、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理念,探索建立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力量解决民生难题,最终达到让老百姓享受民生的“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过程。设“市政府领导及机构”“政府职能”“施政要录”“政府法制”“信访”“外事”“侨务”“台湾事务”8章。第一章市政府领导及机构,下设“市长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其他组成人员”“政府机构”4节,记述断限内变化情况。第二章政府职能,记述改革开放后政府职能逐步转变,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发展变化情况。特设专章“施政要录”,设“城市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4节,记述市政府在市委领导、人大监督下,围绕经济建设、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一要务,依据杭州市地情特色,发挥杭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和人文优势,创新工作思路,依法行政,关注民生。积极寻求探索与杭州区域发展环境相匹配的特色经济发展道路,实现自然、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及杭州经济社会快速跳跃发展的部分施政过程实录。为反映杭州市自1987年开始的政府法制建设及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列专章“政府法制”。设“行政立法”“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应诉”4节,在记述开展行政立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重点记述执法监督、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市民维权意识增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政府而进行的行政诉讼应对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案件数量和变化情况。同时,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增多,呈现高发趋势,尤其90年代末期信访量骤增,由1986年的1.3万件,到1999年的9万余件,2005年达20万余件。专设第五章信访,设“机构”“信访工作制度”“人民来信来访”“信访处理”“‘12345’市长公开电话”5节。第二节信访工作制度,重点记述领导信访责任体系、领导信访接待日和下访接待制度、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办信工作制度和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变化情况。第三节人民来信来访,记述断限内人民来信来访的形式、数量、信访内容变化,揭示自1995年后随着改革深化,信访内容随社会热点转移,信访数量激增,社会深层问题逐步显现,尤其是集体上访量大幅攀升,至2000年后信访行为趋向激烈的现象。第五节“12345”市长公开电话,全面记述了电话设置、电话受理、信访处理和2002年至2005年间受理前10位的热点问题情况,以及“12345”尊重民权、顺应民意、维护民利、赢得民心,得到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拥护,开启党委、政府倾听百姓呼声的窗口,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推动全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为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张名片之始末。第六章外事、第七章侨务、第八章台湾事务,分别记述其1986年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而发生的变化,展示改革开放后围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拓展工作领域、

服务杭州市大局的情况。设附录“1992年—2005年杭州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与精神文明创建篇中的附录“1994年—2005年杭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相呼应,展示杭州市自1992年起每年评选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件大事,纵向看变化,与政府工作相互印证,强化正文记述深度。

第二十七篇地方人民政协,展示杭州市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创新政治协商机制,政协委员依法对杭州市发展建言献策,完善执政党的决策,进而完善政府施政的过程情况。突出杭州市政治协商工作特色,突出协商的质量和有效性,突出政协在杭州市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将记述的“入口”放在政协委员上,包括政协委员的产生程序、自身素质及活动。政协委员的产生体现“精英”的广泛性和特殊性,政协委员的素质体现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深度和质量。政协委员是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基础。篇目设置资料排列坚持以人为本,改首轮修志政协篇篇目设置的逆向思维为顺向思维,按事物发展一般顺序及逻辑关系排列,先记政协委员及其产生,政协委员产生后,召开地方人民政协大会,人民政协大会的召开产生常委会,政协常委会产生后,进行正常的工作,履行人民政协会议职责,体现政治协商制度功能,故篇目设“政协委员”“政协会议”“政协组织”“政协工作”4章。第一章政协委员,设“委员产生和组成”“界别小组”“委员活动”3节,记述政协杭州市第四届至第八届委员会的委员产生、委员构成、界别小组和委员活动发展变化,展示委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情况,为其下各章奠定基础。第二章政协会议,设“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3节,记述市政协四届六次会议至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期间,围绕杭州市中长期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文化名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国企改革、新农村建设、区划调整,尤其是民生问题召开的20次全体会议、131次常委会议、212次主席会议和形成的会议建议案,以及形成全体会议总体协商、常委会会议和主席会议专题协商的规范格局发展过程。第三章政协组织,设“政协杭州市委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3节,记述杭州市政协组织20年发展变化情况。第四章政协工作,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提案与办理”“文史工作”“团结联谊”“学习与工作交流”7节,重点记述市政协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反映人民意志、传递人民心声、广泛参政议政、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推进过程中依法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的情况,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杭州市的特色,展示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设专节“提案与办理”,记述政协提案与办理的发展变化,并设“提案选录”目,选择20年中有代表性的16件优秀提案摘录,展示市政协委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意识和政协委员的地位、作用,以及民主政治素质的成熟度,同时彰显杭州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

第二十八篇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与工商联,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杭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杭州市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杭州市委员会”“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8章,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杭州的贯彻实施和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方针,团结合作,协商共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各党派自身优势,开展参政议政、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及联络联谊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过程。

第二十九篇人民团体,重点记述根据国务院规定免于登记的人民团体,设“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残疾人联合会”“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红十字会”10章,分别记述1986年至2005年各人民团体随着杭州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各自优势,履行职能,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不断扩大活动领域和工作范围,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人民团体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历程。尤其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归国华侨联合会、残联、红十字会等团体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人民团体在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中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加强对群众的引导,教育群众正确对待利益诉求,解疑释惑,服从大局;开展经常性、社会性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全社会关心帮助困难群体,认真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努力化解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为加快发展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为体现人民团体的性质、特点,从政治层面上,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参与社会事务的重大决策;在具体工作层面上,参与社会管理,做好社会服务;在自身建设上,推进人民团体组织自身发展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其中,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在首轮《杭州市志》中过于简略,作为补遗,记述起于事物发端。

第三十篇政法,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5章。第一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分“机构”“管理机制”“平安单位创建”“维护稳定”“专项治理”“管理服务”6节,展示作为全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城市和“全国治安最好城市”的工作机制、工作模式和管理特色。第二章公安,分“机构”“打击刑事犯罪”“社会面治安防控”“治安管理”“经济文化保卫”“人口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8节,翔实记载杭州市改革公安工作机制,深化打、防、控一体化机制建设,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打防并举,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安定,被评为“中国最具安全感城市第一名(2001年)”和被公安部称为“经济发展的热土,社会治安的绿洲(2005年)”的历史进程。为加强记述深度,在“打击刑事犯罪”节后特设专记“千岛湖特大抢劫杀人案侦破纪实”。第三章检察,设“机构”“刑事检察”“反贪污贿赂检察”“法纪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7章,记述断限内检察工作的发展变化情况,尤其是对刑事检察工作机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及法纪检察、监所检察、控告申诉检察、民事行政检察历程做了记述。第四章审判,下设“机构与法官、法警”“审判方式改革”“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立案信访”“审判监督”“执行”“司法鉴定”9节,记述随着改革深入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进步,司法观念更新,审判方式改革,注重裁判过程公开透明的发展进程,重点记述1986年至2005年间刑事审判(反革命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刑事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减刑假释)、民事审判(离婚案件、房地产案件、劳动争议案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合同纠纷案件、破产案件、著作权案件、专利权案件)、行政审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加的变化过程。第五章司法行政,下设“机构”“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机构管理”“公证管理”“监狱管理”“劳动教养管理”“法律援助和服务”8节,重点记述断限内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监狱管理、劳动教养管理、法律援助和服务的历史和现状。

第三十一篇军事,设“军事组织”“军事训练和值勤”“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兵役”“民兵”

“民事防护”“国防动员”“拥政爱民”9章。记述断限内杭州警备区、驻杭部队、武警杭州市支队,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总要求和胡锦涛提出的新时期新阶段人民军队历史使命为指针,实施科技强军,加快部队现代化建设步伐,政治工作、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的发展变化情况,同时记述民兵建设、国防动员、民事防护及拥政爱民工作的发展变化。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国际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个方面的特质相互依托,完整统一地体现杭州城市“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改革开放30年,传承和创新使得杭州文化更富独特魅力。这种文化力,已经得到全市人民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激发杭州人民群众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智慧、热情,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中发挥着“支撑”和“引擎”作用,为市委提出加快“一名城五强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教育强市、科技强市、卫生强市、体育强市、人才强市)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三十二篇至三十九篇为文化部类,即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物、新闻出版、卫生、体育8篇,具体展示改革开放后重点是1986年至2005年文化建设的历程。

第三十二篇教育,设“教育体制”“幼儿教育”“初等及初级中学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办学条件”“教师队伍”9章。第一章教育体制,下设“管理体制”“办学体制”2节,记述1986年起杭州市顺应教育发展、理顺管理体制、优化教育环境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始末。第二章幼儿教育,下设“幼儿教育普及”“幼儿教育管理”“保育与教育”“幼儿园选介”4节,记述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幼儿早教关注度加大,学前教育快速发展、普及,教育部门不断规范学前教育,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发展变化,并通过对杭州幼儿园的选介,以“点”的方式展示其办学情况和特色。第三章初等及初级中学教育,下设“九年制义务教育”“学制·课程”“德育”“体育·卫生”“美育及其他教育”“学校选介”6节,记述全市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前普及和实现高标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以及开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工作的发展历程,并突出记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对重点学校进行介绍。第四章高中教育,下设“普通高中教育”“职业高中教育”“普通中专教育”“学校选介”4节,主要记述各类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尤其是普通中专教育设置随社会发展和就业选择难度加大,学生选择接受高等教育而导致生源萎缩、中专数量骤降的发展变化。第五章高等教育,下设“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其他高等教育”“在杭高校选介”4节,记述高等教育发展和在杭高校20年的变化,尤其是杭州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历程。第六章成人教育,下设“扫除文盲教育”“农民文化技术教育”“职工文化技术教育”“成人中等专业教育”“社会办学”“社区教育”“学校选介”7节,记述改革开放后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基本扫除文盲的基础上,成人教育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和终身学习领域迈进的变化,尤其是记述成人中等专业教育的兴衰和社区教育的兴起始末。第七章特殊教育,下设“视、听、智障儿童少年教育”“心理偏常青少年教育”“学校选介”3节,记述杭州市特殊教育自1986年后办学数量快速增多和办学理念、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历史和现状。第八章办学条件下设“教育经费”“校舍建设”“设施配备”“校办企业和社会捐助”4节,第九章教师队伍下设“学校教师”“学校干部”2节,分别记述杭州市传承尊师重教传统,在随着教育发展教育需求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高的历程。为贯彻教育公平化、均等化理念,加强全市享受义务教育、实施均等教育工作深度,篇尾设专记2篇——“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情况调查”“杭州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通过数据和事实记述杭州市

政府以人为本,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纳入政府议题,所需经费纳入市财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纳入杭州市教育资源整体布局,一视同仁享受良好教育的史实。通过对杭州市及区(县、市)两级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网络及教育活动的记述,构成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齐头并进的教育特色在杭州市的生动体现,并突出杭州市青少年校外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办学成效。

第三十三篇科学技术,设“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科技推广与应用”“科技普及”“科技成果与奖励”“机构与管理”6章。第一章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下设“科技创新建设”“科技体制改革”“高新科技园区”3节,记述全市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后,体制机制、政策、组织、规划及科技本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各行各业、各个层次以至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的一般情况和杭州高新科技园区的建设情况。第二章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设“基础科学”“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软科学”5节,重点记述杭州高新技术领域20年的研究及成果。第三章科技推广与应用,下设“农业科技”“工业科技”“医药科技”“城市建设科技”4节,记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得到推广后,促进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第四章科技普及(科技普及活动、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服务)、第五章科技成果与奖励(重大科技成果、成果管理)、第六章机构与管理(机构、科技管理),分别记述其20年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三十四篇社会科学,设“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教育学研究”“西湖文化研究”“机构和活动”9章。分别记述20年学术研究发展历程,展示杭州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基本水平,研究机构与团体变化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研究管理的基本脉络。专立“西湖文化研究”章,设“西湖文物考古与保护”“西湖宗教文化”“西湖美学”“西湖成因”“学术活动”5节,记述起于事物发端,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湖研究的发展过程,展示西湖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杭州学者认识西湖、珍视西湖、保护西湖的追求和愿望。

第三十五篇文化艺术,章节内容排列总体采取“事以类聚”方式,将不同隶属关系同属于文化艺术的内容相对集中于该篇,设“文学”“艺术”“西泠印社”“电影”“图书馆事业”“档案事业”“博物馆事业”“地方志事业”“群众文化”“文化市场”10章。第一章文学,下设“文学创作”“文学报刊”“文学社团”3节,其中“文学创作”较翔实地记述了1986年后小说(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诗歌、散文(回忆录、游记、随笔、报告文学、杂文)、儿童文学创作流派、创作高潮起伏和“民间文学”搜集、挖掘的历程及文学报刊、社团“潮起潮落”的发展变化。第二章艺术,下设“戏剧”“杂技·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演艺场所”“重大演艺活动”6节,“戏剧”中记述了越剧、话剧、杭剧、睦剧、绍剧、婺剧、京剧、昆剧在杭州近30年的兴衰起伏和杂技、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情况。第三章西泠印社,系从第二章“艺术”中提级升格为章,并置于“艺术”章之后,采取“类以事聚”的方法设置各节内容,以体现事物的系统完整性。下设“机构”“社团活动”“文化产业”“文物收藏保护”“文化交流”“中国印学博物馆”6节。记述西泠印社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到2005年的历史与现状,展示作为集国家级社团、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于一身的艺术社团——西泠印社秉承“保护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发展变化史实,重点记述1999年后市委、市政府把“金石书画”作为重点发展的艺术门类扶持,经2002年机构调整、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后,西泠印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全新面貌发展的实践情况。考虑到电影这

—特殊艺术形式在人们心中的历史烙印及事物发展的延续性,专列第四章电影,下设“放映网点”“电影市场”“放映活动”“发行机构”4节,记述电影在1986年至2005年20年间由“福利电影”过渡到“市场电影”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以数据资料揭示作为电影发行放映收入名列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前列的杭州,电影观众人次大幅下降、放映收入大幅上升的内在因素,即票价过高的事实。第五章图书馆事业下设“公共图书馆”“单位、民办图书馆与家庭藏书”2节,第六章档案事业下设“档案馆”“档案事业管理”“开发利用”3节,第七章博物馆事业下设“综合性博物馆”“专题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3节,第八章地方志事业下设“地方志书”“地方年鉴”“旧志整理和方志利用”3节,均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角度记述图书馆工作、档案工作、博物馆工作,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志工作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并取得社会认可、逐步做强做大的发展变化。第九章群众文化,下设“社区文化”“群众文化活动”“基层文化网络建设”“民间文化”4节,记述杭州随着经济发展,改善文化设施,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艺术水准和质量,在活跃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少儿文化、社区文化蓬勃兴起,以及群众文化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史实。其中“民间文化”一节,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之乡”“保护整理”3目,记述挖掘民间艺术资源,提升群众文化艺术内涵与品位,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保护民间艺术,开展命名“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民间特色艺术之乡”活动始末。专立第十章文化市场,设置“体制机制改革”“市场门类”“市场管理”3节,展示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市场兴起、发展和演变,基本形成门类众多、秩序比较规范、消费层次多元且发展势头强劲的市场兴衰变化过程。重点记述演出市场、娱乐市场(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录像放映厅)、音像制品市场、网吧、美术品(书画)市场和演出中介机构的兴起、发展变化情况。在“市场管理”一节中,比较翔实地记述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市场兴起后,存在的有头审批、无头管理,多头审批、多头管理及执法不一问题,直至2005年1月将原市文化局、市广播电视局、市新闻出版局等行政管理部門的文化市场行政处罚以及相关的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归并,建立杭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使文化市场管理与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分离的历史。

杭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全国七大古都之一。早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智人——“建德人”在杭州地域生息繁衍。2001年,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考古发现,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先人在此生息。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文化被史界称为“文明的曙光”。然而首轮志书由于考古发掘时间晚于编修时限或历史局限,对良渚文化未能全面系统地记述,故在专设的第三十六篇“文物”中,特设第一章史前文化予以专门记述,与“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管理”5章平列。“史前文化”章完整、系统地记述跨湖桥文化和良渚文化发现、发掘、遗址、文物及保护的全貌,以体现事物的完整性。第一节跨湖桥文化、第二节良渚文化采取“类以事聚”的方法设置,“跨湖桥文化”下设“跨湖桥遗址”“下孙遗址”“跨湖桥文化遗址、文物”“跨湖桥文化保护”4目,“良渚文化”下设“良渚文化遗址”“良渚遗址群”“良渚文化文物”“良渚文化保护”4目分别进行记述,记述起于事物发端,相对集中展示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的整体情况。第二章文物保护单位,为便于清晰认识事物性质,节名按文保级次高低排列,下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4节,依次记述了各文保单位的发展变化。第三章馆藏文物,下设“玉石器”“陶瓷器”“金属器”“书画·文献”“杂器”5节,记述馆藏主要文物。并设附“民间收藏精品选”,与馆藏

文物相对应,记述杭州民间收藏的情况,以展示历史古都的底蕴。第四章文物保护,节名也按文保级次高低排列,下设“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及区、县(市)文物保护单位”3节,记述断限内全市各级别文物的维修和保护始末。第五章考古发掘,下设“考古发现”“学术研究”2节,重点记述断限内,尤其是被考古界誉为全国陶瓷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老虎洞窑址发掘和雷峰塔遗址发掘、跨湖桥遗址发掘(均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发现发掘(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情况始末。第六章文物管理,下设“机构”“文物市场管理”2节,记述为加强杭州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文物管理机构变迁和文物市场兴起、发展及规范文物经营行为,加强文物流通市场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第三十七篇新闻出版,设“报纸”“出版”“广播·电视”“通讯社·记者站”“新闻出版管理”4章。第一章报纸,下设“报业集团”“纸质报”“电子新闻媒体”3节,记述在杭出版报纸、新闻媒体的种类、特色及发展变化情况。第二章出版,下设“出版社”“图书·音像·期刊”“发行·销售”3节,记述在杭出版社及出版发行20年的新情况、新变化。第三章广播·电视,下设“机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4节,记述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迅猛发展,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传媒发挥主旋律作用创新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历程。第四章通讯社·记者站,记述国家级主要媒体驻杭通讯社、记者站的基本情况。第五章新闻出版管理,下设“机构”“出版监督”“市场监管”3节,记述1986年至2005年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和出版发行市场的规范、整治情况。

第三十八篇卫生,设“体制改革与卫生机构”“疾病控制”“公共卫生”“基层卫生”“爱国卫生”“妇幼保健”“中医·中药”7章。“体制改革与卫生机构”章,记述卫生改革及改革后杭州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需求,加大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医患关系,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历程和在杭各级医疗、预防保健及教育科研机构的设置及服务特色。“疾病控制”“公共卫生”“基层卫生”“爱国卫生”“妇幼保健”“中医·中药”6章则分别记述断限内相关发展变化及工作特色。篇下设专记“推进‘四改联动’、解决‘看病难’问题”,展示市政府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创新思路,突破体制藩篱而进行的大胆尝试始末。

第三十九篇体育,设“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设施”“体育管理和产业”5章。第一章社会体育,下设“全民健身”“职工体育”“农村体育”“街道(社区)体育”“残疾人体育”“老年人体育”“体育交往”7节,记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情况下,群众体育的开展情况,展示杭州城乡各类人群、各类组织“保健康、要锻炼”理念的形成及积极投身健身和体育锻炼的过程。第二章学校体育,下设“体育锻炼达标”“体育传统项目学校”2节,记述在人们更为关注学习成绩,“拼”中考、“拼”高考的“社会风气”下,学生体育锻炼达标和杭州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的发展变化。第三章竞技体育,下设“训练和竞赛”“主要赛事”“竞赛成绩”3节,记述竞技体育专业训练,在杭举办的主要赛事和杭州籍运动员在国内外主要赛事上的获奖名次情况。第四章体育设施,下设“设施建设”“场馆选介”2节,记述1986年后全市体育场馆、体育设施建设和主要大型场馆情况。第五章体育管理和产业,下设“机构”“体育团体”“体育产业”“体育彩票”4节,记述管理机构、体育团体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记述体育产业、体育彩票产生、发展、管理、规范的历史过程。

杭州自古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朴,积淀了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素有“人间天堂”之

称。改革开放后,杭州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市委、市政府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坚持“亲民理念、亲情服务、亲善管理”,加强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20年的经济大跨越、大发展,杭州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全面小康。杭州数次获得“群众幸福感排名第一”“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称号,为确定“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十篇至四十四篇为社会部类,即精神文明创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社会·生活5篇,充分展示杭州社会建设2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

第四十篇精神文明创建,设“机构职能”“创建活动”“共建活动”“思想道德建设”4章。第一章机构职能,下设“职能”“沿革”2节,分别记述全市为适应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而形成的运行机制、工作职能和设立各种机构的发展变化。第二章创建活动,篇目基本按照先市区、后县(市)和兼顾事物性质分类的顺序排列,下设“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城区创建”“文明社区创建”“文明行业创建”“文明单位创建”“文明县(市)创建”“文明村镇创建”7节,记述断限内覆盖城乡各领域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载体、运作机制、工作模式、先进典型及事迹。第三章共建活动,下设“军民共建”“社区共建”2节,记述全市各单位军(警)民共建、社区共建、联片共建始末,重点记载军(警)民共建活动紧紧围绕全市阶段性工作重心而展开的工作机制、活动载体、共建覆盖面、共建成效,展示杭州市连续4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一个侧面史实。第四章思想道德建设,下设“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学雷锋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4节,记述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载体,营造氛围,加强教育基地建设,开展“三德”教育、学雷锋活动和以爱家乡为突破口的爱国主义教育实录。篇尾设附录“1994年—2005年杭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以“大事”简要勾勒出断限内全市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特色和脉络。

第四十一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篇目遵循“事以类聚”和“事近相聚”原则,结合杭州实际,将首轮志书分设的“人事篇”“劳动篇”和《杭州市志(1986—2005)》断限内市劳动局新增的“社会保障”职能核心——“社会保险”内容合为一篇,集中记述,下设“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就业”“人才与劳动力市场”“工资与福利”“社会保险”5章。第一章人力资源管理,下设“机构”“企业职工管理”“干部与公务员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培养”“人才和智力引进”“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7节,简要记述人事、劳动市本级及下属机构的发展变化,翔实地记述在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职工、国家机关干部与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人才引进、军转干部安置,以及为保证人力资源合理配置、高效使用、绩效评估而建立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及其实施过程的情况,展示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政府应对矛盾的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工作模式和基本成效。第二章劳动就业,下设“就业服务体制”“就业”“再就业工程”“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4节,翔实地记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制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和本地、异地城乡人员在杭就业、异地就业,以及建立市场就业服务体系及其运作的发展历程,展示杭州市政府以人为本,开拓就业空间,实施再就业工程,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实现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就业的工作模式。第三章人才与劳动力市场,下设“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2节,记述杭州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发展、壮大以及不断规范的过程。第四章工资与福利,下设“企业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与福利”2节,翔实地记述断限内不同历史阶段工资与福利的变

化情况。第五章社会保险,下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6节,比较翔实地记述杭州市社会保险于1986年起步至2005年,按照“统一参保管理机构、统一费用征收机构、统一缴费基数规定、统一参保基本信息”原则,基本实现社会保险“五费合征”的发展历程,展示杭州市社会保险工作起步早、工作实,坚持民本理念,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追求社会和谐,整体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特色。

第四十二篇民政,设“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社区建设”“拥军·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管理”“地名管理”7章。第一章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下设“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基层自治组织”3节,重点记述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变化。1999年,杭州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两推一选”,把党员群众的意见作为确定基层领导班子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基层党组织选举办法的创新,促进了其他各类基层组织选举方式的突破,如推行余杭区的村委会“海推直选”办法。余杭区于1998年创建“村务村民理,村官村民选,村情村民知,村策村民定,村事村民管”的“余杭经验”,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首先实行“海推直选”,并在全国首创村委会“自荐海选”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评价体系,村民自治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创新了农村民主决策形式,全面推行“民主决策流程”,规范民主决策制度,落实村民的参与权,“民主决策流程图”被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中心确定为推广内容,形成“党内带动、直选直管”的余杭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模式。故章尾设专记“余杭村民‘自荐海选’当家人”,从一个具体缩影展示杭州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章下对首轮志书补遗,设附录“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的街道居民委员会——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的产生和60年后的情况,以及寻访、论证的过程。并设附录记载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出贡献、全国最早关于在城市建立居委会的政令——1949年12月杭州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文献全文,作为佐证。第二章社区建设,下设“组织”“管理”“社区服务”3节,翔实地记述杭州社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工作模式、工作特色及发展变化。第三章拥军·优抚·安置,下设“创建双拥模范城”“抚恤·优待”“退伍军人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烈士褒扬”5节,翔实地记述杭州市断限内拥军优属工作模式、工作特色和连续4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的史实。第四章社会救济,下设“灾害救助”“社会救济与救助”“收容·遣送”3节,记述在断限内针对市内外各种灾害救助实际,在全市探索、建立、深化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于一体,以社会帮扶、慈善救济为补充,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历程,和农村“五保”户、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1996年起建立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年起开展的一年一度的“春风行动”,以及收容救助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五章社会福利,下设“养老福利”“儿童福利”“福利生产”“慈善事业”“福利彩票”5节,记述随着杭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同步发展,慈善事业不断光大,福利彩票发行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历程。第六章社会事务管理,下设“婚姻登记管理”“收养登记管理”“殡葬”“民间组织管理”“移民安置”5节,记述其发展的历史进程,展示杭州市婚姻、收养、殡葬观念的巨大变化和民间组织快速膨胀、迅猛发展的变化情况。“移民安置”节下,为首轮《杭州市志》补遗,设附录7篇,以文献的形式记述新安江水电站淳安库区于1956年11月至1970年外迁20余万人口,移民安置到江西26个县市、安徽9个县市,以及40余年后移民的生活情况,展示淳安县及淳安县移民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从安排、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大局意识和库区移民“舍小家

为大家”、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第七章地名管理,下设“机构”“命名与更名”“勘界与标志设置”“编纂工作与档案管理”4节,记述地名工作依法管理发展进程和拓宽地名工作范围服务社会的情况始末。

第四十三篇民族·宗教,设“民族”“宗教”2章。第一章民族,下设“民族分布”“民族生活”“民族工作”3节,记述杭州市民族工作20年的发展变化,重点记述桐庐县莪山畲族乡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情况。第二章宗教,下设“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宗教管理”6节,记述断限内各宗教在杭州的情况,着重记述作为“东南佛国”的杭州传承发展佛教文化和以灵隐寺为代表的寺院建设和开展佛教活动,以及各宗教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及交流交往的情况。并在第一节“佛教”下,设专记“1966年浙江大学学生保护灵隐寺纪实”,记述“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杭州影响较大的浙江大学学生带头自发保护灵隐寺的轶事,作为首轮《杭州市志》的补遗。

第四十四篇社会·生活,设“社会风俗”“杭州方言”“城乡居民生活”“老龄工作”4章,以反映杭州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和居民生活的基本情况。第一章社会风俗,下设“生活习俗”“宗教习俗”“节日”“民谚民谣”4节。“生活习俗”设“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文化游艺”“休闲健身”“慈善捐助”5目,“宗教习俗”设“家谱续修”“祠堂修缮”“扫墓祭祖”3目,“节日”设“传统节日”“新兴节日”“洋节”3目,“民谚民谣”设“民间谚语”“新编民谣”“另类辞藻”3目,记述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居民物质文化水平提高而发展变化的历史,同时也记述社会风俗“新潮化”以及一些社会旧风俗以新的面孔出现,尤其是在婚葬等社会习俗上,封建迷信、铺张奢靡之风泛起的不良倾向。第二章杭州方言,依据首轮《杭州市志》记述框架记述,并进行了正误、补遗(补遗起于事物发端),下设“音系”“常用词汇”“杭州话特点”“演变与发展”4节,记述最具地方特质的杭州话的特点及其产生、演变过程,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往来、人员流动频率加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加大,杭州方言包括杭州主体交流语言(媒体、学校、政府机关公开场合用语)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三章城乡居民生活,下设“收入”“消费”2节,“收入”从收入变化、收入差异角度记述了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变化,以及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异变化的历程。“消费”从食品、衣着、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个人用品及服务八大类消费的角度记述城市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巨大发展变化历程。同时揭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5年的7年中,杭州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比之前30年明显加快,改革开放前努力了30年的温饱问题在“六五”时期(1981年—1985年)短短几年中得到彻底解决。至1998年,杭州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消费已达到小康水平。2001年—2005年,杭州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进入富裕阶段。此外,1987年,杭州市进入人口老龄化城市行列,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至2005年底,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95.99万人,占总人口的14.52%。为记述这一社会事实,专设第四章老龄工作,下设“优待政策”“宣传教育”“组织机构”3节进行分类记述。第一节“优待政策”从“老年人优待政策”“社会关心”“赡养保障”“设施建设”4目记述杭州市对70岁以上老年人在市区购买长途车票、观看电影和体育表演、逛公园、乘公交、门诊、洗澡、理发、就餐、购物等凭老年人优待证可享受优待服务(2002年10月扩大到60岁以上)的发展过程,展示杭州市从政府做起,以政策倾斜为突破口,引导全市弘扬“敬老、养老、助老”传统美德,以及全市形成关注、关心、善待、优厚老年人的社会风气的发展历程。“宣传教育”“组织机构”2节分别记述杭州市老龄工作的工作模式、工作重点和创建全国、全省老龄工作先进区、县(市)活动中

涌现出的先进区、县(市)数量列全省第一名的历史和现状。篇后设专记“杭州破解‘七大难’问题调查”,便于读者把握杭州市社会生活脉搏,深化“社会·生活”篇资料内涵。

第四十五篇区县(市)概况,设“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富阳市”“临安市”13章,宏观记述各区、县(市)政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充分展示休闲上城、精品下城、活力江干、古韵拱墅、魅力西湖、高新滨江、实力萧山、人文余杭、潇洒桐庐、秀水淳安、秀美建德、山水富阳、生态临安相互各异的发展特色和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

第四十六篇人物。二轮志书以1978年尤其是1986年后杭州市的发展变化为记述主体,记述杭州人20年中创造的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也包括创造文明社会的主体——人,力求状物、记人相得益彰。因此,人物篇与其他分志各篇互为因果,相互印证,形成统一的整体,体现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和爱国爱乡、忠贞不渝、坚韧不拔、勇于创新、宁静致远、淡泊名利、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杭铁头”精神。既记好“精英”人物、突出贡献人物,又选择寻常百姓、“苟有一德一行者”(“苟有一德一行者,皆可入志”,见明代方志学家张元忬《不二斋文选》)和典型的“斑点”人物入志,以贴近现实,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突出人类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并通过贯穿于人物传、人物简介中人物的创造创新、工作业绩,记述展示杭州人文精神。篇目既考虑与全志相对统一,又沿袭旧志分类记人的传统办法,采取将人物分为三大类分别设章、章下不设节而直接分类记述的方式,设“人物传略”“人物简介”“烈士英名录”“名录”4章,总共收录人物2930人,是首轮志书中人物篇收录人物(1215人)的1.41倍。对首轮志书遗漏的人物,该篇也予以补记。第一章人物传略,分“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经济人物”“科技人物”“教育人物”“文化人物”“卫生人物”“其他人物”8目,共收录112人,其中,文化人物61人,占47.32%;政治人物19人,占15.17%;科技人物17人,占15.17%;军事人物4人,经济人物3人,教育7人,卫生6人,其他人物3人。第二章人物简介,分“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经济人物”“科技人物”“教育人物”“文化人物”“卫生人物”“体育人物”“首届杭州市平民英雄”9目,共收录167人,其中,科技人物53人,占31.73%;文化人物33人,占19.76%;杭州籍两院院士27人,占16.16%;卫生人物14人,占8.38%;经济人物11人,占6.58%;首届杭州市平民英雄10人,占5.98%;政治人物4人,军事人物6人,教育人物2人,体育人物7人。第三章烈士英名录,收录革命烈士共计110人,包括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追认烈士30人。第四章名录,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劳动模范、市劳动模范等人物2541人次(含补记1950年—1985年全国、省、市劳动模范)。

第四十七篇文献,篇幅占全志的12.93%(首轮《杭州市志》也设文献专卷,篇幅占全志的12%),以展示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献之邦和自然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城市的深厚文化积淀、文化传承,以及事在人为、名人辈出、人杰地灵的地域人文特色。作为接续并补遗首轮《杭州市志》的文献篇,既考虑篇目与全志相对统一、内容却相对独立的特点,又沿袭首轮志书的设置,采取将“文献”分为五大类分别设章、章下不设节而直接设目或以正文记述的方式,设“著述目录”“杭州地方文献”“文选”“党政文告”4章。第一章著述目录,篇目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设31个目。正文记述按作者姓名的汉字拼音顺序排列,使同一作者的著述集中,便于把握作者的研究历程,重点收录国内外公开出版的专著和在国内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作者以在杭工作的杭州籍人士和长期在杭工作且著述出版时仍在杭的客籍人士为主,

兼顾长期在杭州域外工作的知名杭州籍人士(或出生地在杭州)和任职单位为浙江省属或杭州市辖县(市)属的人士。“著述目录”收录专著 1500 余部、论文 4700 余篇,集中展示杭州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水平。第二章杭州地方文献,篇目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设 31 个目,正文记述按照著述题名的汉字拼音顺序排列,使各类著述“事同相聚、事近相邻”,不至于因分散而查阅不便。“杭州地方文献”收录专著 2900 余部、论文 900 余篇,集中展示 1986 年至 2005 年全国各地人士研究杭州、关注杭州、描写杭州的主要著述成果,并对其中的重要著述做了提要,以方便读者把握这些重要著述的主要内容、阅读价值和研究价值,便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人查阅、研究。第三章文选,下设“风景名胜文告”“散文”“诗词”“匾联碑刻”4 节。“风景名胜文告”选择对杭州风景名胜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文告 9 篇。“散文”选择全国范围内人名家记录杭州及杭州山水的名篇佳作 35 篇,展示杭州这座城市山水、文化、城市完美结合的特性。“诗词”遴选全国名家吟诵杭州及杭州山水的佳作 17 首,按作品出版时间先后排列。“匾联碑刻”主要收录西湖风景名胜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和萧山、余杭、桐庐、淳安、建德、富阳、临安在 1986 年至 2005 年间制作并公开悬挂、竖立和镌刻的匾联、碑刻,共计 1690 余件,其中匾联 1180 余件、碑刻 510 件,节下设“城区(不含萧山区、余杭区)”“西湖”“西溪”“区、县(市)”4 目,分别按照一般游览的先后顺序排列。第四章党政文告,遴选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 30 篇,以文献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展示市委、市政府在断限内立足杭州、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战略思维、改革走向和发展轨迹。

为加强记述深度,提高学术严谨性,方便读者阅读,全志增设括注、脚注,分为:1. 引文注释;2. 参见、详见、见等指向注释;3. 超上下限的文字内容注释;4. 补遗正误的文字内容注释;5. 地方特色事物需要说明的文字注释;6. 专有名词或缩略语注释;7. 资料来源注释;8. 生僻字注释;9. 以事系人需要说明的文字注释;10. 其他需要介绍说明以加强记述深度的文字注释等。注释总计近 15 万字,其中括注 3135 处、脚注 759 条,用以提升志书内容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方便读者读志用志。

编纂始末,详细地记述《杭州市志(1986—2005)》编纂过程中的人员组织、工作模式、编纂节点等情况,也包括在此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遇到的问题和克服困难完成编纂工作的经验总结,以鉴后人。

索引为综合性内容分析索引,关键词包括目与子目、图、表、录和有检索价值的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事物、事件、风景名胜、名优特产品,以及概念、术语、书刊名等。按照关键词首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设置音序检字表和笔画检字表两个查阅入口,便于不同查阅习惯的人士方便而快捷地使用;将目与子目、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图、照、表及有地方特色的事物、事件等关键词混合编排,不分专题,以尽可能地将相关事物、事件等集合起来,便于读者查找及提高检索效率。

志余卷系在《杭州市志(1986—2005)》编纂过程中未做收录的相关资料基础上补充辑成,既是《杭州市志》和《杭州市志(1986—2005)》两书的阅读向导,又是从新视角展示杭州发展变化的资料性文献;既能作为两轮《杭州市志》的参考读本,又能引导读者认识杭州、热爱杭州、研究杭州;既与《杭州市志(1986—2005)》主体各卷相配套,又是相对独立的单卷本资料性文献。分导读(市志导读)、综述、口述、课题、附录(杭州历史纪略)5 个部分。其中,“市志导读”以两轮《杭州市志》的编纂理念、思路、内容、过程为记述范围,述及篇目框架如何设计、市情地情如何把握、时代

特点如何突出等内容,对篇章节的排序、卷首及各篇概要、资料编排情况等也做了详细说明。文中对《杭州市志》的说明一般记述到章,重点篇章记述到节;对《杭州市志(1986—2005)》的说明一般记述到节,重点篇章记述到目。志余卷记述上限为1978年,下限为2008年,以这些资料作为旁证,并与《杭州市志(1986—2005)》互为印证,达到加强全志记述深度,反映杭州市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目的。

(李忠民)

经济综述

杭州市地处东海之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早在唐朝中期就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与压迫,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国民经济几近崩溃。1949年杭州解放时,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为4.79亿元、人均166.3元,粮食产量45.75万吨、人均79.4千克,人民生活困苦,难以为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把千疮百孔、百业凋敝的旧杭州初步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经济发达的新杭州。在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实现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实现对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杭州市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趋激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先后在农村和城市逐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近20年,杭州市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思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国民经济带上了一条高速增长的道路。

一、城市特色与经济发展定位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根据自身特色和条件,选择个性化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用己之长,避己之短,才是一个城市谋求发展的最有效出路;否则,城市发展就可能陷入四面出击、处处受制的被动局面,甚至会丧失整个城市的竞争力。

(一) 城市特色与优势

审视杭州的情况,其发展可以凭借的优势在于:

1. 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杭州有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资源,又不乏深具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资源。从自然景观来看,全市风景可谓“景中有城,城中有景”,是自然风景名胜区和大城市融为一体的绝佳典范。杭州西湖是我国36处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中最为秀丽、著名的一处,她与城市相互支撑、关联,不可分割并且难以复制。除西湖外,杭州市还有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等著名风景名胜点200余处。从人文景观来看,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璀璨,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孕育了吴越首府和南宋国都,始于新石器时期后期的良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更为中华文明史增添了亮丽的一笔。从全国范围来看,论自然风光,杭州不及桂林、黄山,论历史悠久,杭州不及北京、西安,论经济实力,杭州不及上海、广州,但能同时集美丽的湖光山色、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于一体的,唯有杭州。

2. 人力资源储备丰富

进入21世纪以后,在杭高等院校有20余所,在校学生达6万余人。现浙江大学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4校合并后组建,其规模之大、学科门类之齐全,为全

国之最。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的建设也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和技术创新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 交通便利

杭州坐落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紧邻中国的金融、经济中心上海,距离日本东京和北京、香港、台北等城市也仅2小时左右的飞行航程。

4. 经济基础良好

杭州市传统产业较为发达,加工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同时,应当看到的是,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若干限制条件:缺地、水、电、能源等物质资源,还缺乏重工业基础,也没有天然良港可以凭借。此外,前期引资不足和民营经济比重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杭州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 城市发展定位

长期以来,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优势,扬长避短地发展城市经济对杭州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因而从建国起,杭州市城市发展定位的主线一直在风景旅游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点之间来回摆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将发展经济(主要指的是第二产业)和发展旅游(主要指的是第三产业)综合起来作为杭州市经济发展目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而在具体的不同时期又各有偏重。1986年至2005年,杭州市的发展定位与奋斗目标大致经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年,国务院在批复《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指出,要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同时,杭州又是国务院首批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而在实践中,杭州的城市定位被表达成:浙江省的省会、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偏重于“省会”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过于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发展。

第二阶段:1988年,杭州市提出“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该目标将文化建设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的位置,及时纠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先经济、后文化和重经济、轻文化倾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一口号缺乏个性特点,无法体现杭州的城市特色。这是因为:“经济强市”的概念较为抽象,并且几乎是所有大城市、省会城市的共性;而“历史文化名城”更难以体现杭州的独特性,自1982年以后国务院分3批公布了99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明确杭州的发展定位,提出更具杭州特色的奋斗目标势在必行。

第三阶段:2001年,杭州市将“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进一步深化,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的奋斗目标。至2005年,市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力争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同时,还提出至2050年的远景目标:形成完备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各项功能,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产业体系,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由于城市的“国际性”包括“经济强市”内涵,而“风景旅游城市”定位又很好地将杭州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这一特色纳入其中,因而这一奋斗目标较好地体现了杭州的城市特色及优势,对杭州市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体制改革

杭州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来源于持续而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20年来,全市

的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基础性变革到不断完善的过程,走的是一条“先农村、后城市”“先总量、后结构”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杭州市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原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业结构朝着更加有利于全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动、调整,生产力亦得以发展、解放。

杭州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突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继而进入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生产发展为中心的第二步改革。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取消农副产品统派制度,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迈进。农村改革的成功无疑给城市改革注入了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迈入正轨。1986年起,主要从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逐步展开。“七五”期间,杭州市经济发展仍然更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在这段时期里,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较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受束缚的生产力。进入“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市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日益受到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更侧重结构方面的调整。这一转变为全市经济高速发展、实现重大飞跃以及建设“经济强市”目标的实现注入强劲的动力和巨大的活力。

(一) 以企业改革为主的城市体制改革

1986年开始,“七五”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国务院提出“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全市上下一心,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迈出相当大的一步,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刀阔斧推进的企业体制改革。在“七五”计划之初,杭州市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企业经济效益差的弊病日益显现,成为制约全市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因此,以增强企业活力、盘活国有资产为目的的企业体制改革应运而生。

首先,市委、市政府在改善企业外部条件上采取若干新措施,先后颁布《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的若干实施意见》《关于工业、商业企业落实和完善经济责任制的若干规定》等。同时,为减轻企业负担颁布优惠政策:分期分批取消调节税,提高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的留利率,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企业的折旧基金留给企业自行使用。

其次,通过积极探索“两权分离”的道路来强化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在小型企业中继续完善租赁经营责任制,在全民大中型企业中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进行股份制试点。1986年,市区进行股份制试点的企业有大江南皮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龙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至1989年底,市区累计有近40家股份制企业。股份制被认为对于促进国有企业机制转换和行为合理化有着独特的作用,是搞活国有企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当时企业形式仍然存在不少理论性和政策性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以“积极慎重、从严掌握”的原则进行,并仅在小范围内推广。至1990年底,全市有90%的企业第一轮承包到期,市政府提出对承包基数和经营者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力求尽快落实第二轮承包。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于增强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防止或减缓企业上缴利润的滑坡,推进企业内部的配套改革,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除积极推行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外,市委、市政府还通过其他相关措施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如广泛推行浮动工资制,完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建立企业效益工资升级卡制度;扩大推行和强化厂长(经理)负责制,协调党、政、工、团间的关系。1988年,市属公交

系统 156 家国营工业企业和 17 家大中型国营商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建立以厂长(经理)为首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体系。

1989 年开始,企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实现生产经营思想的 4 个转变:从偏重产值速度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从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到靠内涵扩大再生产;从依靠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素质;从国内市场为主转到国内外市场并重。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推广“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实现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推进企业兼并、联合、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使存量资产合理流动。

“八五”期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全市改革呈现良好势头。“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杭州市经济发展提供一条崭新的思路,为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打通关节,全市上下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其间,杭州市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中心环节。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改革。

1. 落实企业自主权,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进行劳动、分配、保险三项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推行经营、用工、价格、分配“四开放”改革,推动企业走向市场,使工业部门产品结构和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取得新进展。同时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企业内部初步形成“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2. 逐年增加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的数量

1993 年起,产权制度改革开始起步,市政府颁布《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中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试点稳步推进。1994 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继续扩大股份制试点并有新的突破:重点交通、能源项目实行股份制,城区搬迁企业实行股份制,企业间债券变股权改组股份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开始起步,采取部分国有资产有偿转让的办法将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工贸共同投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探索以职工保障协会为投资主体持股的新形式,为公司制改造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3. 推进企业兼并,发展企业集团

以“优势重组、发展生产与扭亏结合,灵活协调政策以利于平稳过渡”为原则,突破部门、地区、所有制界限,按照企业自愿组合的原则,对那些产品无明确发展方向、经济效益低下及扭亏无望的企业,果断地实行兼并、联合或转向第三产业。新发展的企业集团都是以一个经济技术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为核心,主要以资产关系为联结纽带,连接若干紧密层、半紧密层的企业,优势互补,发挥综合功能,实现规模效益,带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九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仍然是企业改革。1996 年,杭州市以“抓大放小、资产重组、整体优化”为方针,重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项配套改革相应取得新进展,促进了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1997 年,根据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和中共十五大精神,制定《杭州市企业改革三年规划》。1998 年至 2000 年,全市按照率先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两目标”的要求,围绕落实三年规划,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大胆探索,合力攻坚,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 优化资本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

积极培育大集团、“小巨人”企业,对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个集团企业和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等 50 个“小巨人”企业采取债转股、土地增资转权、直接投资、贴息贷款等政策措施,予以重点培育,使之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继续规范发展企业集团,至 1999 年全市累计组建企业集团 211 个,企业集团的规模和规范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在加大力度扶优扶强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对部分产品有市场但负担过重、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对产品没有市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和关闭。

2. 加快企业改制

“九五”时期,杭州市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改制,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具体模式有:

(1) 职工入股置换。通过职工入股和置换国有资产,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成功将原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并将职工利益与企业兴衰通过资本纽带紧紧连接起来,强化了激励约束机制。2000 年改为公司制的 53 个企业共 8.20 亿元总股本中,国有股 1.89 亿元,占 23.02%;职工持股会持股 4.32 亿元,占 52.64%。

(2) 社会资本购并。1999 年起,市政府积极鼓励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企业参与杭州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对于一些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扭亏为盈的国有企业,采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为这些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并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3) 外资购并嫁接。利用外资对国有企业进行购并、嫁接,不仅能够盘活存量资产,而且能够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

(4) 债权转股权。仅 2000 年,全市就有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齿轮箱厂、杭州玻璃厂、杭州磁带厂 4 个国有大型企业列入国家“债转股”计划,涉及债转股总金额达到 7 亿元,同时,也为这些企业引入新的投资主体。至 2000 年末,市经委、商贸、园林、旅游、农业系统共 279 个直属企业中,改制的有 233 个,改制面达 83.51%。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 111 个,改制 96 个,改制面为 86.49%。市属和区、县(市)属国有企业改制面在 85% 以上,其中,168 个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面为 88.7%。从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改制效应逐步体现。2000 年,全市完成改制的 156 个企业在消化历年大量亏损的情况下,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73.96 亿元,利税总额 15.91 亿元。

3.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1996 年,全市 28 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中,有 25 个进入实施阶段。各试点企业坚持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对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果。

2001 年起,杭州市进入“十五”计划的建设时期,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初步显现,全市经济面貌不断改善,改革重点转为巩固原有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

以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改革的重点转入国有企业的“二次改制”。市委、市政府继续以产权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深化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市土管部门通过土地储备中心收购的形式,支持市属工业企业盘活 40 余公顷存量土地;市财政部门通过级差地租返还等形式,解决企业改制成本问题。至 2002 年,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市属工业、交通、商贸、园林、旅游、农业等系统改制企业累计 279 个,改制面积达 99%。

根据市属国有工业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的实际情况,改组成产权清晰、权责到位、以资本经营为主的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公司。2002年,在对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杭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杭州汽轮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又完成对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全市工业国有资产形成1个工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6个授权经营公司的“1+6”大企业、大集团格局。同时,整合商业类资产,撤销市物资总公司,将市物资总公司、市贸易局及市粮食局的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企业划入杭州市商业资产经营公司。为强化高新区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组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加快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将原市旅游局所属企业和市经委所属杭州大厦集团公司以及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饭店等优质资产进行重组,创建杭州市旅游集团公司,行使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职能。

2003年末,杭州市有16个资产营运机构经市政府授权经营150余亿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资产占总国有经营性资产的90%左右,国有资产营运体系得到完善。加大城市公用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坚持“打破垄断、开放市场、政企分开、政事分离”原则,采取资本入股、资产重组、公开竞价等形式,使公交、燃气、房地产等公共事业单位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到2005年,4个市属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剥离30%优质土地资产国有股权并实行公开转让,改制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

2002年,杭州市提出“做大做强杭州板块,实现3年上市公司数量翻番”目标,制定《关于培育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2003年,实施“四轮驱动”(主攻国内、瞄准海外、寻机买壳、吸引进杭)的上市策略,效果明显。至2003年12月,全市上市公司总数21个,其中A股16个、B股1个、境外4个,总资产合计165亿元,净资产合计81亿元,累计募集资金40亿元。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杭州打造成长江三角洲南翼金融中心城市的市场定位和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具体发展思路,2003年起草《关于加强服务促进金融机构来杭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着力构建开放、灵活、层次分明的区域性资本市场。

(二) 农村体制改革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市农业与农村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农业资源得到全面开发,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同时,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改革亟待推进。

进入“七五”时期以后,农村体制改革转入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生产发展为中心的第二步改革。集体和农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形成。全市农村改革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把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作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主导方向,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上升;农村经济商品化发展加快,各种专业户和购销联户纷纷出现;科技和流通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工作有所加强;乡镇企业和以集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股份制经济发展迅速。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市农村明显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依靠科学技术,注重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产业结构开始优化,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村经济呈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势头。全市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加强农业基础,落实各项兴农措施,继续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市政府颁发农业承包合同签证、仲裁等配套办法,使农业承包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围绕发展“一优两高”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经济朝

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农村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业生产责任制,农村股份制改革逐步深化,农业保障体制开始建立。杭州市把农村股份制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性措施来抓,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已成为乡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主旋律。以延长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积极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加快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村市场、办好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重点深化农村改革,农村股份合作制继续向农业和林业等领域发展。到1993年底,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349家,比上年增加326家。1995年,农村改革深化,农业保障机制开始建立,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逐步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是年,杭州市还规范乡镇企业转制工作,对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和防止集体资产流失起到有效作用,并通过强化集体资产管理意识,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作为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三、经济结构变迁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近20年全市经济体制结构日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民营经济比重上升为主要特征,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和二、三产业比重的稳步上升,市场构成则由原先单一的封闭式经济演变为国内外市场并重。

进入20世纪80年代,杭州市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逐渐显现:国有资产投资在总量上与其他城市相比明显不足;国营企业运营效率低下,生产力难以得到释放。公有制比例过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引导下,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茁壮成长。此后20年,所有制结构经历从国有经济一枝独秀,到民营资本异军突起的变化,并逐渐演变成国有与民营交相辉映的可喜局面。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拉开了杭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序幕,全市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而二、三产业规模迅速上升。进入21世纪后,从建设“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的定位出发,杭州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逐渐转变为各大产业内部的优化:第一产业内部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内部那些能耗高、附加值低、环境污染重的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以软件开发、现代医药、新型材料等为代表的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本密集的新型工业;第三产业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旅游业主导演变为旅游、会展、金融、教育等行业并驾齐驱的崭新气象。三次产业之间内部联系日趋紧密,整体实力不断得到巩固。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相对其他沿海城市来说起步较晚,但通过利用自身经济基础良好、民营资本活跃等众多优势,全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大有迎头赶上之势。

(一) 所有制结构变化

1988年,杭州市提出“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奋斗目标,但在实际发展经济过程中,却遇到投资不足的难题:杭州市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向来不足;由于在首轮引资中没有很好地把握机会,全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几近空白。因此,加快扩大非国有投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步伐刻不容缓。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杭州市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要的位置,这一所有制结构从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资源由政府统一调配,企业面对的是计划而非市场,相互之间缺乏竞争,因而许多企业缺乏活力,劳动者缺少积极性。只有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力地推

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长,才能搞活整个市场,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因此,在杭州市其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其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放宽个体私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创造出一个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环境。

杭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大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农村体制改革的率先完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八五”时期,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进入“九五”时期后,随着改革的深化,杭州市先后制定加快乡镇企业转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政策,使得个私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十五”时期,杭州市一跃成为全省民营经济第一大市。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全市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杭州市经济腾飞最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七五”时期,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处于萌芽阶段,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比重虽然不高,但增长势头迅猛。在农村,一个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悄然形成。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全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全市乡镇企业累计上交国家税收22.46亿元,其中1990年比1985年增长94.0%,年平均递增18.0%。1990年,平均为全市每个农业人口增加收入285元,占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的28.3%。农业人均收入比1985年增长80.5%,其增长部分的36.1%来自乡镇企业。

在工业领域,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仍然嗷嗷待哺。1990年,在全市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共5887个,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仅为11个。全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实现工业总产值153.29亿元和130.09亿元,分别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2.45%和44.51%,其他经济所占比重仅3.03%。

个体企业发展迅速。1983年起,杭州市贯彻“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使个体工业、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86年末,全市登记发照的个体工业、手工业达1.2万户,从业人员2.59万人,资金额3502.5万元,营业额(产值)1.08亿元,其中商品零售额2465.4万元。与1985年相比,户数增长22.6%,人数增长28.5%,资金额增长44.5%,营业额增长73.9%。个体工业、手工业产品门类不断增多,服装加工、丝绸、针织品及为大工业配套的零件加工业不断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平均每户资金由241元增加到2910元,增长11倍;年营业额上升到8962元,其中一部分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和设备。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后,全国上下关于所有制结构变革的思路进一步开阔。杭州市在公有制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在理顺国有资产产权关系、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全市工业总产值中以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为主的其他工业增长最快,达134.5%;非国有工业增量占全部工业增量的80.1%。是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企业数平稳发展,国有经济增加5家,集体经济减少19家,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由1991年的79家增加到122家,增长54.4%。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实现的利润也大幅度增长,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实现利润21087万元,是1991年的2.57倍。

1993年开始,杭州市坚持“多轮驱动、多业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通过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制定政策、强化服务,促进个体、私营企业迅速纳入“快车道”。至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12.80万户,比1992年增加9.1%;私营企业3042户,比1992年增加67%。1994年,全

市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上城、桐庐、建德等区、县(市)都制定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各地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振兴地方经济、加速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重要措施来抓,通过逐步理顺关系、强化指导服务,使之日益成为经济增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95年,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企业数量占全市企业数量的比重由1992年的97.8%迅速下降到1995年的85.5%;个体和私营经济所占比重由2.2%上升到14.5%。

“九五”期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取得新进展。全市继续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提高到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位置,个私经济日益成为杭州市经济增长中的一支劲旅。1999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放、扶、管”的工作思路:“放”字当头,解放思想,消除一切有碍个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扶”字着力,扎扎实实地为个私经济办他们不能办、办不了的事情;“管”字从严,在管理上加大力度,引导个体私人企业依法经营。9月,为保护个私企业的利益,市政府颁发《杭州市个体私营经济权益保护办法》。至2000年末,全市个体工商户16.93万户,从业人员26.49万人,注册资金35.19亿元,比上年增长2.7%;私营企业3.15万个,投资者6.08亿人,雇员40.32万人,注册资本197.70亿元,分别增长23.1%、25.6%、38.1%、26.8%。全市个体及私营经济工业总产值1023.23亿元,比上年增长33.4%;个体及私营经济的消费品零售额达140.58亿元,占全社会的比重上升至34.8%,较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

除发展迅速、对经济贡献度不断加大之外,杭州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还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至2000年末,全市注册资金在500万元~1000万元的企业有535个;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41个,比上年增加69个;私营企业集团达29个,比上年增加18个。

2.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经营领域不断拓宽

第三产业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且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和服务业,尤其是服务业增长较快。在国家加大农业投入、推动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引导下,投资第一产业的个私企业也有所增加。1998年,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达到706户和87个。同时,鼓励和扶植个体私营企业向信息中介、科技开发咨询、软件开发等新兴行业拓展。

3. 向外向型企业方向发展

私营企业申报自营进出口权条件放宽,私营企业外贸出口额显著上升。2000年,71个私营企业获自营进出口权,有773个私营企业的产品出口,实现交货值38.96亿元,其中交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523个。私营企业利用外资情况良好。

4. 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市委、市政府实施政策引导、财政贴息、优化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个私企业主走科技型的发展道路。进入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个私企业超过100个,占进区企业的半数以上。2000年,全市个私企业技术改造投入资金9.33亿元,其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资金达2亿元。

“十五”期间,杭州市成为民营经济大市,这得益于杭州市积极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和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实施两轮“三年倍增”计划,杭州市实现从国有经济大市向民营经济大市的跨越,凸现“三个第一”。

1. 非公有制经济实力位居全省第一

全市民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 174.7 万元,比上年增长 8.8%。民营企业在初具发展规模的基础上,为实现规模效益,积极组建企业集团,全市有民营企业集团 235 个。有限责任公司继续扩张,全市有限责任公司增至 6.9 万个。个人独资企业达 9737 个。无论是非国有企业数量、非国有企业总资产,还是非国有企业年营业收入,杭州市均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在全省“四分天下有其一”。

2. 500 强民营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在全国 500 强民营企业排名中,2003 年、2004 年全市均有 53 个企业入选,居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全省各市首位,入选量占全国的 1/10 强。2005 年,杭州市有 59 家企业入选 500 强,占总数的 11.8%,连续 4 年居全国、全省第一。

3. 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和贡献位居全市第一

全市非国有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 91.8%,非国有企业职工占全部企业职工数的 89.7%,非国有企业年营业收入占全部企业数的 87.5%,对全市 GDP 的贡献率达 56.6%。

市委、市政府制定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改善投资个私经营者的投资积极性,个私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私营企业增长快速,组织形式不断优化,有限责任公司占主导地位,个人独资企业的快速增长促进独资企业数量的扩张。有限责任公司这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企业组织形式得到广大私营企业主的青睐和认可,成为私营企业的主要发展形式,且增长速度最快。2003 年末,全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为 1.72 万个、1567 个、4.99 万个,比上年增长 13.7%、16.2%、25.1%,分别占私营企业总数的 25.1%、2.3%、72.6%。

(二) 产业结构变化

杭州市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初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二产业是杭州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一产业也起到重要作用,第三产业则相对不发达。进入“七五”时期后,全市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年均增长速度达 16.4%,高于第二产业 12.1% 和第一产业 1.6%。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由 21.3% 提高到 33.2%,拉大了与第一产业的差距。第一产业平均增速大幅下跌,导致其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也有较大下降。“八五”时期开始,第三产业在保持较快增速的条件下,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达 41.6%,缩小了与第二产业的差距。第二产业平均增速比前两个周期有较大提升,巩固其对 GDP 增长的带动作用。第一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继续下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要求。

总体来说,第二产业一直对杭州市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主要的带动作用,第三产业对全市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的贡献度逐步下降。三次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变化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基本平稳中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见表 1)。

改革开放之初,全市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过高,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以 1978 年为例,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有 6.34 亿元,第二产业 16.93 亿元,第三产业仅为 5.13 亿元。进入“七五”时期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业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优化。至“七五”时期末,全市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 30.94 亿元,第二产业 96.17 亿元,第三产业 62.51 亿元,三大产业在全市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演变为 16.3:50.7:33.0。这一比重自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农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表 1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其比重

年份	三产产值 合计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值 (亿元)	比重 (%)	产值 (亿元)	比重 (%)	产值 (亿元)	比重 (%)
1985	90.49	15.97	17.65	52.09	57.56	22.44	24.80
1986	104.36	17.76	16.86	60.13	57.07	25.47	24.17
1990	189.62	30.94	16.32	96.17	50.72	62.51	32.97
1995	762.01	69.25	9.09	410	53.81	282.75	37.11
2000	1382.56	103.96	7.52	709.32	51.30	569.27	41.18
2005	2942.65	148.21	5.04	1496.94	50.87	1297.5	44.09

进入“八五”时期后,三大产业全面发展,第三产业制约第一、二产业发展并严重落后的状况有所改观,三大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在国家重点倾斜政策的支持下,农业投资额明显增加。在第一产业,通过鼓励农民按照市场需要生产,依靠科技力量进步,使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得到调整:农、林有所下降,牧、副、渔得到发展,其中副业发展速度最快。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鼓励第一、二产业和机关的富余人员转入第三产业,鼓励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兴办第三产业。1995年,杭州市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产业结构按照“优二兴三”的原则进行调整,变得更加合理。三大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69.3亿元、410亿元、282.75亿元,比例关系调整为9.1%、53.8%、37.1%。

“九五”时期,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2000年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比1995年的水平增长37.3%、78.9%、77.4%,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调整为7.5:51.3:41.2。第一产业稳中有降,继续巩固其基础地位;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重点在于内部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地位日益提升。全市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提高。

进入“十五”时期后,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兴市”战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转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靠工业拉动转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两轮驱动”。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更加明确:杭州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支撑点和增长点是以创新为动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天堂硅谷”和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商贸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以体现杭州市城市发展特色,搭起“经济强市”的筋骨。通过对这两大支撑点和增长点的把握,让创新产业贯穿于经济发展始终,成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运行质量的“助推器”,让服务业体现在经济发展全方位,成为生产、开发、管理诸环节的整合开关。

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市在探索工业产业结构的道路上走得曲折而艰辛,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产业所贡献的。在第二产业中,又以制造业占绝对比重。然而进入21世纪后,制造业对杭州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传统产业仍起着决定性作用,支柱产业优势不强,产值比重最高的是纺织行业,而居第二位的是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多数制造业层次较低,工业技术集约程度不高,还没有真正摆脱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从而使得产业的竞争力较弱;传统资源缺乏的弱势进一步制约着杭州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制造业的发展。此外,杭州市作为旅游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2001年,市政府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的奋斗目标,为保护宝贵的旅游资源,杭州不能发展污染高的制造业,而能耗大、污染高、附加值高的制造业也不符合杭州发展的方向。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为杭州市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走出一条具有鲜明杭州地方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找准比较优势,打造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与城市性质相吻合的生态工业与绿色工业,在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同时,建设绿色生态工业城市,使工业兴市与环境立市实现良性互动,使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构建现代化大都市相得益彰。

“十五”期间,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思想的指引下,全市工业结构日趋合理,既实现“工业兴市”的经济目标,又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环境的破坏。杭州市着力发展由以下几类支柱产业构成的工业:

1. 源知识型产业

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达到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应用领域广泛的“原创型”高新技术产业,如软件、集成电路、现代医药、新型材料、高消费类电子产品等的开发、设计与生产。

2. 创意型产业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市场前景广阔,附加值很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网络游戏、动漫卡通、女装、房产及园林等设计产业。

3. 提升型产业

对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机械、纺织、食品、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使用技术加以改组改造,进行行业结构整合,或通过招商引资进行“嫁接”提升,不断提高其科技附加值,从而增强其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达803.74亿元,增长11.3%,占比15.1%。杭州高新区通信产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计算机与网络产品产业园、富阳光纤光缆产业园跻身全国首批电子信息产业园,通信、软件、集成电路设计、数字电视、动漫、网络游戏6条产业链初步形成。

“十五”时期,杭州市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继续不断优化。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优势 and 人力资源优势,杭州市大力发展旅游、会展、金融、教育等第三产业。旅游业是不断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朝阳产业,也是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产业,其产业关联度之高、带动能力之强、增长潜力之足、对经济贡献度之高,都是其他许多产业所无法比拟的。杭州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并且全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完善,这些条件都为杭州市建设“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目标定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0年后,杭州每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带动了杭州市旅游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还扩大了杭州在全球的知名度,使得杭州成为继上海和昆明之后又一个全国会展中心城市。金融业发展对全市国民经济增长直接做出贡献,更为杭州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壮大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教育业的积极发展有助于推进杭州市人力资源集聚,从而为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三) 市场结构变化

“七五”期间,当杭州仍致力于内地市场时,不少沿海城市开始着眼于国际市场的开拓。面对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1989年起杭州市奋起追赶,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内需求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缓解。外资外贸水平的不断提高,给杭州市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也带动了有关产业的发展。在外贸方面,尽管遇到不利因素,如国家出口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对杭州市的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加上1998年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出口增速有所减缓,但增长势头较好(见图1)。至2005年,杭州市形成较为合理的进出口结构,产品远销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在引资方面,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制定引资政策等措施,全市引资步伐不断加快(见表2)。外资不断涌入对提升和改善杭州的产业结构、带动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弥补资金缺口、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国际竞争力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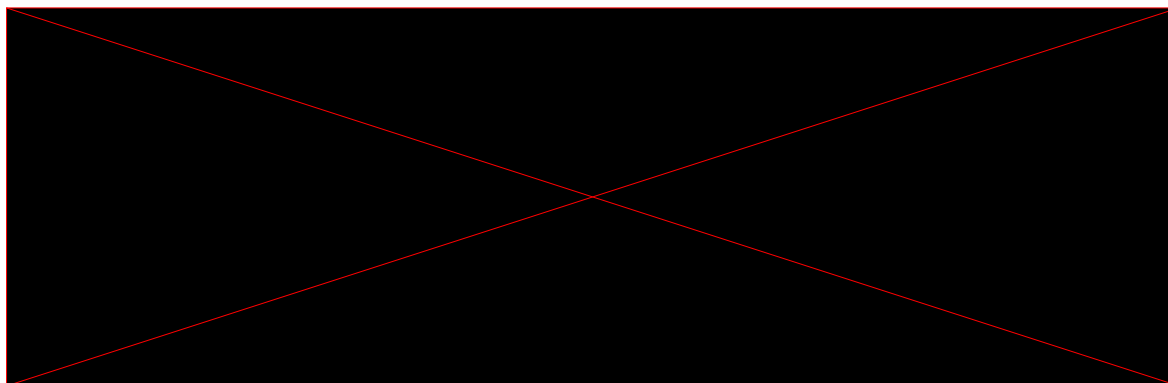


图1 1989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进出口情况

表2 1985年—2005年杭州市利用外资情况表

年份	项目数(个)	协议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1985	21	1731	907
1986	9	2017	683
1987	10	1256	1470
1988	23	2734	696
1989	34	1569	1860
1990	68	3951	751
1991	121	5551	2129
1992	583	60915	9678
1993	1078	121947	35713
1994	624	110541	41098
1995	427	90207	42659

续表

年份	项目数(个)	协议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1996	221	70982	53651
1997	174	27888	41187
1998	216	51400	38425
1999	212	56742	42025
2000	315	64548	43093
2001	483	103023	50324
2002	587	96270	52186
2003	869	200104	100850
2004	802	307746	140982
2005	756	400503	171274

1988年,杭州市贯彻实施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全面推行外贸体制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发生重大变化。市政府根据“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要求,采取生产和外贸双轨承包形式,将所承包的基数切块分包到各区、局(公司)和市各外贸公司,再由后者将指标分解落实到生产企业,同时落实相应经营权限。全市外贸出口商品收购额有了较大幅度增长。1989年,面对国内的不利因素,市政府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做到气不馁、劲不减、政策不变,促进全市外贸业务的发展。“七五”时期,在全市企业改革总体思路的指引下,全市引资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利用外资改造原有企业。主要通过充分利用老企业的原有设备和条件,引进外资兴办“嫁接”型企业,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增强企业后劲。其间,兴办的“三资”企业60%以上通过吸收外资实现“嫁接式”改造,使一批老企业焕发青春。

“八五”期间,杭州市为扩大出口商品的供货,在生产企业中树立“大外贸、大流通”观念,打破区域行业的限制,形成供货多渠道、市场多口岸的新格局。杭州外贸自营出口以大宗骨干出口商品为重点,不断扩大出口创汇,在巩固美国、日本等主体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多元市场。1995年,杭州经济的外向度不断提高,全年完成全社会外贸出口供货总值232.23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30.3%。杭州市努力实施多元化市场的出口战略,全年产品直接出口到104个国家和地区。在产品走出去的同时,杭州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增多,外商投资企业规模水平提高,杭州成为跨国大公司投资的热点。至1995年,共有外商在杭投资兴办企业20家,带来该行业的国际领先技术。

“九五”时期前两年,杭州市对外贸易保持较高增长,在“开放带动”战略指引下,全市全年自营进出口额分别达12.04亿美元和14.53亿美元。1998年至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全市对外经济贸易面临较大的困难,尤其是出口遭受东南亚地区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压力,1998年和1999年自营出口额分别为14.53亿美元和16.96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16.72%和14.15%,较前两年有一定的回落。2000年开始,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大为减弱,外贸出口增长步伐加快。2000年4月,为对加工贸易实行“优化存量、控制总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管理,杭州出口加工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全国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之一。其间,全市利用外资

平稳发展。1996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5.37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后4年,国家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等在税收上的优惠,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冲击,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略有下降。

“十五”期间,杭州市对外贸易不断走强,外向型经济实现大幅增长。外贸出口行业企业集中度加强,自营出口增长总体明显。2002年底,国家经贸委通报表彰全国自营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企业共683个,杭州市有13个生产企业榜上有名。2005年,杭州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9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9%,外贸出口的国家 and 地区超过200个。全市进出口逐步形成“两高两同步”的亮丽风景:高科技产品、机电产品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尤其是民营企业平稳步入成长发展期;同时,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外贸企业与外资企业都保持同步发展。但杭州在利用外资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数量、质量和政策利用方面与周边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且这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不甚合理,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比重过低,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过于单一等。其间,杭州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努力扩大外贸出口,积极发展“走出去”战略,开放型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5年来,杭州市实施两轮招商引资“三年倍增计划”,“北接上海,东引台资,重攻日韩,拓展欧美”,推动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杭州市吸引外资的最有力武器。2005年,全市全年协议利用外资40.0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7.13亿美元,提前一年完成招商引资第二轮翻一番的目标,利用外资的总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全年有39个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经济,境外投资领域拓宽,首次涉及房地产、商品市场、矿产资源勘探等领域。

四、三次产业发展

杭州第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合理,总体呈现3个特点:三大产业呈现“退一,优二,进三”的发展趋势;轻重工业比例逐渐合理,由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转型,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到2005年重工业的贡献度已占据半壁江山;新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社会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

杭州市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较高,并将其应用到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第一产业在比重下降的同时,总产值不断提高。第二产业稳步发展,一直对经济有着较高的贡献度。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主体,结合金融业、建筑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逐年增长。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一直以轻工业为主,丝绸业、棉纺织业、服装业等传统行业均做出过重要贡献。轻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杭州其他特色产业的兴起,饮食、医药、书画、丝绸、杭剪、杭线、杭扇、杭烟、杭粉、茶叶等发展迅速。1989年后,杭州进入重工业发展阶段,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机床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玻璃厂、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叉车总厂等大型企业发展迅速。然而与其他城市相比,杭州市仍存在着工业结构偏轻的问题。此后,在动漫产业、设计产业、软件产业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纺织业等传统产业也开始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大力支持和鼓励传统产业实施制造过程的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推进传统产品信息化改造,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一) 工业

杭州市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有序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先是进入轻工业阶段,然后进入重工业

阶段(见表3)。1986年至1989年,杭州市属于轻工业发展阶段。轻工业扩张阶段的特点是消费市场急剧膨胀,投资急速扩张,轻工业周期发展指数超过重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转向以家电为主。对于杭州来说,1989年家电产品出现“难卖”现象,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疲软”,标志着杭州经济结构出现转轨,开始进入重工业发展的基础阶段。

表3 1985年—2005年部分年份杭州市轻重工业总产值及其比重

年份	轻 工 业		重 工 业	
	产值(万元)	比重(%)	产值(万元)	比重(%)
1985	793766	61.73	492122	38.27
1990	1848911	63.26	1073689	36.74
1991	2201757	62.46	1323143	37.54
1992	2735168	60.41	1792232	39.59
1995	5600664	54.91	4599595	45.09
1996	4606720	52.16	4224447	47.84
1997	4871887	53.45	4242764	46.55
1998	5726407	51.59	5372950	48.41
1999	6129963	51.08	5870833	48.92
2000	7623300	49.39	7812382	50.61
2001	9957027	51.87	9238106	48.13
2002	12435498	51.81	11567474	48.19
2003	15652463	48.88	16372763	51.12
2004	19761946	44.05	25103833	55.95
2005	24059690	44.22	30351581	55.78

“七五”时期开始,杭州市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落实和完善经济责任制,巩固和发展各项改革的成果,力争工业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发展。1986年,由于受上年度工业超高速增长以及电力、原材料供应紧张,银根紧缩等影响,全市工业生产增长相对较为缓慢,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71.63亿元。1988年,全市工业在过热需求的推动下,继续高速增长,全年工业总产值达251.76亿元。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由于国家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处于重要位置,使得杭州的工业结构向轻型化方向倾斜。重工业中,制造业的发展快于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重工业的深加工程度有所提高,但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缓慢使杭州市工业的发展受原材料供应不足所制约的矛盾更为突出。1989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政治上的种种原因,杭州经济受到影响,发展缓慢。全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效益不高、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在宏观经济紧缩过程中出现的流通不畅、市场疲软、企业开工不足、工业生产速度下降过猛、劳动就业压力加大等问题有待解决。杭州经济转型的时间与其相邻的苏

州相比要晚,是在1988年以后的两年。这一时期杭州市的工业虽然取得较快发展,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存在着杭州市区全民工业增长乏力的态势。按各市全民工业生产总值1989年比1986年的增长速度排序,杭州在全国相同规模的15个城市中排末位。1990年,杭州市工业生产总值为215.77亿元。

“八五”时期,杭州进入重工业发展的基础阶段。199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07.46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比上年增长32.9%,是改革开放以后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工业生产基本做到产值、销售、效益同步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1991年的96提高到107。其间,杭州市第二产业向高、新、精发展。1994年,杭州市按照改革、改组、改造相结合的原则,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立足于内部,取得新进展,重工业产值所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又有增加,轻重工业比重由1993年的62.1%、37.9%调整为60.8%、39.2%。随着国家实施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取得成效,生产要素供应总量有所增加,对杭州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保障作用。但杭州市原材料短缺,不可能满足生产需求,并且能源、原材料和资金紧缺的状况长期存在,成为制约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杭州市能源的缺乏使其不得不先发展轻工业,例如纺织工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此后几年,杭州市纺织工业面貌发生明显变化。但从1990年开始,纺织业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且质量差,不适合生产发展的需要。而杭州市自有天然纤维的原料少,主要靠外地调入,因而形势更加严峻。原材料缺口成为杭州市纺织工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1996年至1999年,杭州市工业在经历1992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调整期,全市工业经济呈现出平稳运行、适度增长的态势。其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幅仅为7.7%,低于“八五”时期平均增幅25.5个百分点。2000年,工业经济增长步伐开始加快。全市工业销售产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2341.27亿元。同时,杭州市工业发展注重突出重点,择优扶强,积极实施名牌战略,努力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的优质产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实行产业、产品的调整和优化,逐步建立起以重点骨干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为基础、总体协调发展的企业结构,以拳头产品、优势特色产品和创汇产品为主体的产品结构,以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为先导、以中高技术为主的多层次技术结构,并逐步实现向效益型、集约型、外向型的转变。通过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在产业、产品结构升级中求增长、求效益,向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阶段递进,把杭州工业结构推向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十五”期间,杭州市工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围绕实施“工业兴市”战略,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逐步形成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机械、电子、食品、纺织四大支柱产业和医药、化工两大主导产业。

此外,能源问题对于杭州市工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以电力为例,2003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1.434,说明单位GDP产出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强。杭州市提出走“内涵式”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港”“新药港”建设,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机械、电子、食品、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同时,通过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关闭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或生产线。

2005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双双突破5000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5.6%,工业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9.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产值耗电358度,同比下降0.6%;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803.74亿元,占规模

以上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为 15.1% ;工业经济区域布局更为合理,基本形成以国家级开发区为主导,江东、临江、临平、钱江等工业园区为新增长点,区、县(市)工业功能区块为基础的工业格局;大企业、大集团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 2005 年公布的中国 1000 家最大企业集团名单中,杭州市有 42 家企业集团上榜,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列第一位,其中大多数为工业企业。

(二) 农业

杭州市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吹拂下,1979 年至 1984 年曾出现持续高速增长“黄金时期”。然而好景不长,1985 年粮、棉、麻等主要农产品产值下降,接着连续几年停滞、徘徊,一直持续到 1990 年春天。杭州市耕地资源十分贫乏,人均耕地仅 0.53 亩,是全国人均水平的 1/3,世界平均水平的 1/10。由于这种状况,杭州市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依靠科技振兴农业,利用科技来弥补耕地数量上的不足。

1986 年,全市实施“星火计划”以后,依靠科技,促进联合,扩大规模,建立实体,完善服务,农业由“短、平、快”向“高、群、外”发展,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培训大批农村技术管理人才,推动农村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明显的经济效益,为广大农村依靠科技振兴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了典范。“七五”期间,共实施各级“星火计划”395 项,项目总投资 1.71 亿元,累计新增产值 11.38 亿元,新增利税 3.41 亿元,创节汇 1.18 亿美元,共获国家级星火奖 6 项、省级星火奖 23 项、市级星火奖 58 项、各级科技进步奖 34 项。杭州市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贯彻优先发展农业的产业政策,为农业提供全面的信贷服务,增加地方财政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1986 年至 1988 年,全市遭遇频繁的自然灾害,但除 1988 年之外均完成原定生产计划。1989 年,杭州市重视和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全市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达 1.05 亿元,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 176.85 亿元。1990 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 193.79 亿元。

“八五”期间,全市实施各级“星火计划”项目 507 项,项目共投资 7.54 亿元,累计新增产值 33.52 亿元,新增利税 6.64 亿元,创节汇 2.35 亿美元,共获国家级星火奖 1 项、省级星火奖 30 项、市级星火奖 54 项、各级科技进步奖 25 项。杭州市坚持把依靠科技进步放在首位,以科技为导向,进行技术开发和综合试验,发挥技术、信息、人才的总体效能,依靠科技来发展农业。1991 年至 1996 年,全市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38.5%,比全国“八五”期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 34% 高 4.5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队伍的建设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1991 年,农业生产虽遭受自然灾害,但由于开展“以秋补夏,以丰补歉”活动,农村经济继续发展。1993 年,“菜篮子”工程建设获全国综合银奖。1994 年,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大灾之年获得较好收成,全年总产量 175.68 万吨,农民年人均收入首次突破 2000 元。1995 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 35.77 万公顷,扭转连续 3 年下滑的局面。全市土壤资源以红壤和水稻土为主,红壤分布在海拔 600 米~700 米的低山丘陵区,质地黏重,呈酸性反应,宜种茶树、果树,其中西湖龙井茶品质优异,闻名遐迩。是年,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在巩固传统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使之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调整为 58.0%、8.0%、29.0%、4.9%。

“九五”时期,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第一产业稳定发展。2000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152.65 亿元,较 1995 年增长 53.2%,5 年平均增幅为 7.2%。林业、牧业和渔业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8.16%、24.49% 和 5.12% 演变为 8.96%、21.72% 和 10.14%。1996 年至 1998 年,由于受到“六三〇”特大洪灾、“七九”洪涝和 11 号强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全

市早稻和晚稻的播种受到较大损失。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有效的抗灾救灾工作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全市灾害损失降低到了最低限度。1996年,全面启动实施包括兴农工程在内的“钱江科技潮”综合工程,引导有关单位和科技人员开展农业发展中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形成一批成果,如“特种瓜果引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与示范”“匙吻鲟孵化驯育与大水面增养技术研究”“优质黄鸡配套组合及产业化技术开发”“有益微生物菌种的培养及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示范与推广”等。1999年起,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目标,全市积极推动种植业的结构调整,在大幅下调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扩大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2000年,全市茶叶、花卉苗木、水产、节粮型畜禽、蔬菜和竹叶等优势产业及水果、干果、蚕桑、药材、蜂业五大特色产业的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6.6%。

2000年始,围绕“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目标,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形势,把全市农业发展纳入大都市发展规划。杭州市农业的飞速发展,有科技、政策和投入3个方面的因素,但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农业技术创新不仅为杭州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促进杭州农业的发展,奠定杭州市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推动杭州市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且开始引领杭州市农业向更高的层次、更宽的领域发展,促进杭州市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是年,开通杭州市第一个农业网站“杭州龙网”,为全市农民提供技术、品种和市场信息。2002年,启动航天育种研究课题,开展蔬菜、花卉、食用菌等新品种选育工作,该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2004年,市农科院、市科技局、市农办开发“杭州市农业专家系统”,具有智能化、傻瓜化、本地化和动态化的特点。是年,市科技局还组织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园区9个。这些高起点、高规格的园区和专业村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功能,成为产业区域发展的示范龙头和产业集聚块状经济的典范。通过农民素质教育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和经营素质,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由1998年的7.42提高到2004年的7.97。

“十五”期间,杭州市农业有了较快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2001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199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896元,比“九五”期末增加400元。到“十五”期末,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快速增长到5956.8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655元。200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65.00亿元,2005年增至219.48亿元,增长24.82%。

虽然杭州农业取得较快的发展,但仍存在几个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落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很不平衡,如萧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755元,而地处西部的淳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00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反映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而传统农业的种植业、养殖业所产生的污染等环境生态问题,也成为杭州“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实现“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城市生态环境目标的制约。

(三)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杭州市的主要产业,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七五”时期,从杭州市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商业、交通、邮电等仍占据主要地位,约占第三产业的49.8%;金融、保险、科技、咨询服务等较高层次的综合性服务行业正在逐步兴起,发展速度较快。

在运输生产方面,铁路、公路、水路、民航、港口各部门为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通过挖潜开拓,使综合运输能力有所提高。三堡码头工程、杭甬运河一期改善工程和杭富公路杭州段改建工程基本建成,临安青山航道改善工程和京杭运河新市弯道改善工程顺利进行,缓解杭州市交通的紧张状况。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杭州市金融和保险事业发展迅速。银行信用社各项存贷款均有较大增长,货币回笼超额完成计划。此外,1989年,杭州市有科技进步奖170项,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加快。

旅游业作为杭州的支柱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杭州市旅游资源丰富,景色优美,有“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自然山水乐趣,拥有富春江七里泷、大慈岩、灵栖洞天等一批知名景区景点,且数量多、类型丰、品质优。1989年,杭州的旅游业经历发展、下降、回升的过程。1月至5月上旬,呈发展势头。2月,经国家旅游局批准,成立杭州市海外旅游公司。该公司是杭州市首家有外联权的一类旅行社,标志着杭州市国际旅游业走上一个新台阶。5月下旬,出现滑坡。8月始,逐步回升。1990年,加强对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和治理整顿,杭州市旅游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由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国家旅游局和省政府联合举办的亚太地区旅游促进研讨会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为扭转滑坡的现象,杭州市开展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开通新旅游线路,精心组织和宣传推出“西湖之秋”“桂花节”等项目,外国游客大量增加,但国内游客还是有所减少。

1989年至1994年,杭州市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全市有经市科委批准鉴定的科技进步奖112项,市级科技三项经费逐年增长,科技队伍继续发展壮大。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技术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务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等新兴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在金融方面,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行现汇留成试点,对加快进出口业务、促进外汇管理体制的转轨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期货市场经纪机构进行重新审核登记,将杭州市国有、集体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纳入正常管理轨道,期货市场在规范中得到发展。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证券市场日益活跃。

1995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82.75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7.1%。

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第一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业历来是杭州市的重点产业。1992年,国家旅游局和民航局联合举办“中国友好观光年”活动,到杭州旅游的海内外游客增多。全年到杭境外游客和旅游创汇分别比上年增长25.5%和35.7%。千岛湖被国家旅游局列入“杭州—千岛湖—黄山”名山名水之旅国家级黄金旅游线。为吸引游客,丰富杭州旅游观光文化内涵,结合经济活动,吴山广场举办西湖庙会。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通过努力,杭州之江度假村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数十万宾客在这里度假。1995年,杭州之江度假村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四星级旅游涉外饭店。西湖博览会始办于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博览会。2000年后每年一届的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集会展、会议、活动为一体,是大型综合性经贸博览会,是杭州城市的“金名片”。

2000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69.28亿元,较1995年增长101.33%。

“九五”期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新兴第三产业高速发展。

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杭州市金融业发展形势良好,存贷款规模每年都有较大增幅。2000年末,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686.64亿元,为1995年的2.97倍;存款余额2088.47亿元,是1995年的2.95倍。同年,全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1183.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在保险业方面,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增加险种和扩大保险覆盖面,保险公司业务获得发展。是年,全市保险企业各类保险承保金额为4459.58亿元,保险费收入26.01亿元,分别为1995年的3.09倍和3.15倍。

旅游业有新发展。在原有景点不断丰富完善的前提下,一批新的景点建成开放,境内外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有明显增长。2000年,在假日经济、会展经济、节庆活动的带动下,全市接待海外游客70.7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2.92亿美元,较1995年分别增长60.70%、101.38%;接待国内游客2305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90亿元。1999年下半年起,杭州市组织力量开展西湖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制定2000年杭州西湖博览会总体方案,确定“千年盛会聚嘉宾,西湖博览汇精品”的主题思想。2000年,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举办,围绕打响“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4个品牌,扩大了杭州的知名度和开放度,成为“世界了解杭州,杭州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十五”期间,全市第三产业有较快发展。会展业在西湖博览会的带动下有较大发展,促进全市经济的增长。到2005年,杭州会展业总体规模继续扩大,市场发展日趋成熟,直接办展收入1.1亿元,年均增长8%。

市委、市政府从2001年开始,积极实施“旅游西进”战略。2002年,全面实施、着力打响“游在杭州”品牌,呈现出“大杭州、大旅游、大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非典”给旅游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杭州市旅游部门积极应对,改革创新,努力减少损失,创下较好的业绩。4月,召开全市旅游商贸系统预防“非典”紧急会议,提出“沉着应付、积极预防、内紧外松、采取主动”的工作原则,明确防治“非典”各项举措。经创新和努力,杭州市全年旅游总收入326亿元。

特色街区建设继续推进,旅游休闲特色更趋完备。湖滨商贸旅游特色街区的国际名品街成功开街,阿玛尼、凯萨、爱马仕等15个国际顶级品牌落户名品街。解放路现代商贸旅游特色街区业态调整取得成效,人气、商气明显提升。清河坊历史文化特色街区通过杭州市“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创建验收,被中国步行街工作委员会评为“中国著名特色商业街”。

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2001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2621.51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占增量贷款余额的30.4%。杭州市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支持中小企业、农业和外贸出口企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全年累计发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70亿元,增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能力;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5.07亿元,增强信用社支农实力。至年末,杭州成为全国首个中资商业银行均设有分行机构的省会城市。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突出金融监管,开展“金融服务管理年”活动,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维护金融业良好运行态势,指导农村信用社加大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全年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6.15亿元。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农户贷款6.15亿元,年末贷款余额55.68亿元。

杭州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杭州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却有所不足。不能否认的是,杭州市丧失了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会,许多产业依附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而在国内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扩张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困境。在信贷市场上,民营中

小企业自身信用度不高,还款能力弱,商业银行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不愿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在资本市场上,国家尚没有成立专门的创业板块,现有的深圳中小企业板块亦发展不足,无法满足多数民营企业的融资需要。金融约束成为杭州市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这为杭州金融中心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机会。

2005年始,杭州市加大对金融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将金融服务业列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八大重点领域之一,提出完善资本市场体系、鼓励支持金融创新、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等主要举措,并提出将杭州建设成为金融创新活跃、金融服务快捷、防范体系完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金融辐射能力强劲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杭州要形成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与上海形成错位发展,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其提供一个创业孵化、财务咨询、融资、资本经营和投资管理等金融服务的框架,建立一个相对适宜的金融市场体系,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服务范围应首先立足于浙江,在浙江或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外省、全国扩张。至年底,全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19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6.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5.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等发布的《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中,杭州市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列第四位,被评为城市金融生态一级城市。

五、综合经济效益

浙江省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部地区之一,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其中,杭州市的经济成长性可圈可点,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科技与教育实力不断增强,“天堂硅谷”发展迅速;运用在对外经济方面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国民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小康”转变为“富裕”。

杭州市发展道路曲折,有改革开放等有利因素,也有自然灾害和经济调整的影响。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杭州市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随着全市自然资源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越来越突出,杭州市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资,逐步走上靠科学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杭州市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出发,早在1988年率先提出“科技兴市”的战略方针,1992年发展成为“科教兴市”方针。被誉为“天堂硅谷”的杭州高新区在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在国家“火炬计划”的指引下,经13年的努力,成为全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并跨入全国先进高新区的行列。杭州市以旅游名城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外贸外资,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2005年全市仍实现进出口总额298.6亿美元。在经济总量得到发展的同时,“十五”时期末,杭州市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市农民年人均收入比“九五”时期末分别增长71.7%和56.4%,恩格尔系数2005年分别达34.8%和35.7%,并从“小康”水平升级为“富裕”地区。

(一) 国民生产总值

杭州市用己之长,避己之短,通过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生产力,全市经济较快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稳步增加。1986年,全市生产总值为105.36亿元。1989年,杭州经济出现后退的现象,但通过及时调整得到逐渐恢复。尤其是1992年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改革的日益深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国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为2918.61亿元,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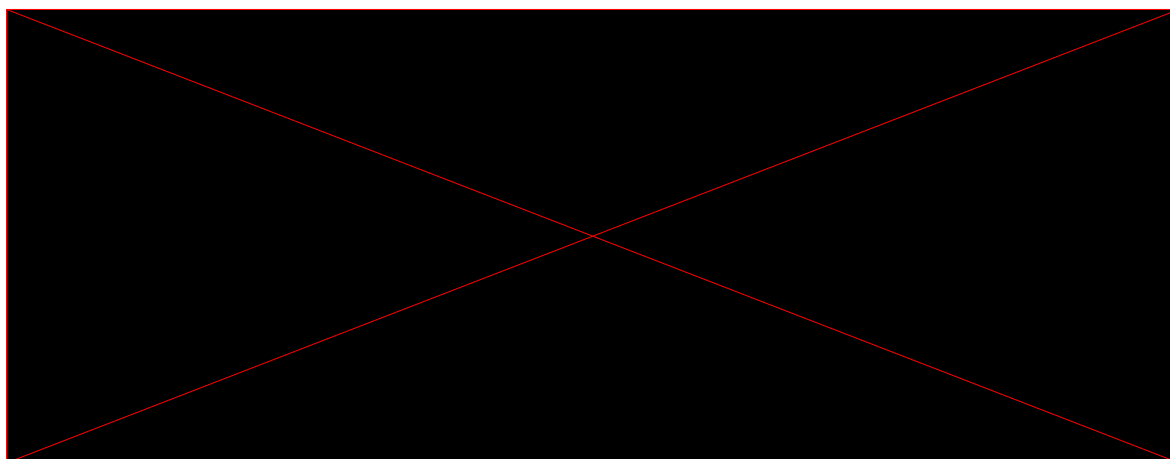


图2 1985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长期以来,杭州市经济一直处于相对落后、发展缓慢的状态。1978年,全市生产总值仅为28.4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只有565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市建立和形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全市经济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6年,全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05.36亿元,是1978年的3.7倍,较1985年增长10.43%,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开端。1987年和1988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全市生产总值分别为126.02亿元、152.54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9.61%、21.04%。

“七五”时期的后两年,杭州市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次动荡。1989年,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第一季度资金、能源和部分原材料短缺,第三季度市场疲软,成品库存急剧上升,承包经营出现曲折,除少数企业退出承包外,有三分之一的承包企业没有完成当年承包指标。由于销售不畅,工业生产速度回落过猛,加上部分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工业经济效益下降。是年,全市面临着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等困难,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66.29亿元,国民收入141.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下降3.1%和2.2%。1990年,全市经济有所恢复,实现生产总值178.03亿元,比1989年增长7.1%,比1985年增长96.7%,人均生产总值为3097元。

1991年至1995年,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总体目标是:打造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社会稳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旅游、科技、文化中心。1991年,全市生产总值208.5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15.4%。1992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全市改革开放和发展呈现出多年未见的好势头。1992年,全市生产总值达2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1年增长24.6%,人均生产总值达4599元。杭州市全国百强县数量由1991年的2个增加到萧山、余杭、富阳和临安4个,综合实力名列中国城市“五十强”第12位。1993年,全市生产总值达394.77亿元,比上年增长31.4%,比1978年增长6.04倍;人均生产总值达6724元,比1978年增长5.05倍,平均年增长12.7%,提前两年实现6000元的发展目标。1994年全市生产总值达585.52亿元,比1993年增长26.3%,比1990年增长138.5%。1995年,全市生产总值达762亿元。

“八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累计达 229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3.4%,比“七五”期间年均增速高 16.7 个百分点,比“八五”期间全国平均增速高 11.7 个百分点,是杭州市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95 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12797 元,提前 5 年实现到 20 世纪末人均生产总值超万元的发展战略目标。

“九五”时期,虽然杭州市面临着经济“软着陆”的压力、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得益于市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从总体来看,全市经济仍然稳中有进。从经济总量上来看,1997 年,全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元。2000 年,达 1382.56 亿元,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稳居第三位,列于广州、深圳之后,在省会城市中仅低于广州,居于次席。从增量上来看,全市生产总值年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基本在 10%~13%,5 年平均增长率为 11.9%。是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2 万元大关,达到 22342 元,比 1995 年增加 74.6%;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1 万元,达 10500 元,比 1995 年的 6301 元增加 66.6%,5 年平均增速为 8.9%。同年,在第六届全国百强县域经济的评选中,杭州市共有 3 个县入选,分别为萧山(第 9 位)、余杭(第 23 位)和富阳(第 54 位)。

“十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前一年实现,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5000 美元,城市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五位,城市发展能力居全国第六位,“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迈出新步伐。其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10911.39 亿元,平均增长 13.6%,比“九五”期间增长 0.9 倍(按当年价格计算),人均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实现从 3000 美元到 5000 美元的跨越。在 2003 年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杭州企业占 10.6%。该时期,杭州还获得“国家卫生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等荣誉,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定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第一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为“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还曾被公安部列为“社会治安群众满意率最高”城市。

(二) 政府财政收支

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给杭州市企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由于企业的税负水平长期以来比较高,为促进发展,杭州市及时调整税制,降低税率,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使全市财政收入水平降低。改革带动企业高速发展,反而使财政收入稳步增加。随着杭州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投入到科技与教育支出中。财政支出对稳定杭州的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作用。财政收入由 1986 年的 20.60 亿元,增长到 2005 年的 520.79 亿元,增长 24 倍。财政收支状况良好,收支差额越来越小。

1980 年,实行“划划分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后,杭州市各级财税工作取得新的进展。1986 年,全市财税部门在 1985 年建立区级财政的基础上,全面建立乡镇级财政。是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 20.6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2.19 倍,其中市区增长 93.4%。1987 年和 1988 年,财政收入分别达 22.62 亿元、24.70 亿元,其中市区财政收入分别为 15.23 亿元、16.12 亿元。1988 年起,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采用“递增上交,超收分成”的办法。1989 年,全市财政收入 25.5 亿元。1990 年,财政收入有所下降,为 25.25 亿元。

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科学、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1986 年,全市财政支出为 7.32 亿元,较 1978 年增长 3.54 倍,其中市区增长 4.65 倍。1987 年和 1988 年财政支出分别为 7.07 亿元和 9.57 亿元,其中市区财政支出为 4.10 亿元和 5.30 亿元。同时,为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对平抑市场价格和职工工资补贴的支出。

“八五”期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财政收入也明显增长。1992年,财政收入总计28.64亿元,与1991年相比增长7%;财政支出为13.28亿元,增加7.9%,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速度相当。市区财政收支缺口,由年初预算的1.39亿元减少到8238万元。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全市财政收入总额39.49亿元,比上年增长31.6%。1994年,财政金融形势较好,全市财政总收入48.68亿元,比1993年增长14.4%。这一时期,全市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由1990年的25.25亿元增至1995年的55.13亿元,5年累计财政收入198.48亿元,比“七五”期间累计总收入增长67.3%;5年平均每年递增16.9%,比“七五”时期年均增幅高10.6个百分点。1995年,市区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财政支出结构趋向合理。

“九五”期间,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及利税能力的增加使财政收入有较好的保障。1998年,市本级历年财政赤字全部消化。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突破100亿,达102.66亿元。2000年,市财税部门以“建财政大市、促强市名城”为目标,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强化财政财务管理,严格依法理财治税,规范财政收支管理。全年全市完成财政总收入142.85亿元,比上年增长39.2%。2000年,全市地方财政支出73.43亿元,比上年增长30.3%。这一时期,杭州市财政总收入迅速增长,年平均增幅21.0%,比“八五”时期高5.7个百分点,亦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扶持国有企业、支持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十五”时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杭州市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财政实力持续增强。2002年,杭州市财政总收入突破200亿元,2003年300亿元,2005年达520.79亿元,比2000年增长2.7倍,年均增长29.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50.46亿元,比2000年增长2.6倍,年均增长29.3%。其间,财政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延续“九五”以来逐步提高的态势,2005年达17.8%,比2000年提高7.5个百分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为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全市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及社会保障补充的支出分别达5.1和6.1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2.7倍和5倍,远高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促进全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三) 增长模式转变

近20年来,杭州市经济加快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土地供应日趋紧张,缺水、缺电等问题凸显。1986年至2003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较高,以投资带动经济的发展。且全市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为粗放型,带来的问题逐步突出。2004年起,杭州经济增长进入转型的黄金时期,注重科技力量,加大科技投入,用高科技来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杭州基本市情决定,杭州所特有的旅游资源及对其的保护要求杭州必须采用集约型、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改革开放后,全市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大,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跳跃式发展。有关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定如下:假如综合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率^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50%,经济增长方式即为集约型,小于50%则为粗放型。

1986年至2003年,杭州市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1%,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0.9个和1个百分点,两者合计达11.9个百分点。而综合要素生产力(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6%,比50%的标准还小11.4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7.8

^① 综合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率 = GDP增长率 - \sum (各生产要素弹性系数 × 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见表4)。

表4 1986年—2003年杭州市、浙江省经济增长方式情况比较

单位:%

地区	GDP 增长率	投资 增长率	劳动力 增长率	TFP 增长率	投资增长对GDP 增长的贡献	劳动力增长对GDP 增长的贡献	TFP对GDP 增长的贡献
杭州	19.7	24.8	1.8	7.8	55.3	5.1	39.6
浙江	19.4	25.7	1.4	4.4	73.9	3.2	22.9

从杭州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早在“八五”时期末,全市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万元目标,标志着杭州市经济进入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然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 and 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杭州的基本市情决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杭州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环境承载压力大,加之外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的较大压力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在能源方面,人均耕地较少,人均水资源量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电力、煤炭等能源自给能力很低,基本上都需要外调解决;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代价也在加大,治理费用支出不断加大;且杭州市经济结构正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化工业阶段转换,必然增加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增加对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资源的供应紧张,成为杭州市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瓶颈。杭州市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大,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脆弱的情况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因此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靠“上项目、铺摊子”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必然会使资源、环境难以承受,使经济发展受阻,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对后代也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正是杭州市在关键时期新的战略性抉择。

再者,杭州的城市性质决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杭州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必须坚持从这一性质出发。长期以来,杭州市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通过旅游、商贸等第三产业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的粗放化使得全市的旅游资源遭受了不少损失和威胁,其中问题最突出的是工业企业,尤其是那些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的乡镇企业,大量消耗能源和物资,经济效益低下,还引发不少环境污染事故,给杭州市的环境带来压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一条经济与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协调发展的道路对杭州市来说迫在眉睫。

2003年,杭州市提出两个并列的城市发展战略,即工业兴市和环境立市。杭州要发展工业,更要实现工业生产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使企业发展具有后劲。通过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建设绿色生态工业城市,使工业兴市与环境立市实现良性互动。

2004年开始,杭州进入结构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较早地迎来“发展黄金

期”，一系列的改革表明杭州正从“以资源换增长”的窠臼里跳将出来，转移到或者回归“以改革换增长”的良性发展道路上去，预示着杭州正在告别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杭州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杭州老城区发展空间不足的矛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新世纪大学城、花园式生态型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全面由招商引资转入招商“选资”，把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拒之门外。从2004年开始，开发区建立招商引资进区项目科学评估制度，对引进项目按投资强度、科技含量、产出效益、能耗、环保等8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把住引进项目的质量关。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方面，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着重发展和培养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家用电器、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改造提升精细化工、纺织化纤等传统产业，扶持培育研发、软件等新兴产业，重点扶持效能优、能耗低、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从而形成企业群，延长产业链，培育价值链。同时，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还积极倡导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研发高科技新产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制定政策，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并通过基金支持、创业投资、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加强“区校”合作和“企校”合作，以充分发挥开发区内14家高校的科技、智力优势，提高研发成果的转化率。

六、总结

至2005年，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连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副省级城市第三位、全国大中城市第八位。与20年前相比，全市经济面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道路更加宽敞，西湖的水更清，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经济的发展带动全市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的提高带动精神文明的进步。回顾过去，应当看到这一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过波折，走过弯路，但杭州市从挫折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并探索出一条适合杭州市情、具有杭州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正是得益于那些挫折，那些“歪路”，杭州才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找到了更正确的方向。

(金雪军、张学勇、单盈颖、高娟)

政治综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口号,果断决定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5年至2005年,杭州从所谓的“破烂”城市,建设成为生活品质之都;从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的重灾区,走向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均居全国前列的现代化都市。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来越稳定,执政能力逐步增强,政府治理日趋优化,民主法制更加健全,市民民主和法制意识逐渐成熟。

一、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全面恢复社会主义政治秩序(1985年1月—1988年10月)

政治上,杭州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的重灾区,极“左”路线余毒至深。至1984年下半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达6年,但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伪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不同程度而且是普遍地影响着广大党员和群众,个别人甚至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社会法律制度残缺,人大和政协的体制性、制度性功能很不到位。故而,1984年与1985年相交之际,杭州在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是在党内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政治秩序。

(一)全面整党,统一思想,纯洁组织

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凝聚力、战斗力和统一思想、纯洁组织的不二法门。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84年9月部署全面整党工作,到1987年9月基本结束。整党自上而下分3个阶段进行。历时近3年的整党整风活动达到预期目的:统一思想,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性大为提高,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基本得到纠正;整顿作风,宣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有效遏制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通过检讨、批评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决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开除出党。同时,清理“三种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参加第一、第二批整党整风活动的主要是党政机关和城市企事业单位党委,参加整党活动的单位共8614个,中共党员213620名,占中共党员总数的94.5%。

1986年5月,全市整党活动深入到乡村,参加乡、村两级整党的单位6577个,中共党员

135310名,占全市中共党员总数的63%。在乡、村两级整党工作中,自始至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采取学文件、上党课、表彰先进、请英模做报告、收看先进人物录像等形式,比较系统地进行中国共产党宗旨、理想、纪律和政策等教育。市委整党办公室邀请鲁冠球、钱富生、黄仲虎、卢心寄、鲁灿新、杨启良、王安新和展亚平、徐高虎、陈天兴、石秋香、林谋利等先后组成“优秀党员事迹”和“英模先进人物”报告团,到余杭、临安、淳安、建德、桐庐、富阳等县做巡回报告。为搞好整党工作,市委及7县县委共抽调70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组成近400个整党联络组,深入到乡、村帮助基层搞好整党。结合整党活动,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通过学习培训,健全党内生活制度,按照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全市共改选村级党支部3572个,调整充实支部领导班子1606个,新建支部372个。把一些党性强、作风正派,能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中青年党员选进领导班子,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根据有利于生产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有利于开展党的活动的原则,按照工作需要与行业特点,改进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设置,适应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整党工作同改革、经济工作的关系,基本做到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教育党员树立发展商品经济的观念,有力地推动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整个整党过程中,坚持从纠正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入手,对1952名有各类错误的党员做出组织处理,占乡、村两级党员总数的1.4%。其中,缓期登记的党员854人,除名、不予登记291人,开除党籍83人,受其他各种党纪处分724人。在村级整党中,查处216名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的党员,解决了农村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在村级整党中,大多数单位还进行了财务清理工作,中共党员和干部带头归还长期拖欠、占用的公款、公物,带头为群众办实事,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1987年,全市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本单位的整党工作进行认真回顾。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找出问题,采取措施,从思想上、作风上、纪律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整党成果。组织全市中共党员学习中央1号~6号文件,采取党课、报告会、轮训等形式,对中共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教育、深化改革教育;认真开展整党工作检查,及时处理整党中的遗留问题,市整党办配合各县整党办,对183名暂挂的中共党员逐个进行分析排队,抓紧做了处理;对犯有“两个严重错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尚未做出处理的中共党员,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并全部结案;对农村拖欠公款的中共党员,加强督促检查,基本还清欠款;对少数整党搞得不太好的单位,进行必要的补课。组织全市各级组织部门对党员登记表和组织处理材料进行检查,总结和介绍一些单位的经验,对手续不全、材料不齐的组织处理材料做了补充,对漏缺有误的党员登记表做了纠正,认真做好全市整党文件材料的归档工作。9月,市委下发《关于我市整党工作基本结束的通知》,对全市整党工作做了总结,整党活动基本结束。

(二) 加速机构及功能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政治秩序

为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重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杭州市在整党整风的同时,加速健全各类重要政治机构及其功能,不断恢复社会主义政治的正常秩序。

1. 恢复和健全市人大立法功能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断。1981年12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1985年1月至1988年10月,市人大常委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职能,行使地方立法权,推动依法治市进程。

1986年开始,市人大常委会推进民主化进程,完善选举制度,实行选民10人以上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和代表20人以上可以提出领导人员候选人的制度,表明中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杭州市有了重大突破,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1987年5月,依据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修改发布的《地方组织法》,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尝试地方立法工作。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通过全市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杭州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地方立法工作迈出可喜一步。

2. 完善行政立法,加强法制建设

1982年开始,市政府依据《地方组织法》授予的权限,先后制定160余项行政规章,并拟定一批法规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定后,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为杭州市地方性法规。1986年,法制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列入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市政府发出《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通知,决定建立法规工作机构,召开政府系统法规工作会议,全年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48项。市政府还制定《关于起草地方性法规和制定行政规章的程序的暂行规定》,地方立法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轨道。同时,对1949年10月至1986年6月颁布的501件行政规章进行清理,废止362件已经被新法规所代替或已自然失效的行政规章,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法规编撰工作,把国家、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定期汇编成册。及时清理行政法规是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和重要措施,对杭州市未来的法制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3. 重视政协建设,发挥协商作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陷入混乱,政协机关停止办公,办公室也被移作他用,挫伤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部门逐渐恢复工作,政协工作也走向正常。1986年,在贯彻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精神时,市政协结合前几年的实践经验,就政治协商内容、范围、形式和需要建立的制度,向市委提交请示。市委专门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并以纪要形式,做出明确规定,下发全市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市政协的工作开始进入活跃期。是年,市政协工作组围绕杭州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展参观考察、专题调查、座谈讨论、咨询服务等活动186次,参加活动的委员近8000人次。其中,专门调查研究37次,写专题调查报告20份。1986年3月市政协四届六次会议到1987年5月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前夕期间,共收到委员提案334件,分别转送67个有关单位办理完毕,及时反映民意、实行民主监督,对党和政府改进各项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同时,1987年,市政协还与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先后举行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15次、近3000人次,受到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对于扩大联系面,活跃政协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4. 打击刑事犯罪,净化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制松懈,刑事犯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全市政法机关于1983年8月18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以下简称“严打”),到1986年底,共“严打”了3次战役。在“严打”中,全市政法机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惩处了一大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并对其中一部分罪犯及屡教不改的劳动教养人员予以注销城市户口、迁送外省

改造(教养)。“严打”战役沉重地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扭转了“严打”前杭州市社会治安的非正常状况,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流氓团伙和拦路抢劫、拦路强奸等恶性案件明显减少,重大节庆活动和公共场所的秩序良好,人民群众普遍增加安全感,特别是全市刑事案发数,“严打”后3年与“严打”前3年相比,下降54.94%。对全市广大群众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广泛深刻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提高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群防群治的能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进了劳改劳教工作。同时,也锻炼了政法队伍,积累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的经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二、排除干扰,干在实处,扎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11月—1993年10月)

1989年至1993年,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历史至少是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一是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此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5年中,杭州市排除“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干在实处,稳妥、扎实地推进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丰富成果。

(一)排除“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切实推进政治思想建设

1984年,中央发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全国思想学术界开始进入活跃期,尤其是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以后,思想学术界群起响应,或反思,或批判,或倡导,或建议,一时间,各种政治主张和思潮竞相呼号。

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提出7个方面的指导性改革意见:(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中,实行党政分开是核心。中共十三大的出发点和基本精神在于:实行党政分开是为了更加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使党从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好地保证“党要管党”,更好地使党能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使党真正具有监督职能,成为同官僚主义做斗争的强大力量。但是,党政分开怎么分,分到什么程度,在认识上莫衷一是,有待于在理论上做进一步讨论,在实践中做进一步探索。

1989年春夏之交,杭州市内盲动的学生设置路障,冲击铁路,一些社会渣滓趁机捣乱,其间,发生重大事件17起,学校、工厂、商店、社会各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及交通与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更为严重的是,人们的思想分歧急遽上升为思想矛盾和对立,社会正常的政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为排斥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市委迅速进行清理、清查工作,查清在杭州组织、策划、制造动乱的指挥体系,取缔“浙江省高校改革促进会”等19个非法组织,查禁《学生团结报丛》《广场论坛报》等17个非法刊物,逮捕或收容制造动乱的少数为首分子。同时,在清查工作结束后,迅速展开党员重新登记工作。1990年7月,党员重新登记工作首先在杭州日报社和市监察局试行,9月在全市铺开。中共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分4个步骤进行:学习教育,主要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坚持党的宗旨、党员标准、党性和党的纪律教育;个人总结,采用写实的方法汇报自己在政治风波中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民主评议;上级党委审批。到年底前,该项工作基本结束。参加登记的7840名中共党员中,准予登记7798名,暂挂或缓

登 36 名,清除出党 6 名,受各种纪律处分 15 名。

同年,农村开展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教育活动。活动声势和规模较大,在 11 月中旬全面铺开,到次年 1 月结束。1989 年,有 100 余名市级机关干部到 7 县(市)、3 区指导教育工作。1990 年,市、县两级机关共派出 2240 名干部,组成 300 余个工作组下乡下村帮助工作。

在治理整顿之后,市委加强对各类党组织的建设。

农村党建方面:1991 年初,市委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对不胜任的村支书进行调整,同时采取经济扶持的办法,13 个市级部门与 32 个贫困村进行联系,还选择 20 个贫富乡镇开展挂钩结对等活动。

企业党建方面:1991 年 5 月,市委制定《中国共产党杭州市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规定》,对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任务、工作机构的设置,专职干部的配备,保证监督的内容、方法等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92 年,杭州市第一个私营企业党支部——中共富阳邮电器材厂支部委员会成立。

街道社区党建方面:一是重视街道班子建设,基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街道干部年龄大、文化低的状况。到 1992 年,全市 217 名街道党委委员中,45 岁以下有 157 人,占 72.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73 人,占 33.6%。二是重视中共党员教育阵地建设,全市 31 个街道全部建立业余党校。三是党组织生活更为健全,支部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四是中共党员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街道居民区的干部、小组长、墙门代表、治安巡逻员、志愿者服务员、护院看楼队中,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

清理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活动后,全市各级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得到普遍提高,一大批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脱颖而出,被选配到领导岗位。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有了极大的改善,5 年中许多一线优秀青年和知识分子积极向党靠拢,有 3.40 万名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社会政治达到空前稳定,为此后杭州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长期高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清理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活动产生巨大政治成效的同时,亦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人们的思想趋于保守,部分党员同志的积极性受到伤害,使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放慢,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设想和举措被搁置下来。杭州经济增长趋势也急剧下降,全市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20% 下滑到 1992 年的 9.6%。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委迅速开展学习、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全市上下紧紧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转换脑筋,革新观念,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从凡事先问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里解放出来;克服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迅速形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和舆论氛围,全社会形成抓经济建设的合力:党委总揽经济全局,制定总体发展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政府部门负责贯彻落实,承担日常经济和社会管理,负责行政指挥;人大、政协积极参与经济工作,在参与中服务,在服务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 干在实处,扎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9 年,推出整体性的大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已不可能,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停顿。杭州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充分发挥浙江人“干在实处”的政治智慧,积极稳妥、扎实地推进政治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政治民主化和政府治理法制化、科学化水平。

1. 加强依法治市,健全政府行政机制

其一,国家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体现依法治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正确对待和科学处理人大、政协的提案(另一个方面是政府行政遵循正式的法律、法规)。1987年6月,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市人民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问题,并制定《关于办理人民代表建议的工作细则》。1990年4月,市政府制定并发布《关于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工作规则》,要求采取超前、公开、协调、座谈等形式,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做到交办、检查催办、总结交流“三及时”,办毕率必须达100%。1991年4月,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经验总结交流表彰大会,市政府对办理工作提出并落实抓好“四个率”:即领导亲自承办率、承办单位与代表见面率、承办成效率、答复满意率,以“四个率”作为办理工作考核标准。

其二,建立法制工作机构,保障依法行政。1990年9月,市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市政府法制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杭州市法制局,作为市政府主管政府法制工作的直属机构,并要求各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负责政府法制工作。至年底,全市12个县(市)、区中,有11个建立了直属的法制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政府法制工作人员24人。市政府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中有9个局建立法制处,配备法制工作人员42人,市政府其他部门也明确了分管法制工作的处室,落实了专兼职法制工作人员。1991年9月,为切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市政府召开第三次全市政府法制工作会议,对全面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条例》做出部署,同时充实加强了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人员。各区、县(市)政府全部建立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全市各乡镇街道共配备专兼职法制员1095名,其中专职法制员245名,覆盖全市的政府法制工作网络初步形成。1988年11月至1993年10月,市政府根据依法治市的要求,先后制定和发布行政规章111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地方性法规9件,建立法制工作机构,逐步强化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其三,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制度,规范依法行政。1992年4月,市政府发布《杭州市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各种行政执法活动必须以法律、法规、规章及区、县(市)政府和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不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超越或滥用职权;行政执法实行持证执法制度;市及区、县(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接受监督检查机关的监督检查。

1988年11月至1993年10月,市政府推行依法治市的种种尝试,巩固和扩大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政府的管理不再是单向的管理,而成为政府与社会、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政务公开、依法治市,意味着政府必须以市民的同意和支持为合法性依据,意味着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市民的利益和意愿,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公开化以便接受市民的监督,意味着市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广度和深度得以不断扩展。这都使得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更容易贴近社会,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减少执行阻力,提高行政执行效率。

其四,科学划分行政职责,适度下放管理权限。1992年10月,市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区政府职责与权限的决定》,提出城区政府发展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主要职责: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把发展城区经济、增强经济实力摆在城区工作的突出位置;把加快城市建设作为城区工作的重要任务;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的要求,切实改进和加强城市管理;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同时,从财政税收、商业及工商管理、劳动管理、人事编制、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规划管理、土地管理、环保管理、房地产管理、绿化管理、市政管理12个方面,给各区下放权限。

其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制度。1988年7月,召开全市推行政务公开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省推行政务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推行政务公开工作,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市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规范行政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凝聚力。8月,市政府制定《全市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工作方案》,先在市计委、市经委、市公安局等27家单位试点。9月,市政府召开政务公开工作现场交流会,以推动政务公开试点工作。1990年,全市政府部门全部实行政务公开。

2. 加强人大立法,积极构建社会法制秩序

其一,加强人大立法,为城市建设保驾护航。1988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制定《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对城市绿化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为扩绿、保证城市空气质量奠定基础。1991年,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等提出严格要求。1992年,对《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做出修改,对房屋开发商、征用拆迁单位和居民的权利义务做了明确规定,保护两者的合法权益。

1990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在组织部分代表深入全市部分居民委员会调查基础上,做出《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议》,要求居民所在地区都要支持居委会工作。此后,居委会工作步入有序和切合实际的发展轨道。

1991年,针对市场经济初期的假冒伪劣现象,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坚决清除假冒伪劣商品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决议》,对扰乱正常经济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破坏杭州市商业信誉和整个城市形象,影响本地经济发展的行为,提出治理要求。市政府按照决议要求,结合存在问题,完善各项制度的规章措施,并着手对假冒伪劣商品进行清理整顿。

其二,宣传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能力。1989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建立组织检查制度的决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在各项工作中严格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1991年,在“二五”普法的第一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又做出有关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提出增强全市民众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水平等要求。

其三,制定相应的监督制度,把经常性执法检查制度落到实处。1989年下半年,为把法律监督工作落到实处,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起,每年底都要进行一次执法检查,并在总结前两年开展执法检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做出《关于建立经常性执法检查制度的决议》,要求行政执法相关部门每年要组织自查,有什么问题要随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市人大常委会平时也采取视察抽查的方式,对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进行监督,听取和审议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汇报。历届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检查工业、农业、外贸、税收、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各个领域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通过视察检查提出贯彻实施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以推动政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3. 围绕大政方针,充分展开政治协商

其一,围绕大局,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又

是社会各方的共同事业,需要通过各方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实施各项重大举措。1988年至1993年,市政协举行5次全体委员会议、2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和56次主席会议,就杭州市改革和建设的大计,包括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决策措施,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事项进行协商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第21次常委会议上,根据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委员们联系杭州实际,围绕全市经济建设中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农业农村工作这两个关键性环节,从宏观决策、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视。第22次常委会议在协商讨论《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时,就明确城市发展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兴市、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加强城市建设等方面,提出上百条建议和修改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建议在市政府修改纲要草案时被吸纳。此外,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委员会共提出提案2563件,内容涉及全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多数提案所提意见和建议被承办单位采纳吸收,对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改进党政部门的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其二,广泛开展联谊活动,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振兴杭州和促进祖国统一服务。做好海内外联谊工作,是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委员会根据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政策形势,增进“三胞”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解和共识;推动委员积极开展同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共接待来杭探亲观光、洽谈贸易人员1400余人次,并为30余名委员和有关人士出境会亲举行迎送会;同时,积极发挥政协委员海外联系广的优势,为发展全市外向型经济服务。

4. 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其一,抓好专项治理,打击各类犯罪活动。1989年,全市政法机关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委的有关指示,以制止动乱、惩治贪污受贿、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除“六害”(取缔卖淫嫖娼活动,查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活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打击制作贩卖毒品、查禁私种吸食毒品活动,查禁赌博活动,取缔封建迷信活动)为中心开展各项社会治安活动,全市共破获刑事案件7171起,查处贪污、受贿大案要案108件,逮捕犯罪嫌疑人3251人,审结刑事案件2590件。1990年5月开始,根据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政法委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严打”斗争,政法各部门注意在“深”字上下功夫,坚持以质取胜,既互相制约又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

其二,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91年,市委制定《杭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年规划》,实施治安目标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真抓实干;“宣传月”“千家谈”等宣传活动广泛开展;治安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到区、县(市),齐抓共管的局面初步形成;基层基础建设不断加强,48名公安干警被选派到街道、乡镇专抓综合治理工作;反盗窃斗争等群众性的防范机制不断健全,安全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一票否决制、属地管理制在艮山街道、富阳镇、临平镇等地试点,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有所进展。政法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同时,案件侦破、批捕、预审、起诉、审判以及司法行政、治安管理等各项业务得到全面加强。是年,尽管受到国内国际形势剧烈动荡的冲击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杭州市仍然保持政治安定和较好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有所增强。

三、加快党的自身建设,实现政治全面稳定(1993年11月—1998年10月)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1993年市场化提速,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

并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因为,不论是要实现政治稳定,还是推进市场化改革,都离不开党的领导;而要加强党的领导,则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1993年底至1998年底,以党的自身建设为龙头,积极推进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工作,实现政治的全面稳定,进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经济高速发展。

(一) 加强学习提高素质,积极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1. 学理论、学知识,全面提高整体素质

1994年至1996年,为提高抵制“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思想,适应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市中共党员开展“两学两提高”活动,即: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科技文化业务知识,提高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两学两提高”活动的重点是抓党员培训,农村着重培训5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党员、村干部及入党积极分子;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着重培训在职干部、职工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培训,主要是利用基层党组织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每季一次的党课和党员集中轮训,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科技业务知识培训,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采取组织党员参加各种函授学校的学习、利用电化教育手段、集中培训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等办法进行。通过培训,50%以上的受训对象能掌握1项~2项生产技能或多种管理知识;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训对象,50%达到农民技术员水平;企业党员70%以上成为生产技术经营骨干;机关事业单位党员60%以上成为懂经济、懂管理、能力强、业务精、技术硬的骨干。1995年,为落实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在全体中共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活动的战略任务,“两学两提高”活动进一步深化,在全市中共党员中开展“双学”活动,即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学习党章的活动。3月,市委举办理论骨干培训班。6月,举办农村乡镇宣传委员培训班。全市各级党委共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37期,培训师资和理论骨干2700余名。同时,在上城区涌金街道、余杭市獐山镇、市二轻总公司、杭州师范学校等单位进行“双学”试点。至年底,“双学”活动在全市铺开,中共党员轮训率达30%。各级党组织按照“两学两提高”要求,对中共党员进行岗位知识培训。全市有8万余名农村中共党员和干部参加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其中,2万余人取得结业证书,近5000人获农民技术员以上职称。

2. 以“三讲”为纽带,推进领导班子建设

在全市中共党员、干部中开展“双学”活动的同时,在领导干部中着重进行以“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活动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了干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自觉性和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干部抵制不正之风的政治素质,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提高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以及解决领导班子自身问题的能力。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深化,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1995年,在1992年公开选拔10名副局级领导干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拔副局级干部;各级党委认真做好年龄即将到杠的党政领导干部退出领导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的工作,及时办理到龄领导干部离退休手续,为优秀年轻干部充实进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同年,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并扩大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民主程度,把干部考核、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同干部的选拔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普遍组织实施了对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对不称职的干部及时进行调整;加大领导干部交流

力度,全市共交流县局级领导干部43名;首次在市级机关非选举产生的部门和单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以增强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奋发向上。1997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继续做好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全年全市调整县局级领导班子85个,任免市管领导干部226人,其中新提拔75人;在新提拔的干部中,45岁以下29人,35岁以下5人;为加强对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市委组织部组织17名机关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从省属高等院校选调18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到乡镇工作,还首次从浙江大学选派8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到乡镇锻炼;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的规定,全市交流市管干部147人,占调整市管干部总数的47.6%。全市各县(市)党政正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7个职位的领导干部全部达到非原籍任职要求;同时,在市级机关机构改革“三定”(定编制、定岗位、定人员)中,绝大多数单位对中层干部实行内部轮岗交流。1998年,市委第三次公开面向全社会选拔市法院等10个单位的副局级领导干部,以创造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拓宽选人渠道。

3. 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1)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1994年,在开展“双学”活动的同时,集中整顿农村后进村党支部,全市近200个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党支部得到整顿。农村基层党建紧紧围绕“奔小康”目标,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1995年,区、县(市)各级党委按照“五好”(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支好的党员干部队伍、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一个好的经营体制、一套好的管理制度)目标,继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广泛扎实地开展“奔小康”活动。1996年,市委制定《杭州市农村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党支部整顿验收标准和办法》,对1994年底被评定为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农村党支部的整顿转化工作进行检查(复查)验收。是年,继续抓好农村后进村党支部的整顿转化和巩固提高工作,并加大对淳安县扶贫帮困的工作力度。1997年,在全市普遍开展农村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市委表彰49名“小康示范村”先进党支部书记和50名“脱贫致富先进村”先进党支部书记。1998年,全市农村普遍开展村党支部创建“五好”、乡镇党委创建“六好”(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支好的乡镇干部队伍、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一个好的工作格局)活动,开展“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以乡镇和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

(2)企业党建方面:1994年,企业党建继续积极探索与实践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新途径,改善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结构,对实行股份制改组的企业,努力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党组织负责人和成员进入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1995年,市委组织部先后对全市28家列入中央、省、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进行党建工作调查,制定《关于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并按照改制试点与党建同步考虑的思路,对企业领导班子、党务机构设置、中共党员活动方式等进行具体指导;市委转发市委组织部《关于加强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的意见》,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党建工作进行分类指导。1996年,市委下发《关于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的意见》,市委组织部直接参与全市23家试点企业和市丝绸控股公司试点方案的修改制定。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颁布《杭州市企业改革三年规划(1998年—2000年)》,明确企业改革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1998年,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文件精神,在全市企业中普遍开展创建党建工作“四好”

(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企业活动,并对全市42个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工作进行检查验收。5月,全省第一个私营企业党委——中共浙江传化化学公司集团党委成立,为做好新经济组织中的党建工作打开思路。

(3)城市社区党建方面:1993年,为有利于街道党组织加强对街道其他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协调街道范围内的省、市、区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市委组织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街道党委改为街道党工委。1994年11月,全国第一个社区建设研究会在杭州成立。1995年开始,在全市街道普遍开展“凝聚力工程”建设活动。到1997年底,全市共有8900余个基层单位开展“凝聚力工程”建设活动,设立扶贫帮困基金2400余万元,帮助贫困户、困难户解决困难4.09万余件。各单位按照“强核心、壮基础、办实事、聚民心”要求,形成中共党员关心群众的良好风气。1998年4月,下城区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8月,第一次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座谈会在下城区举行,来自全国30余个城区的90余位代表和社区建设研究专家参加会议。

(二) 加强法制建设,增进政府社会工作职能

为保障和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有序、快速发育,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1994年起,全市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政府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管理,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1. 加快立法步伐,增强执法力度

首先,1994年初,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制订立法规划(1994年—1996年),立法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全年,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1995年,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有《杭州市农副产品集贸市场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1996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或修订5件地方性法规的同时,对全市现行实施的20余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1997年,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订8件地方性法规,并对全市先行实施的26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其中,对9件法规的部分条款做了修改,对4件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规做出废止决定。同时,为加强本届人大常委会在任期内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有序性,根据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急需先立的原则,市人大常委会制订立法规划(1997年—2001年),明确5年内市人大常委会要审议通过50件左右地方性法规的目标。

其次,在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增强依法执行的力度。5年内,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些涉及面广的重要法律、法规在全市的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督促,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进法律法规深入贯彻实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94年,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执法检查2次,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有重点地进行执法检查4次,配合全国和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5次。1995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执法检查2次,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有重点地进行执法检查4次,配合全国和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3次。1996年,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12部法律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1997年,进行执法检查2次,指导各工作委员会组织执法检查13次。

同时,从1993年开始,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开展行政执法评议,对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开展述职评议,并使“两项评议”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1994年下半年,市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听取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局长述职报告和评议。通过评议,推动任命干部及其任职

部门的行政执法和廉政建设,增强任命干部的法制意识、公仆意识、创业意识和依法行政的自觉性。1995年,市人大常委会在总结1994年评议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两项评议”工作。

再次,社会治安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10月至1998年,全市政法机关严厉打击和综合治理相结合,有力地推动社会健康发展。5年来,全市政法机关相互支持,通过不间断地组织开展“严打”专项斗争和统一行动,遏制刑事案件的发案势头,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1993年,全市政法机关开展重点打击盗窃团伙和集团、打击车匪路霸、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的“三打一禁”专项斗争,依法批准逮捕3524人。1994年,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1995年,依法整治农村犯罪团伙、流氓恶势力犯罪活动,开展“禁毒”“扫黄打非”等专项斗争,维护社会稳定。1996年,依法批捕暴力恶性犯罪和涉枪、涉毒犯罪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分子3895人,批捕重特大案件犯罪嫌疑人3334人。1997年,重点开展“禁毒禁赌”专项斗争,共审查批准逮捕涉毒犯罪嫌疑人255人。1998年,全市政法机关积极参与“夏季严打”“缉毒”“反窃车”等专项斗争,全年依法批准逮捕5421人。

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1994年开始,全市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党政领导的政治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1996年3月、4月,为增强各级领导干部“为官一任,保安一方”的政治责任感,市综治委、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以“六个一”(一次市综治委全体会议、一次市级综治先进单位代表座谈会、一次市领导电视讲话、一次综治黑板报展评暨法律咨询服务活动、一次内保单位安全防范工作现场会和制订一个公共财物被盗责任赔偿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综治集中宣传活动,“务虚”和“务实”均取得较大成绩,扩大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影响,营造出“人人参治”的氛围,推动了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集中宣传活动期间,市综治委、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和市监察局等部门重新公布与市委、市政府签约单位的社会治安责任人,并制定《杭州市199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检查考核细则》。

2. 调整政府工作方向,加强对文化和社会事业的领导管理

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其长处在于能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但市场经济又不是万能的,它不仅需要良好的法律秩序、健康的道德氛围做保障,而且本身有着扩大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的必然趋势。为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市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工作领导管理。

首先,市政府制定并实施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文化发展战略和爱国主义教育规划,连续在城乡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和形势、任务教育,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热情。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促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涌现出一批既体现传统美德又符合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实施科教兴市战略,“钱江科技潮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社会科学、党史研究等事业健康发展,创作出一批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化精品,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计划生育工作富有成效,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不断发展。杭州市在卫生、园林、环保、“双拥”、绿化造林和科教兴市等方面获得全国性荣誉称号。

其次,市政府坚持为民办实事,每年都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1993年和1994年物价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从生产供应、市场流通和价格管理等方面入手,抓好粮食、“菜篮子”商品生产和供应,适时干预和调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价格,建立各级控制物价上

涨目标责任制,努力抑制物价上涨过快的势头。全市新建居民住宅 1263 万平方米,新建和完善 118 个规模较大、设施比较完备的新型住宅小区,新建 25.4 万平方米“安居工程”住宅和 45 万平方米教师住宅,17.58 万户居民搬入新居。结合旧城改造,整治一批街巷、河道和低洼积水地区,扩大环湖绿地和城区绿化面积,新建少儿公园、老年公园以及其他一批公共活动场所,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建立和完善对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安置 3 万余名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积极引导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萧山、余杭、临安、富阳、江干、西湖、拱墅 7 个区、县(市)经省政府考核验收达到小康县水平,110 个乡镇经考核验收被市政府命名为小康乡镇。

3. 政府部门与人大、政协通力协作,依法治市的局面基本形成

市政府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认真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政府工作坚持依法行政,政府部门认真实行执法责任制,政府部门负责人认真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评议并切实改进工作。市政府重视和支持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及时通报情况,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及时进行协商,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府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地方性法规 20 件,制定发布行政规章 82 件,清理废止政府规章和其他文件 164 件。建立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各级行政机关认真审理行政复议案件 944 件。办复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建议 2852 件,办复全国和省、市政协委员提案 3256 件。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解决一批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建立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完成“二五”普法教育任务,公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得到增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及民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依法治市的局面初步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纳入法制化轨道。

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强化民主法制建设(1998 年 11 月—2002 年 2 月)

1998 年至 2002 年初,杭州市在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系快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文明快速、平稳发展。其间,广大干部党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自己,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现代民主、法治建设扎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初见端倪。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全面推动党的建设

1. 思想建设

2000 年,市委部署用近两年时间在全市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指导各项工作。学习活动于 2000 年首先在市、市直部门和县(市)领导中展开,继而在区、县(市)部门和各乡镇展开,到 2001 年 6 月基本结束。8 月,学习教育活动延伸至市属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2000 年 11 月下旬至 2002 年 2 月下旬,先后组织 4616 个行政村、6.64 万名基层干部参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着重突出农村基层干部、中共党员学习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创建“五好”村党支部和“六好”乡镇党委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作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2002 年 3 月至 4 月,进入总结阶段,市委组织力量对学习教育活动进行回访复查。6 月,召开全市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表彰大会,授予淳安县千岛湖镇等 27 个乡镇、村和

淳安县茧丝绸总公司等 17 个区、县(市)直属单位“杭州市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提高,思想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进;广大农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民办事氛围基本形成。

2. 组织建设

市委抓住干部任用关节点,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任前公示制、干部试用制、党政机关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制、辞职制、画线腾位等制度。1999 年,市委制定《关于在市直单位试行副局级领导干部试用制度的意见》和《市级机关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实施办法》,有 109 名干部通过竞争担任中层干部,新提拔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全部实行试用制。2000 年,市委推出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等 26 个局级领导职位,面向全国公开选拔。该次公开选拔创下全市选拔局级领导干部 7 个第一:第一次推出正局级领导干部职位,第一次将所有职位面向全国进行公开选拔,第一次推出专供党外干部竞争的岗位,第一次实行考核预告制,第一次实行考察责任制,第一次实行任前公示制,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发布“公选”公告、接受报名。2001 年,市委组织部在干部任用、选拔上全面推行任前公示、考察预告、民主推荐、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等制度,余杭区、江干区试行干部任免票决制,萧山、临安、富阳等地对有的部门副职实行全额竞争上岗。

3. 作风建设

在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的同时,市委加强对干部作风的监督。1999 年,在市委组织部设立干部作风投诉电话,投诉对象为全市机关和承担各项审核审批、行政执法及收费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干部,投诉内容主要为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包括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吃拿卡要、滥用职权、态度粗暴、故意刁难、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自 6 月底投诉电话开始运转至年末,全市共接到电话投诉 754 件,涉及干部作风 538 件,查办 451 件,报结 392 件;143 人受到教育和查处,其中,谈话教育 95 人,通报批评 17 人,轮岗 6 人,留用察看 1 人,行政警告 8 人,撤职、免职 5 人,党纪处分 5 人,移交纪检部门查处 6 人。

4. 落实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加强各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市委积极落实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农村、社区、非公企业等基层单位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1998 年,全市农村普遍开展创建“五好”村党支部和创建“六好”乡镇党委活动,开展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并以乡镇和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后,全市农村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活动。此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文件精神,在全市企业中开展创建党建工作“四好”企业活动,并对全市 42 个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整顿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同时,探索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机关、街道、学校等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1999 年,新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提上市委工作议程,市和县(市)两级党委对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展开调查研究。11 月,召开全市私营企业党建工作会议,对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做了专题部署。至年末,全市有 3 名以上正式中共党员的私营企业单独设立党组织的占 81%。2000 年,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明确目标,进入完善机制、提高水平、强化作用阶段。至年末,全市 17698 个非公有制企业中,有中共党员 26137 人,建立党组织 1944 个,其中,企业单独建立党组织 779 个,建

立联合党支部 497 个,合计占企业数的 90.4%,涌现出传化集团、金义集团、富通集团等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党建工作先进典型。2001 年,拓展基层党建工作,结合社区体制改革,在 5 个老城区原有的 586 个居民区重新组成 275 个新型社区的基础上组建社区党总支。全市社区党建工作卓有成效,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的肯定与表扬。

(二) 强化民主、法制建设,提升依法治市水平

民主和法治是政治走向现代化的集中表现和根本途径。1998 年末至 2002 年初,全市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表现在民主、法治建设迈出了扎实的一大步。

1. 地方立法、发扬民主与时俱进

1999 年至 2001 年,依照 5 年立法规划,市人大常委会共通过法规 17 件。与以往的立法过程相比较,该阶段立法工作体现出立法民主性和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1999 年,审议《杭州市城市供水条例(草案)》和《杭州市城市公共管理条例(草案)》时,因法规内容涉及民生,市人大常委会将两个法规的草案内容全文刊登在《杭州日报》上,广泛征求市民意见。2000 年,审议《杭州市公园管理条例(草案)》前,市人大常委会又召开立法听证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过程反映立法的民主性,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地方立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更是需要以新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而当时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还带有计划体制时的痕迹。本着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精神,2001 年,市人大常委会对 46 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保证法律法规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保障和促进功能。

2. 民主监督、民主参政有效推进

(1) 民主监督。1999 年,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委提出的创建“强市名城”总体要求和“经济保领先,文明创一流”年度目标,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视察调查、“两项评议”、司法评议、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等形式,有计划地开展监督工作,积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市人大常委会全年先后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 15 个工作报告,对 7 个县(市)和 3 个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还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浙江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市工作。2000 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围绕全市工作中心、突出重点、加大力度、提高实效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促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对运河治理等重大工程实行全程跟踪监督,保证城区河道整治进度超过年初确定的目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高强度的检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关注改革中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审议市政府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决议》情况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杭州市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汇报,督促政府切实纠正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方法;组织市人大代表对市公安局 1998 年以来的执法工作进行评议,抽查案件 1062 件,对其中有问题的 137 件督促其重新调查整改;组织代表对全市卫生、工商等 13 个部门实行“定向”视察,检查监督其工作。

(2) 民主参政。1999 年,政协民主参政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市政协积极探索改进视察与调研方法,在采用统一安排和界别组织相结合、参观性视察和调研性视察相结合的基础上,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从而加强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作。全年参加市政协的市各民主党派、工

工商联和人民团体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材料 178 份,有 50 份在市政协全会和常委会议上做专题发言。各专门委员会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和视察活动 67 次,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24 份,其中,《关于当前超市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建议》《关于加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意见建议》《加强对吴越文化遗迹的抢救保护、开发利用,丰富杭州城市的文化内涵》《杭州文化艺术跨世纪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关于防治我市农田土壤污染的建议》等调研报告得到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数意见建议被吸纳。2000 年,市政协努力推进“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制度的落实,提出落实政治协商“三在前”配套措施,组织调研,形成《按“三在前”要求逐步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提高履行政治协商职能的认识、协商的形式和协商的程序等提出具体要求,意见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市政府办公厅汇总 23 个重大问题提交市政协协商。除市政协常委会外,还通过政协常委专题协商会、主席议政会议、情况通报会、专题座谈会和对口联席会议等,分别就“十五”计划建议、杭州区划调整、杭州西湖博览会筹备工作、《杭州城市绿化管理条例》修改及医疗改革方案等 10 余项事关全局和群众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讨论,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协商会议并向委员通报情况,还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与。最后,采用建议书、提案、意见建议综合和信息专报等形式报送协商成果,并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反馈,委员提出的关于办好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的 19 条意见被分送到市各有关部门办理落实,主席会议关于杭州市区划调整方案的建议被省、市领导机关采纳。

(三) 转变职能,法理型、服务型政府初现端倪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法治意识在全社会普遍增强,与此相伴随,市政府增强法治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和机关作风,自觉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1. 高度尊重人大、政协的意志,快速处理落实人大、政协提案

市政府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市政府重视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及时通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和建议。1999 年,市政府承办全国和省、市“两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1077 件。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1 件,省人大代表建议 16 件,省政协委员提案 105 件,市人大代表建议 438 件,市政协委员提案 517 件,办结率 100%,满意率 99%。2000 年,市政府承办省、市“两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1072 件。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 24 件,省政协委员提案 97 件,市人大代表建议 485 件,市政协委员提案 416 件。建议、提案内容涉及城建城管方面 463 件,占总数的 43%;涉及商贸旅游方面 206 件,占总数的 19%;涉及文教卫体方面 187 件,占总数的 17%;涉及群众生活方面 177 件,占总数的 16.5%。办结率达 100%,满意率为 99%。2001 年,市政府承办省、市“两会”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1276 件。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 13 件,省政协委员提案 89 件,市人大代表建议 559 件,市政协委员提案 615 件。代表、委员针对全市城建城管、商贸旅游、文教卫体、群众生活等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办结率达 100%,满意率 99%,促进了全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市政府还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和民情民意调查网络,充实专家咨询委员会,确保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

2. 深化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机关作风

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1999 年 10 月开始,进行两轮审改,共减少审批事项 641 项,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实行企业登记注册并联审批,改善投资环境。2001 年,杭州市继续深化行政审批领域的改革,市委、市政府要求在第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

上再取消 30% 左右的审批和审批类事项,审批时限平均压缩三分之一。在充分听取和征求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省级各部门和市民意见的基础上,全市行政审批事项从 787 项减少到 568 项;下放、转移一批审批事项,一批审批事项不再列入审批范围或改为备案管理;单个审批事项的审批时间得到严格控制,部分改为当即办理。在改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建立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后,又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绿色通道”审批制度,为省、市重点投资项目开辟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借以切实解决审批效率低的问题。通过第二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工作全面“提速”。与两轮审改相对应,市政府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厂务公开,在部分职能部门、“窗口”行业实行承诺服务制、首问责任制、AB 角制度等,开展“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机关作风明显改变。

1999 年,杭州市的政务公开工作从抓试点转向抓面上推开,从抓制度公开转向抓制度落实,从建立单纯的内部监督机制转向构筑全方位的社会监督机制,自上而下推行政务公开以还知情权于民众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推行政务公开的市政府部门和直属单位有 57 个(公开的办事项目有 800 余项);各区、县(市)所属部门有 398 个,占 94.4%;234 个乡镇和主要街道均实行政务公开。此外,市政府还积极探索和健全新的监督机制,使政务公开取信于民,特别是建立“12345,有事找政府”市长公开电话和各区区长公开电话,实现网络管理与新闻媒体的联手运作,使政务公开、部门承诺服务与群众监督、新闻监督得以紧密结合。2000 年,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强化对内部和网络单位的监督管理,完善工作细则和目标考核管理办法,使中心的受理工作走上稳定、规范的发展轨道。信息产业部将“12345”电话号码确定为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杭州设立当地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2001 年,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健全工作制度,强化网络建设,加大督查力度,加强调查研究,接受行政和舆论监督,积极发挥“传、帮、督”(即正确迅速传递信息,认真及时帮助老百姓办实事,督促机关转变作风)作用。

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公务员队伍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人员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工作全面完成,重大建设项目招投标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广泛实行,廉政建设扎实推进。

五、高举旗帜,科学发展,政治文明建设领跑全省(2002 年 3 月—2005 年 12 月)

2002 年至 2005 年,杭州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其间,全市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在前列”为要求,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重点,坚持“发展、创新、节约、稳定”,推进“五大战略”(城市化、“工业兴市”、“旅游西进”、“开放带动”、“环境立市”),破解“七大问题”(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停车难、清洁杭州、办事难),打造“平安杭州”,创建“文化名城”,建设“法制杭州”,引领“和谐创业”,构建“和谐杭州”和创新型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领跑全省。同时,全市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全面推进,打造“平安杭州”成效显著,政府转型快速推进。

(一) 高举旗帜,科学发展,全面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1.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面贯彻落实省委重大政治战略部署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十六大召开后,市委以开展“学习十六大,创业在杭州”大讨论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抓好中共十六大精神在全市的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四次全会通过

《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杭州现代化建设的决定》。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下发后,市委召开九届五次全会,对全市兴起学习新高潮做出部署。《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后,市委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制定《关于认真组织学习〈江泽民文选〉的通知》,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市委提出把推进“五大战略”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省委“八八战略”的重要载体。市委召开九届六次全会,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召开九届七次全会,强调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确保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好中求快、稳中求进;召开九届九次全会,贯彻胡锦涛“走在前列”和省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强调解放思想,克难攻坚,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市委召开九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制定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来,市委落实宏观调控措施,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贯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策部署。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后,市委把破解“七大问题”、打造“平安杭州”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按照省委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制定《关于深化创建“平安杭州”工作的决定》,努力建设全省的“首善之区”;学习胡锦涛关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重要论述,召开为期两天的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破解“七大问题”,颁发系列政策意见,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切实为民办实事。

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部署。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决策后,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帮扶工作会议、“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会议进行贯彻落实,颁发《关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相关政策意见,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贯彻建设创新型国家决策部署。中央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决策后,市委召开九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打造“天堂硅谷”,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决定》,制定12个政策文件,按照省委建设创新型省的要求,提出推进理念、体制、科技、服务“四大创新”,力争率先建成创新型城市。

贯彻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决策部署。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决策部署后,市委召开九届五次全会,制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若干意见》;召开市委九届八次全会,通过《关于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全市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出部署,制定《关于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先后完成城市基层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和全市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贯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央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后,市委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制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推进全市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贯彻建设文化大省决策部署。省委做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部署后,市委召开“一名城、四强市”建设工作会议,颁发《关于加快“一名城、四强市”建设的意见》和若干政策意见,做出建设文化名城,打造教育强市、科技强市、卫生强市、体育强市的工作部署。

贯彻建设“法制浙江”决策部署。省委做出建设“法制浙江”决策部署后,市委召开建设“法制杭州”工作会议,制定《关于建设“法制杭州”的决定》,对全市法制建设做出全面部署,推进杭州市法制建设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2. 深入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先进性是党的本质特性和本质要求,先进性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亦是每一时期的阶段性工作。2002年至2005年,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先进性教育,推进党的建设。

2003年2月下旬至9月上旬,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杭州作为全国17个试点城市之一,在城市基层开展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在国有(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社区、学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和新社会组织等7个层面进行,涉及基层党组织9731个、中共党员148937人。试点工作分为调查摸底、动员准备、思想发动、学习培训、党性分析、民主评议,抓好整改、巩固提高4个阶段。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各试点单位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工作,按照“六个贯穿始终”要求,立足城市基层实际,切实加强领导,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在试点工作的思路、内容、途径、载体、方法、措施等方面着力创新求实,为2005年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国铺开提供宝贵经验。2005年1月,根据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市铺开。教育活动共分3批开展,参加第一批教育活动的主要是市、县两级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共有基层党组织3029个、中共党员41308人,时间从2005年1月开始至2005年6月基本结束;参加第二批教育活动的主要是区、县(市)的乡镇街道机关、县(市)国有(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社区、学校、新社团(中介组织)以及其他城镇基层单位,涉及基层党组织3427个、中共党员48236人,时间从2005年7月开始至2005年12月基本结束。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市中共党员普遍受到一次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先进性意识有新的增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新的提高;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群干群关系有新的改善,基本实现中央提出的“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目标要求,得到广大党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的发展。

首先,促进干部管理和党风廉政工作。

2003年,市委组织部认真抓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市本级安排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16项。同时,对市直单位党政“一把手”开展2002年度总结报告工作,有86个单位对党政“一把手”进行年度总结报告并接受民主评议,对322名市管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2004年,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各有关单位积极参与的效能建设活动。从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运作方式入手,着力解决影响班子建设和机关效能的深层次问题。全市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中开展“三树一创”(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的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对13个区、县(市)领导班子进行回访了解,对55个市直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届中考核,对105个县局级单位中的122名党政“一把手”进行年度总结报告、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对467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述廉和民主测评,对15名市管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2005年6月起,省委分4组在西湖、临安、桐庐、淳安4个区、县(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杭州市成立综合考核评价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设4个考核组和1个综合组配合开展工作。市委及西湖等4个区、县(市)党委对

试点工作高度重视,准备充分,组织周密,做了大量工作,为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得到省委的充分肯定。

其次,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1)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先进性教育中得到加强。2002年,先进性教育结合“领头雁”工程,组织2587名村干部完成高中学历培训,选拔村后备干部7000余名,调整村党支部书记1814名。换届后的村党支部书记年龄在45岁以下2936名,占65.4%;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3251名,占72.4%。2003年,在全市实施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建设,将创建任务细化到各区、县(市)。同时,深化“领头雁”工程,以村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素质日益改善。为抓好新一轮“49100”帮扶工程建设,抽调选派38名市直机关干部到市级领导联系的欠发达乡镇担任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镇)长,进行为期1年的挂职锻炼。2004年,市委按照“五先行一加强”要求,认真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展“先锋工程”“49100工程”“领头雁工程”建设,深化“三级联创”活动,确定30个乡镇党委、375个行政村党组织为新一轮先锋工程创建对象,建立一支有1.30万人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2)在先进性教育中,社区党建工作不断完善。2002年9月,市委制定《杭州市社区党委工作细则(试行)》,明确社区党委的地位、职责、任务,初步规范全市社区党委工作。按照“积极稳妥、试点先行”要求,市委组织部指导全市5个老城区建立社区党委的试点工作。2003年,确定城市基层35个党建工作示范点,全市有100名以上中共党员的224个社区均完成建立党委工作。2004年,市委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精品”“亮点”工程建设,做好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全市260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实行“两推一选”制度,有35675名党员、15516名群众参与候选人的推荐,初步实现社区领头雁工程“3个60%”目标。

(3)在先进性教育中,加快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步伐。各地采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做法,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村企合建、行业组建等方式,不断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覆盖面。至2002年底,全市有非公有制企业58027个,职工71万余人,党员38299人。2003年,市委制定《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完成省委提出的“三年两目标”(使有5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都有中共党员,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或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都单独建立党组织)任务。2004年,市委认真落实全国和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制定《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和5项具体制度,建立起一支有3500余人组成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指导(联络)员队伍。

(4)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2005年,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市委制定《关于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的意见》,召开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全面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各级组织部门深入开展流动党员专项普查活动,在新闻媒体刊播致流动党员的公开信,发出《致流动党员的公开信》2.30万封;广泛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全市建立流动党员管理(服务)中心73个,新建流动党员支部294个,建立社区(企业)流动党员服务站345个,找到流动党员6021人,创新10种流动党员党组织组建模式。中央组织部《组工信息》刊发《杭州市大力实施流动党员“安家工程”推进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信息,向全国推介杭州工作经验。省、市委领导先后对这项工作的成效做出批示,给予肯定,并向全省总结推广杭州的工作经验。

第三,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在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推动下,市及区、县(市)两级领导机关严格遵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外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后备干部培养选拔,开展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连续选派中青年干部到重点工程挂职锻炼和赴国外学习培训。2002年6月中旬至8月下旬,市委推出150个领导职位,组织开展市和区、县(市)联合面向全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工作。经笔试、面试和考察,选拔领导干部114人,其中局级领导干部15人、市直单位处级领导干部20人、城区处级领导干部38人、县(市)委管理的局级领导干部41人。2004年5月,召开全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会议精神,结合杭州实际,切实抓好中央“5+1”文件和已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加强对各地、各单位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督促检查。10月上旬至11月底,首次实施联合公开选拔(招聘)领导干部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工作,选派8名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挂职。2003年,市委组织部认真贯彻实施“十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将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放在新班子成员的培训和急需、紧缺干部的培养培训上,对县局级领导干部进行理论考试;举办新任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培训班,195名新任市管领导干部参加培训;做好接轨上海的工作,组织首期MPA硕士学位班到美国学习。同年,开展《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五年发展规划》课题调研,市委办公厅制定《2003年—2007年杭州市市管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2004年,市委组织部、市建委等实施“百名中青年干部到重点工程挂职锻炼”工作,从8个城区、42个市直单位以及2个新闻单位抽调123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杭州市城市建设“三口五路”整治等重点工程第一线锻炼。3月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市委、市政府建立实施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省、市、县、乡4级选派农村工作政治指导员4358人(其中市本级90人)。经过一年的扎实工作,农村工作政治指导员在农村基层逐步树立起“勤于学习的有心人、发展经济的内行人、农民群众的贴心人、基层建设的推动人、自警自励的明白人”良好形象。

(二)完善民主、法制机制,打造平安杭州

1.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地方立法

2002年至2005年,市人大常委会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决策紧密结合起来,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通过立法反映民意、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和清理工作中,既注意依法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职权,又注意加强对行政权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和谐调整各方面利益。

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杭州市劳动合同管理条例》《杭州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等。2003年,审议通过《杭州市土地管理规定》等5件法规,修订地方性法规5件,废止地方性法规1件。2004年,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杭州市全民健身条例》等7件法规。对2003年底以前有效的53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审查行政许可事项329项;根据审查结果,修订《杭州市爱国卫生条例》等13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杭州市民办中小学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2005年,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年度立法计划和实际需要,审议通过《杭州市专利管理条例》《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杭州市旅游条例》《杭州市机动车辆排气污染物管理条例(修订)》《杭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修订)》《杭州市家畜屠宰管理条例》6件法规。同时,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立法工作的前瞻性、计划性、针对性,注重立法工作的民主性,向各级部门征求立法项目建议且登报公告,向全社会征集地方性法规项目建议,使立法工作更富民主性。

2. 贴近民生,加强监督

其一,加强对重要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对《浙江省职工养老保险条例》《浙江省职工失业保险条例》和《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市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议》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促进法律法规在全市的正确实施。2003年,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执法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做好自查自纠工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切实保障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市和区、县(市)人大还联合对全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及时整改。2004年、2005年,市人大常委会结合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开展的省、市和区、县(市)人大联动执法检查,组织代表对杭州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生态省决定和推进生态市建设决议情况进行检查,有效推进生态市建设。

其二,加强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的监督。2002年,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九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的决议、决定和广大市民所广泛关注的城区河道综合整治、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拆除市区违法建筑等工作,采取视察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题报告等方式,加强对市政府贯彻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决定情况的监督,责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杭城市容和环境卫生,启动新一轮河道整治工作。2003年,市人大常委会就“行路难”“停车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问题,要求有关工作部门赴外地专题调研;对市区供电情况进行视察,推进政府“让电于民”举措的落实;对钱江新城建设、良渚文化遗址保护等工作进行视察,推动“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战略的实施。2004年,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和《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执法检查,要求市政府加大执法力度,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供可靠保障。2005年,市人大常委会对河道整治、运河综合整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等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督查,督促政府部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

其三,坚持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监督。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审查批准上一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本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就加强税收征管、重视财源建设、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范财政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向市政府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其四,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受理人民群众申诉,依法进行监督,提出监督意见。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对司法机关办理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坚持提前介入,与司法机关共同商量研究,并组织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旁听案件的审理,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常委会领导深入司法机关听取工作汇报,要求各司法机关强化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廉洁司法和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意识,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

同时,政协亦就民生问题在全市展开视察,并向市委、市政府报送相关信息。其中,2004年《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建议》与2005年《国家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应进行调整》《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建议》《关于合并〈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建议》等信息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3. 加强综合治理,打造“平安杭州”

2002年2月至2005年12月,全市政法部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加强流动人口和“城中村”管理,及时调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杭州市连续3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被新浪网和《小康》杂志评为“全国治安最好城市”。

其一,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对各类刑事犯罪发起“凌厉攻势”。2002年,全市政法部门集中力量对4个省级治安混乱地区和12个市级治安混乱地区进行重点整治,治安面貌明显改观并转入长效管理。2003年,政法部门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完善“严打”经常性工作机制。全年组织“严打”整治专项斗争10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814件,摧毁恶势力犯罪团伙332个,依法批准逮捕7674人,起诉9078人。2004年,通过对各类刑事犯罪的持续高压打击,杭州市刑事案件发案上升率为全省最低,杀人案件和“六类”案件破案率居全省第一位。此外,全市政法部门还及时搜集和分析敌情动向,超前工作,先制于敌,有效阻止敌对势力组党结社、窃取秘密、渗透破坏等活动;完善反恐防暴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加强反恐训练,组织实战演练,提升处置恐怖事件的能力;深入开展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积极做好“法轮功”邪教痴迷者的教育转化和防范控制工作,实现敏感时段、“十一”假日和中共十六大期间“零进京”“零滋事”。

其二,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举措。2002年,市委书记王国平、常务副市长马时雍与13个区、县(市)和15个市属有关部门签订2002年度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把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落实到党政主要负责人身上。党政主要负责人按责任制要求定期研究部署政法、综治工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实际困难。2004年,市委贯彻省委打造“平安浙江”决策部署,召开全市公安、政法、信访等工作会议,通过10余次专题会议部署,深化创建“平安杭州”工作。同时,全市政法部门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深化基层“创安”工作,制定《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构筑城市街面电子监控系统,在商区、景区、社区等重要部位安装电子监控点794个。同年,杭州市基层综治工作经验在全国、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得到推广。2005年,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关于平安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发展固平安,机制促平安,合力创平安,民主催平安,亲民育平安,责任系平安”的工作思路,找准创建工作的切入点和载体,全力开展“平安杭州”创建,有力地促进杭州市的社会和谐稳定。7月,根据平安创建工作的需要,市委平安创建领导小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创建“平安杭州”部门工作职责》和《创建“平安杭州”部门考评办法(试行)》,明确各成员单位在“平安杭州”创建中的工作职责、任务和考核、奖励办法等,形成平安创建工作合力。

其三,积极推进政法建设,实现司法公正。2002年,全市政法机关大力加强对政法干警的管理教育,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司法公开、公平、公正水平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群众满意率提高,全年政法干警违法违纪比上年下降55.6%。7月至10月,组织全市有关政法部门对伤害案件进行执法检查,共检查人身伤害刑事案件1435件,治安伤害案件1889件,受理群众告状无门及申诉案件37件,纠正一批执法不公和执法不严的案件。2003年,杭州市开展“争创人民满意”活动,政法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在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广大政法干警战斗在第一线,在本职岗位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群众的满意率进一步提高。2005年,根据中央和省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全市政法系统组织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着力整改政法干警徇私枉法、权钱交易,违规违法办案、执法不文明、玩忽职守、执法不作为、部门保护、违法干预办案等方面的问题。为扎实推进专项整改活动,市委政法委还专门举办全市政法系统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读书会。专项整改活动规范干警的执法行为,整改突出问题,完善监督体

系,提高队伍素质,提升了社会各界对政法队伍的满意度,有92.4%的群众对杭州市执法队伍表示满意。9月,举行市委政法委专职和特邀督察员聘任仪式,对2名专职和8名特邀督察员颁发证书。这项制度的建立是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一项突破,对提升市和区、县(市)两级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三) 坚持民生为先,努力构建法理型、服务型政府

2002年至2005年,市政府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万事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重,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职能,努力构建法理型、服务型政府。

1. 坚持以民生为先、为主安排政府工作

2002年,经过政府部门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西湖环湖南线景区整合工程、道路建设大会战等10件实事全面完成。2003年,市政府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度开始努力解决群众关注的“七大问题”。2004年,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七大问题”,提出落实“两观”、破解“七难”要求,总结经验,明确目标,制定措施,狠抓落实。市和区、县(市)统一部署,建立健全街道(乡镇)和社区(村)两级组织机构,印发《健全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七大问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和《2004年“七大问题”重点整改工作任务》,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岗到人。2005年,市政府再次向群众征求意见并落实建设示范农贸市场、增加廉租房、实施医疗救助制度、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实现免费逛公园、完善垃圾处理系统、建立民工应急救助资金、规范市区门牌等10件实事。

2. 转变机关作风,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2002年,全市开展“作风建设年”和“调查研究年”活动,深化“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开通“96666”党政机关服务态度和效能投诉电话;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及时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持标本兼治,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权力运行不断规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计集中结算、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等工作不断加强。2003年,市政府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减少110项审批事项,减幅达20.2%;以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投资项目网上审批等为突破口,稳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努力提高办事效率;“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比活动继续深化,“96666”党政机关服务态度和效能投诉电话的监督作用增强,机关作风明显改进。2004年,市政府组建市行政服务中心,完善集中办理制度,构建三级行政服务体系;加快电子政务公开制度,行政效率和工作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市政府还开展职能理顺工作,市直部门理出职责交叉问题79个,县(市)理出职责交叉问题159个。2005年,市政府继续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法制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3.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构建法理型、服务型政府

杭州市政府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重视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及时通报情况并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时,发挥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民情民意调查网络建设,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府法制工作也不断加强,2002年,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4件,发布政府规章15件;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及时清理法规规章190件,其中废止政府规章55件。2003年,组织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6件,发布政府规章11件。2004年,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依法公布行政许可事项 360 项,市、县两级废止各类文件 888 件。2005 年,市政府为规范政府立法计划项目的立项工作,增强地方立法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立法的质量,制定《杭州市政府立法计划项目立项办法》,印发各县、区遵照实施,有效改善杭州市的法治环境,维护法制的统一。

(胡承槐、王 侃)

文化综述

一、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弘扬城市人文精神

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色深埋于城市的历史发展之中,决定着城市的兴衰。杭州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人文精神、文化传统对城市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准确把握杭州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色,首先应该科学、客观地梳理杭州文化的历史,把它放在杭州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

(一) 追求精致和谐的生活是杭州的文化传统

一个地方的文化气质、人文精神往往可以追溯到这个地方的历史源头。从杭州历史发展的文脉中我们可以发现,大约7000年至8000年前,在杭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的足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图案、造型甚至装饰都极其精美的陶器表明,在那个年代,杭州的先民就已经创造了最初形态的文化艺术。远在7000年至8000年前的杭州先民对生活的这种审美化倾向,从一开始就为杭州人对生活方式的偏好做了最好的铺垫。此后,杭州先民创造了璀璨的良渚文化,以精致玉器为标志的良渚文化通常被视为杭州文化的源头。在这些外形规整美观、制作精良精细的玉器身上,我们发现早在5000年前,杭州的祖先就已经为今天的杭州人种下“精致和谐”生活理念的基因。

经济的发展是其他一切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然也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上,杭州地区经济的发达与百姓生活的富足也为杭州人追求精致和谐的生活提供了前提条件。早在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百姓就由于气候适宜、土地肥沃而生活安定。至隋唐,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杭州成为贯穿中国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拉开了杭州繁荣昌盛的序幕。杭州也由此改变了山中小县的地位,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要地,走上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唐代,杭州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南”的东南名郡。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鏐定都杭州,使杭州的经济政治进一步发展繁荣起来。据苏东坡《钱氏表忠观碑记》描述:“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北宋时,杭州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据明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三的描述,当时的杭州“舟船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与政治中心汴京(今河南开封)遥相呼应,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经济最繁荣的两大都市,被宋仁宗誉为“东南第一州”。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杭州,杭州遂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于一身,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

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杭州人的生活一直比较富足和闲适,而富足和闲适则必然导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精致的生活,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杭州人对诗意生活方式的追求。由于富足闲适,杭州人历来喜欢游历山水、亲近自然。明朝高濂在《四时幽赏录》中曾这样描述:春时,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夏时,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莲;秋时,满觉陇赏桂,胜果寺望月,水月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冬时,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真是风雅之至。杭州人对吃也很讲究,不仅要求“吃饱”,还要求“吃好”。

清朝沈赤然在《寒夜丛谈》卷三中说：“吾杭富人，一席之费几至六七千文，盖又务为精致相高，虽罗列数十品，绝无一常味也。”而宋室南迁之后，杭州人更是将杭菜融合“旧京师人”所带来的烹饪方法，结合鱼米之乡特产丰盛的优势，“南料北烹”，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和风味的“杭州菜”。在南宋期间，“杭州菜”还被当作很有文化含量的菜肴引入福建，形成“雅菜”菜肴。在杭州，喝茶主要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喝出茶的韵味来。杭州人喝茶不仅讲究茶叶、茶具，还讲究喝茶的环境。杭州人对茶叶本身也很是挑剔，对茶叶产地、采摘的时间、成色，甚至用什么水来冲泡都很是讲究。如在茶叶的品相上，杭州人认为在清明之前采摘的茶叶可视为上品，能待亲朋；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叶成色尚可，留做家用；而此后的茶叶，则只堪“驴饮”，意为只能起到解渴的用处而无诗意可言。对茶的喝法，杭州人也自有一套讲究的方法。老杭州人为能喝到色香味俱佳的茶，往往路远迢迢，拿着水桶去离市区较远的虎跑提泉水来冲泡茶叶。明万历年间钱塘人许次纾在其《茶疏》中，曾记述杭州各色名茶的采摘、焙制、收存方法等39则，可见其时人们对茶道的讲究。

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促使人们不断地对生活中的用品进行改革与创新，而这种技艺、技术上的创新不仅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还进一步推动了其时其地经济的发展。如丝织业，在南宋时杭州已成为丝绸的都会、技术的中心，其后更是不断改进丝织技艺。至元明清时期，杭州官营丝织业极其兴盛，民间丝织工场也发展迅速，工艺与炼染技术已十分先进。杭绸、杭纺、杭缎、杭绫等品种花色独步天下，有“虽秦晋燕赵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布者，必走浙之东也”的记载。

当然，也有人指出，历史上杭州人过于注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尤其是南宋以后一味地沉湎于享乐甚至讲求奢华奢靡的生活，对杭州人文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宋都南迁而形成的对过于精致奢靡生活的追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杭州文化精神中柔美有余而刚猛不足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有必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对于精致、诗意生活方式的追求对杭州的发展而言，却未必是一件坏事。关于这一点，明代思想家陆楫早已有所论述：“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也。何者？势使然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胜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粮醢，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伎，仰湖山而待其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而用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思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消费是另一个人的工作”。杭州地区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一直较为发达，明中叶以后更是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发源地，应该说与杭州传统文化中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不无关联。

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追求体现了杭州文化中“小传统”的一面，那么这种追求“精致和谐”诗意生活方式的理念同样也显见于杭州的“精英文化”，即所谓的“大传统”之中。南宋年间，杭州绘画艺术名家辈出，高手如云。成立于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的南宋画院，集北宋南渡画家和江南绘画高手于一堂，宫廷绘画空前发展，造就了大批多才多艺的绘画人才，创作了众多具有时代风格的绘画作品。在南宋150余年的历史中，有姓名可考的画院画家近120人，其中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号称“南宋四大家”。两宋年间，杭州的刻书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北宋期间，杭州已是当时全国刻书出版业的三大中心之一（今鼓楼至众安桥一带是当时书坊集中之地，亦是出版发行中心）。其时有国子监刻书，刻印精美，为全国之冠，曾刻有《周易传》《十三经》《史记》等十

七史,计 1662 卷。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与此同时,文学也趋于繁荣。在杭为官、游历之客籍诗人,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柳永、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皆有歌咏杭州湖山的佳作,可谓文人荟萃,名家辈出。众多文学艺术人才在杭州的汇集,不仅发展了杭州的经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还使杭州城处处弥漫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形成了注重文化和教育的传统。据载,吴越地区早在唐朝以前就是中国“文气”很发达的地方,读书、藏书风气很盛。明清杭州藏书业甚为发达,至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明清时,杭州有著名藏书家近 30 人,其中以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赵氏兄弟的“小山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杭世骏的“道古堂”等最为著名,而文澜阁则因藏有巨著《四库全书》而饮誉中外。南宋定都后,在杭州设立太学、府学等各种学校,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这样一种“崇文好学”的传统,形成了杭州人秉守礼仪的习俗。葛礼在《钱塘赋》中说:“歌唐颂虞,咏仁蹈德,长者皆不怨不倦,幼者皆克既可仪。升降以齿,人尊长幼之序;渐摩有素,俗安礼仪之守。”而一个秉守礼仪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为恰如孔子所说的那样,“礼”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其重要之点在于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此外,杭州多姿多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也孕育了杭州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与共的理想画面。一方面,秀美的湖山对陶冶杭州民众的精神生活、诗化他们的人生态度起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含义除了说明一个地方的人们其物质生活、生产方式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包含了一方水土对造就人们的精神世界,培养人们的生活态度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自然美暗示生活。”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杭州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与杭州在历史中形成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杭州是“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从杭州西部而来的天目山脉,龙飞凤舞,奔腾跨越,到杭州戛然而止,为西湖架起了三面云山,群山柔和的天际曲线与西湖柔和的湖光水色,给这个城市一种和谐的感受。秦汉时期,由海潮、江流携带泥沙堆积成的沙坎将海湾与大海分割开来而形成的西湖,已经成为杭州一张精致的名片。而隋代大运河的开发,更是为杭州勾画出了一个小桥流水、杨柳依依的“城市溪流”景象。钱塘江的波澜壮阔,则为杭州精致如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些许豪迈和激情。这些湖光山色、江海波涛,不仅给杭州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游乐的好去处,还给历代的文人墨客带来了无数的文思,而这些最终又为杭州的文化气质增添了许多妩媚与欢快。另一方面,今天闻名于世的秀美湖山也凝结了历史上无数杭州人的心血。据史料记载,五代时期,曾有术士(风水先生)向钱镠进言“王若安居城中,有国仅可百年,若填掉西湖而筑城,有国可千年”。试想钱镠乃一介武夫,如若听信术士妄言,填掉西湖筑王城,当时也无人能够阻止。但钱镠听后,不仅没有填掉西湖,还派人日夜疏浚,在湖滨广建庭院,兴建净慈寺,扩修灵隐寺,建钱塘四塔,使西湖不仅呈现出旖旎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更以精致和谐的人文风情融合成人间天堂的独特景象。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没有一种对自然亲近爱护的传统人文精神,如果这样的人文气质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那么今天的杭州,也许早已没有了秀美的西湖,当然也不会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再如“苏堤”“白堤”,即是大文豪苏东坡、大诗人白居易为把西湖雕琢得更加精致妩媚而带领百姓对西湖进行大规模整治所留下的堤坝,如今,它已成为湖边一个重要的景点。另外还有众多的如“阮公墩”“杨公堤”等人文景观,也都体现了杭州民众善事自然之举。这使得杭州的每一处山水景观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典故,每一处人文景观又都坐落在美丽的山水之中,

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精致和谐的人文自然景观。

(二) 大气开放的胸怀是杭州文化的历史特征

如果说精致和谐代表了杭州传统文化中核心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那么大气开放则表明了杭州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相接触碰撞时所拥有的胸怀态度。

说杭州文化具有精致和谐的人文特色,人们一般不会有大的异议,但说杭州文化有大气开放的历史特征,则有相当多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杭州文化是“封闭、安逸、小气、虚浮”的,这表现在:保守封闭,对外不开放,排斥外来思想文化和经济竞争,对内不合作,只顾自保,各自为战;贪图安逸、得过且过,享乐有余、进取不足,休闲有余、创业不足,不愿走出去、不敢为人先;小而全、小而精、小家子气,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缺乏安全感、整体感,缺乏联手出大手笔、干大事业的气魄和胸襟;贪图虚荣,作风不踏实,爱刮“杭儿风”,爱做表面文章,“杭儿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等。但正如王国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看待和评价杭州历史人文特色时,要注意防止一种片面的认识,即要防止过于夸大杭州文化中的消极面,贬低杭州的历史人文精神,以为杭州有史以来就只有精致和谐,而精致和谐就是封闭保守、小家子气。应该看到,杭州的发展史是一部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斗史。可以说,没有精致和谐的人文特色,就没有杭州城市的精致,就没有西湖、环境、园林的精美,就没有丝绸、陶瓷等经济物产的精品,也就没有杭州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和城市持续的繁荣;同样,在人文精神中没有大气开放,杭州就不可能从山中小县演变成江干重镇、东南名郡、地上天宫、人间天堂,也不可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都市。”显然,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杭州文化的历史特征,回顾历史去检视杭州文化演变发展的过程是最好的途径。

杭州文化大气开放的特征从其城市格局的奠定中可见一斑。杭州的城市发展,始于2000多年前秦朝设钱唐县。其时,钱唐县还只是一个三面环山、东南临水的山中小县,现在的西湖也还是与钱塘江、古东海相通的浅海湾。两汉时期,由海潮、江流携带泥沙堆积而形成的沙坎将海湾与大海分割开来,形成了西湖的雏形。西湖的形成、“三面云山一面城”城市格局的奠定,使得杭州的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化融合的产物,具有开放、雄浑的底蕴。也正是在秦汉时期,杭州文化吸收融汇了越文化和吴文化。杭州是吴国与越国的交界地,以会稽为中心的越文化与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对杭州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由“天工开物”所赋予的自然条件为杭州大气开放的文化气质得以形成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可能性,那么,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最终使杭州形成了自己开放的地域文化特色。早在三国时期,吴帝孙权就首创了开发台湾的壮举,并揭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正式往来的历史诗篇。可以说,孙权的这种胸怀和视野,为其后杭州实行全面开放发展的策略启明了方向。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为杭州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地域环境,水陆交通的便利和杭州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其他地区的人们来此观赏游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时期,大批印度、西域的佛教僧人来到江南传教,使当时杭州的佛教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杭州“东南佛国”的称号。那些建成于隋唐五代时期而如今仍然是杭州文化象征的众多佛教建筑(如灵隐寺、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等),可以看成是对其时其地佛教文化兴盛的记录。

五代十国时期是杭州大气开放的文化气质得以形成的重要时期。吴越王钱镠定都杭州后,采取了一系列开放的政策。政治上,钱镠反对闭门称帝。唐乾宁二年(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称皇帝,钱镠劝他:“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钱镠一

生坚守这一原则,并在临终前嘱咐继承人要“善事中国(指北方朝廷),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种明智的战略,在唐末群雄割据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它为杭州开放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政治基础。经济上,钱缪十分重视对外开放。为开拓海上通道,梁贞明四年(918年),钱缪组织一批石工凿平钱塘江航道上的巨大暗礁“罗刹石”,拓宽航道,使海运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吴越国与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海外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使杭州的经济和文化在此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出现“钱塘富庶,胜于东南”的兴旺景象。其时吴越境内富庶安定的生活对战祸连年的北方地区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众多的北方居民在这一时期迁居南方,形成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南北文化的大融合。而钱缪对来自北方的各种英才的提拔重用,则使杭州文化更好地融汇了北方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吴越时期这种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吴越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杭州成为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另一方面,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杭州大气开放观念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吴越起,杭州对全国所形成的兼收并蓄的开放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为杭州在宋元时期开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南宋时,杭州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点。由于宋室南渡,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致使杭州人口急剧增加。至南宋后期,城市人口已逾百万,成为真正的移民城市。在这些移民中,主要包含4类人:一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二是如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军事将领;三是流寓临安的文人、名士,如赵鼎、辛弃疾、李清照、李唐等,所谓“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四是大小商贾、手工艺者和各类伎艺人。这些人不仅给杭州带来了皇家文化,产生了皇家文化与杭州本地市民文化的大融合,还给杭州的市井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众多民间百戏如说话、民歌、说唱、傀儡戏、皮影戏、民间舞蹈、杂剧、杂技、踢弄、口技等,在这一时期纷纷落户杭州,使当时杭州的民间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至元代,杭州已经不仅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大都会,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是其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安全便捷、范围广远的交通,是一个地方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必要条件。在元代,无论是国内各地之间还是与国外的交通都相当发达。“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王礼《义冢记》,《麟原文集》前集卷六)是对当时国内外交通安全便捷的生动写照。正是依凭这种安全便捷的交通,元帝国得以与当时东西方的其他国家进行自由、频繁的交往接触。如在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上,西行东来的中外旅行家为数不少,而其中尤以元代居多。从耶律楚材、丘处机、常德、列班、扫马的西游,到卢布鲁克、普兰诺·卡尔平尼、安德烈·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的东游;从赵良弼、宁一山等的东访日本,到邵元、雪村永梅等的来华求法,都证明了元代中外交流之频繁。在这些游历家的行程中,杭州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且湖山秀美,经济繁荣,成为他们出入中华的必经之地。交通的通畅加上元代统治者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大批西域各族人民纷纷东来,移居中原,而杭州则成为他们的一大聚居点,甚至一度形成了亚欧非各族杂居的局面。据明杭人田汝成云:“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多号色目种。”众多的外来人员在此地游历、生活、定居,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据史料记载,在当时来杭的西域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取汉名,习汉字,甚至还通过科考在杭为官,时云“白拧乌纱碧眼深”。而其时的杭州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身受其他各族文化的影响。仿高丽式样的时尚之靴、从东南亚进口的胡椒、西域生产的瓜果美食等,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杭州的寻常百姓家。在此时期,杭州文化不仅与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文化相交融,而且还与伊斯兰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罗马天主教文化相交汇。在南宋都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代杭

州,已经成为东方文化迎接西方文化的一大窗口。世界几大文明在此时此地的交流与碰撞,为日后杭州文化或者说杭州本身顺利进入全球化时代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后,特别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杭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各种中外文化艺术形式纷纷在杭州落户成长。如清末民初,一代宗师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授绘画、音乐,开西洋艺术传入中国之先河。其时杭州率先出现了学堂乐歌,并开始有了近代音乐教育。民国17年(1928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院校在西湖孤山创办,首任校长林风眠。该学院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在中国美术界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家如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等都曾在此执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21年中,该校培养了学生1000余人。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所专门美术院校,国立艺专为世界优秀绘画艺术逐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大气开放在杭州文化中自古有之。虽然随着生活的安定,有一些杭州人身上渐渐滋生了“小富则满,小进则安”这类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从对杭州历史传统文化的研究来看,在杭州人身上还有着奋发进取、勇于开拓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性格特征,只不过在某一时间段,由于特定环境的影响,导致了这些因素受到暂时压抑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大气开放的优秀传统将会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培育,对于以创业为重点的杭州新人文精神的弘扬也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肯定大气开放是杭州文化的历史特征,肯定杭州文化是在开放和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但也必须指出,杭州文化的“开放”所体现的正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是立足于杭州自身基本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创造的文明成果,故而,它是传承坚守与吸纳创新的辩证统一。也正因此,尽管在历史上,杭州文化一直不间断地与其他文化相接触相融合,但杭州文化核心的价值理念即对“精致和谐”生活的追求却从来没有间断。在开放吸取的过程中,杭州文化从来没有丧失过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本位性,无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杭州人都既能以不涓细流的姿态胸怀吸收采纳各种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又能坚持自己核心的价值理念与目标追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由于对核心价值一以贯之的坚守,杭州文化才有自己的根本,杭州文化才真正成其为“杭州的”文化;由于始终保持着理性开放的姿态,杭州文化才不致故步自封,才能一直保有革故创新、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

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必须切实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打破长期以来束缚文化发展活力的体制性障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实施建设文化名城战略以后,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城市,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杭州市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一系列成功的经验。自2003年开始,杭州市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为契机,在全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演艺等领域,扩大改革范围,拓展改革内容,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取得显著的成果。这就为杭州市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建设文化名城提供了新的引擎。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徘徊尝试阶段(1986年—1992年)

文化体制并非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制度的各方面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杭州市的文化事业由国家统包统办,文化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文化单位普遍缺乏生机与活力。在计划体制下,杭州的文化生产力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文化部门难以通过投入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的最有效(机会成本最低)组合,生产出最优的文化产品组合,更未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以及国民经济的利润增长点。计划经济体制下既难以很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也难以很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经济性功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动必然会对文化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并非是这几年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与改革开放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几乎同步。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杭州的文化事业也取得较大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文化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当时杭州的文化体制,在总体布局上,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层层建立专业文艺团体,机构重复设置,直接导致大量的人财物浪费;在所有制结构上,施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全部文艺团体都由政府财政包办;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演不演、演多少、演得好与坏(或作品水平的高与低)与收入没有联系;在人事制度上,缺乏正常的人员流动和淘汰机制,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行政化,机关化,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很难发挥。这种旧的文化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并严重地束缚了杭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1986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杭州市文化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对文化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性的改革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借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杭州市对市属的6个专业剧团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图解决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1986年,为了解决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文化单位出现的经济困境,杭州市在杭州杂技团一队、二队等文艺单位进行文化与经济横向联系的改革尝试,出现了像金鱼魔术团、青春宝飞车走壁队这样一些后来蜚声国内外的演出团体。在这一阶段,杭州市已经开始尝试以文助文、多业助文、以副补文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式。这些改革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培育,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而且也为文化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增加了文艺单位自身的经济收入。1986年,市属专业剧团的营业收入达100余万元,创汇达13.25万美元。这一阶段中的一些改革尝试在当时甚至领先于全国,比如杭州市文化与经济横向联系的改革尝试就为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提出的在全国文艺团体中实行“双轨制”改革提供了成功经验。

在这一阶段,市属文艺单位在分配制度上也进行改革,初步打破原先“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经济分配制,试行了在保证所有员工基本收入不减的情况下,按照“多劳多得、按劳计酬”原则进行分配的制度,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同时,在人事制度上,也开始试行“德才兼备者上,德才平庸者下”的机制。

在这一阶段,杭州的文化市场初步孕育。文化市场的孕育带来管理的问题。1988年,为了整顿文化市场,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与此相应,杭州市

也于1990年起草出台《杭州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草案)》。这既标志着“文化市场”的地位在杭州得到正式的确证,也标志着杭州文化市场管理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说有了一定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犹疑的、徘徊的,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相比,也只是局部的、尝试性的。文化管理部门大包大揽的文化管理模式并未在根本上发生变化,文化队伍臃肿、国家包袱太重的状况依然存在。文化投资渠道不够顺畅,以政府投入为主、广泛吸引社会资金的良性投入机制还未真正形成。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93年—1995年)

文化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3年至1995年,杭州市文化部门积极探索转变文化主管部门职能,调整布局结构,推进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的转轨;积极推进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重点的文艺体制改革,建立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和艺术创作生产规律又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机制;努力增强文化事业自身发展的活力机制,拓展多种经营渠道。

1993年,市文化局制订《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杭州市属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试行意见》,随后根据“因团制宜、分团决策、总体布局、分类指导”的原则,市属6个文艺团体进行了改革探索。在这一轮改革中,杭州曲艺团在运行机制、人事制度以及艺术样式等方面实施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剧团自己创作演出的《爆炸》一剧在全国15个省(市)的412个城市中连演了2070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文化报》在头版发表了《杭州曲艺团改革见效益》的专文,《光明日报》也刊文盛赞杭州曲艺团的演出是“创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迹”。此后,全国各省(市)的10余家艺术表演团体改编、移植演出了这一剧目。1994年,杭州市通过对市属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形成“三三制”的总体格局,即“杭越”“杭歌”“杭杂”3个团作为杭州相对的重点团,由地方财政给予经济扶持;“杭话”“杭曲”“杭滑”3个团由文化部门依法管理,自收自支。1995年,杭州市重点加大文艺团体改革力度,促进内部运行机制的转换,搞好搞活文化企业,努力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是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人们对文化体制改革究竟应该从何处着手、往哪里去都还不是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杭州市文化部门的一些改革尝试,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相对于杭州市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改革只是局部的,相对于杭州经济体制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从文化领域看,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许多文化企业直接由文化主管部门兴办,往往用事业单位甚至行政机关的方式来管理,文化企业缺乏人事、分配的自主权;从宏观管理上看,存在着省、市、县(市、区)多级管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工商、公安等多头管理的现象,政出多门,标准不一。政府既管文化又办文化,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被打破。

(三)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阶段(1996年—1999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杭州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文化的作用力已越来越突出。在90年代中期,经过全面的自我诊断后,杭州市委、市政府认识到,经济和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两翼,在提升杭州城市的综合实力中越来越显示出它们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杭

州已经初步形成与城市性质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氛围。但就杭州文化的整体情况看,存在着3个较为突出的矛盾:文化事业的现状与城市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欠债太多;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省座城市、中心城市的性质地位不相适应,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存在某些不协调现象;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现有文化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多高质量精神产品和多功能、多样化文化生活的要求。因此,进一步释放文化发展的活力,发挥文化建设在提升杭州城市综合实力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市委、市政府于1995年召开杭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于1996年1月出台《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这一文件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杭州文化建设的自我觉醒,而且标志着杭州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被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中,杭州市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做了比较全面的定位,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文化实体,逐步推进文化事业产业化,建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形成多层次、多门类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文化网络”。同时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以国家办为主导、以社会办为基础”的文化体系。

《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中,杭州市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许多提法都领先于全国其他一些城市。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市提出“文化主管部门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行业管理,实施规划、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的职能“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和双向选择,逐步形成能调动文艺人才积极性、使文艺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筹资办文化,进一步调动社会各界支持和赞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广开财源,拓宽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路子,办好各种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逐步把文化艺术团体推向市场,让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增强文化艺术团体的生存、竞争和发展能力”等提法。这些提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杭州作为全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城市对文化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自觉。

1999年8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在重申《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有关提法的基础上,也对文化体制改革做出了一些新的表述。如“各级文化管理部门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行业管理,履行规划、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的职能。”与前一个文件相比,关于文化管理部门的这一职能定位显然更加准确,它已经具备了后来杭州市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定位的雏形。又如“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逐步把有条件的文化团体和单位推向市场,增强文化团体和单位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提法与前一个文件“逐步把文化艺术团体推向市场”的笼统提法相比,虽然仅仅增加了“有条件的”这几个字,但其中蕴含的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它标志着杭州市对文化部门可以推向或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边界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经营机制上,市文化部门对市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在调整产品结构、拓展市场、加强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艰苦地探索,对市文化企业如何走向市场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实践。如市电影公司在大力加强对国产优秀影片宣传、推销的基础上,还深入农村对农村电影市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7年,杭州市的电影放映收入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列第一位。市文物公司盘活库存,举办各种展销活动,宣讲各种历

史知识,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也搞活了经济。西湖戏具厂自力更生研发百合花童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后,开始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仅1996年,市文化系统直属企业全年完成产值6568万元,实现利润932万元。1999年,杭州文化中心与杭州演出公司进行重组、合并。西泠印社出版社坚持“结构管理、量化管理、奖惩管理”的办法,全年共出版新书126种(含重版书),在全省14个出版社中名列前茅,发行金额达1327万元,上升幅度列全省第二位,逐步走出了困境。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加强主业营销策划,全年斥资100余万元,成立了银都娱乐分公司。这些文化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为文化事业单位如何走向市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人事与分配制度上,市文化部门在杭州市杂技总团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在其内部机构设置、定岗定责、择优录用以及绩效挂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试验,最终取得较好成效。1998年,市文化部门在市文化系统中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及有关情况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文化系统的员工要求对人事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这表明事业单位员工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99年,《杭州市文化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市文物公司、文化中心、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相继制定并实施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签订全员聘用合同。杭州少儿图书馆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

(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阶段(2000年—2002年)

在世纪之交,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新阶段的同时,浙江社会发展也开始进入各种矛盾开始显现的敏感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省委、省政府进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进行全面自我诊断的重要历史时期。顺应浙江新一轮发展的要求,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认识经济与文化日趋融合形势下文化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建设文化大省,正是总结历史经验和自我诊断以后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也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举措,省委、省政府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2000年,《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出台,标志着省委、省政府对于文化建设和相关文化体制改革问题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定位,以及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开始逐渐从过去的局部探索向全面推进转变。

在实施文化大省建设战略的背景下,杭州对新世纪文化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认识。2001年3月,在市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市委书记王国平发表了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为题的讲话,从“三个代表”的要求、杭州城市的性质、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经济文化日益融合的发展趋势等角度,全面地阐述了新世纪文化的地位。从这种认识出发,王国平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指出“发展文化必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把文艺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认真研究”。7月,市委八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文化体制改革,提出要“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发展文化产业为突破口,以提高市民素质为基础,大力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大众特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会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杭州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和《杭州市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以此为标志,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在杭州市启动,以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以改革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开始从过去的局部探索向全面推进转变。

与1996年出台的《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相比,2001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杭州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措施做了更全面也更准确的阐述,不仅提出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并建立“科学管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

生产经营机制”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而且十分具体地对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进行了定位,即“统筹规划、制定政策、把握方向、组织协调、检查监督”。《意见》提出,要对不同的文化单位实行不同的改革措施,“对博物馆等公益性机构和少数重点国办艺术院团,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继续保留事业单位的性质,财政予以重点支持,并鼓励社会捐赠。对营业性文化事业单位,都应通过企业化改造逐步走向市场,依法经营,自负盈亏”“对营业性国有资产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采取租赁、承包等方式,也可通过股份制改造或出售实现资产重组,使文化企业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人事制度上,提出“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职工全员聘任、职称评聘分离”的原则。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对文化体制实施改革:

一是根据不同文化单位自身特点,深化内部改革,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生机和活力。2000年,市文化部门先后两次向社会推出基层文化单位领导职位19个,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同年,结合部分基层单位换届,在5个艺术表演团体内部建立院(团)长责任制,在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对专业技术人员推行职称自主申报、评聘分离及单位自主聘任等办法,允许基层单位实行低职高聘、高职低聘、只评不聘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为文化单位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建立和完善文化企事业单位发展新机制。2000年,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在“适应市场、拓展市场”上不断努力,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杭州越剧院凭借自身实力,依托周边城市的辐射功能,在上海等城市演出《梨花情》《梁祝情梦》获得成功。杭州市滑稽艺术剧院根据市场供需状况,不断拓展范围,常年坚持走街串巷。市属院团全年演出928场。

三是根据2001年制订的《杭州市文化企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按资产非经营性和经营性标准对市属文化部门的22个基层单位进行公益性、经营性划分和界定,并实施了改革。第一类12个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深化内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用人制度改革。第二类10个经营性文化企事业单位,推行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转企改制,实现国有非经营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转换。

四是注重文化市场法制建设,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大管理稽查力度,抓好娱乐场所整治,加强管理部门间的协作,强化管理队伍建设,文化市场管理进一步规范有序。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问题也依然存在。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其时杭州市文化局直属的20家单位中,公益性事业单位有10家(含文艺院团5个),经营性文化企事业单位也有10家。公益性单位普遍缺乏事业发展的动力,经营性单位则经营状况普遍欠佳。杭州文化中心至2002年已连续6年亏损,杭州电影公司3年(2000年—2002年)累计亏损430万元,杭州演出公司、杭州美术公司已连续2年(2001年—2002年)亏损,杭州文物公司、杭州对外文化交流中心虽未亏损,但业绩每况愈下。显然,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说,以进一步的改革促进进一步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五)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部署阶段(2003年—2006年)

杭州是一个文化市场发达的城市,改革开放以后,历届党委和政府逐步形成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传统,民间具有充足的内源性发展力量,因而,党委和政府有更成熟的条件和可能性从直接服务的提供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管文化”。这些事实,使文化体制改革在杭州全面铺开,成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做了更加全面的阐述。2003年上半年,浙江和广东一起,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标志着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更加凸显。自试点省确立以来,浙江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各级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并成立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从思想、组织等方面给予保证。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改革逐渐进入实质性阶段。自此以后,改革工作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这两大块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杭州作为省会城市被浙江省指定为改革的试点城市,以此为标志,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部署和落实阶段。2003年10月,《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出台,共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微观运行体制,发展民营文化企业,工作重点,加强组织领导6个部分。《方案》提出了杭州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总体目标,即积极探索建立新形势下保证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建立体现宣传文化特点、适应法制建设总要求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传播精神文化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形成吸收国外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抵制腐朽文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格局。《方案》的制定和出台,意味着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全面启动。

2003年,杭州市文化系统出台《杭州市文化局局属文化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关于2003年度市属院团演出收入和主要演员收入两个“翻番”的实施细则》《杭州市市属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总体方案》《杭州杂技总团体制改革方案》等文化体制改革方案。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杭州市文化系统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建立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一般职工双向选择的竞争机制,形成了岗位结构工资制、工资部分搞活或预算外收入分配搞活三种模式的分配制度。

经营性事业单位改革的正面效应逐步显现,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多元投入文化的局面逐步形成。在杭州演出公司和杭州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改制的基础上,2003年5月,由市文化局、杭州广电集团和杭报集团共同斥资600万元新组建的股份制演出公司正式成立。同年,通过对改制后电影公司39%的社会法人股的公开竞标,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最终以1600万元的价格竞买成功,比评估价(780万元)高出1倍多。民营资本的成功引进,使电影公司股份化改造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文化产业的发展领域进一步拓宽。经市委、市政府批复同意,2003年,杭州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为实现国有资产价值形态的保值增值,以市场化手段内引外联,盘活国有资产,加快改革步伐,壮大文化产业打下了基础;按照与旅游结合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运用杭州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积极与有关部门合作,培育新型文化旅游项目;创演可供长期演出的“西湖歌舞”大型原创文艺晚会作为杭州旅游文化的标志性项目,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雅俗共赏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为杭州旅游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市场化运作开启新的一页;改造西湖电影院,投资建设新华时尚影城,初步形成与省电影公司庆春大世界、翠苑大世界竞争的格局。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杭州市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不仅打破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坚冰”,而且初步实现了由改革向改革与发展并举的重要过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06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

精神,进一步以深化改革促进杭州市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加快文化名城建设,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路的叙述上显得更加严密、深刻和全面。《意见》指出,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推进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以此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加快建设文化名城做出新的贡献”,为此,要求在积极稳妥推进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的同时,全面推进微观运行主体的改革。

具体而言,宏观上,要求“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理顺党委部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企事业主体之间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文化建设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配套政策,推进依法行政。组织编制和实施文化建设‘四个一批’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完善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每年发布统计数据。编制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开展各类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发挥文联、社科联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建立完善符合改革新形势的协会、学会运作机制。加强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完善文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职能,制定《杭州市属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完善市属国有文化单位授权经营管理制度。开展国有文化单位清产核资工作。完善适合宣传文化集团的业绩考核制度。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推进投入方式改革”。微观上,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探索实行人事代理制、签约制、劳动合同制等多种用人方式。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规范转企改制。凡按规定需要转企的文化事业单位,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逐步转制为企业。同时,对不同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新人’用‘新办法’,对‘老人’则用‘老办法’,要切实做好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的政策衔接和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要进一步优化新闻媒体组织结构,转变经营方式。在进一步规范市属媒体集团与集团有限公司关系的基础上,健全党委领导和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推进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部分,以及影视剧等节目制作与销售部门,可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扎实推进艺术院团和文体场馆改革。进一步完善全市文艺院团整体布局,建立符合都市文化特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院团格局。对独具地方特色的剧种,加大抢救、研究、传承的扶持力度。对市属文艺院团实行‘事生企’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可通过组建演艺公司进行项目运作,推进院团市场化;也可组建股份制企业,建立企业经营体制;也可通过改革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大力推进演艺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拓展院团改革后的生存发展能力。盘活资源,改善市属文艺院团馆舍条件。以盘活国有资产、提高服务能力为目的,积极探索企业化管理、合作开发、国办民营、委托管理及转企改制等多种方式,推进国有文体场馆改革。”《关于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出台,为今后杭州市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政策基础。

三、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竞争力

杭州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相伴的。在过去的20年中,杭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大体走过了4个阶段:1986年至1995年,为第一阶段;1996年《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至1999年,为第二阶段;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至 2002 年,是第三阶段;2003 年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杭州作为省会城市被浙江省指定为改革的试点城市至 2005 年,是第四阶段。通过这 4 个阶段,杭州市文化产业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式的萌芽到“映日荷花别样红”般蓬勃发展的过程。

(一) 文化产业的自发发展阶段(1986 年—1995 年)

杭州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以及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成长,市场经济先发优势的形成,文化产业的孕育和发展已经具备了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换,人们的市场意识逐渐觉醒,开始逐渐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具有文化属性而且也具有商品属性。在实践中,文化领域已经开始显现出其产业性质的一面。

1986 年至 1995 年,杭州的文化工作者从实际出发,开始探索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框架下文化发展的新方式。大力发展文化“三产”,实现“以文助文”“多业助文”,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就体现了这一阶段杭州市文化部门对文化发展新方式的探索。1986 年,杭州市属 6 个艺术表演团体开始施行“承包责任制”,或与企事业挂钩,结成互利互惠的文化经济联合体,或自开“以副补文”渠道。杭州杂技团一队、二队和金鱼魔术团、青春宝飞车走壁队与企业挂钩,建立文化经济联合体;1987 年,杭州话剧团与省财政厅、浙江电视台联合拍摄电视剧,杭州歌舞团与国旅浙江分社合作在杭州饭店定点演出,杭州越剧团与杭州电视台联合承办“越剧新姐妹”的评选活动等。对文化发展新方式的这些探索,为后来杭州先于全国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尝试性的实践也培育了杭州文艺工作者的市场意识,并初步培养了一批文化经营人才。同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活动。以此为契机,杭州文化市场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1992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提出以产业化为方向,加快发展包括文化生产和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历史表明,文化产业是随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文化市场比较成熟的社会里,文化生产与消费才可能成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资源才可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得到开发和利用,文化价值才可能被越来越多地转换成经济价值,文化也才可能与经济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92 年以后,随着杭州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文化与经济进一步趋于融合,舞厅、卡拉 OK 厅、录像放映厅、电子游戏厅以及音像制品市场、演出市场等得到了迅速发展。1989 年,杭州城区经审批陆续开放的舞厅有 28 家,1996 年发展到 110 家;1988 年,杭州市尚无一家卡拉 OK 厅,但到 1996 年,杭州市有卡拉 OK 厅 102 家。录像放映厅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现在杭城,至 1990 年,杭州市有录像放映厅 106 家。

杭州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发育和繁荣程度也领先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正因如此,杭州市的文化管理机构也必然会先于其他一些城市遇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从事文化管理的问题。为此,杭州市依据国家和浙江省的各项法规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制订一系列整顿规范文化市场的规章制度,并对舞厅、卡拉 OK 厅、电子游戏厅、字画市场、录像放映厅等进行必要的专项整顿,取得良好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一时期,杭州文化市场取得初步繁荣,文化产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1995年以前,杭州市颁发的文件中并未明确地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而是无一例外地把所有文化发展统统纳入“文化事业”中予以表述,文化管理部门更未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采取分类指导原则,文化产业还未完全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文化领域“母胎”中脱离出来。在这一阶段,杭州文化产业发展可以说基本上仍然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并没有获得正式的承认和足够的重视。

(二) 文化产业从自发走向自觉阶段(1996年—1999年)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文化体制改革逐渐深入,“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实践逐渐显示出局限性。这些政策和实践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市场经济冲击对旧体制弊端的一种局部修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不能充分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为了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活力,杭州市委、市政府于1995年召开杭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在1996年1月制定《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在这一文件中,杭州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建立繁荣、健康的文化市场”战略目标。在时间上,这不仅远远早于全国,而且远远早于北京市^①。它既标志着“文化产业”概念在杭州正式被接受,也标志着杭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始从自发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

在《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中,杭州市明确提出“要制定有利于提高文化生产力水平,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兴办文化产业积极性的政策”,制定“一整套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管理的政策”,提出要在2010年左右“形成一个完善的文化产业运行、管理机制”。根据国际著名旅游城市的特点,文件对杭州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初步定位,即“从杭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发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适应旅游、休闲娱乐消费的需要,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景点的开发利用结合起来”。适应于20世纪以来高科技对文化发展的渗透,尤其是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等技术在文化领域广泛应用的趋势,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依靠科技力量发展文化产业,将多媒体等高科技技术充分应用于影视、出版、音像制作、美术设计和文化娱乐等各个领域,使高科技产品在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最终建立起一个“以电影、电视、广播、出版、音像制作、美术设计以及文化娱乐为支柱、技术先进的现代文化产业”。

1999年,为贯彻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杭州提出的“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要求,杭州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杭州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的目标,即“建立以教育培训、传媒广告、文化旅游、美术工艺、文化娱乐为支柱的现代文化产业,形成健康繁荣、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

在这一阶段,杭州文化产业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1999年,全市“大文化”口径的文化产业单位创造增加值58.46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8%;“中文化”口径的文化产业单位创造增加值52.2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2%;“小文化”口径的文化产业单位创造增加值28.58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3%。当然,这一时期杭州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部分国内发达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比如,1998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创造增加值87.9亿元(不包括教育),占全市

^① 1996年12月,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地使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

生产总值的4.4%,而1999年杭州市文化产业(不包括教育)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7%;1998年上海市的“大文化”产业创造增加值158.97亿元,而1999年杭州市的“大文化”产业增加值是58.46亿元。此外,这一阶段杭州的文化产业发展也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待改进的问题,如文化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仍然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的优势和特色仍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存在着人才上的瓶颈制约,发展文化产业的法制还不够健全等。

(三)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2002年)

这一阶段是杭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它标志着文化产业的合法地位在中国得到确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9年,浙江省委十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这意味着文化产业概念在浙江被正式接受,标志着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200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文化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12月,中共浙江省委常委通过《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纲要》突破仅仅单一地看到文化产品意识形态属性的传统思维模式,既认识到文化产品所负载的精神属性,也认识到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商品属性,提出“要正确处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对不同的文化类型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必须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十分重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努力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观已经开始形成,文化产业作为增量拓展了浙江区域文化建设的内涵。

在这一背景下,杭州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已经具备内外的条件。在世纪之交,杭州市场环境日趋完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2001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56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突破3000美元;市区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达到10896元,比上年增长11.9%;市区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至40%以下,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市区居民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为39%。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如产业结构会出现重大的调整,第三产业将快速增长;消费结构会发生转变,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会快速增加,消费将出现“脱物化”等趋势。这些变化在世纪之交的杭州渐露端倪。是年,杭州市区居民人均用于教育娱乐、交通通讯的支出分别比上年增长18.7%和20.1%,人均旅游消费比上年增长22%。这表明,杭州市区居民消费已从基本生活需要向注重自身发展和精神享受的方向发展。居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重大的导向作用,推动着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杭州市三产结构从1997年的8.8:52.3:38.9调整为2001年的7.1:50.6:42.3,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3.4个百分点。与1996年相比,2001年杭州市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企业法人人数增长4.5倍,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企业法人人数增长2.6倍,增长速度均大大超过制造业(增长5.9%),电力、煤气及水(增长4.02%),建筑业(增长82.4%),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长65.5%),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增长49.2%)。这标志着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意味着杭州的文化消费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1年7月,杭州市委召开以“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名城”为主题的市委八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杭州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关于加快市属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若干意见》3个重要的政策文件。会议明确“十五”期间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即全市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力争保持年平均增长15%以上;全市文化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由4.8%提高到6%;通过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杭州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把杭州建设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文化产业的重要基地。8月,根据《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并结合实际,制定《杭州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市第一个关于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它标志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市委、市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突出。

一是市委、市政府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意见、加快市属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意见、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文化产业)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杭州市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文化经营企业,明确规定该类文化企业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人才引进、税费减免、从业人员职称评定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为鼓励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改制,规定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原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变,财政拨款3年内不减。2002年,市政府把文化产业项目列入新一轮对外招商引资项目之中,并要求市统计局把文化产业列入年度统计调查计划之中,定期向社会提供统计数据,为企业及政府决策服务。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为促进杭州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杭州市主办或支持社会力量主办了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第五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第五届亚洲艺术节等一系列大型艺术节庆活动和会展活动。这些大型节庆会展活动遵循政府支持、社会兴办、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发展的原则,成为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按照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发展、企业化管理的要求,杭州市组建一些文化产业集团。2001年11月,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挂牌成立。该集团拥有《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每日商报》、《E时代周报》、《休闲》杂志、《风景名胜》杂志、杭州网及广告中心、发行中心、印务中心、物业公司,总资产4.42亿元,全年营业总收入3.12亿元。其中,《都市快报》创办3年即取得在全省发行60万份的成绩,2002年广告收入达1.6亿元,独树一帜的版面和简洁明快的报道风格为省、市其他报刊所效仿,在杭州市区日零售量达15万份,不仅成为杭州市区零售量最大的报纸,主导着杭州自费类报纸市场,也推动杭州书报零售业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9月,杭州广电集团成立。该集团有3个广播频率、4个电视频道、1个贯通全市的SDH数字双向传输网、1个IP宽带城域网、1份广播电视周报,总资产8亿元,全年产业创收突破3亿元。

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这一阶段杭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快速上升。2000年1月至6月,全市文化产业单位实现增加值30.53亿元,占全市上半年GDP的4.9%,比上年增长12.3%,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01年,全市文化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5.3%,三产结构由2000年的7.5:51.32:41.2调整为7.1:50.6:42.3,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0.6个百分点是由文化产业所创造的。2002年1月至6月,杭州市“大文化”口径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上半年GDP的比重为6.6%,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拉动全市GDP增长1.4个百

分点。

杭州文化旅游业也得到长足发展。2000年,为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杭州市提出“旅游西进”战略,并作为“十五”计划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在市区西部区域实施以旅游为龙头的综合开发,使之成为杭州市旅游业的新增长点。2001年,杭州召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市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会后印发《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旅游西进”战略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杭州市旅游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旅游西进”工作全面启动。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确定从2001年起每年筹集和安排不少于4000万元的旅游发展资金。2001年至2002年,在宋城、杭州乐园、未来世界等老景区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相继建成开放清河坊与信义坊仿古历史街区、雷峰塔、万松书院、杭州野生动物园、中国古代造纸文化村、桐庐“女儿村”民俗文化园,举办“西湖之春”艺术节、“杭州之夏”旅游节、杭州金秋旅游节和中国国际(萧山)观潮节、西湖国际烟花大会、“娃哈哈”西湖狂欢节等重大旅游节庆活动。2001年,全市接待海外旅游者81.94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7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8%和27.2%;接待国内旅游者251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18.8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9%和15.2%。

(四) 以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发展活力阶段(2003年—2005年)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然要求对妨碍文化经济力进一步释放的文化体制进行改革。2003年,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杭州作为省会城市被浙江省指定为改革的试点城市。以此为契机,杭州文化产业进入以文化体制改革释放发展活力、依靠制度创新推动发展的新阶段。

2003年10月,《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出台,提出关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评价体系,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大力扶持高附加值的文化企业、文化项目等一系列指导性意见。《方案》提出,要按照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要求,抓紧制定《杭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纲要》,围绕与“旅游西进”战略相结合的文化旅游产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现代传媒业、与会展业相结合的艺术品产业、与大众文化体育健康消费相结合的文体娱乐产业、与提高市民科学文化素质相结合的教育培训产业等杭州文化产业优先发展门类,进一步明确影视、报刊、出版、发行、印刷、数字电视、文化会展、演艺等发展重点,明确政府重点投资、重点扶持、重点协调的项目,明确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保障措施以及过程管理。《方案》明确提出要构建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5+8”框架,即重点发展杭报集团、杭州广电集团、杭州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出版总社、西泠印社五大集团和《都市快报》、杭州网通、杭州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杭州大剧院、杭州文化商城、杭州网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宋城集团8家重点单位。《方案》还提出要建设浙江文化产业园区(地处萧山)、亚洲包装中心、休闲文化产业园区和体育健身制造园区等文化产业园区。

2004年5月,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在市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包括财政税收扶持、投资和融资、土地处置、工商登记管理、价格等在内的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

2005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杭州大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杭州市政府采购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试行办法》等政策文件,召开大文化产业发展会议,全面部署大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关于进一步推进杭州大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杭州市未来五年的文化产业发展进行规划,提出到2010年杭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产业政策趋于完善,产业结构基本合理,产品的艺术、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明显提高,产业发展速度高于全市GDP增幅,使大文化产业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之一,把杭州建成为浙江省大文化产业的中心城市,‘长三角’地区大文化产业的次中心城市”。

《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就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新的部署。《规划》提出在未来5年内,杭州市将重点发展“数字娱乐和创意产业、现代传媒业、旅游文化业、艺术品业、文艺演出和娱乐业、体育产业、教育培训业、科技服务业和健康保健业等九大门类”。其中,要“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业、现代传媒业和数字娱乐业3个门类,力争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占优势地位”。《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杭州数字娱乐产业起步早、创业能力强、具有较强产业化能力的优势,高度重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结合“动漫之都”的建设目标,在3年至5年内培育和完善杭州市数字娱乐产业链,建好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形成产业聚集,构建好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及研发、孵化中心。争取每年推出3部至5部原创电视(影)动画剧,30款以上手机游戏,不少于20部漫画书籍,每年举办1次至2次大型动漫展示活动。文化旅游业要“打造杭州标志性的旅游文化项目和多元化、多样性的旅游文化吸引物。充分利用‘三江两湖三址一山一河一潮’等具有杭州特色和优势的旅游资源,对杭州历史文化内容进行组合包装,调整旅游开发思路,重整旅游线路。充分开发休闲度假产品、传统观光产品、会展商务产品、时尚旅游产品等。着力整合包装西溪湿地、天目山等十大旅游休闲基地。培育我市旅游休闲品牌产品,提升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地位”。现代传媒业要把推动传媒艺术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交互式媒体;推动有线电视网、计算机网、电信网三网融合;推进社区信息化和数字家庭建设;大力发展手机报纸、车载电视等新型传媒。同时,杭州将大力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文化,充分发挥杭州市民营经济的优势,“支持社会力量以股份制、合伙制和独资等多种形式,参与或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书报刊印刷、发行、会展、广告、体育、中介服务和教育、卫生事业,培育一批重点文化企业和‘高、尖、特、新’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杭州文化产业发展开始步入制度化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文化产业已开始逐步趋于成熟,并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1. 产业发展总体上呈逐渐加快趋势,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

2003年,杭州市大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63.5亿元,比2002年增长18%,占全市生产总值的7.8%。2004年,文化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上半年完成增加值91.49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8%。杭州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成为杭州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杭州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至2005年底,经杭州市两级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许可(含备案)的文化经营单位共计9459家,其中,印刷复制单位3496家,书报刊零售2431家,网吧950家,音像制品零售单位799家,娱乐场所782家,演出剧场94家,表演团体67家,录像放映场所25家,游戏机场所23家,电影放映单位124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视频点播、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500家,个体演出人员及个体演出经纪人168名。另外,分别有书刊发行业、娱乐业、演出业等两级文化市场行业协会13个。

2. 国有文化产业企业实力显著增强

在这一阶段,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和杭州广电集团等进一步释放出发展的活力。2003年,杭报

集团总资产超过6亿元,销售总收入4.75亿元,比上年增长25%;广告营业收入3.7亿元,到账收入3.39亿元,增长28%;实现利润5726万元,增长14%。集团实施从城市媒体向区域媒体、从单一媒体向多元媒体转变的战略,使其开始向区域化、多元化发展。其中,《都市快报》在台州、宁波、上海派驻记者;完善金华、余姚等代印点,新增宁波、嘉兴、乐清、余杭分印点;并购《萧山日报》《富阳日报》,拓展集团的区、县(市)产业发展空间;出资2600余万元,分别投资杭州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和组建杭州网有限责任公司,从纸介质媒体走向集报纸、期刊、电视、网络为一体的多媒体集团。2005年,杭报集团实现集团总收入7.7亿元,广告收入5.35亿元。《都市快报》跻身世界报业发行百强,并在第二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排名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综合竞争力第8名,在浙江省同类报纸中排名首位。

2003年,杭州广电集团全年创收3.8亿元,其中,广告创收超过2.6亿元,比上年增长23.6%。2004年,集团全年广告创收达到3.64亿元,比上年增长37.2%。2005年,集团总收入为8亿元,广告收入突破4亿元。

2003年,杭州市开始组建包括6个国有艺术院团(杭州歌舞团、杭州越剧院、杭州杂技总团、杭州话剧团、杭州滑稽剧院、西泠书画院)、4个经营性企事业单位(杭州红星文化大厦、杭州电影有限公司、杭州市文物公司、杭州文化中心)以及杭州大剧院(在建)在内的杭州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8亿元。2005年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按照“政事分离,管办分离”的原则,将杭州市广播电视局与杭州广播电视集团分离,合并杭州广播电视集团和杭州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组建成立集广播电视、文化演艺、有线网络和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在这一时期,作为杭州文化的“金名片”,西泠印社也通过分步改制组建了产权多元化的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2005年,西泠印社实现销售收入4260.5万元,实现利润1636.5万元,当年国有资产回报率为87%。

3. 民营文化企业不断成长壮大

作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市民营文化企业成长迅速,这得益于民间内源力量和政府政策的有效引导。中共十六大以后,尤其是浙江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杭州市被浙江省确定为综合试点市后,杭州市利用民营资本充裕的优势,采取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和优化发展等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的措施,取得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杭州民营文化产业发展有许多突出的亮点,民营文化产业在杭州的文化娱乐业、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批发零售业、文化旅游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涌现出宋城集团、开元旅业集团等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宋城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旅游投资集团、国际游乐园景点协会首席会员,以投资主题公园、大型休闲社区、生态旅游、农业观光、度假酒店等旅游休闲业和景观房产为主,同时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涵盖了旅游休闲“吃住行游购娱”全部要素,集团资产规模超过40亿元。至2005年,宋城集团的开发项目已经从单一主题公园向多元化大型休闲社区发展,从单一区域向跨区域整体延伸。杭州的另一大文化旅游品牌“金海岸”则在经营娱乐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化休闲业,开发了如杭州剧院“红磨坊”、东坡大剧院“西湖之夜”大型旅游演艺专场、“金海岸东坡大舞台”等文化休闲项目。华宝斋投资兴建的文化旅游中心“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向游客集中展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晶——造纸术与印刷术,被列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营剧团——黄龙越剧团进驻杭州黄龙洞景区,使“听戏黄龙洞”成为戏曲爱好者和中外游客的时尚。

4. 文化旅游业得到长足发展

杭州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有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是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在实施建设文化名城战略的过程中,杭州大力发展与旅游相关联的文化产业。2003年以后,杭州文化旅游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开发宋城、杭州乐园、未来世界等文化旅游项目基础上,又相继开发世界休闲博览园、千岛湖开元度假村、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等一系列文化旅游项目。2004年,在已有景点的基础上,杭州市重点推出“一街(北山街)二馆(中国茶叶博物馆、苏东坡纪念馆)三园(云栖、仁寿山、龙泓涧)四墓(龚佳育墓、苏小小墓、武松墓、陈夔龙墓)五景点(魏庐、朱家里、玉岑诗社、留余山居、三台阁)”15个文化旅游景点。当年,杭州市旅游业5项主要指标均实现历史性突破,接待入境游客123.41万人次,比历史最好年份增加17.79万人次;创汇5.97亿美元,比历史最好年份增加1.2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3016万人次,比历史最好年份增加240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61.18亿元,比上年净增70亿元;旅游总收入410.77亿元,比历史最好年份增加80余亿元;旅游业增加值156.81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6.3%。2005年,为推进“东方休闲之都”建设,进一步推进杭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杭州市全面启动“十大休闲基地”建设。是年,杭州市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65.07亿元,比上年增长8.9%。

5. 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利用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文化产业,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高新技术含量,促进文化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粗放型向质量型转变,实现文化产业的不断升级,是杭州这一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又一大亮点。

首先,以动漫和游戏为主的数字娱乐业初具规模。2004年底,在省委宣传部、浙江广电集团和市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杭州高新开发区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批准中国美术学院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为加快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布局中的动漫和游戏这两大新兴产业发展,2005年起,高新区财政每年从产业扶持资金中安排不少于2000万元的“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动画产业基地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建设、动漫作品原创以及动画企业发展的财政扶持,落户基地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得到叠加。同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5000万元资金滚动用于动漫产业发展。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吸引中南卡通、盛大边锋等40余家动漫、游戏及相关企业加盟,基地企业全年实际完成动画影视作品14部、900余集。6月,杭州市成功申办中国首届国际动漫节。8月,位于西湖区的杭州数字娱乐产业园被授予“国家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称号,是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块“国”字号数字娱乐示范基地牌子。

其次,实现数字电视跨越式发展。杭州大力推进数字电视发展,积极推动模转数整体平移。2004年,完成市内10万户用户的平移任务,创立全国领先的“杭州模式”。2005年2月,杭州地区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整合工作全面完成,杭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程全网。12月,杭州市区50万户用户数字化整体转换顺利通过国家广电总局专家组验收,杭州被国家广电总局授予“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示范城市”称号,成为全国首批实现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城市。

再次,创意文化产业呈良好发展势头。2002年9月,美国DI设计公司入驻拱墅区杭印路49号。此后,一大批艺术和设计公司纷纷进入,迅速形成租用面积达9300平方米的新型创意企业集聚地——LOFT49创意文化产业基地,入驻企业注册资本2460万元,直接在基地工作的员工达360人。2004年,基地实现产值1.6亿元,人均产值43.6万元,成为继北京、上海等地之后新生的

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此外,在余杭塘路上由原杭州织带厂转变而成的“唐尚 433”创意设计中心也聚集 10 余家杭城知名品牌的建筑设计公司。

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体系相对应,主要着眼于社会效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为全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领域,与整个文化领域可以实行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性文化产业体系共同构成文化建设的完整内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积累、传承、创新文化传统,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 年来,杭州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初步尝试(1986 年—1994 年)

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是现代政府的职责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因循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有和国办文化的文化体制。与全国各地一样,杭州市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曾经全部或几乎全部是以“公共方式”提供的,文化服务职能主要由文化事业单位来实现,不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全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由政府文化部门进行行政管理。几乎所有关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被纳入到计划经济的统一模式之中,即国家生产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文化产品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而主要是根据政治任务、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安排。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计划体制下的杭州文化部门难以通过投入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的最有效(机会成本最低)组合生产出最优的文化产品组合。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当现象也十分突出,如文化投资方向选择不当,在创作、生产适应人们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的不同文化产品之间配置不当等。其直接结果,是导致文化内部结构失调、投资效率过低和文化产品供求脱节等现象,不仅文化产业缺乏生存的空间,而且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也构成“周期性”的压制和损害,人民群众的正当文化需求长期受到压抑。

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悄然开始。在这一宏观背景下,1992 年以前,杭州市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逐渐推进。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进行放开经营、企业兼并、企业集团和租赁制、股份制等试点。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杭州市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加快。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杭州市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投资等项改革逐步深入,商品、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取得进展,各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迅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

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客观必然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非与市场无关的自足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两个必然结果,其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杭州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萌芽和发展,对计划体制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全部或几乎全部以“公共方式”提供的政府“大包大揽”模式产生冲击;其二,是引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杭州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初步重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逐渐发育,原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由于物品价格上涨、人员更新等因素的影响,原有的文化事业财政支出已经难以满

足文化机构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杭州市各文化事业单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尝试。1986年,杭州市属6个艺术表演团体开始施行“承包责任制”,或与企事业挂钩,结成互利互惠的文化经济联合体,或自开“以副补文”渠道。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会议精神,市文化系统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1989年初,市文化局在美术公司、文物商店、群众艺术馆、滑稽剧团4家单位实行和完善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的领导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经济分配、考勤奖罚、劳动纪律以及财产和财务管理等制度。1992年,为贯彻执行中央2号、5号文件,市文化局党委提出加快市文化系统改革开放的10条思路和措施,并确定5个改革项目。1993年,市文化局按照“面向市场抓演出、精益求精抓创作、开拓实干抓经济、深化改革抓管理”的思路,对杭州歌舞团、杭州越剧院、杭州杂技团等进行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杭州市文化系统这些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杭州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自发地进行重构。这种重构显然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展开,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调整,即退出许多需求充分的市场领域,凡是市场可以提供的,就不必再以公共方式提供。1986年至1995年,杭州市文化系统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发展逻辑。在杭州市的这一轮改革过程中,本来可以由市场提供却一直由政府提供的许多文化服务被推向市场。

当然,这一阶段杭州市重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也体现一种“尝试性”的鲜明特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各自承担的职能和发展途径等仍然不甚清晰。比如,在1992年市文化局确定的5个改革项目中,其中一项是“将局机关的临街车库破墙开店,挖掘经济潜力,筹措发展文化事业发展经费”——在经济压力下,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事业单位靠出租房屋、场地举办各种商业性展览等增加收入的做法曾经相当普遍。这种“改革”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影响到文化事业机构为广大公众提供公益性服务职责的正常履行。应当说,在这一阶段,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的边界、公益性文化事业职能等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构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二) 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自发走向自觉(1995年—1999年)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相对而言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和分配结构最终要由消费者决定,消费者的需求才是市场经济的中心。当一个地区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市场的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将不再为物质生产领域所特有,它必然会渗透到文化领域,从而使文化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制约。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制度,是配置文化资源的有效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产品的繁殖具有更广阔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不是万能的,它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也会“失灵”。

杭州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各类文化机构都有很多发展机会。正因如此,杭州市的管理机构先于其他一些城市认识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也先于其他一些城市意识到市场经济在配置文化资源方面的不足,从而在全国较早地意识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实施分类指导原则的必要性。早在1995年颁布的《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中,杭州市委、市政府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要

“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建立繁荣、健康的文化市场”。这一提法,意味着杭州市已经开始将文化产业发展从整个文化发展格局中剥离出来,从而与过去不区分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不仅对于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发展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构建相对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把文化产业从整个文化中剥离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重新定位不能被产业化的文化部门即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功能和发展途径。

从1995年以前文化部门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杭州市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更多地属于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对文化领域造成冲击的一种被动应对,其突出特征就是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文化部门推向市场,在市场化的压力下被动地开展“生产自救”。至于市场可以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在1995年以前杭州文化部门的改革措施中并无清晰的界定。1995年的《杭州文化发展战略和总体布局(1996—2010)》不仅提出要“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建立繁荣、健康的文化市场”,而且提出要“繁荣群众文化”“大力发展社区文化”,尤其是提出要“逐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这就意味着杭州市已经初步地认识到原先由政府统包统揽的文化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来发展,另一部分则必须由政府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它不仅标志着杭州市发展文化产业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而且突出地标志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杭州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点在杭州市此后的相关文件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在1998年的《杭州文化艺术跨世纪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中,杭州市文化局提出应把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群众文化馆(站)、文物保护单位考古所等确定为公益性文化单位,社会效益第一,以服务于公共文化事业,服务于人民群众,相应地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确保其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确保其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费。这表明,杭州市文化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把所有的文化部门都推向市场是不适宜的,政府应当对所有文化单位分类定性,在财政投入、政策指导上区别对待。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增加公共财政投入,以弥补市场的不足。

1999年8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杭州建设成为一个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融合,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优良文化风尚、丰富文化生活、先进文化设施、发达文化产业的文化名城。《意见》列出10项建设文化名城的工作重点,其中8项属于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它们分别是:创建全国一流文明城市,全面提高城乡文明程度;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形成清晰的历史文化序列;创建优美城市环境,增添城市文化魅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出一批现代文化艺术精品;进一步活跃和丰富群众文化,创办富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文化活动;培养引进各类文化名人,发挥名人在创文化名城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的文化设施体系;扩大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成为文化交流重点城市等。

1999年,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关于加快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强调要增加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经常性投入、扶持重点专业艺术团队和艺术创作、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设立杭州文艺发展资金、征足和用好文化事业建设费,尤其是提出各区、县(市)要逐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把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文化馆、影剧院、文化广场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分步予以改造和建设。《意见》对不同于文化产业发展经济政策的杭

州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经济政策已经有相当清晰的阐述,这些政策基本上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政府财政投入”、鼓励“社会捐助”、设立“发展基金”等原则。

1995年至1999年,杭州市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集中体现在以下5点:

一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步伐逐渐加快。相继建成了杭州艺术学校、杭州少儿图书馆、中国印学馆、吴山文化广场,开工建设杭州红星文化大厦等文化设施。各区、县(市)也建成文化馆、图书馆等一批文化活动阵地。

二是文化精品力作不断涌现。自1996年至1999年,全市文学、影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艺术门类的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有20余个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奖项,其中,有13个作品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性大奖。

三是文化考古和博物馆建设成效突出。先后对六和塔、灵隐寺等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整修,一大批古建筑在旧城改造中得到妥善保护;编制新一轮《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公布实施65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层次、有重点的保护;考古工作连续获得重大发现,继南宋太庙遗址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后,又发现南宋皇城遗址内的老虎洞窑址等重要的古迹遗址;博物馆建设成绩斐然,成为全国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四是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基本形成以大型文化活动为龙头,以群众文化活动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活动格局。先后成功举办第四届全国舞蹈比赛、西泠印社95周年社庆、越剧新十姐妹评选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文化活动;节庆等大型文化活动水平不断提高,景区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杭州艺术节、杭州新节目会演以及各类美展、摄影展等在艺术性和参与面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间文化活动和民间民俗文化遍及城乡各地;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活跃。

五是“东海明珠”工程全面推进。建成18个省级“东海明珠”标准集镇。全市各乡镇建设“东海明珠”工程总投资达9500余万元,新建、改建、扩建农村文化活动设施5.40万平方米,农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活跃。

(三) 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阶段(2000年—2002年)

在世纪之交,加快构建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

首先,经过改革开放以后20余年的发展,杭州市经济实力不断壮大。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分别达到1380亿元和142.85亿元。2002年,分别达1780亿元和257.14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推进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公共财政支付能力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其次,在世纪之交,杭州大力推进城市化,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杭州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开放的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实施大都市发展战略。大都市不仅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还应是文明的大都市。杭州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城市越大、城市化越快,越需要推进城市文化建设,让市民形成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如市委书记王国平所说,“整个城市应该是一个有序组合的有机体,一个多样统一的系统,应该更突出精神的内涵、品位和凝聚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杭州城市文化建设中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工作。

再次,1999年12月底,中共浙江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2000年12月,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围绕浙江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立足浙江实际,勾画出此后20年浙江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蓝图。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理应在文化大省建设中走在全省的前列,起到率先示范的作用。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1年8月,根据《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杭州建设文化名城的若干意见》,并结合实际,杭州市制定《杭州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市第一个关于文化发展的五年规划,它标志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规划立足世纪之交杭州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从比较高的起点对杭州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不仅提出要“实施精品工程、标志性文化设施建设工程和跨世纪文化人才工程”,而且提出要创造几个“一流”,即“创造出一流的文化硬件设施,建成一流的文化服务网络,生产出一流的文化产品,培养出一流的文艺人才”。规划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杭州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包括兴建一批标志性文化设施,重点抓好杭州大剧院、杭州图书馆、杭州美术馆等一批高雅的现代化文化设施建设;实施精品战略,完善精品生产的论证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文艺创作繁荣局面的形成;加快都市文化建设,以抓文化广场为龙头,拓展带动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发展;全面推进图书馆网络建设,实现以市馆为中心的部分公共图书馆计算机联网,初步建成杭州地区的书目中心和文献情报中心;大力发展艺术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办学效益,提高艺术人口教育质量等。《杭州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十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标志着杭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已经进入到高起点和全面推进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有关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经济政策。杭州市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中,涉及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经济政策指出:“要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保证‘十五’计划中杭州大剧院、杭州图书馆、杭州美术馆、杭州体育场等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对列入市财政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市财政要做好资金落实工作,确保资金及时到位。鼓励单位自筹资金进行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市财政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贴息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旧城改造拆迁的文化设施,建设单位应按原面积拆一还一,公益性的文化设施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指标优先安排。文化单位转让、开发土地获得的级差地租应全额返还文化单位用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

这一阶段,杭州市明显加大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比如,2001年,全市文体广事业费支出6625万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5.6个百分点。2002年,全市文体广事业费预算安排8679万元,比上年增长30.87%,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11.87个百分点。为扶持艺术创作及推动文化事业单位改革,2002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艺术创作投资、200万元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专项基金,当年还安排市级文化事业建设费1790万元。公共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列入“十五”时期文化产业重点建设项目并已开工的有西湖文化广场、杭州西湖国际会议中心、杭州广电中心、杭州文化商城、杭州大剧院等,建筑面积约88.3万平方米,总投资27.2亿元。杭州市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000年,杭州市成功举办西湖博览会开幕式文艺晚会和“山花奖”全国民间歌舞大赛决赛等一系列重大演出活动。以中央文明委授予杭州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和举办西湖博览会为契机,努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社会公德教育,培养市民良好的文明习惯。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主题,不断扩大文明行业的创建成果。精品工程建设结出硕果,一批优秀的文艺、广播、电视作品获得国家 and 省级奖项。新批准公布4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完成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申报工作。

2001年,杭州市文艺创作成果丰硕,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项31个、省级奖项58个,其中电视剧《我亲爱的祖国》、儿童音乐剧《寒号鸟》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中国杭州西湖狂欢节等重大节庆活动。全市“东海明珠”标准集镇达到85个,其中省级达到22个。全市拥有文化馆和群艺馆15个、音乐厅1个、公共图书馆10个、艺术表演团体18个、剧场17个、乡镇(街道)文化站240个。全年出版报纸9.9亿份、各类杂志8547万册。杭州出版社出版图书182种。杭州电视台4套节目平均每周播出533.7小时,杭州广播电台3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63小时。至年末,全市电视综合覆盖率98.12%,广播综合覆盖率98.3%。

2002年,杭州市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项59个、省级奖项129个,其中儿童音乐剧《寒号鸟》获文化部第10届“文华奖”和第14届世界青少年戏剧节(韩国汉城)“特别荣誉奖”。成功举办第五届亚洲艺术节、西湖狂欢节、雷峰塔重建落成音乐庆典等大中型文化活动。文化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杭州大剧院主体工程完工,杭州东坡剧院等第七届全国艺术节辅助场馆改造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年末,全市拥有文化馆13个、群艺馆2个、公共图书馆11个、博物馆12个、剧场16个、音乐厅1个、艺术表演团体18个。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全面繁荣,全年出版报纸11亿份、各类杂志7600万册、图书2.8亿册;杭州出版社出版图书224种,其中新版图书145种;杭州电视台4套节目平均每周播出538.5小时,电视综合覆盖率98.99%;杭州广播电台3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67小时,广播综合覆盖率99.21%;广播电视作品获国家级奖项9个、省级奖项66个。

(四) 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契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阶段(2003年—2005年)

在现实中,一个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伴随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育以及“市场失灵”的暴露而逐渐形成,它的构建也将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而得以实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孕育和发展,也是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体制改革相伴随的。改革开放以后,杭州的文化体制改革一直在探索中逐步推进,但相对于杭州的改革开放整体进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文化体制改革只是局部的。相对于经济体制等其他领域的改革,杭州的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新型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孕育和发展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即以传统的供应方式服务于新的目的,完成新的任务。虽然在这种模式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质变和新的要素,但也特别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会将旧体制中的一些弊病继承下来。因此,新型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迫切需要通过一场更加深刻的文化体制改革来实现。

2003年6月,浙江省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7月,浙江省初步拟定全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和试点部门、试点城市的改革方案。8月,《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得到中央批复同意后,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迅速批复了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广播电视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6个省级试点部门和杭州市、宁波市2个试点城市的试点方案。2003年10月,《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开始实施。自此,杭州市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全面启动。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杭州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入新的阶段。

《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提出要“强化政府的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行政职能”。同时,也进一步明晰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的边界,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文化阵地”。这意味着杭州市已经完成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功能和目标的最终定位:提供只能进行集体消费的文化内容,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培育和保护公共文化资源。

2003年至2005年,杭州市财政总收入由395.75亿元增至624.4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3965美元增加到5475美元。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为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由于公共服务是由预算制约的,而预算永远不可能充裕,所以原则上说,公共服务的提供永远会有某种选择性,有特定的优先排序。在财政逐渐宽裕的情况下,一方面,杭州市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明确各级财政每年对文化事业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杭州市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实现公共文化财政政策的转型,尤其是重点扶持杭州大剧院、杭州广电中心、杭州棋院、西湖博物馆、中国丝绸文化中心、中国财政博物馆、运河博物馆、钱王祠、杭州碑林、杭州图书馆新馆等文化设施建设(重建);重点扶持有线电视网线入地、数字电视、杭州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及农村广播电视覆盖工程等文化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基层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乡镇、城市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

在这一阶段,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契机,杭州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杭州大剧院、红星剧院、韩美林艺术馆、西湖博览馆、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等一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先后建成。至2005年末,全市12个公共图书馆拥有图书藏量803万册,比2001年增长28.4%;市区6个老城区全部设立公共图书馆,杭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实行了“十五馆一证通”;启动百个社区图书馆工程,首期建成30个方便市民、设施先进的社区图书馆。2005年底,全市拥有文化馆13个、群艺馆2个、剧场16个、博物馆12个、艺术表演团体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200个。全市20套电视全年节目播出128121小时,比2000年增加13套82487小时;17套广播节目全年节目播出121307小时,比2000年增加8套51446小时;全市电视综合覆盖率为99.2%,广播综合覆盖率为99.6%,分别比2001年提高1.1个和1.4个百分点。乡镇“东海明珠”工程覆盖率达70%,村级文化设施覆盖率达39%,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加强,西泠印社金石艺术、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富阳造纸技艺、杭州小热昏、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7个项目申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成功。至此,一个相对完善的杭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陈立旭、冯 婷)

时间:2013年5月16日

口述:王歌凯——原杭州东南面粉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采访:高丹、冯跃民

整理:高丹

(一)

我现在68岁,是老知青。1964年的时候下农村,当了8年的农民。1972年回到杭州,属于知青返城。我是杭州人,也是在杭州读书的。杭二中高中毕业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时不高考了,就到余杭插队。1972年回来以后,正逢杭州市商业局来招人,报到以后分配到杭州粉丝厂——当时杭州只有这么一个粉丝厂,现在已经没有了。1977年,我担任了粉丝厂新产品小组负责人,1986年又当了副厂长。

杭州东南面粉厂是1987年成立的,因为它需要扩大,所以1988年时兼并了杭州粉丝厂。我就是被兼并进东南面粉厂的。因为粉丝厂小,面粉厂大,粉丝厂只相当于车间一级,所以我进了面粉厂以后就是厂办副主任,直接分管管理。当时这两个厂都是属于市粮食局管的市属企业。到1994年时,我被主管局任命为副厂长、副书记,还是分管管理,兼搞党务工作。后来因为我们粮食系统经常进行干部交流,1997年时,我被交流到杭州粮油化工厂,当书记、厂长。这个厂后来因为它负债比较重,两年以后就歇业了,我又被调回到东南面粉厂,这个时候我已经快临近退休了。2000年左右,我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享受副职待遇。大概从2005年左右,开始一直抓搬迁,退休后返聘也一直在搞这个。到现在厂子已经生产了,但房产证还在办。企业当时聘了两个总经理助理,一个搞经营,一个搞管理,所以我等于从1988年到现在一直在东南面粉厂搞管理。

(二)

我是这样总结的,东南面粉厂主要经历了建厂、发展、通过改制再发展、搬迁这4个过程。搬迁就是蝶化了,搬迁以后规模大了不少,效益也好了不少。

我先讲一下建厂初期的情况。1987年厂子刚成立时,人员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个是拱墅粮库,原来叫杭州市第二碾米厂,后来又叫粮油贸易公司的,这部分人到东南面粉厂来是专门搞保管的。第二个是从杭州面粉厂过来的,专门搞生产的。因为东南面粉厂当时是厂库合一,所以有粮库和工厂两批人。第三批就是杭州粉丝厂兼并过来的了,主要是粉丝厂有10.8亩土地,而东南面粉厂当时80亩土地不够,所以进行良性扩张。粉丝厂当时大概有100多人,其中一半给缝纫机厂,一半到东南面粉厂。杭州粉丝厂就没了,市场都让给民营企业了,牌子也没了,很可惜!原来杭州粉丝厂产品的质量标准是细、白、长、亮,虽然没上优质产品,但也比较好。

所以,东南面粉厂的建厂阶段就是从1987年开始,到评上国家二级企业为止。发展阶段是从这之后到改制前。改制到搬迁属于再发展阶段,搬迁以后就是蝶化阶段了。在建厂阶段,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设备是全新的,但都是国产设备。这里就有个困难了。因为面粉分3个等级,原来叫富强粉、上白粉、普通粉,后来叫特一粉、特二粉、标准粉。这当中特一粉比较好,现在叫强筋粉,它是需要进口麦子做的。而进口麦子要用进口设备做,这就不配套了。国产设备做进口麦子,磨的时候牙(磨辊的齿轮)咬不拢。我们做面粉主要是反复磨和筛的过程,一颗麦子要多次竖着走

45米,再多次横着走100米,还有斜角走的,这样反复走、磨、筛,一共要走2500米才能变成面粉。所以当时的问题就是,国产设备如果造高档的面粉,要用进口麦子做,不配套。这个时候,我们就动脑筋搞技术改造了。当时省科技厅鉴定通过了我们“利用国产设备消化进口麦子”的新技术,这是我们第一个科研成果。

另外由于建厂初期,人员和设备都是新的,没有磨合期,我们提出了“管理上等级”。提出的“四个创”即产品创优、管理创奖、工艺创新、效益创佳。第一个是产品创优,当时我们的特一粉、特二粉得到省级的优秀产品,和粮食部级的优秀产品,在产品质量上达到了创优目标。第二是管理创奖,当时我们提出了“三全管理”,即全员、全面、全过程,我们评上了全国的TQC(全面质量管理)优秀小组,整个企业评上了省部级的质量管理奖,这就是管理创奖。第三是工艺创新,当时新厂造起来时是由粮食部参加设计的,这个设计评上了最佳优秀工艺奖。第四是效益创优,当时为了瞄准国家二级企业,它有个经济效益指标是,必须人均年产1万元,我们第一年没到,只有8000元,第二年就通过了这个指标。这样我们“四个创”都做到了。

当时厂里人员有400到500人。我们的人员数变化是这样的,改制之前500人,改制以后200人,到新厂里只有50人了。就是说我们的机械化程度、自动化程度高了。现在我们的销售额是3亿,但人员只有60人。改制以后经过分流,变成200人,但车间里还有150人。现在车间里只有5人了,麦子上上下下变面粉都是全自动了。

(三)

从1990年我们上了国家二级企业,到2000年改制,这个十年可以分成发展阶段和再发展阶段。2000年改制时,我正好被调到杭州粮油化工厂去了,所以没有参与到,但情况是了解的。当时首先是进行资产评估,评估以后合理清账,所有的国有资产全部退出,最后剩了1000万元,由全体职工入股。其中经营班子400万元,职工600万元。600万元里,由职工的工龄折算形成300万元,再1:1配股,比如工龄股是3万元,可以再配3万元的股。经营层的400万元中,总经理是200万元,两个副总分别是100万元,可是他们也没钱。当时的市长是仇保兴,每个礼拜都要开会,汇报改制进度。我们是粮食系统里第一家改制成功的,挂牌是在2000年12月。

东南面粉公司现在只有60名职工,其他的职工都拿了钱,自己回家就业去了。当时朱镕基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认为是对的。不改的话,一大批人养在那里,每年国家一两千万投下去。现在全部分流分掉了,没有包袱了,但是这里拿出个1000万元,能作为职工再就业的成本,他到新的岗位去,能产生新的利润出来。作为职工是有阵痛的,工作很难找,没有在厂里好,但拿到了一笔钱。同样还是这笔钱,如果每年投下去,每年还是亏损,职工工资也不会高。可能因为我不是直接受害者,没有下岗的因素,但从大局上来看还是好的,否则第三产业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

改制的关键是资产要清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经营层,没钱怎么办?当时的杭州市长仇保兴同意经营层可以拿厂里的资产做抵押。当时资产还是比较高的,抵了400万元贷款,投进去了。但是每年的利息是要付的,这里有个问题了,资产是不能当成个人的,大家的资产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用,所以当时市政府就有个专门的文件。搬迁以后,股权的比率是10.86%,老百姓全部拿到了钱,原来的3万元变成30万元了。当时是“国退民进”,国有资本退出,民间资本进来。到后来,200个人里有130个走掉了,每人手上都有股,这个钱谁拿出来?就由主管局拿出来,叫“民退国进”,又变成国有控股了。现在我们的1000万元资产里,经营层是400万

元,主管局是600万元。经营层还是持股的,老百姓全部退股了。经营层必须要持大股东,这是对管理人的一个“跳楼机制”,弄不好就对不起自己了。

我是改制好以后回去的,2001年1月。改制的时候,不少职工看不懂。第一个,自己本身钱不多,工资也很低,要拿平均3万元钱出来也不容易,有的新职工按照规定交5000元都拿不出来。但是看好的也有,一个人一家子借借弄弄交了10万元进去。当时中层干部可能多交点,但大家普遍还是没钱。我们当时的一个销售部经理,现在也是总经理助理,他看好这个,10万元进去,现在就100万元了。当然还有弃权不要的,他的股份就由另外人拿了,成了两个极端。关键就看你对这个企业看不看好。当时的“跳楼机制”是很明确的,弄不好就会亏掉。但分红已经是百分之两百的分进去了,本钱已经是1:2了,6万元钱拿到了,再一搬迁就是10.86倍了。所以改制对企业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后来的搬迁也有搬迁的好处。市政府为了提高搬迁的力度,有政策给我们,我们的资产原来是1000万元,评估出来是原来的10倍,有1亿元了。这块土地一出让有17亿元,而政府只给我们2.3亿元,就是根据资产评估而来的。包括买土地、造厂房、买设备,以及所有的施工费,最后局里同意的就是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是搬迁后期了。

名称方面,2000年底以后,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叫杭州东南面粉有限公司,一个叫牡丹面粉有限公司。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由东南面粉有限公司拿出8000万元,成立一个牡丹面粉公司,作为东南面粉的全资子公司。因为我们搬到余杭勾庄后,必须要在当地成立公司,这是个税收的问题。注册取名的时候考虑到一些问题。原来为什么叫东南面粉厂,因为朝晖这边的老厂址是在运河的东南面,所以最后叫了“东南”。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厂名跟产品名没合一,我们的商标是“牡丹”牌。现在好了,商标和厂名合一了。我们的“牡丹”牌还是省级著名商标,是受国家保护的。

在管理上,从ISO国际质量管理认证进来后,我们就开始搞这个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叫ISO 9000标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叫ISO 22000标准,前一个认证我们在1994年就拿到了,在浙江省粮食系统里面我们是最早的,是第一批。当时人家都很奇怪,你们这个面粉怎么搞认证,但是我们一定要弄。它主要是关于质量管理的台账,很多,我们要求当时发生、当时登记。质量管理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质量,一个是工作质量。当时我提出要管理“管理者”,指标叫“三定”,即定人、定职、定时间。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首先是要有标准,第一层次就是质量文件,第二层次就是控制文件,对标准设计一系列的表格进行控制,第三管理层次就是专业制度。关键就是第二层次文件里的表格怎么样来控制。一开始搞这个时,真是很吃力。

(四)

东南面粉厂没组建之前叫叶青兜粮库筹建小组,这是最开始的名称,是我们副局长管的。粮库造好以后,发现有块地,可以做面粉。当时粮库主要是存放麦子和稻谷。我们杭州市有三大粮库,即半山粮库、拱墅粮库和南星桥粮库。这三大粮库,南星桥粮库和拱墅粮库都没有了,就剩一个半山粮库也改制掉了。当时朱镕基总理上台以后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们粮食系统全部改制。所有的粮店都卖光了,当时有108家粮店,现在可能还有20家。我们当时叫阵地不丢、队伍不散。现在没有一家国营粮站了,三大粮库也都没了。但库存是有的,国家储备粮还是有的。半山粮库牌子还在,大概有二三十万吨的储备粮,现在属于中粮公司。

我到半山粮库当过副书记、副主任、副总经理；还到粮食局做过八年，筹建粮食工会。粮食工业里面，米面油我都全了。所以最早东南面粉厂就是为了筹建叶青兜粮库，征了80亩地，因为在运河东南，叶青兜的名字又叫不响，所以取名叫东南面粉厂。这时候厂库合一，厂长又是叶青兜粮库的主任，后来粮库的职能全部划为东南面粉厂的粮食仓库，叶青兜粮库就取消掉了，形成了刚才说的三大粮库。

当时粮食系统是分购、销、调、存、加五大系统。购和销是指粮食商业；调存是指粮库，包括调运和保管；加是加工，我们就属于加工类的。加工又分米、面、油，即米厂、面粉厂、油厂。现在多了粮机、饲料，粮机就是粮食机械，变成七大系统了。

(五)

这里提一下杭州面粉厂跟东南面粉厂的区别。东南面粉厂产品把市场占领以后，杭州面粉厂转为生产方便面了，跟日本合资成立了爱司可口有限公司，专门做日本的方便面。它成了我们的下游企业，跟我们拿面粉，最后亏损了还欠我们钱还不出来。改制的时候国有资产评估，这些欠我们的债属于国有负债，全部清掉了。所以说杭州面粉厂一直是小打小闹，规模没那么大。我们每天生产400吨面粉的时候，他们每天才生产4吨。后来他们转为做方便面、面包，走了不少路，最后资不抵债，歇业了。杭州面粉厂现在地方还在，因为它的建筑面积大概有4万平方米，这个房子拿来做仓库出租。它也是歇业了，但是还有资产，先把职工都清空，只留管仓库的。也就是说它的厂没了，但资产还能产生效益，可能用来清偿负债。这是一种模式。

杭州粮油化工厂也是资不抵债。它主要是炼油，当时的产品叫“谷花”牌油；还有个“康尔佳”牌，是现在的杭州油脂公司的；另外一个三墩油厂。现在只有“康尔佳”这个牌子还在。杭州粮油化工厂当时做油，但是做得不太好。它在做油的同时，提炼两个新产品，一个叫谷维素，一个叫牙周宁，都是在糠油里面提炼出来的。谷维素曾经做得很好，当时厂里的成本每盒是一毛四，到医药公司是一块二，到老百姓一下子到两块四。现在大概卖十多块钱都不止了。牙周宁也是同样的概念。这两个产品做了以后，粮油化工厂上升了。后来因为谷维素、牙周宁价格直线下降，市场没了，它就负债了。当时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已经负债4000万元了，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了。这个厂歇业前曾经也尝试像东南面粉厂一样改制，评估为负资产，大家入股进去一两百万，成立个公司。但是在改制的时候，在职工下岗等问题上，工人们包括班子都不同意，局里也做了工作，最后做不下去，干脆就歇业了。因为改制后到底前途怎么样不知道，是做油，还是做谷维素，没有方向。而且老厂房、老机器要造新产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要有市场，要有工艺，要有原料，都得跟上去。最后，职工按照一年工龄一年补偿金的标准，拿了以后作为就业赔偿和成本。

东南面粉厂我是在改制前调走的；粮油化工厂我去了，但是没经历改制，又调回东南面粉厂了。我就好比从一个金元宝跳到了一个穷元宝。作为局里，是把我当一个救火兵调过去的，但是我有天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了。当时我是到处借钞票，问娘家借了两百万，拿到那儿去买原料，也就稍微维持一下，大概弄了两年。职工工资总要付的，水费电费总要付的。最后我当厂长没办法，到自来水厂也来找我，电力局也来找我，水电费都交不出来。我拿到钱第一个要考虑职工工资，第二个要考虑生产原料，第三个才能考虑水费电费。后来是水也被断掉了，电也被断掉了。每次一到发工资的时候，我都是胃病都愁出来，实在没办法，回天无力。最后，主管局把土地卖掉

了,卖的钱用来还债。首先把职工这块的钱管牢,至于水电等欠款,都打折清偿掉。当时叫歇业,就是资不抵债了。粮油化工厂歇业前,我已经调走了,局里派过来的副厂长接替我当了厂长。后来他也没办法,就在这里下岗回家了。他怎么处理呢?就把所有资产能变卖的都变卖,设备卖掉,土地么收去。首先是清理职工,这个局里都做工作的。当时厂里大概有两三百个职工。把所有的土地、设备卖掉后,跟负债对比,先把职工的安置费管住,然后把所有的债主召集到一起,按比例打折清还,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这是法院判的。

(六)

萧山现在有一家恒天,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是改制以后的国有民营企业,它是纯民营企业,各种机制要灵活很多。在规模上,现在我们是3亿元,他们有10亿元,但他的主业规模要比我们小。因为我们专门做面粉,他还做另外的业务,比如麦子的营销等,所以恒天下面有10多个子公司,我们就只有牡丹公司一家。

东南公司本身没有牌子,就一个“牡丹”的牌子。我们生产的的面粉,原来是特一粉、特二粉、标准粉的“老三篇”,现在专用粉多了。因为老百姓做饼干怕咬不动,要用低筋粉;做饺子怕凝不住,要用高筋粉;做面包要用中筋粉。这样一来,所有的面粉等级以筋度为标准,分了七八种出来。国家提倡特色粉,我们南方叫专用粉。现在我们就在专用粉上做文章,效益也在这上面,比如油条粉、面包粉。当时省级新产品鉴定,我们有个速冻粉,有两种,一个速冻饺子粉,一个速冻馒头粉。我们有两个研究生、一个高工,科技力量应该算比较好的。我们的产品生产出来后,主要是供给食品生产厂家,比如做月饼的、做方便面的企业等,超市里、菜场里都是没有的。我们是作为食品生产的原料销售的,在浙江省各个地区发给二级经销商,可能有些菜场是从二级经销商拿的。我们产品的覆盖率,到省统计局都查不出来,只知道原来是产量连续5年全省排名第一。后来恒天上来以后,前年是全省排名第二。我们的专用粉市场覆盖率是75%,这个是清楚的。

时间:2011年11月22日

口述:仇保兴——1999年4月至2001年12月任杭州市市长

采访:安蓉泉、贾大清、李忠民、李辉毅等

整理:高 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稿校订,有删减)

(一)

我是2001年的11月二十几号离开杭州的,准确时间忘记了,现在正好是十周年。十年,中国变化很大,杭州也变化很大。有许多事情,既觉得非常遥远,又觉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刚到杭州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杭州有几个发展战略应该更加明确一些。一是城市的定位。杭州到底是发展工业,还是发展新兴产业,是和宁波、上海错位竞争还是同类竞争?城市发展定位,历史上大概摇摆了很多次。我认为这是世纪之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二是城市发展合力。作为经济强省的浙江大城市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浙江比较早地实行了强县放权。强县放权的好处是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缺陷就是中心城市的合力不够,即集聚力不够。这样,中心城市想做强就很难。现在的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都市化阶段,要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和人口密集区来统筹竞争力优化的问题,如环境资源共享、支柱产业共树、生态环境共保、基础设施共建等。这些问题,都是单个城市或者是单个经济区走向都市化必须要考虑的。此时如果体制分隔,各自为政,城市群内部之间相互竞争,非常不利。我国的体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相关的体制问题不解决,会影响集中力量,也办不了大事。能办大事的城市和不能办大事的城市之间在长期战略实施以后,差距就会显示出来。三是机制和活力的问题。按常理讲,浙江经济以民营经济占主导,是活力最强、体制最灵活的省份,杭州又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但不同的是,长期以来杭州是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而且国有经济的包袱非常大,绝大多数企业仍是旧而僵的体制。我记得刚到杭州的时候,马时雍(时任常务副市长)告诉我,每年年底杭州市财政要拿出5个亿救济那些发不出工资的国企,每年都是这样搞的。当时市财政负债很重,过年光企业的安定费就要5个亿,这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印象很深刻。杭州地处在经济机制最活跃的区域,但作为省会城市,经济运行的活力却不足。四是环境问题。环境包括人居环境、投资环境、政府的办事效率。怎么讲呢?当时省里一些老领导、周边地区的企业家,反映在杭州办事有些难、政府的效率不高。在世纪交替之际,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杭州和宁波市同为副省级城市,有时候宁波发展快些,有时候杭州发展快些。当时上海发展非常快,徐匡迪(原上海市市长)跟我讲,要是高铁一通,杭州的那些企业家全跑到上海来了,杭州就没戏了。

我在杭州工作了两年零十个月,我认为在发展的思路,有几个方面得到了一些纠正。

(二)

城市发展的定位问题。杭州发展定位非常明确,就是要和上海、宁波错位互补,而不能同位竞争,杭州是上海的大花园。我曾回应徐匡迪说,高铁建成后说不定部分上海人会到杭州来创业、居住,然后在上海工作。这都是可能的,因为杭州的人居环境好。旅游当然更不成问题了。所以杭州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发挥人居环境的比较优势,旅游的比较优势,创业的比较优

势,这三个方面要比上海好些。那么和宁波的关系呢?宁波是个港口城市,长期围绕港口发展重化工业,而且土地预留得比较多。杭州和宁波的互补关系是:宁波发展重工业,杭州发展新兴经济。新兴经济,就是软件、IT产业、高新技术和网络经济等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杭州比较注重这些产业的扶植和发展,连续办了几届“西湖论剑”大会,国际500强中的高科技企业,国内华为、华大等著名的新兴产业龙头企业纷纷落户杭州,还有归国留学生创业的UT斯达康等,这些企业产生了聚集效应。那时候阿里巴巴等还是比较小的企业,后来发展比较快。杭州在产业发展上与宁波错位互补,这是非常重要的。杭州没有港口优势、土地资源的优势,不能发展炼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杭州一定要在城市的定位和产业的定位上和上海、宁波错位互补,不能同位竞争。我认为这是发展思路上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三)

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定位问题。改革的思路定位必须非常明确,就是国有企业怎么盘活资产存量、增强活力。当时有一种思路认为国有企业的规模不够,要把规模做大。不仅是杭州,全国各地都犯这类错误。企业规模不够怎么办呢?成立各种大集团。几年以后都垮了。杭州也有这样的问题,改革之前有许多企业还是比较好的,品牌也是不错的,但被人为合并成大集团。这种集团实际上是企业归大堆,集团下属企业之间没有合理的分工合作,缺乏产业链的互补,也没有经济上的规模效应、人才上的聚集效应。企业最稀缺的资源,一是人才,二是资金,两个规模效应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合并实际上就是拉郎配式的,把经济责任搞得更糊涂了。因为单个企业要盈亏核算,拼大堆之后不仅吃大锅饭,相互之间还发生了摩擦矛盾,加上企业大而笨,对市场的反应反而慢了。此外,合并以后管理者为了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主要精力不放在企业经营上,而是放在经营上级关系上。领导者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不放在经营市场、技术上,而放在经营、内部摩擦或上级关系上,非败不可。因为这些“集团”是拼大堆形成的,就是政府说了算,怎么合并,给什么优惠政策,财政给多少支持,包括人事,都是上级定的。这样的企业根本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也不能自负盈亏,而且把原有边界比较清楚、考核比较容易的单个国有企业,搞得边界不清楚、考核不容易了。从全国各地的实践来看,这种模式基本都是无效的。

当时流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是仿照美国二战后的企业制度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只注意一些表面的东西,如“企业不能办社会”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做法效果都不好。因为按照现代企业成长的历史脉络来讲,企业能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看产权是不是清晰。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经营者、所有者开始是合一的,后来随着企业越做越大,所有者管不过来了,开始聘请职业的经理人。随着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并在社会上形成经理人市场之后,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形成。这是一个内发的改革过程。而我们当时的改革只是外壳很像,过分讲究形式,例如不论企业大小,董事长和总经理一律要分开、企业不能办社会等等,都只是简单的模仿,追求“形”似,缺乏内在机制的建立。任何事物,如果是基于内在机制发展起来的话,就会产生自动纠错的能力来应对外部干扰,如果是外部强加的,反而会把内在的创新活力搞没了。企业改革为了什么?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所有者、经营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前面讲过,这种拉郎配式的强制合并以后,企业集团领导人的注意力不放在搞活经济,而是放在其他方面了,放在怎样去适应官方从上到下的要求上,这样发展模式就错了。

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自主性的机制,它能够形成适应外部环境、有活力的有机体,因为有机体整体能力大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有机体的奥妙之处,是由其内部各子系统间复杂而自主的相互作用所成就的,是内在的机制自发形成的。与其相对应的,是无机体式机制,属“它组织”式的,各个部分相加摩擦力极大,不会产生大于整体之和的力量。“它组织”是一种机械式的东西,因为其结构是由外部强加的,系统输入的功和输出的功肯定是不对等的,还需减去内耗摩擦的功耗。有机体和无机体的机制区别就在这儿。当时采取的从外到里、从上到下的企业制度改革,就是一种它组织的模式,是政府强加的,是用一个模板套所有企业,使企业经营者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内、向上不是向下。这一切都是违背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规律的,缺乏此制度发生的条件、机制和过程,改革只是形式相似,目的难以达到。当时我比较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大胆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因为现代企业制度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产权明晰,使产权的所有者和企业家真正有积极性,有动力,能自主盈亏去推动内生改革,实现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我们把所有的国有企业进行债务剥离、土地估价,而且进行了原有经营者民主测评。我们比别的城市股份制改革多了一个经营者民主测评的环节,就是看看经营者到底受不受工人群众欢迎。被测评者如果支持率不过半数的,就不能主持内部的自我改革,你失去了人心嘛。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的公开交易和优势重组。当时测评不过半数的经营者相当多,可以说有小一半左右。因为长期以来,工人对企业亏损是很着急的,也看到了这些厂长、经理都在打小算盘,已经不是他们的同路人了。我记得有一个厂:厂长出国订购了进口设备,运进来以后发现和厂里原有的设备根本不配套,结果连箱都没打开就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直到包装箱内草都长出来了,整套新设备就报废了。那是几千万啊,损失巨大,完全是败家子行为。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国有企业把钱借给私营企业,或者给亲朋好友的私营企业担保贷款,使国有企业“放血”;或者产品销售是两本账,亲戚朋友一本账,给市经委一本账,把利润偷偷让渡给自己的关联企业。这类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但也有一些比较有正义感的企业家,以厂为家,工人投票得票率就比较高。我当时特地设计这个环节,就是让工人群众来辨别现有的经营者有没有资格进行内部改革。这是我的一个小发明,因为我自己当过厂长,很清楚国有企业是怎么运转的。在这个基础上,产权通过公开拍卖,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买下来,或参股经营。

在交易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原来估值比较低的国有企业,反而卖出了高价,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很重要。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如果是内部人改革的话,可能会把资产贬得一文不值;如果是外来者参与改革的话,他们会看企业的品牌、未来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资产评估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根据现值来评估,就是残留值,即原来资产买来花了多少钱,然后不断地折旧,最后剩下多少钱。这是一种传统的评估办法。二是市场收益法。即这个企业能实际盈多少利,如果年盈利是500万,那资产就值一个亿。因为银行贷款的年利率5%,按照这个平均利润率反推企业资产的实际价值,这就是市场法。三是预期收益率法。这种方法是通过产权交易发现的。我清楚记得,杭州轴承厂当时的净资产价值内部核算只有几百万,可是有一家温州的精工轴承厂愿意出5000万,这还不是实际成交价。按照残值法、市场法算资产都很少,他们为什么愿意出高价?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技术改造和推出新产品,可以获得很高的预期利润,他们就按照预期的利润,再打一个折扣来买这个资产。由此可见,对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公开交易,竞争式地出价,然后由合格的企业家来经营。浙江省有这个条件,因为浙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温州的,台州的,还有其他地方的。经过

长期市场竞争的洗礼,企业家都已经成熟了,具有市场经营能力。这要是放在我国西北地区,因缺少合格的企业家队伍,此法肯定行不通。

我认为,杭州国有企业改革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把原有的那些归大堆的企业集团进行市场化分拆,原来产权不明晰的企业资产分拆成较独立的资产板块,然后再公开化交易转让,吸引成熟企业家加盟,从而形成企业内生活力机制。

(四)

城市的发展定位问题。城市的服务功能到底是什么,这要和城市的发展目标定位结合起来。城市的本质是一个人类聚居的场所。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有一句名言“城市使民众的生活更幸福”。他说人们为什么愿意住到城市里来,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们是奔幸福去的。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到现在还管用,也是城市功能改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使市民的生活质量更好。这样,杭州城市发展的定位非常明确,首先就是全面优化人居功能。其次,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自然和人工建筑物的复合体,自然斑痕越多的城市越美。山水城市就是这样提出的,保留自然斑痕越多越好。杭州与其他城市相比,江、河、湖、海、山齐全,自然景观就比其他城市丰富得多,多样性好。我们提出“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就是把城市定位与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合理结合、相互强化。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曾经在大会上多次说:“西湖是美的,如果拿个芭蕉扇把西湖一盖,其他地方就不咋地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西湖,杭州只能算是个三流的城市,就没有优势了,怎么和上海、宁波友谊竞赛?由此可见,只有通过人居环境的整治优化,才能提升城市品位。

另外,在空间结构方面,杭州的定位始终不清楚。长期以来,只是围绕西湖转来转去,造成交通拥堵,人口过于稠密,城市多种功能过分在湖滨区域叠加。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始终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围绕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时代。这步棋如果不走出去,空间合理布局(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后来的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促使城市中心从绕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而展开的。因为只有迈进钱塘江时代,杭州才会在空间上有所合理拓展。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步骤。

首先在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就是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线,思想要高度统一。为了让人们承认钱塘江是城市的发展主轴,看得到城市的未来,我聘请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由他们筹资50多万美金,编制了一个钱江两岸的景观规划。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划,尽管现在没有完全按照此规划实施,但是规划的前景唤醒了人们的认知,统一了思想,未来杭州市区就应该以钱塘江为中心的新格局。

二是钱塘江边的开发建设是低档次的填空还是高品位的开发?当时钱塘江两岸是城市的边缘,一些先期建设的小区环境质量非常差,几乎跟棚户区相似。我们把这个地方重新定位,设计成钱江新城,城市未来的CBD,从这个角度启动开发建设。

三是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里有一个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这个电厂的规模很大,每年会产生严重的煤灰污染,而且是当时很知名的香港大企业家投资的。这么大规模的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早已订了,等于说木已成舟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或者说杭州城市走向钱江时代都成了空话。因为第一步就有了拦路虎,还正好处在钱江新城中心地带。当

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一次,意见也不统一。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从未来的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但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做出这个决定,省里又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这个电厂还要继续上。这是个两难的事情,一般人肯定就放弃了,但当时我认为这个事情非争取不可,因为这是关系到杭州城市未来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城市中心,也就是西湖和钱塘江北岸的核心地段,建一个发电厂,怎么让城市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且这个发电厂正处在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战略通道、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二十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成为煤灰区,这还能建什么城市 CBD 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北京找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作为浙江同乡,他们也了解杭州。两位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市区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曾培炎说,我支持你们。我回来以后,就主动对这件事情做了调整。因为国家计委已经表了态,这个项目可以下。我想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我在杭州所有重大决策中做得最好、对长期发展最有利的一件事。当时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首先是工程全部停下来,断电断水。其次是组织人马,分成4个小组,设备在哪里订货,就到哪个厂家去跟他们谈赔偿。再次是通过赔偿,收回土地,实际赔偿了4个亿,但是土地收回改变用途以后,还增值了15个亿。这是个很重要的决策,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是杭州大剧院坐落在什么地方?这很重要。我记得当时个别省领导的意见是大剧院要摆在西湖边上,认为这样利用率高,而且给城市中心增加了人文景观。但我认为大剧院的风格和西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是一个法国人设计的,是一个玻璃壳透明结构,哪怕位置跟西湖有点距离,也是不恰当的。西湖充满东方的古典美,在旁边突然摆上一个超现代的玻璃壳,景观无法协调。再加上,西湖景观每一处都是历经千年精雕细琢的,突然挤进去这样一个闪亮的庞然大物,也是对江南传统园林文化的冲击,效果将很糟。所以我下定决心把大剧院建到钱江新城去。

五是钱江新城以什么样的面目面世?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钱江新城要有特色,但有点遗憾的是,钱江新城没有完全按照原来的思路去建设。尽管现在外观也是不错的,但是和一般城市的 CBD 有点类似,缺乏自身的文化特色。

最后,围绕以钱塘江为中心建设新城,萧山、余杭必须撤市建区形成合力。特别是萧山撤市设区,使两岸能共同围绕钱江新城开展城市建设。否则,两岸仍会把钱江作为各自的城市边缘,这在概念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江边的一些基础设施要做及时调整。比方说钱江四桥,方案拿出来时候就是一座一般的箱梁式公路桥。我当时就把它否定了,要求重新进行设计,要把它建成一座与未来城市中心相匹配的景观桥。这个工程因此推迟了一年半,结果把一座景观非常单调枯燥的桥变成了一座外形优美的桥梁,能与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遥相呼应。

(五)

开展“大拆违”。除了上述的调整之外,在杭州城市发展空间战略上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最重大的决策无疑是“大拆违”。当时是在怎样一种理念下进行的?那会儿我还是代市长。我是1999年3月调到杭州的,2月市人代会已经开过了,所以我这个代市长要代近一年时间。当时人所周知的是,杭州市区违法建筑肆无忌惮,遍地开花。我曾在杭州学习、工作过6年时间,对那里很熟悉,发现杭州许多单位、个人都可以盖违法建筑,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建成之后,临时工棚全部改成了店面。那么多公园绿化被占了,人行道被挤了,管道被压了,城市还能不乱糟糟的啊?

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些违法建筑都拆掉。但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字去掉以后再拆。可我认为,当时违法建筑增加很快,正是高潮期,每年增加约200万平方米。推迟一年再拆,就要多拆200万平方米违建,各方面的矛盾和损失就更大。我记得当时很多熟友,包括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些厅局长,纷纷打电话给我:“你这样做‘代’字还要不要取消啊?”我就说:“不取消就算了,‘代’下去就算了嘛。”当年4月,我就部署了这件事,下决心进行“大拆违”。

除此之外,杭州第一是面临一个城市规划有效实施的问题。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都要科学。现代规划学中有句名言:“规划是一个过程。”《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对城市规划的释义是什么呢?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它是一项专门的工程技术。这项技术事关大到城市定位、小到公共空间的优化设计,本身是一门艺术加科学的综合性工程学科。第二层含义,它是一种法律体系,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去实施。城市规划是在土地私有制国家起源的。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私有制和公共利益常常是冲突的,所以必须要有一套规范来平衡这个冲突。土地是私有制的,但是公共空间又必须要为公众服务,规划就是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协调必须带有强制性,能够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相对抗。从这个角度上讲,违法用地实质是一种公开剥夺公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公开地挑战法律。第三层含义,城市规划是一种文明运动,而且是一种公民参与的、广泛的文明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公民,凡利益相关者都有关系。城市规划特别要对低收入者的利益有充分照顾,因为他们的发言权最小。规划至少有这三个方面的含义,而不仅仅是一张图纸。如果谁有权有势就可以建违法建筑,就可以乱改法制,那实现规划的这三大功能,追求社会公平,就毫无可能,政府也就没有了公信力。所以这是最大的挑战,否则什么城市定位啊,什么合理空间框架、可持续发展啊,都会落空。

第二方面,违法建筑不拆,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当时拆的第一座违法建筑,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绿晶饭店。我们去拆的时候,他们连家具都没搬,而市政府公告已经贴出半个月了,告诉他们这是违法建筑,要拆除。当我们把吊车启动,开始扒屋顶了,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你们真拆啊?三年前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叫我们自己拆,我们都顶着不拆,你们杭州市倒来拆了。”意思是说,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定下来的都可以不执行,小小的杭州市怎么来拆。我说,市政府这个决定半个月以前就告诉你们了。到我们真的开始动手了,他们才开始搬家。一边上面扒屋顶,一边下面在搬家。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法治的公平社会,不能让强势者或违法者侵占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在,如果谁都可以占有,那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如何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决不能让这些挑战法律的违法者占便宜,这是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第三方面,建立健全城市功能。要完善城市功能,和上海、宁波的发展模式错位互补,就要把张德江同志的话改过来,让杭州除了西湖美以外,城市也是美的。这就要拆除大量的违法建筑。拆除违法建筑,是落实城市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政府连这个执法能力都没有,连公共空间设计的实施机制都不存在,那“四个在”(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就是一句空话。作为后花园的杭州要比上海更美,高铁建好以后要让上海人往杭州跑,而不是杭州人一窝蜂住到上海去,这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决策。当时我的决心是比较大的,就准备这个“代”字不取消了,也要这样做。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可以说是一种独创。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拔掉。我认为,政府办事必须是公告在先。依照土地管理法和城市规划法,公告明示违法建筑坐落在哪里,面积多大,并通知违建者自己拆。如果拆不了,到

一定期限后我们帮助他们拆除；如果拆错了，政府赔偿。违法建筑公布以后，完全是公开执行。第一批违法建筑在电视台、报纸公布了以后，15天内，自己不拆，政府来拆。同时，设立一个专门的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住宅周边的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法建筑被拆了，就会有积极性举报周边他人的违法建筑。这样拆违的同盟军就越来越壮大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违法建筑全是经群众举报后政府核实，核实以后登报进行15天公示，公示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拿不出合法建筑证据的，就得拆。

就这样，一浪接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拆除违法建筑活动就推开了，到后来就成了一个群众的自发运动，挡不住，停不了。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利益的冲突，这是难免的。对改变大家都会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我毕业后曾留在杭州大学物理系光学实验室当了3年助教，有一大帮同事和同学。开始拆违法建筑的时候，他们都写信为我叫好：杭州必须要有铁腕拆违，必须要这样治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城市就乱了、衰了。后来，浙大校园也开始拆违了。浙大对“大拆违”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浙大合并后有4个校区，当时农大校园的周边一圈全是临时建筑改成的商店，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4000多万元。但按照规划法，这些都是违法建筑，浙大统统把它们拆了，并全部建成了绿化带，透绿后景观很美。虽然经济损失很大，但整个形象完全改变了。之后，浙大自己组织了一个拆违队，专拆校园里面的违法建筑。原来许多教授、讲师在校园内随意搭建棚屋养鸡养鸭，甚至养猪的都有。校园拆违，首先就是把鸭棚、鸡棚给拆了。他们就写信给我，说想起了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他们养的鸡鸭都没啦，都被“鬼子”抓走了。有抱怨的，有骂娘的，反正完全是同一拨人，开始叫好，后来喊糟。由此可见，只要触犯到自己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围绕西湖的整治，起初省军分区的少数同志一度有点抵触。拆违，首先确保西湖边上没有违法建筑，但许多军队的机构都在西湖边上搭了猪棚。因为那些机构对外经营，剩菜剩饭比较多，战士们就养几头猪把剩饭消化了，然后改善战士的伙食。但他们把猪粪排到西湖里面，污染非常大。当时我们把这些猪棚全拆了，拆了以后猪让他们自己处理；不处理就拉走，过年过节的时候把杀好的猪肉再给战士们送去。但是在送去之前的这段时间，意见很大。再加上少数军队机构的房子随意加高、乱建，在西湖边上也常有报道。众所周知，城市规划法也是基本法，跟军事设施法是同等级的。而且国务院在批准杭州规划时明文规定，所有在杭单位都要服从杭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我们当时就宣传这条，部队违法建筑确实也拆了不少。

任何改革，总体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这是常识。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两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是做不好事情的。实际上，整个拆违也是利用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力量，依靠了这种新的机制。干部还是原来那批干部，就把违法建筑拆了。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违章建筑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干部的默许支持下建起来的，现在又是他们去拆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说，关键是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干部的思想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违法建筑最多的是江干区，当时市政府决定，江干区的违法建筑如果不拆，不能完成指标的话，上到区委书记，下至一般干部，出国一律停止。当时出国还是很热门的一件事情，一说停止，大家都不好受了。半年，一年，两年，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区长都没有出国过，领导干部也觉得很没面子，拆违的底气就更足了。办难事，就是要

把一切手段都利用起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当时杭州的违法建筑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多集中在马路两边,因为这些违法建筑都是临时工棚。工棚不是门朝内嘛,工程一结束,把工棚外围一改就变成店面了。虽然人行道、自行车道、绿化带都被占了,但临街的违建都有一个光鲜的外表,霓虹灯一打,很漂亮。把这些违法建筑一拆,后面破破烂烂的东西就都暴露出来了,如果没有弥补的话,杭州将到处都是破烂街道。所以紧接着拆违的,就是街道整治。街道整治的主要方法,就是“穿鞋戴帽”和增绿。我们下了大功夫,每一条街道都请专家做特色设计,多方案比较,每一条街道都力求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譬如,主要建筑怎么美化,一般建筑怎么美化,园林绿化和街道小品怎么设计等等。这样一来,美丽的街道就呈现出来了。违法建筑拆除,加上整治修饰,能为公众提供协调整洁、环境优美的公共空间。

拆违的实践还给出了这样一种启示:中国城市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存在着文化的差别。西方城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城市的执政官就非常注重公共建设,首先会把公共浴场、公共图书馆、广场建设好。执政官自身的官邸往往都是很小的,公共的建筑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建筑都非常讲究公众享用的理念。后来城市规划法强调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包括所有的建筑物,不管建筑物属于谁的,只要是面向公众的,外立面就是“公共财产”。也就是说,尽管房子产权是属于个人的,但房子朝外的那一面,包括窗子、颜色、格调、阳台、庭院、绿化等,都是公共的。所有的华侨,包括使馆人员,在国外引起冲突最多的,就在这方面。华侨们刚到国外时,经常把衣服晒在阳台上,隔壁邻居就会举报,甚至会被起诉,到法院去听候审判,然后就是罚款,还要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没收,因为侵犯了公共空间。这个理念,在西方国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越来越强化。我国大使馆的很多工作人员和华侨都犯过此类错误。比方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温州人在罗马做生意,他们租店面以后申请一个牌照,然后挂一个很小的牌子说明这是某某店。但当局对店牌的大小,是有严格规定的,厚度最多不能超过3厘米,如果超过3厘米就要罚款,而且罚得很厉害。有几个温州人曾告诉我,一个很小的牌子,就被罚了5万欧元,而且牌子也被没收了。租个店也就5000欧元月租金,一个牌子就罚了5万欧元。建筑物的外立面作为公共财产,历来是城市文明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市民意识与管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国城市有优雅的园林文化,但就是没有很好的公共空间。历史上,我国的园林也好,其他设施也好,往往大都是皇家所有或者私有。古代中国有皇家公园、私家花园,就是没有开放的公共公园。我国城市缺乏公共空间景观要素,这是城市文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城市所有建筑的外立面应该属于公众,必须进行立面整治,这是与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挑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在电视辩论要不要拆除外凸防盗铁笼子时说:“我们装那么多保险窗,就是一种中国特色嘛!”参加节目的人还拼命鼓掌。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杭州很多地方的许多住宅公共立面,还是有违规防盗铁笼子。人民群众的文化意识是需要引导的,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城市公共空间必须依法治理,这是现代城市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媒体揭露,香港特首私人公寓的阳台用玻璃给包起来了。建筑阳台是属于公共空间,封闭以后就变成私人的空间了。香港规划署署长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当局已经通知特首必须在十五天之内拆掉违法建筑,如果期限到了还没有拆,规划署就要行使强制拆除。就是特首,也必须执行这个法令。

(六)

关于用市长公开电话“12345”来加强城市管理,前段时间北京也在做这件事情。杭州的市长公开电话其实早在20年前就有了,就是在我到杭州任市长之前就有了。但那个时候,市长公开电话基本是个空架子,只有一条线路,几乎谁都打不进去,用不了。实际上就是同样一个东西,用什么理念去设计、施行,是非常重要的。大体上,我们的城市管理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希望把“七八个大盖帽”的职能全都集中到一个单位,然后让它用最大的权利、最高的效率把城市管起来?这种思路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现代化城市公共服务职能部门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三百年前,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业化城市刚刚诞生时,城市管理的单位确实只有一个,仅有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连城市规划也属于卫生部门管理。随着城市现代化,产生了煤气、供暖、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各种各样的专业单位就涌现了。当前,同时为城市公众服务的专业机构已多达几十个,而且还在增长。怎样把这么多的“大盖帽”合并到一个大机构里面去?北京市一个综合执法局的队员跟我讲,他要背150部法律,连法律名称都背不过来,怎么去执法?根本就不懂啊!这个矛盾至今为止没有被破解。

“12345”市长公开电话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功能与此不同。首先,它是一种效能检查和监督的机制。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城市部门为老百姓服务,都能通过“12345”把它们全覆盖在里面,让老百姓监督它们的运行效率与质量。通过“12345”,可以评价出哪个单位服务最好,哪个单位投诉少,哪个单位反应快,而且一目了然。这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对政府效率进行控制的一个必要系统,能促进政府职能部门用最高的效率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价政府的效率。不管城市政府有多少个单位,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都要经过人民的评价,因为人民群众是从他们的切身利益方面来评价这些部门的。第二,能促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亲民的政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个要高挂起的匾,而且要落实到政府服务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上。西方政客经常怀疑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合法性不是由什么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程序决定的,我们的合法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体现了共产党没有自身利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将宗旨实施好了,就是合法性的依据。西方政府最早的雏形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两个人做生意,缺乏一个公证人。这个公证人或仲裁者就是第三者,第三者的概念扩展开来以后就是政府了。政府是干什么的呢?是做一般的经济人做不了的事情,提供公共社会保姆的责任。公共保姆的定位非常重要,就像普通人家里雇了一个保姆,首先要确保这个保姆是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的,其次是确保保姆的技能和效率是高的,再次是保姆的费用是合理的。我们评价保姆就是这样。政府的实质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保姆”性组织,把主人服务好,政府的合法性就体现出来了。至于这个保姆从哪里找来比较好,那都是要靠实践来证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不能绕进西方式合法性的陷阱之中,而是要尽心尽力做到老百姓觉得最满意就行,执政能力也就体现在这方面。对老百姓的疾苦,对老百姓的呼声,对老百姓的诉求,政府如果无动于衷,这个保姆就有被开除的危险了。我认为,现在倡导的创新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将城市政府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即成为公众合格的保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没有问题的,但各地政府具体为民办事的行为、效能、诚心诚意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

“12345”公开电话能促进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效能。首先这个电话最容易被民众记住,原来的

电话记不住,有人甚至连自己家里的电话也记不住,但“12345,有事找政府”就朗朗上口,要保证“保姆”容易被主人找到。还有,这个“保姆”能够办事,而不只是一个传话筒。许多地方的市长公开电话,效率不好的根源就在这里。接电话的人都是一帮临时聘用的小姑娘,只是转转电话,跟114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杭州的“12345”公开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效率很高?因为我要求机关所有的后备干部都必须到“12345”去直接为百姓解忧办事。这是第一线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仅要能在现场清楚地回答百姓的诉求,而且要有权调度相关部门,能够调动“分保姆”直接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对他们的服务成效做出评价。杭州的“12345”公开电话和其他地方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全国其他地方市长公开电话的办事大厅里,只有几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制服统一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她们不能办事。即使有少数几个小姑娘经过长期的锻炼成熟了,能够回答一些问题,那也对百姓的投诉起安慰作用,她们不能现场解决问题,也不能调度政府职能部门为百姓解难题。杭州的“12345”办事人员不仅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指挥职能部门为民办事,还常到现场去检查取证和督办。杭州的市长公开电话既可以给老百姓服务,也能监督有关机构为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十分有效地锻炼了“接线员”的才干。干部的才干主要是在实践中锻炼获得的。没有经过实践的磨炼,书本上的那些东西都是苍白的,没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也是不管用的。不跟群众打交道,不能掌握为群众服务的技巧,就会形成官僚主义的花架子。“12345”公开电话在为民快办事、办好事的过程中树立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过了一年,就连省级机关的厅长们也常要打“12345”来办事了。

我认为杭州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经验要好好地总结一下。当我国社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人们对高质量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强烈,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临界线,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市民各方面的诉求很高,再加上现代通信与媒体的作用,增加了国内外政府运作的透明度。此时我国城市政府的执政技巧、服务能力和素质也要相应提高,这就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说,现在的主人是很挑剔的,主人对“保姆”的服务开始很不满意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姆”还是传统老一套,家庭环境就创新不了。“和谐家庭”首要条件就是主人和保姆关系要好,保姆的服务技能要提高,如原来没有的家电现在有了,洗衣机、电冰箱、煤气炉等各种各样的电器都要会操作,还要烹制出可口的菜让主人觉得满意,这就是新时期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官员转变的难度比西方官员转变的难度更大,为什么呢?受五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影响,政府官员实际上有一种“当官做老爷”、自己是百姓“父母官”的旧框框,始终将自己当成是主人,缺乏一种真正为民排忧解难、为民当保姆的概念。为什么有段时间,我们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对新加坡很感兴趣?道理就在这里。新加坡也是个东方文明国家。在新加坡,李光耀公开讲的那些东西都非常朴实,没有任何玄妙高深的理论色彩。他曾说过,新加坡所有的公民应面向全球去挣钱,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世界城市国家。人们要到全球市场去拼搏,到国际上去竞争,再把赚到的钱汇到家里来,如果累了就回家休息。政府负责把家管得好好的,治安、环境、公共服务都是世界一流,那么回家之后就觉得非常舒坦,而且家养孩子在这里也能够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服务。他讲得非常朴素,就这么几句话,就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的职能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奥妙都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仔细想想,有几个我国基层单位能体会到这些东西啊!我们有的干部习惯在理论上打圈子,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把自己摆到一个保姆的位子上去。反过来,比方说过去的利比亚、埃及,这些领导人的执政经验不丰富吗?不强大吗?都很厉害。一开始也许他们也把自己看成一种民众保姆的角色,但是长期执政以后就淡化了,慢慢地就变成主人了,甚

至反过来欺压人民群众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蜕变,他们的“保姆”意识在淡化,逐渐成了独裁政权,尽管历史上也曾办过许多好事,但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在所有的非洲国家中,利比亚的人均收入较高,社会福利是最好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我国,如民众从小学到大学免费,医疗也免费等,但人民群众仍然不满意。在这个问题上,以前我国不少人也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富裕了,政府合法性就会提高,福利好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这远远不够,民众要求政府的服务宗旨不能改变,要更好地体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保姆”角色。在这点上,“12345”公开电话在深层次上对所有的干部,特别是后备干部,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在为百姓解决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的服务意识。这种意识扎根了,再走上其他工作岗位的时候,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具体化了。

历史上,所有政权在更迭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开国的那些领导人不仅能力好,国家机器为民服务的意识也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开国的领导人都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他们对人民群众和自己之间关系的定位相对比较清晰,到了后面就会发生一代不如一代。所有政权的更迭都符合某种周期律,我认为影响和形成这种周期律的核心因素,就是政府“保姆”意识在退化,政府是干什么的没搞清楚,后面的一切质变都是由此萌发的。所以,改革也好,民主也好,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只是一种手段。政府真正的定位就是一个公共保姆,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才是根本。“保姆”的意识,“保姆”的能力,“保姆”的效率,是影响政权长期稳定、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之一。老百姓满意了,社会就稳定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认为能这样深入地去分析“12345”市长公开电话的服务机制,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就是要从这个高度上去认识“12345”电话的意义。

(七)

对于杭州市发展的四个品牌——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我写过《追求繁荣与舒适》一书,主要是围绕四个品牌展开的,现在已经是第九次印刷了。我认为:杭州只能走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人力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实际上与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企业家密集型和科技创新密集型模式等都是有区别的。杭州有众多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具备此条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让一切文化财富涌现出来,让一切文化人的积极性涌现出来。如果说我国改革起步发生在农村,就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继而是国有企业改革,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那么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把文化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阶段经济发展潜力的挖掘,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文化人的积极性能否发挥上的。中国制造要与中国创造结合起来,太需要像乔布斯这样对产品性能与质量精益求精的人,在文化创意上玩命的人。乔布斯开发的苹果系列,实际上是文化和科技完美结合,是艺术的创造。我国五千年文明不间断传承,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很早以前就想到杭州有这个优势,四个品牌都是围绕人力资本来运作的,都是为人服务的,尤其是对那些文化人。杭州所有的战略选择,都应该为中国式的乔布斯式的人物服务,因而才有了很多现在的软件网络产业。比如阿里巴巴,为什么诞生在这个地方?跟这四个定位是很有关系的。这四个品牌定位的所有指向,都是为了人才的汇聚与培育,为了人创意能力的培养、创意成果的转化、创意才华的发挥。

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某些反向调整的趋向,即后来杭州房价上涨得过快过高。房价过

高,人才的创业和居住成本就高了。比方说,乔布斯这些人为什么能兴起呢?美国加州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即所有人都可以在车库、住宅中创业,这样初次创业的成本就很低。我国没有公司可以注册在车库里面的法律。实际上,如果没有在车库里创业的许可就没有现在的硅谷,也没有乔布斯。因为所有的创新都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诞生成长而来的。创业在杭州,就是要围绕这些新理念展开工作,而房价太高则是与此矛盾的。记得我刚离开杭州的时候,住的房子才值4000块钱每平方米。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当时的房价是14000块钱每平方米。但现在全反过来了,北京的房子相对比杭州还便宜了。杭州比首都房价贵得多,并不利于人才创业集聚,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有教训的。所以房价一定要控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是住房一定要实行双轨制,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3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说有错误的话,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改革开放的成功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就是似乎市场能够做一切事情,所有的资源只要交给市场去配置就是最高效率的。但是市场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能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能解决穷人和富人比较平等地占有城市空间的问题。城市空间是种稀缺资源,初次分配应该公平分配,就像土地是初次的资源,任何一个政权上台都是从均地土改开始的。城市空间的再分配更要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公平化。住房双轨制不是一个坏东西,并不是把双轨改成单轨才是改革成功。住房体制改革30年来,走的是一条市场万能的弯路。大多数商品,像电视、电冰箱等日用品和一般性服务等,不能采用双轨制价格体制,过去的双轨制是错误的。但住房恰恰不一样,住房确实实在空间地理上是垄断的。既然是一种地理空间垄断的资源,市场是解决不了有效配置的,必须要采取双轨制的方法。我在杭州时提出,每年至少要造保障房100万平方米以上,我记得后面几任市长也坚持这个方案,听说意见很不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认为,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改革只是一种手段,公平地分配城市的空间资源才是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尊严地居住,才是改革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八)

还有一个大企业、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始终认为,真正有活力、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就像真正有战略指挥才华的将军都是从士兵开始的一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大企业能不能持续发展,就看它是不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所有成功企业的发展壮大,都是基于内生的机制,要为企业内生机制的形成创造条件。因为企业是个有机体,就像孩子成长一样,不能把两个孩子拼成一个孩子,那就成怪胎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史实已证明,所有有经济活力的城市,都拥有数量众多的小企业,而且这些小企业产权明晰,集聚成紧密合作的企业集群。在这个基础上,有一部分会成长为中等企业,又有一部分中等企业会成长为大企业,大企业再成长为跨国公司。合理的企业集群结构肯定是个宝塔型结构,小企业是大企业成长的沃土。

政府实际上应该为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提供空间和条件。我们有的人成为科技专才和大企业家,是与父辈的智慧分不开的。他们让小孩子吃得好,书读得多,多体育运动和实践锻炼,然后逐步成长为人才。小企业也与小孩类似。小企业要成长为大企业,政府就要在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方面,为新兴产业小企业的成长创造条件。因为只有新兴产业的企业,才可能迅速成长为巨人。在《追求繁荣与舒适》这本书里面,我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样的企业是发展

最快的,就是新兴产业。凡与网络经济、新能源、环保、软件 IT 等产业有关系的企业,往往是成长最快的。譬如,微软、苹果、谷歌等新兴企业和洛克菲勒、摩根大通等传统企业相比,前者仅有几年的发家史,后者却是百年老店,时代为前者从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大型企业创造了空间。如果思路上不转变,还想着当年洛克菲勒、福特的成长规律,那政府就错了,这样的政府就是不聪明的政府。正如保姆遇到新时代的小孩子,那喂养的方法就要不一样了,观念一定要转变。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网络经济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良策,一切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新办法都会形成巨大的商机,都可以诱使或者促使小企业转变成成为巨人企业。谷歌、Facebook 等就是这样诞生的。搜索引擎就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产生的。阿里巴巴也一样,马云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大概是十年前,我在飞机场偶遇马云,他和我说他要建一个社会诚信体系。我说你可以做,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他是什么麻烦?我说个人和企业诚信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公信力或政府公信力基础上的,因为最早的政府诞生就是一种诚信机制。最初,政府是由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仲裁者转变而来的,是决定农产品交易价格是否合理,所用的秤是否公正等等。政府最早的职能就是这样简单,就是中间人的角色。企业要取代政府是很难的。马云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建立这个诚信体系,没有成功,因为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和接纳。后来他设立第三方存管平台,先把钱存进去再看货,货收到后再打钱,这是对的。但是最近他公司内部的人又出了问题,因为内部人发现这个交易在不监控的情况下可以私下获利,这证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腐败。包括谷歌、百度都遇到过此类问题,就是内部人不诚信,对企业影响非常大。因为该类企业的建立,是为了解决社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的生命力就是帮助民众解决信息不对称,迅速捕捉到他们想捕捉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盈利。现在只要交了钱,企业排位就往前升,假李鬼在排位上排到了第一,真李逵倒是在后面,那就把为追求信息真实性而诞生的企业给毁了。我国很多此类企业,包括谷歌在中国的总部,这种理念还没有转过来。马云的思路是清晰的,但是里边的那些人不一定认真去践行。我可以肯定地讲,将还有很多此类企业都会面临此类悲剧。只要它们最大的收入是缴费排名,那就会要了企业的命。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企业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有生命力?为什么能从小到大,几年就变成一个超大企业?它们不知道这最主要是社会需求推动的,企业自己做的事又毁了企业赖以生存的社会需求,这是举起右手打自己的左脸,很愚蠢。我觉得这部分是由于许多现代青年人眼光不远大,抱负不广泛、不深远所造成的。

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有几个国内反社会分子在跳跳蹦蹦,或者说有国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而是在于我国的青年有多大的心胸。一个民族的青年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国家就有多少辉煌的前程。

(九)

当前社会对建设用地拍卖制度的合理与否和变革方向争议较大,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谁都不愿意讲。其实,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性分析的。国家当时为什么进行土地的招投标,其实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城建资金。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公正,房地产商用什么手段来获得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土地跟农村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城市土地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增值基本上是由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著作没有讲清楚,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这类问题,社会矛盾也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因城市基础设施投入造成交易成本的下降而打造出的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不能凭权力或凭关系。当

代许多大亨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少数房地产商占有有限的城市空间造房子就能发横财。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土地公开公正的招投标,通过价高者得,才是最公平的。它的确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其他一种制度能够取代它,至少至今为止还没有。有人说,这是一个在建设用地区分配方面最不坏的制度。只能是这样讲,它比其他制度坏的程度要少得多。西方历史上的土地分配最早是通过爵位分配,后来通过权力分配,还有通过关系分配,关系分配后来发展到依照腐败程度来分配,再后来就转变为通过市场来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不是退步,我们不能倒退到按照爵位或权力来分配。

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英国人霍华德,在一百多年前写了一本书——《田园城市:通向未来的变革之路》。他在书里写道:田园城市作为社会公平的载体,有空间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模式。在其管理模式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城市土地的地租收入应该归全体市民所有。英国土地是私有化的,但基础设施一投入就使得土地增值了,处于市中心的土地升值更快。而处在城市远郊区的农地,或被规划划定为道路或农田、公园的土地就不会升值。那么 CBD 的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因城市发展增值了,难道这个增值全部归少数土地所有者所有吗?霍华德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把这些增值部分全部收回来归全体市民所有。霍华德从土地私有制与基础设施的公众投入产出的巨大社会矛盾中,真正了解到土地价值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才能公平分配。他的这套理念比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后来英国的新城镇都是按他的理论进行建设的。说明西方国家进步的政治家们都非常清楚,城市土地的升值是由于公共设施的投入造成的,公共设施的投入是人民群众的钱,那么由民众的钱产生的土地溢价落到少数私人手里是不公平的,必须收回后再投入到公共设施里去,再投入到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方面去。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不能追求土地的高效益。这只是实现社会公平、人居环境改善的一种手段而已。由此可见,土地财政收入应专户监督,其用途应主要用于长期发展和社会公平方面,应比一般的预算内财政资金的用途管制更为严格。

第二,建设用地完全按照价高者得,会使土地的使用功能非常单一。为什么呢?因为商住楼开发获利最高,其他满足民生的多样化房产需求就会被掩盖了。此外,还会造成贫富居住分离的问题,如某建筑的外观和品质非常好,节能性也好,但里面住的全部是富人,社会公平就没有了。这些问题极大地考验当代决策者,影响社会的公平发展。再加上仅靠价高者得地,会促使地方政府决策者营私捞利。我在另外一本书里面讲到,现有土地拍卖制度最大的缺陷:一是社会公平,现有的拍卖制度影响社会公平;二是寅吃卯粮。这些如果不注意,可能要犯很大的错误。为什么呢?我国历史上,为了防止中央政权对地方失控,要异地五百里做官,防止地方诸侯作乱,几千年以来都是这样。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代,就是所有城市的主要领导都是异地任职的。异地做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短期行为,所关心的事情往往都是三年计划,三年计划之外的莫谈。在三年中,他们力求把土地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出来,以后的事情就不管了。那么西方呢?必须要本地人才有资格担任市长,而且市长的任职时间很长。芝加哥的市长任职十三年了,还说要超过他父亲的任职十五年。要当选市长,必须要有一系列限制条件。在机制上他们就不可能乱用钱。杭州的澳大利亚姐妹城市——堪培拉,曾是一位女市长,对杭州非常友好,也到杭州访问过两次。因为在体育馆建造的过程中,多花了两千万澳元,她被迫辞职,还差点坐牢。

第三,所有来自土地的钱必须要纳入预算,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些钱按照霍华德的设想应存入土地银行,重新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全部还给市民,为城市的可持续,为城市公共空间

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现在许多城市的领导人将土地出让金收入转变为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集体小金库”,或肆意用于众多豪华而毫无用处的形象工程,这些所作所为都违背了这个原则,有可能把最不坏的制度变成很坏的制度,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十)

关于城市的定位。改革开放以后,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服务业,再冠以“国际”实属“画蛇添足”。但是我始终认为城市的定位,应该从传统历史上单一的、清晰的定位,转向一个宽泛的、模糊的定位。因为城市定位实际上就是一个发展方向指引,方向多少度,不必很清晰。我写了一些文章,从我国实践和国际经验中得出这些观点。城市的定位问题实际上是一套理论体系,有旧理论和新理论的区别。城市定位只是初定一个发展方向,实际上城市的发展从来没有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也从来没有在原来既定的目标上非常清晰地实现。因为城市发展受各种各样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城市和城市之间也呈相互博弈和合作关系的,城市发展也是在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中自组织式演变的,带有随机性的。所以未来不在原有的延长线上,就是说未来是不确定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规划定位实际上只是一个大方向。为什么我在《追求繁荣与舒适》一书中,一开篇就讲到概念性规划?因为在快速变动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发展的。在全球城市相互作用中,找到城市自己的大概“生态”定位,且这种定位随时都应做一些微调,以适应外部的变化。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同济大学出版的。在这本书里面,我讲到了中国城市规划应该怎么改变,根据国际经验和规划自身的要求。对于城市规划,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理想的城市规划是百年不变的。领导人经常讲:规划要百年不变,要有权威性,要有科学性,要有刚性。你说这个不对吗?也对。对在什么地方?城市规划中的确有一部分内容必须是权威的,必须是刚性的,必须是百年不变的。但是绝大多数内容,应该是柔性的,应该是随机的,应该是充满应变能力的,应该是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如果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没有这两种刚柔相济、阴阳相互转化的概念,城市规划就成了一个器皿的外套了。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就是要随时准备捕捉外部所给出的发展机遇。所以城市规划既要有柔性,又要有弹性,这是二十世纪以后城市规划学家关注最多的内容。

但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规划必须要有足够刚性的内容。这些刚性内容体现在四线的控制上:比方紫线,什么概念呢?紫线就是把像河坊街这样的历史片区、城市之根、文化遗产和重点文物保护范围划定并保护起来。就像家里有一幅唐伯虎的画一样,要跟子孙后代交代清楚,这个东西是世代代增值的,而且体现了我们祖宗的成就,是传家宝,要强化保护。这样的地段要用紫线划定,里边不能拆不能修,只能延年益寿,只能镶牙式小修小补,不能拆毁了推倒重来。紫线划定区外面还有虚紫线划定的协调区域,就是要求建筑的高度和风貌协调。针对杭州来讲,西湖和河坊街必须要用紫线切实加以保护。其次是蓝线,蓝线就是明确城市的水域,运河、河流、湖泊、河岸之间的哪些地方要控制,城市的水源、泄洪道这些,都是蓝线的保护范围。蓝线,也包括海岸线,都应是刚性的法规管制的区域,谁都不能改变。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曾批评市政公用局在运河支渠闸北的河面上铺上水泥板盖了房子给职工住。我认为,占用河道盖房子完全错了,这个房子肯定要拆,尽管手续是齐备的,现在不拆以后也要拆。像这些水系要用蓝线保护,不能占用。第三是绿线,绿线保护风景名胜、公园和植物园,这些绿化带全部要用绿线控制

起来永远不能变。包括公园边缘地带,都不能去搞建设或损害,这都是公共资源,都是要严格控制起来的。最后是黄线,黄线是什么呢?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垃圾中转站、自来水厂用地必须永久保留,这些重大的公共设施,必须便民、亲民,为人民群众及子孙后代所用。省会城市市长的困惑之一,就是省里经常有领导打招呼,要将他们住宅旁边的垃圾转运站迁走。但迁走放哪里去啊?这不可能的嘛。因为这些是社区必需的城市基础设施,必须要有,每个小区都必须要有。这些用地,都要用黄线来控制。这四大控制线是城市规划中百年不变的内容,涉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特质、人居环境质量,城市空间的基本骨架、基本特色、基本定位,还有历史传承的文脉。这些是刚性的规划内容,在执行中要切实强化其严肃性。除此以外,规划其他的内容都是可变的,或依程序可以调整的,否则城市规划就没有弹性,就会因捕捉不到发展机会而落伍。因为市场是充满弹性的,随时在变化的。

(十一)

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是不是一种国有资产的流失,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这样看。第一,我们追求最优配置。因为任何固定资产都要最优配置,最优配置就是让资产进入产权市场,经过广泛的、公开的讨价还价,使资产向最有能力使用这些资产的企业家集中。那肯定不是原来那个厂长,原来那个厂长的能力已经被历史证明过了,肯定不行,对不对?就像现在农民说的,把土地集中在种粮大户手里一样。如某人不会种粮,自己的二亩自留地都歉收,其他农民会将承包地交给他经营吗?资产在向优秀的企业家集中的时候,资产质量和获利水平就会提高,结果等于全社会资产收益上升,国有资产也增值保值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第二,如果工人对这个厂长、经理班子非常信任,厂长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比方通过群众投票,证明这个厂长、经理很公正,有能力,他们就会选择他继续经营。另外,虽然有的厂长能力差一点,但群众认为人品好,可留任董事长,再公开招聘总经理,这种情况也可以。

第二种方式主要适用于企业技术性很强、产品专门程度很高的情况,资产技术性和专业性过高,在产权市场上买家就少,合理竞争难以形成。但资产通用性强的企业另当别论,理应公开竞争性转让。例如,当时每个局都办了房地产公司,市政府决定所有局办的房地产公司都不能内部改革,全部上产权市场公开拍卖,有些原来内部改制定价为200万净资产的,后来就变成了2个亿。因为房地产公司所有的资产都在土地上,作为通用性最强的资产,土地值多少只能由市场来定价,因而原国有房地产公司改制应将资产全部上市公开交易。当时杭州市区大概有几十家国有房地产公司,涉及每个委局和区,所有的国有企业,所有的党政单位,都有房地产公司,都应上市公开转让脱钩,不能内部封闭式改制,因为国有房地产公司的资产属性很简单,不像阿里巴巴那样,完全是虚拟资产。如果一个企业虚拟资产占多数的话,资产专属性和技术性太强,不同的经营者就会有不同的升值预期,企业资产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构成的,这种资产的专用性很强。资产有广泛性和专用性,专用性很强的资产在公开市场不能交易,可以让信誉良好的原有经营者去继续经营,如果工人信服的话。如果说,企业资产的可交易性很强,那必须上市。为什么国有的房地产公司改革必须要上市,道理和国有建设用地实行招投标一样,目的在于防止腐败和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处理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很多人会钻空子。财政部有一个原副部长朱志刚,就在这方面犯错坐牢了。他把国有资产评估程序搞成封闭化,自己贪污了上千万。国有资产变成了“唐僧肉”,随意低价卖给亲戚朋友分肥,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是惨痛的教训。

(十二)

我当了近三年的市长,觉得工作中最难的事情,就是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我们做任何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获得者。当这些利益获得者,不是私人利益,而是一些强大集团利益的时候,处置难度非常大。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去过河坊街,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老领导有意见,因为原来集体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树已经砍光,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6个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关系的,他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重新将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他们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记得有一次,中宣部部长来杭州视察,他们一百多个人“啪”地跪在部长面前,我就在旁边很尴尬。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以后,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了。当时在做河坊街设计的时候,请了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说你赶快给我重新设计一下,他说调查研究至少要一年半,我就开玩笑说,等你一年半规划拿出来的时候,我官帽可能就要没了。后来通过招标,三个月就把规划拿出来了,修复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时间:2013年5月22日

口述:毛玲甫——杭州市文化局退休干部

采访:高丹、黄琦峰

整理:高丹

(一)

我是1950年5月1日参加工作的。开始是在西湖电影院小卖部,做了3年。1953年,我被吸收为放电影的实习生,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1954年,我从西湖电影院调到了老的人民电影院,就在邮电路上的老的天香楼那边。一年以后,又调到拱宸桥的大众电影院。1956年,我被抽调到浙江省电影放映干部训练班去培训技术,时间是半年。当时基本上市文化局管辖的几家电影院都有放映员抽调去参加培训,名字叫座机培训班。这个省电影训练班其实主要是面向农村电影放映员的,但为了提高座机电影放映员的技术水平,也吸收了一部分城市影院的放映员,专门办了这样一个班。座机就是固定在电影院的放映员。学习的内容除了电工、放映机、扩音机,还有发电。这是因为虽然我们是座机电影院,但也可能去农村放映,所以要学习发电,那时候农村包括杭州郊区的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电。培训班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大众电影院。

1956年下半年,我被调到杭州市电影队。当时杭州市的农村电影队统一由省里管理编队,我们杭州市是7字开头。原来杭州市有4个电影队,后来余杭的几个电影队也并入了。我去的时候,杭州市一共有11个电影队。一个电影队固定在市区,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放映。还有一个电影队在当时的文教区,专门负责各个学校的放映任务。我一开始是到农村,主要是在今天的三堡、九堡、彭埠一带放映,加起来一共有24个放映点。50年代的时候,杭州市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到九堡要乘长途客车,农村的路也都很小。我们电影队是电影放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住到哪里。这24个放映点里,有的集镇或者农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半个月放一场;有的比较偏的、农民居住比较散的地方,就一个月放映一场。

当时主要放映戏曲片,比如《花木兰》《梁祝》,还有一些战争片和侦探片。农民最喜欢的还是战争片和戏曲片。有一次,我们在彭埠的一个小学里放映《花木兰》,那天下着雪,可是2000多个观众一个都没有走掉。在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就是一个电影,所以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是走十几里路赶过来的。我们的票价是3分钱至5分钱,一场电影能收入80多块钱,但清点就要花两个多小时,因为那时候用的都是1分、2分的硬币和纸币。

当时放映电影的条件比较艰苦,到山区放映更艰苦。我们放映电影时,晚上睡觉最好的就是住在农民家里,有时睡在学校的课桌上,有时睡在以前的庙台上,甚至有时睡在农村里放棺材的祠堂里。当时我们的吃也是这样子,今天在贫下中农家里搭伙,明天在供销社搭伙,后天在学校搭伙。所以我们叫“走千里路,睡百家铺,吃千家饭”。

我在农村电影队一直待到1959年,因为电影体制改了,我们原来合在一起的电影队都分散了。我回到太平洋电影院,带一个电影队,有一套放映机,任务是逢年过节为工矿企业搞文化生活放电影。1960年,我调到新华电影院当副经理。在这之前,我们电影队还放过临时的露天电影,在工人路、柳浪闻莺等地方,还有在一些大的居民区里。1963年,杭州市的电影体制又改了,杭州市电影公司撤销,经济上直接归省管了。市文化局成立了杭州市电影管理站,我被调过去,

这样就到了局里工作。当时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块牌子是戏剧电影科、一块牌子是电影管理站。电影管理站的主要任务:一是对农村电影放映的规划;二是定期组织农村电影放映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每年交流学习心得;三是搞技术培训。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我会放电影,就到新华电影院和前进电影院放电影。前进电影院在羊坝头那里,现在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又被抽去重建杭州市电影公司。1973年,又调到新华电影院任经理、支部书记。后来,又带队去了文化系统在桐庐的知青点。待了一年以后,正好是“四人帮”粉碎。到1977年,我就回到文化局,在政工组搞保卫工作。后来文化局体制逐渐健全,我到了保卫科工作。1985年时,我已经是人事保卫科科长了,又调到杭州越剧团当支部书记。当时是越剧团的领导班子有变动,我当书记,团长是杭州话剧团的一名导演,很有水平。当时看越剧的观众已经不多了,组织观众很吃力。剧团的生活也很辛苦,每个演员都打了铺盖,以剧团为家。除了主要演员可能找个好一点的地方住,其他演员都在剧场里面睡。当时剧团大概有四五十个人,经济效益也不好,甚至搞到工资也发不出来。我作为支部书记,主要就是做思想工作,有矛盾就化解一下。文化娱乐生活多样化以后,连电影观众都下降了,戏曲观众就更不要说了。这样两年后,我再回到市电影公司。过了一年,又回到文化局,然后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我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从放电影到管电影,最后是写电影,因为我还参与编写了《杭州市电影志》。

(二)

1971年,杭州市电影公司重建,主要负责杭州市影片的发行、放映、宣传和技术培训等工作,是市文化局的下属单位,之后就没什么变动了。以前县里的电影发行归省里管,由省里排片,杭州市只管杭州市里的。1992年,杭州市电影公司进行体制改革,改成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后,变成全面管了。县里也成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省到市到县,变成分级管理了。2003年,又转企改制为杭州电影有限公司,当时我已经退休了,但情况还是了解一点的。这个改制主要是由横店控股39%,另外的股份里主要是国有控股,个人也有一部分,但很少。当时电影公司原有的影院职工大部分都“一刀切”切掉了,可以退休的办退休,只留下少数在现在的电影公司。市电影公司主要就是新华、西湖、太平洋这3家电影院。改制后没几年,太平洋电影院也没了。

我们杭州市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基本上大的工厂都有电影队、电影场。那时候文化禁钢刚刚放开,观众渴望看电影,原来的七八家电影院就满足不了要求了。因此有条件的工厂都开辟了电影场,包括杭氧、杭钢、汽车发动机厂等等,都有自己的电影场,而且对外开放。这样基本上市区里普及了电影放映,放映点星罗棋布。这些放映点的排片归电影公司管,经济由他们自己管。后来企业改革以后,基本上都没有了。这之前由于电视的发展和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开放,这些工矿俱乐部放映单位也都逐步歇业了,到企业改制后就全部没有了。

1997年退休以后,我还筹建了一个放映厅,叫银都,是市电影公司办的。这个放映厅一方面是为工作看片造的。那时候新片上映之前,电影院的经理、宣传员、有关部门领导以及报社、电视台等都要先来看过的,叫审片,实际上是了解一下宣传怎么做,观众怎么组织,票价怎么定。放映厅就在平海路上,当时还是一个空架子,我前前后后搞了3年,一直到开张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离开。

(三)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电影主要强调宣传教育功能,通过电影来提高观众的思想觉悟。因此,电影公司要组织各种各样的电影周、宣传月、电影展览,来宣传、放映那些思想性好、艺术性好的影片。那时候拍电影也经常会有些献礼影片,主题思想比较突出,比如《党的女儿》《南征北战》等,这些电影我都放映过。虽然后来我不直接放电影了,但那时候机关干部逢年过节甚至礼拜天都要参加劳动,我主要还是放电影。还有工厂里逢过年过节有重点影片,都是由单位的宣传员专门到电影院订票,回去发给每个职工的。一场电影1000多人,一天要放六七场,特别是春节的时候。还有夏天,组织学生观看暑期电影。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电影基本上强调寓教于乐,通过娱乐来学习影片当中的先进思想了。有教育功能,但以娱乐为主了。90年代后期到现在,基本上是以休闲为主了,也不再通过电影来教育和学习了。

观众的构成也不一样了,以前是男女老少都到电影院看电影,后来随着电视、录像等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观众的层面发生变化。现在到电影院看电影的基本上是以年轻人为主了,小孩子就看一些动画片。老年人是很少了,我现在也不去电影院,就在电视上看看老电影。

现在的电影,比如说票价吧。原来很低很低,基本上是福利性的,每个单位的工会里面都有看电影的经费。那时候实行低票价,开始是一毛二、一毛五,后来两毛五,又到四毛钱,有了宽银幕电影后再加点上去。后来票价逐步放开,以前由省物价局、省电影公司定的,市物价局、市电影公司也可以定了,到最后电影院自己也可以浮动了。所以从票价来看,现在真是很高。我觉得首先是电影演员的片酬太高了,再加上电影公司要利润,电影院要利润,票价自然就高了。当然,现在的放映设备不一样了,电影档次提高了,成本也提高了。不过现在的电影也还是有它的消费群体和市场,观众的追求不一样了。

时间:2011年4月20日

口述:孔胜东——杭州大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交司机

采访:金利权、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于1982年11月参加工作,进入杭州公交客车厂,当机修钳工,一晃就是十年。应该说,那时候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早上9点钟上班,下午4点半下班。这十年中,我从普通团员做到了车间团支部书记。那时候我还年轻,认为作为一名团员青年应该从本职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就连打了3张报告,要求到一线去当乘务员。当时厂里的领导很关心我,但看我这么坚决,很感动,就同意了。

1993年元旦后,我调到28路车上当乘务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杭州公交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96年8月,杭州的公交车开始实行无人售票。原来紧缺的乘务员一下子多了出来,而驾驶员又变得不够了,我就开始学驾驶。到1997年8月,我学出驾驶员,回到28路,开始开车。所以,参加工作29年来,我先后做过修理工、乘务员、驾驶员三大工种,其中乘务员和驾驶员都是在28路上。这29年的经历,使我对做一名好驾驶员有很深的体会。在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热心、真心、诚心、爱心、耐心”的宗旨。我认为,在外国人面前我代表中国,在中国人面前我代表杭州,在杭州人面前我代表公交的形象。因为我们的乘客来自五湖四海,一个公交车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要用诚心去对待乘客,大伯大妈都是我自己的父母亲,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小孩都是我自己的孩子。

28路是浙大附中到浙大附中环线,下车的地方就是上车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在对面找车站的,所以我每次都会提醒乘客。这么多年来,老弱病残孕妇儿童都很喜欢坐我的车,甚至有特地在等我车的。很多大伯大妈从灵隐寺回来,把巧克力、糖、苹果、甘蔗、香蕉,一把把地塞给我,说是寺里烧香拜过的,保佑我身体健康、开车安全。我认为这是不能用钱买到的,说明你对老百姓好,他们对你也像对儿子一样。虽然我父母亲都去世了,家也回得很少,但是舍小家换来大家的幸福,我觉得很值得。有千千万万的父母亲甚至不认识的人,都在关心爱护我,所以我热爱我的公交行业。

(二)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1986年3月5日,团市委号召每个团员青年为社会做点好事或有利的事情,为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做贡献。当时我23岁,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就想响应团支部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来做宣传。通过一个月的调查,我发现杭城晚上没有修车点,自行车胎坏了也没地方补,只能踏着瘪胎回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设了共青团员义务修车点,在中山北路百井坊巷的四岔路口,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十点,风雨无阻。包括年三十晚上,1995年父亲去世,结婚的第二天晚上,我都没有落下,一直到现在整整坚持了25年,为市民义务修车25000多辆,不收一分钱修理费。

另外,从1999年6月1日开始,我在车上推出了免费茶水服务。每天早晨在家里用煤气灶、

电茶壶把水烧开,把茶叶泡好,带到车上,为乘客提供免费茶水。到去年(2010年)8月,用掉一次性茶杯36000多只,茶叶35公斤。后来因为创建“无饮食车厢”的需要,到去年(2010年)8月停止了。我还推出免费塑料袋服务,在每只座位后面都放了塑料袋,这样做既可以解决雨天乘客间发生的矛盾,又可以保持车内环境的整洁。后来,因为市里出台了“限塑令”,才取消了这个服务。我认为公交车有起点和终点,但是为人民服务永远没有终点,要活到老,学到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要把工作做好都是非常难的。

去年(注:指2010年)10月,杭州开展党员“争先创优”活动。我想作为一名党员,应该为缓解“两难”(行路难、停车难)做出一名公交司机应有的贡献,就推出了党员承诺服务。在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下班以后,晚高峰加班多跑一圈,为市民早点回家做出一点贡献。多一辆车,效果就很好,但这一圈因为堵车,时间很长,所以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比我们28路的其他驾驶员多奉献两个小时。跟义务修车一样,这也算一种奉献吧,是我对自己新的要求。另外,我的车厢卫生是自己搞的,我要让乘客到了车厢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干净。今年(2011年)我又提出一个党员承诺服务,就是“跑一圈,检查一圈(有没有可疑物);跑一圈,扫一圈;跑一圈,拖一圈”。这两个服务既是对我们公交公司的内部承诺,也是对乘客的承诺。其他几位28路的司机在我的带动下,也在向我学习。车厢干净了,乘客上来心情也会很好,这就是乘客的心理。所以,老百姓是否满意,是衡量我们党员的标准。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小事也是大事,乘客对我工作的支持就是最好的回报,学习和服务都是无止境的。

(三)

30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杭州城市、交通、公交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城东的建设、钱江新城的建设,还有下沙、临平、滨江的建设,变化都太大了。我作为一个老杭州人,感到很自豪,住在杭州,也感到很幸福。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不要说外地人,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都觉得要不认识了。特别是西湖的改造,大变样了,我越看西湖越美。还有运河,千年历史,拱宸地区原来很小,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原来我们28路,在汽车东站有个车站,后来改革开放,造了高架桥,所以这一站取消了。我当乘务员的时候,28路从市中心出了武林门以后都是郊区,没有黄龙体育中心,没有浙江图书馆,没有世贸中心,那一带都是田坂,所以我们的车一出武林门速度就很快;如今车在黄龙洞一带开起来比武林广场还要慢,人太多了,太繁华了。

这30年,市委、市政府对公交的发展特别重视。原来是没空调的车,而且是两节的有人售票车。原来我们的乘客只要挤得上公交车就满意了,现在要有座。原来的月票是贴票花的,现在都是刷卡,电子化了。公交车的档次也在不断提高。从普通公交车,改为空调车;从空调车没电视机,到现在有电视机,有卫星监控;从原来的汽油车,改为柴油车,后来再改为金龙气囊车,现在又改为电力混合动力车,更环保,更经济实用。公交员工的福利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原来公交司机纷纷跳槽出去,现在都要“开后门”才能进来。当然,跟社会上相比,年轻人还是比较辛苦的,收入只能达到中等水平。但是跟原来相比,我已经相当满足了,工资涨了很多。原来一个月休息不到1天,现在平均一个月有6天可以休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年年到公交公司来调研,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了便于市民出行,杭州市还为公交的最后一公里推出免费单车,老百姓也很满意,这都是实事,是发展。作为我们驾驶员,行车做到“礼让斑马线”“停车让人”,这也是以人为

本、和谐社会、品质杭州的体现。另外,萧山、余杭的公交一体化,使老百姓得到了更大的实惠。总之,杭州被评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真是名副其实,一点都不做假。还有我们杭州的治安环境特别好,外地人创业都喜欢到杭州来,确实名不虚传。

我是1992年4月14日入党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时候,我没想到党和人民会给我这么多的荣誉。我要感谢党和人民,把我从一名普通工人培养成一名党员,又从一名党员培养成一名全国劳模。荣誉成了我的动力,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快乐!

时间:2009年4月22日

口述:厉德馨——1983年11月至1987年5月任杭州市委书记

采访:任振泰、冯跃民、高丹

整理:高丹

(一)

我先讲讲杭州是怎样打赢农村四个“翻身仗”的吧。

1983年,我到杭州的时候,当时整个国家是短缺经济,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日常用品和食品几乎全都凭票供应,光票证就有几十种。凭粮票吃饭,没有粮票有钱也吃不到饭,没有牛奶、鸡蛋、水果、青菜、鱼。杭州人从来没吃到过活鱼,吃的都是死鱼,因为平时收购来的一点鱼都放在冰库里,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凭票供应一点,哪来的活鱼呀。我还没来的时候,省儿童保健医院院长厉裔华跟我说:“听说你要到杭州当书记了,一定要把我们孕妇、孩子的牛奶解决好哟!”可见解决牛奶问题多么迫切!我们市委、市政府召开“五一”座谈会时,市政协副主席江敦厚也反映,五月“断鱼腥”,从来没有过。这些都是杭州人关心的大事。我感到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关注民生。经济短缺,供应匮乏,工作从哪里着手?就是要深化改革,打好禽蛋、水产、水果、奶制品供应的四个翻身仗。农村改革我是驾轻就熟的,施行奶牛承包、山林承包、蔬菜地承包、商品粮继续供应,放开禽蛋、水产、水果、奶制品的价格。这一承包,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这件事卓有成效,一年后,杭州牛奶供应不要票了。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改革承包到户,就解决了。

总之,这四个“翻身仗”推动了农村的改革,满足了城市的需要,解决了民生问题,既符合中央的方针,又满足杭州人民的要求。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就市委、市政府这两套班子来说,起步起得很好。尽管我们这届班子大多数人是“外来户”,但加强同杭州人民的联系,取得杭州人民的信任,是头等大事。

(二)

再说改变杭州面貌。杭州主要是明清的建筑。因为元军入杭州,一把火烧光了地面建筑,南宋的东西基本上只剩下一些遗迹。后来都是明清的建筑,建得很低级,砖墙很少,都是板壁。再后来人口增多,乱搭乱建,房中有房,院中有院。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乱来,见缝插针,“到处开花”,全是违章建筑。垃圾乱倒,污水横流,环境极差。当时我们考虑,要改变城市面貌,首先要还湖于民,拆旧还绿,把西湖周围的旧建筑变成绿地。过去西湖被旧房子挡住了,走到西湖边也见不到西湖,老百姓会满意吗?游客会高兴吗?“还湖于民”这个口号实施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口号,历届市委都是按照这个方针办的。

对环境的保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了环境保护的意识,比如建四堡污水处理厂、天子岭垃圾填埋场。这两个项目当时就全国来说也算是早的,说明我们这些人还是有点眼光的。我们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的,不容易呀!

杭州的城市破烂,怎样突破呢?中河、东河治理涉及上万户的拆迁,还有不少企业,但没有一个人反对的,那时候拆迁是改善生活,不实行过渡,是房子等人,而不是人等房子。在朝晖、艮山

门等3处地方先造好新房子,让拆迁户去挑选。还有钱塘江与西湖、与运河沟通工程,这两大工程一改造,就把杭州的破烂面貌改造了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建设,又是改造,解决了旧城改造的问题。应该说,杭州改变破烂面貌,就是从这两个工程开始的。

(三)

说起交通,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环城西路、虎跑路、体育场路路况很差。保俶路是什么路?一下雨,车子就不能走了,到那边就熄火。省政府在的那个地方,省政府领导住的那个地方,一下大雨,就不能走。还有虎跑路,一下雨就漫水,车子根本无法通行,因为是当时上钱塘江大桥唯一的路,除了杭州人,连温州人、金华人都抱怨。我们下决心要把这条路修好。搞这个工程用的是杭州自己的劳动力,资金来源三家凑,中央出50%,省里出25%,市里出25%,中央的全拿回来了,省里不肯出钱,最后杭州还赔了钱进去。后来中央检查拨款的使用情况时,一致认为:财政部给杭州的钱用得都比较好,都很注意节约,该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虎跑路修好后,老百姓都是交口称赞的。

(四)

杭州市的商业怎么改,怎么发展?也是我们这届市委考虑的大问题。我们来之前,商业只有一个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商店。当时的小吕宋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在杭州,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是不对的。在这个方针下,杭州商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商业繁荣不繁荣,是城市繁荣不繁荣的标志。我们首先从商业改革试点开始,在解百、天香楼、楼外楼3家搞试点。新建商店吧,开始还建不起,只好先从老商店的“涂脂抹粉”着手,这个钱是向财政部要的。接着就是新建百货大楼、工业大厦(注:后改名为杭州大厦)、国际大厦等商业设施。应该说,商业这篇文章,我们做得比较早。那时我们提商业,许多人还没有这个概念,发展商业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定得比人家早。大家都在说,当时大办商业的能有几家?当然改革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楼外楼就很成功,天香楼就不是很成功。成功与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当初改革的思路是对的,尤其在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方面是成功的。

(五)

一开始我对工业企业改革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怎么改,完全靠自己摸索。杭州工业企业改革如何起步,当时上面没有政策,只有给广东省、福建省的特殊政策。除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口号,其他没有任何东西,那怎么办?我们就抓试点,没有办法自己找办法。这个办法从哪里来呢?从实践当中来。先向人家学习,哪里有好经验就到哪里去学。1984年,我带队到广东、福建去学习参观,学习人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在福建参观福日公司,这个电视机厂是中国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到那里面看看,真是一个大课堂,大开眼界,深受教育。工厂有条不紊,秩序非常好,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人随地丢烟头,你进去也没有人跟你搭腔,工人都在埋头生产。福日公司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现代化企业,我认为企业改革就要从学习福日公司入手。这些现代化的企业走什么路,今后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应该走什么路。我们还看了万门程控电话,

在福建也是全国第一家。考察回来以后,又组织了中药二厂、电视机厂去参观。他们回来后提出一个方案,当时市政府批准的有两点,我记得很清楚。一是实行效益工资,产值与效益工资挂钩;二是破“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浙江破“三铁”,在杭州中药二厂首先实行,工业企业改革由此起步,逐步推广,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在“破三铁”方面,冯根生是很成功的,还有电视机厂也实行了。这两个厂开始为员工提供每天一顿免费午餐,当时效果不错,也一直坚持到现在。

杭州中药二厂在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原材料都由市医药局供应,产品全由他们销售,别的药厂也一样。我要他们闯关,但多次碰钉子,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甚至争论起来。医药局理直气壮,坚决不同意放宽政策,认为一放就乱。我忍无可忍,同别的同志一商议,决定撤销医药局,解放制药厂。然后怎么办?找原料自行采购。从那时起,中药二厂才能到东北去采购人参,才能在省内采购蜂蜜,走上市场化道路。当时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是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阻力重重,没有一点冲劲就会失败。

乡镇企业的改革,我们选了万向节厂。当年我到万向节厂去,同鲁冠球交谈。我问他:你认为农民最高兴的是什么事情?他说得很简单,说第一件事是土地承包到户,人人有饭吃;第二件事是发展社队企业,人人有钱花。我被这两句话吸引住了,觉得他不是一般的农民,一般的农民不可能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表达农民的愿望和憧憬。万向节厂当时的状况十分可怜,但鲁冠球十分努力,把全国同行业的国营企业“打倒”了几百个。有一次我们市委几个领导到万向节厂去视察,刚巧一个美国商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参观。当时鲁冠球很为难,因为钱塘江北岸竖着个牌子,写着“外国人到此止步”,而万向节厂在南岸,这样他们就无法越过去参观。我们几个领导商量一下,当场拍板让他们来,手续当天就办好,万向节第一次走向世界。当时销给美国一个公司3万套万向节,现在万向把人家厂都收购了。事后,省公安厅厅长夏仲烈对我说,阁下这一冲,省委、省政府才决定把所有的这种牌子统统拔掉。不顶风破浪,哪有对外开放。

1982年搞承包,1983年兑现奖励,有王星记扇厂、万向节厂等。当时财政部说不许兑现,有的呢,是兑现了也不敢拿。事情一直反映到中央胡耀邦那里,我们说“一定要兑现,说话不算数,等于放屁”。鲁冠球就用这个钱办了个小学,还给在厂里工作的大学生买了台电视机看。王星记厂也没拿,那时候人的观念都比较规矩。

当时推进工业企业改革阻力是很大的。工作午餐不许搞,企业不许动,怎么办呢?我给副市长顾维良说,别的厂可以不搞,试点的两个厂一定要搞,后来还是把它坚持下来了。后来搞企业机构改革,规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厂长,我听到这个规定就觉着不对劲。当时省委组织部在“杭丝联”搞试点,一定要厂长下来,说因为厂长不是大学毕业生。100余名技术人员一致反对,愿意把自己的文凭送给厂长。我也支持技术人员的意见,不赞成换厂长。我认为不能硬换,组织部搞试点的人对我很有意见,说中央规定了大学毕业生才能当厂长。我说,也有个别的,没有大学文凭,难道一定没有大学生的本领?最后,中央组织部终于同意了 this 个意见。当时改革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不是冒别的风险,是冒上级的风险,你不冒一点风险,要改革成功是不可能的。

(六)

旅游业从来都是杭州的一大问题。在我们来以前,严格地讲,杭州没有真正的旅游业。西湖山水很吸引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很好,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是当时杭州没有旅游业,旅游

没有被当作一个产业；杭州也没有宾馆，只有招待所。杭州旅游业的兴起，应该说，开始于我们那一届市委、市政府。

第一，我们一下子建了3个宾馆：黄龙、新侨、友好，都是合资兴建的。没有旅馆，旅游业无从谈起。当时在3个宾馆中，黄龙饭店是龙头老大，设计得特别漂亮，方案是书记办公会上讨论的。当时我们没有钱，建宾馆哪有那么容易啊！3个宾馆都是利用外资建的，我们没有出什么钱，我们只出一块地皮，就建起来了，真可以说创造了奇迹。那个时候我们两手空空的，建了3家宾馆，后来又收回来华侨饭店，才开始有了杭州旅游业。

第二，旅游业兴起的另一方面是整顿杭州的景点。西湖很好，但城市一直很破烂。于是市委下决心，搞环湖绿地工程，还湖于民。这个事对当时的杭州来说，震动很大。那时候没有钱，无法对一些单位和个人进行补偿，让他们搬迁的确有点难。

第三，实施西湖引水工程。西湖当时是死水一潭，夏天发臭，冬天发绿，金沙港还有养猪场。西湖引水工程那么大，我们只花了1700万元，钱是由国家环保总局出的，同时还建起了太子湾公园。这样既改变了西湖水质，也美化了环境，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第四，杭州旅游业发展和文物保护，建了4个博物馆，对丰富杭州文化内涵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我和杨招棣几个人到北京旅游会上据理力争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是我们与苏州争，国家旅游局批准建在杭州。茶叶博物馆，人家没有想到的东西，我们先行了，也落户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这是杭州特有的，当时我们刚发现南宋官窑。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现在还在，包括胡庆余堂的古建筑都一起保护下来。现在看来，我们要建有杭州特色的，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样才能吸引游客。还有园林文物合一，从历史上到现在，没有哪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只有杭州。我们设立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把园林和文物两块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人为地把它们合在一起，而是根据杭州的实际情况定的。其他地方有文物但无园林，也有园林的但无文物，而杭州这个地方的文物几乎都是和园林交融在一起的，比如灵隐的北魏石刻等，这在全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20多年过去了，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杭州旅游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七)

我们先后建了少年宫广场和武林广场。这两块地方是过去斗“走资派”的地方，杭州人都知道的地方。当时全国广场文化兴起，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乐趣。我们从福州回来以后，下决心建广场。不久就建成了，在1984年国庆节开放。这两个广场建成后很得民心，每天有上万人到广场去活动，晨练的，游玩的，读书的，开展各种活动的都有。虽然花钱不多，却成为杭州市民向往的地方，这在全省我估计都是带头的。还在武林广场搞了个雕塑，这里面有一件事现在很多人不清楚了。喷水池里的雕塑是有寓意的，外面有5个人吹乐器，里面有3个人在跳舞，那个叫“五三三五”。从外面往里数是“五三”，从里面往外数是“三五”，而且以“舞”谐音“五”。为什么叫“五三三五”呢？是因为杭州是1949年5月3日解放的，而雕塑建设的那年正是杭州解放35周年。这个寓意由于宣传得太少，杭州好多人都不知道。现在我把它揭秘，可以使更多的杭州市民去欣赏它，可以增加更多的情趣和理解。

当时“文化大省”“文化大市”“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话一句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大”这个概念，我们只办了一些具体的实事。比如杭州市从1957年以来，从未开过文代会，1987年我们就开

了。我在会上做了《措施与希望》的报告,广为流传。后来被中央宣传部的通讯全文刊载,引起了全国轰动。那时候提出文艺工作怎么搞的人几乎没有。我在报告中讲到,要对文艺工作采取10条措施,并提出几点希望,与会人员听了都十分激动。在硬件建设上,我们把杭州的“大世界”(中苏友谊馆)改建成杭州文化中心,共耗资800万元。当时建这样的项目可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别的地方都没有,杭州是全国第一个建文化中心城市。当时市里的几个文艺团体,像杭州歌舞团、话剧团,还有3个越剧团等,都建立了团部,然后又造了宿舍。歌舞团还搞了排演厅和剧院,而且还搞得不错,现在出了不少人才。有一次,当时的(市)文联副主席杨培泽碰到我讲:“我们文联的日子现在好过起来了,当年你把石屋洞那里的厂给了我们,现在我们在那里盖了四星级酒店,已经成为‘文艺之家’了,什么时候请你来看看。”

总而言之,我们那一届市委、市政府还是有些事可以记忆的,不是碌碌无为,是有所作为的。

时间:2011年1月14日

口述:叶文玲——当代小说家,曾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采访:贾大清、李忠民、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是1942年底生的,今年68岁,调到杭州来的时候是40多岁,写过很多关于杭州的作品。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文学,从能读书开始就喜欢看书。最早发表作品,是13岁时在玉环县办的小报纸《玉环报》上。我经历过方方面面的事情。经历就是阅历,是一种财富,丰富的经历可以增强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要不怎么能写出那么多作品。当然我自己也比较勤奋,但我去过的地方也很多,很艰苦的地方我都有过经历,所以才都能写下来。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出了1卷到8卷的作品集,现在已经出到9卷到16卷了。

杭州离我的故乡那么近,我对杭州的感情不言而喻。我小时候读书很好,读书从来都是第一名。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我们那里最好的黄岩中学。但是因为哥哥在复旦大学被打成了右派,我也受到了影响。那时候我才15岁,读了一个星期的高中,就被告知不能读书。这在当时讲是件坏事情,因为我想读大学的理想一下子破灭了。但从现在来讲,经历成了一种财富,使我很早就进入了生活,从当农民开始,当小学教师,到当工人。我正式调去从事写作,就是从工厂里调出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书都不能读了,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惋惜。但我这个人很有毅力,尽管不能读书,但碰到书我就看,这又养成一种很好的读书习惯。后来我熟悉和认识的,都是看书看来的东西。后来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注:今浙江传媒学院)创办的时候,我把自己保存的很多书都捐给了他们。对这种事情,我很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大姐大我10岁,1949年到的杭州。1958年的时候,我在《东海》上发表了小说《我和雪梅》,写两个小姑娘怎么参加农业劳动,写得很简单朴素,但是很有感情。当时我大姐就在杭州工作,她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了《东海》的目录,看到了我的名字,就写信来问我。我这才知道,脸上还带着泥巴,就马上跑到文化站上,翻出来看。对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那时候还发了40块钱稿费,我永远都记得。后来,我经哥哥介绍结婚。1963年,跟着丈夫到了河南,在工厂里当工人。1983年的时候,我就想调来杭州,当时我在洛阳,河南文联不肯放。1986年夏天,在河南度过了整整24年的我,终于调回故乡浙江,在省文联担任专业作家,从此定居杭州。

(二)

杭州陶冶了我的艺术个性,也培育了我丰富的创作灵感。关于杭州,我专门写过这方面的作品,在文集里都有。马可·波罗赞誉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这个评价极为精确。我喜欢杭州,是毫无疑问的。对杭州来说,我印象最大的就是她的变化。尽管我不是杭州人,但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也应该是个杭州人。身为一个杭州人,是我最大的幸福,哪个地方都不能跟杭州比。全国各地我都去过,大一点的城市基本上都走遍了,但我永远都想要回到杭州。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还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很多地方都邀请过我,但从感情来说,我还是选择了杭州。

除了夏天这两个月太热以外,其他地方没有一个能超过杭州的。1983年时,我就想调来杭州,当时我曾经回老家一个月,写了对老家的感觉与对杭州的感觉。我第一篇写杭州的作品叫《道不尽的杭州》,就收在了文集里面。其他跟杭州有关作品的还有写西湖的,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份,我把以前写的跟现在的感觉合起来,又重写了一次。在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写意浙江》里,收录了我的《道不尽的杭州》《乌篷摇梦到春江》《美韵无限千岛湖》《醉桐庐》《悠悠古运河》《无言新安江》等描写杭州地区山水文化的作品。

我觉得,杭州之美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媲美的,杭州什么都有,山水、文化和树,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的树。好多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描写杭州的树的作品。杭州的城市建设发展也很快,历任领导都很有作为,比如对老房子进行外立面整治,建设钱江新城、西湖文化广场等。杭州的绿化也做得很好,我经常出去散步,看看满眼的绿色。我经常想,不管是谁,能到杭州来,那真是太幸福了。能到杭州来工作,哪怕是做个普通的市民,也都很幸福。我现在正邀请作家莫言到杭州来,杭州市如果能把各种优秀的人才都请过来,那就真能成全世界第一了。因为这么好的山水,这么好的文化,要靠人才来传承下去。现在,杭州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就是交通比较拥挤,这是最大的缺点。不是人最多,杭州就最好;而是城市最优秀、环境最优美、文化最有影响力,杭州才最好。很多画家都愿意到杭州来,还有作家,为什么喜欢杭州?就是因为杭州环境好,有好的人才政策。杭州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好,而不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对交通拥挤之类的缺点,要早点想办法去解决,现在有了改变,但还是太慢了。

(三)

我给浙江大学设过一个新叶·广发文学奖。1998年,浙大聘请我为兼职教授,不是因为我有名,而是因为我给浙大的学生上过课。那时我正好出了1到8卷的文集,有10多万块钱的稿费。在十多年前,这笔钱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想圆个上大学的心愿,就把这10万块钱拿出来,想为学生做一点事情。他们有了作品,如果能得个奖什么的。我就想找学生里面写作好的,挖掘新人,作为奖励。当时我把钱放在广发银行,去取钱的时候遇到行长,他也很感动,马上跟行里商议后,给我增加了15万块钱,分5次投入,每年赞助3万元。我每年给学生颁一次奖,到去年,正好有10次了。这是从1999年开始的,除了前两年我生病的时候。这个奖在当时,在全国作家里,我是第一个。这是我的理想,尽管钱很有限,但我觉得要做有影响的事情,起到影响下一代的作用。

时间:2010年10月20日

口述:卢文舸——1988年10月至1992年1月任杭州市市长

采访:贾大清、李忠民、蔡建明

整理:蔡建明

(一)

对一个省级以下城市或地方来说,政府领导人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国家层面上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要国家层面上的路线方针政策定了,大局就已经定了,地方上想左右什么是很困难的。但城市政府也不是无事可干,如城市规划。如何通过立法等途径,保证好的规划得到实施,对后续肯定会有影响。

1988年12月12日,市人大常委会任命我当杭州市代市长,上任后我在市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贯彻落实中央治理整顿的精神,会上我做了讲话,有人说是我的“施政纲领”。我的讲话分三个方面:一是贯彻中央精神,要在治理整顿上下狠心;二是调整产业结构,要在加强改革上花力气;三是增加有效供给,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做文章。第一点是对中央决策的表态,第二点、第三点才是我真正想讲的。我认为关于治理整顿,当初各地在贯彻中央决策上是有缺陷的。当时流行一句话:“下!下!下!砍!砍!砍!”就是对工程项目一刀切地进行否定。有次省里开会,省委书记听了11个地级市领导的汇报,问大家如何看待治理整顿这个问题,我最后一个发言。当时我就说,1988年的物价飞涨,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起的,把总需求压下去,是在经济停滞的状态下搞治理整顿;我们应当适当控制总需求,大力增加供给,用发展来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二)

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多的是结构调整,因为杭州市经济是负增长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丝绸工业。丝绸从种桑养蚕到缫丝,都是低附加值的产业,缫丝业必然要被整顿掉,蚕桑业向西部分发展成为必然趋势。调整低端行业,加强高端行业,就要改进印染、织造技术,当时的织造技术主要是从意大利、日本引进。而丝绸业的附加值主要来自于后期终端产品。丝绸公司成立了织造研究所,以韩国浆干织机为基础,搞适合国情的浆干织机。我主张丝绸公司与院校合作,当时是与杭州丝绸工学院合作,研究出了计算机调色和自动制版技术,解决了传统手工调色会出现色差、颜色不正等问题。有个国外的公司提出要购买我们的软件,开出了120万美元的价格。当时大家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开多少价都是不应该卖的。杭州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牢固建立在质的提高的基础上的,也是基于杭州市的城市定位上的。

(三)

80年代初,杭州搞过一个城市规划,上报国务院批准。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否则会带来城市病,这是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能避免的。当时规划的城市(市区)规模是到2000年人口105万,用户籍标准来控制城市人口。实际上我到杭州时,杭州市区人口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主要是靠产业,产业规模控制不了,要想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是很难的。人口素

质也是由产业的层次来决定的,产业层次低,用工素质低,整个人口素质高不了。从控制人口规模的角度,杭州也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当初是想把杭州搞成精致、文化水平高的城市。1989年春夏之后,杭州的财政被逼到墙角去了,“左”倾思想很严重,改革开放处在停滞状态,那种气氛是很难受的。

我在任时提出城市规划要启动修改,原来的城市规划市区东面严严实实守住铁路线,杭州没有发展的空间了。西边、北边是余杭的,三桥、四桥那边的滨江区块是菜地,是杭州的菜园子。那可是杭州未来的浦东啊!老城区要腾出空间来发展商业、文化产业,制造业要外迁,所以要扩大市区面积,向东发展,向铁路东面发展,向菜园子发展。搞了下沙的经济开发区,当时叫台商投资区,很多场合叫台商、外商投资区。跟国务院开放办沟通,答应我们适当的时候可以换牌子。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机会就来了,但当时确实是硬上的,包含着杭州向东发展的意思。另外,还搞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杭州市的开发区建设奠定了基础。

我在任时间不长,主要做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城市规划——向东发展两件事。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当时还想把杭州搞成博览城,以博览带动经济发展,种种原因顾不上了。

时间:2010年10月15日

口述:冯根生——原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访:贾大清、阮关水、蔡建明

整理:蔡建明

(一)

我今年77岁了,8月份市里让我退下来,现在已经宣布退休。我工作了60多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杭州,工作在杭州,是杭州发展的见证者、经历者,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经历者。我直接参与了杭州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发展过程。

先讲个真实的故事。在2002年7月全市“工业兴市”大会上,杭州市政府决定奖励鲁冠球、宗庆后和我每人300万元,这对企业家是一个直接的激励,可以讲在全国没有过,也是轰动全国的。本来我们准备全部捐掉,一分不要。这是鲁冠球提出来的,他和宗庆后在商量(这个事)。大会结束后,王国平书记、茅临生市长请我们吃午饭,几个副书记、副市长也一起,我们三个就在商量捐钱的事。鲁冠球对我说:“大哥,你不要捐,国有企业没有钱的。我和宗庆后捐掉,捐给下岗职工成立一个基金会。”鲁冠球比我小11岁,宗庆后也比我小11岁,他们叫我“大哥”。我说:“老鲁啊,你不是捉弄我嘛!你们两个捐掉了,明天报纸见报了,就会说冯根生真小气,所以国有企业搞不好。我再穷也不稀罕这300万。你们捐我肯定也捐,讲好了一起捐。你们两个捐,我不捐,这个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争论被市长茅临生听到了。他就问:“你们在争论什么?”我们说,准备把奖励的300万元捐掉。他说:“这个不能捐,捐了就是给杭州市政府脸上抹黑。今天奖励给你,明天又回到市政府口袋里,这不是作秀嘛。绝对不要捐,要捐你们企业有钱可以捐。这个钱是给你们个人的,特别是给老冯去买个别墅。”茅市长态度是很严肃的。既然这样讲了,我们就不捐了。下午在新侨饭店二楼开新闻发布会,到了100多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问:“你们每人拿到300万元之后,能不能告诉我,想要圆一个什么梦,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回答。”第一个问鲁冠球:“鲁主席(他是董事局主席),你想圆一个什么梦?”鲁冠球回答:“我要为杭州人民造一辆汽车。”他的梦是要为杭州人民造汽车,大家为他鼓掌。第二个问宗庆后:“宗董事长,你想圆一个什么梦?”宗庆后还要干脆,不假思索一句话:“我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大家也为他鼓掌。第三个就问我:“冯总,你想圆一个什么梦?”问的口气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即兴发言,不能说无可奉告,也不能虚构。要圆一个什么梦,就是你最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是吧?他们都讲得很干脆。我就说:“1972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我原来是胡庆余堂的一个车间主任。后来这个车间变厂了,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胡庆余堂为第一中药厂。我随着车间一起升格,当了厂长。18万元的净资产,190个工人。什么厂长?实际上是请了一个保姆。我的‘东家’关照我,你一定要把这个婴儿带大。这个婴儿先天不足。那时候是谁家工厂在冒烟,谁家的‘走资派’就在走。我原来不是‘走资派’,当了厂长就变‘走资派’了。生产也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是个新厂,连家具也没有。我省吃俭用,把这个婴儿带大。这个婴儿长大之后赚了很多钱,但他是国家的,我还是个保姆。我想圆一个梦,恳请我的‘东家’让我这个老保姆好休息了。我把这个婴儿带大了,这个婴儿也可以自己独立了,能去闯了,有没有这个保姆意义不大了。我的‘东家’说,你这个保姆还可以继续管

理这个长大以后的婴儿,继续当下去。我无可奈何地讲一句话,我只能当一个国有企业的终生保姆。”这样一过又是8年,到今年8月总算让我退下来了,可以讲我的这个梦总算圆了。我们三个人的梦都圆了。鲁冠球的汽车已经出来了——电瓶汽车,他有这个能力去造一个汽车城,他为杭州人民造一辆汽车的梦已经圆了。宗庆后不但成为杭州的李嘉诚,也已经成为中国的首富,成为中国的李嘉诚,这个梦圆得更好。我到今年8月梦也圆了,老保姆好休息了,让我过几天夕阳红的生活。再不休息的话,我连夕阳红的生活都没有了。什么叫夕阳红呢?六七十岁老年人的黄金时期,带着孙子带着老婆去旅游,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们的梦都圆了,就得出一条结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结局完全不一样,圆的梦都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弊病在什么地方。民营企业,他创造的财富、付出的心血全是他的,亏了也是他的。国有企业付出的代价说实在比他多得多,压力也多得多,最后全是国家的,你无非是个保姆。作为一个经营者,我一直在思考:国有企业厂长和民营企业厂长都是人,他(民营企业厂长)轻松得不得了,因为他亏了也是自己的。国有企业搞得好,是政策好,搞得不好,是渎职啊!我这么多年扛过来了,拿的退休工资也就3000块钱。当然我无怨无悔,毕竟对这个企业的付出是看得到的。交给我是18万元的净资产,37万元的总资产。现在有几十亿元的总资产,光一个青春宝就有二十几亿元。青春宝集团下面有几十个企业,都是国家的。我无怨无悔地付出了一生,尽管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像民营企业家一样拥有财富,但社会已经给予了肯定,这是用钱买不到的。这里要讲的,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因为机制的不同,结果完全不同。这一点经过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已经逐步看得出来了。

(二)

我要是有文化的话早就想写一部回忆录了,这个回忆录国外是没有的,只有中国才有。我是解放前的学徒。小学刚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等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书包到胡庆余堂去当学徒。旧社会老板收学徒,要求14岁到15岁,16岁算最大了,再大他就不要了。这是有道理的。十四五岁是最要学东西、长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学好就好了,学坏就坏了。这个时候是长进的时候。16岁以后就定型了,十二三岁呢又太小了。现在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里4个兄弟姐妹,还有外祖母、祖母、父亲、母亲。我家是中药世家,祖父是胡庆余堂第一代工人,我父亲是第二代,我是第三代。现在我的大孩子在这里当总裁,是第四代了。本来想有第五代,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也需要。可我的孙子28岁,不愿意做这行,看来第五代要不可能了,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变得真厉害。实际上一代代传下去,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有什么不好?我当学徒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早晨5点起来,晚上最早10点睡觉,半夜有人敲门抓药,还得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一年365天,也没有一天休息。旧社会3年的学徒,实际相当于现在9年的时间,就叫你学基本功,越苦越能锻炼人。为什么我当厂长之后,遇到各种困难都不会低头,这跟旧社会的学徒生涯是有关系的。3年学徒期满之后,我什么困难都经历过,这培养了我的毅力。那时候胡庆余堂100多人,年纪都比较大,我最年轻。我褪过小毛驴的皮,做阿胶;煎过3年药,凌晨1点起来,早上9点钟送出去。接方送药,什么困难工作都是我去做。

1960年,我二十四五岁,当车间主任,那时是很少的,又入了党。那时候工厂就从市区搬到了这里,一共有3个车间,我们是制胶车间。这里最大的树都是我种的,有人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我在感叹,我自己种树自己乘凉。50多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我的心血;这里的每一幢楼,都是我亲自参加建的。有付出的劳动,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现成建好搬进来,你去当老总,是不会爱惜的。这种时代当然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可能去建,也不允许建了。但那时候都是自己建,哪有什么建筑队。到1966年,胡庆余堂来了一个书记,是从浙大调过来的。他看中我成分好,就把我调过去当人事保卫科长,现在叫人事部经理。我的成分是全厂最好的,三代工人,从小当学徒,不可能是特务,也不可能是叛徒。我是那年3月去的,去了3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个人首当其冲。当时批斗“保皇派”“走资派”,书记、厂长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的“亲信、走狗”。1966年11月,北京开始破“四旧”(注:实为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开始的),接下来杭州也开始了,灵隐寺都要去烧掉它。胡庆余堂也同样,一批造反派要烧,要拆掉。我这个保卫科长没有权了,但位置还在,每天坐在那里。胡庆余堂一旦毁掉就没有了,所以我动员了师兄弟一起保护它,白天晚上地保护,睡觉都在厂里,就怕他们来烧。他们出来,我们也出去,争执起来,他们也动不了手。由于这个原因,胡庆余堂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一个奇迹,“文化大革命”中一点也没受破坏。后来我被指成在幕后指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把我揪出来批斗,让我下放劳动,去当了两年装卸工。1968年,恢复了一批成分好的人,我重新回来当车间主任。这时3个车间合并了,不叫车间,改叫连队,军事编制,一个连就是一个大车间。

到了1972年,那也是动乱的年代,杭州当时的市长(注:时称市革委会主任)叫王子达,他来车间看了看。说实在的,当时的车间比作坊还要落后,没有一条水泥路,全是黄泥路,木结构的房子。过了几天,经市政府研究决定,这里变为厂,成立杭州第二中药厂。当时归杭州市化工局管,化工局下面48个厂,我们这个厂是最小的。100多人,没一分钱流动资金,叫我当厂长,难啊!说实在的,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升格为厂以后,我们自立门户了,要自己发工资了。胡庆余堂没给我一分钱,国家也不可能给我钱。就是这样把这个中药二厂建立起来了。我原来不是“走资派”,一当厂长就变“走资派”了。白天批斗,晚上生产。生产一点卖一点,发发工资,但是远远不够。第一个月借了5000块钱,发了全厂的工资,190多个人,最低工资28块,最高工资52块。但不可能每个月都借钱发工资,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睡在厂里,与职工共苦。后来就一年一年地好起来。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厂的困难时期也过去了。但是留下的珍贵遗产也不多了。你可以看一下厂史展览室,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想象不出会有如此破烂的中药厂。

人都有一口气,“有志者事竟成”,我争了一口气。等到建厂10周年的时候,那是1982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庆祝大会上就总结,“过去的10年是艰难的10年”。我在大会上讲了一句话:“再让我在这个舞台上表演10年,我一定把中药厂建成中国最好的现代化中药厂,到20世纪末,一定建成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中药厂。”现在叫平台,过去叫舞台。这个也做到了,我们中药厂现在是全国最现代化的中药厂了,谁进去看了以后都不可能想象这是个中药厂。温家宝总理2004年来厂里看了以后,跟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讲:“这么现代化的中药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不起!了不起!”他非常满意。那时是有规定的,总理来了不准请总理拍照、题词,我们都做到了。我很想跟总理拍照,但工作照是有的,单独拍照我也不敢。温总理刚要上车走的时候,拉住我说:“老冯来,我们单独留个影。”当时习书记在旁边,我想一个人拍也不好,就叫上习书记3人一起留了个影,这是很珍贵的。

(三)

这个厂的发展应该说靠的是改革开放,所以我讲,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小的时候,见证了杭州最繁华的地方——清河坊、大井巷,所有的名牌店都在这里。这条路上没有自行车、汽车,却连走路都是蛮挤的,可想而知这个人流量有多少。我见证了河坊街、大井巷从繁华到衰败,现在又恢复。80年代有外宾来杭州以后,流行过一句话叫“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现在这句话反映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美丽的西湖,现代化的杭州。变化就发生在这30年了。王国平书记提出创业在杭州。胡雪岩是创业在杭州的一个最好的典型。我们杭州出了两个全国首富,一个是胡雪岩,一个是宗庆后。杭州发生的巨大变化,是过去根本没法比的。说明杭州是一个创业发展的天堂,也是一个旅游的天堂。所以,身为杭州人,我感到自豪、光荣。杭州既是一个旅游天堂,也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的城市在全国是很少的。我作为一个老杭州,看到了杭州现代化的成就,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常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要了解过去,珍惜现在,不了解过去就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穷过来的。

我工作了62年,也总结了我的一生。我认为文化高最好,不高也不要自卑。自己创业去,比别人努力一点,多付出一点,同样可以成功。

时间:2013年4月12日

口述:吕文宗——杭州市冬泳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采访:高 丹、黄琦峰

整理:高 丹

(一)

我原来是新华书店的,前几年刚刚退休,因为书店改制,是按照事业编制退休的。我祖籍是四川,但出生在杭州,生长在杭州。我本人从1980年开始冬泳,从1983年冬泳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做协会的具体工作。原来任冬泳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协会成立后,我是杭州市冬泳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现在也是。

一开始参加冬泳,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我是个体育爱好者,在新华书店的时候,市文化局经常组织体育活动,当时曾经组队参加过横渡钱塘江的锻炼活动。我们队里有个女同志,是西泠印社的,姓沈,她的游泳衣上有一只企鹅和“杭州冬泳”字样。我感到很好奇,就向她初步打听了一些冬泳的情况。另外,我在邻居家里看到过同龄人冬天在雪地里拍的照片,也很好奇,就想试试看。当时就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冬泳,结果就这么坚持下来了。通过坚持冬泳,我体会到好处很多,一个是锻炼身体,还有是锻炼意志。因为冬泳是一项比较艰苦的运动,没有一定的意志,那是坚持不了的,所以我们冬泳队里人变换得很快。冬泳对身体确实很有好处,尤其是早期,一个休息,一个睡眠,通过冬泳,一整天的精神状况都非常好,对血液循环的改善也很有好处。我们这里这样的实例很多,有的是轻微的关节炎或者心血管问题,或者是睡眠方面有些毛病,通过锻炼来改善体质。我在当时体质应该算是好的,就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来参加了这项活动。

到现在我也一直在坚持,基本上以早晨为主,一个星期至少游五六天。我最冷到哈尔滨去游过,水温是零下两度,在松花江,虽然是流动的水,仍然在不停地结冰。杭州是偶尔有结冰现象,基本上也是薄冰,我们就用竹竿把冰打碎。但有时候身上和脖子上还是会弄出血来,因为游过去时还是会有小的薄冰浮在水面上。冬天皮肤又很脆,很容易划破,不像夏天,皮肤韧性好。基本上,杭州水面结冰的时间很少,西湖边上可能会有,游泳池结冰的情况更少。个人成绩的话,小比赛呢,我冠军是得过的。全国的比赛,只得过第二名和第三名。

(二)

杭州市冬泳协会和杭州市游泳协会是两个并列的群众团体组织,相互又支持又分开。游泳协会中有一小部分是冬泳的,但是总人数不多,其中有不少人本来是我们的会员。我们冬泳协会么,是杭州市体育总会领导下的群众单项体育组织,是一个法人社团,主要就是冬泳。协会发展的历史比较早。早在1966年时,革工会(注:“文革”时的总工会)中就有工人冬泳组织。那时候工厂都停工了,人也比较空,革工会成立了一个冬泳队,一句话一个号召,响应的人很多,有1000多人,就在西湖冬泳,那时候西湖可以游泳。(我们)也跟其他城市进行交流。有一年,在老的天水游泳池(注:即现杭州市游泳中心)接待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专门来看我们杭州市的职工冬泳表演。

所以,杭州市冬泳协会在1983年之前就是革工会的冬泳队、冬泳分队这些。1983年的时候,正式在市体育委员会的领导下改叫冬泳委员会。1985年,又在冬泳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杭州市冬泳协会,现在一直叫冬泳协会。协会的人数历年有变化,最多的时候有1500多人,现在大概是1000人左右。这些年我们的人数又比以往稍微少了一点。我们协会是纯业余的组织,没有专职人员,领导班子成员都是在工作之余为大家服务,为群众体育服务的,现在也一样。协会自正式成立后,虽然是由冬泳委员会改名而来,但领导班子也是经过调整的。协会有顾问,一般是本身参加冬泳或者对冬泳比较支持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有名誉主任,原来叫名誉主席,徐兆骥等市领导都担任过。顾问后来是由协会退下来的副会长等担任。协会有会长一个,副会长有多有少不固定,秘书长也是一个,从协会成立到现在一直由我兼任。朱会长是第一任主席,他担任了两届。我们是四年一届,重大活动要召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领导团体是经协商产生,再经大会选举,大会每年都召开,选举是四至五年进行一次。换届的时候先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换届小组,由换届小组讨论建议名单,再由常委会讨论,最后进行全会选举,通过这个途径选出来。

(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杭州参加冬泳的人是比较多的,而且以中青年为主,现在是以中老年人为主,青年人很少了。基本上是40多岁将近50岁或以上,60岁左右的人可能是最多的,年龄最大的超过80岁。冬泳活动没有年龄限制,但作为竞技参加全国冬泳比赛对年龄是有限制的,必须是69岁以下。分年龄组,从25岁以上开始比赛,一直到69岁为止。这个年龄段当中,以5岁为一个年龄组。我们参加的比赛都是分年龄组的,业余的成年人比赛一般很少分年龄组。70岁以上可以参加“不老松”冬泳,只要游过去就行。参加冬泳运动的性别构成上,男、女不成比例,男性占绝对多数。

1980年我开始参加冬泳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很多,就在水池游泳。那时候条件也比较好,冬泳结束后,还供应姜汤姜茶,现在是没有了。当时生活水平低,水池的票价很便宜,一个月才两块钱,而且这两块钱还能到单位里去报销。因为当时市总工会、市财税局一共8个单位联合发过文,规定除了冬泳费用可以报销外,还能发给一块大浴巾。那块大毛巾名义上是向单位借用,实际上就是给个人的,不会再收回去了。那时候我们单位也执行这个文件。这个政策对冬泳运动的发展鼓励很大,尽管钱不多,但是当时收入也低,能有这样一个待遇就很不错了。还有当时的单位确实对体育运动也比较重视。像我们冬泳,每年都要参加全国比赛和交流,到单位去请假,一般情况之下都是支持的。当时很多比赛都是以市总工会的名义发文,到单位去要人。像我们冬泳协会组队参加冬泳比赛,因为是群众性的业余组织,下面没有运动员编制也没有工作人员编制,运动员都是要去各个单位请来的。一般就由总工会发文件,各个单位都很重视。

总的来说,我们杭州市应该说在全国是属于冬泳水平比较高的单位,在全国很有影响和知名度。杭州市冬泳协会历年的成绩,最好拿过冠军,差的话六七名也都是拿得到的,前三名拿过很多年,成绩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90年代有一年,我们去香港参加比赛,拿了全部的5个奖杯,包括男、女团体冠军,男、女个人冠军和总团体冠军。最近几年,我们到乌鲁木齐、辽宁、湘潭等地参加了一些全国比赛,成绩也还可以,但总的水平稍微有些下降,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协会没

有经费,所以人数受到限制,很多好的运动员去不了。再加上杭州市也有其他冬泳队伍,把运动员的力量分散了。比如杭州市游泳协会也有一支冬泳队伍。对整个冬泳比赛来说,力量如果集中起来,成绩肯定要好得多。

(四)

市区的冬泳场所里,最早是在天水游泳池。天水游泳池时间最长,因为从1966年开始,一直就是在天水。我1980年开始冬泳时,也是在天水游泳池。天水游泳池什么时候拆掉?我记不清了,但是1988年的时候还在。那一年我们在这里搞了个全国17城市冬泳邀请赛,当时的副市长陈端是分管体育的,她是组委会主任。那个比赛我们是总团体冠军。可能在90年代初,天水游泳池拆掉了,就搬到了省政府旁边的向阳游泳池。冬泳这个活动比较艰苦,也受条件所限,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向阳游泳池活动的时候。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中心,城东、城西过来都比较方便。向阳游泳池是2003年左右拆掉的,后来就到了城东公园的游泳池,也是体委系统下面的模型无线电运动中心,地理位置相对偏一些,锻炼的人数也受到了限制。

从泳池的条件上说,应该是逐步变好了一点,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说,向阳游泳池是最好的。那时杭州市参加冬泳的人最多,在那边活动也最方便,因为那边还是全天开放的。在航模中心的时候是只有两个时段开放,早晨五点四十分开放到七点四十分,下午三点半开放到五点半,一共两个时段,每个时段两个小时。这也是一个局限性,因为有的人可能这两个时段来不了,就有一定影响。而且我们冬泳都是要在室外游泳池,在自然水温下游的。

协会现在的这个办公地点,是游泳中心建好后不久给我们的场地,当时中心的主任正好也是我们的一个副会长。我们作为体育单项组织,本来的场地在市体委(体育局),就是现在的省人民大会堂那里,有一排老房子,很多协会都在那里做办公室。后来那边改造拆迁,就给我们在这里腾出了现在的这个办公室。

(五)

西湖冬泳表演很早就有了,到2010年为止,我们已经坚持了42届,就在西湖边比赛,每年都是大年初二,反响比较大。这两年因为客观原因,没有组织起来。杭州市冬泳比赛我们也已经举办了27届,每年有比赛,反响也比较强烈,就是“东信杯”。说说是杭州市的比赛,实际上是个邀请赛,因为周边的城市都来的,每年都有安徽、江苏、上海、江西等附近的省、市组队来参加。这是我参加协会以后,由我们一个团体发起的。一开始在天水游泳池,后来搬了地方以后也坚持举办,在玉泉游泳池也举办过一次,其他的就是在哪里锻炼就在哪里举办。最初的时候,作为冬泳组织来说,总是要以活动为主,因此没有搞过的活动我们就想着搞一个。作为杭州市冬泳协会这么一级组织,组织杭州市的冬泳比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分内事。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就举办这个冬泳比赛。当时分成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三个年龄段,不像全国比赛每五年一个档次,因为分得太细每个项目参加的人就很少很少了。那时候搞活动很难很难,要跑体育局,先让他们批准,这很正常,但是要经费就比较困难了,有时候能拿一点,有时候还不一定拿得到。有时候我们跑省体委找关系,也可能会给一点。尽管我们市里面不是归省里面管的,但因为是搞群众体育,他们总还是支持的。再到各个单位,当时我和老会长经常为了活动两个人去跑钱。有时候是通过老会长的关系,他联系好,我去跑。当时经常为经费的问题到处奔波。老会长是朱筱

波,现在已经过世了。

“东信杯”这个冠名,是我们协会的一个副会长苗军,找到他们具体的工作人员联系并挂上钩的。也通过了我,因为东信原来的副总是我同学,所以上层我自己去跑,中间环节就由苗军去跑。说老实话,体育活动拉社会赞助,有单位支持,也有单位不一定支持,支持的单位不一定肯出钱,有钱的单位也不一定来支持你的体育活动,总是要通过跑,通过自己的关系,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1988年的时候,在杭州举办首次游钱塘江马拉松比赛,我也参加了,所以印象深刻。那个活动是我们和交通报社联合组织的,交通报社一个姓陶的总编担任总指挥,我担任副总指挥,自己又是运动员。这是个长距离的游泳赛,我游了14个半小时,从富阳南门码头游到六和塔游泳场。参加的一共有10个人,有8个人全部游完了。参加的人是自己报名,虽然不是选拔,但也是我们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选出来的。这是我有史以来游过最长的距离,这个距离在全国都不多见。当时我们全部是杭州市的,在半夜两点钟下水开始游,中间不上来休息。因为整个过程比较长,所以要早点下水,到了杭州才不会到晚上。那天游得筋疲力尽,我作为组织者还参加了晚上的庆功会,有的运动员干脆就趴下了。确实很累,我是第二天睡了整整一天,但这也是一种自我挑战。

后来在1993年,我们还办过一次马拉松游泳比赛,跟体育开发公司合作。当时全国有10个城市参加,包括北京和上海。那次是从富阳新沙开始游,距离比1988年的那次稍微短一点。但由于外地队伍参加的比较,对钱塘江潮水不是很熟悉,游出来以后不远就遇到了涨潮。因为外地来的人员技术参差不齐,技术差的人只退不进,他们慌了就爬到岸上去了。像我们杭州队就没有关系,还是往前游。后来组委会看情况不行,就终止了比赛,把人装上车拉到闻家堰,从闻家堰重新开始,实际距离只有1万米了。但是1万米的比赛,在全国来说也是很少的。

国际交流方面的活动我们没有怎么做。但是在水天游泳池,曾经有两次和美国的交流,都是请我们冬泳协会来的,是美国长岛的成人游泳协会。因为当时杭州市游泳协会还没有很健全地组织起来,主要是我们冬泳协会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所以需要运动员跟他们交流和比赛时就是找我们来。跟两岸的交流我们比较多,澳门一次,台湾很多次,香港就更多了,包括我们去参加比赛和活动,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活动,次数都比较多。

(六)

冬泳协会的发展,一是要靠领导重视,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方便,因为活动开展得多了,就有吸引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二是要有经费,因为组织活动必须要有钱,除了通过自身努力,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适当资助一点。我们是归体育总会管的,体育总会对群众体育应该要有适当的支持。

1994年,我到国家体委去开会,当时国家就提出中国体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奥运竞技项目,一条腿是全民健身项目。而实际上,全国各级的极大精力都放在竞技体育上了,我希望领导能把群众体育重新重视起来。那次会议,是国家体委为成立全国冬泳委员会开的筹备会。当时全国的正式代表是10个,还有列席代表基本上是北京的。我们杭州在1988年举办了17城市的邀请赛,1989年温州又搞了个27城市的邀请赛。当时各个代表队的领队和团长聚在一起,就很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冬泳组织,于是就在温州发起成立了中华冬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杭州是发起单位之一,老会长被选为常委,我被选为副秘书长,1990年,以中华冬泳联合会的名义,在

青岛举办了第一届友谊赛,这时候就发展到 54 个会员单位了。后来,又到四川崇州等地举办比赛,一直到 1994 年,都是以中华冬泳联合会的名义。这期间,我们以联合会的名义向国家体委和国家民政部等做了一些宣传性的工作,也申请要求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当时国家对全国性组织的审批控制得比较严,就一直没批下来。后来就建议冬泳组织挂靠中国游泳协会,所以由国家体委出面,主要是竞训三司和群体司。国家体委管游泳的刘吉副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成立中国游泳协会全国冬泳委员会这个组织。原来我们杭州有在全国冬泳委员会担任常委,现在只担任委员。原来的常委基本上是亲身参加冬泳的,现在省一级的常委都是在体育界影响比较大、贡献比较大或者比较知名的领导。作为我们来说,只要是支持冬泳的领导,我们都欢迎。

时间:2011年2月24日

口述: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清同治绍兴“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

采访:金利权、高丹

整理:高丹

(一)

关于铜雕艺术在杭州的影响力,有不少东西好讲。杭州铜雕是全国唯一一个铜雕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代表性传承人与铜雕艺术渊源很深。我们家从曾祖父(朱雨相)开始,就从事制铜工艺,我是第四代。我的孩子现在接我的班,是第五代。五代相传,这是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艺术传承。

杭州是个很女性化的城市,给人的感觉温柔而美丽。西湖和钱塘江孕育了丰富灿烂的杭州文化,也为我们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但对杭州文化,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传统的丝绸、茶叶、绸伞、扇子等,而铜文化则讲得相对较少。其实,从越王勾践开始,杭州一地就崇尚武德。到南宋时,杭州铜文化的发展已有悠久历史。尤其是铜建筑,比如西湖周边风景区、佛教寺院中的铜建筑,名声远播海外。这些都是历史的珍宝,是对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铜雕艺术的传承者,我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进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又比如推动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促进运河申遗;进行“与达利的对话”,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这些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工艺美术的继承发展方面,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铜建筑的开拓,现在在全国已经排到首位;二是铜艺术的交流,主要通过“与达利的对话”进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这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三是熔铜艺术的运用,实现了传统工艺向现代工艺的跨越。

(二)

我家的制铜工艺在我父亲(朱德源)这代曾经中断过。那时候由于战乱,铜作为战略物资,供应很紧张,不可能为寻常百姓所用,于是就中断了。直到改革开放,父亲退休以后,才重新开始搞铜艺术。他的书法在杭州较为知名,作品也很多。1984年,他成立了“朱德源书画社”,是杭州第一个个体书画社,可以说是杭州文化领域的一个破冰者。在这之前,杭州的民营书画商店都已消失。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那些名家的作品很需要一个流通到市场的渠道,书画社的成立就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当时,美院的书画家纷纷与我父亲交往,书画社里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在这种艺术氛围下和党的政策的指引下,我父亲重操旧业,回归到制作铜匾招牌,就这样捡回了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几个兄弟也就跟着一起做。

此后,我就是跟着父亲,一边学书法,一边学铜雕,逐渐回到了老祖宗做铜的领域里。一开始主要是简单的搞一些铜招牌和酒店的铜装饰,慢慢地发展深入。比较有影响的是做铜门。大概是1994年,在上海的外滩,做了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座铜门,也是全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座铜门。再有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人民大会堂香港厅的铜门,这是专门为1997年香港回归打造的,祖国母亲欢迎香港游子的归来,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随着时代的发展,制铜工艺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做铜匾发展到做铜门,后来,我又开始做

铜建筑,在这方面有几件事值得回忆。一是参与雷峰塔的重建。1999年底,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郑重决定,按雷峰塔原有的形制、体量和风貌建造雷峰新塔。2002年10月25日,雷峰新塔如期落成。雷峰塔的建设在中国风景保护和建设史册上留下了4项“天下第一”,其中一项就是塔类建筑中采用铜件最多、铜饰面积最大的“天下第一”。雷峰塔作为铜文化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产物,其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都非常大,这也是千年难得的机遇。二是铸建灵隐寺铜殿。铜殿由杭州市佛教协会委托我主持设计制作,前后八易其稿,历时400余天,总计万余工而制成。高度达12.62米,为“中华第一高”的铜殿,获世界吉尼斯最高铜殿的纪录。它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的结晶,采用铸、锻、轧、刻、镶、镂、冲、鎏金、点蓝、氧化、做旧、封闭12种工艺,开创了大型铜工程建设中多种工艺综合运用的先河。当时建好的时候,也是中国最高的一个铜殿。第三件事,就是2007年给印度那烂陀寺建唐玄奘纪念堂。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跟尼赫鲁达成协议,准备在印度建立玄奘纪念堂。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纪念堂一直没有建好。一直到50年后,也就是2006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才再次提出建立玄奘纪念堂这事。这样,建好纪念堂,成了两任总理的共同期望。2007年,我作为国家宗教代表团代表去印度访问,到那烂陀看了当时的玄奘纪念馆。那其实只是一个留出了地方的空房子。后来,我们跟当地的工程师就如何建好玄奘纪念堂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讨论,尤其是铜雕艺术品的设计。最后,经过研究决定,纪念堂里面最大的一幅铜雕壁画——《大唐玄奘传》由我来负责完成,后来成了印度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也是中外(中印)铜文化交流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

(三)

铜雕艺术不断发展,特别是后来熔铜艺术的运用,使铜雕艺术实现了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艺术的突破和跨越,也填补了国内熔铜艺术的空白!熔铜艺术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与常州天宁宝塔的修复工程有关。常州天宁宝塔是塔身用铜铸成的宝塔,也是中国最高的佛塔,有153.79米。当建到最高一层的时候,塔烧了起来,最后屋檐烧掉了,铜瓦和斗拱都烧化成了铜渣。在参与塔身的修复工作过程中,我发现这些铜渣千姿百态,流淌的形状有着特殊的美感,同时又能反映铜的特点。因此,我就收集了一部分铜渣,制作了一批作品。其中一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名叫“阙立”。后来,就在这个的启迪下,成就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就是熔铜艺术。熔铜艺术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实现“与达利的对话”。2009年,是达利逝世20周年,当时达利的100件作品要来杭州展览。为了能更好地体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主办方提出了一个想法,希望能有我们中国的东西参与,实现东方和西方作品的同台展览。于是有关部门就找到了我,我拿出了100件熔铜作品参展。国外的艺术家们在杭州看了我的作品后,感到非常震惊,并希望把这次展览办到欧洲去。当时《人民日报》以“谁在与达利对话”为题,专门做了报道,认为这是文化发展中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很有价值。此后,熔铜艺术逐渐产生了自己新的影响力,包括在台湾举行的“两岸艺术展”,连战、江丙坤等台湾方面的知名人物都参加了。当时江丙坤在开幕式上,还对这个艺术展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两岸在文化领域发展交流的里程碑。

(四)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我也有幸参加了3个馆的艺术设计,就是中国馆、杭州馆和智利馆。中国馆是我和许江合作的。开始我没有参与杭州馆的筹建,大概是到开馆前十天的时候,才应杭

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参与其中。由于时间很紧,我就以最快的时间,以突出杭州的西湖文化为重点,设计了5件作品。还有就是智利馆。智利是产铜大国,是中国最大的铜进口国;对它来说,中国又是它最大的铜出口国。在国际铜艺协会的推荐下,智利馆的筹建者找到了我,请我给他们做铜雕和铜树。在制作的过程中,恰巧智利发生了8.8级大地震。当时我就担心,智利馆的建设可能会因大地震而停下来,或者粗制滥造地建造,毕竟大地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个大灾难。我想应该为智利做点事情,就提出把工程款全部捐出来给智利救灾赈灾,这个愿望最后通过智利大使馆实现了,我还专门写了封信给智利总统。2010年10月,是智利建国40周年国庆,智利总统在北京举办招待会时,还特别邀请我参加。我也赠送了他一件作品,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了一点事情。

(五)

为了弘扬铜文化艺术,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铜雕艺术博物馆——江南铜屋在2007年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铜来打造的民居,而且是免费开放的。开放以后,铜屋每年大约要接待300万名游客,让他们畅游在铜文化艺术的海洋里,这对宣传杭州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作为一个纯个人办的博物馆,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国际民间文化交流的阵地。2008年3月24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秘书长弗朗·加利先生参观了博物馆后,也是赞不绝口,说这里真是“太华美了”!

时间:2010年12月31日

口述:庄富泉——富阳竹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采访:金利权、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们的祖辈每户人家都是靠造纸吃饭的。小时候我爷爷、爸爸做纸的时候,我们就去偷看。到了16岁,我半工半读读到初中,高中读不起了,就在生产队里面开始跟师傅学做纸。那时候很苦的,不好让师傅知道,要偷偷地学。从早上四点半,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回家,一天只有两个工分。冬天很冷,夏天做纸的时候,水里的温度要好一点,但是晒纸的时候,烘干室里面有80度到100度的高温。那时候学造纸,一般要学三年,不像现在三个月就可以学会。为什么呢?因为向师傅学手艺,头一年是根本不会教你的,你有水平,就自己去偷看。我们都是靠自己偷看学的。

从山上毛竹砍下来到真正做成纸,有72道工序,全部学会的人很少,一般都只会几道。比如夹板,要木工做,做纸的人不可能做的;又比如要劈篾,就要劈工做,做纸的人是不会剥的。为什么现在造纸工序减少了,因为一般年纪大的人,有的知道但也写不出来了。所以从72道工序里面,再选出23道,是大家都懂的。像我自己,比全国其他人要多会两样手艺,比如劈篾,人家都不学的。这次浙江省组织20个地方的人去评奖,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真正会做,就得了金奖,当场发奖还拍了照片。

(二)

我们这个技术是宋代传下来的,那个时候叫元书纸。1978年,中国美院(注:当时叫浙江美院)有个老师到我们这里来。他跟村书记说,你们那个元书纸,卖几毛钱、几分钱,怎么不像安徽那样学,去做宣纸?当时我们也不懂,3个村子就派人,派生产队长和技术好的老同志去安徽偷看。回来以后想尽办法,把纸做了出来。做出来后,销路还不知道,就先卖给浙江美院。我们3个村就集体办了厂,三四年后,我们造宣纸就出名了,一年有1万块钱好赚,市政府开会还表扬,当时叫万元户。我是自己做的,不经过集体。一开始集体做的纸销不掉,我就把事情揽过来了。半个月之内,把3个村子积压了3年的纸全部卖光了。后来,我又和浙江省进出口公司联系,把纸推销到日本、韩国去。纸一推出去,韩国就订了1500件,每件2000张纸。3个村子就这么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到1985年,环保也有点意识了。因为土法造纸环境污染很严重。我一想不对,这个东西肯定做不长。到1987年,政府就开始不让办宣纸厂了,还要拆掉。一次我抽烟,发现了香烟纸可以代替,就跑到华丰造纸厂请教,才知道是用龙须草做的。经过试验,发现效果比我们用毛竹造出来的要好。于是我跑到东北、湖北、湖南等龙须草的产地,开始全部用龙须草做原料,质量超过了安徽的宣纸。那时候日本人也看中龙须草做的纸,包掉了富阳全部的纸。这个我们都是一家一户出口,出口要求比较严格,质量不好要退货。现在《二十四史》、故宫里面的书全部用的这种纸。

到90年代,大家都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因为做纸是辛苦活,加上日本人把纸的价格卡得很死,做纸的利润很薄。一下子,我们这3个村子,50%的人改行去做门窗生意了,出去两年就赚了很多

钱回来。但是总有一批年纪大的人,没有出去,叫我帮他们推销,一直坚持到现在。去年、前年还有100个人,现在只有20个人了,因为都是50岁以上了,做不动了。年纪轻的流动性很大,像我们从贵州、江西招来的人,在这里学会了技术,就回家自己搞了,到时候把纸卖给我们。现在我们这里一家一户造纸的不多了,大概从1000多个槽减少到最多150个槽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还在做。大家都在担心,再过五年,这个东西可能要失传。政府现在政策慢慢好起来了,开始注意保护了。但保护也有困难,没人肯学怎么保护?另外,纸的价格也卖不高,我跟画家说,你们一张画几十万几百万,我们一张纸赚不了几毛钱,怎么能生存下去呢?

(三)

机器宣纸,我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要求做出各种各样的504种纸。有一个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人就跑到浙江省土产公司,问能不能造古代的诗?省土产公司只知道富阳造纸的人多,就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我当时在村里面承包了一个地方,在里面搞这个纸,红的、绿的、黄的都有——是在给台湾天一出版社修复古籍封面的时候学会的。他一看,就是这种纸,我就跟他合作做这个,是仿唐代的薛涛笺,叫中华笺,后来还找沙孟海题写了名字。这个时候,中国邮电总公司说要把信封、信笺全部改成宣纸。天津那个人就去接业务,叫我们一定要搞机器宣纸。那时候一点都不懂,搞了四五年,成功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机器纸与手工纸还是两样的,机器出来是硬的,手工出来是软的,经书、古书一开始都印不好。用机器宣纸印出来的书,字迹更清楚,印好后看起来跟手工纸的纹路和颜色都一样。

四五年后,因为机器做出来的纸不值钱,又改回用手工,我的机器就停下来了。1994年,我发明了用宣纸做挂历,一下子全国挂历界都开始用机器宣纸。我的机器宣纸出来后,安徽的宣纸就跟我打官司,因为我们没有“宣纸”这两个字的专利。官司打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们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发明出来的。但是我没有去申请专利,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思想意识。本来大家用机器宣纸印书好印,但是老百姓思想,还有国家拨款上,都一定要是手工的。现在只有挂历跟邮票书画册,这些手工纸印不好的,还用机器在做。我还在继续用机器搞试验,希望明年能成功。因为真正的手工纸要失传了,如果机器能成功,也是传承,是技术的改进,这样成本和销路都会好解决。

(四)

这30年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化。原来的房子很差,我们四个兄弟,我只分到15个平方米。1988年搬到这个地方,村里批了80个平方米,超出一点点就给你敲掉。后来我当村长,一下子给村里面批了105间房子出来,整个村庄不是很好看了么。现在我们这里农村的路,还有房子都是高楼大厦,都很漂亮。我33岁结婚,当了17年村长,给村里老百姓做事情。这三个村子,老老小小,不管哪一个,都很敬重的。像这种路,都是我筹资修起来的。1994年以前,整个富阳,农村里面没有水泥路的,外国人一看坑坑洼洼的,都不愿意来。还有村里的学校,也是我叫齐大家,用七八十万元建起来的。那时候我们一搞,整个富阳市的其他村庄就来看样,在杭州市还评上了奖。

(五)

我从1971年开始学做纸,1975年后出去跑供销打销路,在杭州待了3年。80年代后开始搞

纸,最早的厂名叫庄家古籍书画纸厂。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在全国一共认可了11家宣纸厂,浙江有2家。我们富阳可以叫仿宣纸,真正的宣纸不能叫。后来厂名改成了富春江书画纸厂。1984年,我们村里面改了个富春江宣纸厂。1987年的时候我当厂长,接管了集体的这个厂。2002年的时候,改成了公司,叫富春江宣纸有限公司。

现在我主要想,怎么把造纸发展下去?我的儿子在读高中,今年暑假我教了他一个星期。准备明年再学一样,把最难的学掉,72道工序就有希望了。现在政府也在鼓励我们,给我们出主意。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出来以后,就更重视了。2008年的时候,我的公司被认定为“浙江老字号”和“杭州老字号”,以后还是要继续宣传,争得各种荣誉。

时间:2009年4月16日

口述:李金明——1992年2月至2000年2月任杭州市委书记

采访:任振泰、冯跃民、高丹

整理:任振泰、高丹

(一)

杭州市的发展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在杭州市的9个年头,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我刚到杭州工作,一是人地生疏,情况了解不多;二是杭州话一时也听不习惯。只有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杭州的情况。一是经济十分困难,本级财政赤字很大,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每月只能向省财政厅借钱;二是国有企业特别困难,比如浙江麻纺厂、杭州第一棉纺厂、杭州第二棉纺厂等;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有的外国元首和友人说杭州是“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四是人民生活也很艰苦,水、电、路、房、菜等与人民群众相关的都很困难。我们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应该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他们的冷暖要时刻挂在心上。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在与各方面干部群众的座谈中,大家都认为:要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的新局面,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杭州的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做好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工作。所以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再教育,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大讨论半年,一开始都满足现状,于是市委就决定让大家走出去看看,分成“南下”“北上”两部分参观学习。回来后,有人就讲:“不出去还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看不到与人家的差距。现在看到人家的发展速度与实力,看到人家引进外资的进程与规模,看到沿海城市开放的程度,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于是大家对发展的认识深刻起来。财政有困难,不等不靠,用政策的思路去抓财政,用足用好政策,搞活财政。

(二)

从哪些方面发展呢?首先是抓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5项:水、电、路、房、菜。

水。主要是群众的吃水问题,当时全市人民群众吃的水,是“南咸北臭”。咸是海水倒灌,臭是运河污染严重造成的。为解决吃咸水的问题,建了南星桥水厂,从钱塘江抽水,还建立钱江水厂,打山洞取钱塘江的水。这个工程不仅解决咸水问题,同时还修了钱塘江堤,拓宽了六和塔附近的路面,上面是路,下面是水管。抗咸工程共投资6个亿。北边,祥符桥、和睦新村一带居民家里的自来水都是臭的,主要是运河水污染厉害,每天流入运河的污水有60万吨,做自来水水源能不臭吗?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利用外国的政府贷款,对运河进行截污治理,解决群众吃臭水的问题。

电。90年代初期,杭州市的用电量很紧张,一到夏天很热的时候,电力部门经常拉闸断电,居民群众叫苦不迭,老百姓反应强烈,意见很大,有的还骂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高压电力总量不够,低压电网没有改造。所以我们在余杭、下沙建了两个50万伏变电所,又通过旧城改造,改造低压电网,后来又不断扩容,基本上解决了经常拉闸断电的问题。

路。杭州的路既狭窄又弯曲,堵车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结合旧城改造,一是拓宽,如当时庆春路由8米~10米拓宽到40米,还有延安路;二是延伸,有庆春路、凤起路和延安南路;三是新建西湖大道等。当时的市建委主任对我说,全市一共拓宽、延伸、新建了38条路,200余千米,一定程度上缓解当时行路难的问题。

房。房子问题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有的人家居住(条件)十分困难,几代人挤在一个小破房子里,睡的是高低床,甚至还有在一个床铺上轮流睡觉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平方米。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一是通过旧城改造建房屋,有的老百姓对过渡不理解,市委、市政府领导就下去了解情况,耐心说服;二是有条件的企业自己建房,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三是市里每年筹建一定的资金建房。过去用马桶的人家,用上了卫生间,用上了抽水马桶。百姓住房条件改变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城市面貌也改变了。

菜。菜是城市老百姓最关心的,因为菜每天都要吃,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1992年、1993年,菜的问题就很严重。蔬菜由于受雨雪的影响,连小白菜都卖到5块钱一斤。各家主妇都怨声载道。为解决群众吃菜问题,一是扩大原来的蔬菜基地,从江干区笕桥一直扩大到丁桥那里。同时在西溪那边搞鱼、虾基地;二是从外省引进,搞了个三里亭蔬菜批发市场,山东、安徽的菜贩都来了;三是依靠科技进步,对蔬菜改良品种,科学管理,提高产量,使蔬菜的价格稳定下来,周围的县、市都没有市区的菜价格低。

(三)

杭州是老工业基地,老企业多,这本来是我市的一大优势。可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建于五六十年代,这些企业设备落后,亟须技术改造。但由于企业负担较重,地方财政又紧张,因而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导致厂房陈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竞争力减弱。再加上这批企业长期习惯了按计划经济模式生产经营,经营机制不活,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一是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闯出一条新路。对优势企业,让他们把政策用足用好,加速内部机制转换,办好企业集团,实行国有企业“强强联合”。杭州电化集团公司、杭州龙山化工总厂、杭州油脂化工厂合并为新的杭州电化集团公司。杭州家电行业的4家骨干企业——杭州金鱼电器集团公司、杭州东宝集团公司、杭州市家用电器工业公司、乘风电器公司实施联合,新组建杭州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达39亿元。支持企业向跨国公司方向发展,让他们放开手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改造自己,发展壮大自己。

二是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既加强企业技改步伐,又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开放度,实行“三外”(外商、外资、外经)并举、“四区”(下沙经济开发区、萧山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之江旅游度假区)联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93年,“嫁接”型合资企业1200多家,其中“嫁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130多家。“嫁接”改造后的老企业,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加速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调整内部机构设置;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对职能部门和车间岗位定员、定岗、定责、定薪,对职工实行优化组合,彻底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按照职责、能力、实绩取酬,拉开收入差距,激发竞争意识。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品档次的提高,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促进企业向外向型转变。比如杭州橡胶厂引进中策来改造企业,子午线轮胎的生产很快就达到100万套,使厂的后劲很足,大大增加了税收。

我认为,利用外资改造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捷径,后来还以我的名义在《人

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嫁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杭州有两条经验:首先,嫁接改造要“嫁”国际大公司;其次,“借船扬帆”,依靠“嫁接”改造实现国有企业转换机制。通过企业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通过兼并联合、优化结构、扶优扶强,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的大集团,培育一批国内行业领先或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小型巨人”企业。总之,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和出售等多种形式,全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同时,抓乡镇企业(现称民营企业)的发展,如鲁冠球的万向节厂、宗庆后的娃哈哈厂。特别是娃哈哈,“小鱼吃大鱼”兼并了杭州罐头厂。企业都发展得很好,成绩很大。乡镇企业成了当时财政来源的基础。

(四)

旧城改造,城市基础建设,过去的市委、市政府不是不想,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钱搞,但我们为什么能干?因为当时有了利用市场经济的思想。于是我们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途径,多形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特别是做“借地生财”的文章,用级差地租筹集资金,并大幅度地利用外资和内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的步伐。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和“以路带房、以房养路、路房结合、综合开发”的方针,遵循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保护风景名胜兼顾,改造旧城与开发新区兼顾,长期建设与当前急需兼顾的思路,加速旧城改造和城市基础建设。新建房基本上扩大了一倍,还对名人故居进行了保护,如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等。胡雪岩故居改造修缮花了5000多万,搬迁100多户;夏衍故居当时已经没有了,又重新搞起来;还有清河坊恢复原貌等等。

当时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有一次,在市政府老礼堂开座谈会,有些老同志表示不理解。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被视为“出卖主权”,搞“新租界”;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被认为是转变公有制性质,是“搞资本主义”;企业推行股份制,被看成是变相“搞私有化”等。有位企业的老同志在会上激动地说:“我们把小日本赶走了,你们又把他领进来了,这是丧权辱国。”一位政协的副主任说:“我听到这种议论觉得脸红,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告诉他:“我们自己没钱,引入资金把我们这个‘破烂的城市’搞好,你怎么能脸红呢?邓小平不是有‘三个有利于’么?我们改造庆春路,不但政府不用出钱,还会有2000万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他说:“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不靠政府出钱,还能赚钱。”我就告诉他先不要争论,两年以后看能不能实现。现在,不支持可以,但不要反对。

我们大胆的引进内资与外资,进行庆春路、复兴路、杭州火车站等“五路一场”旧城改造工程,改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钱江三桥、西区水厂、运河截污工程、绕城高速公路、三堡二线船闸,杭新公路以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也基本上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来进行的。

(五)

杭州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当时我们一直在挖掘西湖的文化内涵,加强西湖风景区建设,强化旅游资源的延伸开发,逐步朝大杭州旅游格局的方向调整,拓展“三江两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西湖、千岛湖)、“西溪水乡风情园”和“吴山景区”。一方面,对西湖景区深度挖掘,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西湖旅游文化的内涵和特色,提高文化品位。比如加快吴山文化旅游

区的整体开发和西溪文化旅游区、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建设,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西湖新老十景,大力发展城市主题公园和博物馆,形成新特色,使西湖景区更加光彩夺目。另一方面,抓好西湖旅游景区的延伸开发,通过多层次、分区域的综合开发,形成以西湖为中心,以杭州—黄山国家黄金旅游线和“三江两湖”旅游线为两轴,以西湖、千岛湖、良渚、西溪和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为重点景区,辐射全市区域联网,特色互补的大杭州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的新格局。

(六)

市委、市政府对西湖的保护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新中国成立前,西湖湖泥淤塞、葑草丛生。后来,虽然经过多次治理,但都不够理想,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我们对西湖进行了综合治理。一是对排入西湖的污水进行截流,截断西湖的污染源,规定西湖边的居民、宾馆、饭店所排的污水全部进入管网,不得排入西湖。尽管政府资金紧张,还是千方百计完成了这一工程。二是对西湖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疏浚工程,清理湖底淤泥300万吨,都填到玉皇山后的一个山沟里,使西湖的水深从一米五六增加到了两米。三是开山凿洞,引钱塘江水冲刷西湖,给西湖1个月换一次“血”,湖水的透明度达到63厘米,使西湖碧波荡漾、永葆青春。

(七)

杭州区域范围的形成,是由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域范围很小,发展空间不大,区域范围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比宁夏银川市略大一点。早在1992年,我就向省里建议,把萧山、余杭的部分乡镇划入杭州市区。但是困难很大,特别是两个所属地域的政府抵触情绪很大。到1996年实在是不行了,光靠西湖过日子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不向外发展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所以提出要建设杭州的“外滩”,使整个城市的走向“沿江、跨江、向东延伸”,旅游向西发展。城市东进,就是要跨江,往萧山发展,也就是提出了杭州要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

城市区域,从萧山市、余杭市各划出3个乡镇并入杭州市区。当时经专家论证,提出了一个小方案和一个大方案。小方案,5个老城区加5个乡镇(萧山3个、余杭2个);大方案,江北划9个乡镇,江南划9个乡镇。当时,萧山市的干部有抵触情绪,统一思想非常困难。为了这个事,我一个月其他事都没干,就是把两个市的四套班子领导都召集到杭州开会。会上谁都不发言,没有办法,我就给他们讲故事。我说,我在河南南阳工作时,南阳人与襄阳人为诸葛亮到底是“躬耕”南阳还是襄阳的历史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清朝时有个南阳知府,他是襄阳人。南阳的老百姓向他提这个问题,他很为难,就说:“心存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归天下,何必辩南阳襄阳。”此后这个问题再无争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为争名人效应又争论起来了。当时,有人就拿这个事问胡耀邦。胡耀邦说:“心存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及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故事讲完后,我也讲了两句话:“心存杭州,原无论江南江北;利归天堂,何必争多划少划。”这样,就缓和了会议的气氛,大家在说说笑笑中统一了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杭州就形成了5个老城区加5个乡镇的格局。

刚才讲的是区域范围的扩大,还有城市的升格,争取把杭州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当时,全国是14个,后来加了2个(包括杭州)。这以后,杭州权力变大了,近3000名干部升级了,发展的自由度也变大了。升格后,对提高城市地位、干部素质,特别是杭州的发展很有好处。我当时就教育全市干部:级别提高了,要同时提高水平,要更努力地工作,把杭州各方面的工作搞上去。

时间:2013年7月11日

口述:汪 晶——杭州大厦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采访: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叫汪晶,今年54虚岁。从事的职业是杭州大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拿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HR。我是1986年4月到杭州大厦的。现在算起来,正好是个平方数。就是26岁到杭州大厦,然后在杭州大厦工作了26年。我从营业员开始干起,先做了三年营业员,然后做了五年领班,又做了五六年主管后,担任了商场的商管部经理,后来又转到培训部当副经理,现在是在杭州大厦有限公司,也就是公司总部,担任人力资源部专门负责培训方面的副经理。

我在杭州大厦,从一个什么都不太知道的年轻人慢慢成长过来,确实是很有感受的。最开始我进入杭州大厦(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我家就住在延安路附近,听说了这里(武林广场)在新建房子。我的想法很单纯,觉得这里要造一个100多米高的大楼,如果有机会进里面工作应该挺不错,就去打听了一下,看是否需要人。当时我是在杭州汽车制造厂工作,他们问了一下我的大概情况,觉得还可以,就让我把简历调过去看一下。看了以后,又经过面试,觉得还不错,就录用了我。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杭州大厦一共还不到300名员工。于是我就去了,一开始什么都不会。

当时为什么要建杭州大厦呢?其实最初定的名字是叫杭州工业大厦。因为政府有一个想法,希望建一幢大楼,能把杭州市的所有工业产品都聚集在一起。外地人如果想购买杭州市的工业产品,只要进这幢大楼,就可以全部买到。但当时国家是没有出一分钱的,都是靠自己筹集资金建设。如果外地人来杭州购买工业产品需要住,我们有宾馆;在住的同时需要用餐,我们有餐厅;为了能让人住得开心,我们有娱乐设施;另外还有一个小商场,开始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卖部。一般的话,对于宾馆来说,商场是作为配套产业的。

我们的第一任总经理,打算把我们的团队先锻炼一下,就借了杭州剧院的地方,围了一个圈开始卖东西。这里面的想法,第一是试试看我们进来的商品能不能卖出去,就是进货进得好不好;再就是我们的员工,能不能把产品销售出去。这里有两个团队,一个是进货的团队,一个是销售的团队。这样子,就等于在杭州剧院先开出来了一个商场,当时叫杭州大厦商场,还没有成为购物中心。同时,大楼也开始建设,我进去的时候,差不多是正在打地桩。我们在杭州剧院上班的同时,就看着杭州大厦的楼像搭积木一样,一点一点地上升,心情还是蛮激动的。每天都在长,直到高耸入云。大楼是1985年动工兴建的,到1988年的时候,基本上就盖好了。主楼有30层,高102米,是当时杭州市最高的建筑。

大楼正式开张是在8月8日。但是从1988年开始试营业到1989年,我们经历下来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们销售的那些工业产品都是由各个厂家以租赁的性质,一摊一摊地卖。走进来给人的感觉很混乱,也很脏,就像一个大地摊。当时的总经理是周顺南,他认为这样子不行,应该把这些厂家的人全部归杭州大厦管理。这样,就在1989年的时候有了一个重大的举措,把所有这些已经在这个楼里上班的人,都聚集成为了杭州大厦的员工。

这些人原来都是由厂家派过来的,真正杭州大厦的人是不多的,当时还不到 300 人。这些人和产品全部过来以后,才建立起来杭州大厦。这个取名是很有前瞻性的,几十年过来的事实证明“杭州大厦”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好。因为当时是叫杭州工业大厦,但是人家不知道从这个工业大厦可以体验到什么。而杭州大厦则真的成为了杭州商业的一个风向标,或者说地标,提升了整个杭州市的地位。

(二)

到了 1989 年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杭州大厦了。从经营情况看,到 1992 年,越来越差了。当时杭州有十大商场,我们的排名已经到了第九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第二任总经理楼金炎在 1992 年末来到了杭州大厦。他来了以后,认为杭州大厦的官商作风比较严重,那些好的区域、好的楼段都做了公司的办公室。所以他的第一个大举措就是“寸土寸金”,只要能做生意的地方,一概要获得经营效益。这样我们就开始搬家,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处于搬家状态,不断地扩面。到 1993 年 6 月,我们又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停业整顿。作为一个商家,是要取得经济效益的地方,停业整顿这种事情是不太多的。停业整顿以后,一批员工放在杭十四中培训,还有一批人开始去全国各地招商。到 1993 年 9 月 12 日,杭州大厦重新开业,楼总推出了几个比较新的理念。一个是大开架,原来传统的百货都是放在柜台里的,实行大开架以后你可以直接走到商品中间去。还有一个就是保持一定的路边宽度、高度以及亮度,包括灯光怎么设、过道有多少米宽等,都用现代化大型百货业的格式来安排格局。这样之后,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新的感觉,杭州大厦一炮打响了。

杭州大厦开始是在 1985 年,开业是在 1988 年,但真正的事业上升阶段是 1993 年开始的,所以我们将 9 月 12 日这一天定为店庆日。现在说的杭州大厦店庆多少周年,其实前面还有七八年的历史,就是从 1985 年建立,到 1988 年开业,到 1989 年成为杭州大厦,一直到 1993 年取得辉煌的经济效益开始。从那以后连续十几年,经济效益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在这里面,首先是楼总提出的企业文化之一,“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正确的观念。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要不断地创新。在那以后,我们的商场不断地进行改造,商品也不断地丰富,经济效益也不断地增强起来。所以这 1993 年是第一个飞跃。

到 1998 年,杭州大厦有了第二个飞跃。当时,我们现在的 B 座是叫新天龙商厦,他们的公司内部出现了一些状况,大家都感觉到这家企业可能会不太好了。杭州大厦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如果不去兼并它,那么别的单位会到这里来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因此我们就兼并了新天龙,它成为了杭州大厦的 B 座。其实在兼并的时候,总经理和整个领导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返回去看,作为一个总经理,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决策,二是用人。当时我们决定兼并,真是需要有点魄力的。杭州大厦那时候是 800 名左右的员工,新天龙可能已经意识到企业将要不行,所以他们的人力资源部门给全体员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全部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在当时还是很时尚的,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无固定期限、有固定期限,连员工自己都不太懂,糊里糊涂地就签了。这样新天龙倒闭后,所有员工都作为正式工(由杭州大厦)接盘,这等于是小弟弟抱大哥哥了。当时我们召开了员工代表大会,由大家举手表决,最后很一致地决定了兼并新天龙。那时候的说法是“强强联合”,因为当时新天龙(的效益)还是不错的。

兼并以后,我们的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从本来 A 座的一栋楼,变成了两栋楼。那么有了地方以后做什么呢?选择商品是很重要的。当时童民强还在购物城,他强调要走精品、名品道路,就是“商品销品牌,商场创名牌,用 3 到 5 年时间实现杭州大厦这个品牌”。确实,在三五年之后,杭州大厦成了买优质产品、高端产品的地方,到后来逐步演变成“要买奢侈品到哪里去?就到杭州大厦”。当时有一个情况,杭州的有钱人买高档商品都得去上海,我们就说你们不用去上海了。后来又出现很多人会去香港买,现在也不用去了,因为买奢侈品的人总归是要买的,而每次都出去带还是挺麻烦的,价格么算上路费也差不多。如果仅仅为了商品,还不如在我们这里买。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服务好,这也是杭州大厦企业文化里可以总结出的一条。从 1993 年重新开始以后,我们就推出“服务要成为企业生命线”,搞了第一个大型活动“顾客之月”,提出了主动服务的意识,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新的。什么叫主动服务?就是当客人需要你为他服务的那一瞬间,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而你通过他的肢体已经意识到他有什么需求,在这个时候你要很恰当地表示出我们的服务,这才叫主动服务的意识。在这个大型的“顾客之月”活动中,我们发了将近 5 万份的调查问卷。当客人买商品的时候,就提供他一份调查问卷,只要客人填写了,都有礼品赠送。当时我也在团队里做这个事。(问卷的)内容有“您认为优秀的员工,请告诉我工号,他有什么事情感动到了您;您如果不满意,也请告诉我他的工号,以及需要我们改进的地方”等。我们把表格分开,凡是给我们表扬的,都表示感谢;凡是给我们批评的,我们都一个一个找到当事人,不管多远都去。那个时候没有出租车,更没有地铁,要么靠两条腿走,要么靠骑自行车,连坐公交车都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真的是一家一户都找到,让当事人都很感动。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一直推服务,后来慢慢发展到个性化服务、无缝隙服务、品质服务,现在的员工服务手册里都有提到。员工们在公司理念的指导下,逐步地进步。所以杭州大厦不仅商品高端、奢侈,而服务也至少是国内一流的。

第三次飞跃是在 2009 年。那个时候,经济泡沫已经开始了,经济危机也已经开始了。我们在一年中,新开出了两家商场,这在国内都是不多见的。4 月 25 日开了 D 座,9 月 25 日开了 C 座。C 座和 D 座在环城北路北面,A 座和 B 座在环城北路南面,靠什么来连接呢?就是天桥。这大概是国内最漂亮的现代化廊桥了吧,一年四季都显示出它的绚丽光芒。这样,四大商场形成了我们“做大做强武林广场”的理念,营业面积从最开始的 2.5 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 18 万平方米,经济效益也是连续翻番。到 2011 年,是我们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做了 60.8 亿元。2012 年有点回落,是 59.1 亿元。这是光指我们的商场这一块。

(三)

我们的商场最先只是一个小卖部,杭州大厦最开始是个 hotel,就是宾馆的意思,商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慢慢地越做越大,以至于人们认为杭州大厦就是个商场。其实商场和宾馆是我们的两大主业,并驾齐驱。最开始成立杭州大厦的时候,我们整家公司是跟澳门的南光集团合资的,作为合资企业,国家有很多政策上的优惠,我们也是用足了这个政策。合资了以后,我们是挂牌三星级的宾馆。对于宾馆,哪个星级要达到什么服务,标准是非常细的,都有分数,每年通过明察暗访来审核。我们就拿这一套服务理念及服务标准对全体商场的员工进行培训,我觉得这在国内也是堪称创举的。在其他地方,宾馆就是宾馆,商场就是商场,拿宾馆的服务礼仪引导到商场来,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吧。这样子以后,商场的员工服务礼仪就有了标准,填补了百货业服务

没有标准的空白。

宾馆达到三星级以后,还是要不断进步的。因为几星级的宾馆,房价是受到限制的,要发展,就要上星级。如何上星级?杭州大厦只有这么一块土地,没办法扩张,但是可以向高科技发展。比如四星级的标准里面有电脑和无线设备,我们就改造宾馆,把它变成一个主题酒店,以我们的专业和特色,挂上了四星级牌。另外,为了要实现“寸土寸金”,虽然大堂是一个宾馆的外貌,但杭州大厦的一楼这么金贵,我们就实行了一个重大举措,把宾馆的大堂改建到了五楼,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那个大堂非常宏丽,金碧辉煌的味道。又做了一段时间,觉得这样虽然漂亮,但是经济效益还不够,又把大堂改建到了七楼。现在的大堂给人的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在尝试把大堂往高层升了以后,效益依然还是很好,原来我们还曾经很担心怎么把客人引上去。这样,宾馆也显示出了它的实力。

现在,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的管理结构从直线型进入到了事业部制,能够更好地将经济效益和管理职能都明晰化。在事业部制的结构下,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超市公司,作为其中一个事业部。超市公司现在除了杭州大厦店以外,也有几家门店了,但还属于正在发展中,属于我们公司的小弟弟小妹妹。这样,杭州大厦就有了三块主业:商场、宾馆和超市。同时,我们从前年开始进军房地产业,现在城东方向有一个西子国际在建,杭州大厦在这里是有股份的。

这些都是硬性的条件。在软性的条件上,就是杭州大厦这么多年来对员工的培养,包括它的企业文化,都是很充实的。以商场举例,现在都是店中店的管理模式,那么多的供应商带来的员工都在这里,大概有4000多个人,而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一共也就近6000个人。那这些供应商带来的员工为什么要听你杭州大厦的,这么多厂家的人怎么管呢?这就跟服务理念有关系了。我们公司的理念,服务于顾客这是没话说的,还有就是服务于供应商,服务于员工。这三个服务也是杭州大厦的一个特色。在服务供应商上面,当供应商有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包括结账、资金调用、楼层调整、商品调整等,杭州大厦都给以相当多的支持。还有就是员工,在品牌供应商的员工中,现在随着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不断灌输,人们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在十几年前,大部分品牌供应商的员工都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件事情上,因为杭州大厦的经济效益很好,希望来的供应商也很多,我们的总经理就提出来要用好资源,实现品牌的资源共享,就是你要进到杭州大厦来,就必须遵守杭州大厦的规则。而杭州大厦有一条规则,就是必须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点是我们最先提出来的,杭州市商业联合会还专门为这个事情写过文章。2005年、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3件事情,第一是要求供应商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第二是要求供应商给员工的工资不得低于社会最低收入,第三是要给员工休息日。员工以前是没有休息日,也没有最低收入的,有些品牌做得差,员工收入就很低。这样强行硬推了将近两年后,所有的供应商全部都签了劳动合同。又比如,有些公司是做一休一的,我们就提出来不应该连续工作13个小时,要求按我们的工作作息时间,分上午班和下午班,然后再给休息天。这些要求在推的时候都是有阻力的,但慢慢地也都做到了,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员工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给买了社会保险,看病也有了依靠,他就能安下心来。同时,我们还推出了很多免费的培训,包括手语培训、英语培训、普通话培训等,这些都是有证书的。你在我这里工作,表现出色,我就让你免费培训,只跟你签一个协议,3年内为我们公司服务,不要走。如果3年内走的话,证书还是给你,就把培训的钱按期限递减还给公司。后来国家推行资格证制度,就是上岗要有资格证。我们给员工的,就是初级资格证由公司出钱,这个有相当一段时间是政府给钱的,自己不需要出钱。但中级以上

都是需要自己出钱的,我们就全部由杭州大厦出钱。这上面投入的钱相当多,你只要在这里工作,我们就都不收钱。你3年以后再走的,我们也不收钱。最后,杭州大厦形成了一个培训基地,从杭州大厦出去的人,学到了很多,因为都有证书,到了外面直接就能做店长。我从2001年起担任培训经理,到现在10年下来,教过的学生大概有十几万人了,无论走进哪一家商场,面孔都很熟悉,这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让我挺有成就感,也是应该感谢杭州大厦的。

三次飞跃过后,我们高层的领导有了新的思考,开始做“百年杭州大厦”的梦。在人才梯队的培养、企业的扩张、国际品牌的引进上,包括将来在地铁下面这些商场的管理上,我们都应该成为佼佼者。当年我们童总第一次去LV公司总部的时候,人家对杭州,根本是当乡下地方看的,但是童总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去。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每次去之前,我们都做了努力,做了功课,人家也看到了我们的成长,最终答应来看一下。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以前杭州大厦挂了一个很大的LV箱子,这个箱子价格不菲,是杭州大厦自己出钱的。我们的想法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百分之百地去努力。

(四)

我个人的话,从1986年进杭州大厦以后,先是做了3年的营业员。当时第一任总经理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他说要把我们送出去学习,谁功课第一名就请谁做领班。我那时26周岁,在下面听得很激动。那时候的学习很轻松,上午学习,下午放假,我每天都把功课熟悉到可以复述老师所讲的程度。最后考试的时候,我最差的成绩是91分,最好的成绩是99分。后来,杭州大厦真的就让我做了领班。当时的领班就是柜组长的意思。领班做了3年,其间还是不断地学习,之后就被提升为主管,相当于经理的下面一级。我从进入杭州大厦开始,直到2011年11月11日到人力资源部报到为止,一直都在商场工作。1995年,我们去郑州亚细亚学习,回来以后总经理召开座谈会,我提出了表格式管理的建议。商场总经理就找我来谈,让我做做试试看,一个下午之内就决定,新成立一个商场管理部,由我来负责,先担任副职的经理。这样我就开始编制员工的服务手册,对工作流程、操作步骤等都做了说明。写半年,纠正半年,一年以后形成制度,再有违反,就扣钱。商管部成立以后就这么做下来了,慢慢地演变成我们现在的作业指导处。到后来,我还组织员工们进行正确规范的培训,实现了从小时候起当老师的梦想。2001年,公司成立培训部,我就去担任了副经理,从事教学工作。我觉得这是把我放在了应该去的岗位上,后来我还在这个岗位上编了教材。

这样,商管部成立以后,才陆续成立了管理部。当时商管部做的一个工作是总服务台,现在变成了宾客总台这个部门;当时还有块工作是负责商品投诉,现在有了质管这个部门;当时巡查的部分在商场保持下来,现在属于营运部;那时候还有很多的服务投诉,现在也有了专门处理的部门。还有现在慢慢地有了客户中心,管理的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当时成立的商管部,是我们承担管理职能的第一个部门,是“向管理要效益”这句话显现作用的开始。还有企业文化这一块,也是我在做。我找了一些载体来丰富员工的生活,连续搞了几年的大赛。现在我们有“店长之星”评选,这些人的奖励都由杭州大厦出。我们还有“员工之家”,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大型活动。

在担任了培训老师以后,我更认识到要让别人信服你,自己就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我进公司的时候学历不是很高,只有高中文化。在担任了部门经理以后,当年我就报了职称考试,一下子就考下来了,那时我37岁。之后,我重新开始走上读书的路,一直到现在没有停下来过。大专

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给予了免考进本科的机会,就一鼓作气拿了下來。后来,又考了国家二级培训师,当时的企业培训师最高也只有二级。之后就不断地考试,包括普通话、英语等等,现在是考了很多了,有高级人力资源法士、企业咨询师、大学生创业指导老师等等。一路走来,从我的成长和杭州大厦的成长来看,应该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五)

杭州大厦从最开始成立以后,职能部门是慢慢产生的,之后又不断扩大。但总体结构不变,就是宾馆和商场,这是营业部门。还有管理部门,比如人力资源部、保安部、工程部、总务部等。这些在当时是属于直线型的管理结构,如果画个图来说,就是总经理和总经办,然后7个副总经理分别管一个部门。现在变成了事业部制,就是在总经理之下分了宾馆、商场、超市三个事业部。在销售管理中,开始实行部门经理负责制,部门经理下有业务助理,有业务主管。后来由于商场不断扩大,业务主管下面可能有一到两个业务员,行政主管下面有一个管理员。这下面还有柜组长,基本上都在楼层管理那些品牌公司。

员工的结构上,最开始是零零星星通过各种渠道来的,还有像新天龙这样整个公司并进来的。一开始的规模是不到300人,后来陆续招人到了800人为止。新天龙一兼并,1000多人一来,直接到了1800多人。对新天龙的这部分人群,当时做了分流,因为这么多员工要一下子消化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走。第一步,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办理退休手续;年龄偏大的,留去自由,办理退养手续;再稍微年轻一点的,可以办理退岗手续。因为给的政策很优惠,新天龙有一部分人是走的。剩下一批年轻人,大概也有三五百个,就进行培训,培训完了考试,然后分期分批充实到我们的员工队伍里面。这样子把新天龙的员工消化掉以后,我们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没怎么招过员工。最近几年,因为企业在发展,员工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当年三四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要退休了。考虑到后面接班人的问题,我们从1997年开始招聘大学生,充实到员工队伍中来。一开始招得不多,每年也就是三个五个,陆陆续续地进人。大规模的招工是在2009年,我们一次性招了35个员工,其中有本科毕业生,也有自学成才的大专生,有些已经在杭州大厦的品牌店工作了很多年。从那以后,管培生的队伍开始形成,但真正大规模招管培生是在2012年。

杭州大厦现在是1300多人,因为一些人老了、走了、退了。在员工队伍中,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部门经理是从其中提拔的。但因为行政岗位毕竟有限,大部分的人还是走不到领导岗位,所以这几年我们总经理提出来“双通道”,就是管理能力强的人可以走行政通道,其他员工可以走技术通道。比如营业员,如果能把商品卖得优秀,可能就是首席服务顾问;比如做工程,如果推出的项目优秀,可能就是工程师;比如计算机岗位的,设计了一个杭州大厦的管理软件,就有版权。这是去年提出来的,现在正在完善中,还需要时间。应该说,一个人一辈子不跳槽是不可能的,但在杭州大厦3到5年的工作经历,是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时间:2010年12月24日

口述:沈天仁——滨江区西兴街道缤纷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

采访:金利权、高丹

整理:高丹

(一)

改革开放实行以后,发生的变化是大家预想不到的。在我们这里,三十年的变化已经说不清了。因为这里是钱塘江边,原来很苦的。

我是1975年到村医务室的,当时17岁,一天的工资是9毛5分。一开始很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家里还要种地。我初中毕业到这里,才待了一周,村里就把我送去医院读书。读了半年,回来半年,又去实习,再回来一年,又去进修。这样陆陆续续的,边干边学。那时候我们比较苦,也比较忙。打预防针,搞计划免疫,都是晚上去,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挨家挨户上门,也没有补贴,深夜12点才能回来。晚饭顶多一人两个面包就解决了。到后来一点点地经过体制改革,才好了起来。那时候我们住得很远,一开始来上班都是靠走路的。后来有了一辆自行车,晚上出门的话才好点。当时我们和七甲闸村,从最西南到最东北将近有5里路,晚上一个诊出下来就很晚了。

当时的设备条件也没跟上。80年代的时候,滨江附近没有大医院,到杭州市区很不便,三桥都还没造。如果晚上去看个病,脑血管病或者其他一些急病,都要送到萧山人民医院去。我很喜欢送病人,因为送病人有几个好处,一是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比读书还好。比如你自己吃不准的病人,大医院的医生就会跟你讲,叫你听牢。先问你,是什么引起的病,然后就跟你聊天,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学习机会。二是同病人家属交朋友。我们村里这批人,基本上都知道,病人我会去送的,不管是不是晚上,所以都很放心。我们这里有些乡村医生认为病人转出去就好了,我就认为送病人其实也是件蛮好的事情。还有抢救病人,我都是一边挂盐水一边送过去的。原来农村里喝农药(注:即自杀)的病人很多,现在少了,我手上就救回来过3个。已经快死了,又救回来了。我都是一边车子叫好,一边在半路上催吐,药用上去,弄到医院里。我们这里原来有很多水塘,一到夏天,小孩子溺水的就很多。我救过好几个小姑娘,当时都快要死掉了,最后终于救过来了。现在都出嫁了,还拿喜糖过来送给我。

我们卫生站的地址经过很多次变动,条件是一点一点变好的。70年代的时候,是三间茅草棚。过了大概五六年,就变成三间小平房。后来村里有钱了,在1988年的时候造了个260多平方米的房子,楼上楼下都是我们卫生站的,里面科室齐全,条件也挺好,像医院一样。当时省里和中央都到我们这里来过。现在这个场地(注:指卫生服务站)从小区开始建时就规划了。整个社区的服务中心都在这里,一共3层楼。我们卫生服务站很快要搬去北面场地更大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地方不够用了。特别是上午病人多的时候,就诊室里根本挤不下。小区今后还要大起来,估计人口会到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五千人。医疗器材也要再改造一下,否则的话要跟不上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的病人,大概要占到中心院的三分之一。往后,公共卫生、预防卫生都可以搞,病人就不用跑到西兴去了,(那样)也不方便。

(二)

农村变化也很大,我们这里的人原来是很勤劳的,离杭州近,蔬菜好卖。我在村里工资每年只有一万多块,家里种种蔬菜也有两万块。我早上起早一点,在地里干两个小时活,马上赶过来上班,菜叫我老婆去卖掉。现在时代发展了,我们这里的人大都从农民转为居民了。滨江如果不开发,没有从农村转为城市的话,年纪大的人没有这么好过。他们总是讲:还是政府好。滨江区成立这十年,老人跟儿子、媳妇吵架的事少了好多,本来经常要闹纠纷,找我去劝的,现在都不太需要了。现在的老人是真享福了,政府给发钱,他们都有钱了,小的要捧着老的了。现在村里的年轻干部很为老百姓着想,村委会给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100块钱,一到了70岁,重阳节等节日都去看望。每两年给老人体检一次,这一块是政府给的福利。我们这个社区中心里,老年活动室、图书室、理发室等都免费开放。一到星期天,小孩子都在这里活动,打打乒乓球什么的。

还有公共卫生,刚开始我们村里都是茅坑,后来就开始搞卫生公厕。当时萧山是从我们村里开始搞的,政府贴100块钱,用一个月时间,把茅坑全部清完,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因为外地人多,村的公共卫生这一块,仅垃圾清理一项,每年的费用就要20多万。村里条件好,领导也重视,所以我们的公共卫生搞得挺好。我们卫生站的药特别便宜,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零利润,进来的价格多少,就卖多少钱。比如进来一块钱一颗,就卖一块钱,政府贴钱。这在我们滨江已经试行了两年,今年(注:指2010年)开始,在杭州市基层全部推广。今年的药价又降了20%。老百姓现在看病,都跟我说:沈医师,你给我们药用得好一点好了,十多块钱我们付得起。

农民转居民,老百姓的意识,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也在改变。原来没有这个意识的,现在都认为社保和其他的保险应该买,也开始注意养生了。有空的时候,我就跟病人聊天,平时要注意些什么,这么大年纪吃饭要怎么吃。你把科学方面的东西跟他们聊,他们听不懂,转头就走了,就是要聊接地气的话。比如甜的东西少吃一点,饭该吃多少,中午稍微吃点番薯之类。所以我说,农村转城市的时候就是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来。2002年刚开始住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也弄不好的,随便什么东西都乱丢。经过8年的发展,现在小区里面很干净了,改造得蛮好。小区里面的绿化,从来不破坏,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个小区是安居房,里面空间蛮大,要玩的娱乐设施也都有。

(三)

我们卫生站的体制改革,一步一步都是按照国家政策改的。1992年,我们就开始改革。萧山卫生局先在我们这里试行,那时还不是搞承包。当时把星民村卫生服务站的房子重新建造,我们村实行每个村民每年出两块钱,村里贴一点,我们赚一点。我们这里一直都没被承包掉,就抓牢这一点,医疗、医药都没有承包,有承包就不行。不改有什么好处呢?对老百姓有利。像湖州等一些地方的几个市,来我们这里考察过。他们后来比我们先进是为什么?就是参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制改革以后,老百姓出一点、村里出一点、政府拿一点的做法。我们村里本来老百姓看病就是报销60%,一直没有少过,那时候村里每年估计要为老百姓贴出合作医疗费将近30万。2004年的时候,我们全部并给镇卫生院,现在叫中心服务站。当时村里老百姓就不同意,他们说本来就可以报销六折的,而且住院病人还可以上面国家报销一点,下面村里再报销一点,家里比较苦的还可以再补助点。

2006年,我们并给中心以后,主要还是以公共卫生这一块为主。我们自己村里2800多人,七甲闸2500多人,两个村一共才5000人稍微多点。但我们这里外来人口有将近8000人,还不肯走。因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来看病的时候,我也不会敲他们竹杠,该用的用一点,不该用的不用。后来连杭州、萧山,很远地方的外地人都过来看病了,这也有很多年了。

(四)

我们乡村医生,其实就是赤脚医生过来的,慢慢地已经淘汰了。现在乡村医生人数不多了,整个滨江不会到100人。政府要把社区卫生室工作人员的劳动保障搞好,医疗体制改革就会好改。小医院是大块,包括传染病防疫等,都是基层在管,管好了就没有事了。尤其是年轻人的编制和保障,人数也不多,要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工作。

卫生站成立时有4个人。30多年里,两个老的退休了,两个新的进来了。我和高中毕业比我晚来两年的小高,两个人一年就可以赚20多万,全部贴给老百姓,我们只领工资,一直这样。后来星民村和七甲闸村合并成缤纷社区,我们站的人员就增加了。我们有3个,他们有4个,有两个要分到其他地方去,我留了一个,一共就有了6个人。我经常跟这里的年轻人说,你们现在来了,其实是享福的。现在人员集中了,要忙也就忙几个小时,而且白天也好,包括晚上,要忙也不会去叫你们的。

我现在家住得很近,有什么事情基本上都可以过来的。晚上如果有人来叫也很方便,我基本上也没什么事情。我的电话号码都不用问的,一般不是在家里就是在村里,谁家身体不好了,叫一下我就来了。我不打麻将也不打牌,这样跑跑,感觉也蛮好。有人说,我现在这么忙,两个人,每天上午七八十个病人,七点半上班,到十一点,基本是没空的。我说还好,不怎么累,其实还是过去累。过去跑死了,过去的病人(病)重,现在的病人(病)轻。现在重病人少了,一点点病他自己来看了。本来如果晚上我们出诊去的话,我总感觉到很怕。小孩子最起码是高烧烧到抽筋了他才会来叫你。也没什么上半夜后半夜,有时候三四个病人一接,一个晚上就去了。那时候路又远,你去了又不好马上走的,送医院么也远。盐水挂上你要陪,陪了以后你再回来,最起码就要两个小时。现在好了,现在做医生真是享福了。

时间:2013年5月31日

口述:陈 峰——上城区紫阳街道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

采访: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是嘉兴人,大学是在温州读的,1995年毕业以后到杭州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居委会。居委会是社区的前身,以前叫居委会,后来叫社区,是2001年改称的。我从1995年到2001年,一直在居委会工作,也经历了整个社区机构改革的过程。1998年的时候,我已经当居委会主任了。换届选举之后,当时叫第一届,我在复兴南苑社区当选为第一任书记。到现在,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我从事社区工作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是最早的一批“村官”,当然“村官”这个词也是后来才有的了。我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在居委会和社区这个岗位上度过了。

我去过很多地方,最早是在复兴路这一带,拆迁之前,有一个叫山南居委会的,现在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刚毕业之后,当时的职位叫主任助理,我主要负责一些宣传、文字及党务等工作。那时候的工作性质跟我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居委会主要是一个业余的自治组织,工作人员都是一些退休的大伯大妈,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管管卫生、做做宣传,带上红臂章组织老太太们进行治安巡逻,以及对党员的一些收容式的管理。就是党员年纪大了退休了没地方去,由社区把他们聚集到一起过组织生活。

我是毕业分配到居委会的,也是阴差阳错。本来我是分配在街道下属企业的,因为我们都是7月毕业,三四月的时候已经跟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我还没去上班,企业就倒闭了。当时我们共有4个人,街道看我们是大学生,觉得也很需要,经过研究后决定让我们进街道。进去以后首先就是到居委会去锻炼,我们就是这样到了居委会工作。

当时在居委会,我们这种年轻人是没有的。我的同事们比我的爷爷奶奶年纪还要大,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是75岁左右,我才22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思路、方法和理念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也有许多的经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很被动地做一些配合工作,应该说也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山南居委会做了3年,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最主要是怎么跟不同年龄层次、各种类型的居民打交道,如何来了解民情民意。我也在那段时间结交了很多忘年交,比如居委会的大妈们对我非常好,像我这种外来的“新杭州人”,生病时候还给我烧稀饭带过来,让我十分感动。

(二)

之后一段时间,我短暂地在街道里从事过就业、城市管理方面的工作。那时候因为中河南段的“抗咸工程”,整个复兴路全部拆掉并开始建设回迁小区。原来那个地方都是棚户区,有句话叫“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就是形容复兴路一带的。当时的房子都是一层最多两层,也没什么基础设施,居民都是用马桶、用水井。后来到1997年、1998年时,第一个小区复兴北苑投入使用,当时虽然还没全部建成,但已经有几幢楼交付了。我就过去担任了居委会主任,书记还是由一个年纪很大的退休大伯担任,也算是新老结合。我就在那里探索这种小区的管理模式,虽然现在看

来那里也不算太好,但在当时老百姓都很高兴,觉得是住上洋房了。那时候居委会进去了,也开始有物业了,片警也开始进入。我们当时有一个创新的点叫“物居警联手”,还到省里面交流过这种多方共同管理小区的模式。

1999年初,第二个回迁小区复兴南苑建成了,我又去担任居委会主任。这时候市里对居委会这块工作慢慢地开始重视起来了,我们街道包括区里都开始感觉到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理念了。当时我们有一些创新的工作,也获得了很多荣誉,来参观来访问的人很多。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来我们小区参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这个班子年轻有战斗力,那时候我年纪还很轻。就这样,各级领导重视,然后加大投入,老百姓的服务设施、经费和人员都跟上了,逐步走向了正轨。也因为这些原因,开始有从居委会到社区的改革。我记得那时候王国平书记在市体育馆开了动员大会,此后在全市掀起了一个高潮,居委会都逐步地改成了社区。我就是经历了这整个过程。比如原来的一班人马都是退休的,后来就找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专职人员,包括招聘了一部分城市协管员,以及从社会上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招人,整个年龄结构在2001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南星街道那里我还有很多好同事,就是最早招来的那批人。我那时候当社区主任,街道还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找人来社区工作。因为当时没人要来,待遇非常之低,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我就找了一些人过来,现在有些也都当主任、书记了。

2001年下半年,通过换届选举,我们正式成立了第一届社区居委会,我那时候在复兴南苑社区居委会,就被选为第一任主任。这以后,社区工作应该说就逐步正规起来了,我们也非常注重一些基层的基础建设,比如说开始注重骨干队伍、群众自治力量的培育。我记得当时为了组建一支小组长队伍,连续好几个月,请每一幢楼的代表下来开会,由大家推选小组长,最后形成一支骨干队伍,号召力和公信力非常强,对整个工作的推动也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能因为更多的行政化而弱化自治的作用。到2001年底,社区建设在我所在的复兴南苑应该是达到了最高潮,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的人非常多,国家部委和省里面很多领导都来过。我们很多的创新做法,包括业主委员会的组建、物居警联手等都是新生的事物,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

后来,我们街道新建成一个商品房居住小区,叫海月花园,完全不同于复兴南苑和复兴北苑这类社区。当时我原先所在的社区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也有人跟上了,领导就派我去那里摸索商品房居住小区的管理模式。我在那里担任书记、主任的时间比较长,干了8年。这个社区也是处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一开始只有一个单独的小区——海月花园,慢慢地把金棕榈花园并进来,再慢慢地把十亩田家园和清逸花园等小区并到一起,社区工作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这个过程就是从社区建设有了一定的模式开始,到2010年我离开的时候,这个模式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杭州市的社区建设在全国也是十分领先的。当然商品房居住小区的管理模式和回迁小区大有不同,那里的居民经济收入水平和文化层次都相对较高。回迁小区更多的是居民单向地希望政府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生活上的以及养老赡养等经济上的东西。而新的商品房居住小区由于层次较高,他的需求就不一样,比如说家政、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

我在那边搞了几个事情,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信息化。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搞社区网站信息化,做得非常早,而且是自己挖掘资源搞的。当时我们小区有一家网络公司,经过

协商之后,基本上是以无偿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一个网站。这个信息化的尝试很好,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逐步开始使用电脑了。我们这个社区网站的建设过程,见证了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后来我们还搞了论坛和一些特色板块,比如早教方面,宝贝俱乐部就做得很成功,效果也非常好。在基层民主方面,有时候政府想做一件事情,本来是好事情,却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做完以后受到一些非议,最后被推倒或否定掉,使整个效果都大打折扣。我们在2002年就通过网站进行社区事务听证,后来全区都在搞这个事情,就是在做一件事之前进行公示,让老百姓都知道并且来提意见。比如我们当时建科普宣传画廊,投入很多,但是样式一直定不下来,位置也很难选。因为金棕榈是一个花园式小区,整个景观是专业设计过的,放到哪里弄得不好是影响整个景观协调性的。我们把这个情况通过网站公示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包括选址和式样,居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最后我们定的位置可以说是最合理的,样式效果也是最好的。这个载体我们后来很多都在用,包括社区办公用房的装修,以及一些活动的开展,都是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当时QQ还很少,也没有群,我们就用Hotmail进行即时交流,对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网站板块上还有红黑榜,好的事情弘扬,不好的事情批判,都要让大家认识到。这样通过信息化,我们带动整个社区建设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这个社区大概有近3000户人家,八九千人,流动性比较大。我现在对这些很熟悉了,包括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等配套的东西,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我现在除了是人大代表外,还是城建环保委的一个专委会成员。比如对《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我觉得自己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经历过一些低层次的物业管理,包括一些由房管站转制的。比如我们复兴南苑当时是由城南房管站负责的。原来的事业编制,后来因为市场化,走了物业管理这样一条道路,他们有一些问题,当然也有好的一些方面。到海月花园后,是纯商品化的赞成物业,做得很好,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也很到位。这些我都经历过。还有业委会改选,我也经历了很多次,这种基层民主很重要。特别是在封闭的商品房居住小区里,这样的机构应该发挥很大的作用,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非常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好对推进社区建设和政府管理有很大帮助。目前这一块的法律还不是很健全,有一些问题存在。现在市里面很重视这块,修订物业管理条例也很有必要。比如居民把业委会赶下台、物业撤退,以及业委会跟物业的关系处理不好等等,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

(四)

2010年3月,我离开海月花园,到了南星街道的美政桥社区。这个社区在南星街道的地位很重要,是个窗口,也是个社区建设非常领先的地方。它是一个混杂的社区,有“抗咸工程”的回迁小区,有普通的商品房,有高层一线江景的楼盘,也有单位的比如民航宿舍。这样的混杂社区管理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挑战,连物业公司都有好几家。如何协调不同层次的老百姓,需要一定的技巧。

到那边去以后,我发现了很多问题。社区建设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百姓就是一句话“有事找社区”,造成社区无法应对所有问题,责权利不匹配,即我的这点职责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政府特别是一些社会组织来解决一些问题,于是我就组建了“陈峰工作室”。它是一个民政局备案的社会组织,名字虽然是我,但是在发挥的作用上,我只占很小一部分。我下面有很多人,其中有社区内的“能人”,也有一些社会资源,比如说律师、民警,以及医疗

机构像市第十医院、宝力门诊部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辖区内的一些企业资源,理发、磨剪刀、修理等等服务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心理危机方面的,是我们从外面大专院校引进的力量。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陈峰工作室”这个平台,把这部分资源整合,来为居民服务,效果是很好的,应该说名气也是比较大的。

我走了以后,工作室没法再叫“陈峰”这个名字,他们就改名了,但是这帮人马还在那里。当时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我们引进了一些退休的大伯大妈,他们非常热心,手里也有一些资源,后来就做了一个相亲会所。原来的想法是给社区内和周边的大龄青年进行牵线搭桥,提供相亲服务,后来越做越大,到现在登记的有五六千人,而且覆盖整个杭州市甚至杭州市之外的人群,影响力和社会效益都很大。我们当时引进的负责人吴耀汉,就是浙江电视台现在的“老娘舅”。还有周边社区一些能干的人,我们也把他们吸收进来,所以效果是很好的,真真实实地给老百姓解决了一些问题。

再比如我们的一些便民服务。“陈峰工作室”下面有很多的“能人”,其中很多服务老百姓都很欢迎。其中有个退休的木匠,我们的居民有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他,什么抽屉坏了、铰链掉了,他都会无偿地去提供服务。还有我们的理发服务,就是把外面的商家引进来,每个星期两个上午,在我们的活动室里面,进行免费的理发,很受老年人欢迎。因为社区里有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这种无偿或低偿的服务,而且又很优质,当然受欢迎。这家理发店在我们那里是最好的,生意很好,这样每星期来服务,老百姓是很喜欢的。

这些资源都是去找他们谈来的。但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便利,比如他们要搞一个活动,我们会提供一些桌椅、场地之类,也是一种双赢。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整个社区工作的推进作用是极大的。很多社区无法做或做不了的事情,社会组织有这样的资源为老百姓服务,做到了很多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很多。现在我们上城区对这样的社会组织很重视,今年是要重点发展的。

我在美政桥社区待了两年多。去年的时候,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以社区工作者的身份考取了公务员。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居委会社区工作,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领导还对大学生到社区工作专门做过调研,觉得很少见、很稀奇,怎么会有年轻人到这里来工作的,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事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通道被打开,这是一个过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只要有水平、肯上进,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这几年,高学历的年轻人也都来社区了,这是很好的。像我们上羊市街就有海归,硕士生也有,在做普通的社工。

(五)

以前的时候,社区居委会的架构是很简单的。居委会组织有五大委员会,其实就5个人,就是综治、计生、妇女文教、民政福利、卫生5个委员。这几个人跟我们的党支部也是重叠的,反正就那么几个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当时刚成立社区的时候,一个是居委会,一个是社区党支部。那时候没有党委,因为退休工人都还没下来,党员数很少,现在退休工人全部社会化管理,都归社区管了,党员数就多了。以前的政府职能也没有现在这么多,退休人员的管理,失业人员的管理,现在都归社区了,我们有个劳动保障站。当时的社区民警也没有现在这么规范。还有城市管理,现在除了卫生委员之外还专门有城市管理的岗位。也有专门的帮扶救助员,负责低保困难户的审批等。我们现在还有残疾人专管员。这些都是新的岗位,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正式社工编制的十

四五人外,还有协管员,还有 4050 人员,一共 20 多个人。这是个不断扩大的队伍,也是因为政府重心的下移。社区现在承担了政府许多公共服务的职能,所以成立了公共服务站。

我到现在已经工作 19 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是三四百块钱一个月。一直到 2007 年、2008 年之前,我还只有 1000 多块钱一个月,但在年轻人里还算是好的,因为我工作时间比较长。如果是刚来的大学毕业生,简直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证,比如租房、吃穿等基本生活开销,所以人很难留得下来。后来就有了待遇上的改变,大幅度提高到 2000 块钱左右,但跟整个平均工资水平来比,还是很低的。再后来,连续又有两次调整,像我这种参加工作最早的主任可以拿到手 3000 多块钱,基本上就跟一般企业差不多了。大学生进来能拿到一千五六百块钱,待遇还是低,但能保证基本生活了。去年又进行调整后,像我这个工作年限,应该可以拿到手 5000 多块钱,这算很可以了。

现在还推出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我是第一批,在 2008 年就考出来了,这是全国承认的。如果自己努力,可以通过这个考试争取职称,也有相应的福利,是 400 块钱一个月。这些都加上的话,以我的级别和工龄,可以拿到 5000 多元钱一个月,那就比我现在的公务员身份要高了。所以说,待遇确实是上去了,现在年轻人进来估计可以拿到 3000 元钱左右,跟之前有很大的变化。

(六)

去年我作为社区代表,在上城区五六百个社工中被推荐、选举为市人大代表,也感到很光荣。我在社区做了这么多年,对老百姓在想什么和想让政府做些什么很清楚,因此我的履职就是把老百姓的呼声带到政府的决策层。但我认为这个比例还是太低了,我是唯一一个代表,在这个层面上的代表应该更多一点,基层社区的发言权也不够。

我提的建议案还是蛮多的,有公交出行、八卦田景区周边的卫生、公园的夜间照明、钱塘江的旅游开发、小学生的课桌椅等等。主要是通过一些居民的反映,自己平时了解的也比较多。作为人大代表,有时候我会到社区去接待选民,他们也会提一些问题上来。而且我在南星街道、紫阳街道待了这么长时间,对这一带很熟,老百姓有哪些需求我也很清楚。应该说人大这个平台是很好的,通过这个提上去的问题,相关部门很重视,解决的速度也很快。最近,我正在提“一户一表”供水方面的问题,还有城市建设死角的问题。

人大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也可以提建议案,但效果应该是在会议期间提比较好,所以大部分的建议案都是在会议期间提。提了之后,相关部门都会给我们反馈。

时间:2011年1月24日

口述:罗红英——中国美容大师,浙江花都美发美容培训中心主任

采访:李忠民、金利权

整理:高丹

(一)

我不是本地人。作为一名外地人,生活在杭州,发展在杭州,我觉得很自豪。杭州秀丽幽美的自然环境培育和造就了一批有文化的人。我能够在杭州工作,作为一名职业技能培训的老师,能受原国家贸易部和现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编写全国教材,能作为国家外派专家到国外去学习交流,我很骄傲。

1988年前,我在杭州越剧院搞形象设计。一个偶然的出国机会,让我领略和学习了国外很多时尚方面的知识。回国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创业,办了一个美容美发的职业技能学校——花都美容美发培训中心。1988年8月8日,在杭州大学路小学内的教室里,迎来了第一期13名学员,是她们见证了“花都”的诞生。从那一刻起,“花都”就与时尚美丽相伴而行。

当时杭州的美容美发行业,只有一家国营的“时美”,民营小店有,但是很少。因此创办“花都”压力很大,因为国营的“时美”也在搞培训,她培训出来的学生可以拿营业执照,而民营学校就拿不到。我就是顶着这样的压力,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是自拉自唱,自己教,自己辅导。要招学员,只有在报上登广告。开始时没有人来,只有十几个学生。但我教出来的学员很管用,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他们说,用工就要招罗红英花都学校培养的学生。因此,学生也越来越多,边远的江干区、余杭区,包括无锡、苏州的学员,都开始认可我们的证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也迅速发展。90年代初,我们学校通过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是当时浙江省唯一的一所。这样,我的劲头就更大了,学生也开始源源不断。招生人数从开始的每月50名发展到月均500名;班级从一个发型专业师全科班到高级美容师班、专业美容师班、专业彩妆班、专业护理班、高级发型师班、专业发型师班、纹刺绣术班、发型晚妆班、美甲专业班、盘发化妆班、发廊大工班、自我美容班、等级考证班等15个专业。我们先后培养了省内外美容美发专业人才16万余人,在全国同类培训学校中名列前茅。办公场地也从大学路简陋的小学教室,搬到光复路98号自己的教学大楼,再到2008年的滨江高教园区内。

(二)

为什么“花都”会发展得这么顺利呢?回想起来,我觉得主要有三点:一是由杭州的人文环境决定的。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环境优美,经济发达。传统人文精神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自身与他人的相安包容,注重休闲与劳作的协调,开放兼容,融合交汇多元文化;新世纪又提炼形成“精致和谐、大气开放”为特征的新的的人文精神,所以杭州有“东方休闲之都”的美称。这为我们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在不断强化学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职业技能培训。因此,2000年左右,我在上城区政协会议上提出,职业技能教育应该列为国家教育的强项,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既抓学历教育,又强职业技能培训,使大多数人拥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职业技能

培训是“花都”的强项,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是花都始终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特别注重社会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当时我就面向农村招生,学费也比较低,所以农村学员特别多。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岗工人也逐渐增多,我就免费招收下岗工人。我用这种社会效益带动经营上的经济效益。当时很多下岗工人都来学习和从事这个美容美发行业,学成后,以技术求生存,就从事美容美发行业或者自己开店,许多人都做得很成功。

(三)

我始终认为,在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前提下,企业家要更多地回报社会,特别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饮水思源,“花都”在不断成长的同时,一直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价值的真正体现,不在于创收的多少,而在于为社会贡献的多少。在公益活动方面,“花都”一直不遗余力。1992年,“花都”独创性地推出为广大工薪阶层服务的“三元美发店”和免费理发店,此项服务受到了在杭新闻媒体的关注、报道,以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截至2010年,已经服务了10万人次的周边居民。从2004年开始,“花都”每周都会为浙江省女子监狱和良渚少教所的人员免费培训,给大量的服刑管教人员提供了进入社会再就业的机会,并定期在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开展理发服务。此外,对残疾人同胞免学费、对下岗工人优惠等培训计划也是“花都”一直坚持不懈的任务。2008年底,花都首推了“五元美容店”,让美容也能走进一般的家庭。同时,“五元美容店”也入围了首批杭州市十大特色潜力行业体验点。2009年,我们又联合滨文社区,建立了“爱心卡”制度,凡是持卡的滨文社区老年人可以免费享受“花都”所有的服务。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叫做“让世界充满爱”。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业的发展,我也收获了很多。特别是看到我的一个个学员走向成功时,我感到特别欣慰,也是为杭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当然,党和政府也给了我很多。对我个人来说,无论是技术上的职称,还是政治上的待遇,都是最高的。在技术职称上,我是国家内贸部首批中国美容大师,当时全国只有8个,还是高级化妆技师、高级美容技师。在荣誉方面,我是杭州市“三八红旗手”、杭州市职业技能技术带头人、浙江省职业技能技术带头人、浙江省十大技能状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我甚至还能够站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这是我无上的荣耀。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执着地去追求,执着地去做,付出你的努力,你肯定会获得成功。比如我自己就是一个鲜活的事例。这里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多的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我只是千千万万专家型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代表之一。正如2008年我作为杭州的奥运火炬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我是“三个代表”,第一是代表女性、代表母亲,第二是代表这个行业、代表我培养出的16万名学员,第三我被评为了杭州市生活品质年度人物,更能代表杭州。

城市的形象需要包装,人的形象更需要包装。美容是一种文化,让人懂得科学的生活。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这种认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时间:2013年8月13日

口述:单金发——西湖区委宣传部退休,西溪文化研究会会长、京江越剧团团长

采访:高丹、黄琦峰

整理:高丹

(一)

我是老杭州人。我们家过去住在城站火车站旁边,那边有个地方叫大火把弄1号,一直住了40年。1985年,因中东河工程拆迁,搬到了望江门。后来又到我岳母家住,她家在松木场。调到西湖区政府后,在古荡新村西区住了10年。现在住在机神新村我父亲的山子里,古荡新村和机神新村两头跑。

我从胜利小学毕业后,在杭州六中读初中。我是老三届,在杭州十一中高中毕业后,1969年2月,主动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富阳县东图乡插队落户,那边现在已经并到场口镇了。村庄是白石皎村,如今也在打造“美丽乡村”。下乡两年后,因为家庭出身是工人,又评上了杭州市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于1970年底被抽调到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先是做了两年多的装卸工,后来因为是高中毕业,会写写画画,就让我在市运一公司五车队搞宣传,然后又让我搞统计。工人大学办起来以后,又叫我去读书,那是1976年到1977年间,主要学习汽车构造和汽车修理。我先后在公司的工会和政治处工作过,还担任过五车队和二车队的工会主席。1977年7月,工人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公司筹备成立工会,主抓文体宣传。1978年6月,我搞了一台庆祝公司工会成立的文艺晚会。当时找了公司宣传科科长夫人筱湘卿,她是宁波地区越剧团的主要小生,正好那会儿人在杭州,没有归队,就请来演《祥林嫂》的主角。我也演了个角色,叫老孔。而且因为我比较会唱,而筱湘卿10年没唱越剧了,所以我还教她祥林嫂的越剧唱腔。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成立了职工业余艺术团,我担任团长,演了《梁祝》《盘夫》等一些折子戏。后来我又创作了一些小戏,比如《两张回单》,得了交通系统的优秀剧本奖,这是80年代的时候。还写了一些小品,比如“路边系列”的《路边饭店》《路边小事》《路边科学》,都得到了杭州市交通系统及全市职工文艺会演的优秀创作奖。再后来就是写一些新闻报道文章,在《杭州日报》《浙江交通报》发表得比较多。

这期间,我努力自学成才。1977年的高考我参加了,想考北大的古典文学专业,但后来没有考上。当时招的人也少,整个杭州市只招1个人。之后,我在杭州教育学院的中文专业读了两年,因为文凭不被承认的缘故,又转到电大的中文专业读了3年。我的文字功底还可以,跟先后读了两次中文专业也有关系。后来,我觉得大专学历还不够,又考到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的经济管理专业读了两年。毕业时,本来还想去读华师大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因为同学都说实用性不强,而且当时年纪也已经40岁左右了,就此作罢。我基本上都是边工作边读书,所以真正成了个“五大”生(工大、夜大、电大、函大、自学考试)。后来我写一些散文和中篇、短篇小说,编成了集子。主要是因为到西湖区工作以后,有精力了,就先后出了5本散文、小说集,最近一本是去年(2012年)出的。我还参加了杭州市戏剧家协会、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一直到全国戏剧文学学会。对自己的一生来说,也算是搞了点东西。

我在市运一公司一直工作到1993年,被西湖区委组织部作为人才引进调入。1995年,西湖

区委宣传部把我调过去,叫我筹办《西湖报》,此后一直干到退休为止。曾经担任过《西湖报》负责人,也担任过西湖区委宣传部党总支副书记。2004年2月,西溪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我先是担任秘书长,2008年退休后又担任了会长。当时我还搞了个西溪越剧团,担任团长。西溪越剧团承包掉以后,因我家是闸弄口街道管辖,街道聘我当了京江越剧团团长。又因京江越剧团是杭嘉湖越研会成员单位,他们又选我当了杭嘉湖越研会会长。所以现在我的兼职比较多,还被区政协聘为特聘委员。西湖区方志办是从我退休后一直返聘到现在,区志办在我的建议下也出过几本书,如《西湖龙井茶史话》《西溪简史》《西湖区二十年回眸(1986—2005)》。

(二)

重点讲一下西溪文化研究会吧。因为西溪湿地是西湖区乃至杭州市一个重要的风景区,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刚开始时,我们觉得那里是一块宝地,文化积淀很深厚,就向区里有关部门领导提出来,要求成立一个西溪文化研究会。那是2003年8月的时候,最开始有的领导不是很支持,后来我们就向王国平书记反映,得到了王书记的支持,还亲自批示下来。最后于2004年2月8日,正式成立了西溪文化研究会,我担任秘书长兼常务副会长。当时的西溪几乎是一块白地,我就带着大家开展调研活动。到后来一期、二期一共28个景点,基本上都是我们调研出来后恢复的,写了许多调查考证报告和调研文本。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在王国平书记提出的六项原则(注:即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民为本、可持续发展)下,目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

西溪文化研究会成立时的会长是钱明锵。他是写诗的,当时担任浙江新时代诗社的社长,号召力比较强,就聘请来当了会长。他也是带着我们去调研,包括秋雪庵、洪园等。研究会成立时人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最开始是由我和钱明锵、沈庆漾3个人筹办的。沈庆漾是当地的农民,对西溪文化比较了解。后来又增加了郑发楚,他是老东岳居民。后来人数逐步扩大,现在有130个会员,阵容很强大,包括杭师大的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西溪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是没有一分钱的,都是自己通过课题项目费运作,现在是以政府买单、我们服务的形式维持。比如一个课题是5万块钱,30%给研究会做办公经费,70%用来做通讯费和劳务费,所以大家积极性也很高,这样下来,我们现在还能有一定的结余。在杭州市的几百个学会、协会中,我们算是搞得比较好的,2012年还评上了优秀团队。现在我们从大西溪的范围来搞调研,把包括余杭区的一些会员也吸收进来了。

在我担任会长期间,我们还帮周边的街道和村、社区搞历史文化调研,也比较成功,出了一些书;还受西溪研究院的委托,撰写部分“西溪丛书”,我主编了《西溪越剧》《西溪的水》《西溪的历史建筑》《西溪医药文化》4本书,也参与了一些西溪文化调研。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事情,是搞“西溪文献集成”的编纂,工作量很大,因为要把西溪从古到今的历史文化记载全部搜集起来。现在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准备交稿了。最近,我们还在参与投标“西溪研究报告”,准备把以前对西溪的调研文本全部整理出来。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越剧首演地。这件事,最开始是沈庆漾向我们反映,说蒋村老街上有个130多年历史的古宅,有可能是越剧北派艺人首演地,但那时也没找到什么资料。后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党支部书记、浙江省文化厅巡视员应志良去那边看了以后,给王国平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北派艺人马潮水等曾在蒋村说书,于1906年召集了三四个戏班子到陈万元家里演

出《珍珠塔》。那会儿还不叫越剧班子,只叫说书艺人,不登舞台的不能叫越剧。形成一个剧种有4个要素,一是一定的舞台设施,二是一定的观众,三是一个完整的剧情,四是要有角色的扮演。当时这4个条件都符合了,在蒋村陈万元古宅搭起了3张八仙桌,演了《珍珠塔》,村民们都来看,方卿、方卿的姑母、小姐陈翠娥都有角色扮演,演出比较成功。我们经过调研,论证了这个推断,后来我写了本《西溪与越剧》的书,在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过程。我们还先后去昌化和嵊州、老余杭调查考证,在越剧老导演方海如的陪同下,采访了浙江越剧团舞美专家、时年94岁的裘云飞,他听马潮水亲自说过搭起3张八仙桌演戏的事情。后来我们还照着那个样子录像了演《珍珠塔》的情景,中央电视台也播放过。后来就确定陈宅为越剧北派艺人首演地,现在这幢房子也保留着,是杭州市文保点。但是“越剧北派艺人首演地”这块碑因为一些原因,到现在一直没竖起来,这是比较遗憾的。

越剧首演地调研成功后,2005年4月,我们成立了西溪越剧团,是我和沈庆漾一起搞的,我担任团长,他担任常务副团长。蒋村那边的人很喜欢唱越剧,但是她们的功底不深,毕竟都是农民,没有经过培训,比较业余。剧团组织起来以后,我还专门请了老师给她们指导。演出剧目主要以折子戏为主,因为自身基础不是很好,所以大戏排得不是很多。原来只是每个双休日,在蒋相公祠进行义务演出,没有津贴,提供一顿盒饭。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对演员来说太亏了,因为西溪那边游客流动性大,看的人不多,就提出下到西湖区的郊区和农村演出,那边喜欢越剧的人比较多。于是,西溪文化研究会就投资搞了舞台、服装和音响设备,总共是11万元,排出了《王老虎抢亲》等一些戏。我当会长以后,大家提出来政府不投资的话,经济压力太大。2008年5月,正好我当时为了演出搭台把脚跌伤了,研究会有人提议将剧团承包给个人,我只好忍痛割爱了。这个剧团现在一直还在蒋相公祠演出。

另外就是对西溪与《红楼梦》的研究。“土默热红学”对全国来说,是一个震动。土默热老师提出,西溪是大观园的原型,蕉园诗社十二才女是金陵十二钗的原型,《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真是石破天惊的说法。2005年的时候,我们着手对此进行调研,找到土默热,邀请他来参加研讨会,前后开了3次会,还帮他出了本书,叫《〈红楼梦〉与西溪文化》。现在“土默热红学”搞得很红火,我也被聘为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我还把《红楼梦》里的杭州话找出来,对照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很多杭州方言,比如儿化音等,还有一些杭州的民俗和地名的叫法,在书里面也有反映。所以对《红楼梦》,我是一直把书带在身边研究的,发现什么就用纸条夹起来。这些研究既为杭州的文化积淀增加深度,也丰富了西溪的文化内涵。对《水浒传》我们也在研究,《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是杭州人,里面很多场景描写的都是山和水,也写到了杭州的地名,现在的一些场景比如“龙舟胜会”船尾把舵的姿势,就是那时候水浒的水军传下来的。

西溪文化研究会下有个戏曲分会,我也是会长,另外还有个武术分会和新蕉园诗社,这样一共是两个分会和一个社团,是在西湖区民政局备案过的。内部分4个组,分别是历史组、文学组、艺术组和旅游组,门类齐全,有什么工作开展起来就比较方便。

(三)

我现在担任团长的京江越剧团,比西溪越剧团要好一点,演员和乐队阵容强些。这是闸弄口街道的越剧团,也是个民营越剧团,成立时间早,基础也比较好。1993年就成立了,已经有十八九年历史。排练场地由江干区闸弄口街道提供,经费以每年奖励的形式拨给一定费用,来购买一些

演出设施,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好的。经营收入主要是靠到下面去演出创收的,走市场化道路。基本上是我去联系的,包括西湖区、江干区和余杭区的一些社区和村镇,一般是2500元到3000元一场。但演员和乐队人员还是比较艰苦的,分到每个人手里也就几十块钱,但她们也没怨言,因为自己喜欢。后来我们团委每人出一两千块钱,集资买了全套音响,服装也都是演员自己买的,只有公用的和一些龙套服装由剧团多余的钱购买,到现在还有3000多元的结余。我是2008年6月到京江越剧团的,一开始是名誉团长,后来老团长因病去世以后,我就担任了团长。剧团已经排了《五女拜寿》《天道正义》《新三笑》《玉堂春》等10多本大戏了,因为演员都是杭州市的一些优秀票友,所以排一本戏很快,基本上每周排一次,两三个月就排出来了。后来,剧团在我们的努力下,评上了江干区三星级剧团和杭州市二星级剧团。

因为一直在搞民营越剧团,所以我对杭州市民营越剧团的发展情况,基本上是有了解的。现在杭州市大概有十二三个民营越剧团。历史比较早的有个秋红越剧团,还有个红梅越剧团。但这还不是最早的,最早有一个叫新雅越剧团的,大约是1985年就成立了,我是1986年参加的。当时演出情况比较好,我担任副团长,联系了望江门的一个录像厅,有二百多个座位。我们每天晚上演出,连演了三个月,每天换一本戏。我抓票务收入,每天一下班就奔到剧场里去,后来因为家里女儿读书加上工作忙的原因就不搞了。之后一直到2005年,我过了十多年才又搞起了越剧团。现在是搞得停不下来了,也是兴趣爱好使然,自己也参与演出了一些折子戏,如《秋海棠》《刑场上的婚礼》等。

民营剧团现在的生存情况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是不投资的。我们京江越剧团还算好,因为是街道剧团,有提供的场地,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奖励,还能生存下去。但是许多剧团因为是自发的,没有依托,有些连排练场地都没有。现在的民营剧团也比较混乱,原来文化主管部门抓得很紧,剧团必须挂靠一个单位,比如文化馆或者街道。90年代以后,政策逐步放开,很多私人剧团办起来了,又多是一些退休人员办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强,剧团就比较困难。剧目也比较混乱,有的剧团靠卖票的收入维持,就把解放以后禁掉的一些比较淫秽的戏都演起来了,这就不是很正常的现象。虽然国家放开政策了,但是也应该好好管理一下,该登记还是要登记,该管理的还是要管理。

(四)

《西湖报》的筹办,源于我在区委组织部工作时,有一次和区委宣传部的汪部长一起吃饭,我提出西湖区也应该有一张报纸的想法。后来在区委领导的同意下,我于1995年1月调到了宣传部,和副部长孔春浩一起筹办《西湖报》。当时我还做了方案,设想每一版放什么内容。那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人员也不齐,先后从学校里调了两个老师过来。我们的报纸是1995年3月10日开始出版的,出来以后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先是半月刊,过了两年后改为旬刊,再改为周刊。现在《西湖报》是周二刊,发行量10000多份,办得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把我们西湖区的大事和要事都反映出来了。开始时经费也很少,只有5万元的开办费,没有其他拨款。可光印刷费一年就要十几万元,再加上发行费等,一年实际开支要20多万元,我就去找单位征订。那时候算临时刊物,有临时刊号。现在变内部资料不公开发行了,由我们区委、区政府来负责,钱就不用自己再去筹集了。

在《西湖报》,我从1995年一直工作到2008年退休,时间比较长,几个版面都负责过,包括对

西湖区一些先进人物的宣传,比如“小巷总理”陈珍珠、三替公司老总陶晓莺等,我们都报道得很详尽。我写的新闻报道至少有两三千篇了,但是很遗憾没有编成集子。

(五)

我写剧评,最早是给《戏文》杂志,后来是《大舞台》杂志,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最近几年也在写,主要写一些戏曲评论,其中写越剧的比较多。1982年以后,我担任过东坡剧院、杭州剧院、胜利剧院的评论员。特别是杭州剧院,我担任评论员的时间比较长。那时候观众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杭州人喜欢看越剧。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话剧《于无声处》到杭州来演出,我当时在市运一公司工会做宣传干事,负责买票,可是票非常紧张,每个单位只有30张票可以买。我们公司几千个人,连我自己都轮不到看,一直到后来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团演出,我才看到这出戏。那时候票价也便宜,大概就几毛钱一张。

越剧演出的话,那时候有上海越剧院来演出《花中君子》,也是比较轰动的,一共连续演了八天,现在一般演一天票房就不行了。其他像中央歌舞团也来演出,我们都去看的。看完以后每个人要写剧评文章,也专门编了刊物刊发的。做评论员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看戏,看完以后当晚就要写出来。有时候一看完戏,就要跟主创和演员们一起座谈,就唱腔、表演和剧情等方面提出意见,他们也都比较虚心。那时的氛围比较好,场团合一。现在不行了,大家都管自己搞,也不听取意见了。

另外,我喜欢创作剧本,写了《西溪才子》,又叫《洪昇传奇》,得了第六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铜奖。后来又写了以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为题材的《断肠记》,得了第七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剧本奖。今年,我又写了小剧场话剧《西溪轶事》,得了第八届全国戏剧文化奖铜奖。后来我把它改编成微电影剧本,在《浙江日报》“慢生活微电影征稿”中评为最佳编剧三强,准备拍成电影,这也是很不容易的,算是为我们西湖区、杭州市争光了。所以早几年我被评上杭州市有突出贡献人才,可以申购人才房,但是因为分配的房子在三墩比较远,就没有去。在职的时候我多次被评为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现在也是西湖区离退休第一党支部支委,负责宣传,也算是发挥余热了。

现在呢,我就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我们民间组织的关心。政府要推行社会化服务,应该要调动民间组织的力量,使我们能扩大队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

时间:2013年5月27日

口述:胡来义——西湖区农大嫂餐馆老板

采访:高 丹

整理:高 丹

(一)

我是安徽东至县人,就在黄山边上。1998年9月来的杭州,今年48岁了。1998年的时候,老家那边条件不好,正好又是打工潮,大家都出来打工。我家当时条件也不好,小孩子读书连学费都交不起。我闲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又是在山区,各方面的信息很少,也没有办法增加收入。我其实不太想出来打工,但是儿子、女儿都说,人家父母打工都把学费交了,就我家老是拖欠着。我一想这话也对,就出来打工了。那时候杭州算比较文明的地方,不像外面有些省,乱七八糟的,治安很不好。我的父母亲也喜欢我到杭州来,所以就来了这里。

我是坐老家的大巴到了武林门,就是市政府大楼那个地方,感觉当时那边也没几幢高楼。下车以后走到了152路古荡公交站这里,身上只剩下三十几块钱。没钱住旅馆,因为当时住个旅馆要三四十块钱,而我这钱是救命钱,可不能用掉,要是住了旅馆,第二天就没饭吃了。我就花两块钱炒了一份粉干,这个老板娘是台州的,老板在边上睡地铺,我就靠着他过了一晚。第二天,我就找工作到了庆丰社区这边。社区以前的老场地就是我们那个单位,是杭州市西湖区劳动局办的一个城西建筑装饰工程队,我就在那里做装修的活,一共做了4年零3个月。

(二)

一开始来杭州的时候没饭吃,中午是老板提供的工作餐。那年是3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早饭要自己买,我就吃一根油条,然后饿到中午吃3碗饭。到晚上又没饭吃,在单位搭伙要补钱给老板,一个月交100块。这样还是不能解决早饭的问题,我就叫我老婆也过来,开始在这个桥头设摊。她是1998年10月来的,比我晚来了近两个月。来了以后没上班,她又不会做事,女人也做不来装修。我们就开始卖茶叶蛋,那时候什么也不会做呀。第一天烧了一锅蛋,一个也没卖,都送给人家吃了,人家就评价我,觉得我做生意还是比较认真的。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只会做茶叶蛋,也做不了别的。寒冬腊月温度零下几度的时候,一个早上才卖7块3毛钱。蛋是5毛钱一个,但有的居民少一毛也就少一毛了,也无所谓,东西多下来最好,自己还有的吃。不过这样也赚不上什么钱。

一开始是一定要艰苦的,不艰苦怎么能创业。我上班挣300块,我老婆卖点心,两个人就这么拼着,一天就有的吃了。我们早上摆摊,晚上又做油墩儿卖,没卖完就把那个萝卜丝加点雪菜炒炒,半生半熟地当饭吃,再买点面啥的下。那年运气还不好,冬天我老婆生病了,得了慢性阑尾炎,又没钱做手术。后来我们赶到市一医院去看病,医生蛮好的,工号是059号,我至今印象很深。我讲我们是自费的,他就给开了中药保守治疗。结果那年我们没回家过年,春节的时候就在这里吃中药,把病吃好了。

新年的正月初二,我们开始卖馄饨,馄饨的活,是在第一年学了个基础。还有社区里的一个王大伯,教了我们做小笼包。馄饨也是向人家学来的,还是在卖茶叶蛋的时候,隔壁摊上看我们

只会卖茶叶蛋,不忍心,就慢慢地教我们包馄饨。当时我们就搞了一个摊,一张桌子那种。后来第二年5月,就有人来罚钱。当时一天也卖不了几十块钱,每次都要罚50块,其实就是不让摆(摊)。但摊子还是得摆呀,只好打游击,每天早上8点钟就收摊。到最后一次,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没收走了,我就找到社区里,事情又报到街道的城管科,那个科长还专门批评了下面的人。现在就好了,城管都是文明执法了。那次之后就很好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到这里来落户。再一个,我平时还在为社区里的老居民做防盗窗,大家心里也舒服的,知道我不偷不抢,是靠劳动吃饭的人。

就这样到了2003年,这个地方要造桥,又没地方摆摊了。当时我就盘下了一间洗头房,一共2400块钱,当时做个小生意还容易吧。改成卖馄饨的店后,地方小的连桌子都没有地方放。我自己是做装修的,就用木门钉上贴脚,围了一圈,做成四周都能吃早饭的。后来市政府下了文件要求办执照,可这个地方因为要拆迁执照办不出来。一直到2005年,执照才给我们办出来了。执照办出来后,我也交税了,也合法经营了,三证样样都有,卫生许可证也定期去验审。现在政府安排得很好,以前卫生许可证是半年审一次,现在是三年审一次。今年这次后,还给换了一个长期的,因为他知道我没问题。

那个店搞起来以后,生意不错,但到2006年的时候就拆迁掉了。这之前,我就已经做起了“农大嫂”的牌子。到今天,我们“农大嫂”在这个地方已经生存12年了,成了做整个餐饮的店。现在,我通过管理的模式,也慢慢地在扩展生意,到现在也有五六家店(摊)了。但是我不搞加盟店,就是实实在在做生意,该交的房租要交,该付经销商(注:应为供应商)的钱要付,不能等人家打电话来催。

(三)

我开了“农大嫂”饭店以后,有很多附近浙江大学的学生来吃饭,他们有素质有教养,还帮我介绍客人。我到今天都给他们打九折,这是无理由的,人要感恩。这样开了第一家以后,就有人找来了。比如我发“爱心券”给老人的那家店(注:2013年初,胡印制了3000张爱心券,请社区发给老人、低保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请他们吃“爱心早餐”),原来是在翠苑那边的,我把它引进到庆丰菜场来。庆丰菜场的问题是没人气,地段又偏,人家就跟我讲:你把早点引进来,老年人硬的东西吃不动,到这里来吃个软的东西再顺便买点菜,不是更好么?我一想道理通的,是这样的。今年菜场里人气是要旺一点,早上在那个自行车棚里,一天人就那么转,5块钱的小笼包,现蒸现卖。绝对不会昨天卖不掉的今天接着卖,没有这种事情的。他们把健康证等证件也都办好了,公安局都有名录的。这里做了以后,富阳那边看了就也要引进我们。

餐馆的网站也是浙江大学帮我们推荐的,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做起来的。我们还做外卖,不过也看地段,远的地方不送的。不过老年人给他们免费送,打个电话来就送。不管国家以后怎么变化,不管历史走到哪一步,文明还是要的,尊老爱幼还是要的。

(四)

刚来杭州的时候,哪里租得起房子。地方政府还是有爱心的,那时候还没有社区,是庆丰村。我到这边落脚以后,他们把放自行车的一个棚子给我们住,我就自己搞点木板撑着,像收破烂一样的。电是5毛钱一度,水是7毛钱一吨,房租是5毛钱一天,一个月15块钱。我在那里住了两

年多,开始摆摊的时候没钱。后来“农大嫂”开在桥头这个地方以后就好了,我们就租到房东家里去了。我到现在都还是租房子住。政府把我孙子放到幼儿园里,跟杭州城里的孩子同等待遇,也没收我高学费。不过我家人包括儿媳的养老保险,我都自己买。现在政府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小区房,但是租金我自己付,人家多少我多少,就在这个社区里。

现在我就是新杭州人,新庆丰村人。全家都过来了,就儿子、媳妇不在这里,他们在苏州开店。我来了之后,我家的亲戚也都来了好多人。他们不在我这个边上,都在下沙、九堡那一带。我带了人出来后,先出来的又带人出来,带了又带,都是做馒头的。像我这种管理模式的饭店是没有的,都是农村里出来的人。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住在比较偏的地方,房租便宜,管理也比较松懈。不像城里,管理非常紧。我跟他们讲,你来了杭州,在哪里做都不要紧,第一个先把健康证办好,第二个要把暂住证办好,第三个再看哪个地方店面合适。要搬走可以,但不要转让,你把店转出去,人家转进来没生意,不是把人家害倒了吗?就安安耽耽地做点生意就好了。反正他们做他们的,我也不要他们钱,就帮着料理料理,为他们创业提供机会。我这个店一年挣个二十几万,用用也就够了,也不想买房子什么的。我就想怎么回报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在我刚来的时候拿衣服给我穿,教我做小笼包,教给我技术。有条件的话,政府也可以考虑给这里的老人建个老年食堂,周末的时候跟家人吃个饭,也不用去外面铺张浪费。

时间:2009年4月24日

口述:钟伯熙——1983年4月至1988年10月任杭州市市长

采访:任振泰、冯跃民、高丹

整理:高丹

(一)

我到任后不久,国务院关于杭州市的城市总体规划就批下来了,是周峰任市长的时候搞的,把杭州的城市性质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点风景旅游城市。我当时认为不完整。一是旅游本身是产业,要出经济效益;二是要解决旅游同其他行业的关系,如工业的布局,商贸、文化的设置,都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最典型的是要把化学工业区放到小河地区去。化学工业污染严重,居民的意见很大。我本人原来在热电厂工作,热电厂也是与居民离得太近。当时我提出在钱塘江南岸搞科技,在下沙开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要搞,但是不能污染环境。对现有的污染工厂要迁出市区,到萧山、余杭去发展,要有大杭州概念。

1985年9月,全国召开了一次会议,是我去参加的。会议着重研究以城市为中心的问题,特别强调中心城市的作用。本来是要打破行政区划,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但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干成,主要原因是条件不平等,有的要当老大,思想不对头。现在有一个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区域,思路对头了,大家平等了,那事情就好办了。我认为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是要打破条块分割,打破行政区划,真正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

(二)

1983年,我来杭州工作,那时市里的财政资金的确很拮据。上面规定的又很死,一不准有赤字,二不准向银行贷款,三不准发行地方债券。有了盈余大部分上缴,我们一个市上缴的与广东一个省一样多。缴了还要借,借了也不还,其实就是“一平二调”。有一次我们就上缴了1亿美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挤出钱来,立足长远,搞了一批主要体现社会效益的公用工程。

一是7千米的运河连接工程。这个工程沿途修起11座大桥、1个引水和降水船闸。这些桥中,有3座宽度24米的城市桥、2座公路桥、5座农村桥、1座铁路桥。工程完成,不仅可以沟通钱塘江、甬江、曹娥江、苕溪、古运河的水源,提高水路运输效益,还可降低货物装卸费用。以往艮山门过港货物每年上百万吨,都要通过水、陆交换完成,即货物从运河船上卸下,再转为陆路运输,再从陆路装到钱塘江的船上。如今,运河的船可直通钱塘江,既提高效率,运货量可从100万吨上升到300万吨,又节约财力、物力,光是减少辗转的运输费就很可观。以每吨5元计算,每年节约费用可达500万元以上,真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工程。

二是西湖环境和西湖水质保护工程。对西湖的保护,我们首先把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14个污染严重的工厂和单位迁往远郊,清除工业污染源,对西湖周围各单位的炉、灶、窑全部进行改造,对西湖周围居民和饮食业优先供应石油液化气,减少周围空气污染,基本上实现西湖周围无黑烟区。同时,在西湖周围不断增植树木、花草,扩建园林绿地,使公园面积大幅度扩大,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3.6%。对西湖水质的治理,我们一方面每年每月用几条驳船挖西湖污泥,另一方面把西湖死水变成活水,引钱塘江水入西湖。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我们从南星桥

引钱塘江水至玉皇山下的八卦田,然后再从玉皇山下打出个引水渠,穿山入洞到达西湖。每天引水 30 万吨,1 个月可将上千万吨的西湖水换一次。引钱塘江水入西湖的工程完成后,效果很明显。一是控制西湖水,西湖边有闸门,多了可放出去,少了可引进;二是提高湖水的透明度,过去引水前湖水透明度是 20 厘米,引水后湖水透明度可达 50 厘米以上;三是降低水温,有利于湖鱼的繁殖;四是提高附近水厂供水能力,南山区、武林门一带的赤山埠水厂供水一下子提高 7.5 万吨,既美化西湖、改变水质,又增加经济效益,真是“一石多鸟”的好工程。

三是中河、东河治理两大工程。这两个工程最宏伟、规模最大、耗资最巨、影响最为深远。中河、东河,作为横贯杭州旧城的人工水道,已有 1200 余年历史,凿成至今,几度兴衰,乃至近代,几经淤塞,河水黑臭刺鼻,与美丽的花园城市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杭州市政府,虽有治河之心,终因财力、物力不济等原因,未能如愿。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和政策指引下,市政府才有可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共耗资 22035 万元,动迁沿河两岸居民 7000 户,单位 303 家。动迁从 1984 年 4 月开始,到 1986 年 11 月结束,历时 2 年零 7 个月,可谓牵扯千头万绪,关系到千家万户,但速度之快、步伐之整齐却令人惊奇,是靠杭州市的各级领导,靠成千上万的战斗在第一线的建设者,靠驻杭部队的大力支援,靠千千万万杭州普通市民的理解。工程于 1987 年冬天宣告胜利竣工。

除以上四大工程外,还在杭州市区搞了祥符水厂水源的保护和扩建,世界贸易中心的兴建,管道煤气铺设的筹建,铁路“中取华东”战略杭州配套工程的投资以及道路的改善,西湖园林的进一步完善。还利用世界银行无息贷款,建造当时杭州最大的现代化自来水厂(珊瑚沙),开辟建设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等等。

城市改造我们还有一条经验,搞的工程不多,但能一竿子到底。包括几个饭店,如新侨饭店、友好饭店、黄龙饭店。工程管理一竿子到底,配备的第一线力量是很强的,不仅行政管理能力比较强,技术力量也很强。因此,没有出大的问题,也没有出大的安全事故。

(三)

我相信陈云说的一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当时我市的生产总值增长不快,财政也不好,要想改变局面,首先就得抓工业,抓工业企业的改革。改革大致上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一是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经省政府批准,全市从 1984 年 7 月开始,在杭州机床厂等 10 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试行厂长负责制。到 1986 年底,市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 226 家实行,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有 83 家实行。1987 年底,市属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全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是改革企业分配制度。1986 年,市政府颁发《关于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若干实施意见》,对企业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分配主要形式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对试点企业实行浮动工资,允许对外承接业务,提取劳务费。除以上主要分配形式外,还在不同企业中采取企业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浮动考核、超额报酬提取率、岗位工资制、全额计件等办法,发展工资含量包干、亏损包干、超产计件、集体租赁等分配形式。三是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从 1983 年开始杭州市在企业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先是在新增职工中试点。

第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 年,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在实行简政放权、全面落实和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原则,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 14 家工业企业中进行试

点后全面展开。

第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84年,市政府对杭州中药二厂和杭州电视机厂做出“学福日”的决定,向企业放权,实行“严要求、高效益、优待遇”的改革试点。从1987年,成立杭州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开始,根据“大胆试验、稳步推进、规范要求、两股先行”的原则,到1992年底,市工交系统成立股份制企业10家。

第四,发展企业集团。市政府把企业兼并和组建企业集团作为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使存量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的重要途径。1986年开始起步,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组成初创型企业集团14家。

对工业企业的改革开放也做了一些具体工作。首先,放手搞乡镇企业,以鲁冠球的万向节厂为代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杭州自己的模式,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并且把乡镇企业的政策放宽到跟国有企业一样,比如大学生不愿去,就把他们的关系编制放到当地县里的乡镇企业局;又比如允许国企大学毕业生和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去当“星期天工程师”,这样做既增加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为乡镇企业提供科技的力量支持。其次,搞活国营企业,抓几个大的企业的改制,主要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负责政治领导,工作找厂长;大量工业技术员提拔到厂长、副厂长岗位,由内行来管厂;强调外联,搞中外合作,如汽轮机厂和西门子,杭州制氧机厂和德国林德公司。和西门子合作的最大好处是根据用户需要,把我们的产品模块化,技术和管理都先进了。萧山电机厂、齿轮厂和德国技术合作,产品很好,通过了德国认证。杭州电视机厂显像管的生产,与韩国大宇合作。小的国企,像叉车厂、台扇厂,很早就有产品出口了。

大概工业就做了这些事情,其中乡镇企业花的力气很大。国营企业改革做到三点,即“指出方向”“干部整顿好”“内行当家”。

(四)

杭州的城市性质是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对旅游自然就会重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搞旅游得先把西湖的环境搞好,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市政府就开始对西湖风景名胜区内违章建筑进行清理,拆除影响景观、破坏风景的违章建筑。同时,引钱塘江水入西湖工程,把西湖的死水变成活水,使西湖有个永久而可靠的清洁水源。这样才会吸引游客,如果是黑水一潭,那谁还来呀?

我记得是1986年初,以杭州打头,召开杭州、西安、苏州、桂林4个旅游城市市长座谈会。会议形成文件《市长建议》。谷牧阅后说:“可作为经验。”后来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就以此为蓝本。1986年,省里成立旅游领导小组,杭州由市委书记厉德馨任组长,利用外资建了几个饭店:黄龙饭店与南洋商业银行合资、新侨饭店与中国香港银行合资、友好饭店与日本岐阜昭和混凝土公司合资。刚开始没有资金,也缺乏管理人员,所以当时“一把手”都是外资方的。后来钱还掉了,就变成我们独资了。

我们那个时候想把旅游突破一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外曾经想搞旅游的外联权,跟中旅、青旅、国旅3个旅行社。我们提出了3个方案,前面两个方案是不要国家一分钱的,后面一个方案要求中央给3000万元。钱是没有要到,但是上面还是给了一些政策,如可以收旅游附加费、钱塘江大桥收费等。

改革开放是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城市企业的闸门,也打开了农村致富的大门。现在人们都对

改革开放坚信不疑,可是在当初那是很不容易的,每做一件新鲜一点的事,几乎都要挨骂。最难的是动员拆迁,为扩大西湖公园的面积,拆掉沿湖的几幢旧房,动迁办的同志说得口干舌燥,两腿跑酸,他们也无动于衷,最后只得让我和厉德馨以及几位副市长亲自出马“督战”,拔去“钉子户”——有的是住户,有的是大单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不要说动迁,就是开一条马路,有人说不要砍树;修一幢房子,有人说破坏了传统风格;与外商谈一个项目,有人说“饥不择食”;撤销行政公司,有人说这是争权等。

凡是要做事,就会有“不”的声音,但只要是对群众有益的,对国家有利的,对事业有发展的,我们都硬着头皮去干。

(五)

对教育工作,不是我一个人重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很重视,因为当时百废俱兴,到处需要人才。要出人才,就要以教育为本。当时我们除办好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外,一是办特殊学校。杨绫子小学现在是小学、中学配套了,这个聋哑学校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在全国都很早,但是不普及。特殊教育费用比较高,要办就要办成免费的,要交费的话,穷人是负担不起的。二是办好电大。当时电大很少,学生年龄大,但读书都很用功。三是开了几个分校,如医科大学分校、浙江大学分校,搞合作办校。我们搞了技术学校,把它办成培养技术人才的主要基地,学生就业率很高,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员和技师。杭州还有一大批的部属技术学校,水利部、机械部都在杭州办过学校。后来技校变成大专,又升为大学。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办技术学校是对路的,既解决了一线的技术工人,又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为我市的工业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

我们这届班子,主要有一个好班长——市委书记厉德馨。我们这批人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做苦工,改变杭州面貌。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有分工,但是分工不分家。如对拆迁户、对文化界的事情,每个人都去做工作,协调一致。我们几个书记,包括常务副市长顾维良,都随时通气。有时一天通几次气,不是一个星期开个会才通气。做什么事情,其他的同志都知道。还有常委办公会议、书记办公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办公会议等,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厉德馨对我们很支持,好多事情我们管了他就不管了,而且很尊重我们。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政府系统的人事问题,他的意见是要我们政府领导先议一下。他跟市委组织部部长交代,政府要使用的干部不要直接拿到常委会讨论,要政府先有个意见。大家为了一个目标,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所以在工作中有很多政府的事是我说了算。在我的工作生涯中,这个时期的心情是最舒畅、最愉快的。

时间:2013年6月21日

口述:曹亮——杭州市志愿者协会环保总队常务副队长

采访:高丹、黄琦峰

整理:高丹

(一)

我是杭州本地人,今年38岁,做志愿者十几年了,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做到现在。之前因为在保险公司做业务,时间上相对灵活性比较大一点,所以参加的志愿服务比较多,现在换了个工作岗位,时间上感到压力很大,事情很多,都走不出来,但还是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

我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是在1998年的下半年。因为报名之后不是马上参加活动的,还过了一段时间。那次是去团市委报的名,通过《杭州日报·下午版》上的一块“豆腐干”,上面写着招募志愿者的启事。那天我到朋友那里去,正好那张报纸放在桌子上,就看到了这个“志愿者报名”信息。可能那段时间比较空,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那边就把我的名字记下来了。过了几天,电话打过来了,让我到团市委一楼的会议室去参加会议,其实就是报名的人互相见个面。会议室不大,人坐了一圈,也就20多个的样子。我记得会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团市委志愿者的工作,其他具体内容也想不起来了。这相当于是第一次活动。后来过了段时间,又接到电话。那时候杭州市志愿者协会设在团市委宣传部,协会下面有几个小组,有敬老队、维修队、医疗组等,其中有一个环保小组。环保小组的组长打电话给我,我就去了团市委的办公室,简单地做了一下沟通。实际上是他看到我报名表上的资料,邀我过去参加环保小组。那时候对我来讲也没什么概念,什么组都可以,环保就环保吧。这也是一种缘分,后面就一直这样做下来了。

报名了环保小组以后,我就相当于正式入到一个有针对性的组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协会打电话过来通知活动。这个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做一个市民的调查问卷。市环保局有一个对市民环保意识的满意度调查,是每年都在做的,当时可能是第一次。需要调查的问卷也不多,就500张。当时整个小组大概10个人不到,大家就聚了一下,开了个会,做了这个调查。这个问卷也没告诉你要到哪里做,对市民的调查么,就是随机的。好在我当时在保险公司做销售,人还是比较熟的,就去广场和一些居民的家里发调查表,认真做了3天,最终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这是我第一次做志愿活动。后面主要就是以参与为主,上面有任务来了,就参与一下。就像现在很多志愿者也是这样的,报了名,组织有电话打过来或者有通知过来,什么时候要参加活动,那就积极参加。应该说起初的时候活动频率不算多,但还是有的,一个季度不少于一次。主要还是配合团市委本身的一些工作,以及政府的一些环保宣传方面的活动,志愿者负责执行一些简单的工作。

(二)

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感觉杭州市志愿者活动的气氛有点起来了。我去的时候,大家对志愿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后来随着报名的人越来越多,志愿者的队伍也庞大起来了。只是靠参加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相对地已经不能满足志愿者的需求了,因为不可能每次活动都需要几百个人。从小组来说,志愿者人数没有一下子增加得这么快,但是从整个杭州志愿者来说,人数是在

增加的。在组织活动上,政府性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2000年时,有一次大活动,叫“废旧电池大回收”。那时候我已经是环保小组的组长了,原先的负责人做了不到一年,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我组织了这次活动,应该说反响还是很大的,有将近200个志愿者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收回了很多废电池。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出台政策不鼓励回收。现在的电池经过技术改进,含汞量已经很少了,但当时的废电池还是污染很大,包括宣传上也是这样。我们就通过报纸,在杭州百货大楼和几个重要的大厦门口,都设了点,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也举行了专门的启动仪式。那次收到的电池很多,上吨的,一袋袋都收回来。我们志愿者做什么工作呢?就是通过报纸宣传,家里有废电池的,只要打电话进来,志愿者就上门去收,各个城区分好区块,每个区块派几个志愿者,按照家庭地址去收。收来之后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当时杭州废物处理中心有个大地环保,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我们就统一送到那里去。这个活动算是我自己组织,规模比较大,从领导重视到媒体参与都比较系统化的一次志愿者活动,做得比较完整,效益也比较好。这个活动的创意是团市委提出来的,我负责志愿者部分的运作和操作,包括志愿者招募、培训、安排、分配任务以及现场报到等。整个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那次活动之后,环保的氛围和意识受到的影响还比较大的。

(三)

前期的志愿者们都很热心交朋友,大家在一起也很开心,可能是人少的原因,凝聚力也比较好,一起做一些政府的活动。比如还有一个活动叫绿地认养,是跟城区绿化办合作。有一块地就在武林门码头,浙江展览馆对面。我们志愿者就穿个马甲,劝导群众不要乱扔东西和随意踩踏,有点像现在的文明劝导。还有好几块绿地,包括运河边的稻香园社区旁。一组志愿者有十多个人,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去看护绿地。这种基础的活动做过以后,对自身的要求越来越高,志愿者自己也开始策划搞活动,当然由于水平有限,就搞一些绿色登山等简单的活动。

最大的转变是在2003年,杭州市成立了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说明政府领导对这个非常重视。这个时候,志愿者队伍通过招募也非常庞大了,有几百号人。随着志愿者人数的越来越多,团市委毕竟只有这么几个主题活动,越来越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也就自发自动地去考虑一些问题,比如哪些是跟环境保护有关的,自己去策划一些活动。我们做了几个项目,一个是环保志愿服务进社区,主要是到社区进行宣传教育,包括发放环保局的宣传册,制作KT板展览,组织环保讲座等,做了几年。另外一个“保护母亲河”,这个牌子是团中央很早就有的,我们就去检测水质。因为在市区,主要是围绕运河来做,看看有没有排污口之类。那时候不懂,以为很多企业可能会偷偷排污,就去找。后来随着对环保的了解,知道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运河边的工厂企业都搬掉了,所以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污染,也就是一些生活污水。在这个过程中,市环保局也会给予一些培训,比如测水的透明度,教会我们使用专门的仪器;比如水面的漂浮物,就是水脏不脏怎么判断;还有一些专门的环保标准的测试,一些试剂的使用,包括pH试纸之类。大家都很好奇,也很积极,把数据记录下来,再报给市环保局。虽然对于市环保局来说,也只能是参考一下,因为本身他们每个点都有标准检测的。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参与,能让志愿者了解政府在做些什么,也提高了市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志愿者最大的作用就在这里,通过参与来培养主人翁精神,进而参加到社会管理中来。

(四)

我一直在环保志愿者队伍里,那个时候报名的还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比较多。当时志愿者的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对于老人来说可能还没什么概念。而且这又是共青团的工作,所以年纪轻的人可能会接触更多一些,比如大学生什么的。我们第一次来开会的人都是年纪轻的,而且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当然也有一些退休的人,也很积极参与。不像现在,可能是退休的人更多一点了,基本上除了退休人员就是大学生,像我这种情况算是比较少的。这个少不是说人数少,那时候一股脑儿也才20多个人,现在因为基数大了,只是说在整个队伍中占的比例小。

志愿者毕竟是一个松散组织,人多了以后,如果管理跟不上,就会比较乱。2004年,《杭州市志愿服务条例》出台后,有一个精神,就是各局委办都要成立志愿服务队。协会原来有一个环保小组,一直跟市环保局的接触比较多,大家的沟通和合作也都很好。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市环保局就设想成立一个环保志愿服务总队。最后由市环保局和市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以联合发文的形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志愿服务总队,不是通过民政局注册的独立法人社团,实际就是建立在原有的协会下面的环保小组基础上。既然成立了组织,就要有组织架构,当时我也参与了组建。设立了办公室、活动部、宣传部等,还有一些专业的项目组,以及分城区建立支队,形成了这样一个队伍架构。我负责把社会上的志愿者招进来,根据区域安置,有些有时间有能力的,则放到总队的活动部和宣传部,甚至我们还专门设立了高校支队,因为学生比较多。目前填过表格的志愿者,我们的档案里有1000份左右,这些主要是社会上的人,学生除外。对学生我们是社团化管理,叫“在杭高校绿色联盟”,现在联盟里面有43个高校社团,因为社团的人每年都在变化,就不单独填表了。第一次整理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有6000多名大学生,再加上社会上的,对外宣称是近万人。这是我们手上掌握个人信息的志愿者人数,实际在参与活动的人更多,因为其中可能有一些单位组织来参加。大致就是这么个架构。

(五)

再讲一些活动。除了刚才讲到的,还有“护绿使者”志愿者行动,这个组织也比较长久了,原先是在绿化办的。这个队伍做的也非常好,我们以前一直参与,包括刚才讲到的绿地认养,还有前几年的植藤节,搞垂直绿化,都是我们发起在做的。另外还有一个“冒黑烟”督查志愿服务队。前几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公交车的技术或者性能没那么好,一起步一股黑烟就出来了。近几年还好,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政府不断在改造提升、加强监管和维修,一个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用眼睛在看,特别是公交车,哪个公司,牌照号码多少,及时报告环保处下面的截排处,他们直接通过公交公司盯牢。这个在平时生活中就要注意,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活动。我们会做培训,告诉志愿者什么样的情况属于汽车发动机的问题,这是主要的原因,也有些是驾驶员开车的技术问题,要区别出来。如果是技术问题,那是偶尔的;如果是发动机问题,那一直开一直冒烟,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就需要及时整改。

其他更多的还是一些宣传活动,比如“每周少开一天车”,和一些公益组织、基金会联合发起倡议,包括垃圾分类宣传等。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各种各样的活动,带队也好,策划也好,都做过了。但我感觉还是粗层次的,要提升比较难。环保志愿者跟其他志愿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主要还是以宣传为主,也没有专门的目标群体。环保资料发出,不是说明天马上

就能看到蓝天白云了。但工作还是要做的。

(六)

我们现在定位,环保志愿者要起到“实践者、宣传者、监督者”三个作用。第一是做个模范的环保人,自我实践,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注意环境卫生。第二是要影响别人,要宣传环境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第三是监督周边的环境变化,及时举报,做一个相对合格的志愿者。这是环保局总结的,非常好,我在这三个上面还加了个学习。环保志愿者还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做到“学习、实践、宣传、监督”,这是我现在组建队伍时告诉他们的。像我们以前纯粹就是参与,说难听点有点凑热闹,现在做志愿服务,一定要有相关知识。这是对“环保人”的一个综合提升。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平台太少、载体太少、缺少项目。这跟人的能力强弱有关系,跟客观因素也有关系。我们环保总队毕竟不是法人组织,没有自己的账户募集资金,纯粹是以参与为主;志愿者又是从社会上招募来的,虽然也有一些专业人士,但要凝成一个团队去做一个项目,问题还是很大,大家都时间不够,又不是专职的。这么多年下来,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主要还是前面几年,我几乎是全投入,除了上班,双休日等全部搭在这上面,甚至有时还要占用上班时间。一个活动,可能参与者只要等待电话打过来,安排好时间去就行了。但组织是件很累的事,从策划、资源匹配、志愿者报名等一系列东西,从头到尾,可能提前一个礼拜就要进入状态了,而且中间不能拖,不能休息哪怕一天。所以前面几年,我在这里花的精力确实很大。

经费方面,之前我们参与的一些活动都是政府主导的,我们作为纯粹的参与者,不涉及资金。当然,作为项目主办方肯定会有资金考虑,但我们不用考虑。后来做了团队的组织人以后,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些项目,基本上需要考虑的费用也很少,因为都是以志愿者参与为主的。像宣传板这些东西,环保局都有,借来就可以。像派人去做讲座,志愿者也可以解决掉。所以我组织的这些活动,费用都是很少的,甚至基本上没有费用。前面几年我基本上是自己贴钱进去的,比如大家太辛苦了请吃个饭,包括一些通讯和交通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现在搞活动的话,可能涉及的费用就会多一些。现在我们主要的经费来自环保局,下面有个事业单位叫宣教中心,每年财政有拨款,就从这个中心的日常经费里挤出来。这两年也向财政申请,有几万块钱的经费,也不多。平时用得也不多,主要是到年底的时候,会开一个表彰会议,对一些比较积极的志愿者,用奖金的形式进行一些交通费的补偿。

(七)

杭州城市环境在十几年变化是很大的。我们志愿者的工作不可能去改变城市建设者,但能让市民有一种参与的意识,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意识。我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城市管理角度。参与志愿者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去了解、知道政府部门在做些什么事情,不参与是不知道的。比如环保局的工作范围其实是很局限的,实际上做的是污染防治控制等一些专业的东西,跟我们环保志愿者在做的事情搭边的很少。所以我们环保志愿者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跟环保局、林水局、绿化办等各个部门都有关系,范围很广。城市环境上,比如展览馆对面的绿地,现在很漂亮了;还有运河的游步道整治,又干净又漂亮。城市化建设方面,这些年政府投入多,确实改变非常大。这些大家都能感受到,但我可能更多从我这个环保志愿者的角度来看,生活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污染也是越来越多了,主要是汽车太多,工厂倒是都搬掉了,该取缔的也取缔了。

另外一个最核心的,还是市民的意识,这是最重要的。通过志愿者的学习、实践、宣传、监督,宣传教育是个长久性的东西,我们也还在努力当中。但是随着政府对整个志愿者氛围的营造,以及我们总队对志愿者理念的宣导,效果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从我个人来说,我的能力有多少,就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持之以恒,把它做到最好。只要我们发动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理念,身体力行地去做,就 ok 了。社会需要每一个人去参与。

时间:2013年6月3日

口述:程蔚东——剧作家。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

采访:李忠民、高 丹、黄琦峰

整理:高 丹

(一)

我生在杭州,也长在杭州。我出生的地方很有地标意义,就在现在大家都去参观的那个胡雪岩故居的边上。那时候的胡雪岩故居,用高高的围墙围在那里,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后来发现里面有人住着,再后来又觉得里面在办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工厂。我们小时候进去玩时,能看到假山,雕梁画栋,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房子。花园里也曾经住着一些解放后需要照顾的名流。后来就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胡雪岩故居对面是元宝街,原来有一大批老房子,现在已经全部拆掉变为新小区,我就在那个地方出生,在老式的墙门房子里。

所以在我小时候,对面是胡雪岩故居,往前走过去是望仙桥。望仙桥是南宋时期一座很著名的桥梁,边上的德寿宫是宋高宗居住的地方。包括秦桧被义士刺杀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望仙桥上的。翻过望仙桥,不远处就是现在的鼓楼。我们小时候,在50年代的时候,鼓楼上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就剩下一个楼台,很多孩子在上面玩,甚至抓蟋蟀啊等等。那个地方杭州的古老文化遗存很多,包括各种各样的传说。杭州最著名的传说“白蛇传”里,有个“白蛇前传”,是老百姓代代相传下来的口述文学。许仙和白娘子为什么会断桥相会,是因为许仙小时候曾在元宵节时走上望仙桥,把嘴里的元宵吐到桥下,被正在修功的白娘子吃到,使白娘子产生了对人间的向往。这样的一段遭遇,促使后来白娘子变成人形来当凡女。为什么这个发生在杭州的故事,能那么多年被老百姓传颂,让国外的人对这个传说感到钦佩?最主要的就是白娘子“不做神仙做凡人”的这种追求,使这个传说有了民间基础,能一代代地传下来。这个传说在古代是没有任何文本的,直到清代有了说书唱本以后,才有人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而且出来以后还在不断变化,一直传到现在。所以民间口中的传说,每个阶段不一样的变形,实际上体现了传说它的那些老百姓,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寄托了自己的审美,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的期望,使故事不断发生变化。

(二)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后来经历上山下乡,再后来又回到元宝街,到了电视台工作。杭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对于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无法改变的影响。一直到2003年,我被聘为杭州市的文化顾问,当然做过很多事情,也开过很多会。但有两件事情是说起来是杭州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西湖上演的《印象西湖》。

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国平说,杭州的夜晚不大留得住人,应当有一些留得住人的演出,杭州拥有西湖这样一个名湖,应该引进一个名导演,编一个湖上可以演出的名戏,来吸引人来杭州。我刚才为什么讲“白蛇传”呢?就是即使我们用了现代的声光电,用了大型实景演出的现代戏剧观念,用了现代老百姓的观赏方法,编出《印象西湖》这样一出戏,实际上还是从“白蛇传”过来的,它从相会、相恋、相恨、相别这个过程来演绎这个故事。怎么看杭州的文化?光产生“白蛇传”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就足可以让杭州永远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城市。当时就把张艺谋、王潮歌、樊跃

找来,这个演出现在每天晚上演,有时候还要加场演两场。我听具体运作演出的人说,现在已经在赚钱了,经济效益也很好。我从来都认为这种文化活动一定会有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一个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精神产品里面,是完全可以获得统一的。当然,搞文化作品首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好的文化产品一定也要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印象西湖》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它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比如杭州那么多游客,晚上花一个小时,以不多的钱,看一场这样的演出,多好。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演出,让杭州的文化,至少在夜间,就像《印象西湖》里的声光电一样,有了色彩,有了亮光,有了人们离开杭州以后还久久不能忘怀的一种记忆。这就是杭州的文化,或者说是杭州作为已经具备文化景观遗产的著名城市,她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吸引人的理由。

由此,我引申出来一点:一个城市的文化应当由城市经营者小心翼翼地培育、发展以及保护。比如说,白居易曾经是城市的经营,他当时留下的白堤,不仅是生产建设,而且还留下很多关于文化的传说。还有苏东坡,在治理杭州的时候,也留下各种各样的传说。对于今天杭州的城市经营者来说,我认为在保护杭州的文化发展方面也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三)

刚才我讲了《印象西湖》的由来,再比如现在杭州市民都知道的,每年4月底5月初,杭州有一周的时间,满街的愉悦和快乐,满街孩子们的笑声,因为在杭州有个盛大的国际动漫节。我经常碰到国际友人很惊奇地对我说:“哦,杭州,你们那边有个国际动漫节!这是全世界最大规模、最美的、见到朋友最多的动漫节。”

话说回来,杭州的动漫节在历史上没有过,也不一定非要属于杭州,但是杭州争取到了。第一次到北京去申请举办动漫节时,杭州市特意邀请我去做申办城市的演讲。我作为杭州市的文化顾问,当然义不容辞。去的时候,我在萧山机场才知道,杭州到香港的空中航班已经增加到每天三班了,我到北京就讲了这件事。杭州到香港的航班,最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一周三次,再后来每天一次,最后变成每天三次了,可见今天我们杭州的交通已经便利到什么程度。举办国际动漫节,一个城市的交通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作为省电视台的人,并不是市里的单位,杭州市邀请我去做演讲,还准备了很多详细材料,说明杭州下决心要把这个主办权争取到。因为里面有重要的原因,杭州意识到了。我认为动漫是成人的童话,不是只给孩子们玩玩的,为什么成人喜欢看动漫作品?为什么孩子们也喜欢动漫?为什么大人孩子一起喜欢?动漫现在在全世界文化产业里面名列前三位。文化产业是哪些?比如说电影、主题公园、音像制品。人类发展到今天,动漫成了一种国际语言,它可以沟通,可以寄托,可以在其中获取当代人对于生活、对于未来的想象,这是在很多现实的艺术作品中很难体现出来的,只有动漫才可以体现。像对于动漫这个文化品种理解上的准确,并且花大精力去争取让动漫节落到杭州,不仅第一年申办了,第二年还是我去,要求动漫节永久落户杭州。现在杭州举办动漫节是一届比一届办得好。这个动漫节的举办,就体现了杭州在当代文化上的发展,一个城市经营者对一个城市怎样发展文化,和文化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清楚。

(四)

另外再说一个事情,杭州市对那么多的背街小巷进行改造,这我在别的城市没听到过。当时

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讲,我们既要面子也要里子,要改造背街小巷。结果投资了很多亿,花了好多年,把背街小巷一条条改造好,在改造的过程中也非常注意文化韵味。中央台做过一篇连续报道,就讲到杭州的背街小巷改造,很多老百姓是很感动的。后来,不止搞这个背街小巷,还搞庭院改造。像这种城市建设,里面所具备的文化含量也很高。

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现在已经开始呈现了。我觉得杭州市满城市的文化点,都应该标出来。可能很多人匆匆忙忙不一定走进去,但是路上应该标出来。比如龚自珍故居、郁达夫的风雨茅庐、马可·波罗曾经到过的地方,或者李清照落难时居住过的地方,有时候甚至可以做成排地标。有一次我在梅地亚宾馆开会,我告诉大家,别看这个地方现在这么热闹,其实这里是杭州很有文化的地方。走出门口向后几步,就能听见鲁迅的咳嗽声,因为那是杭高;再往前走走,不远处是过去很早时候的车站,那里能见到朱自清的背影。这些都是发生在杭州的故事,多么有文化的地方。现在已经标了一些,景点都是咖啡色的牌子,但还没有标全。甚至我们也不回避什么,比如明代的严嵩,他的晚年是在杭州度过的,就是现在的皇亲苑那里。还有周作人、胡适,都在杭州留下生活痕迹。讲女子的话,林徽因、秋瑾、王映霞,都可以标出来,让整个杭州弥漫在一片文化的氛围里。

对于文化来说,一定需要城市经营者对它重视,这点非常重要。普通老百姓可以呼吁,但是要投入那么多资金搞背街小巷,搞《印象西湖》,没有城市经营者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再比如说我们的西湖西进,光是发掘出来的文化景点就有58个,这些景点有的在历史上声名远播,却都湮没在农田、山野、农居中。

(五)

还有“西溪,且留下”,现在果然留下西溪了,这都是杭州文化的表现。我小时候,城西从杭大外面开始,完全是一片农田。后来城西发展了,一座座小区向西建过去。再后来突然有一天悟到了,再这么把房子造过去,杭州的城市越来越大,可绿化、空气、环境还有历史上的那些文化遗存怎么办?于是决定,从紫金港路开始,紫金港路以西、天目山路以北、文二西路以南,一律不再出让土地,一律不再上新的项目,要把这块地方永远保留下来。结果就从这里开始,西溪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就这么搞下去了,全部都是一片湿地。把里面居住的老百姓进行一定的调整,把湿地好好地保护起来。现在西溪是越来越好了,也挖掘出很多文化景点,比如高士奇的高家庄,洪昇的洪园等。

2007年的时候,冯小刚和王中军、王中磊两兄弟到杭州来,谈起要拍一部戏,当时还不叫《非诚勿扰》。我马上邀请他们到杭州来拍,告诉他们我们新开发了西溪,有山野风光,景色又新鲜。电影是个文化产业,拍电影需要先投资,拍完靠票房收回来,所以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当时为了吸引这个电影来拍,省广电集团准备投资1000万参与合拍,我也找到杭州市委宣传部建议他们提供优惠条件。后来杭州市给予了包整个剧组食宿的优惠,对他们是很大的吸引。最后,谁也没有想到,电影放映以后会产生这么巨大的效益。两个景点因为这部电影火爆了,一个是日本的北海道,一个就是杭州的西溪。电影放映后,西溪的门票收益比原来翻了三四倍以上,还专门设计了跟电影情节有关的旅游路线。杭州市运用很多现代传媒的宣传办法,来宣传杭州、宣传西溪。西溪本身就是一个当代文化发展很好的样本,后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多荣誉。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包括湿地博物馆,以及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都在里面。

(六)

从我眼中看到的杭州文化发展,还包括杭州市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特别是在近几年杭州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这种提升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像西湖和西溪可以让我们观赏,也不像大街小巷上的文化遗存可以被标示,它对杭州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比如杭州的观众在听费城交响乐团来杭的演奏时,甚至懂得欣赏交响乐的规则,使乐团里那些几十年的老团员都感叹杭州是个有文化的地方。

杭州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空气清新、人很温润的地方,这跟杭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但我们也不是没有过轻视文化、忽略文化的教训。我当浙江教育台台长的时候,曾经搞过一次由建筑大师和普通平民参加的大讨论。那是在修中河高架的时候,在羊坝头水漾桥边有栋非常好的民国建筑,但为了造路给炸掉了,这种民国建筑在杭州本来就不多,非常令人遗憾。这一场大讨论,我相信对杭州市后来做出“凡是五十年历史以上的旧建筑都不能轻易拆毁”这个决策是有意义的。一座城市,对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加以甄别,对其中真正有文化价值的建筑予以保留,或者有文化地开发,这是很有意义的。过去解放后因为不懂文化,曾拆掉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建筑,这是一场灾难。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城市的建设,有过一个大拆大建的时期,又拆掉了一大批好的建筑,这也是一场灾难。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意识到了,也保留了许多青砖黑瓦的老建筑,将它们修旧如旧,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人总是生活在历史中,来开创自己的历史,文化是一定要得到重视的。文化也需要聆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历史的遗存。

(七)

作为一个在杭州出生、长大的人,现在能够为杭州的文化做点贡献、做点具体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在杭州生活,在杭州成长,要推动产业发展,要有效益,要建设这个城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生活所必需的一个因素——文化。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我创作过一个剧本《中国商人》,反映的就是杭州的商业文化,当时我体验生活的3家商场,就是杭州大厦、杭州百大和解百。那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个商场间的竞争很激烈。1995年之前,我还是专业编剧,突然就当上了台长,被要求筹备电视台。那时候不像现在,市场经济初期,人们做广告的意识还没有形成,电视台没什么钱,电台的人都不愿意来。90年代初时,很多产品还是计划供应,商品根本不需要做广告。产品要凭票才能买到,完全不需要推销,广告也就没有作用。到后来市场经济慢慢发展,电视广告才上去了。杭州市的商业文化在全国是有重要意义的,包括民营经济进城办商店,而且大型的百货商场交给民营经济来办,这方面杭州是走在前列的。《中国商人》就是来自于我体验生活中了解到的人和事,它播出的时候,党的十四大还没有召开,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还没有明确,但这部戏已经通过故事告诉人们,不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所以当时穆青说:“春江水暖鸭先知。”艺术家的眼光有时候比政治家还要犀利,艺术家发现真理的速度有时候比理论家还要快,就在于这里。为什么?就是艺术作品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只是把让我感动的这些东西拿来塑造人物,是杭州市的商业生活给了我文化的启迪和生活中的真理。

时间:2013年4月18日

口述:楼一层、何 璟——桐庐县文化馆原馆长

采访:高 丹、黄琦峰

整理:高 丹

(一)

楼:我1984年到县文化馆当书记、馆长,那时候还没接触到剪纸。1988年,桐庐写县志,需要采访文化名人。其中有个清朝末年的文化名人叫胡传泰,他的女儿胡家芝生活在南京。于是我们就到南京去了解胡传泰的情况,在了解的过程中,意外知道了胡家芝是个相当有水平的剪纸艺人。那为什么过去我们桐庐不知道呢,因为她1952年就迁居到南京去了,在那之前已经在桐庐农村剪了半个世纪的纸。胡家是个文人家庭、书香门第,她从小就喜欢剪、画、刺绣,尤其是剪纸剪得很好,能把地方螺蛳戏的人物剪到剪纸里。18岁的时候,她嫁到桐庐珠山村,丈夫也是个文化人,出身于进步的开明地主家庭,解放初在桐庐孤儿院当负责人,解放后得了肺病,到杭州医治无效去世了。此后,胡家芝就随着已经工作的大儿子迁居到了南京,与家乡失去了联系。要了解桐庐过去的剪纸是怎么回事?她是一个典型人物。

桐庐剪纸历史悠久,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还没有确切根据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清朝的时候,剪纸已经在全国普及,在桐庐也是盛行的,这个剪纸主要是民俗剪纸,是民俗活动的载体,依附在民俗活动中,结婚要剪喜花,送礼要剪礼花,做寿要剪寿花,还有人死了办丧事、清明祭祖都有各式的花样,更多的是正月里闹元宵时候的灯花。胡家芝嫁到男家以后,把剪纸带过去了。因为剪得好,还被称为福星,红白喜事都请她去。因为民俗剪纸有时代的局限性,她到南京后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再加上她又生活在一个文化家庭,就开始把剪纸提升为创新的喜花剪纸。所以说,她剪纸剪了一百年,前五十年是民俗剪纸,后五十年是创新剪纸,内容也新,形式也新,把原来的各种图案组合起来,提升了民间的喜花剪纸。她一直剪到114岁去世。

我1988年到她家去时,看到了一本剪纸书稿,但是出版要6000块钱,而当时还差3000块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回来以后我就向文化局领导汇报,最后政府同意赞助3000块钱。这本书出版以后,大大激发了她的创作激情,一直到一百岁,还剪出了许多作品。1989年国庆节时,她让大儿子从南京送了500本书到文化馆,我们为此搞了个简单的仪式,并把一起带过来的20件原作挂起来展示,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带劲,原来桐庐还有这么好的剪纸。这时候,桐庐一些民间的剪纸艺人,或者是没有被发现的,或者是没有那么高水平的,都把自己的剪纸作品送到文化馆来。我们在大门口的橱窗里搞了展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还把人们组织起来搞了几次培训,提高水平,传承技艺。

到1993年时,新的阶段开始了。当时杭州市群艺馆馆长王大同在杭州市文化界提出,文化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杭州的民间艺术推向世界。因为桐庐剪纸曾在1991年的建国42周年杭州美展中得过几个奖,就在1993年的时候把桐庐列为剪纸开发基地。我们则继续一年一年地搞剪纸培训。那个时候文化馆很困难,因为这个培训不能收钱,不像唱歌跳舞可以收钱,我们不但不收钱还要给他吃饭,给他纸,给他剪刀。文化馆当时仅靠翻翻录像那一点钱,哪里支持得了,但是我们看准了这是个重点的新项目。第二个重点开发剪纸的理由是,当时桐庐的故事已经有名气了,

再要上难度大了；戏曲小品也有名气了，省里也得了奖，但要冲上全国也难了；摄影只是还可以；书法、美术比不上建德、萧山。市里既然提出来要发展剪纸，刚好上下对口了，于是就把这个作为重点项目来开发。

1995年的时候，正值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有个剪纸骨干叫谢玉霞，（纸）剪得很好，就一直扶持她。过年的时候，我在年会上提出，能不能将剪纸作品作为一个礼品送到北京去，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话只说了一半，没有具体讨论，结果谢玉霞回家后自己找了资料，根据中国女性风采这个主题，剪了四五幅中国历代女性的剪纸带到文化馆来。我看了以后觉得很不错，就把这个作为重点项目，鼓励她继续搞。除了送纸过去，还发动了县妇联、文化局的领导以及杭州电视台一起到她家里去鼓励她。她的积极性很高，一连干了两个多月，有时甚至干到通宵，剪得手上老茧都出来了。后来我们在作品中选了38幅，以三八妇女节的意义，体现38个女性的风采，一直剪到秋瑾为止。那么怎么把这些一张一张的剪纸连起来呢，以前没有做过，我们就动脑筋，用反拓法，很小心的粘贴，终于把长卷做好了。可是怎么送到北京去呢？我们先请妇联出面去联系省里，省妇联说世界妇女大会的礼品浙江已经定好了，我们的剪纸已经轮不到了，而且还需要赞助费，我们也没有钱去赞助。那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一个文化部的朋友，请他帮忙，把做好的东西给他寄过去，最后终于送到了大会，给我们寄了收藏证过来。这个事情一成功，大家心里才稳了。

再说到1996年，第二件事情的办成，就是中国民间艺术展，在浙江展览馆举行。这一年，我们的43件作品在杭州展览了3次，一次在柳浪闻莺公园，一次在新侨饭店。当时评奖需要参评费，可我们的钱哪里去找呢？当时我还当着文化馆长，就想办法去拉赞助，办了个长征胜利几周年的画展，找了电视台过来，拉了2000块钱赞助，其中1000块钱就寄到杭州去做参评费。后来评上了一个金奖是谢玉霞，一个银奖是王德林。这是第二次成功，让大家信心很足。县里的领导很高兴，业余的30多个骨干也很高兴，说我们文化馆是在给他们做嫁衣裳，扶植他们。

第三个成功的事情是1997年，谢玉霞由杭州市群艺馆组织到西班牙去做国际文化交流，走出国门去了。这个事情联系了快一年的时间，到第二年才总算成功了，一共去了一个半月时间。再后来就是到1999年的时候，我们承办了浙江省的一次年会，我和何璟两个人就编了《桐庐民间剪纸》这本书。这本书花了一万块钱，当时困难很多，我们把书编起来却没有钱出。那时候领导还没能理解这个事，钱拨不下来，书就只能拖在那里。后来杭州市文化局的副局长来了，问我这本书样稿早就出来了书怎么还没出来啊？我说没钱了。这时候桐庐县的文化局长终于下决心了，拨了一万块钱下来。这本书印了1000册，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当时找了上海的专业设计，设计好了运到杭州，杭州再运到萧山去线装，一本就要四块钱。这本书搞出来以后成功了，发给全国各地，都说县一级能搞出这样高质量的东西很不容易。

2000年时候，我馆长不当了，只当书记。新来的馆长喜欢书法，不太重视剪纸。这时候一个机遇来了，也是碰得巧。我的一个朋友，刚从杭州市旅游局退休，跟我说想在桐庐搞一个女儿村景点，里面要造一个博物馆。我就跟他说把剪纸放到里面好不好，他说好呀，于是一拍即合。等于就是在困难的时候碰到机遇，把剪纸文化嫁接到旅游景点去了，因为靠政府部门来养文化确实养不起，我们自己没有造血功能啊。花过一年多时间，到2002年4月，桐庐的第一个剪纸艺术馆开馆了。后来文化馆又搞了第二个剪纸馆。第三个是胡家芝剪纸艺术馆，在胡家芝故居。第四个就是叶浅予艺术馆，搞好后开辟了一个桐庐剪纸艺术馆。4个馆就这么连续搞起来了。

女儿村搞了以后,我返聘到桐庐县文化局搞桐庐大剧院基建,到2002年项目上马后我刚空下来。当时刚好文化部下文,说省一级的民间艺术之乡可以申报国家级。而我们桐庐是1998年申报、1999年批下来的省级剪纸艺术之乡。于是2002年时我和何璟就去申报国家级,到2003年4月左右成功了。我当时跟桐庐县文化局长讲好的,因为要申报成功的两个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搞一次全国大赛,他答应等申报成功一定做这个事。2003年6月,全国大赛开始筹备,我们两个人到省里文化厅等地方到处跑,总算事情有了名目,但是年底办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定到2004年2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大赛。第一届大赛很成功,成功在过去像这样大规模的剪纸大赛很少,特别是有奖金的大赛就更少。过去剪纸都没有奖金,就是一张纸。而我们有奖金,政府肯出钱了,这样吸引力就很大,第一届大赛来的人很多。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很细心很小心很认真,组织工作做得很好,3天的活动安排得很好。很多艺术名家都来了,100多岁的来了两个,一个是内蒙古的,一个就是南京的胡家芝。这次大赛的成功给全国的印象都很好,就是桐庐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评奖也很认真,这对全国的大赛都有促进。后来,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也都成功了,而且一次一次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第二届,特色就是跟杭州国际剪纸艺术节一起搞,重要的活动有“一台戏”,就是杭州越剧团的《剪花女》;“一本书”,就是王伯敏写的《中国民间剪纸史》;再有就是王德林的一个剪纸长卷,也是我们组织人把它搞起来的,一共有20多米,也费了很多的劲。第三届主要是时装表演。第四届是创意剪纸。这个我就不讲了。

前面我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放前的桐庐剪纸什么样?桐庐剪纸有哪些内容?是怎么定位的?有什么特色?话讲回来,桐庐剪纸过去在外面名声不大,浦江和乐清的名声很大。浦江现在明朝清朝的剪纸都拿得出来,我们拿不出来。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没有,就像山上的兰花一样,在深谷里面,鲜为人知。我们做了个什么工作呢?就是通过代表人物把它挖掘出来后,把技艺传承下来,把“非遗”项目抢救起来,而且得到进一步地弘扬和光大,逐步走向市场。这个过程中,我们起了抢救、保护的作用。这个除了技艺传承和培训之外,还有中小学教育。1992年的时候,我们就有5个剪纸开发基地组织起来了。到2003年、2004年的时候,老年大学的剪纸开发基地也搞起来了,现在还有工作室之类的,很多了。下面的事情请何璟讲吧。

(二)

何:我是搞美术的。1995年,我美术专业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才开始接触剪纸。那时候刚好是我们被杭州市列为民间艺术的特色开发基地,接触到很多省里和市里的一些老师下来培训。这段时间是把我们桐庐的业余(剪纸)骨干集中、提高的过程。因为我们桐庐的剪纸发展除了要有带头人,像胡家芝老太太,像谢玉霞,还需要有一批业余作者来做。我到馆里以后,就开始接触这批业余骨干,跟他们一起交往,一起搞活动,更多的是跟他们学习,这样我也觉得剪纸艺术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原来不太接触剪纸的,小时候只能看到零散的一些作品,也都是小东西。接触以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跟着楼馆长一起,慢慢把剪纸工作,包括整理、组织等,逐步开发起来。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应该说,前面都是一些铺垫、准备工作。等到我们成绩出来后,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特别是我们县里的领导,包括局里的领导,都觉得这个剪纸相当于是我们桐庐的一张名片了。外地人通过什么了解我们桐庐呢?这就是一个手段、一个方法。

应该说,苦的几年已经过去了。就像楼老师说的,没有钱搞活动的日子,那时候真是没有钱

啊,每次搞活动要贴钱,每次组织展览要贴钱,把作者和作品送出去参赛要贴钱。我记得我们是1997年第一次正式开始参加省里的活动。浙江省当时有一个剪纸研究会,他们每年都搞活动,就是省里的活动,但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1997年时,我是背着这些作品去的,就是我们这里这些业余骨干作者的作品,创作好了打包以后由我背着到宁波去参加活动。也是从那次以后,浙江省里(剪纸)圈内的这批人开始认识桐庐剪纸,知道我们桐庐有一个创作群体在做剪纸这个事情。从那以后,我们桐庐真正进入到浙江的剪纸圈里,然后接下去开始承办省里的剪纸年会和剪纸大赛,再从省里面走出去,走到全国,来举办全国的大赛。包括今年(2013年)10月,我们要举办第五届的“神州风韵”剪纸大赛。连续五届下来,我们桐庐的剪纸已经不仅仅在杭州,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楼老师刚才提到,我们的第一届“神州风韵”剪纸大赛,可以说在全国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因为以前剪纸在艺术门类里是很小的一个范畴,没人重视它。当然这几年随着非遗工作的保护和推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但在当时,你搞一个剪纸比赛,全国性的、大型的很少,而且往往都是在美展中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和艺术门类,没有单独的展览。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搞第一届大赛时,应该说是进行了全面的发动,全国各个省都通过省里的剪纸组织全部通知到位,组织了国内顶尖的剪纸艺人来参加比赛,所以非常成功。从这以后,如果说第一届的时候了解和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虽然当时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参加的人有800多个,收到的作品有1000多件。但等到第二届举办的时候,收到作品有几千件了,全国的省市我记得除了台湾和澳门两个地方没有作品来参加,其他都有,包括香港都有作品来参加了。到第三届的时候,我们刚好跟杭州的国际剪纸艺术节一起搞,连国外都有一些剪纸艺术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应该说在全国的剪纸界中起了示范作用。从那以后,各地各类的全国大赛就多起来了。我们的大赛除了搞比赛以外,还推出全国各个协会推荐上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十大神剪”,每一届选可以代表各个流派、各个地域风格的十个人。这个也得到我们剪纸业内的公认。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推动了我们本地剪纸的发展,也为宣传我们的文化、宣传我们桐庐打下了基础。

现在,作为全国的民间剪纸艺术之乡,我们除了重点培养几个剪纸骨干以外,更多的是做好传承工作。我是2007年担任文化馆长,到2012年离开。现在这块工作除了文化馆在做,还有我们成立的非遗中心。现在剪纸的保护和挖掘工作重心已经逐步转移到非遗中心去了,近几年主要在做对外宣传和对外交流。楼老师前面提到,我们的谢玉霞老师1997年参加了到西班牙的文化交流。从那以后开始,我们的这些骨干会员,分别去过英国、挪威、丹麦、日本、韩国等国家,参加省一级和市一级的文化交流。2011年时,杭州到台湾去搞了《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在这期间,我们桐庐创作了一幅新的《富春山居图》,按照新时代富春江沿岸的景色,作为现实题材,制作了一个剪纸长卷。我们也是从建德的梅城开始,一直到杭州湾钱塘江大桥这段,专门组织了5个人的创作团队,对整条河进行写生采风,再集中创作。当时整整用了3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个长卷,有20米长、68厘米宽。这个长卷出来以后,通过县里报给杭州市政府,被纳入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并配合合璧展,把作品送到台湾去展出,也把作品作为礼品赠送给连战,当时在台湾引起了轰动。用剪纸创作这么长的一个长卷,在国内还是第一个。这件事情对我们桐庐现代的剪纸创作来说,在几个地方都是种突破。第一是剪纸的题材,以前我们桐庐主要是以喜花为主,现在我们在这个题材上就有所突破,不单单可以反映传统的东西,我们传承要有,但是更要有发展,要有现代的东西,就是如何把现代的风景通过现在的剪纸手法去体现。第二个是长卷,如何

把一张张剪纸拼连成一个大的卷轴来制作。第三个是技术层面上,如何装裱等等。因为这次的成功,2012年时,我们受联合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部的邀请,把我们的剪纸送到那边去做了个专门的展出。这次展出,我们又带了个(剪纸)长卷,还是《富春山居图》,但是在2011年的基础上另外创作的,受到场地的限制,长度是8.8米。同时,我们也带去了桐庐的一些传统剪纸,包括杭州的西湖十景剪纸。那次展出我也去了,而且我在现场做了个剪纸表演。联合国的那些工作人员都觉得非常神奇,一张纸、一把剪刀你能剪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他就来跟你学。所以这两年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对外的交流和宣传,第一是促进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发展,第二也是激发我们当地的业余骨干水平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推动桐庐的对外宣传,打响了桐庐的文化品牌,现在剪纸真正是成为桐庐的一张金名片了。

这些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剪纸的市场化探索,应该说做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成功。我们也尝试了很多渠道,各种方式方法。不过做下来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艺术家都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像谢玉霞的女儿张文子在谢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王德林有剪纸工作室,还有专门搞剪纸连环画的华金娟也有自己的工作室。通过工作室,也在尝试走市场化的道路。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剪纸在传统的传承基础上,也有一些创新。从第三届“神州风韵”剪纸大赛的时候开始,推出了创意剪纸大赛,比如剪纸跟服装的结合、跟陶瓷的结合,相当于如何把平面的剪纸用三维的立体的手法去制作。这个创意剪纸大赛同样是全国性的,全国各地的作者都在尝试。因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剪纸始终是一张纸,大家都觉得比较局限。剪纸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跟其他的艺术不一样,比方说画,有唯一性,但是剪纸一次性可以刻或剪出好几张来。从大家常规的思考方式来说,它的艺术价值跟其他的门类相比较就会低一点。我们就是通过把剪纸的元素嫁接运用到其他的艺术门类中,来进行剪纸艺术的创新。这块是我们近几年在探索的一个事情。

现在整个桐庐的剪纸骨干人员也不多,只有二三十个人,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这些人。我们作为东道主在这里搞展览和比赛,他们是每一届都参加,而且每一届都有人获“十大神剪”。第一届是谢玉霞,第二届是王德林,第三届是朱维桢,第四届是华金娟,他们四位都非常有特色。第一位谢玉霞老师是喜花剪纸,传承胡家芝老太太的制作工艺。第二位王德林老师是在传统上有发展,传统剪纸是单色剪纸,他是套色剪纸,有色彩的,而且运用了版画的一些元素,作品非常漂亮。第三位朱维桢老师搞的是风景剪纸,因为我们桐庐富春江风景秀美,也有很多名胜古迹,他就是把这些风景用剪纸来创作,用比较写实的手法来反映富春江的风光。第四位就是华金娟老师,是剪纸连环画的形式。他们的特色不光是我们自己说说的,因为“十大神剪”评选的评委不是桐庐人,而是全国各地邀请的,评选的过程中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因此他们的实力是在国内受到大家公认的。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是用业余时间创作的,只有华金娟是专职的剪纸艺人,搞了工作室。

这几年,还有一个是王伯敏老师,对我们桐庐的贡献比较大,因为他在桐庐写了《中国民间剪纸史》。他的女儿王莘老师,这几年也在帮我们桐庐的剪纸作品如何走向市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华金娟的工作室都是在她的扶持之下。她自己每年都组织一些剪纸骨干创作一些作品到国外去交流。

(三)

楼:桐庐县的剪纸协会是1998年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呢?第一因为当时文化馆的业余骨干还没有一个名头,有了组织以后,大家就很自觉地参加活动。第二是起到技艺磋商、理论探讨、外部交流的作用。当时这个组织实际上还是文化馆在做,因为谢玉霞剪纸剪得好,所以当了会长;何璟是秘书长,负责操办。我呢,年纪大了,就当个顾问。我们希望把谢玉霞推出去,她是个医生,虽然到后来退休了,就是起到个示范作用,实际工作还是我们来做。研究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就是刚才何馆长介绍的几个情况。在传承、讨论当中,大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几位有用剪的有用刻的,风格都不一样,题材内容都各有侧重。通过研究会,在保持桐庐剪纸共性的基础上,再把各地剪纸的营养都吸收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我们剪纸的内容丰富了,题材多了,形式也多样了,从过去的单色的平面的剪纸,发展成多色的立体的剪纸,就是把过去传统的剪纸提升为现代的剪纸了。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们把桐庐的民间剪纸往上提升了,是让剪纸从分散的状况走上了有组织的路,发挥了集体的作用,发挥了文化部门辅导和支撑的作用。研究会还有个作用就是理论的提升。我除了宣传推动、理论研究、组织活动外,自己也去尝试了剪纸,发现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太费眼睛了。

我们的剪纸研究会以我为主,主要是宣传,把这些人都推出去,在《浙江文化报》《杭州市群众文化报》《美术报》上写了二三十篇文章。我们一是把作品推出去,二是把作者推出去参加各级协会。像谢玉霞参加全国的剪纸协会,她自己根本没有想过,是我在浙江的剪纸小报上看到北京有个中国剪纸研究会,就把她的作品复印了二三十张,还代她写了个申请寄过去。后来参加全省的、全市的组织,我们都把他们推出去。除了剪纸作品和作者,我们还把桐庐的地方文化推出去。剪纸是桐庐的地方文化特色之一,桐庐有四大产品——故事、戏剧小品、剪纸和越剧,我们把剪纸作为地方文化品牌之一推向全国。

另外在理论研究方面,王伯敏到桐庐以后,写了《中国民间剪纸史》,把理论也推上去了。我们剪纸的第一个推动力是胡家芝,第二个推动力是王伯敏。他讲过写剪纸史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剪纸全国非遗的申遗工作。他的剪纸理论研究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鼓舞,我们同时也把桐庐剪纸的历史进行了挖掘,对过去剪纸的题材、内容、代表人物也进行了调查。这时候正好国家非遗项目抢救活动下来了,等于我们前面已经把奠基工作都做好了。包括胡家芝的故居,2001年时候在老城区已经是危房,我就写了建议把它修起来,一是作为老城区少有的明清建筑,二是文化名人故居,三是桐庐文化站当时没有活动场地也可以解决了。到后来经过呼吁,花20多万把它修起来了。王伯敏先生叫女儿在桐庐建了个红园文化艺术中心,干什么呢?也是搞文化艺术,重点是剪纸。他还叫女儿办了个小报,叫《中国剪艺观察》,就是宣传剪纸的理论,已经出了近十期了,不定期的一年出三到四期,对全国剪纸理论研究和交流起了推动作用。第三个事情是办了个中国首期民间剪纸理论高级研修班,档次很高,来参加的全国各地都有。这些都是在理论研究上通过活动来推动剪纸创作艺术的提高,理论搞好了,才有引领作用。

我们剪纸研究会这些人,后来到了文联之后改成剪纸协会。第一那时候朱维桢老师当会长,因为我们这些会员都是文人,大部分是老师,社交面不广,外面去拉赞助很难。第二我们去外面得了奖回来,因为不是文联这条线,评奖不起作用。于是就把它纳入到文联下面的民间文学艺术协会中去了。我们原来在桐庐剪纸研究会时,也搞过七八期的剪纸研究小报。

(四)

何:杭州地区现在下面有剪纸协会的只有我们桐庐。我们基本上是在市里的指导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建德是农民画,桐庐就是剪纸。这几年,余杭也举办过杭州全市性的剪纸比赛。其他几个地方剪纸也都有,但是都不像桐庐这么盛大,办了这么多全国大赛,还有自己的协会。

杭州剪纸协会隶属于杭州民间艺术家协会,是一个二级协会,是宋胜林老师前后在做的。他在杭州的艺术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桐庐前几年剪纸的发展,跟他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在培训方面,还是在活动组织上面,他给我们的帮助非常大。这几年,杭州剪纸协会也搞了很多活动,人数也比较多。他们的工作除了开展一些会员之间的交流之外,更主要的一块是搞少儿剪纸的培训。杭州市剪纸协会在杭州的几个区建立了好几个小学生的剪纸基地,这块工作做得比较好也比较多。相对来说,杭州市剪纸协会正式成立要比我们桐庐迟,所以原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跟省里挂不上,和这个也有关系。

楼:杭州市本来是2006年的时候就想成立协会的,结果没成,一直到2010年底的时候才正式成立。

(五)

楼: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吴文昶就是故事大王了。他是个民办老师,开始是说故事,讲《烈火金刚》等长篇小说,在农村里面讲,农民都很喜欢听。到后来,县文化馆发现他故事讲得好,就支持他搞故事创作。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创作了《新来的女队长》《戏外戏》《狗尾巴的故事》等很多故事。当时文化部门就开始重视了,把他借到文化馆来。除了他自己进行创作外,还组织文化站的创作干部进行培训。当时有30多个人搞创作,不只是文化站的人,还有农民。因为那时候的文化太枯燥了,没有电视之类的看,讲故事算是一项很好的文化娱乐项目了。那时候他讲的故事很生动,创作的题材都很贴近生活,而且适于宣传。他创作了很多故事,其中有个《大树底下》还在全国得了奖。因为那时候故事在杭州市也是作为拳头产品、重点文化项目的,杭州群艺馆抓得很好,在全国都有影响。当时全国的协会、活动、比赛,吴文昶都参加,在报刊上发表的故事也很多。还有他培养起来的这些人,创作的新故事也都在《上海故事》等杂志上发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水平也提高了,效果也很好。自然而然的,桐庐就被称为“故事之乡”了。为什么呢?因为杭州市连续十几届故事比赛中,桐庐都是名列前茅。故事红火了很久,但是后来慢慢冷下去了,因为文化项目多了,外来文化也多了。

何:大家都看电影看电视了,没人听故事了。

楼:那时候,故事就像是黑白照片一样了,人家唱歌、跳舞的多得很,电视也家家户户都有了,谁来听故事?当时我还在文化馆,我就想,这个有点难办了!于是故事就萎缩到仅仅只有文字创作了,就是到刊物上去发表,最多杭州市组织几次比赛,农村里没有人来听故事了。那时是一个低谷了。那怎么办呢?文化馆当时有个业务干部陈明珠,讲故事讲得很好,全国得奖的,吴文昶写故事,她就讲故事。后来她就开始抓小故事比赛,推少儿故事。这块还是有它的市场的,因为需要演讲,口才要好,讲故事儿童又喜欢听,在学校里面慢慢就扩大起来。一搞就连续搞了20届少儿故事比赛,每一届都冒出讲故事尖子,到杭州市,到全国都得了奖。

何: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刚刚命名桐庐为“中国故事之乡”,并且在桐庐建立了中国故事研究基地。其实剪纸和故事差不多,都是有一个领头人出来以后,影响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民间故事在桐庐,一个是创作,一个就是演讲。讲故事从一个高峰,又掉到低谷,那时候完全就没有人讲故事了,仅仅就是靠创作,包括吴文昶老师后来也就是上海《故事会》杂志的一个特约编辑。整个演讲和创作都跌入了低谷,后继乏人。这时候,我们还是从娃娃抓起,做一个传承的工作,这就是陈明珠老师,我们原来文化馆的副馆长做的事,她就抓了一个少儿故事的培训。我们连续举办了二十届的少儿故事演讲赛,然后又进行“少儿故事大王”的命名。比如这个小孩子连续3届在我们少儿故事的选拔赛中获金奖,我们就命名他为“少儿故事大王”。做下来以后,这个活动也变成了杭州市群众文化方面的一个品牌。现在杭州市里也有少儿故事的演讲比赛,慢慢波及故事创作。这块对我们当地的触动也比较大,我们现在依托桐庐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建立了一支队伍,骨干有十多个人,他们每个星期都举办活动,大家坐到一起交流想法,通过讨论形成作品。这几年我们其中一位方赛群老师,去年(2012年)获得了山花奖,这是民间艺术方面最高的一个奖项。我们还有很多写故事的作者,在许多地方发表故事或获奖。包括我们民协的秘书长潘小伟,应该算是陈明珠的学生,他对故事方面也非常投入,这几年成绩也很好。我想,通过去年这个命名以后,对我们当地的文化品牌,又是一个促进。

杭州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与探索

1978年至2007年,杭州市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①取得巨大成就。在中共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际,回顾杭州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和探索意义深远。这不仅有利于杭州市正确认识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而且有利于杭州市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和趋势的分析,阐述传统发展方式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并与国内外具有部分共性的几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探索杭州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线及政策取向。^②

一、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

(一) 杭州市经济发展道路概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市的经济建设不仅在数量上取得巨大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得到显著提升。到2007年底,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比1978年增长144.5倍,达到4103.9亿元;同期人均生产总值增长108.5倍,达到6131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显著改善。

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杭州市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3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由1978年的1:2.7:0.8转变为2007年的1:12.3:11.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巨大,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同期的产值总量则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地区工业化的推进,杭州市加大对重工业的发展投入,从而带动工业整体实力的发展。同时,第三产业根据自身优势重点打造旅游业和金融业,这两个行业的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

同时,杭州市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全国较早有力地推进产权结构改革,尤其是大力鼓励

^①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得到增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成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环境与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是一个综合的体系,主要用来反映总量增长、经济结构、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经济总量通常用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来衡量。经济结构则主要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绝对值和相对比值加以表示,有的学者从行业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可以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医疗和健康等角度加以衡量。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一般采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排污量等指标。

^② 在衡量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考虑到反映真实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的变化过程的需要,以及数据可得性,文中用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来反映经济总量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总量和三个产业产值的相对比作为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指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发展结构指标表示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变化,以体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和发展方式优化的成果;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指标,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加以体现,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因素,仅对近几年的数据加以分析,并引入国内外的相关城市加以比较分析。

民营经济的发展。在非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之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2000年以后,非国有经济在杭州市的比重仍快速增加。相应地,国有经济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其他经济组织的工业产值比重迅速扩大。

杭州市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出台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2007年,杭州市单位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5.5%以上,对缓解能源紧张状况、减少环境污染、支撑杭州市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高新技术产业、三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等齐头并进,迅速发展,对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经济发展的高效性、均衡性、协调性明显增强,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

(二) 杭州市经济发展的成效与问题

1. 经济发展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杭州市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效。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8.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103.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1%,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5.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565元增长到2007年的61313元,年均增长率为16.9%,也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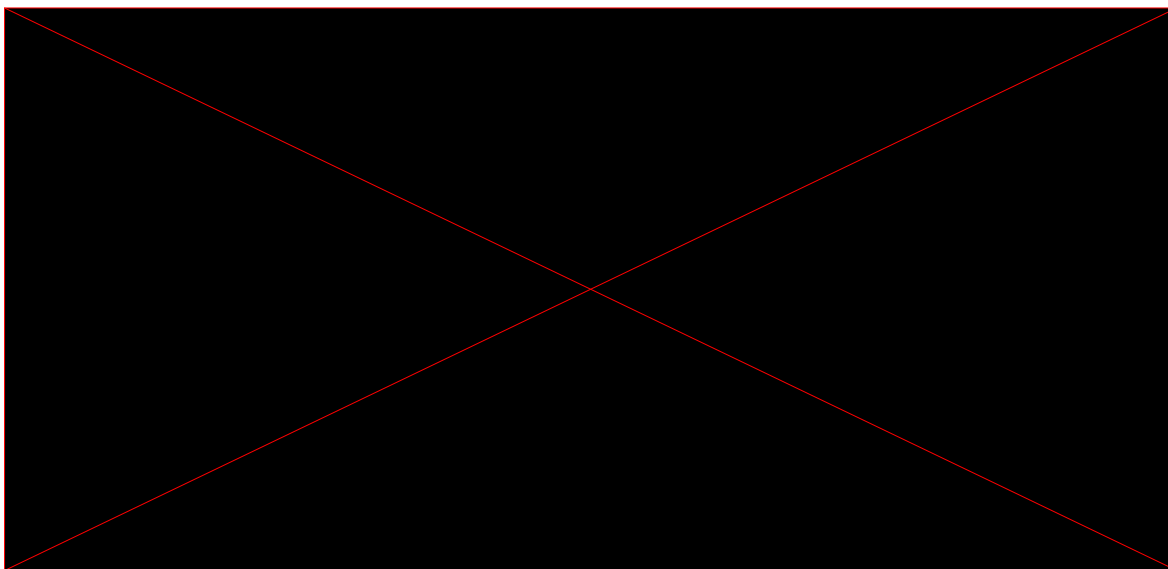


图1 1978年—2007年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全市生产总值

国际贸易方面,出口创汇从1989年的0.5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299.7亿美元,增长599.4倍,累计创汇达1481.4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2.7%,远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0.1%)。出口供货额从1978年的4.3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2269.9亿元,增长524倍,年均增长率为123%,远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在早期国家外汇短缺时期,为国家出口创汇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在30年的发展中,出口产品已由最初的初级农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多元化产品。

进口额从1989年的0.3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34.6亿美元,增长395.9倍,累计进口额为739.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9.4%,远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7.2%)。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6.3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67.57亿元,增长了26.44倍,年均增长率为11.5%,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1.6%)接近。第二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16.93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059.15亿元,增长了121.60倍,年均增长率为17.35%,比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5.1%)高2.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5.1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877.17亿元,增长了365.71倍,年均增长率为21.74%,比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17.01%)高4.73个百分点。

改革期间,杭州市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产业对全市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产值占60%左右。9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大,到2007年达到45.7%,并保持继续上升态势。随着地区工业化的推进,杭州市对重工业的发展投入加大,带动了工业整体实力的发展。其中,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38.3%上升到2006年的58.3%。第三产业中,杭州市根据自身优势,重点打造旅游业和金融业。依靠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杭州市不断推进“旅游西进”和旅游国际化战略,2007年实现旅游总收入630.06亿元,同比增长15.8%,占第三产业总值的33.6%。同年,杭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10.5亿元,同比增长20.1%,占第三产业总值的16.5%。近三年,这两个行业的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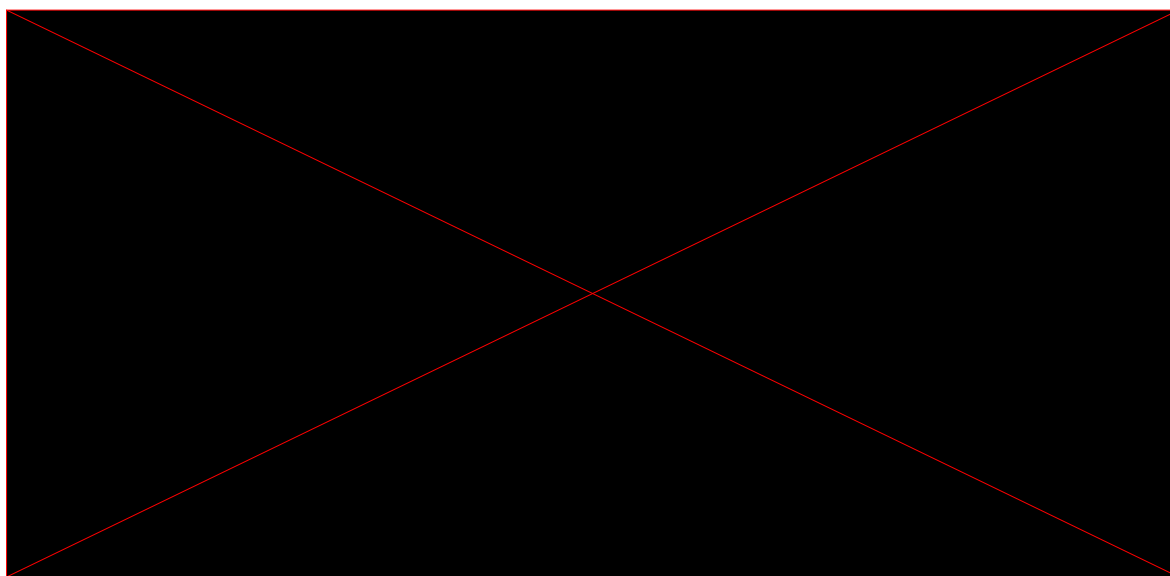


图2 1978年—2007年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

杭州市在全国较早推进产权结构改革,大力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2000年以后,非国有经济在杭州经济中的比重快速增加,国有经济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尤其是在民营企业方面,杭州市远远优于全国其他大中城市。除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外其他经济组织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25.6%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

89.3%。其中,杭州市有规模以上私营企业 4893 家,占总企业数的 62.5%,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3% 增长到 2006 年的 30%,高于同期的上海市、南京市 20 个百分点左右。同时,三资企业^①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 2000 年的 25.8% 上涨到 2006 年的 34.5% 左右。

杭州市注重可持续发展,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以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2005 年,杭州市每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为 0.87 吨标准煤,分别比全国 1.22 吨标准煤/万元、全省 0.90 吨标准煤/万元下降 28.7%、3.3%;全市能源利用效率约 40%,比“八五”时期末提高约 5 个百分点,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约高 7 个百分点、4 个百分点。2006 年,杭州市每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为 0.83 吨标准煤,降低率为 3.8%,好于全省平均水平;降幅在全省各市中居第四位。2007 年,杭州市单位生产总值电耗 1071 千瓦时/万元,同比下降 1.6%,单位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5.5% 以上。

2. 经济发展问题

(1) 要素制约突出。一是土地紧张。浙江省土地面积小、人口稠密,工业用地严重缺乏,与其蓬勃发展的工业经济不相适应。现阶段,杭州市国内投资项目较多,形势较好,城区和萧山一些工业园区对入驻企业有行业和规模上的要求,突出的问题是用地紧张;在市区内靠合资、购并起家的外资企业,大多面临无空间发展的情况。二是资源缺少。杭州市自有资源很少,所需大多都要从外地购进。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源压力日益突出。三是劳动力短缺。由于杭州市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再加上旅游城市的特点,以及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使得杭州市企业所需的劳动成本大幅上涨,并显著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

(2) 第三产业比重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虽然杭州市第三产业的总量及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上海等大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如果和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就更显未来发展空间的巨大。

(3) 大企业相对较少,部分产业基础薄弱。在浙江省内,杭州市产业基础是较强的,但与上海市、江苏省南部城市比较,仍然有大企业少、规模较小、布局分散、产品缺乏品牌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等弱点。特别是县或县级市在招商引资上的突出问题有产业基础较低、基础设施较差、人力资源较少等。

(4) 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贸易增速受限。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的贬值,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有所减缓,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出口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科技附加值需要继续提高。

二、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一) 客观因素

1.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优势和浙江省经济的迅速发展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但长期的计划经济已造成小商品短缺的市场结构。杭州市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改革之前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轻工业基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为优化产业结构,改

^① 三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

变经济发展方式,杭州市加大了对重工业的投入。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杭州市经济得到新的推动力,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迅速增长,增长率达到惊人的40%左右。在非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之后,非国有经济规模迅速增长,成为杭州市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2006年,杭州市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九成。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开始迅速发展,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产值迅速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第三产业的需求增加和市场化政策得到正确执行,杭州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21世纪以后,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继续转变,鼓励低能耗、高附加值的高新企业发展。杭州市企业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打造出一系列高新产业群,培育出更多的高新企业。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出口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贸易额稳步大幅增加,有效推动杭州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相互促进的,全省其他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强化了杭州市作为全省经济中心功能作用的需求。杭州市不仅是受益者,还为浙江省经济的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信息、资源、人才、要素的充分流通。

2. 地理位置优势

杭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枢纽,其经济受到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辐射的影响,上海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自然推动杭州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通过沪杭甬高速公路等大通道连接上海浦东和宁波北仑两个对外开放窗口,杭州市处于中心地位,经长期发展已形成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层次,具有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外向度,科技人才相对集中,是全省经济增长与开放的领航区域。

(二) 主观因素

1. 各项经济政策的及时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

杭州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向好和浙江省整体经济优势,以及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与杭州市各项经济政策的及时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密切相关。可以认为,杭州市经济发展的加速与领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浙江省的改革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杭州市作为其省会,是浙江省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带动者和受益者。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浙江省和杭州市对政府功能定位准确,市场化改革理解到位,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和工业化进程。改革的先发优势造成的经济体制与全国其他改革比较迟缓地区的“落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因。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的特点是市场发育比较早,非国有经济发展比较快,传统计划体制外的新体制因素成长比较迅速。体制外市场因素的生成和发展,包括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基础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方面。新的所有制经济成分和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相辅相成,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并且随着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和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加速,原先在体制外生成的经济成分“反客为主”,成为区域经济中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①在这个过程中,杭州市地方政府讲求实情,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促进了杭州市经济的大力发展。政府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经济加以引导和管理,扶持相关行业、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和有序竞争。经济发展充

^① 参见史晋川、罗卫东:《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浙江工业出版社,2000年。

分考虑杭州的比较优势,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再加上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不仅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使杭州居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并跃居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压缩和减少重工业生产、扩大工业消费品生产、调整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制度、大量安置城镇待业青年,从而创造出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杭州市首先抓住这一契机,对市场做出迅速反应,利用非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和自身历史悠久的城市型轻纺工业的优势,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轻纺工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生产资料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份额不断加大,商品价格不断放开。杭州市的大量小型、非国有工业企业利用省内、省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组织生产,开辟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市工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对粗放式增长的限制,杭州市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以及治理工业污染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后来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再次促进了杭州市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高潮。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不仅推动非国有工业崛起壮大,而且带动专业市场不断涌现和产业集群效应显现。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及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引导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杭州市产业优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进入21世纪,杭州市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幅显著。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7%,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工业上,产业层次得到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5%,杭州市着重构建以知识经济为方向、高新技术为先导、原有优势产业为支柱、新型都市工业为特色的现代工业格局,关闭、淘汰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的企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加大,经济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同时,深化改革,推进体制创新,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所有制结构,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鼓励发展开放型经济,吸引外资,参与国际国内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对内开放格局。创新节能减排有效机制,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排污权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管理制度,规范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出台《杭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杭州市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

2. 杭州市的传统文化禀赋与智力

浙江省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物质利益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和市场成熟的时候显现出来。杭州市身在其中,对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能更主动迅速地把握,带来了改革开放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内生的现代化、市场化方向制度创新下的改革与发展,使得杭州市较早地在改革开放中占据领先地位。杭州市民间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使得官员较其他地区更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就很快地确立起来。各级政府对民间的创新采取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即让市场充分自由发展。所以,一方面,得益于浙江省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制度创新提供“道德支持”,杭州自古以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另一方面,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制度创新,而在制度供给过程中,优秀的“执行能力”是创新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三、杭州市经济发展转变方式的实践

(一)20 世纪 80 年代

1. 经济增长速度

这个时期,杭州市的生产总值迅速增加,1984 年达到最高(22.7%),但增长率波动较大,1982 年仅为 7.2%,表现出稳定性不足的缺点。从全国的宏观背景来看,国家实行以压缩和减少重工业生产、扩大工业消费品生产、调整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制度、大量安置城镇待业青年等政策,提升了国民对于日用消费品的需求,这就给以轻纺工业为主要产业的杭州市带来了发展机遇。同一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为杭州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生产资料由市场调节的比例不断增加。由于杭州市积极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再加上本地特有的经商文化,使得改革的速度和跨度都优于其他城市。1985 年后,中央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迅猛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杭州市生产总值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基础差、技术低、产品档次不高,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环境变化,增幅出现回落。1988 年,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发生,中央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实行冻结物价、关闭市场、实行专营、加强集中等一连串行政性措施,造成 1989 年的市场疲软和经济增幅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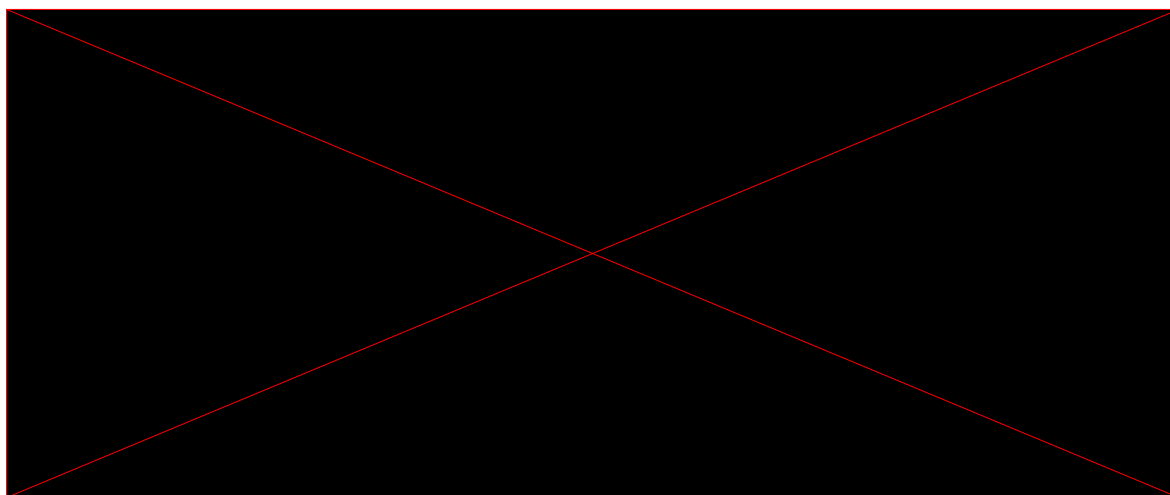


图 3 20 世纪 80 年代杭州市 GDP 总量及增长率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杭州市的三次产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都有较大发展,其中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17.57% 上升到 1989 年的 29.07%。第二产业的发展虽快,但增长速度不及第三产业,其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 1980 年的 62.37% 下降到 1989 年的 53.92%。同样下降的还有第一产业,其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20.05% 下降到 1989 年的 17.00%。杭州市快速发展的轻工业需要销售、采购、金融等流通环节的配套支持,这大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全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刺激了人们外出旅游的需求,杭州市旅游服务业及其相关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为提高第三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做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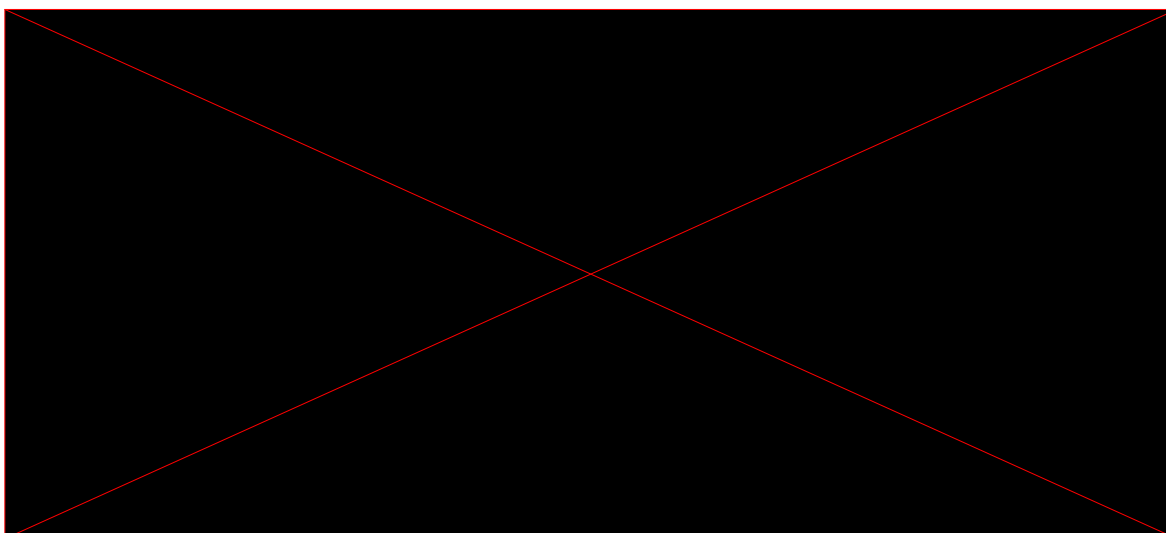


图4 20世纪80年代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其占GDP的比重

(二)20世纪90年代

1. 经济增长速度

这个时期,杭州市生产总值总量进一步增加,从1990年的189.62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225.28亿元,增加5.46倍。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平稳。1993年,杭州市生产总值增长30.1%。此后,生产总值增长率逐年下降。1999年,杭州市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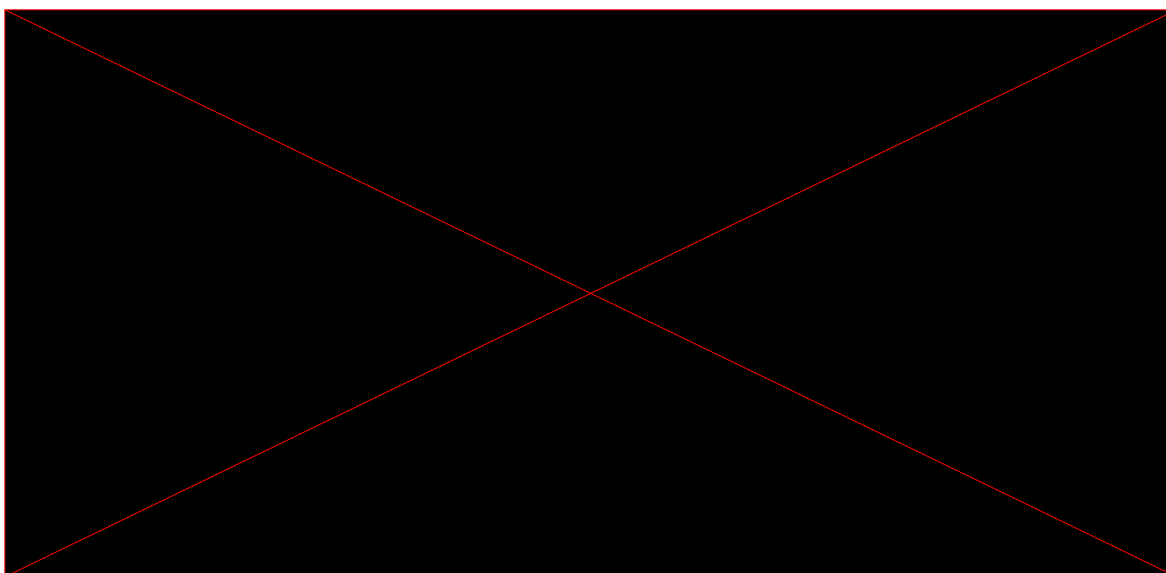


图5 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GDP总量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市粗放式增长方式的优势明显减弱,省、市政府和经济学界开始考虑走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以及污染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道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再次促进了杭州市工业化发展的高潮,进一步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崛起壮大。这个时期,专业市场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推动了杭州市工业化的实质性进展。1993年下半年,国家宏观调控再次减缓了杭州市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比较明显,从1990年的16.32%下降到1999年的7.96%。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则较为平稳,1990年为50.72%,1995年为53.81%,1999年为51.48%。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32.97%上升到1999年的40.56%。产业结构的优化得益于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杭州市工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再加上以往创造的产业基础和市场,以及对外开放发展所带来的出口机会,使得90年代杭州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政府引导及产业自身进化的作用下,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效应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增加,原有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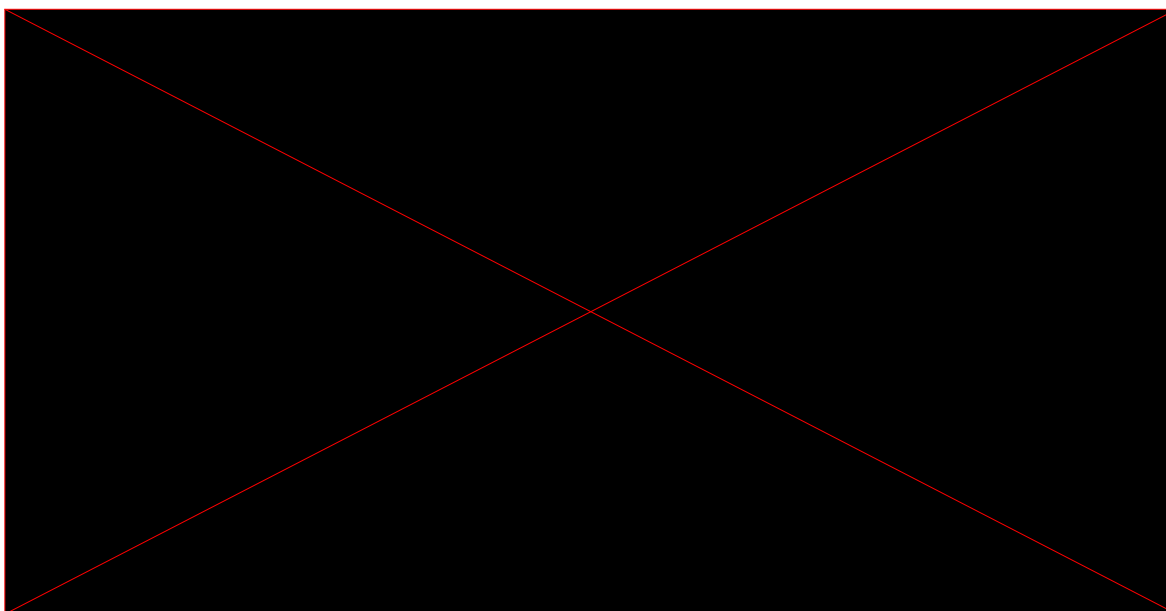


图6 20世纪90年代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其占GDP的比重

3. 出口贸易

杭州市的出口商品供货额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巨大发展,从1990年的6.9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40.16亿美元,增加4.82倍。自营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商品供货额都保持增长态势,且增长率逐步趋于稳定。杭州市出口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杭州市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得益于三资企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以及出口商品品种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等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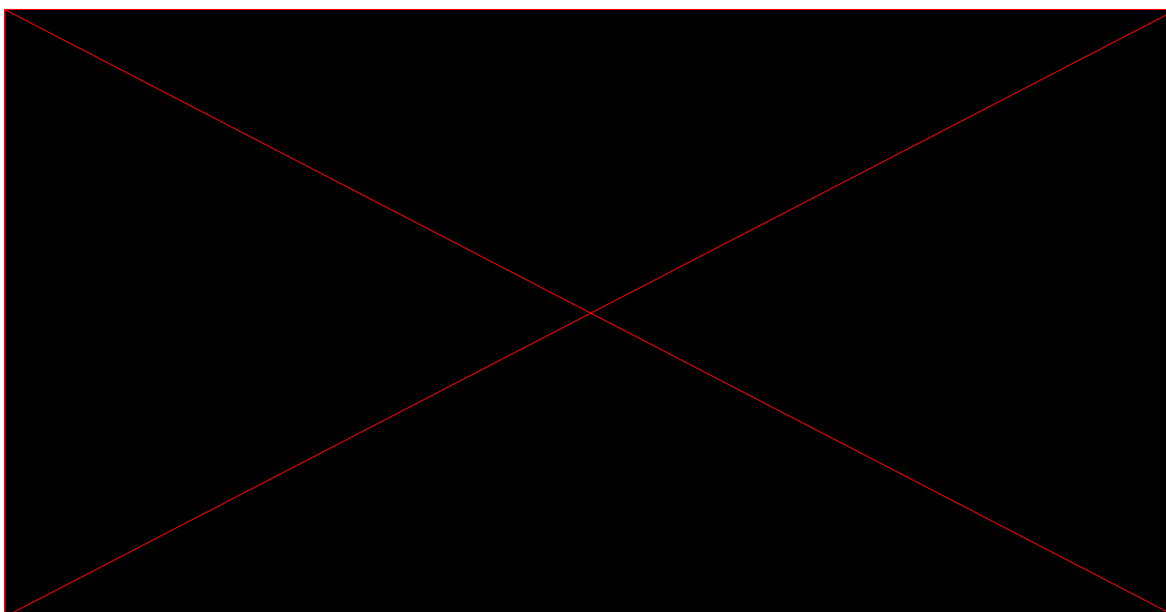


图7 1989年—1998年杭州市出口贸易额及其增长率

(三)21世纪

1. 经济增长速度

这一时期,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继续向好,外资制造业加速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杭州市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民营经济更为活跃,全市生产总值增速保持高位运行,年增长率维持在12%以上。2000年,杭州市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2.0%,2003年为15.2%,2007年为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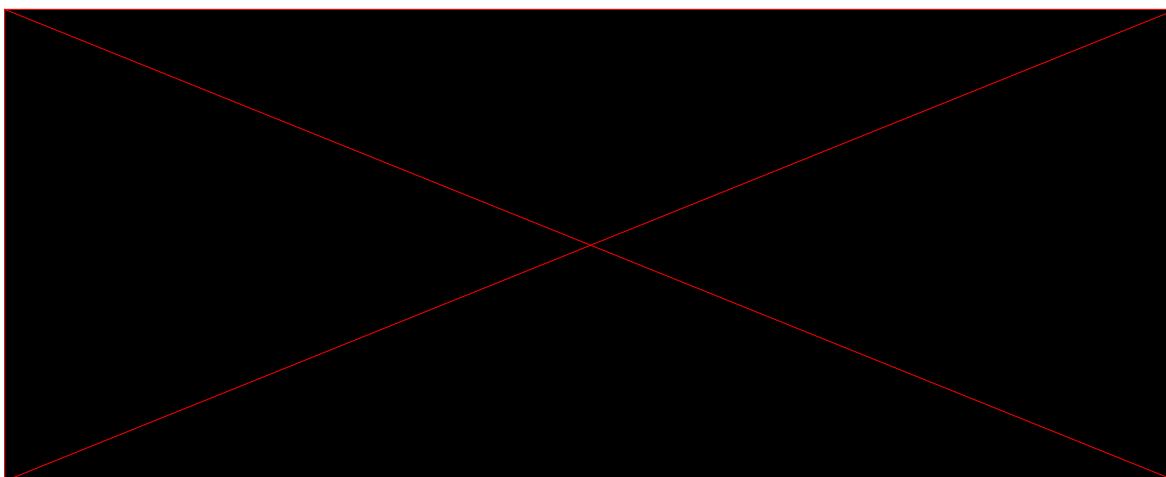


图8 2000年—2007年杭州市GDP总量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0年以后,杭州市三次产业的发展呈现较为稳定的态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生产总值

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减少,分别从2000年的7.52%和51.31%下降到2007年的3.98%和49.85%。第三产业的比重继续增加,从2000年的41.18%上升到2007年的46.17%。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以后,第三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继续增加,尤其是金融业和旅游业发展提升较快。在国际贸易上,杭州市提前进行规划,将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三个产业的总量都保持持续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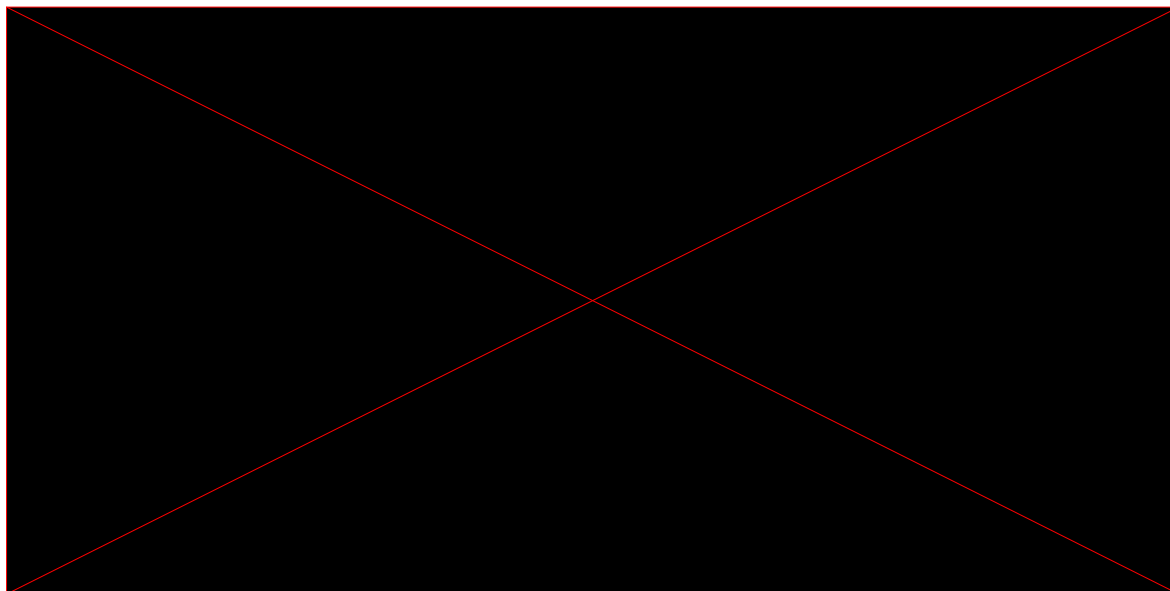


图9 2000年—2007年杭州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其占GDP的比重

3. 出口贸易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出口贸易发展平稳。2002年后,出口贸易发展有所加速,年增长率16.4%,均超过全市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3.2%)。杭州市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存度相对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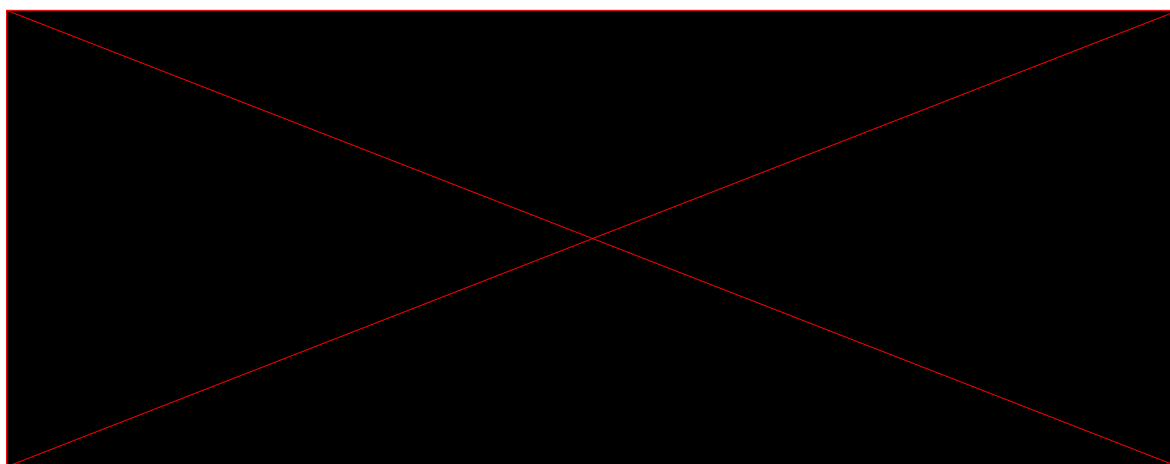


图10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出口贸易额

2004年,国家出口退税政策重大调整后,企业出口受到很大影响。2007年,主要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杭州市出口贸易增长率出现下滑。杭州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出口贸易的不利因素,提供优质服务,举办各种贸易促进会,继续推进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合作,加大招商力度,突出招商环境建设,创新招商引资的方法和手段,使出口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之势。

(四)中共十七大以后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以后,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沿着良性方向转变。市政府制定相应具体措施,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并做出政策保证。事实上,在中共十七大以前,杭州市就已经意识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从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的增加,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的发展提升,以及高科技企业产值的增加和产业园区等基地的建设等方面都能体现出来。中共十七大以后,虽然新制定的相关措施实施时间还很短,但从已有指标能看到政策的部分效果。2008年前两个月,全市限额以上服务业(不含金融业,下同)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145.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8%;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实现工业销售产值1280.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2%;全市工业总产值累计实现1294.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说明杭州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正在显现。服务业增长率持续增加而工业增长率相对下降使得杭州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四、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的比较分析

(一)国内比较(与南京市、上海市的比较)

1. 三个城市的相似处

南京市与杭州市都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遗产众多,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上海市则是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改革开放前,三个城市有着非常相近的政治、经济、地理状况。三个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同样有着许多相似的环境和条件。

一是区位。南京市、上海市和杭州市地处沿海开放地带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三者都是中国国土规划中沪宁杭经济核心区的重要城市,在各自所在地区处于枢纽位置和中心区域。南京市和杭州市都是省会城市,上海市是直辖市,三者都具有加速经济国际化的有利条件。

二是交通通信。无论是南京市、杭州市还是上海市,都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和通信枢纽,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五种运输方式齐备,构成立体化、大运量的交通运输网络,程控电话、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微波、卫星、光纤等组成现代化通信网络。

三是教育科技。南京市是江苏省重要的教育中心,杭州市是浙江省重要的教育中心,包括上海市在内的三个城市有着雄厚的教育基础和资源。

四是产业。三个城市在经济发展中都形成各自特有的产业优势。南京市是东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已经形成以电子、汽车、化工和一批地方特色产品为主导的综合性工业体系。杭州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纺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方面已经形成特有的产业优势。上海市在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产业上优势明显。

2.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对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上海、杭州三市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主要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深入分析,来发现三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以及各自的特色和不足。

(1)从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三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都较快,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改革开放初期,杭州市的生产总值低于南京市,1978年为南京市的82.5%。1981年,杭州市的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南京市,并且一直维持。至2007年,杭州市的生产总值是南京市的1.25倍。上海市则在生产总值基数上一直大于杭州市和南京市,但在发展速度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有时候反而要低于杭州市和南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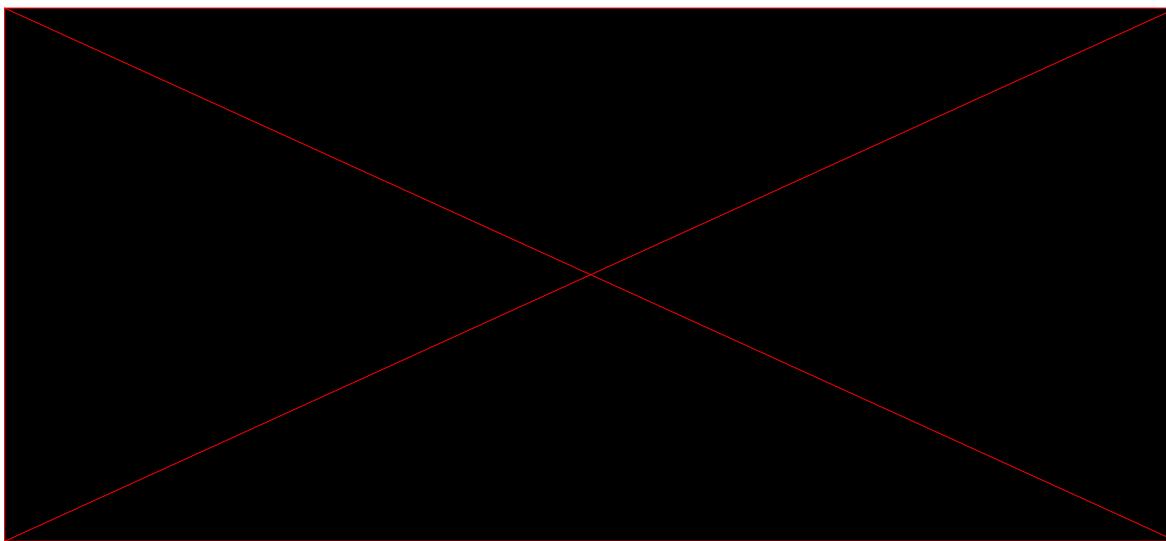


图 11 1978 年—2007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 GDP 及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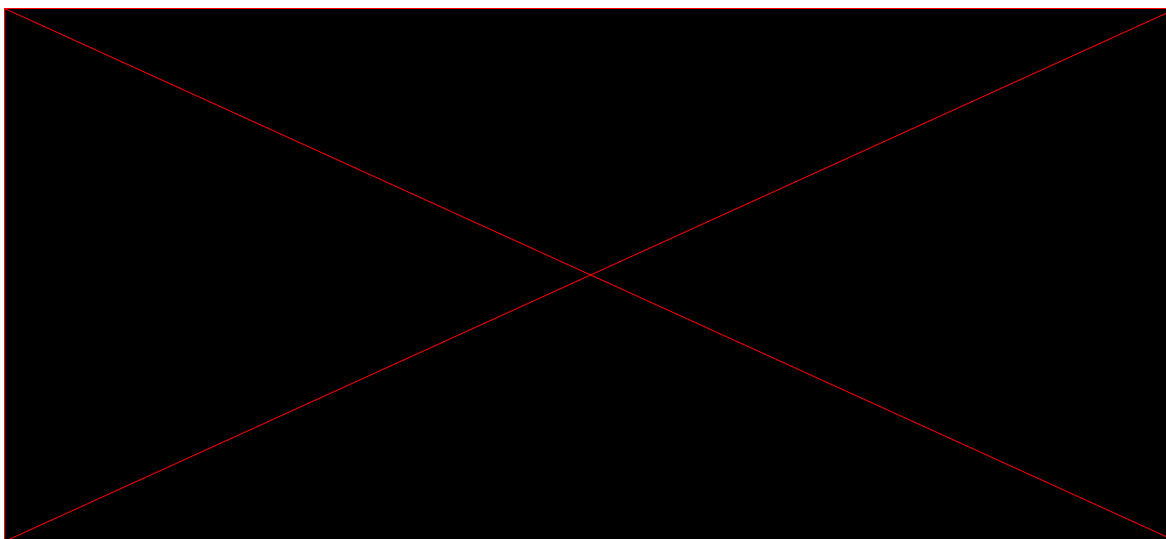


图 12 1978 年—2007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财政收入及其增长率

(2)从财政收入增长上看,改革开放以后,南京市的财政收入基本呈螺旋状上升趋势,波动比较大,直到1992年以后才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上海市的波动也相对较大,1990年之前经常处于增减交替状况,1990年之后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相比而言,杭州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较为稳定,除1990年稍有回落外,其余年份都呈上升趋势。从绝对量看,长期以来南京市的财政收入一直大于杭州市,但差距不是特别明显,大部分年份高出30%以内。最近两年,杭州市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南京市,说明近些年来杭州市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大于南京市。

(3)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三个城市基本保持着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南京市除4个年份的投资有所下降外,其他都处于增长状况。上海市则有3个年份呈下降趋势。相比而言,杭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较为稳定,只有1989年有所回落,其他年份都较上一年有所增长,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的几年内增长特别快,之后增长又相对趋于稳定。上海市在2000年左右增长非常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南京市在2000年之后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最低在10%左右,最高却达58%。与此同时,杭州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非常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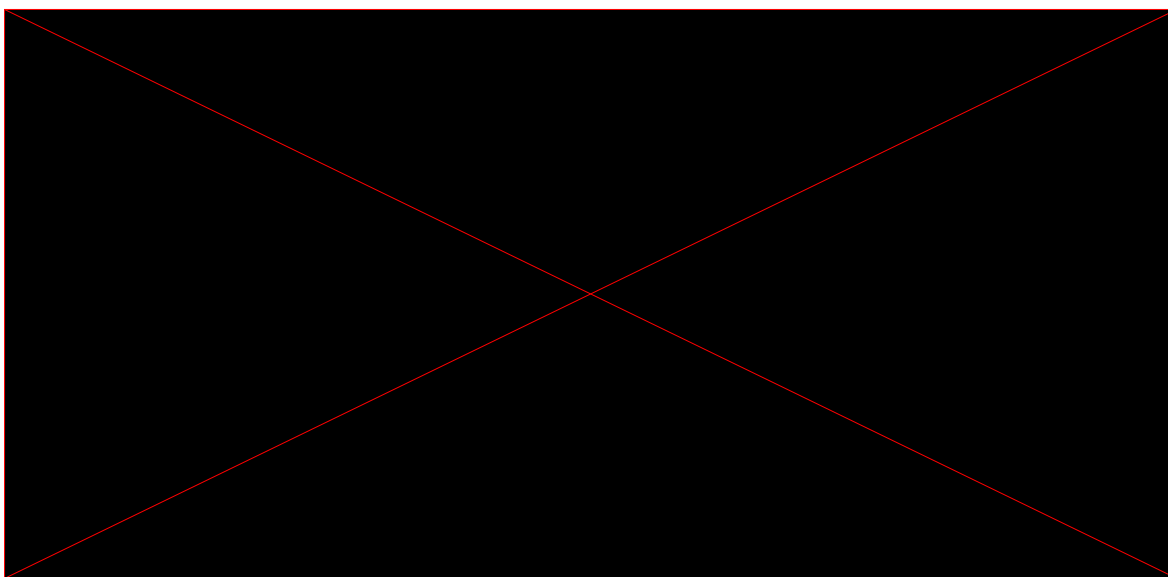


图 13 1978 年—2007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率

(4)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看,自改革开放以后三个城市都有较大增长,且1990年和2000年左右都有一波快速增长。南京市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与杭州市比较接近,2003年以前南京市略低于杭州市,而2003年之后南京市略微反超杭州市,两者几乎呈交替上升态势。上海市的消费品零售额一直领先于杭州市和南京市,但其增长率却稍低于杭州市和南京市,最近几年增长率在10%左右,杭州市在14%上下。南京市相对最高,平均为15%以上。

(5)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1990年之前三个城市增长都较慢。1990年至2000年,增长速度迅速提高,南京市和上海市增幅达到4倍以上,杭州市相对较低,为3.9倍。2000年至2007年,增长速度趋缓,南京市增长最快,为1.5倍左右;杭州市为1.2倍左右;上海市最低,为1倍左右。在量上,则南京市相对较低,杭州市处于中间,上海市最高。2007年南京市、杭州市、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0317元、21689元、23623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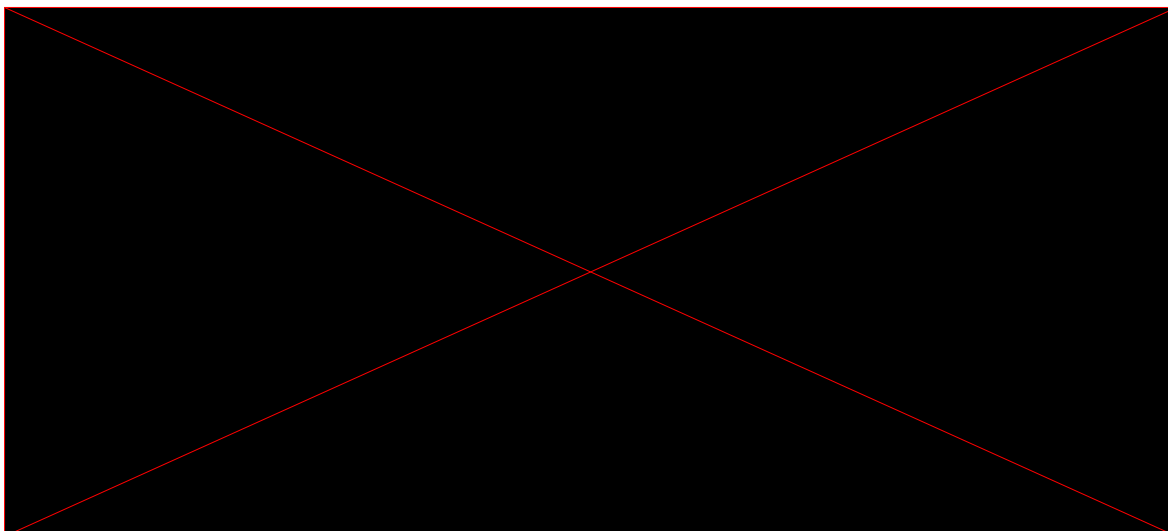


图 14 1978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的比较分析

(1) 产业结构发展比较。从南京市、上海市与杭州市的三次产业构成情况分析,2007 年,杭州市的三次产业比为 4.1:50.2:45.7,南京市为 2.6:49:48.4,上海市为 0.8:47.3:51.9。相比之下,杭州市的第一、二产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则偏低。相对来说,杭州市与南京市的产业结构较为相似,而与上海市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从历史数据看,三个城市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比重则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杭州市一直高于南京市和上海市,但是从下降的趋势看,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第二产业比重三个城市逐年接近,2007 年,杭州市的第二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 50.2%,南京市的第二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 49%,上海市的第二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 47.3%;第三产业各城市发展都较快,但由于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优势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较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快于其他两个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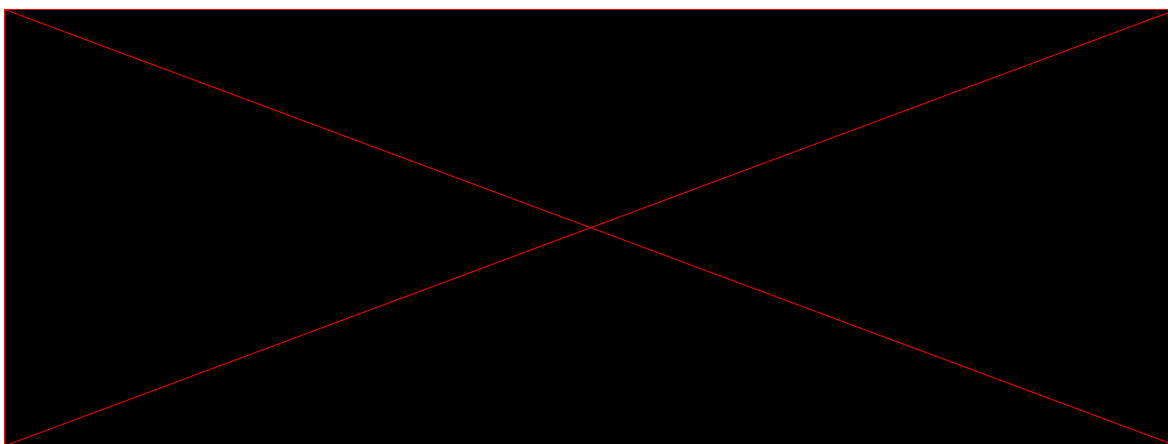


图 15 2007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产业结构

总体来看,由于杭州市的地理环境优势,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产业比重一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2007年,杭州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6%,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和都市农业示范园区(基地)建设有序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标准建设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南京市2007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4.64亿元,比上年增长4.7%;上海市则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5.1亿元,比上年增长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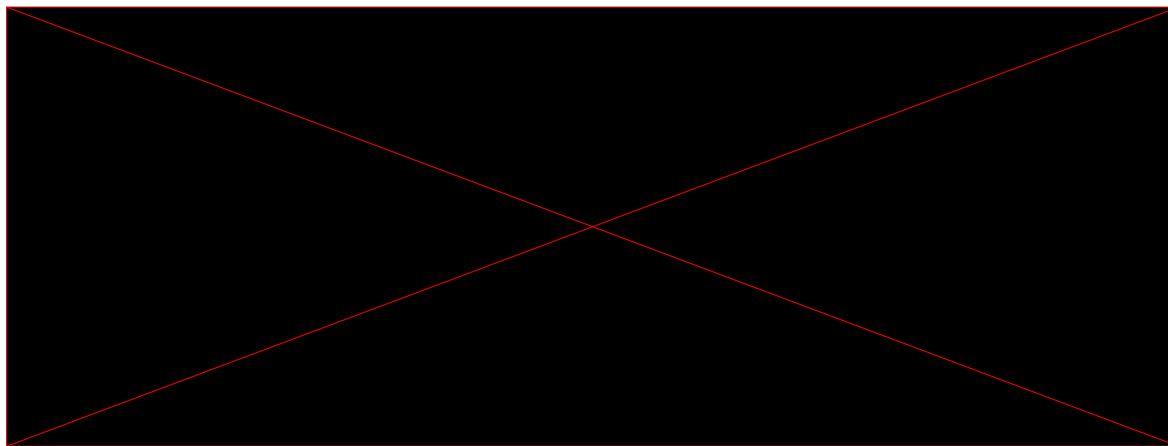


图 16 1985 年—2007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工业方面,在绝对值上杭州市明显高于其余两个城市,但从增速上看,近几年杭州市和上海市呈下降趋势,而南京市则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南京市四大支柱产业的稳健发展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基本保持稳定。2007年,杭州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8204.8亿元,增长19.4%。这一增速略低于南京市的22.3%,但高于上海市的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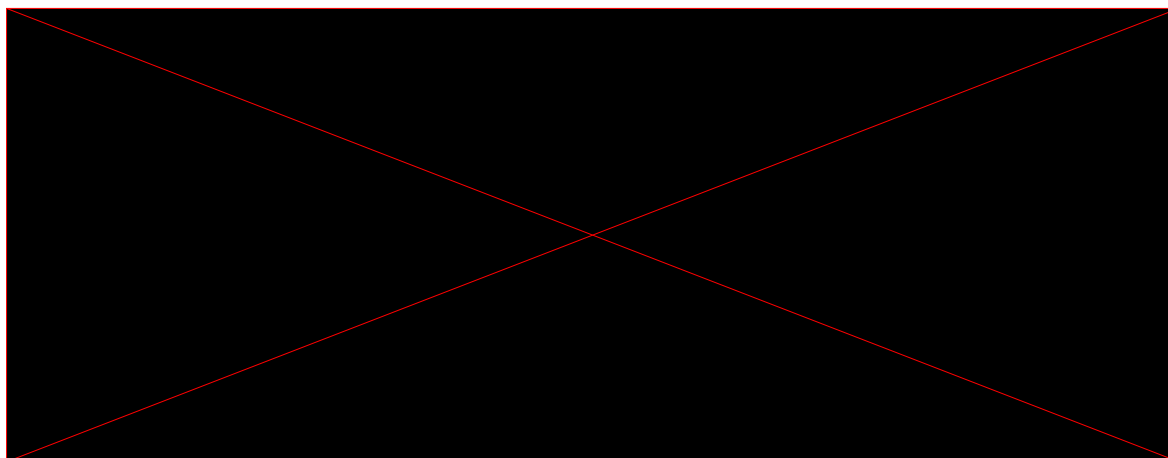


图 17 1985 年—2007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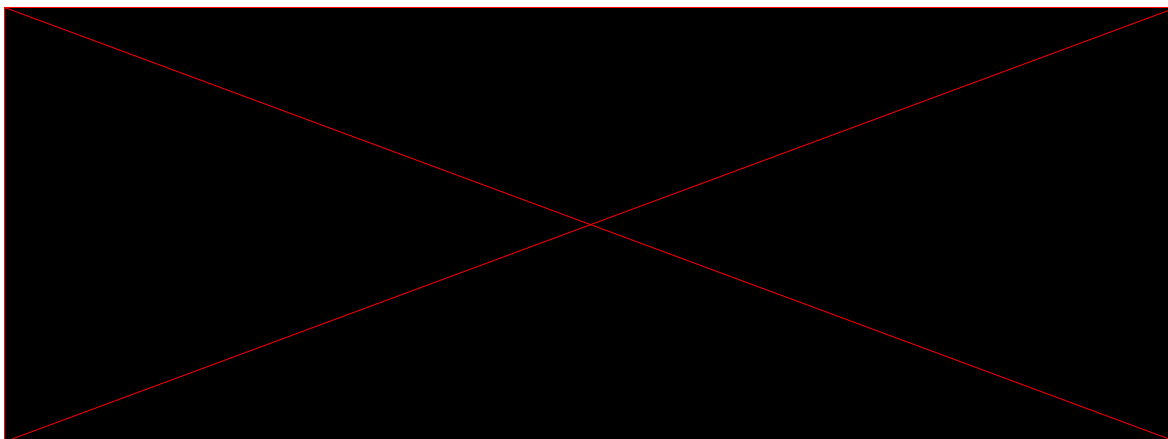


图 18 2003 年—2007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工业总产值及其增长率

截至 2007 年,各城市第三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接近一半,上海市则超过 50%。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6.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 0.6 个百分点。杭州市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使“旅游西进”和旅游国际化战略不断向前推进,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630.06 亿元,增长 15.8%,占第三产业总值的 33.6%。上海市全年实现旅游产业增加值 858.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1%,占第三产业总值的 13.8%。这一比例明显低于杭州市,说明杭州市的旅游业在第三产业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上海市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195.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4%,占其第三产业的 19.2%;南京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3%,占其第三产业总值的 11.4%。相比之下,杭州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31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占其第三产业总值的 16.5%,处于三座城市的中间水平。2005 年至 2007 年,各城市的金融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总值的比重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2005 年、2006 年,杭州市与上海市金融业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基本持平。到 2007 年,杭州市金融业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上海市,南京市总体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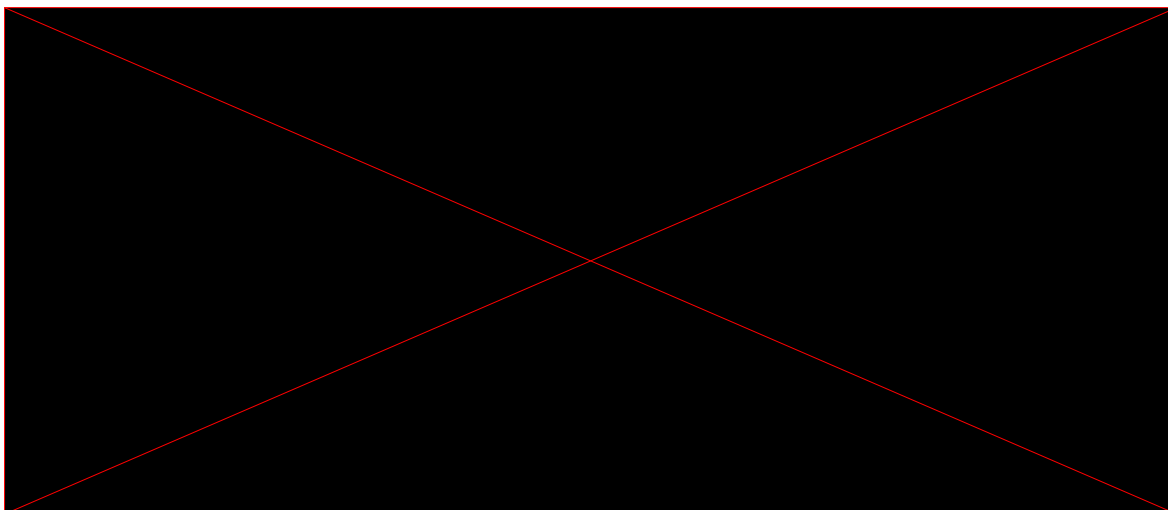


图 19 1985 年—2007 年南京、上海、杭州三市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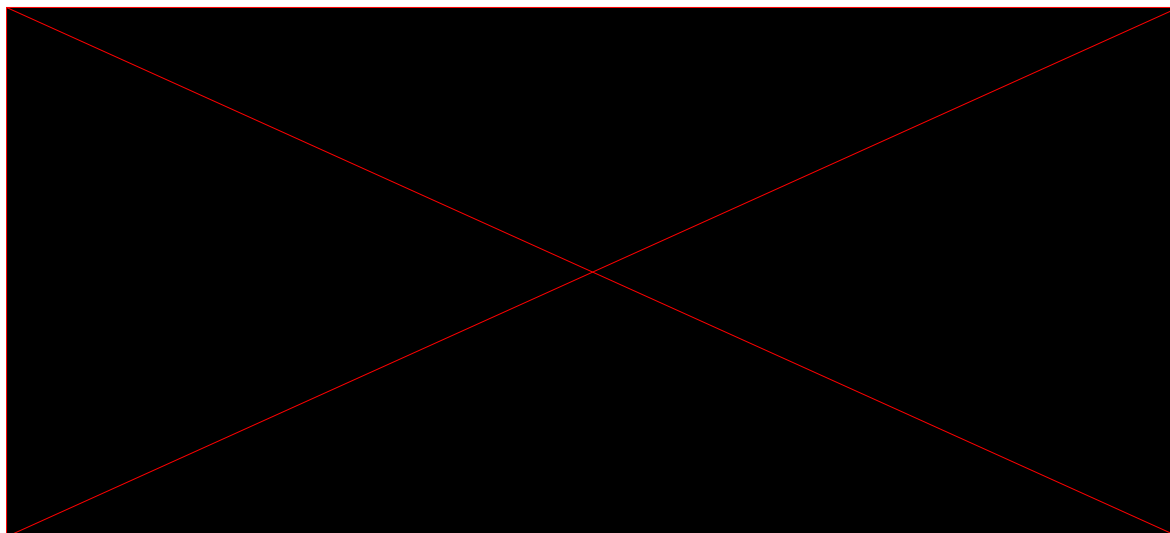


图 20 2005 年—2007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金融业增加值及占第三产业比重

(2)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较。2006 年,杭州市单位生产总值电耗 1088 千瓦时/万元,下降 0.17%。其中,第一产业消费电力 4.01 亿千瓦时,增幅同比回落 2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消费电力 273.26 亿千瓦时,增幅同比回落 5 个百分点,其中全部工业消费电力 268.76 亿千瓦时,增幅同比回落 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消费电力 47.92 亿千瓦时,增幅同比回落 11 个百分点。与上海市相比,杭州市单位生产总值电耗要多出 123.7 千瓦时/万元,同比多耗电 12.8%。同年,杭州市关停污染企业 103 家,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较上年下降 2.1%、6.2%,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水综合排放达标率分别达到 94% 和 92%。2007 年,杭州市单位生产总值电耗 1071 千瓦时/万元,同比下降 1.6%,单位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5.5% 以上,但与上海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较上年下降 5%、4.6%。

2007 年,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较同口径工业总产值增幅低 17.3 个百分点;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为 0.50 吨标准煤,比上年减少 0.08 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14.1%,降幅大于杭州市万元工业(规模以上)增加值能耗下降幅度(同比下降 5.5%)。节能减排工作仍然是杭州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中之重。

(3)轻重工业发展情况比较。轻重工业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合理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三个城市都呈现出轻工业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特点。但比较而言,杭州市在发展轻工业过程中保持着大体平衡,2003 年以前基本偏向以轻工业为主,2003 年以后重工业比重基本超过轻工业,稳定在 50% 以上。南京市的重工业比重是三个城市中最高的,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 60% 以上,到 2006 年达到 85%,说明南京市的工业发展一直以重工业为龙头,具有典型的重工业化特征。2007 年,南京市以石油化工、电子信息、汽车、钢铁为主的四大支柱产业在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中占到 68.8%。而杭州市主要以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加工业等为主。南京市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行业间的差距较大,相对重化工业而言,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十分薄弱。杭州市在各产业发展中相对平均,虽然从产业高度上讲不如南京市,但其发

展保持着大体平衡,与世界产业发展的标准态势相比差距不大。而南京市则表现出较大差别,其重工业比重过高,而轻工业比重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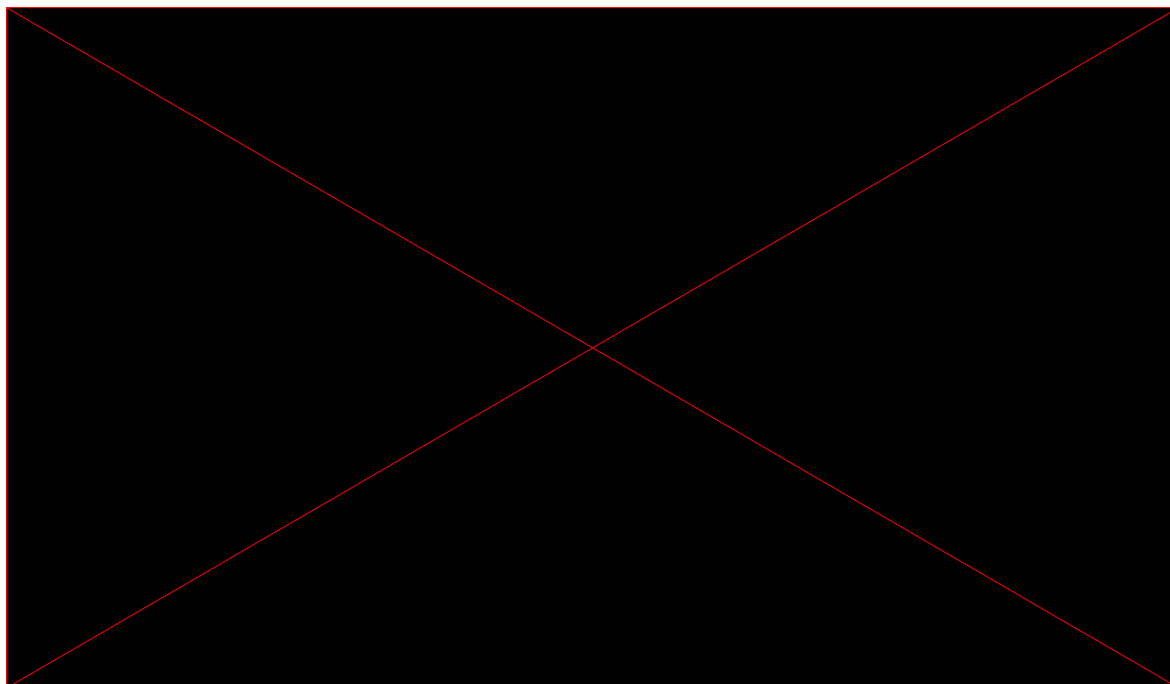


图 21 1996 年—2006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轻工业产值及其增长率

对上海市而言,其轻重工业比重相对适中。2007 年,上海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制造业六个重点工业行业的总产值为 14377.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占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5.5%,说明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在工业比重中占据重要优势。另外,上海市的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2007 年,上海市高技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5606.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7%,占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25.6%。

从轻工业发展状况看,在绝对量上,杭州市介于上海市和南京市之间,相对来说南京市比重明显偏低;在增长率上,杭州市 1996 年处于相对低速发展时期,2000 年之后其发展速度一直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而南京市在 2003 年至 2004 年有一个明显的下滑趋势,之后其发展速度基本稳定,介于杭州市与上海市之间。

从重工业发展状况看,在绝对量上,杭州市与南京市非常接近,但都明显低于上海市;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定的同步性(增长率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且交替上升。

(4) 所有制结构发展状况比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工业生产总值中越来越小,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逐年提高。尤其是在非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之后,非国有经济日益发展。2000 年以后,非国有经济在杭州市、南京市和上海市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快速增加。在 2003 年以前,南京市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上要稍慢于杭州市,南京市非国有经济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小

于杭州市。但 2003 年以后,南京市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其比重迅速提高,到 2006 年基本与杭州市持平。而上海市非国有经济中其他经济(主要包括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明显要快于其他城市,说明 2000 年以后上海市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得到巨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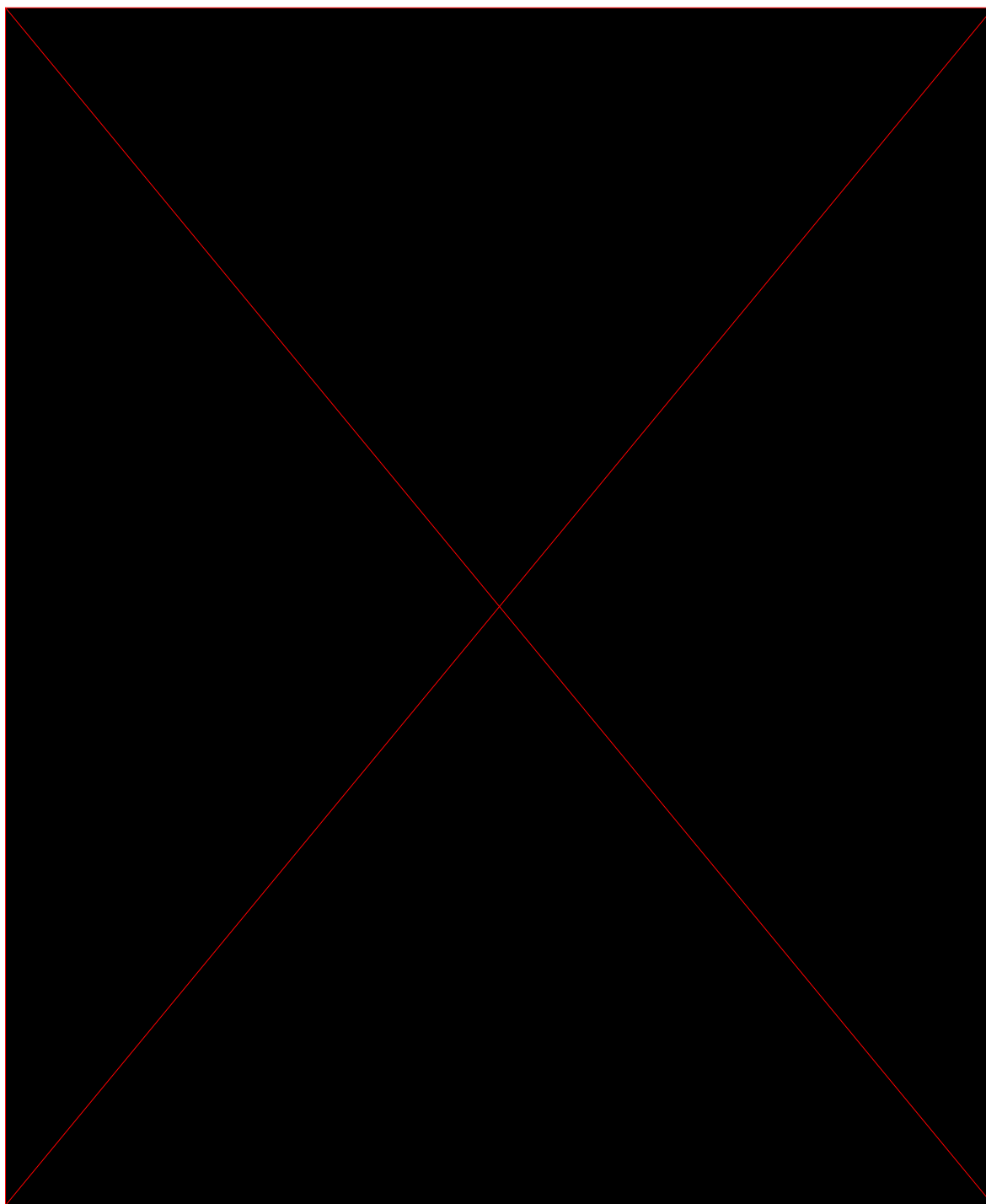


图 22 1995 年—2006 年杭州、南京、上海三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南京市一直作为国家主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在国家的投资下兴建了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通过改革,国有企业数量明显下降。相比而言,在数量上,南京市的国有企业数没有杭州市和上海市多,但是其产值(去掉规模因素)在南京市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 2000 年以前明显高于杭州市和上海市,2000 年以后则趋于接近且总体呈快速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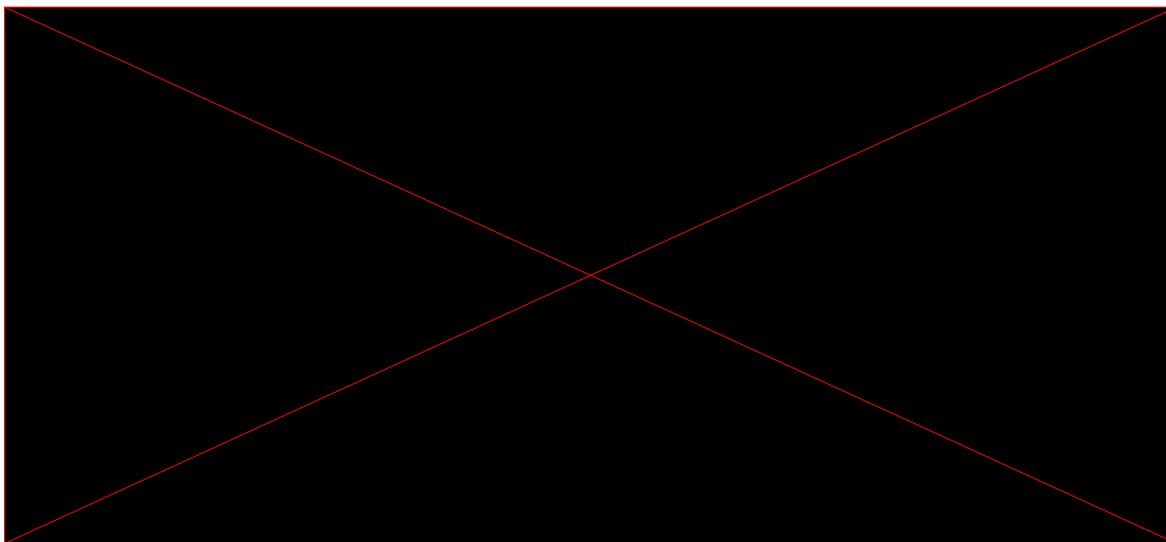


图 23 1995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国有企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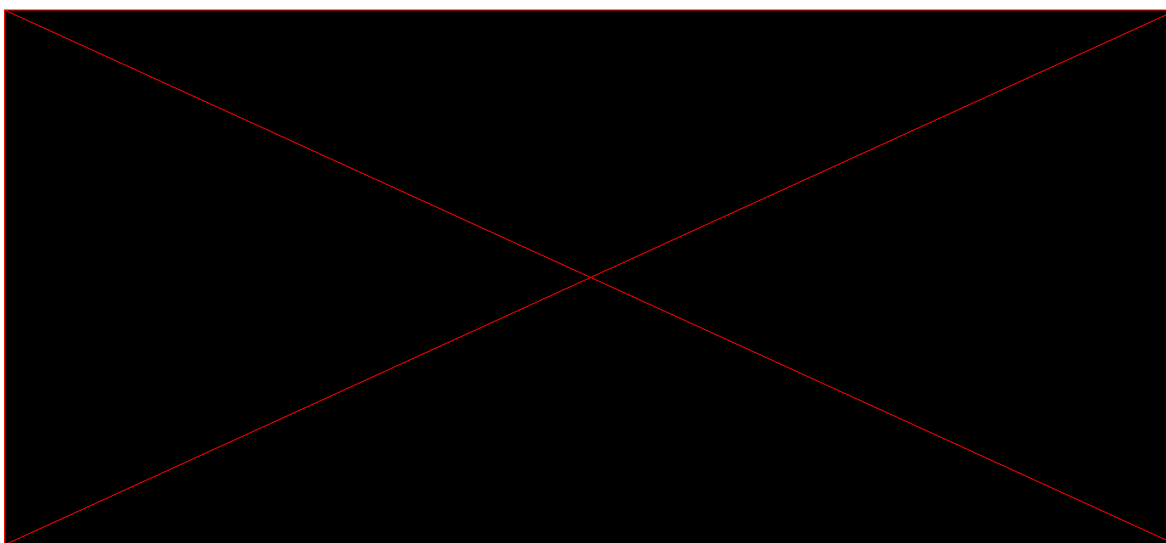


图 24 1995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集体企业数

非国有经济中,除集体经济之外的部分发展势头迅猛。在总量上,杭州市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主要归功于股份制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 年,杭州市的股份制企业有 974 家,占企业总数的

35.9% ;到2006年,股份制企业上升到5122家,占企业总数的65.4%。

三资经济相对来说发展较慢。2000年,杭州市三资企业有514家,占企业总数的18.9% ;到2006年,三资企业上升到1385家,但占比却小幅下降,为17.7%。就三资经济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杭州市明显落后于上海市和南京市。上海市的三资经济一直占有较高比重,2000年以来基本在50%以上,而南京市、杭州市到2006年基本在40%以下。

在私营企业方面,杭州市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6年,杭州市规模以上私营企业有4893家,占企业总数的62.5% ;而南京市只有773家,占比为40.9% ;上海市有5579家,占比只有38.7%。从私营企业产值上来看,杭州市的私营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城市,特别是2003年以后这一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杭州市达到30%左右,而南京市、上海市则只有10%左右。

总体来看,杭州市在所有制结构发展过程中,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发展迅猛,并带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显示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潜力,发展速度要快于南京市,这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很大关系。通过比较发现,南京市在所有制改革和发展进程上要慢于杭州市,而上海市则体现出国际化都市的特色,三资经济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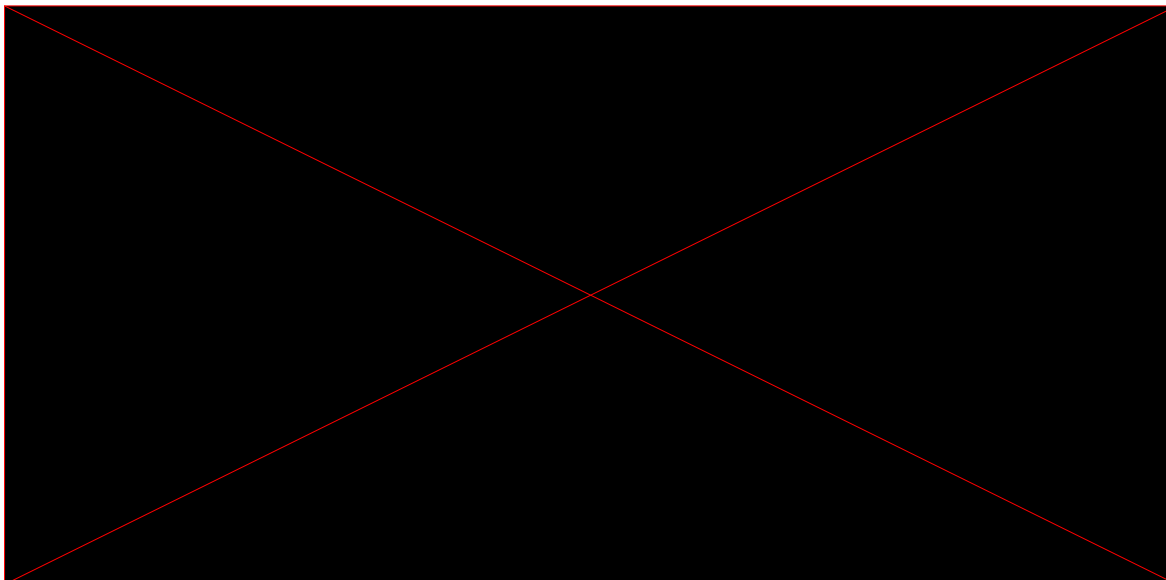


图 25 1995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其他经济企业数

4. 市场集聚与扩散功能的比较

(1) 对外开放度。一般用贸易依存度变量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即用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长期以来,南京市的进出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高于杭州市。2000年以后,上海市对外开放度明显扩大,高出南京市和杭州市将近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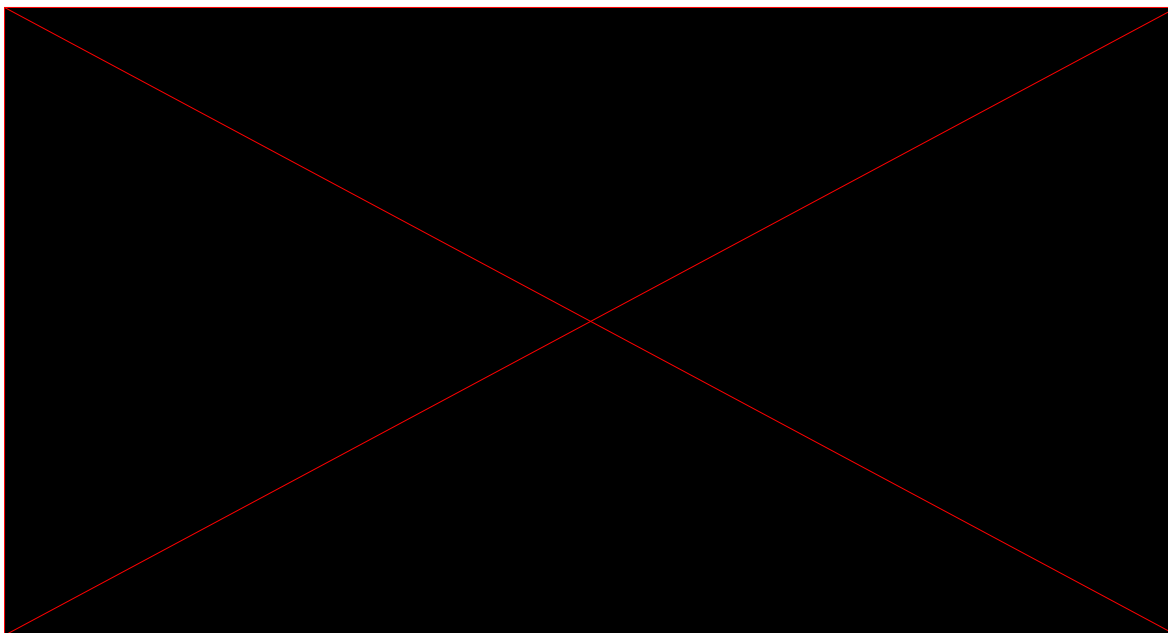


图 26 1990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进出口总额及占 GDP 比重

(2) 外资流入率。即外资流入量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外资分为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等。1990 年,三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处于相当低的程度。1992 年开始,三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都有飞速发展。1991 年至 1992 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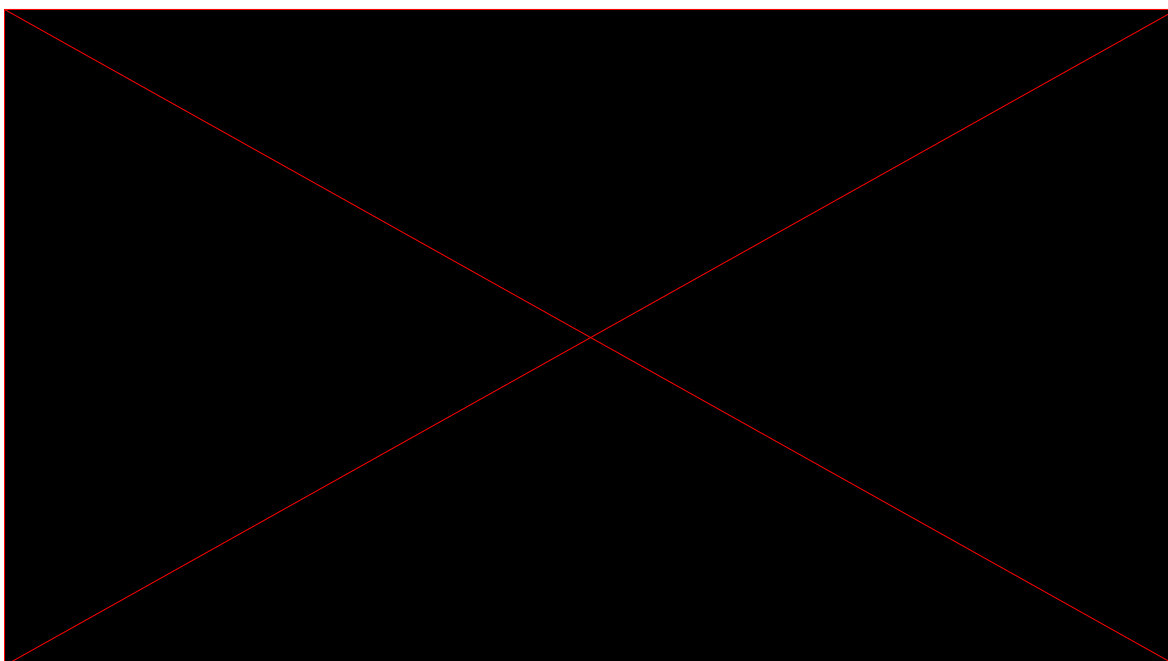


图 27 1990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占 GDP 比重

资额增长 7 倍多。之后一段时间,上海市占有明显优势。南京市则是后来居上。2000 年,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上海市,2003 年达到最高点。上海市在 2000 年降到最低点后,一直处于平稳发展阶段,降低的原因是在实际使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而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的投资比重有所上升。相比两个城市,杭州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 21 世纪后,发展速度才有所加快。总体来看,上海市、南京市的外商投资环境要好于杭州市,在吸引外资上有更强的集聚力。

(3)三资企业指标。这是衡量城市开放型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支撑度的指标。三资企业是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三资企业的数量多少能反映外资资金在城市的集中度,三资企业的经济规模则体现外资的未来发展潜力和投资信心。从企业的绝对数量上,杭州市的三资企业数要多于南京市,且近两年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南京市,2006 年已经超过南京市的一倍。在总产值上,南京市却要高于杭州市,说明南京市的三资企业规模要大于杭州市。而上海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产值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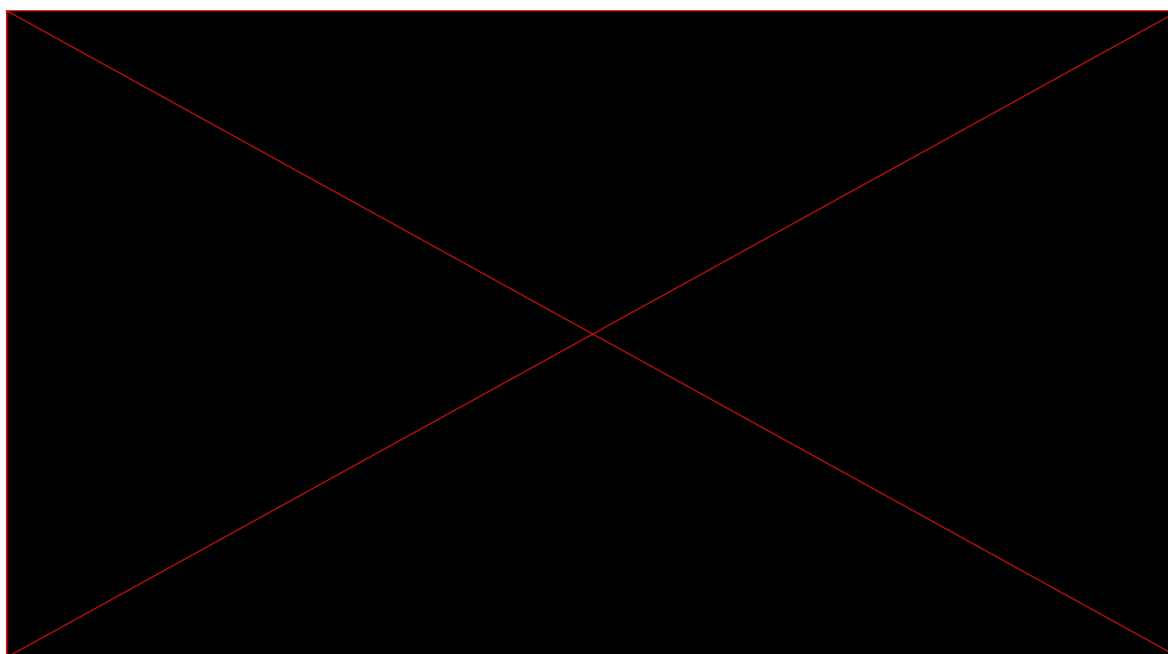


图 28 2000 年—2006 年南京、杭州、上海三市三资企业数及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4)境外旅游指标。这是反映城市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和区位环境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支持度的指标,它体现一个城市的人流、物流情况。在境外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指标上,杭州市的历年数据都高于南京市,这说明杭州市在旅游资源的整合和利用上要优于南京市,境外旅游对城市开放型经济的贡献要大于南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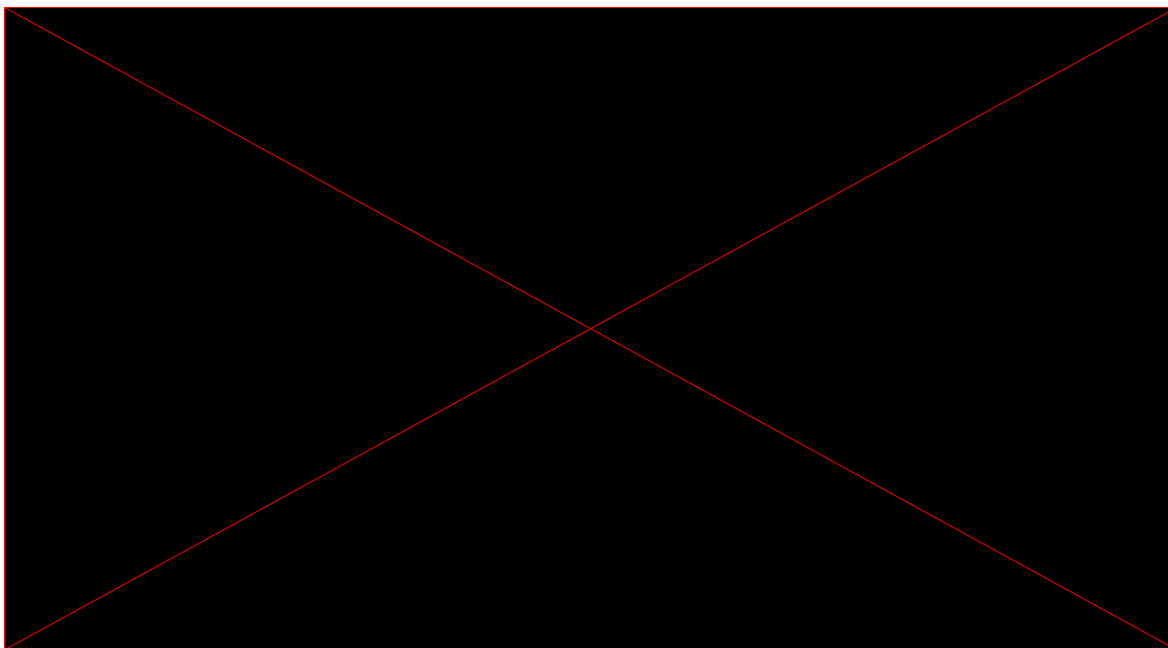


图 29 1995 年—2006 年南京、杭州境外旅游指标比较

总体来看,进入 21 世纪后,杭州市受上海市的经济辐射影响,抓住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转移机遇,大力营造外商投资环境,使杭州市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由于杭州市利用丰富的旅游、历史、文化资源,再加上科学合理的开发,其在境外旅游方面的分值较高。南京市在进出口及三资企业指标方面不具优势,而利用外资指标分值较高,这说明南京市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足,在出口上缺少龙头产品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同时说明南京市三资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度不高,外资的利用效率不高。

(二) 国际(地区)比较(与香港、新加坡比较)

杭州与香港、新加坡两个城市比较的重点是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香港和新加坡都曾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虽然杭州与香港、新加坡相距甚远,但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以现代化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发展,其中不乏相似之处。

1.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7 年杭州市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与香港和新加坡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相同。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相对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杭州市与其他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逐步缩小。杭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除在 1978 年至 1983 年间低于香港外,以后年份的均高于香港和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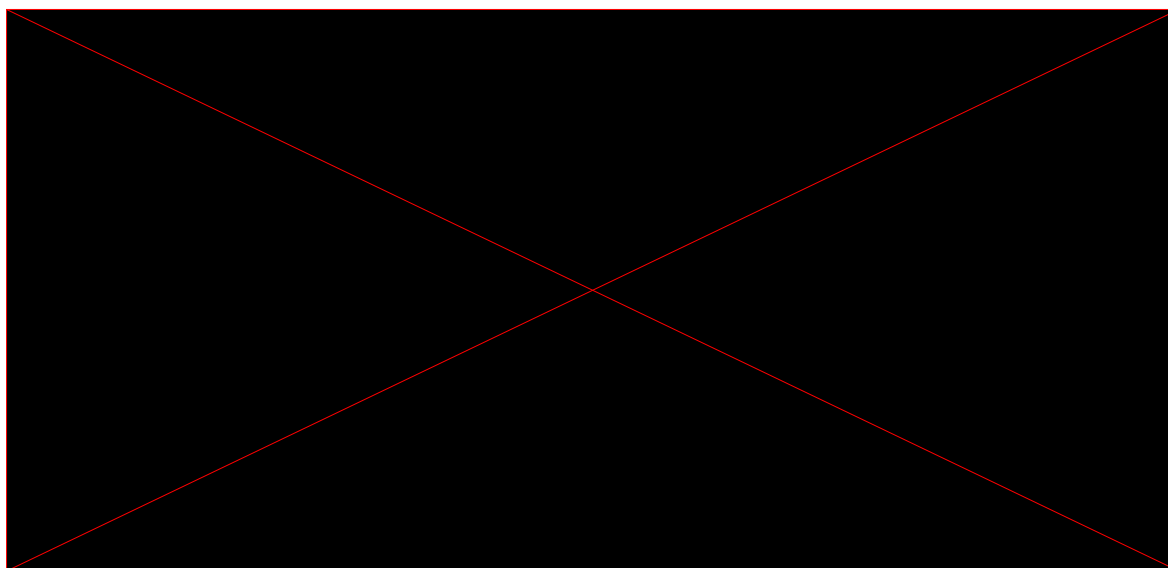


图 30 1978 年—2006 年杭州、香港、新加坡人均 GDP 及其增长率

2.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的比较分析

农业在杭州、香港、新加坡的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都很低,因此只比较第二、三产业。

在三个城市中,杭州市的工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居于首位;香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新加坡的工业产值比重总体上显著低于杭州市。新加坡的工业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科学与保健、信息通信技术、化工、精密工程业等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相比较而言,杭州市工业结构相对落后。进入 21 世纪后,杭州市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指导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地将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更新换代成电子、医药、动漫等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发展方向上与新加坡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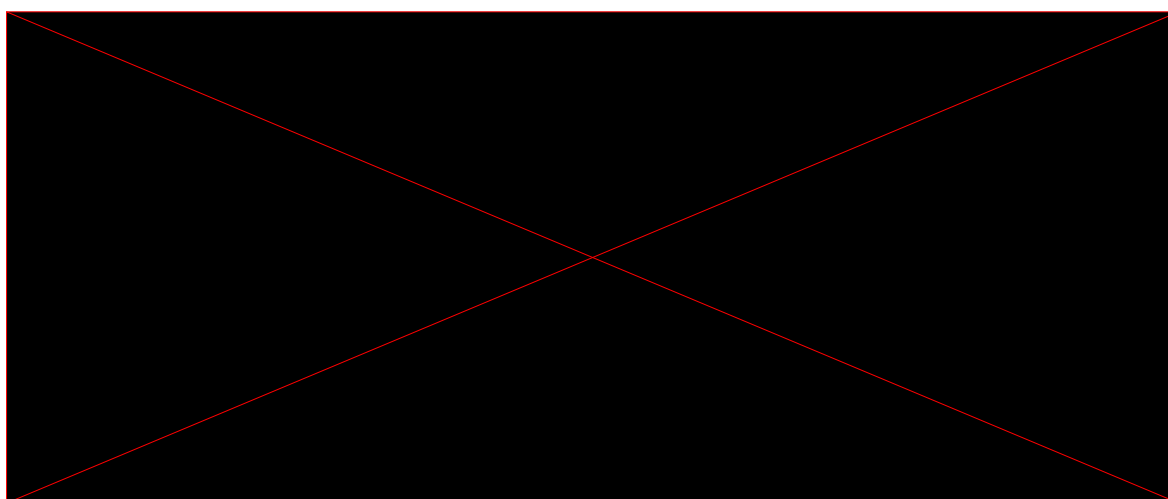


图 31 1980 年—2005 年杭州、香港、新加坡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三个城市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有明显差别,但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香港所占比重最高,较早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新加坡的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大。1978年至2007年,杭州市服务业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低,总体上落后于香港、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根据自身优势,着力培育了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一经验值得杭州市学习。杭州市应充分利用规模优势、集群效应、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已有的产业基础,重点培育旅游业等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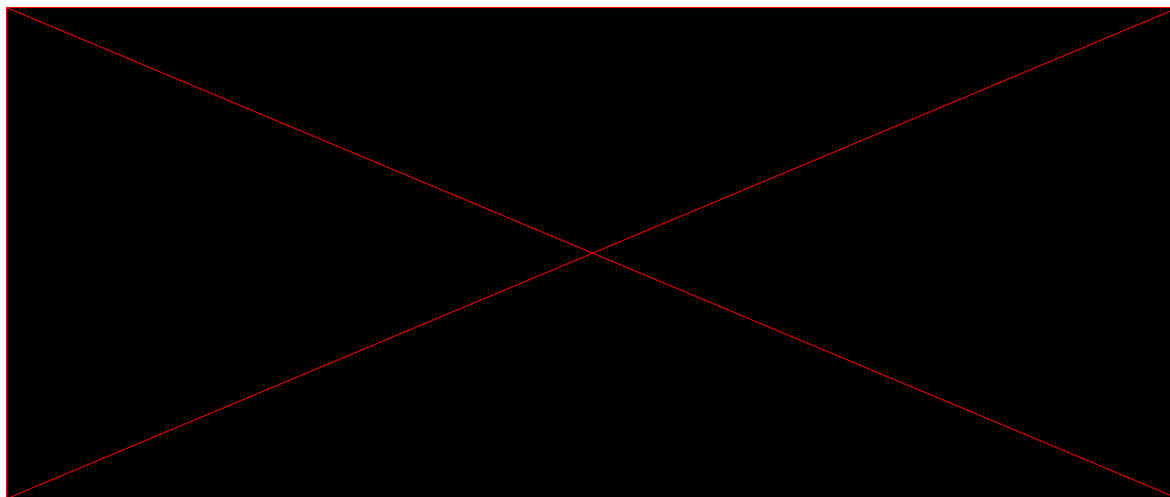


图 32 1980 年—2005 年杭州、香港、新加坡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五、杭州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

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不断发展变化,今后仍将随着社会的进步继续向高级阶段演进。结合现有的经济背景,本文对下一阶段杭州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方向和途径提出相应对策。

(一) 立体规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下,杭州市不仅要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并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说,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1. 从产业角度规划,优化产业结构

(1) 工业要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深加工传统产业,加快工业功能区和产业集群建设。

其一,引进、消化、创新及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资金、技术、人才上多方努力,利用国内外环境,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环保设备制造等产业;营造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创业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增强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和经济贡献。打造一批具有明显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加强杭州市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

化基地、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继续加强杭州市数字电视产业园、杭州市动漫游戏产业园、杭州市生物产业基地建设,形成若干个技术水平突出、产业特色明显、具有相当规模经济效益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通过引进、学习、消化、再创新等途径,建成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平台。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其二,适度发展重点领域的重化工业。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优选重化工业的发展重点,推动产学研攻关,提升集成配套能力,着力发展运输设备、成套设备、机床等装备制造业,适度发展化学工业,积极探索发展海洋产业,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汽车制造业以发展大中型高档豪华客车系列为核心,同时加快发展专用车辆制造,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加强自主开发和品牌打造,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做大做强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强国际合作。船舶及零部件制造业重点开发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船舶产品。成套设备制造业要开发新一代汽轮机、新型锅炉、燃气与蒸气联合循环机组、抽水蓄能机组和发电机组、输变电配电等电力设备、大型乙烯装备及下游合成产品所需的重大装备,推进大中型空分设备产品更新换代,完善并开发新型电梯,加快调整机床产品结构,磨床产品向数控化、高精度、高效率、成型专用和成套成线方向发展,开发精密磨加工设备。化学工业要利用周边地区产业优势,发展无污染、高附加值的石化下游产品,延伸杭州湾石化工业的产业链。海洋工业重点发展船舶和船机制造、临港工业配套设备、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品、海洋信息技术与设备、海水淡化等产业,积极争取在杭州市建立国家海水利用产业化南方基地。

其三,通过深加工发展传统产业。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材等杭州市传统优势产业要逐渐过渡到自主创新、自创品牌的发展模式。纺织服装化纤业要发挥产业综合优势,通过重组、兼并、股份制改造等多种形式,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食品饮料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方便食品、绿色食品、新型特色食品、水产品精深加工和海洋生物食品,提高食品饮料精加工程度,扩大食品饮料出口。建材业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发展环保、绿色、节能的新型建筑材料,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发展钢结构产品,积极发展工艺水泥、建筑陶瓷、玻璃和新型墙体材料。

其四,提高整体水平,积极发展建筑业。推进建筑业的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提高建筑业的设计、施工和技术装备水平,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建筑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大力拓展国内外建筑市场。

(2)服务业要围绕建设服务业大市的目标,坚持传统服务业与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举,以市场化做大服务业规模,以信息化提高服务业水平,以国际化提升服务业能级,以法制化优化服务业环境,构筑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其一,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加快发展大旅游产业。围绕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和“东方休闲之都”,积极保护和有效开发旅游资源,整合杭州市独具特色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特色项目,同时发挥其龙头作用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

其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积极引进知名的跨国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壮大地方金融企业,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

其三,促进商贸与物流业升级,打造物流中心。加快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推进连锁经营,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推进第三方、“工商合一”和“商商合一”的新型物流业态,培育物流基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南翼物流中心的基本框架。

其四,扩大自身优势,着力拓展信息服务与软件业。鼓励软件企业加快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以发展网络增值业务为重点,加快新兴信息行业的发展。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互联网本地交换平台,抓好“数字杭州”的网络基础。

其五,以市场化、专业化为导向,大力培育中介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以培养高附加值产业为重点,培育发展创意产业、经济鉴证、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知识型、科技型服务业,扶持一批有实力、有品牌、有信誉的中介机构加快发展。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大力引进国际著名的会计、咨询、评估等中介服务企业。完善中介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

其六,以持续健康为基调,稳步发展房地产业。形成供需基本平衡,价格基本稳定的房地产发展格局。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住房的建设步伐。引进国内外著名的房地产咨询、设计、物业管理公司,培育本地房地产企业,争创房地产全国品牌。

其七,改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

2. 从城市功能角度规划,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快构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市)城为依托、中心镇为基础、高等级公路为发展轴的市域网络化大都市,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县(市)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 合理安排空间发展框架。建立和完善主体功能区划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的差别化区域开发政策,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机制,使主体功能区划成为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总体效率的重要依据。开展区域主体功能区划分,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与潜力,合理划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优化开发区域主要是主城区,主要任务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现杭州市古城风貌;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升城市品位。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钱江新城、江南副城、临平副城、下沙副城和江东工业区、临江工业区、临平工业区、钱江经济开发区以及省级开发区、工业功能区块等,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转移,形成新兴城区。限制开发区域主要包括森林资源密集地区、江河水系源头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主要任务是强化生态保护与整治,进行集约开发。禁止开发区域主要包括西湖国家风景名胜区、千岛湖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保护区及各类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历史文化遗迹核心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2) 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依托主城区各个区块的特色优势,发展和培育城市的主导功能,重点建设中央商务区、旅游休闲商务区、创新创业带,提升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创新创业功能;发展省会经济、总部经济和面向企业的各类咨询机构,提升管理决策功能;推进旅游业国际化,积极发展休闲产业,提升旅游休闲功能。健全适应大都市特点的高效管理体制和机制,合力推进副城建设,实施以大都市新中心为核心、以“三副六组团”建设为重点的新城区建设工程。

(3) 加强统筹协调,加快五县(市)发展步伐。以“旅游西进”为先导,以完善“交通西进”为载体,依托高速公路,实现产业、资金、人口集聚,“顺藤结瓜”,促进中心城市产业梯度转移,发展“高速公路经济”和“黄金水道经济”。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五县(市)尤其是富阳、临安从郊县(市)向郊区转变。

(4) 构建杭州都市经济圈,推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根据省政府提出建设杭州都市经济圈的

总体要求,在进一步推进中心城市与五县(市)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基础上,加强杭州与湖州、嘉兴、绍兴等相邻县(市)的合作发展,将杭州“一个半小时经济圈”由市域扩展到“都市经济圈”。

(5)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资源要素支撑。贯彻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的建设要求,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善以交通、市政、信息、能源、环保、防灾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为杭州市的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6)优化产业布局,发挥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向开发区、工业功能区集中,市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面向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以块为主、点块结合”的布局。依托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江东、临江、临平、钱江四大工业区,建设杭州市东部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环杭州湾产业带核心区。进一步推进支撑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三大科技创新集聚区建设,即城西科技创新区、下沙科技创新区、环杭州湾产业带和浙江省的科技创新核心区。同时,加强县(市)特色城镇工业功能区建设。

3. 从制度角度规划,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助力

(1)继续实施改革,推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维持社会利益平衡的机制,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保障。

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公用行业、优势产业和基础领域集聚,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和基础行业的主导作用,重点推进市属授权经营企业集团和国有独资公司产权多元化改制。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非禁即入”原则,积极创造民资、外资“国民待遇”体制空间,赋予均等的资源分配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实施中小企业成长计划,进一步改善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环境。对公用垄断行业本着效能统一、权责一致、运行高效的管理体制,制定兼顾社会、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改制政策。

二是创新公共财政体系,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提高社会公益事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资助力度。推进部门预算改革,深化部门预算编制。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合理调整市、区分成比例,实现事权与财力相统一。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调整机构布局,整合优化资源,控制总体规模,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三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培育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健全市场结构,提升市场功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地方金融市场,加快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改革。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扶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内外上市融资。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开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试点,扩大发行企业债券,积极开拓期货、保险、租赁市场,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证券中介机构。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合理运用市场机制,发挥价格机制对资源要素配置的调节作用。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健全公共资源招投标管理体制,规范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遵循“公平准入、公平交易”原则,强化招投标监督机制。

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相结合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原则,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政府机关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政府及部门政绩考核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与职责,切实履行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和投资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严格规范行政许可项目设定和行政许可审批行为。健全各级行政服务机构,实现市、区、县(市)联动,建立并联集中、高效便捷、公开透明、协调顺畅的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审批系统,提高办事效率。按照“政府投资管住、管好,民间投资放开、搞活”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障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2)坚持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努力实现对外开放的新突破。

一是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效益。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在继续保持纺织服装、轻工工艺、五金工具等传统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扩大机械设备、软件、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创立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促进从以数量增长为主向以质取胜转变。大力发展国际旅游、服务外包、软件出口等国际服务贸易,提升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层次,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加快从低端的贴牌生产、简单组装向中高端延伸和发展,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善出口加工区功能。健全维护贸易公平应对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行业协调和自律,建立对外贸易预警机制、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和反技术壁垒工作机制,做好反倾销、反补贴等的起诉和应诉工作,健全外贸监控体系,提高处置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

二是强化投资引导,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强化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大力引进对杭州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项目、大企业,着力引进跨国公司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的投资项目。拓宽招商引资领域,扩大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旅游、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外资引进,积极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的转移。创新外资引进模式,推动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推进具有品牌、管理、网络、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资合作,推动优势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鼓励企业通过境外上市、国际风险投资、国际融资等方式加大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用。

三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多渠道建立海外重要物资开发和供应基地,提高杭州市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国际劳务合作,大力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加强外贸“大通关”建设,加快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保障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

四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按照“规划共绘、设施共建、市场共享、产业共兴、环境共保”的原则,加速“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步伐,充分利用上海市的信息、人才、资本、市场和国际形象等资源,带动杭州市发展。发挥省会城市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引进企业的决策、研发、财务、营销四大中心为重点,培育总部经济,发展省会经济。继续推进“山海协作工程”和“双对口”工作,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拓宽杭州市发展的战略空间。突破行政区划局限,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建立杭州市与周边地区互补联动、平等共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形成区域间良性互动、竞争合作、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 规划实施重点方案

规划在实施中,要着重解决好要素制约问题,合理规划好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1. 多种途径解决要素制约问题

对于土地问题,建立可持续的科学用地机制,组织开展土地开发整理和建设用地复垦,积极盘活存量土地,努力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善和落实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措施,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标准,加强新增用地的前置控制和事后监督。规范土地征用程序,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办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农村宅基地整理复垦机制,合理制定农村居民人均建设用地定额,控制农村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开展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改革,完善工业用地竞争性供地方式,加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力度,提高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水平。引导工业项目向开发区和标准厂房集中,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资源使用中,坚持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技术体系,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度,组织开发和推广有重大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建立和完善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推进供水、供气、排污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完善环境评价、环境淘汰和排污许可等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劳动力人才方面,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方面要努力降低外来劳动力在杭州的生活成本,如建立专门的租房政策和其他辅助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措施,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加强政府公务人员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培养,强化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监督。为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积极创造再教育和相互深入交流的机会,培养造就一支优秀企业家和高素质职业经理人队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优化人才创业环境,充分利用现有的高校资源,搭建人才培养与创业的基础平台,由政府引导投入大学城、留学生创业园区、企业研发基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等建设。推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健全人才的选拔任用制度,完善人才市场体系,推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绩效优先、体现价值的人才竞争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的人才市场。

2. 合理规划、布局、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产值在生产总值中比重的增加。杭州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有一个长期有效的规划。建议杭州市建设高端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着重在旅游休闲、生产性服务业、物流、金融服务等领域做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水平,实现建设多功能的综合性现代化服务业城市。

(1)在旅游产业方面,要利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整合杭州市以国家级旅游资源为重点,利用国际大型旅游公司,加快旅游国际化进程,提高国际知名度,用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杭州市在旅游业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广泛的国内、国际知名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杭州旅游业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通过规划和创新,旅游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此,本文提出发展旅游产业的几点建议:

一是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整合旅游资源,深化企业改革,培育龙头企业,推行集团化、网络化、专业化经营方式,推动旅游产业向深层次、高效率方向发展。一方面整合本地优势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给予龙头企业大力扶持,努力培养其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打造跨国旅游集团公司,从而更好地整合本地旅游资源。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本地龙头旅游企业与国内、国际大旅游集团公司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旅游企业管理经验和旅游资源开发经验,甚至直接引进国际大型旅游集团在杭州市建立总部和分公司。引入外地旅游企业以后,本地旅游企业就必须学会在竞争

中成长,按此趋势发展,杭州市将出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旅游集团公司,成为中国旅游产业的聚集地。这些大型跨国旅游企业对外地小型旅游公司进行兼并和重组后逐渐往超级旅游集团方向发展,将对本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将起到非常有益的带动作用。

二是大力发展旅游相关配套服务,比如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交易、导游服务、旅游企业管理等行业以及相关行业的人才培养等。旅游配套服务的成长与旅游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能实现由单一产业向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走多元化经营道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促进旅游相关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

三是推动旅游服务方式由满足旅游消费基本需求向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转变。杭州市不但要重视景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更要重视打造高质量的旅游服务水平;不仅要关心游客的物质利益,还要关心游客的文化利益、精神享受,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服务。要充分利用杭州市悠久的历史,开辟各种层次的文化娱乐服务业,从而补充静态风景点的不足。从物质享受的角度看,杭州市的旅游发展已经比较完善,但是互动文化娱乐项目相对单一,可以直接从外地引进更多的文化娱乐元素来丰富本地的娱乐文化,比如体育竞技、探险体验活动、歌剧等,以打造立体式的旅游产业。

四是推动旅游带动作用由注重经济功能向积极发挥综合功能转变。旅游是一个关联度高、辐射力强的综合经济产业,旅游优势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经济优势,它的带动作用除体现在传统的经济方面外,还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弘扬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形象等综合功能上。在进行城市旅游建设的时候,将和谐的文化、美好的道德风尚贯彻到细节,可以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社会文化进步,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城市形象。

五是加大对“品质之城”“品质旅游”“国际旅游休闲中心”的宣传推广。杭州市要以实施“旅游西进”和“旅游国际化”两大战略为载体,结合建立国际化旅游集团公司的策略,以全面推进项目建设和强化城市营销为重点,全面实现旅游业品质的提升,打响“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旅游品牌。

六是加大生产型旅游服务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旅游业都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生活性、传统型、消费型服务业。但旅游业最终要向现代服务业及生产性服务业转变,向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旅游业发展。现代旅游业可以分为会议旅游、展览旅游、商务旅游、奖励旅游、接待旅游等。杭州市要从各个角度多方动员,努力引进各种会议、展览、商务活动,为杭州带来更多的旅游人群。同时,要加强对体育竞技活动的引进。现代体育活动能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极大地提升城市知名度,杭州市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尽可能多地引进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如全国运动会、亚运会、世界杯赛,甚至是奥运会。

七是继续加大开放力度。杭州市地处改革开放前沿,但是仍有继续开放的空间。尤其是旅游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酒店方面的成果可以视为成功的例子。旅游企业除酒店外,开放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开放程度可以体现在区域合作上,以长江三角洲旅游合作为范例,根据市场需求,经过调整去掉障碍,满足游客需求,并根据市场在各方面不断跟进。

(2)在金融产业方面,可利用上海市的金融优势和沪杭交通的便利条件,合理定位金融产业在杭州市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杭州市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积极引进知名跨国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壮大地方金融企业,从而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辐射力,努力把杭州市建设成金融机构齐全、

金融市场发达、金融辐射功能强劲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性金融中心。

具体有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放宽政策，扶持鼓励各种类型的金融中介服务。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金融中介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杭州市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投资意识和能力的增加，急需有多条渠道疏通需求和满足供给，这正是金融中介大显其用之时。

二是大力发展理财业务，树立理财品牌。随着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6000 美元，人们对金融理财的需求将会有个显著增加。截至 2004 年底，杭州市共有金融机构 200 多家，从业人员 3 万余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5707 亿元。2005 年，中国理财市场的业务规模达到 500 亿美元。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个人理财市场将以 30% 的速度递增。杭州市要利用好长江三角洲南翼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大力培育本地理财机构，引进国外成熟的理财机构，实行内外合作或合资等多种形式，把杭州市迅速打造成为全国理财中心。同时，借助本地高校和金融机构，打造理财人才的培养基地，将理财活动和理财人才培养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要在国内还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理财中心城市之前率先行动，赢得先发优势。

三是抓住机遇，利用上海市建设金融中心的契机，把杭州市建设成上海市金融中心的后台服务系统。上海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金融业非常发达。杭州市与上海市相距甚近，江浙沪三地来往相当密切。杭州市现有的各类金融机构在数量、规模和效益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适于建立这样一个服务于上海市金融中心的后台系统。

四是政府要鼓励金融业进行创新，多提供创新平台，多举办创新活动，使金融业在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 在商贸与物流业发展方面，杭州市有很好的地理和经济优势。杭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枢纽，本地经济能很好地辐射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上海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自然会推动杭州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杭州市通过沪杭甬高速公路等大通道连接上海浦东和宁波北仑两个对外开放窗口，处于中心地位，具有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外向度，是全省经济增长与开放的领航区域。这些有利因素为杭州市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提供很好的基础条件和广阔的需求市场。杭州市发展物流业的目标是：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第三方物流等新型业态，重点培育发展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等国际物流中心，加快都市配送型、产业基地型、行业分拨型三大物流体系建设，推动现代化的物流产业在杭州市迅速发展。

对杭州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建议是：

一是将物流业的发展建设纳入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目标，制定物流业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引导多元化市场主体投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物流基础设施系统的形成与完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兴起是市场化运作的核心体现，杭州市要运用政策扶持的办法，鼓励企业引进不同类型、拥有先进科技手段和广泛配送网络的运输管理技术，让这些企业拥有自动化分拣、存取系统等大型配送运输技术和先进技术的管理设施，为客户提供周全的服务。政府可采用各种灵活的市场手段，比如入股等，支持物流企业快速发展，尽早占领市场。

二是政府要制定明确的物流业发展规划。在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在城市的郊区、主要公路枢纽区域规划建设物流基地，倡导发展“城市内最佳配送系统”，围绕某个标准轴心将城市内无规则发生的各种方向、数量、时间的货运加以汇总，实现混载配送，提高配送效率。政府可以将规划

区内的土地以低价位卖给投资商,为物流企业提供一定的低息长期贷款,加快规划区交通设施建设,使规划区内地价增值,使物流企业看到即使业务不景气也会得到相应收益。政府要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出台如放松政府管制、建立政府部门协调促进机构、提供政府援助等可行的鼓励政策。

三是抓好物流教育与物流新技术推广工作。物流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可采用人才引进和自我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国内很多大学已经开设物流专业,可以解决普通技术人员的需要。对于高技术人才,既可以通过企业和政府合作的方式引进,也可以从高校引进。

(4)在信息服务与软件业方面,政府要为信息服务业提供先进的基础平台,把吸引外部信息公司和发展本地信息企业相结合的战略尽可能早的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全球著名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要鼓励其他信息公司为阿里巴巴提供周边服务,扩展阿里巴巴的服务范围,更要鼓励其他企业进行创新,抓住信息产业的前沿机会。

该方面主要有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政府可以成立创新基金,向信息产业的创新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的支持。

二是引入风险投资,为信息产业的创新注入后续活力。

三是加大对创新活动的宣传。

随着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电子签章的法律效力,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都将再次得到创新的源泉。尤其是电子政务,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完全的无纸化办公,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建立电子政务网络平台、数字认证平台和网络监控预警平台,形成信息共享和安全保障机制。要以发展网络增值业务为重点,加快推进电信服务、计算机应用服务、广播电视在线(传输)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同时,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光缆干线网络,加快建设互联网本地交换平台、无线宽带和光纤到户接入,推进“三网融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以阿里巴巴和成功企业的创新活动为基础,在信息产业界内进行宣传,让业内人士充分认识到创新的巨大能量。

杭州市相当一部分软件企业由于资金缺乏,无法吸引人才,产品研发滞后,产量不成规模,管理跟不上,长期处于小作坊式的生产状态。因此,要发挥软件企业高科技、高发展、高附加值的优势,与市场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鼓励软件企业上市融资,建立长期的资金来源;一方面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软件产业,尤其是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同时,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引导资金投向具有广阔市场和竞争优势的产品,使软件企业做大、做强,改变“小、散、软”的状况。而软件产业作为知识型、幼稚型产业,一方面需要精心保护,另一方面要走出一条特色化的道路。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并建立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沟通的渠道,使需求和供给更加贴近。

(5)在中介服务业方面,要培育发展创意产业、经济鉴证、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知识型、科技型服务业,引进国际著名的会计、咨询、评估等中介服务企业。完善中介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中介服务企业的执业行为,加强对中介服务业的规范管理和信用建设,建立信用监管和惩戒制度,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具体而言,加快中介服务业发展主要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政府加强规划引导,优化发展环境。政府应将中介服务业发展纳入经济发展规划,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为中介机构提供支持,对不适应中介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地方政策和管理方式予

以调整,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和舆论环境。

二是认清产业发展方向,发展高端服务业。香港及国外中介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会计、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要素的分配,是实现高利润、高就业、低消耗、低污染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符合杭州市建设的方向,也和杭州市的经济发展现状和人文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杭州市本土中介组织的业务经营范围一般只限于本地区,跨地区尤其是跨国经营的中介机构较少。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例,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传统的会计业务,即企业审计业务。与之相比,国外同行的业务已拓展到企业管理咨询等其他服务上。因此,高端中介服务业是杭州市中介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是积极引导相关中介联合重组,建立新型机构。综合性、集团化、跨国化应是中介服务业新的发展趋势。杭州市中介服务企业要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就需要在规模、人才、服务品种、专业知识等方面具有相当优势。杭州市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联合重组,扩大规模,建立综合性的、新型的中介机构,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中介机构“强强联合”,加快发展,提高竞争力;支持中介机构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取得多种资质,拓宽业务范围,开展多项中介服务;鼓励发展“内引外联”的外向型中介机构,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加速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接轨;加大对中介服务企业的招商和扶持力度,同时和金融机构加强联系,打造出一批强有力的金融中介组织。

四是利用好杭州市对外联系频繁的特点,加强中介服务的国际国内交流。抓住机遇,加大开放力度,有的放矢地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引进国际知名的会计、法律、咨询、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先进管理经验。有关部门要把引进国际知名中介服务机构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积极争取国际知名中介服务机构来杭州市合作、合资或者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同时,把杭州市比较优秀的中介服务企业作为招商储备项目介绍给外商,鼓励它们与国内外知名中介机构合资、合作,积极推进本地中介服务业与国际中介服务业接轨,引导、鼓励杭州市中介服务企业走出国门,利用先进服务理念、手段和技术,提升中介服务业总体水平。

五是利用高校和现有的成熟中介组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中介服务业一方面靠创意,另一方面靠人员服务素质,人才的培训和教育作用至关重要。政府要重点引进中介服务业发展急需的高级职业人才,并重视中介服务业人才的后续教育和培养,丰富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使他们熟悉国际惯例,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研究制定中介机构行业道德标准、员工职业道德标准、就业规范、服务规范等,通过考试考核制度,选拔、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进入中介机构,并为人才的进入与扎根提供入户、住房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形成人才优势。

六是应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和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促使其尽快与政府脱钩,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各部门对中介机构要从直接管理转变到对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上来,制订行业规划,审查认定行业协会的规章制度,审查批准收费标准,监督规范执业行为,查处违法违规事件,建立与完善各种监管制度,提供公正的法律制度。

3. 发展高技术产业

发展高科技,要坚持以现有优势科技产业为基础,走逐步拓宽做强的道路。根据现有科技基础,建设杭州市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一定的电子信息产业格局。对现已基本建成的杭州市数字电视产业园、杭州市动漫游戏产业园、

杭州市生物产业基地,要不断地用市场化的方式支持这些产业园和产业基地的发展建设,比如加强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的建设,形成若干个技术水平突出、产业特色明显、具有相当规模经济效益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用创新和科技提升改造传统优势产业。突出重点领域,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适度发展临港重化工业,积极探索发展海洋产业,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重点发展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光、机、电一体化产品,高科技精细化工产品,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品,海水淡化设备等。加快发展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印刷包装等都市型工业。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打造一批知名品牌、著名商标。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快淘汰污染严重、工艺落后、物耗能耗高的产业。

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系统角度讲,需要软件配套服务。

一是加快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加强评估、策划、鉴定、咨询等中介机构建设,完善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健全技术标准体系,大力推广国际标准,执行国际计量和技术法规,形成有效的技术进步推进机制。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交易体系,健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转让、抵押、处置制度。完善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设立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小型科技企业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政策咨询等提供“一条龙”服务。发展科技信息机构,组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平台。

二是定期举办高新技术产品交流会,同时鼓励企业参加全国甚至全球的各类高新技术交流会,实现技术产品交易和科研成果转化相结合:把科研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创业投资与成果转化结合起来。

三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高新技术产业扶持政策,尤其是对中小高新企业的扶持。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创建积极,但在资金政策上更容易遇到困难。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国家法规的前提下,鼓励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转移,对用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生产的设备加速折旧,增提折旧费用于技术改造和创新。鼓励高新技术引进与创新,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取得进出口权,积极争取建立出口加工基地。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兼并、承包、租赁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明确规定并定期发布优先采购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同等条件下提倡使用省内先进技术产品。

四是建设多层次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强化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和能力建设,加强以重点企业为依托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高层次、综合性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源建设,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组织和运用科技攻关、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等科技计划,针对影响全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重大产品,组织好科技攻关。对若干特别重大的关键、共性技术,应面向社会招标,开展联合攻关,并予以重点支持。高等学校要根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投入,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鼓励科技人员通过专职或兼职的形式创办或受聘于企业,进行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

五是建设多元化投资体系。要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新机遇,利用杭州市资本充裕的优势,利用风险投资正在广泛寻找项目的特点,拓宽高新技

术产业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国内外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新型投融资体制,促进资金的有效运转和良性循环。调整政府投资结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政府资金投入要侧重支持战略性项目,作为高技术企业创业期的引导资金以及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补助资金等,并突破所有制限制,以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重大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稳步增加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改进投入方式,全面实行招投标制度。在完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机制的同时,健全相应的决策程序和监督评价体系。促进企业增加投入,加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市场准入领域,利用税收优惠、补贴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使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的主体。积极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创造条件,鼓励民营和中小型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市场和其他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积极运用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等金融工具筹集资金,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参与上市公司重组或借壳上市。加快创业投资体系建设,培育创业投资主体,健全退出机制。鼓励境外资金特别是国际风险投资机构来杭州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或直接投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发展民间风险投资机构和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风险投资市场,以资信条件良好的大企业 with 金融机构为主组建创业投资基金,形成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境外风险投资为示范、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资本供给主体结构。

六是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融资体系。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境外投资项目,在流动资金贷款和出口信贷方面给予政策性金融支持。建立担保基金,为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建立风险规避机制,为到境外从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企业提供保险服务。

七是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加强人才培养,继续改善高新技术人才用人政策。高新技术人才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竞争。要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实行办学模式多元化,致力抓好创新教育。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根据市场需要及时调整专业结构。鼓励高校与企业联合建立人才培训中心,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合作培养人才。选派科技骨干和企业经营管理者到国外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全面提高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素质。同时,多方吸纳贤才,构筑“人才高地”。发挥高等学校密集地带和大学科技园优势,制定有利于人才有序合理流动的各项政策,强化人才引进力度,吸引和聚集各类人才。逐步推进企业家市场化,打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鼓励和支持境外科技人员和出国留学人员以各种形式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加强与国内外发达地区人才智力的合作与交流。对优秀科技和管理人员在户口、收入、住房、子女上学、出入境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强化激励机制,创造“事业留人”环境。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完善分配制度和奖励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知识产权化,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符合高新技术产业特点、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尊重知识价值、鼓励人才成长的分配制度和经营制度。形成有利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风险分担、收益共享的激励机制和“选优、培优、留优、用优”的用人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创业创新积极性。

八是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式发展。总结动漫产业园等一批成功产业园区的经验和教训,各开发区应充分考虑自身比较优势,培植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及不良竞争。促进高新区产业集群发展,把园区建设与发展产业基地、培植龙头企业结合起来,建设以骨

干企业为核心的大企业工业园。支持国内外大型企业入园兴办产业基地,力争国家、省、市重大项目落户高新园区。吸引跨国集团进区发展,建设跨国工业园。加快特色园区建设,积极发展创新型小企业,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和企业群。

九是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引进国外大型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建成一批对产业发展起辐射和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项目。坚持“高起点引进、全方位创新”的原则,吸收更多的跨国公司来杭州市设立地区总部和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注重引进技术的整体性和消化吸收,鼓励多引进软件技术。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效运用专利战略,选准重点领域、关键核心专利技术,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并取得突破,以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向海外拓展。

(主持人蔡奇、执笔人金雪军)

杭州市迁移政策与劳动力 市场政策协同研究^①

据对杭州市主城区劳动力市场的统计,2006年,求职农民工达71.78万人次。其中,34岁以下占总数的87.31%,16岁~24岁占总数的53.29%,离开校园后直接加入打工行列的农民工人数已居第一位^②。

另据抽样调查显示,有51.6%的农民工打算长期在杭州工作,其中占总数34.5%的人希望取得城市户口,22.1%的人想赚够了钱就回家乡,5.2%的人想尽快回家乡,14.5%的人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而定。^③可见,相当多的进城农民工有留在城里成为城市居民的愿望。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杭州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迁移政策

(一) 杭州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在推动劳动力市场完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度是全国最高的。从市场运行上看,雇佣关系基本市场化,即企业与劳动者通过市场建立劳动关系,各类劳动力都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进入杭州的劳动力市场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从更深层次分析,杭州市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需要完善的方面,即在不同劳动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歧视。

一是对不同身份的求职人员采取不同的管理。2001年9月5日,杭州市劳动局发布文件,实行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录用备案和办理杭州市外来人员就业登记证制度。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在办理备案手续时,须针对被招用人员的不同身份携带不同的证件,分别是:市区非农业户口人员为失业证或职工失业保险手册;市区非农业户口人员档案转入劳动保障部门的应届大学、中专、技校、职高毕业生为毕业证书和户口本;市区农业户口人员为杭州市区农业户口人员就业登记证;外来人员为杭州市外来人员就业登记证。不同身份的求职人员需要提供不同的证件,意味着有可能对外来农民工采取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准入政策。

二是杭州市就业援助证制度。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实

^① 本地城镇居民,可分为原有城镇居民(即老城镇居民)和征地“农转非”“购房入户”“投资入户”“人才入户”人员(即新城镇居民)。本课题研究对这两类群体不做具体分析,仅以城镇居民统称进行研究。本地农村居民,因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矛盾不突出,不属于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面。外来暂住人口,根据户籍身份分为外来城镇居民和外来农村居民。本课题主要研究外来农村居民,在杭州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即我们所称的城市农民工。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仅指本省外地及外省进杭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

^② 王国平:《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需要两手抓》,《文汇报》,2008年2月28日。

^③ 魏皓奋:《代表建议允许农民工用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今日早报》,2008年3月14日。

施意见》规定,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符合条件的本市城镇失业人员,经其申领予以发放杭州市就业援助证,并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对持就业援助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并免收属于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持就业援助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创办注册资金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并参加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给予每人每年1500元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招用的持就业援助证人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对上述企业中的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在相应期限内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单位招用持就业援助证人员,给予用工补助和社会保险费补贴;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在新增加的岗位中新招用持就业援助证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以上的,根据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贷款额度;鼓励政府投资开发公益性岗位,安排持就业援助证人员中的“4050”人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和其他长期失业人员就业;市和区各级机关、财政补助事业单位要分别按不低于勤杂岗位、协管岗位临时用人计划总数70%、50%的比例吸纳持就业援助证人员就业。该文件事实上抬高了外来农民工进入一些行业就业的门槛。

以上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还不能完全达到平等就业。

(二) 杭州市的迁移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政策变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8年是人口的自由迁移阶段,政府对人口迁移的管理比较放松;1958年至1978年是中国政府对人口迁移进行严格控制的时期,对人口迁移进行直接控制管理以发展工业;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迁移政策逐步放开,并且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个省市人口迁移政策出现多样化,并逐步形成地方特色。

根据杭州市户口迁移政策的规定(杭州市公安局网站2008年11月1日发布),以下9类人员的户口可以迁入杭州市:

外商投资入户。1998年起,在杭州市区新批或在该年度起增资10万美元以上并在本市或区纳税满10万元人民币的外商投资企业。

纳税落户。外地来杭州市区的个私企业经营者,从2000年开始凡连续两年内缴纳地税满10万元人民币的,法人代表本人可申请办理落户手续。外地来杭州市区的个私企业经营者,从2000年开始凡连续两年内每年缴纳地税满15万元人民币的,法人代表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申请办理落户手续。

夫妻投靠。夫妻婚龄满3年(含3年),外地农村农民与本市农业户口村民结婚满2年的,在杭一方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外地一方可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夫妻投靠。

老年投靠。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或原杭州籍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夫妻双方均在外地,身边无子女,子女全部或多数在杭州市区且子女在杭有合法固定住所,可向子女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老年投靠。

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凡15周岁以下(含15周岁)未成年子女或18周岁以下在校学生,父母在杭有合法固定住所,可按自愿原则向父母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投靠。

专业技术、党政干部、科技人员家属投靠。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科研成果奖的主要完成者,党政机关处级以上管理人员,被聘任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被聘任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三年,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获得者。上述人员本人户口在杭州市区的,其外地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申请办理进杭。

购房落户。2006年3月20日之后在滨江(80万元)、下沙(60万元)、钱江新城(100万元)购房,付清相应房款的可申请办理1户(夫妻以及未成年子女)杭州市区户籍。2008年10月14日起,购房入户政策实施范围由杭州经济开发区(下沙)、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钱江新城区域扩大到上城、下城、西湖、江干、拱墅区等区域。购房者为非杭州市区户籍人员(不含境外人员),在上城区内购买单套住房(含存量房)总价达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或在下城、西湖、江干、拱墅区内购买单套住房(含存量房)总价达80万元以上(含80万元),付清相应房款的,可申请办理1户(夫妻以及未成年子女)杭州市区户籍。

人才引进人员落户。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级职称45周岁以下,副高级职称50周岁以下,正高级职称55周岁以下),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紧缺专业大专学历(35周岁以下),拥有发明专利(45周岁以下)。上述人员在杭州市区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办理本人户口进杭,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的政策。

应届高校毕业生落户。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普通高等学校硕士以上学历毕业生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的政策。

显然,外来农民工从整体上看,不属于户口可以迁入杭州市的人员。

(三) 户口迁移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平等就业的影响

迁移政策从四个方面影响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一是直接影响就业机会的获得,如杭州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中,有一些针对本市户籍劳动者的就业优惠。二是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影响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三是影响工资水平。四是影响权利的实现。

1. 就业机会方面

就业过程中的机会包括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相当一部分城市工作只能提供给持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而对进城农民工求职提出诸多限制。许多被城市户口持有者挑选下来的肮脏、危险、乏味的工作留给了农民工,由此证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户籍歧视,不同户籍持有者就业的机会并非均等。这是导致农民工从事脏活、苦活、重活的制度性因素。

对比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在下岗失业前的就业行业和农民工的就业行业,发现两者之间差异明显。相对来说,农民工更多地就业于制造业小企业、服务业及私营小商店、小餐馆、小商贩等,而下岗失业人员大多来自于制造业。研究进城农民工与城市下岗职工两个社会群体求职与报酬的决定因素,表明两个群体的工资报酬和行业选择存在差异,因而证明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户籍歧视,城市下岗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获得再就业的优先权,农民工不得不选择被挑剩下来的行业和职业,可见政府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实证研究显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餐饮业和制造业,两者合计占迁移劳动力就业的60%以上;其次是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约占25%。相对而言,城市本地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则分布比较分散,涵盖各个行业。农村迁移劳动力从事的行业较为狭窄,意味着他们对收入的选择只能取决于这些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很少有其他机会。

2. 能力方面

就业过程中能力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员工能力培训的不平等上。为使农民工在思想文化观

念、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投资是关键。但实际上仅有少数农民工参加过类似培训。在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中,有一大半是自己寻找机会和门路参加培训的,只有一小半参加过所在单位组织的培训。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投资中,农民工成功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并获得了工资收入等直接收益。但在第二阶段农民工向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投资成本过高,私人预期收益有限,农民工进行相应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减弱,导致第二阶段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本不足,进展缓慢。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培训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一环,而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培训源于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

农民工的岗位培训与发展机会渺茫。在劳动岗位上,与有城市户口的员工相比,农民工大多没有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几乎都被排挤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大多处在技术含量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一线岗位工作,劳动的可替代性极强。所以,大多数雇主根本没有为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意识,没有对他们进行培训与开发的计划,更没有让他们得到提拔和晋升的打算。这将进一步导致农民工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就业之中。

城乡户籍差异对于子女受教育条件的影响。除关注对农民工自身能力的培训之外,还要关注他们子女的能力发展问题。农民工努力打工挣钱很多是为了给子女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事实并不如其所愿。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显示:所有的民工子女都不能与当地学生一样无条件免费入学。统计的所有学校都要求家长提供务工证、毕业证、暂住证和户口本,而民工家长能提供的比例分别为 58.75%、92%、90.75%、98.5%。大部分公办学校要求提供固定住所、独生子女证和劳动合同,民工家长能提供的比例分别为 22.75%、31.75%、14.25%,所有证件都能提供的仅占 8%。7 所被调查的民工子弟学校都无政府拨款,说明民工子女教育经费主要由民工自己买单,政府教育经费并没有投入到他们身上。根据人数和有效百分比,把民工子弟学校教师从教前的职业从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民(59%)、教师(34%)、学生(3.23%)、其他(2.41%)、工人或工匠(1.2%);将后勤与行政人员视为教师统计,则民工子弟学校师生比例约为 1:30,而公办学校师生比为 1:15 左右。民工子弟学校课程的设置远远低于国家标准,不利于民工子女的全面发展和对未来社会的适应。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则是最为直观的。研究同时表明,由于流动性过大,暂时移民儿童入学率远低于本地儿童。种种迹象显示,农民工子女受到不平等的发展限制,而这又进一步制约了农民工下一代的就业机会。

3. 收入方面

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在城镇就业过程中面对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问题进行分析时发现,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低、工作时间长,表现为很低的小时工资水平。他们的月收入仅为当地职工的 61%,小时工资不到当地职工的 50%。即使就业于相同的职业,如服务人员,小时工资不到当地职工的 50%。造成小时工资显著差异的背后原因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居民和农村移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职业分割,形成了中国城镇中的双层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当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差异进行分析时,发现差异的 80% 以上来自于职业内的工资差异。这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这完全是一种歧视现象。因此结论是,户籍制度既影响农民工进入城市,也是造成农民工与当地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权利方面

研究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需求与权利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保障权和劳资平等权利两个方面。

社会保障权是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利用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迁移劳动力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非常低,参加或享受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迁移劳动力比例分别为 7.2% 和 10.4%,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约 1/11 和 1/7;享受工伤保险的比例为 9.8%,约为城市居民的 1/3;享受失业保险的比例仅 1.5%,约为城市居民的 1/25。同时,将收入与参保率之间进行回归分析,显示出工资上升和参保率之间并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对迁移劳动力是否获得社会保障的影响很小,而企业、行业和职业特征对参保率有很大的影响。这说明在社会保障问题上,迁移劳动力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劳资平等权利。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雇主本来就处于比较有利、有权地位,农民工处于不利、无权地位,因此雇佣纠纷、雇主拒付工资现象频频。劳资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雇主占有劳动工种、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与劳动条件的信息优势,而农民工则由于并不清楚所要投聘的工种、岗位的确切信息,处于掌握有关劳动内容与劳动条件的信息劣势。这种不对称使得农民工从一开始寻找工作就面临着成功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即使被雇佣,也常常在原给定的劳动支出与劳动收入范畴内,身受工作长度强度被变相加大、工资被拖欠或克扣之苦。劳动收支不平衡,农民工在劳动实际收入上处于劣势。

(四) 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与迁移政策

从上面对杭州市劳动力政策与迁移政策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一方面,在杭州市劳动力市场政策上有一些针对本市户籍劳动者的优惠规定,而非杭州市户籍的劳动力就不能享受这些政策;另一方面,外来农民工难以取得杭州市户籍。这样,外来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就限制其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从而影响到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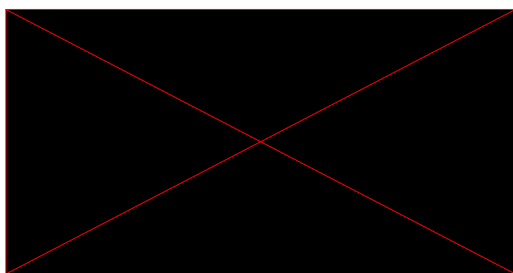
1. 平等就业的实现途径

平等就业的实现可以有两途径:一是淡化劳动者的身份,实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一视同仁的劳动力政策。二是深化迁移政策的改革,使外来劳动力转化为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即通过身份的转化,使外来劳动力平等地进入杭州市劳动力市场。

2. 迁移政策对平等就业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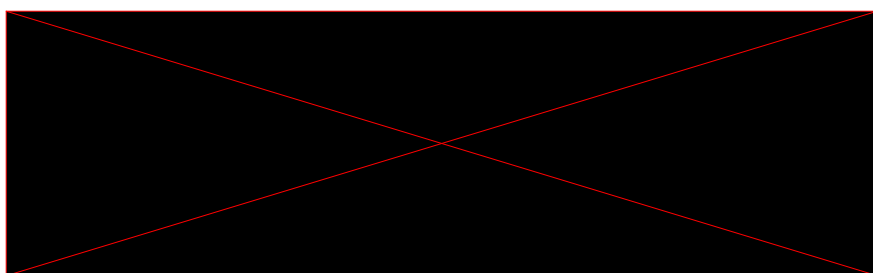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平等就业的实现,需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迁移政策的协同。在以上途径中,迁移政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影响平等就业的各种因素中,劳动力市场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迁移政策的调整才能解决。

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从杭州的现实情况看,妨碍就业岗位优化配置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严重阻碍着对就业岗位的充分竞争。二是由于体制身份的束缚,一部分劳动能力已经弱化的国企职工不能顺畅地退居于低一层次的劳动岗位就业。以上两种因素导致在杭州的劳动力市场上,政府对本地户籍劳动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保护,具体就表现在就业援助证制度上。



说明:虚线的圆圈表示调整前的劳动力市场,实线的圆圈表示调整后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后,杭州户籍劳动者与外地户籍劳动者在同一市场上平等竞争。

图1 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与平等就业的实现



说明:圆圈表示劳动力市场,通过迁移政策的调整,外地户籍的劳动者成为杭州户籍劳动者,与原杭州市民在市场上平等竞争。

图2 迁移政策的调整与平等就业的实现

二、迁移政策改革的意义

(一) 宏观意义

通过迁移政策的改革,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完全进入城市,将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流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缓解劳动力迁出地的就业和人口压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从而间接提高更多农村人口的从业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体来讲,城市迁移政策的改革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切实解决好城市农民工问题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更是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者平等就业的重要步骤。

(二) 对杭州市的特殊意义

首先,农民工对杭州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了杭州经

济总量扩大、利润增加。杭州市外来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杭外来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的约40万人,他们为杭州重大工程项目、大规模的路桥建设,为大量的居民住房、楼宇、商店的建造和装修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①,是杭州市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推进迁移政策的改革,将极大地激发他们作为新杭州人的自豪感,从而加快杭州市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步伐。

其次,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各个企事业单位,必然给企业原有的用工制度带来强有力地冲击,有利于企业及时规划调整现有政策,对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完全转移还会加快城市原有职工的流动性,给原有城市职工带来压力和忧患意识,从而提高城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推进迁移政策的改革,将有利于消除原杭州人与新杭州人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杭州建设。

最后,从城市的产业层次来讲,农民工进入城市多从事原有城市人口不愿从事的技能水平低、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行业。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城市不同产业层次的弥补,对城市产业层次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以家政服务为例,保姆、钟点工、清洁工等职位角色多由城市农民工担当,这就为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群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于产业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迁移政策改革的主要困难

迁移政策改革的主要困难在于杭州原有居民与外来劳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公共支出的庞大。

(一) 二元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关系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法律的核心是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并对农民进入城镇做出硬性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而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政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都使附着在户口上的利益相对弱化。户口的功能相对减少,但城市户口仍然享受着相对优越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等福利。

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是现有户籍制度的绝对受益者。所以,当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影响到城市劳动力收入,城市利益群体就会产生不满。尤其是当经济增长缓慢、下岗失业增多时,这种不满就会升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以保护其相对福利。政府为了经济和政治稳定,必然要对城市居民的压力做出反应,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农民工向城市的迁移,从而使迁移政策的改革过程受阻。

二元户籍制度强化了对城市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性歧视。城市农民工面临着许多非常严重的就业歧视。首先,许多地方政府制定的就业政策限制外地民工就业,具有一定的歧视性。为了保障城市常住人口就业,许多城市政府都出台地方性法规,规定外地人就业的行业和种类,限制用人单位使用外地工,并且时不时采取措施清退外地民工,从而排斥外地人的就业和谋生,实现对

^① 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调查组:《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解之题》,2005年1月。

外来人口的总量控制。歧视性就业政策,使民工很难找到工作,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企事业单位对民工的歧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民工即使和城里人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所得的工资往往也要少一些,并且他们也无法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待遇。

二元户籍制度使城市农民工与包括住房待遇在内的许多公共服务无缘。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无法进入相对完备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障;很多民工在高风险行业和场所工作,又没有工伤事故保险,频频发生的工伤事故常常对他们造成致命打击;对于住房,农民工更是无法奢望拥有,他们没有住房公积金,银行更不会给他们提供购房贷款,他们只能租房或住在非常简陋的棚屋中,生活环境非常恶劣。隔离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民工,成为城市中最脆弱的群体和“末等公民”,这与他们为城市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形成巨大反差。

二元户籍制度使城市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据估算,目前中国外来流动人口中学龄儿童有 200 万人左右。为了解决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一些暂行办法,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中国的义务教育事业由地方政府负责,实行分级管理,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负责筹措,并按户籍学生人数下拨,学校招收学生与户籍挂钩。外来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民工流入地政府不愿意为民工子女支付教育经费,流入地学校也不愿意无偿接受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为了让子女有书可读,民工们只得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向学校交纳高额的“借读费”或“教育补偿金”,对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阶层的民工来说,这笔费用无疑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结果,民工子弟只能到那些收费低廉的民工子弟学校去读书。但民工子弟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令人担忧,不少是未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和承认的“黑户小学”,办学不规范,教学水平很低,教学设施不足,条件简陋,消防、卫生、安全等问题突出。当然还有一些民工子弟根本无学可上,永远失去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成为失学儿童,形成新的文盲^①。

总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增加了民工的生活成本,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无法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他们被迫在城乡间大规模地来回迁徙,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迁移政策改革的进展。

户籍改革的难点不在户口本身,而是户籍制度背后附带的社会利益。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是错综复杂的。1992 年,国家就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 1993 年 6 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改革又牵扯到各种交错的利益关系,为避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直接影响迁移政策改革的进程。^②

(二) 迁移政策改革的主要困难在于利益调整难度大

一项制度改革能否推行取决于该制度实现后的收益与成本分析,如果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则该制度得以推行。收益实际上是推行该制度的动力,成本是推行该制度的阻力。动力与阻

^① 杨鹏程、代礼忠:《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其创新》,《重庆大学学报》,2002 年第 8 期。

^② 黄会清:《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新华网。

力的背后,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制度改革,其背后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迁移政策改革是相关主体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

迁移政策改革首先涉及外来农民工、现有城市居民、城市政府三个利益主体。下面简要分析这三个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关系。

1. 从农民工角度的分析

首先,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制约了他们在制度博弈时的谈判能力,成为城市迁移政策改革过程受阻的重要因素。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低下、观念陈旧、就业空间狭小。以出卖体力为主要手段的农民工只能涌入门槛较低的非正规部门,造成这些岗位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低工资必然使得农民工无力承担各种社保费用的缴纳。

据一份专门针对“长三角”16个城市农民工展开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885名农民工中,属于文盲的有112人,占3.9%;小学文化程度的有509人,占17.6%;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509人,占52.3%;高中文化程度的有431人,占14.9%;中专的有197人,占6.9%;大专及其以上的有127人,占4.4%。文化和技能的不足,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只能从事一些原有城镇居民不愿从事的苦、累、脏、险的体力劳动。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有474人,占16.4%;从事纺织、服装业的有311人,占10.7%;从事电子、机械制造业的有587人,占20.3%;从事服务业的有434人,占15.0%;从事环境卫生的有111人,占3.8%。^①

农民工就业难,企业招工也难。这其中一個很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职业技能低下。在浙江省范围内的一次调查^②中,85.89%的农民工希望参加技术培训,14.11%的农民工希望参加文化培训。另外,由于收入不高,基本倾向于参加免费培训。在愿意参加自费培训的农民工中,72.09%的农民工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可见,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不仅是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流入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农民工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迫切需要。当前专门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数量少,机会不多,有的还需要一定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转变为市民的步伐。

其次,城市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盲目进城单纯靠体力谋生,且缺少法律知识,加上对城市环境的陌生,因而缺乏维权意识。他们工作辛苦,但工资收入普遍很低,人格尊严和公民权利容易遭受侵害。遭欺负,受坑害,被克扣、拖欠工资,甚至被赖掉工资的现象屡屡发生。所以,农民工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缺乏维护自己在城市中与其他市民公平享受资源、争取“市民待遇”的能力。

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杭州市外来务工青年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及以下的仅有20.3%,将近40%的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至10小时,将近40%的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长期工作超时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威胁,直接影响他们的生产潜力。

相当多的在杭外来务工青年没有享受到双休日、带薪休假、工伤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66.9%的外来青年“没有享受工伤事故保险”,53.1%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60.1%的人认为“工作超时,没有加班工资”,47.8%的人认为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63.8%的人认为“用人单位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③

^① 详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

^②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浙江民工调查报告》。

^③ 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市青年农民工城市生活现状调研》。

第三,农民工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相应的组织(如工会)发展不完善,因此他们对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却很小,“搭便车”的现象在所难免。

城市农民工的力量十分分散,单个农民工很难有积极性去影响政府决策。因此集团内部个人之间博弈的结果只能出现所谓的“囚徒困境”,谁都不愿意去施加影响以改变现有市民偏向的公共政策。最后必然使得现有的制度和政策被固定下来。

2. 从城市市民集团角度的分析

作为城市的原有主人,市民集团占据了城市的各项资源与重要岗位,享有城市户籍带来的种种公共福利,成为整个城市发展的支柱。因此,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中更具话语权,也更有可能性联合起来为整个集团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影响政策向着更有利于市民集团的方向改革。

大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除自身劳力外,很难再为城市带来相应的资源与资本,相反还要与原有市民分享有限的城市资源,这必然是市民们不愿意看到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加入,使得原有城镇居民不得不与之共享原本可以独享的城市优质物质资源和生活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镇居民原本正常的生活秩序和保障,从而引起城镇居民的不满。他们害怕大量的流动人口给城市秩序带来冲击。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原来就已经趋于饱和的城市资源和公共设施很难再承载大量的流动人口。无限制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必然会降低原有市民的生活质量,带来所谓的“城市病”。因此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城市市民集团无法以一种更平等的心态对待农民工。自利性必然导致城市政策出台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来自市民的反対。

2006年春,杭州市某小学拿出15%的名额招收民工子女时,遭到市民家长的立即反对。家长普遍认为学校招生门槛太低,甚至由此质疑学校教学质量,担心民工子女由于素质低下会影响原有市民子女。^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市民在分享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财富的同时,却不愿意与他们共享各种城市福利待遇。目前,杭州市1000余所中小学中,90%的公立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每年吸纳75%左右符合就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此外,还有37所独立设置、专门用于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国有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②该小学拿出15%的名额招收民工子弟,这样的措施于情于理都无不妥。但是这种正常、合理的行为,并没有被市民集团所理解和接受。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根据户口、工作单位等进行学区划分,农民工子女由于不在城市的任何一个学区之内,所以理论上就失去了在城市里平等就学的机会。这种制度上的安排被很多城镇居民所认同,也为他们反对农民工子女接受同城教育提供了充足理由。

3. 从城市政府角度的分析

在现实经济环境中,政府并非是完全中立的,它有自身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政治收益的最大化。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偏向现有城市市民利益的倾向。政府与城市现有市民的利益基本一致,作为城市居民的利益代表,对户籍改革动力不足。在户籍改革过程中,政府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担心放开户籍制度之后会导致城市贫民区的迅速产生,也就是城市贫困率的迅速上升,还担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承担不起。

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及定居数量的增加,使得杭州市原本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变得更加

^① 中新杭州网 <http://www.uuhz.com/news> 2006-05-11。

^② 中青网 <http://www.youth.cn> 2007-11-05。

稀缺和供给紧张。以教育资源为例。2006年秋季,市区小学一年级最大容量为21700人,但当年秋季共有入学意向学生28352人,其中本市户籍13852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14500人。在保证本地学生入学的前提下尚有7848个位置,也就是说,杭州市区只能接收7848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这与14500名需要入学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人数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持续增长的进城务工人员使杭州市区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压力有增无减,并将持续下去。^①

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后,政府财政支出相应会有所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是既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将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压力,原有的计划体制造成基础设施存量较少,再加上现有的财政体制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关系不利于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基础设施投入的流量较少。所有这些都对政府财政负担产生压力。如果得不到进一步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原本用于提高和改进原有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财政资金就不得不分摊给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从而使城镇居民的正常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

据测算,随着新的《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出台、实施,2008年杭州本级基金和财政将增加支出6亿元。^② 在上级财政拨款及财政收入既定的前提下,这笔不小的支出无疑给政府的财政预算带来很大压力。

从政府职能来讲,政府为城市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公共部门没有及时提供有效的就业信息,职业培训不足。2007年初,75.1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1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1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1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1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③

四、杭州市政府在推进迁移政策改革中所做的努力

杭州市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异,是迁移政策改革的主要困难。尽管如此,杭州市政府在推进杭州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杭州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做好城市农民工的管理服务工作,积极提供公平待遇,努力减少城镇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的差别,从而最终为迁移政策的改革创造前提条件。

(一) 社会保障方面

社会保障同城同待遇的实现。杭州市已制定“城乡统筹、全民覆盖、一视同仁、分类享受”的《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对所有城乡居民都做出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并在城乡居民各项具体保障制度之间实现贯通,具体制度之间可选择、可转换。

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方面,杭州市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具体的保险选择、转移、接续制度。杭州市已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制定《杭州市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并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① 张连水:《杭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调查研究》,2007年。

^② 孙瑞灼:《杭州让农民工参保,让公共财政照亮低收入者生活》,《青年报》,2007年10月18日。

^③ 简新华、黄崑:《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7期。

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同时,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并建立农民工应急救助机制。政府和有关民间机构着力维护农民工权益,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在医疗保险方面,杭州市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实施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有所区别、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保制度。按照“广覆盖、轻负担、低标准、保基本”原则,制定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医疗保险政策。杭州市已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制定《杭州市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确定合理的缴费比例和医疗标准,制定方便可行的费用支付、医疗管理办法,解决外来创业务工人员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问题。同时,政府通过“花钱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加大医疗救助力度,积极开展“卫生惠民服务工程”,努力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提供价廉、效佳的基本医疗服务;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民工医院,着力解决外来创业务工人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按照现住地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的原则,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检查制度,提高农民工医疗服务水平。

(二) 住房保障方面

杭州市实施与现行的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政策标准有所区别的农民工住房政策。采取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动的办法,逐步形成企业集体宿舍、租赁房屋、农民工廉租公寓等多形式、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缓解农民工“住房难”问题。近年来,杭州市加大农民工廉租公寓建设力度,并对廉租公寓建设给予政策支持。坚持疏堵结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公寓,利用现有合法闲置房屋改建扩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公寓。切实加强出租房管理,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①

(三) 子女教育方面

杭州市把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教育事业发展整体规划,坚持“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女学校为辅”,在充分挖掘现有全日制公立学校潜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同时,利用现有闲置校舍、厂房等,开办独立设置的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工子女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现义务教育公平化。

近几年来,杭州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订相关政策,出台《关于进一步破解“上学难”问题的若干意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就学的暂行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目前,市区有90%的公立学校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9.68万人,占70%。除城市原有公立中小学安排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外,以国有民办、民办、公办等形式独立设置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学校47所,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4.48万,仅市区就建立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子女学校42所。2007年,杭州市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人数12.39万人。^②

2005年起,杭州市设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就学专项补助经费,至2007年市本级共拨款1090万元,专门用于补助6城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另外,自2006年春季开始,市政府出台《关于杭州市逐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通知》,明确全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享受同城待遇,免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2006年,各级政府补助全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免费义务教育经费2200万元,其中市本级和8城区补助经费1900余万元。从2007年秋季开始,免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借读费”(小学300元/学期,初中600元/学期)。从2008年春季开始,取消进城务工人员

^① 王国平:《坚持“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两手抓,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

^② 张连水:《杭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调查研究》,2007年。

子女课本和作业本费共计95元至145元(小学)。

(四) 生活就业等其他方面

1. 消除政策障碍

2002年开始,杭州市撤销对外来务工人员来杭就业的限制性政策,取消对企业使用外来务工人员的行政计划审批,取消禁止和限制招用外来务工人员专业工种的规定,取消外来务工人员求职必须有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出具外出务工登记卡的规定,取消“先城镇后农村”等歧视外来务工人员在杭就业的其他规定,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所有行政性收费。在杭州,不分本市人员,还是外来人员,只要有求职意向,均可提供职业介绍,办理录用备案手续和劳动合同签证,缴纳社会保险。

2. 优化就业服务

1988年,杭州市成立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2003年,建立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并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建筑行业,开辟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的专门场地。同时,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前基础知识培训,通过组织观看教育录像片、发放外来务工人员求职手册、开展群体职业指导、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等多种形式,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求职能力和综合素质。2004年,对主城区15.76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就业前的基础知识培训。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作用,在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方面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与杭州城镇人员同样的就业服务。2004年,为外来务工人员举办免费的劳动力交流会11场,组织用人单位409家次,提供就业岗位1.2万个;举办免费的群体职业指导26场,指导计1000人次,并受理外来务工人员现场咨询,实行教、学双方互动,释疑解难。1998年至2004年末,通过外来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达16.72万家次,进入市场求职的外来务工人员130.37万人次,成功录用56.14万人次。

3. 加强权益保护

近年来,杭州市以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重点,制订一系列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外来务工人员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劳动保障权益,落实外来务工人员在职业资格、平等就业、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仲裁等方面的劳动权益保障。2004年5月至6月,杭州市开展以外来务工人员劳动保障权益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检查。对使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服务、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and 企业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全市共检查用人单位1014家,查处侵害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案件649件,补发拖欠工资及待遇116.39万余元,补签劳动合同17872份。^①

五、迁移政策改革财政支出的实证研究

(一) 杭州户籍人口与外来农民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差异计算

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住房待遇、子女受教育机会、职业培训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本课题主要从社会保障、住房待遇及子女受教育机会三个方面进行统计调查。

1. 社会保障

从杭州市近两年颁布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实施的文件来看,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养老、医疗、

^① 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调查组:《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解之题》,2005年1月。

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方面的待遇差别越来越小,户籍身份的差别逐渐不再成为社会保障待遇的障碍。政府越来越注重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提出的要求,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劳动者(包括城镇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其雇工、灵活就业人员、城镇自由职业者)、外来务工人员为参保重点,进一步扩大基本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

1998年开始,杭州市在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率先将农民工纳入职工基本保障制度范围。目前,杭州市建设以养老保险全覆盖为主要平台的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工,继养老保险统一制度后,工伤、医疗保险以及失业、生育保险均先后把农民工纳入范围,与城镇职工同等对待。凡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卫险和生育保障所规定的统一标准缴费的,不分城里人和乡下人,退休后或出险时所享受的待遇一律平等。^①

(1) 养老保险。2007年6月,杭州市政府明确“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目标和未来社会保障的工作方向。^② 针对农民工收入低、就业不稳定等实际情况,政府专门制订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③

杭州市委、市政府将养老保险种类分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征地农转非人员“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等几种保障类型。^④ 依据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农民工所对应的养老保险种类主要集中在第一、二类。对一般性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言,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职工是否参保以及保费的交纳主要取决于农民工或城镇居民的职工身份及人员所在的企业,而不再因户籍的不同而产生限制。^⑤ 特别针对参加杭州市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企业中收入偏低的农民工,又推出“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基本养老保险,使更多城市务工人员能够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

2008年3月,杭州市委办公厅公布《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实施细则》,对杭州市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运行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规定。其中,对城市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农民工“双低”养老保险做进一步说明,保障农民工参保的权利和利益。^⑥ 2008年1月1日起,杭州市降低农民工“双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2个百分点,调整单位养老保险征收方式,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和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至2008年7月末,市区农民工“双低”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09万人。^⑦

(2) 医疗保险。2007年10月,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将杭州660万市民和200余万外来务工人员覆盖到同一张社会保障网内。新政策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低筹资、保大病、保当期”的保障办法。农民工医疗保险筹资标准,为用人单位按上年省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按月缴纳3%,农民工个人不缴费。农民工医保不设个

① 详见《杭州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引导与保障机制》。

② 详见《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办法》(杭劳社险[2007]121号、杭财社[2007]335号)。

③ 详见《杭州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试行办法》(杭政[2006]46号)。

④ 详见《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市委[2007]43号)。

⑤ 详见《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市委[2007]43号)第二章第五、六、七条。

⑥ 详见《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实施细则》(市委办[2008]6号)第二章。

⑦ 详见 <http://www.taxchina.cn/xwzx/2008-08/26/cms664601article.shtml>, 杭州日报, 2008年8月26日。

人账户,普通门诊不纳入保障范围,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的保障待遇与职工医保基本一致。^①至2008年7月末,主城区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1824人。

根据《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杭州市的医疗保障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②各用人单位及在职职工、协缴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及退休人员均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城市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方面的平等性。^③此类医保费的缴纳主要由用人单位及职工本人承担,政府仅按参保人数及金额统一给予适当财政补贴,并不存在城市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支出的差异。^④另外,符合职工医保参保条件,且收入偏低的农民工可以申请参加农民工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缴纳,农民工不缴纳。此举显示政府对农民工医保工作的重视及扩大农民工参保覆盖面的决心。^⑤

2008年2月出台的《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城市农民工参加医保的相关细则。不论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护。^⑥文件对医疗保险险种的转换有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保农民工可按规定在城镇职工医保与农民工医保之间转换^⑦。

(3)失业保险(城市最低工资、最低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雇工,都应当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⑧凡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及1个月以上的临时工都必须参加失业保险。^⑨

(4)工伤保险。2004年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把工伤保险的对象范围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即各用人单位,而不是以户籍身份为界限来划分,^⑩即包括城镇居民和城市农民工在内的各企业职工都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具体来讲,杭州市颁布的几部法规条例也明确规定,包括城镇合同工、农民合同工、1年以内的合同工(临时用工)在内的所有本市职工都应参加工伤保险。^⑪针对各行业农民工的专项法规文件也相应出台,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进行切实的政策保护。^⑫

(5)生育保险。杭州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参加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的除外)、自收自支或

① 详见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10/17/content_6893609.htm,钱江晚报,2007年10月15日。

②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市委[2007]42号)。

③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市委[2007]42号)第二章第六条。

④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市委[2007]42号)第二章第八条及第十条。

⑤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市委[2007]42号)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

⑥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实施细则》(市委办[2008]4号)第二章第十四条。

⑦ 详见《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方法实施细则》(市委办[2008]4号)第四章第十九条。

⑧ 详见《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号)第一章总则。

⑨ 详见《关于失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杭劳险[2000]100号)。

⑩ 详见《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75号)第一章总则。

⑪ 详见《浙江省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浙劳险[1999]333号、浙财社[1999]123号、浙总工发[1999]97号),《杭州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杭劳险[1998]150号、杭财社[1998]372号、杭总工[1998]83号),《杭州市劳动局关于杭州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杭劳险[1998]166号)。

⑫ 详见《关于推进杭州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通知》(杭政办函[2007]148号)。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参加职工生育保险,为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职工生育保险费。^①

综上,城镇居民和城市农民工在五大社会保险中的待遇差别正在逐渐减小。据了解,当前在社会保障方面,杭州市当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的拨付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筹集,是专门用于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缴纳社会保险费、促进再就业工作而设立的专项资金。^② 杭州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主要组成为杭州市本地城镇居民,所以此专项基金实际体现了政府支出在城镇居民与城市农民工之间的差别。此外,最低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还没有覆盖到农民工。

2. 住房保障制度

城市住房体系由商品房和保障性用房两大部分组成。后者包括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经济租赁房(包括大学生公寓、人才公寓、外来务工人员公寓等)、廉租房等。符合有关条件的城镇居民家庭可申请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③

1999年起,杭州市正式实施经济适用房制度,至今共组织23次经济适用房公开销售,合计推出房源29786套,建筑面积266.03万平方米。^④“十五”计划时期,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累计投资98.82亿元,比“九五”计划时期增长4.6倍,年均增长34.2%,累计开工建设经济适用房和拆迁安置房783.95万平方米,向社会公开销售共19个批次,计191.39万平方米。^⑤

至2007年末,杭州市区累计发放廉租住房配租资格证1508张(其中:实物配租资格证444张,配租建筑面积约8400平方米,租金配租资格证1064张,补贴金额983.12万元);租金核减1327户,累计核减金额196万元。仅2007年,全年市区共发放廉租住房配租资格证521张(其中:实物配租资格证262张,租金配租资格证259张,补贴金额319.47万元);租金核减家庭新增74户,核减金额62万元。^⑥

在杭州,还没有农民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政策规定。^⑦

3. 子女受教育机会

2006年春季开始,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下发《浙江省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出台《关于杭州市逐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通知》,明确全市城乡实行

① 详见《杭州市职工生育保险方法》(杭政[2006]12号)。

② 详见《杭州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杭政办[1998]40号)。

③ 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为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具有本市市区常住城镇居民户口(不包括学生户口)5年以上(含符合杭州市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以下、家庭住房面积低于48平方米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或35周岁以上单身);廉租房供应对象为人均收入在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两倍(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左右)之内,且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或3人以上家庭住房建筑面积低于45平方米的家庭;廉租房供应对象为家庭成员中有一人以上具有杭州市区居民户口且实际居住、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人均房产使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家庭。

④ 详见 <http://www.zjol.com.cn/05biz/system/2007/09/14/008796306.shtml>, 浙商网, 2007年9月14日。

⑤ 详见 http://www.hzstats.gov.cn/webapp/show_news.aspx?id=4756, 杭州统计信息网, 2006年2月24日。

⑥ 详见 <http://news.sina.com.cn/o/2008-01-25/053313323414s.shtml>, 今日早报, 2008年1月25日。

⑦ 在福建、成都等地,符合条件的城市农民工也可申请经济适用房。

义务教育阶段免交杂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享受同城待遇。^①另外,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基金用于补助招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②2008年4月,杭州市政府出台针对农民工子女在杭就学的专门性文件,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经费保障机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③从2008年春季开始,浙江省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此前,浙江省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收取每学期小学300元、初中600元的借读费。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借读费和赞助费占浙江省农民工子女教育支出的三成以上。^④但是,在民办和国有民办学校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们需缴纳400元~800元/学期的学费。

(二) 外来农民工转化为杭州市户籍的政策成本

主要从社会保障、住房待遇和子女受教育三个方面计算。

1. 社会保障

根据最新的文件,杭州户籍人口与外来农民工除最低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再就业援助等3项政策以外,其他已经没有大的差别。

2. 住房

按目前杭州市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差价(以经济适用房价格3000元,同地段商品房价格8000元计算),一套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政府需补贴30万元。一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以每平方米每月补贴租金20元计,市财政每年需补贴租金1.44万元。

如果每年增加1万户农民工家庭(涉及受益和比较对象的问题,对象总量不同),按经济适用住房8000套、廉租房2000套计算,财政每年将增加支出24.24亿元。这还不包括居住公共配套设施和廉租房建设投入。

3. 子女教育补贴费用

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人数从2003年的5.84万人、2004年7.52万人、2005年8.95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0.50万人、2007年的12.39万人,每年需增加15所左右的中小学校才能满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需求。

从以上分析可见,实现杭州市迁移政策的改革需要巨大的财力作支撑。显然,根据现有的财力,无法全面实现迁移政策的改革。

六、城市迁移政策改革的思路

基本思路:逐步剥离与户籍相关的利益,降低户口“含金量”;同时,农民工以退出原户籍所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将规划留用地指标、农转用指标、基本农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等相关土地指标带到流入地城市作为补偿条件,从而获得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一是逐步剥离与户籍有关的相关利益,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由政府提供最低保障,原

^① 详见《浙江省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06]66号);《关于杭州市逐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通知》(杭正函[2006]11号)。

^② 详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杭政函[2007]245号)第二章第三条。

^③ 详见《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就学管理暂行办法》(杭政办函[2008]163号)。

^④ 详见 <http://www.hangzhou.com.cn/20080215/ca1454386.htm>, 杭州网, 2008年2月19日。

城市居民、外来农民工根据自己能力解决社保、住房等问题。

所谓户口“含金量”,主要是指城市户籍人口与非城市户籍人口之间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上的差异,特别是那些通过再分配方式,以人口户籍身份获得的社会服务差异。它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包括一系列相关劳动就业及福利保障制度相互结合的产物。

从长期来讲,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实现杭州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必须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配合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降低户口“含金量”。剥离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等制度,对户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把户籍制度变成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使户籍制度行使通常意义上的基本职能,而不是用于识别“身份”。实现这一根本转变,使户口不再与一系列福利待遇关联在一起,有利于结束目前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保证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降低户口“含金量”的措施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改革。

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显现作用的市场机制的调节,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发育的过程。户口“含金量”越小,获得公共资源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户籍制度改革就越容易,反之则愈加困难。因此,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需要在相关领域进行充分改革。^①

二是农民工以退出原户籍所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将规划留用地指标、农转用指标、基本农田指标、占补平衡指标等相关土地指标带到流入地城市为补偿条件,从而获得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农民工取得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户籍身份后,其未成年子女可一并迁入,其父母(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在农村没有赡养人的也可迁入,转为城镇居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做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价值的最大化,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快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流入地城市可以把农民工带来的用地指标落实到实物形态的土地上,转换为本地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土地开发建设弥补解决农民工问题所需的城市发展空间、城市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收入,使迁移政策的改革具有现实可行性^②。

七、迁移政策改革的近期措施

(一) 近期目标

至2015年,应逐步缩小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根据外来农民工的需求层次与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促进在杭外来农民工“部分市民化”。

在杭农民工的“部分市民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根据杭州市经济发展状况,每年将一部分外来农民工完全转化为居民;二是对那些够不上完全转化为杭州居民的外来农民工,根据他们的需求层次,分轻、重、缓、急,逐步满足他们对城市公共产品的需求。

改革迁移政策,努力促进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对于杭州这样一个沿海地区的城市来说,存在着大量的外来农民工,要在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之时,将原本专属于市民的公共资源完全平等的在农民工和原有城市居民间配置是不

^① 蔡昉、都阳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三联出版社,2004年。

^② 赵立航:《社会和谐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4期。

现实的。因此,政府在分配公共物品时必须有所取舍,应按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程度,结合城市的供给状况,陆续消除对农民工的种种歧视和限制,最终给予农民工同等的市民待遇,使他们真正转化为城市人口。

(二) 主要措施

1. 按照农民工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同层次,逐步满足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按照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不同阶段,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做一定的区分。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初期,首要满足的是他们最基本也是最低层次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在城市至少不会无法度日。所以,笔者认为应该给予一次性实现农地转让的农业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以保障他们最低的生存权。当然,对这部分人的低保可以区别于市民而独立设线,以防止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寻求低保的庇护。各地可以结合当地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设立不同的低保线。

另外,考虑到农民工大量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性质,必须首要满足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的需要。同时,这类保险相较养老保险需要缴纳的保费较低,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改革的难度较小。众所周知,农民工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工作环境差、强度大、危险性高,所以工伤和医疗保险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否则,在城市一旦患病,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水平而言,高昂的医疗费用必然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并且产生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另外,由上文的讨论可知,在实施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还应逐渐融入特定病种门诊的医疗支持。

通过本阶段的各项努力目标和措施,扩大城市农民工参加社会基本保险的覆盖面,满足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使农民工在城市能够得到最低生活的保障,伤有所赔,病有所医。而另外两项与迁移政策改革进程息息相关的指标——住房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在本阶段将服从于社会保障的发展和实现。

2. 设置一定的门槛,促进一部分外来农民工转化为杭州市民

根据财政承受状况,设立取得杭州市户籍的条件,先让一部分农民工转化为杭州市民。对于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不仅需要考虑到农民工这一需求方的特点,还需要考虑城市这一资源供给方的现实状况。由于各类城市经济实力、社会功能的不同,在提供城市公共资源的路径上,各等级的城市也应该区别看待。因此,还需要配合户籍制度的开放与限制作用,建立适当的“门槛”来有效引导人口的有序流动。因为无限制的人口流入必然会对城市的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社会福利等资源和城市环境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无保留的废除户籍制度,给予农民与市民一视同仁的权利,必然导致人口过度涌入城市分享资源,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承受的。每个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设置不同的人口准入界限,将达到一定教育程度、有固定收入、有固定住所、在城市工作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到城市保障体系中去,并且逐步实现他们市民身份的转变。

由于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程度不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别不同的城市等级,设置不同的“门槛”,有层次地解决为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资源的问题。

杭州市可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状况与外来农民工的总量,以外来农民工的工作年限为参考指标,制定外来农民工转化为杭州市民的条件,确定每年一定数量的转化比例。

3. 不断缩小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

迁移政策改革的难点在于本市市区居民与外来农民工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差异。在城市中,外来农民工与市民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在公共服务上的

差距。如果城乡间公共服务上的差距没有了,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也就不存在了,迁移政策的改革就变得十分容易。因此,不断缩小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才能更有效地推进迁移政策的改革。

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逐步消除城乡居民之间保障待遇的差别,特别是在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养老保险等制度上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1) 要尽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一,要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为更好地贯彻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应调整中央和各级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而且把增加投入部分重点投入到农村,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社会保障法》。首先,是要抓好单项法规的建设,如农民养老保险法、农村扶贫与救济社会保险法、农村残疾人保险法、农民医疗社会保险法、农村工伤社会保险法等。其次,是要抓好地方性法规的建设,鼓励与提倡各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保障办法,比如为进城务工人员分类提供社会保障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建立合理的保障基金筹措体系。要坚持“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增加集体投入,通过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经济来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加大国家投入,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的投入。

(2) 要推进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围绕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应大力推进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第一,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新增卫生投入到公共卫生的政策,保证投入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幅度,并将公共卫生工作成绩列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内容加以管理,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投入的责任,改善服务水平和质量。

第二,积极稳妥地扩大新型合作医疗的覆盖面,逐渐提高农民大病医治的报销比例,降低直至取消“门槛费”,同时要将更多精力放到农民的小病医治和大病预防上,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整合卫生资源。可以以人口计生网络为平台,实现乡镇卫生院与计生网络资源共享。从技术层面看,农村卫生部门与人口计生网络的服务是比较接近的。卫生系统可以定位在国有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医疗秩序维护和医疗市场监管、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制(包括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而人口计生网络的定位则主要体现在农村预防保健与公共卫生。

第四,加强执法监督,规范医疗服务市场和行为。强化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能,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体系和奖励机制,加强用药安全和医疗安全,防止逐利行为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对居民健康的损害。

据人口流动的托达罗模型阐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和城市就业机会。根据这一理论,城乡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化也使得迁移政策的改革进程较慢。因此,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方面加大投入和倾斜政策。要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各项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切实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保证劳动力流动的有效性。

在本阶段,农村争取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的发展重点是:建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八、迁移政策改革的中远期设想

(一) 中期目标

到 2020 年,完全实现外来人口的同城待遇。

党的十六大专门划出 21 世纪的前 20 年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值包括:城镇人口比重 60%,城乡居民收入比低于 2.8:1,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 80%,人力资源得到更好开发。

具体到每个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社会保障的完善使得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有必要进一步考虑他们如何在城市稳定生活、实现个人成长的问题。给予子女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是农民选择进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三农”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人”的问题。只有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享受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个人资本不提高,即使进入了城市,也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因此,要满足农民工健康保健和卫生服务的需要,以保障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培养,进一步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所以,必须对进城农民本身实行教育培训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农民素质的提高直接关系到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快慢。因此,政府必须多渠道地开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要监督和引导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适时的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同时,职业技术学校要针对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设置有针对性的课程,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农民工能较快地在城市立足和发展。另外,对于农民工子女享受教育资源的种种歧视,势必影响下一代人口的城市化转移问题。因此,为了这部分流动人口个人发展的需要,城市政府应逐步取消“借读费”等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以“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地吸收农民工子女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就学。对于民工子弟学校,要加强规范管理,动员师范院校的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提高教学水平,保证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的实现。

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要保证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既是农村义务教育稳定发展的目标,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地区贫富差距的手段。让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儿童都能获得大体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重要途径,是公共服务提供均等化的重要体现。要完善相关政策,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一是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的义务教育制度。要继续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达到基本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目标;要建立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农牧区和山区的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行教育工资保障机制。

二是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使农村后备劳动力资源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加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

收入。

三是尽快完善和健全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措施。把“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从政府文件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为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以县域为中心,面向农村基础教育,具有区域性服务功能的教育评价制度。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城镇体系宏观布局不合理,大、中、小城市比例不协调,中等城市和小城镇数量明显偏少,分别占全国城市的30.5%和56.4%。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对中小城市应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逐步扩大这些城市的规模。对于流入小城市群(县城)和中等城市群(地级市)的农民工,应放宽他们的入户条件,对于有合法收入和稳定住所的农民工,应尽早发放城市户籍,甚至可以尝试一体化的居民户口,根据城市的财政能力,让他们更多地享受到城市福利。

总之,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在农民工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应该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并保证农民工子女享有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免除城市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最终融入城市、转化为城市市民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前一阶段小城镇放开农民工准入限制的基础上,加大中小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以吸纳更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加速劳动力在城市与农村间的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

(二) 远期目标

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从21世纪开始到2050年,中国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阶段,城市农民工应该已经完全融入城市及转变为城市市民。

当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不断增强后,那些适应了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会希望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为了满足农民工这一阶段的需要,需要将养老保险覆盖到这一阶段的农民工中去。土地曾经作为农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保障,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真正离开土地,长久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养老保险,使他们即便将来不工作了也老有所依,不必再返回农村。另外,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在这一层次的需求上,应该给予这部分农民工与市民相同的住房优惠政策,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在城市扎根下来,最终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

从城市类型的层次上讲,对大城市群(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包括国际大都市、直辖市)要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订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具体来讲,首先,第一步是要将“蓝印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其次,对从事纺织、机械、电子、化工等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工人敞开城市户口大门。最后,才对已经有工作岗位和住所的“流动人口”实施户口转移。

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将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民工将完全融入到城市体系中去。公共服务在全民范围内将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均等化。不论在城乡之间,还是在城市中的不同阶层之间,将享有相同完善的公共服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

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态势 及其对策研究

一、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发展演变状况

(一) 中共十七大报告政策导向及全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并明确政府的政策导向是让个人拥有财产普遍化。这意味着政府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将拓展更多的渠道与路径,提供更多的平台与机会,创造条件让老百姓提高自身的理财水平,并促成家庭收入多元化。由此,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黄金理财时期。这一举措将使更多的居民可以合情、合理和合法地拥有财产性收入。

一般而言,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还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涉及各种投资,比如实业投资、金融产品投资,涵盖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在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经不是唯一的来源。随着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投资理财逐渐成为其未来致富的一大“法宝”。

表 1 1990 年—2006 年主要年份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占比情况表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1510.2	4283	6280	10493	11759.5
	财产性收入(元)	15.6	90.4	128.4	192.9	244.0
	财产性收入占收入比重(%)	1.03	2.11	2.03	1.70	1.92
	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速(%)	—	95.89	8.40	10.50	26.49
农村	居民纯收入(元)	686.3	1577.7	2253.4	3254.9	3587
	财产性收入(元)	—	41	45	88.5	100.5
	财产性收入占收入比重(%)	—	2.59	1.99	2.71	2.80
	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速(%)	—	—	1.95	19.33	13.56

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整理。

随着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股票、基金和房屋出租已成为城镇居民

的主要投资渠道。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财产性收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4元,比2002年增长139.2%。这一增速不仅大大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52.7%),而且也大大超过同期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速(52.8%)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速(44.7%)。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的来源也逐步趋向多元化,收入构成出现新的变化。在2006年城镇居民的全部收入中,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占68.9%,比2002年降低1.3个百分点;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2.8%,比2002年下降1.7个百分点。经营、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其中,经营净收入占6.4%,财产性收入占1.9%,分别比2002年增长2.3个和0.9个百分点。

由表1可知,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虽然比重小,但呈快速增长态势。

(二) 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态势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居民财产的增加,杭州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出现持续快速增长,财产性收入正成为市区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据杭州市城调队对市区600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市区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18816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6760元。2007年市区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24475元,比上年增长14.5%,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89元,比上年增长14%,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1%。2006年市区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476元,同比增长24.5%,增幅是家庭总收入构成中最高的,其中利息收入增长47.5%、股息与红利收入增长35.9%,保险收益增长25.7%。2007年市区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84元,同比增长28.4%。

从市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看,各类投资收入均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其中保险收益增长77.8%,股息与红利收入增长38.3%,利息收入增长22.3%,其他投资收入增长18.7%。在市区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用于存款、债券及购买股票等资金形式投资的存款利息和股息红利收入增长迅猛,人均收入103元,同比增长达90.1%。同时,近年来杭州楼市的大幅升值,使得居民出售住房及收藏品等其他投资的净收益显著增加,比去年同期人均增加59元。房东收入也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为121元,同比增长41.7%。

表2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及其构成情况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总收入	5467	6326	6670	6968	7765	9874	10206	24474
工资性收入	2284	2810	3219	3579	3887	4317	4772	16293
经营收入	2640	2860	2732	2937	3456	4331	4493	2027
转移性收入	349	447	416	280	237	621	555	5570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194	209	303	172	185	605	386	584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117	166	213	218	250	586	1138	1137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2007)》及市统计局综合处。

随着证券、房地产等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幅居各项收入之首。调查显

示,由表2可知,从杭州市居民收入增长构成看,财产性收入增幅居首,单位发放的工资及补贴收入则对居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

杭州市居民家庭运用资本投资逐渐趋于成熟,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渠道日趋多元化,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杭州市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构成发生显著变化,股息红利增长最快。财产性收入增长快于可支配收入增长,可支配收入越高,财产性收入越多,说明杭州居民比较注重资本投资收入,在资本运用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利息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居民理财观念开始由注重储蓄向注重资本运用转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利息收入比重大幅下降,其他收入比重直线上升。股息和红利收入增长最快,居民投资渠道日趋多元化,开始注重资本投资、企业入股、股票和国债等证券,以及分红型保险、外汇市场等。资本投资带来财产性收入大幅增长。

二、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的效应与问题

(一)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先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制度环境。一般来说,如果群众较少拥有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和让渡的权利,那么财产性收入本身就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私有产权的有效界定和对个人拥有财产权利的承认及保护是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先决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有产权已经初步得到社会认可和法律保护,这就为群众提高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充分条件。

另一方面,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经过快速的资本积累阶段,经济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传统企业的劳动要素边际利润越来越低,同时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小,盲目地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已不是明智之举,而加大资本要素的投入正是不少企业的即时之需。同时,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群众的私有财富也获得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不少资本积聚在民间。因此要实现生产继续快速高效地运转,就必须刺激这些资本要素的所有者积极、自愿地将其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这就需要控制投资风险,给予相应的收益回报,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否则,生产活动就可能会得到抑制,从而制约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地发展。

(二) 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社会经济效应

1. 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

改革开放伊始,由于技术落后和资本匮乏,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很多杭州企业的首要选择。随着整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杭州不断涌现出各类优秀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毫无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已初具规模。企业这时再单一增加劳动投入势必将遇到发展瓶颈,相反加大资本要素将会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比,改善企业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从国外先进国家经验看,技术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往往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此,利用好居民的资本投入将会有效地推动杭州企业的研发进程,从而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企业的融资方式来看,让居民的财产直接投入到生产当中去,将改善杭州企业融资方式不平衡的问题。根据杭州市金融办的统计数据,2006年杭州市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7.34%,这不仅低于成熟市场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直接融资是通过股票或者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具有成本低、风险分散等特点,而间接融资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筹

集资金,成本高,风险集中,并且会产生很多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创造条件让居民的财富参与到企业的直接融资中去,将会拓宽直接融资的资金来源渠道,改善企业融资结构,降低相关交易成本。

2. 有效分散金融系统潜在风险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晚,整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融资手段仍然较为单一,因此不少杭州企业融资时的中长期资金主要通过银行配置,造成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比例居高不下。根据杭州市统计信息网的数据显示,2007年末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8430.6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2%,中长期贷款依旧占有较高比重。虽然杭州各类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但是防范由于中长期贷款过多造成存贷款期限错配的潜在风险始终是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

除上述原因之外,银行的存贷款期限错配风险不仅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相关,也与杭州目前的高储蓄率相关。2007年末,杭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9310.9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8.1%,存贷比为110.4%。根据成熟市场的经验,中长期投资稳定的资金来源是通过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这一方面需要在资本市场上有优质的股票供给和债券发行;另一方面也需要拓展渠道,让更多群众积极投身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理财方式中去,从而降低银行过剩的流动性,分散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

3. 使更多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在让更多群众拥有一定财产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让群众的财产不断升值,使更多群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群众理财方式的多样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市场的活跃,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就更容易。否则,资本市场低迷,企业在国内融资困难,不少优质企业不得已只能去海外上市,使群众不能从资本市场中分享本地区经济发展成果,也会制约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三) 提高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财产性收入提高的大众化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提出了财产性收入的概念,还强调财产性收入的广泛性。后者涉及收入分配领域,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此有明确地表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然,目前财产性收入的初次分配是不均等的。根据杭州市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7146元,仅为平均值的1/3。因此,为了让更广泛的杭州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首先在初次分配中需要多考虑分配公平问题。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2006年和2007年国内的资本市场、楼市房市处于快速膨胀状态,但是根据对杭州市居民抽样调查的结果,43%的居民没有参与到资本市场的投资当中,56%的居民没有参与到房产的投资当中。这其中固然有风险等因素的考虑,但是较低的可支配收入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所有居民都有投资渠道,但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只对一部分人有利,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因而,有必要采取完善投资机制等措施,既要保证投资能广泛参与,又要保证有广泛的收益,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最终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

2. 财产性收入提高的多样化

问卷调查显示,杭州居民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需求。如果在资本市场中有足够丰富的金融产品,人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富水平和风险收益偏好进行有效配置。总体来说,对于中高收入者和高风险偏好者而言,偏向于选择风险较大,期望收益较为丰厚的股票、基金、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而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风险厌恶者而言,则偏向于选择更为保险的债券类理财产品或者是更加基础性的理财产品。

虽然杭州居民对金融产品种类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但是在当前金融市场上,针对这种多样化需求提供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环节非常薄弱,导致居民无法选择符合自己风险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这无疑成为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壁垒。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尽快完善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加快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债券等在内的市场发展,同时也需要杭州市金融职能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创造条件,为群众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提供更多便利的渠道。

3. 财产性收入提高的低风险化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理财并不是要追求最高的收益,理财是根据每个人的风险收益偏好、家庭结构、人生不同生命周期来进行相应的匹配和安排,只有最适合的理财方案,而没有最好的理财方案。所以,“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时,不应该忽视“条件”的风险,在“创造”时要注重投资的低风险化和层次化,从而合理引导居民理性投资。事实上,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在目前环境下,既能应对通胀压力又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受到最多群众的欢迎。然而,在现实市场上,该类金融产品往往酝酿比较大的风险,这预示杭州相关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创新上,要以市场需求为依托,在“创造条件”时注意财产性收入提高的低风险化。

当然,低风险化的控制不仅仅取决于金融产品本身,还必须要有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问卷调查显示,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且往往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产品密切相关。因此,要想保护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必须保证这些资产相对稳定的趋势,防止资产价格在短期内大起大落。对资本市场信息要有效监管,包括要求上市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及时、准确披露相关信息等等,防止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这不但需要国家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严厉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而且还需要地方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地域优势,积极有效配合,保护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安全性。

三、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的因素

国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化和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居民通过投资来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收益。收入的增减、储蓄投资比例的变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一) 收入增长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源泉

财产性收入增长是收入增长的组成部分,收入增长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源泉。财产性收入的多少,首先和居民手中持有财产的多少直接挂钩,而财产源于收入的积累,财产的多少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多少。居民财产是个存量的概念,它的形成是历年居民资产增量的累计。财产性收入比重的高低与收入水平高度相关,财产性收入的形成来自于财产,而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一般来

自于劳动收入的节余。因此,工资收入水平越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就越高,比重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杭州市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给杭州市城乡居民带来收入的快速增长,从而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条件。

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和不断增加的居民财产总量,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根据杭州市统计年鉴资料,2007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549元,比上年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3%。同时,2007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89元,比上年增长1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1%。城镇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构成也发生变化,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稍有下降,财产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2007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137元,比2000年的117元增长了近10倍;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2000年的194元增长至2007年的584元。财产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基本上是稳步增加,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速也基本呈增长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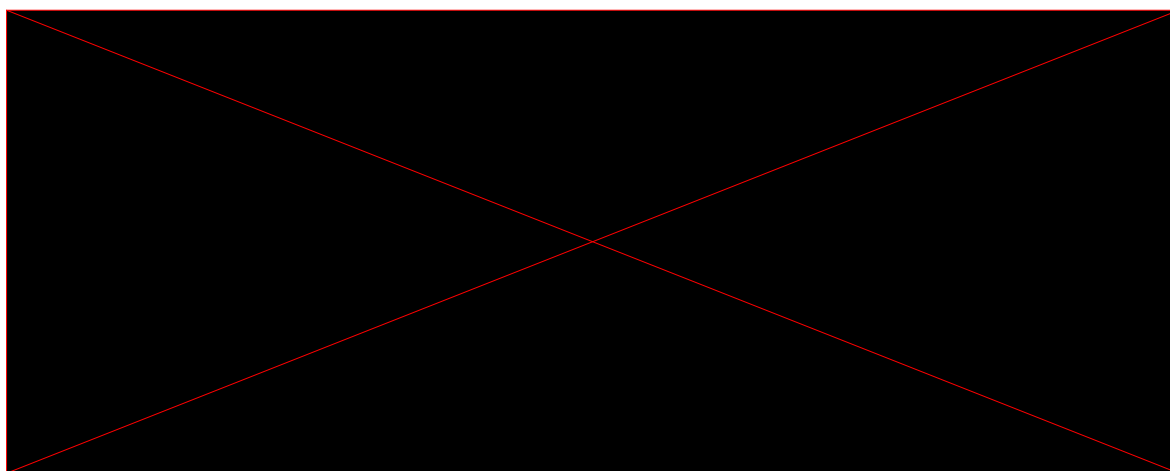


图1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可支配收入走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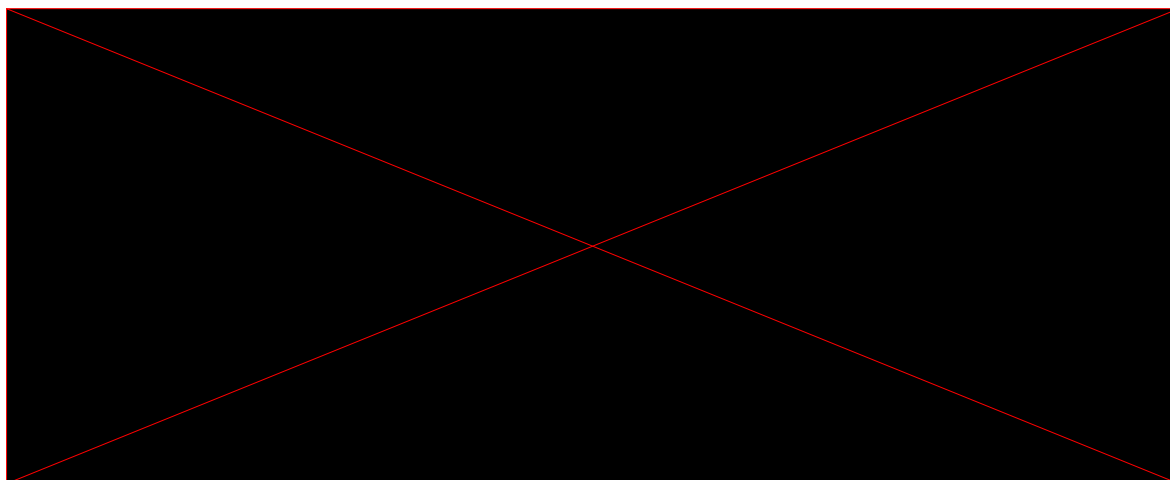


图2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总收入走势图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基本上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具有相当程度的线性关系。城镇居民 2000 年至 2004 年财产性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关系高度相关,走势基本吻合;而从 2005 年至 2007 年的关系图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不仅与城镇居民的高收入有关,也与城镇居民可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有关。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走势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在不考虑 2005 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这个异常点的情况下,走势也是基本吻合的,尤其是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走势更体现了这一点。

(二) 消费与“储蓄”比例变动影响财产性收入

这里的“储蓄”,采用广义的居民储蓄概念,将其界定为实物性储蓄和金融性储蓄两种具体内容。实物性储蓄主要包括住宅建设和购置、耐用消费品的购置、收藏古董字画及其他实物储蓄形式;金融性储蓄主要包括银行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保险保费及金银等其他金融储蓄形式。储蓄即为收入形成并用于消费后的剩余部分。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主要取决于储蓄的积累。在经济生活中,居民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其实质就是对收入的分配。居民会不断就储蓄消费比例进行调整,从而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结构以及金融资产组合进行抉择,消费与储蓄比例变动会影响财产性收入。

在通常的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财产性收入的获得体现为收入按照边际储蓄倾向转变为储蓄所带来的未来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变动比例决定了在现有收入下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数,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现象为财产性收入的变动提供了条件。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杭州市也是如此。凯恩斯的消费—储蓄假说认为,居民当期消费支出是由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的,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重下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一定收入下,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长,互相对立的。如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的货币收入不变,消费支出增加,则储蓄会减少;反之,消费支出减少,则储蓄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反比例变化。若有更多比重资产或收入用于储蓄,储蓄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1979 年至 1987 年,中国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1987 年以后,人均收入迅速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长的速度与收入基本相当。无论其他变量如何变化,中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据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的测算,1978 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比发达国家储蓄率高出 10 余个百分点,高储蓄率为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从图 3 可以看出,杭州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每年都呈上升趋势。2007 年末,杭州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 2634.83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3.1%。居民的高额储蓄积聚了可以带来财产性收入的财产。同时,杭州市居民的储蓄资产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据调查问卷显示,2007 年很多居民把原本用于银行储蓄的资金投资于其他更为丰富的理财产品,以获取更高的财产性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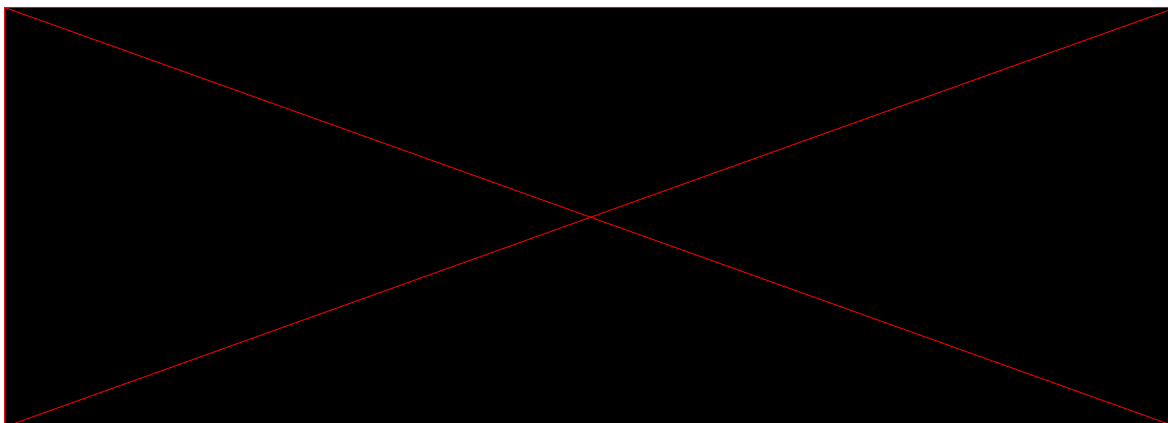


图3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从图4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后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收入的情况。整体看来,杭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呈增长趋势,但是消费收入比,即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5年起,消费比重下降趋势增强,20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6年增长2662元,但是人均消费支出却只增长424元,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一定会增加杭州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调查问卷也证明了这一结果。被调查居民普遍反映,由于现在收入和生活已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更多的资产不是用于提高消费水平,而是怎样进行保值升值,于是提高了整体的财产性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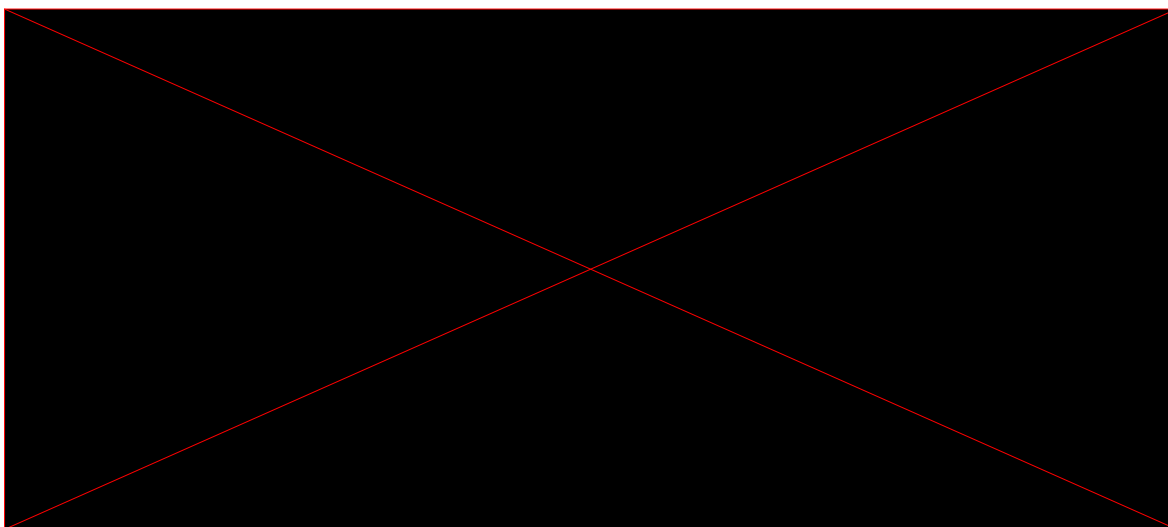


图4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变化

(三) 金融市场的发展为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条件和渠道。要让财产能够产生未来收入流,必须把个人拥有的财产转化为资本。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居民财产性收入

的前提。财产性收入涉及各种投资,除实业投资外,还包括投资金融产品,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金融市场逐步成为创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财产性收入的迅速增长与个人投资渠道的拓宽、资本市场的活跃密切相关。近几年,杭州市金融市场发展十分迅猛,直接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发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居民财产的配置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财产品。居民通过金融资产组合,选择不同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居民参与程度越深,持有的金融产品数量和种类越多,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就越大。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为优良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工具,促进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近几年,杭州市金融市场取得长足发展,杭州成为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据最新统计,杭州市金融总量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之后,排在全国城市第5位,已相当于国内中等发展程度的一个省的金融总量。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位于庆春路。这条杭州繁华的“金融街”,目前已云集100余家金融机构,聚集浙江80%的省级银行总部,平均每15米就有一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杭州市居民理财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产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居民手中拥有的储蓄存款、证券资产、保险资产逐渐增加,居民金融资产结构随收入的增长不断调整,金融资产多元化的趋势明显。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不断高涨。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杭州市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来债券、股票和保险在居民资产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被调查居民普遍认为现在的金融投资产品越来越丰富。

(四) 经济增长是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根本保证

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先是要让他们拥有财产。但是,财产的拥有还有赖于经济发展,唯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为人民群众的财产增加创造良好的基础。因此,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保持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杭州市居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源泉。

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通过经济的增长,带动群众收入的增长;通过收入的增长,累积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样,更多的群众才能够拥有更多的财产,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群众才能够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才能为更多的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提供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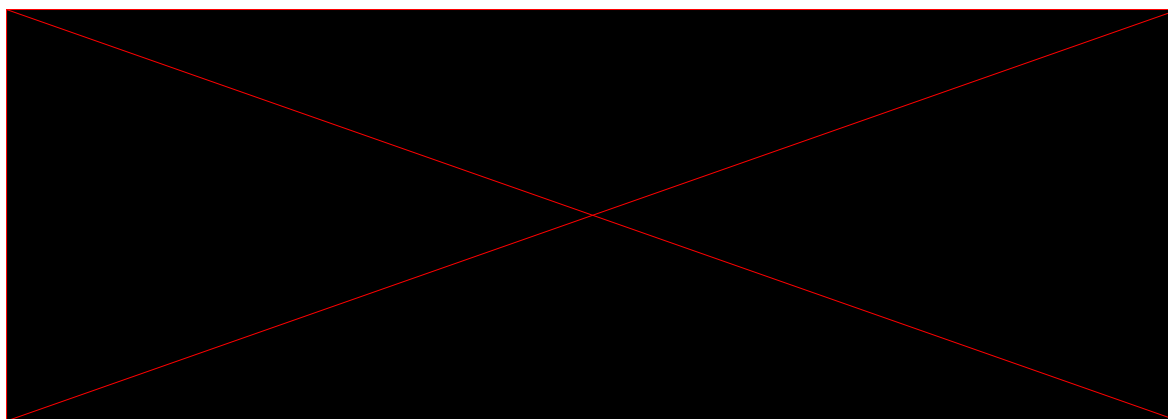


图5 2000年—2007年杭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

随着杭州市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 GDP 高速增长,总产出不断有质的飞跃,为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奠定坚实的基础。2000 年,全市生产总值为 1383 亿元,至 2007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103.8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4.6%,比 2000 年翻了约两番,连续 17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为 52638 元,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为 61313 元,分别增长 12% 和 13.6%,按国家公布的 2007 年平均汇率计算,分别达到 6922 美元和 8063 美元(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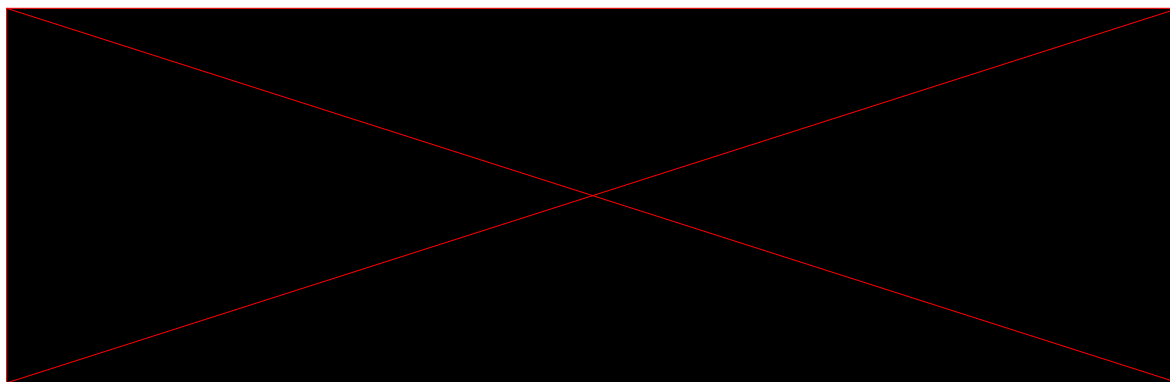
可以看出,杭州市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普通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基本保障和先决条件。杭州市政府不断创造条件让他们从最根本的方面参与经济发展,成为各项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除劳动报酬以外,还有机会得到经济增长总成果的分享,无疑有助于提高国民整体福利,也是遏制和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途径。

四、杭州居民财产性收入发展的比较分析

(一) 财产性收入的国际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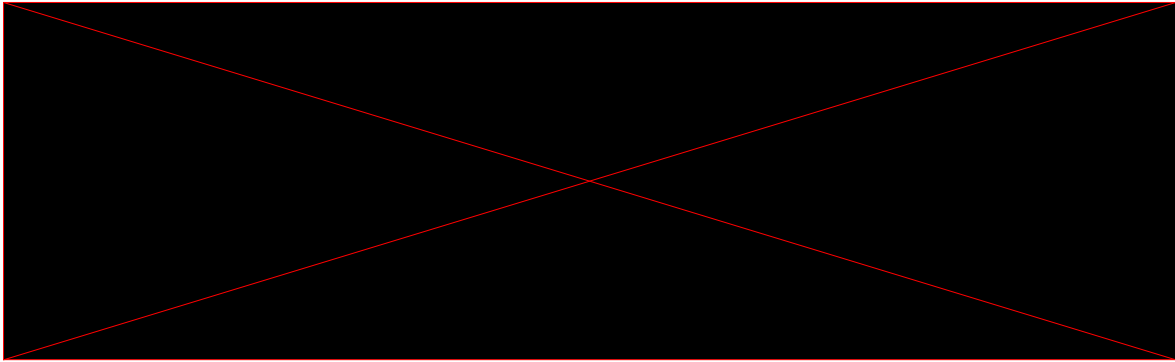
1. 以美国为例阐述应重视财产性收入与投资层次化

美国居民个人财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红利等资产收益及房屋租金收入。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07 年,美国个人财产性收入总计 11.66 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利息、红利在内的资产收益为 1.95 万亿美元,仅次于劳动者报酬,居第二位;租金收入为 654 亿美元。1987 年至 2007 年的数据显示,劳动者报酬呈逐年递增趋势,从 1987 年的 2.75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7.85 万亿美元,始终占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见图 6)。但该比例一直处于上下窄幅波动态势,1988 年达到最高比例 69.76%,1996 年达到最低比例 67.28%,2007 年的比例为 67.34%(见图 7)。包含利息、红利和租金收入在内的财产性收入稳中有涨,其占个人收入的比例维持在 16%~20%。在财产性收入中,利息收入所占份额最大,由 1987 年的 6049 亿美元上升至 2007 年的 1.15 万亿美元;红利收入次之,由 1987 年的 1122 亿美元上升至 2007 年的 7925 亿美元。尽管利息收入数额较大,但其与资产收入的比例却出现下降趋势,从 1987 年的 84% 降至 2007 年的 59%;红利收入与资产收入的比例则由 16% 增长到 41%,增幅达 25%(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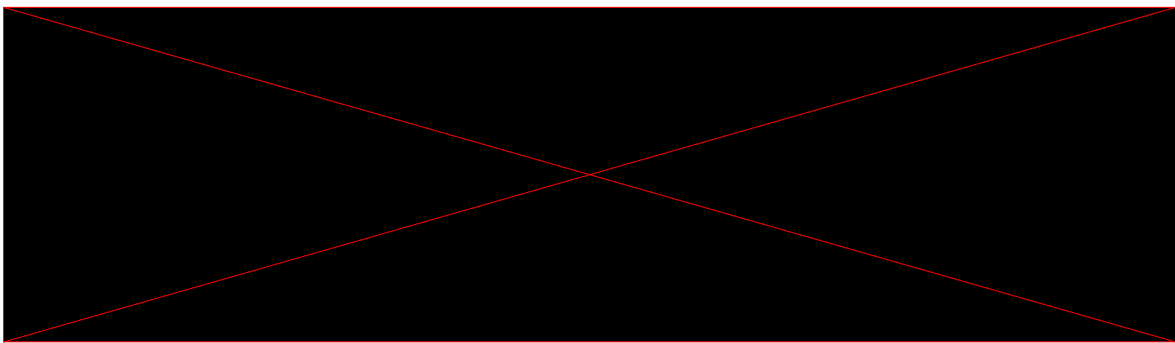
说明:数据整理自美国商务部网站 www.bea.gov,劳动者报酬对应左轴,其他对应右轴。

图 6 1987 年—2007 年美国居民个人收入分类结构



说明:数据整理自美国商务部网站 [www. bea. gov](http://www.bea.gov), 劳动者报酬/个人收入对应左轴, 财产性收入/个人收入对应右轴。

图 7 1987 年—2007 年美国居民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与个人收入比



说明:数据整理自美国商务部网站 [www. bea. gov](http://www.bea.gov)。

图 8 1987 年—2007 年美国居民利息收入、红利收入与资产收益比

美国居民在投资方面非常注重层次化,通常在进行保障性投资的基础上再进行积累性投资。所谓保障性投资指购买保险,投保内容十分广泛,如房屋、汽车、人寿、医疗、养老、教育等。积累性投资则指购买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以及投资房地产等。美国家庭的保险意识很强,一般首先购买保险,而后才将剩余财力进行积累性投资,以此获得财产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共同基金。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现约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共同基金之所以受美国家庭的青睐,一方面,人们认为共同基金的市场业绩较为优异;另一方面,能够回避直接投资股票的高风险。其实,美国居民极具风险意识,一般当投资额度较大时,他们会找投资顾问咨询和指导,而得到规范的顾问服务是非常便捷的。当人们找到合意的理财顾问机构后,理财顾问会根据客户的实际财力状况,提出合理的投资计划,同时让客户充分了解投资风险。

由此可见,家庭在进行投资时要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注重投资层次化,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适的理财计划。

2. 法国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房产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

在法国,购买房产出租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方式,除能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收益以外,还可以通过享受税收减免和抵扣等政策获得额外好处,由此获得更丰厚的财产性收入。法国政府为缓解大城市的住房压力,历来鼓励私人购房用于出租。因此,法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善的房屋租赁市场,且城市越大,租房比例越高。

另外,法国历任住房部部长都曾对相关税费优惠办法做出调整。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规定,不论是低租金住房,还是非低租金住房,房屋出租者的收入都是纯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现行税法则规定,房东支付的物业管理费和贷款利息,可以在其报税总收入中以相同金额扣除,余下部分才缴税。这些措施基本都遵循一个共同原则:在国家确定的开发区内,用税收杠杆鼓励购买新房。国家通过税费减免和抵扣来减轻购房者的资金压力,2007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罗比安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根据新法,购房者可在9年内享受房价50%的折旧减税。其具体规定是,在房主申报租金收入时,购房的头7年内每年从其房租收入中扣除购房款的6%后再计税,后两年该比例为4%。如果房租收入低于应扣除部分,那么两者之差还将在报税的总收入中扣除。实施如此的减税措施,房租收入高固然很好,即使房租收入不理想,也可以通过税收等方面得到优惠,弥补房产投资损失,有助于财产性收入累积。

3. 阿根廷减税帮助低收入民众积累财富

2007年末,阿根廷议会通过政府提交的一项议案,对个人资产税的征收进行大幅调整。通过此次调整,中低收入阶层得以减免个人资产税,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资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阿根廷政府希望通过此次税收政策调整帮助中低收入民众积累更多的个人财富,同时加重富人的税赋负担,通过税收杠杆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阿根廷目前实行的个人资产税缴纳办法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将10.23万比索(当时美元和比索汇率为1:1)定为免税额,即个人总资产(包括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所有资产)小于等于10.23万比索,可以免交个人资产税。个人总资产在10.23万比索以上再根据资产多少按照不同的税率纳税。例如个人总资产达到20万比索,扣除10.23万比索的免税额后,剩余资产按照0.5%的税率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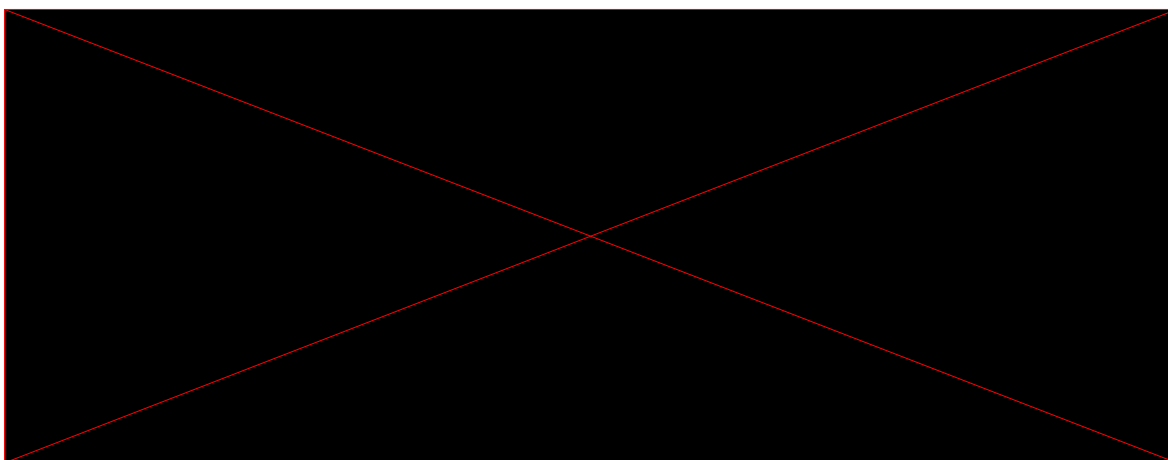
2001年,阿根廷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比索汇率大幅贬值,加上通货膨胀逐渐加剧,在阿根廷拥有10.23万比索个人资产已经比较普遍,一些中低收入阶层虽然收入不高,但因个人资产已经超过免税标准,也不得不纳税。相反,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需要缴纳的个人资产税税率并不高多少,而且同样享受对10.23万比索资产免税的待遇。为此,阿根廷政府调整个人资产税征收方法,个人资产税被取消免税额,起征点提高到30.5万比索;税率采取累进制,个人资产越多税率越高;个人资产在30.5万比索到75万比索的,缴纳0.5%的个人资产税;资产在75万比索到200万比索的,交纳0.75%的个人资产税;资产在200万比索到500万比索和500万比索以上的,个人资产税的税率则分别为1%和1.25%。采取新税制后,阿根廷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资产税得以减免。

税收政策必须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少对中低收入阶层征税,鼓励他们积累财富,壮大中产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和监管力度,对偷税和逃税行为进行重罚,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无疑,阿根廷的这次个人资产税征收调整从一定程度向着这一目标靠拢,也对其他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国家在有关保障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上起到示范作用。

(二) 财产性收入的国内比较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和居民财产不断增加,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出现持续快速增长,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2007 年前三季度,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快,人均财产性收入 476 元,同比增长 24.5%,增幅是家庭总收入构成中最高的,其中利息收入增长 47.5%,股息与红利收入增长 35.9%,保险收益增长 25.7%。

单位发放的工资及补贴收入仍是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2007 年 1 月至 9 月,市区居民人均工薪收入 12601 元,同比增长 13.0%。随着杭州居住环境及个私经济创业氛围的不断改善,居民的经营性净收入出现较快增长。2007 年 1 月至 9 月,市区居民人均经营性净收入 1550 元,同比增长 14.3%。近年来,杭州市多次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及节日补助的发放标准,放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亲友及居民间的赡养和馈赠也随着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出现明显增长。2007 年 1 月至 9 月,市区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4190 元,同比增长 19.5%。



说明:数据整理自杭州市统计局网站(www.hzstats.gov.cn)相关公报。

图 9 2000 年—2006 年杭州市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家庭总收入比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杭州市居民家庭总收入平稳增加。其中,财产性收入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几乎每年呈现递增趋势,特别是 2005 年和 2006 年,同期增长率分别达到 1.34 倍和 0.94 倍。而其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出现相似的态势:2000 年至 2004 年,所占比重在 1.5% 附近,2005 年这一指标飙升到 3.12%,2006 年上升到 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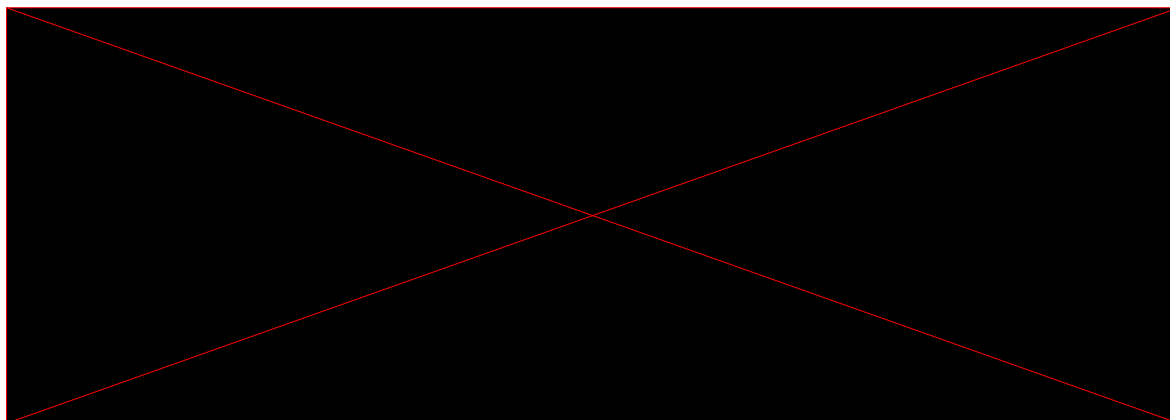
以下就浙江省以及位于长江三角区的三个重要城市——上海、南京、宁波的居民家庭、个人收入结构情况加以阐述。

1. 浙江省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2001 年以后,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七年居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三位,排在上海、北京之后。2007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20574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13786 元高 6788 元,同比增长 12.6%,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8.4%。人均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 2000 年以后 10% 以上的增幅。2007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1080 元,增长 21.5%。

其中,人均出租房屋收入 458 元,增长 23.3%;人均股息红利收入 248 元,增长 10.8%;人均其他投资收入 244 元,增长 29%;人均利息收入 117 元,增长 25.7%。

近几年,浙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仅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更是逐年扩大。根据 2000 年至 2006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总收入的 4.8%,比 2002 年的 1.6% 提高 3.2 个百分点。这一增长得益于近年来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经济效益良好,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浙江省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快速增长,达 14510 元,同比增长 11.5%,占居民家庭收入的 64.2%,工薪收入的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额的 64.7%,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由于浙江是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城镇居民从事经营活动的较多,经营收入较高成为一大特色。2007 年,在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环境下,居民经营收入快速增长,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2612 元,增长 20.2%,增幅比上年提高 8.5 个百分点。离退休收入增长带动居民转移收入的增长,2007 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4382 元,增长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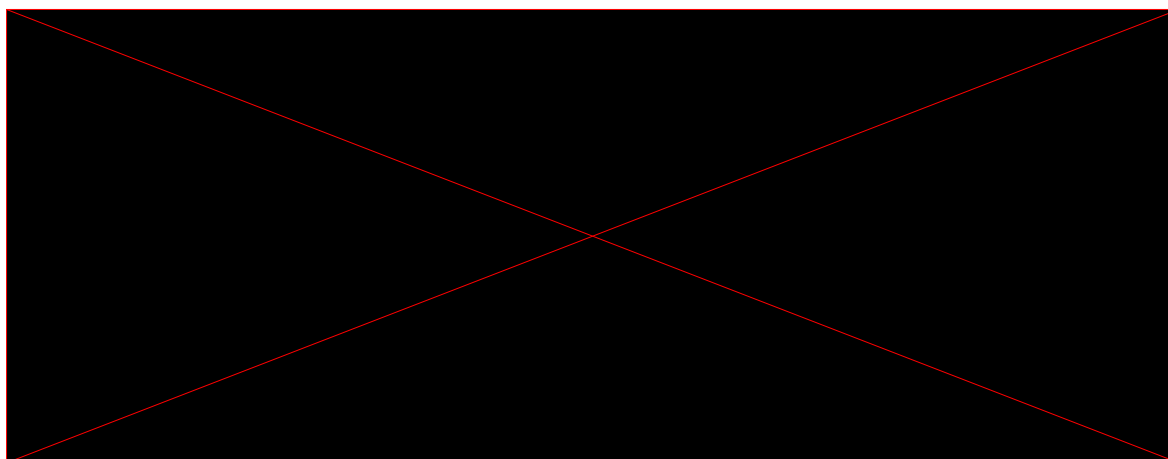
说明:数据整理自浙江省统计局网站(www.zj.stats.gov.cn)相关公报。

图 10 2000 年—2006 年浙江省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家庭总收入比

2. 上海市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2007 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623 元,居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比上年增长 14.3%,增幅比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工薪收入增长 18.9%,经营性收入增长 20.8%,财产性收入增长 22.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10222 元,增长 11%,增幅提高 0.6 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工薪收入增长 8.8%,财产性收入增长 21%,转移性收入增长 29.8%。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虽然上海市居民个人财产性收入有高增长速度,但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始终不高,2003 年以前基本不足 1%,2005 年、2006 年分别为 1.57% 和 1.45%。



说明:数据整理自上海市统计局网站(www.stats-sh.gov.cn)相关公报。

图 11 2000 年—2006 年上海市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家庭总收入比

3. 南京市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近年来,南京市委、市政府把支持创业作为百姓致富的首要途径,推动全民创业、自主创业、艰苦创业,有效推动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随着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等渠道的增多和居民投资意识的增强,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同时,政府把实现相对充分就业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目标,广开就业门路,落实就业政策,为城市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条件。政府还高度重视低收入家庭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加大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上述措施使南京市城市居民获得收入的渠道日趋多元化,收入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工薪收入以外的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新亮点。2007 年,财产性收入不仅相对增幅最大,达到 58.5%,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达到 1.6%,比 2002 年高出 1.3 个百分点。

表 3 2003 年—2007 年南京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及增长情况表

年份	工薪收入 (元)	增幅 (%)	经营净收入 (元)	增幅 (%)	财产性收入 (元)	增幅 (%)	转移性收入 (元)	增幅 (%)
2003	7039.32	6.4	282.36	85.9	48.36	70	3514.44	14.9
2004	7841.29	11.4	374.05	32.5	83.85	73.4	4089.75	16.4
2005	10892.31	26.6	532.58	1.9	122.8	46.5	4926.62	20.5
2006	12505.05	14.8	551.12	3.5	229.75	87.1	5908.71	19.9
2007	14112.52	12.9	737.48	33.8	364.15	58.5	6872.46	16.3

说明:数据整理自南京市统计局网站(www.njtj.gov.cn)相关公报。

4. 宁波市财产性收入的变动

据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对宁波市区 400 户居民家庭生活收支情况的抽样调查,2007 年市

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22307 元,同比增长 13.4%。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9.1%。从收入构成看,居民收入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其中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成为市区居民收入增长的一大亮点。随着居民投资理念的不断更新,加之受宏观环境向好、股市持续向上的影响,居民投资增长迅猛,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据调查资料,2007 年,市区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102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6%。其中,人均股息与红利收入 494 元,同期增幅高达 3.4 倍。

受经济增长和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好转的拉动,宁波市工薪人员从单位得到的收入及奖金增多,加之政府重视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增加就业岗位,再就业形势得到有效改观。2006 年 9 月宁波市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07 年 3 月国家调资政策等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出台,使 2007 年市区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得到较快增长。据调查资料,2007 年市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6526 元,同比上期增长 10.2%,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 74.1%,工资性收入增加额为 1526 元,占家庭总收入增加额的 53.3%,仍是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体。另外,为了保障和逐步改善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国家先后在 2006 年 7 月和 2007 年初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受此政策影响,2007 年,市区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5057 元,增长 25.5%,在可支配收入总额中居第二位。其中,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3539 元,增长 27.7%。

综上,浙江省在家庭总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个指标上都居全国前列,而杭州市在这两个指标上又远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杭州市居民家庭总收入及其各组成部分基本上呈逐年递增态势。其中,工薪收入始终占最大比重,成为居民的首要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也飞速增长。根据以上与其他一些城市的比较,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出,在如今宏观经济良好的大背景下,随着居民财产的不断累积,投资意识的不断增强,投资渠道的日益多元化,财产性收入快速增加必将成为一个大趋势,也将成为居民家庭总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五、居民财产性收入变动的态势与对策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意味着广大群众现有财富应该也必将成为获取收入的手段和源泉,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广大群众现有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视,体现了藏富于民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随着杭州市居民财富的增加和投资渠道的拓宽,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在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增长的不均衡性日益凸显。特别是由于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较大和渠道、制度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财产性收入不均衡增长的格局。由于存量财产和流量收入的相互转化,财产性收入的非均衡增长势必会进一步扩大现有的收入和贫富差距,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构建,不利于小康社会建设。因此,要创造有利条件,提高和稳定杭州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一) 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保证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以美国为例,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约为 40%,90% 以上的公民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值证券。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要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近几年,杭州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价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房租作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持续增长。随着 A 股市场的持续繁荣,许多个人投资者在“牛市”中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这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对居民财产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要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职能的发挥。杭州市政府应从制度和体制上为维护和增加广大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提供保障,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将为防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提供体制保障,从而保证居民有更多的劳动收入除用于消费外还能向财产性收入转化。一是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通过立法和制度保障劳动者收入随着 GDP 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同步增加,坚决纠正少数企业只涨效益不涨工资,或只涨经营者工资不涨劳动者工资的错误做法。二是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保障普通群众财富增长就是要培育和扶持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尤其需要加大对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支持力度。三是要提高公共保障覆盖面和力度。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应覆盖到城乡每一个公民,从而将高储蓄释放成内需消费。四是要建立就业保障机制。积极就业是民富之本,人人有工作,个个有收入,百姓财富增长才会变成现实。

(二) 健全资本市场,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渠道

作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平台,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降低投资门槛,拓宽投资渠道,营造宽松、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伴随着杭州市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者人数急剧增加,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是保证广大群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提高或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条件。

近几年,虽然杭州市股票市场在改革中稳步发展,但资本市场仍面临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性缺陷,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有待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亟须改善,证券公司规范运作有待加强等。需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要主动跟进、积极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监管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落实高管人员个人责任、强化信息披露、建立风险预警为重点,调整监管执法工作思路和方法。另外,切实加大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执法力度,明确和界定执法的尽责权限,提高执业质量,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规范和约束功能。

杭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开拓民营资本准入领域“急先锋”的角色,企业发展良好,不少已经达到上市标准,政府应该加大吸引民营资本的力度,有意识、有选择地主动放宽民营资本准入领域,将基础建设、市政工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产业向民营资本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将开放过程规范化和制度化。杭州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强规划引导,使杭州成为资金流、金融信息流的主要吸纳地,为杭州经济建设提供创业孵化器、融资、资本经营和投资管理金融支持,打造“立足浙江、辐射东南”的区域金融中心。要加快打造“信用杭州”,良好的信用秩序是立市之本,银企双方都要强化责任,确保资金安全有效运行。要不断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帮助银行消化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银信部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原则,引导企业和项目单位依法融资用资。新闻媒体要加强宣传监督,对各种破坏信用关系的行为进行监督披露,大力营造杭州规范高效的金融运行环境。通过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银行支持、项目带动,努力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

(三) 加强风险教育,让居民在理性投资中稳定财产性收入

通过对杭州市民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投资者对投资的认识相当肤浅。他们有投资的冲动,但相关知识储备不足,缺乏风险意识。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冷静认识投资风险,逐渐从一个短期投机者转变为理性投资者。股票市场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以银行为主

体的间接融资方式。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居民有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居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绩效的重要途径。调查问卷显示,58%的杭州市居民理财的首选渠道是购买以集合理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特征的基金。由于没时间长期盯盘、缺乏炒股的经验常识、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小,基金成为居民重要的投资选择。

杭州市的投资者教育工作在教育对象和内容上要突出“新”字。即在投资者教育对象上,要特别针对新股民、新基民等投资经验较少的中小投资者,向他们讲解和宣传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讲解开户和交易流程、证券投资常识与风险控制,以及识别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代销机构等。在教育内容上,要侧重于对基金投资产品、集合理财等新产品、新知识,以及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权证等新业务的普及和教育,尤其要向广大普通百姓讲清楚股票、基金产品、集合理财产品等与储蓄、债券等其他投资工具之间的差异,向投资者提示其中蕴涵的风险。重点抓好地方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三类会员单位的大投资者教育工作,发挥其贴近市场、贴近投资者、点多面广、具有众多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等优势,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活动。

附:问卷调查

调查时间:2008年8月4日至8月7日

调查方法:整群抽样,街头拦截式访问

调查对象:杭州市民,年龄18岁~65岁,性别配额1:1

调查样本:164个

1. 2007年,您的财产性收入有多少?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1000元以下	13%
2	3万元以下	32%
3	3万~5万	23%
4	5万~10万	17%
5	10万~50万	12%
6	50万以上	3%

2. 2007年,您的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0%~10%	25%
2	10%~30%	42%
3	30%~50%	23%
4	50%以上	10%

3. 您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是?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股票、基金	45%
2	房产、出租房屋或土地使用权	23%
3	银行存款	14%
4	保险、黄金投资产品	8%
5	其他	10%

4. 您目前的投资回报率是?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10% 以下	25%
2	10% ~ 30%	36%
3	30% ~ 50%	21%
4	50% ~ 100%	13%
5	100% 以上	5%

5. 2007 年,您用于储蓄的银行存款占收入的比例变动?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减少很多	20%
2	减少一部分	35%
3	基本没有变动	24%
4	增加	21%

6. 您目前有没有详细的理财计划?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目前没有详细的想法	29%
2	有比较模糊的想法	45%
3	有很清晰的理财计划	26%

7. 回报最高的项目有?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股票、基金	33%
2	房产、出租房屋或土地使用权	23%
3	银行存款	19%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4	保险、黄金投资产品	11% 
5	其他	14% 




8. 您觉得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稳定性给您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是?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市场波动很大,影响很大	78% 
2	市场有波动,但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不大	22% 





9. 您选择投资产品最主要看重的因素是?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产品收益	38% 
2	起点金额	26% 
3	变现能力	11% 
4	风险高低	17% 
5	其他	8% 

10. 在将来,您认为财产性收入会在您的收入中有显著的增长吗?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不会	25% 
2	会	55% 
3	看以后的情况而定	20% 

11. 您认为政府在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过程中,哪项是最需要重点关注的?

序号	答题选项	百分比
1	提供政策保证	30% 
2	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29% 
3	进行全民风险教育	21% 
4	其他保障措施	20%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

杭州居民生活研究报告

绪 论

社会生活的变迁,可以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反映社会文化所经历的变化。广大群众的日常思维、生活习惯、心理素质和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行为模式,以及民众对于生命的理解,关于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普遍信念,都真实、生动、丰富地表现了历史的本相。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钱塘江下游,是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枢纽。杭州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建都地,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006年,杭州成功地举办了世界休闲博览会,正在进一步努力地打造东方“休闲之都”。这一定位是在改革开放后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杭州独有的城市人文精神而形成的。9月28日,经过社会征集、专家评审、市民投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杭州城市品牌——“生活品质之城”浮出水面,概括了杭州的整体特色和综合优势,既照顾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包括困难群众,又涵盖了各行业、各领域,是环境、文化、创业有机融合、互为支撑所构成的城市整体生活品质。

第一部分 城乡居民收入^①

一、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概述

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最多的阶段。杭州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1998年的5425元,扣除物价因素,20年实际增长2.2倍,平均年递增6%。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生存到温饱再向小康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2005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杭州市自1986年后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来源不

^① 文中未做说明的数据及图表资料来源:杭州市统计信息网 <http://www.hzstats.gov.cn>。

断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民生活跨越了温饱和总体小康两个时期,进入了富裕生活阶段。2005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918.61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达44487元,按国家公布的2005年对美元平均汇率8.1917计算,突破5000美元,为5431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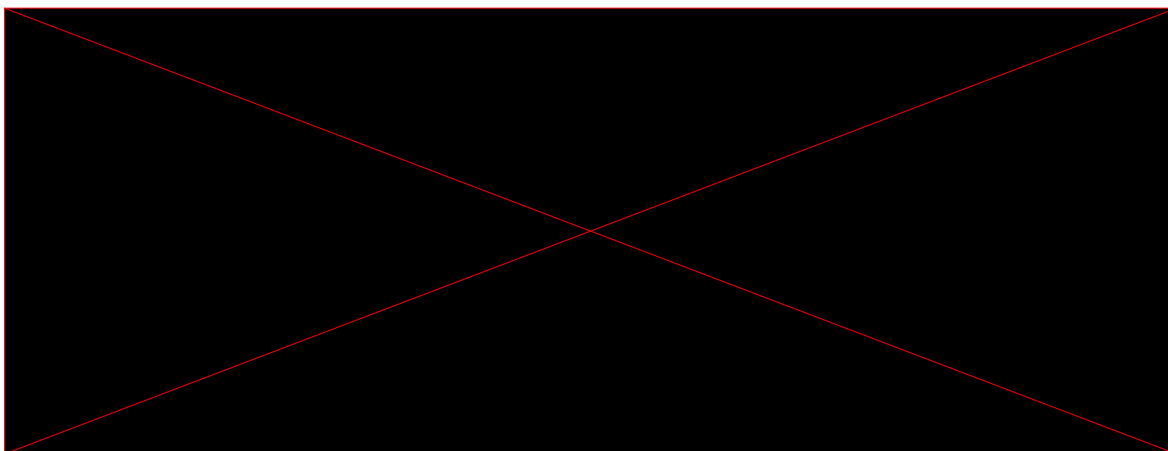


图1 1985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

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下同)为16601元和7655元,比1985年增加15575元和7031元,年增加779元和352元,年递增(指1986年至2005年每年递增,下同)14.9%和13.4%。

二、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性分析

城市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收入来源性质划分,包括工薪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4个部分。城市居民总收入中扣除个人缴纳的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和记账补贴后可以用来最终消费的收入,称作可支配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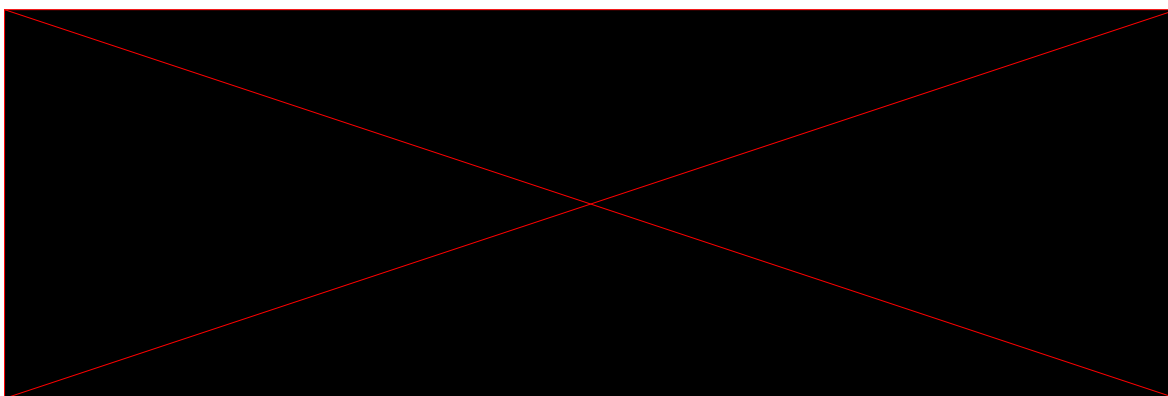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结构性收入及占比

1986年至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全面增长,城市年递增14.6%、36.9%、23.2%、17.3%,农村年递增19.7%、9.3%、11.9%、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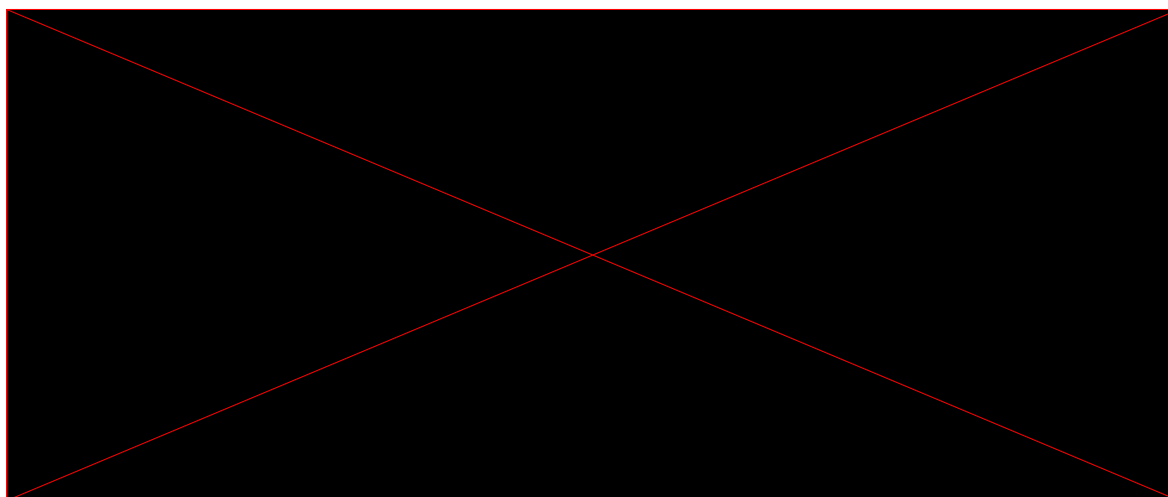


图3 2005年杭州市居民各项结构性收入比1985年上升或下降情况

与1985年相比,城市居民工薪收入的主体地位逐渐减弱,但仍是收入来源的主流。2005年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69.1%,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比重分别上升到5.5%、3.1%、22.3%。在农村,工薪收入逐渐取代了经营收入的主体地位,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一来源。2005年,经营净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下降到35.8%,工薪收入比重上升到56.4%。

表1 1986年—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动总趋势

项 目	2005年 收入水平(元)		1986年—2005年 每年递增(%)		2005年 收入构成(%)		2005年比1985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总收入(纯收入)	18762	7655	14.9	13.4	100.0	100.0	—	—
工薪收入	12961	4317	14.6	19.7	69.1	56.4	-13.4	37.5
经营净收入	1041	2743	36.9	9.3	5.5	35.8	5.5	-38.9
财产性收入	586	302	23.2	11.9	3.1	3.9	2.2	-1.2
转移性收入	4173	295	17.3	19.8	22.3	3.9	5.7	2.6

三、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阶段性分析

1986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其结构变动经历了4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一) 第一阶段:1986年—1991年

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市1986年、1988年至1990年,农村1987年至1989年、1991年的年递增速度均在10%以上。

表2 1986年—1991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

项 目		1986—1991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收入水平(元)	城市	—	1169	1260	1565	1764	1985	2114
	农村	—	673	820	996	1117	1172	1308
年收入增加额(元)	城市	184	143	91	305	199	221	143
	农村	114	49	147	176	121	55	136
年增幅(%)	城市	12.8	13.9	7.8	24.2	12.7	12.5	7.2
	农村	13.1	7.9	21.8	21.5	12.1	4.9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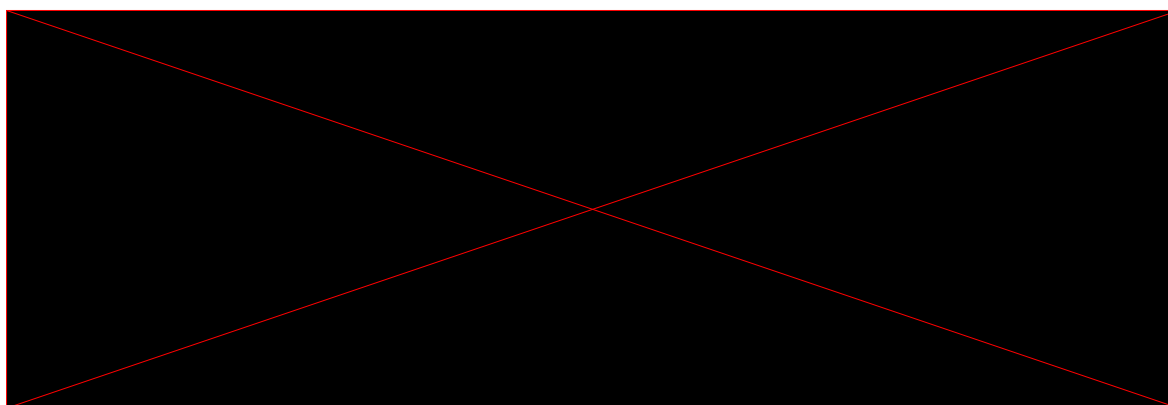


图4 1986年—1991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1. 工薪收入

在城市,1985年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重大工资改革后,建立了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在内的结构工资制,使工资和奖金收入逐年增加。1987年,为理顺企业分配关系,全国对企业劳动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职工工资总额随同本企业经济效益浮动的办法,使职工工资随着经济增长得到经常、稳定地增长。这期间工薪收入年递增11.1%,其中各种奖金和超额工资年递增14.2%。在农村,1984年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完全取消后,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在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迅速崛起,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在本地企业工作的工资收入在内)得到相应提高,年递增17.6%。

2. 经营性收入

在城市,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后,杭州市的私营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经营性收入也成为城市居民收入的新来源。1989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15.7%。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效进一步体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继续稳步增长,年递增10.5%。

3. 财产性收入

在城市,财产性收入年递增22.1%,主要增收因素是利息收入。为了稳定物价,抑制过快的消费增长,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9月10日开始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业务,并于当年9

月 1 日和 1989 年 2 月 1 日两次提高银行储蓄存款利息。这些措施对居民的吸引力很大,储蓄存款大增,存款利息收入增加,1988 年至 1991 年每年递增 25.2%,1991 年财产性收入中存款利息收入占 93.3%。在农村,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储蓄存款增多,再加上储蓄存款利率提高,存款利息收入的增长成为这一阶段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期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年递增 26%。

表 3 1986 年—1991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动情况

项 目	1991 年 收入水平(元)		1986 年—1991 年 每年递增(%)		1991 年 收入构成(%)		1991 年比 1985 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总收入(纯收入)	2126	1308	12.7	13.1	100	100	—	—
工薪收入	1610	312	11.1	17.6	75.7	23.8	-6.8	4.9
经营净收入	9	846	15.7	10.5	0.4	64.7	0.4	-10.0
财产性收入	30	128	22.1	26.0	1.4	9.8	0.5	4.7
转移性收入	477	21	18.5	17.6	22.5	1.7	5.9	0.4

说明: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年递增 10.5% 为 1989 年—1991 年每年递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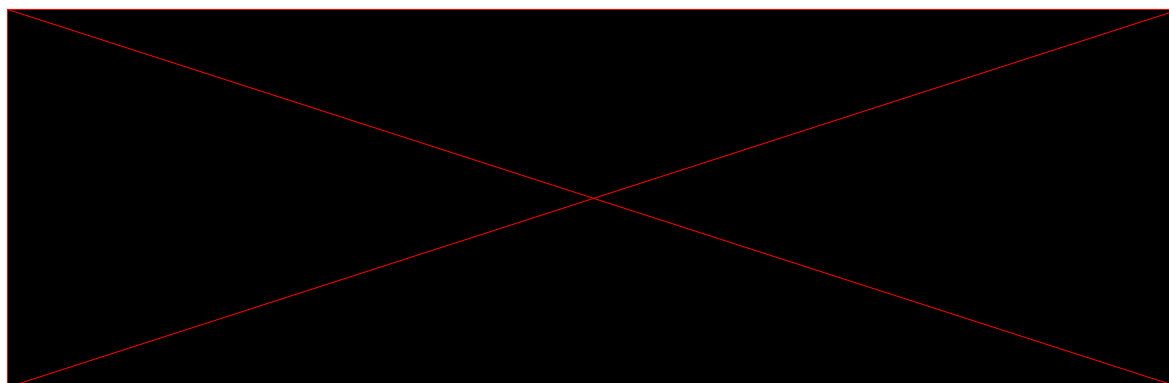


图 5 1991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结构性收入及占比

4. 转移性收入

在城市,转移性收入年递增 18.5%。转移性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七五”时期以后,杭州市乃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攀升,为此从 1988 年 4 月开始,肉、蛋、菜、糖等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1988 年至 1991 年,年人均发放价格补贴 280 元,当年发放的价格补贴占当年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均超过 40%。原因之二是离退休金收入快速增长,年递增 22.5%。在农村,转移性收入年递增 17.6%,以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和带回现金收入、城市亲友赠送、国家财政补贴为主。

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特征是:1991 年与 1985 年相比,城市居民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经营性收入从无到有,1991 年占到 0.4%;

农村居民工薪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上升,经营净收入比重下降。

(二) 第二阶段:1992年—1996年

这一阶段是城乡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时期,年增加1016元和435元,年递增27.8%和21.6%,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15个和7.5个百分点。其中,城市1992年至1995年、农村1994年至1995年增长速度均在20%以上。1994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000元,1995年突破6000元,1996年突破7000元。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2000元,1995年突破3000元。

表4 1992年—1996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

项 目		1992—1996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收入水平(元)	城市	—	2580	3252	5249	6301	7206
	农村	—	1493	1748	2267	3012	3482
年收入增加额(元)	城市	1016	452	945	1724	1052	905
	农村	435	185	255	519	745	470
年增幅(%)	城市	27.8	21.2	36.6	48.9	20.0	14.4
	农村	21.6	14.1	17.1	29.7	32.9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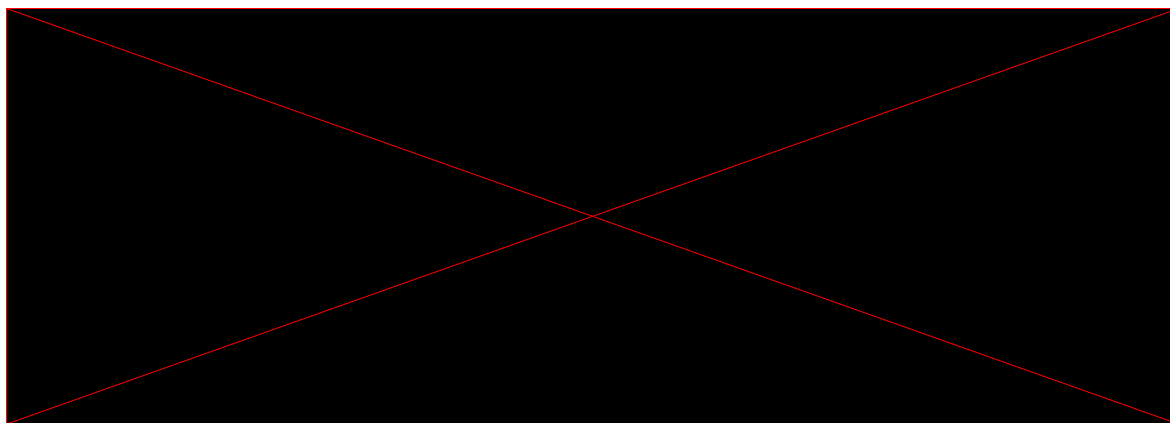


图6 1992年—1996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1. 工薪收入

在城市,1993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杭州市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进行全面改革。1994年,杭州市被确定为副省级行政级别后,于1995年按副省级工资标准进行套改,工资改革和套改使城市居民工薪收入提高,年递增30.9%,比1989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19.8个百分点。在农村,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杭州市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随之增强。1996年末,杭州市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劳动力的总人数突破100万人,达到123.09万人,农村居民工薪收入每年以

36.6%的速度递增,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19个百分点。

2. 经营性收入

在城市,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杭州市营造了良好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城市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迅速提高,每年以28.2%的速度递增,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12.5个百分点。在农村,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先后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逐步放开农产品购销体制,实行市场调节,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村居民得到了更多实惠,家庭经营收入进入加快增长阶段,年递增16.7%,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6.2个百分点。

3. 财产性收入

在城市,财产性收入年递增32.6%,比1986年至1991年增长幅度高10.5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利息收入继续快速增长,年递增32.7%;二是伴随着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投资股票和证券获得的红利收入成为居民家庭财产收入的一个来源,年递增20.1%;三是出租房屋收入从无到有,成为城市居民收入的又一来源。在农村,财产性收入年递减23.7%。

4. 转移性收入

在城市,转移性收入年递增13%,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低5.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价格补贴减少,由1991年的232元下降到1996年的0.18元。转移性收入内部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首次突破50%,达到69.8%,1996年上升到72.2%,成为城市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主流。在农村,转移性收入每年以45.3%的速度递增,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高27.7个百分点。

表5 1992年—1996年杭州市城市居民各项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动情况

项 目	1996年 收入水平(元)		1992年—1996年 每年递增(%)		1996年 收入构成(%)		1996年比1991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总收入(纯收入)	7215	3482	27.7	21.6	100	100	—	—
工薪收入	6181	1482	30.9	36.6	85.7	42.6	10.0	18.8
经营净收入	32	1830	28.2	16.7	0.4	52.6	0.0	-12.1
财产性收入	122	33	32.6	-23.7	1.7	1.0	0.3	-8.8
转移性收入	880	137	13.0	45.3	12.2	3.8	-10.3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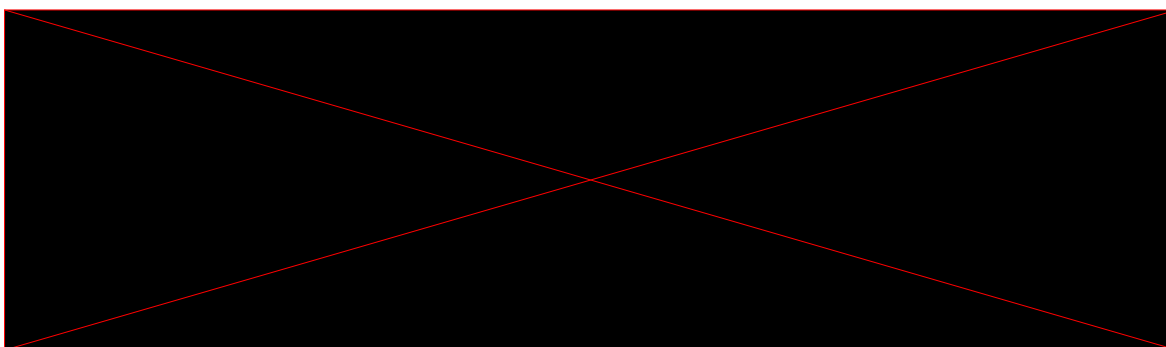


图7 1996年杭州市城乡居民结构性收入及占比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特征是:1996年与1991年相比,城市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转移性收入下降,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收入比重变化较小;农村工薪收入上升,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下降。

(三) 第三阶段:1997年—2000年

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缓,年增加616元和353元,年递增7.6%和8.9%,比1986年至1991年每年递增幅度低5.2个和4.2个百分点,比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低20.2个和12.7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0年,除农村1999年外,城乡居民各年度收入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下。

1. 工薪收入

在城市,1997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政策的实施,下岗分流人员不断增加,城市居民工薪收入增幅减缓,年递增3.4%,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低7.7个和27.5个百分点。在农村,乡镇企业改制导致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城市职工下岗增多导致农民进城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双重原因使这一时期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年递增11.4%,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低6.2个和25.2个百分点。

2. 经营性收入

在城市,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营企业采取鼓励、引导并使其健康发展的方针。此后,杭州市个体私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城市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剧增,年递增64.7%,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高49个和36.5个百分点。在农村,这一时期农产品的供需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影响和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导致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年递增2.5%,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低8个和14.2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出现负增长,比1999年下降6.2%。

3. 财产性收入

在城市,财产性收入年递减1.1%。主要原因是1996年以后存款利率逐年下降,利息收入减少。这期间,股息与红利、出租住房收入分别年递增34.6%、60.3%。财产性收入内部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利息收入比重由1996年的94.2%下降到74.4%,股息与红利、出租房屋收入比重则分别由1996年的4.2%、1.6%上升到14.5%、11.0%。在农村,这一时期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包括出租农业机械在内的租金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收入的新来源,并且成倍增长,年递增1.2倍和1.9倍,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收入剧增,年递增89.3%,利息收入增长较快,年递增23.4%。这一阶段,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每年递增83.9%。

4. 转移性收入

在城市,1997年以后,在企业实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同时,办理提前退休的人员增加,使得离退休人口增多。据城市住户调查,2000年每百户家庭离退休人员由1996年的29人增加到51人,增加22人。离退休人员增多使得城市居民包括离退休金收入在内的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年递增26.9%,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分别高8.4个和13.9个百分点。在农村,转移性收入年递增11.3%,比1986年至1991年和1992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幅度分别低6.3个和34个百分点。

表6 1997年—2000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

项 目		1997—2000	1997	1998	1999	2000
收入水平(元)	城市	—	7896	8465	9085	9668
	农村	—	3785	4006	4582	4894
年收入增加额(元)	城市	616	690	569	620	583
	农村	353	303	221	576	312
年增幅(%)	城市	7.6	9.6	7.2	7.3	6.4
	农村	8.9	8.7	5.8	14.4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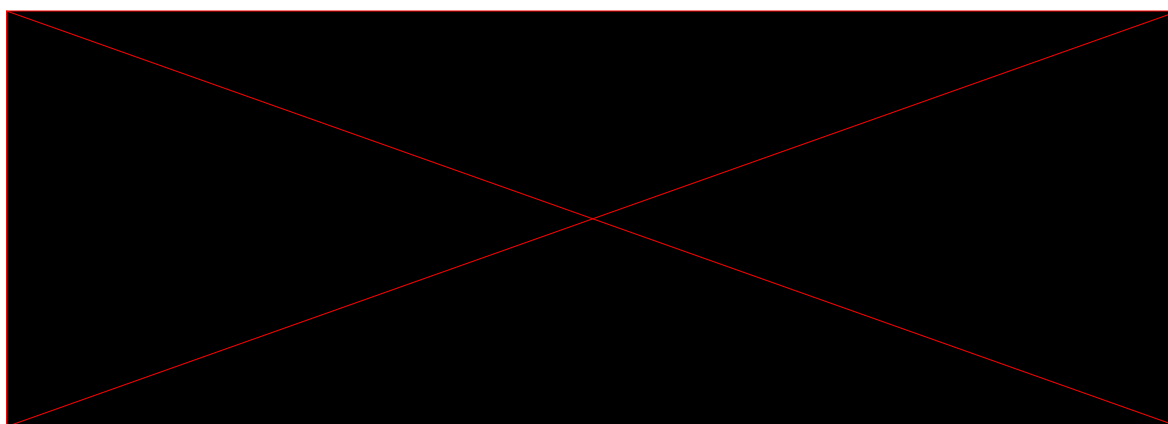


图8 1997年—2001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各项收入结构变动的特征:2000年与1996年相比,城市居民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家庭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农村居民工薪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经营性收入比重下降。1997年,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为49.9%,2000年再次下降到41.3%,从此结束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历史。

表7 1997年—2000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动情况

项 目	2000年 收入水平(元)		1996年—2000年 每年递增(%)		2000年 收入构成(%)		2000年比1996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总收入(纯收入)	9709	4894	7.7	8.9	100.0	100	—	—
工薪收入	7075	2284	3.4	11.4	72.9	46.7	-12.8	4.1
经营净收入	236	2019	64.7	2.5	2.4	41.3	2.0	-11.3
财产性收入	117	380	-1.1	84.2	1.2	7.8	-0.5	6.8
转移性收入	2281	211	26.9	11.4	23.5	4.2	11.3	0.4

(四) 第四阶段:2001年—2005年

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进入较快增长时期,年增加 1387 元和 552 元,年递增 11.4% 和 9.4%,比 1997 年至 2000 年递增幅度高 3.8 个和 0.5 个百分点,其中 2004 年和 2005 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均超过 10%。2005 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 16000 元,农村居民纯收入突破 7000 元。

1. 工薪收入

在城市,“十五”时期以后,随着城市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就业渠道越来越多,工薪收入也呈现出回升增长的态势,年递增 12.9%,比 1997 年至 2000 年每年递增幅度高 9.5 个百分点。在农村,“十五”时期以后,随着农村居民在本地企业就业和进城务工环境的改善,农村居民工薪收入增长速度开始回升至快速增长,年递增 13.6%,比 1997 年至 2000 年每年递增幅度高 2.2 个百分点,其中在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和常住人口外出就业得到的收入年递增 14.2% 和 21.4%。

2. 经营性收入

在城市,“十五”时期以后,杭州市制定了一系列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优化服务环境的政策措施,使民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城市居民经营性收入也进入了稳健增长阶段,年递增 34.6%,比 1986 年至 1991 年和 1992 年至 1996 年每年递增幅度高 18.9 个和 36.5 个百分点。在农村,“十五”期间,杭州市把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不断创新新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都市农业。2004 年 1 月和 2005 年 1 月,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两个一号文件后,杭州市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各项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坚持“科技兴农”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积极推进都市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优势农业、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进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增强,呈现出农业增效、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2001 年至 2005 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年递增 6.3%,比 1997 年至 2000 年递增幅度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来自第二、三产业的经营性收入年分别递增 9.6% 和 15.8%。

3. 财产性收入

在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投资意识和理财能力不断增强,家庭财产性收入也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年递增 38%。其中,股息与红利收入年递增 37%,出租房屋收入年递增 99.9%。这一时期,财产性收入内部构成发生重大转折,2004 年出租房屋收入占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达到 52%,2005 年上升到 70.2%,出租房屋收入已成为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流。在农村,这一时期财产性收入每年递减 4.5%,主要原因是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增长速度放慢。

表 8 2001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

项 目		2001—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收入水平(元)	城市	—	10896	11778	12898	14565	16601
	农村	—	5329	5708	6250	6950	7655

续表

项 目		2001—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收入增加额(元)	城市	1387	1228	882	1120	1667	2036
	农村	552	435	379	542	700	705
年增幅(%)	城市	11.4	12.7	8.1	9.5	12.9	14.0
	农村	9.4	8.9	7.1	8.5	11.2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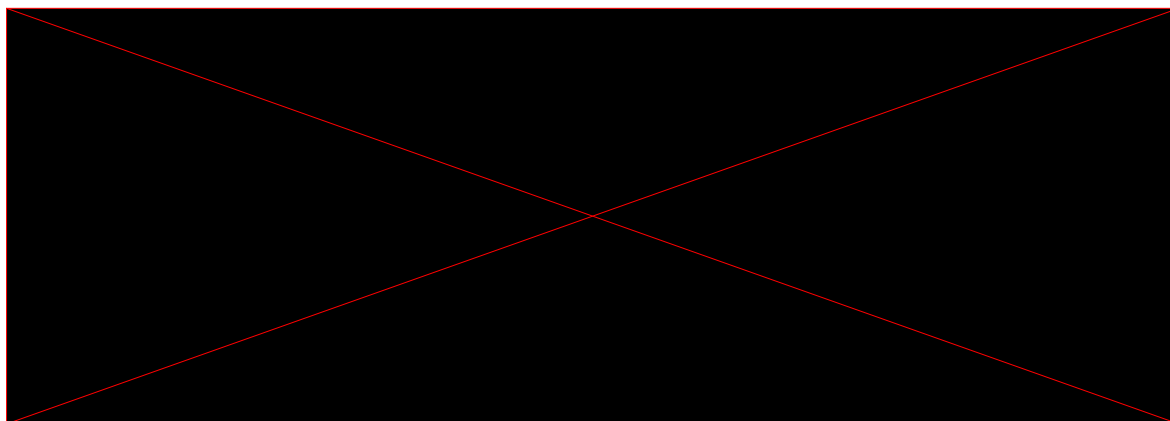


图9 2001年—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4. 转移性收入

在城市,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线、社会救济金、失业保险金等标准不断提高,以“春风行动”等为载体的扶贫帮困力度逐年加大,以及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增加,城市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提高,年递增12.8%。其中,离退休金年递增14.1%,社会救济、捐赠和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收入年分别递增35.2%、17.4%和47%。在农村,转移性收入年递增31.5%。原因之一是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收入增加,原因之二是2004年1月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天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后,杭州市实施了以“三补一减”为主要内容,以“多予、少取、放活”为特征的新政策,政策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新来源。

表9 2001年—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增长和结构变动情况

项 目	2005年 收入水平(元)		2001年—2005年 每年递增(%)		2005年 收入构成(%)		2005年比2000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总收入(纯收入)	18762	7655	14.1	9.4	100	100	—	—
工薪收入	12961	4317	12.9	13.6	69.1	56.4	-3.8	9.7
经营净收入	1041	2743	34.6	6.3	5.5	35.8	3.1	-5.4
财产性收入	586	302	38.0	-4.5	3.1	3.9	1.9	-3.8
转移性收入	4173	295	12.8	6.9	22.3	3.9	-1.2	-0.5

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特征:城市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农村居民工薪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下降。2001年,工薪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首次突破50%。2005年达到56.4%,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一来源。

四、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特征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入特征分析

1. 城镇居民就业面扩大,就业者负担人数减少

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多达4人至5人。1978年,杭州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为4.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为2.89人。1985年,平均每户人口数下降为3.53人,就业比例为64.02%。20世纪80年代以后,和全国的整体趋势一致,杭州市家庭规模逐年缩小。1990年,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3.37人,到2000年时仅有3.1人。进入2000年后,平均每户人口数低于3人。2005年,平均每户人口数为2.84人。

但是从就业角度考虑,由于改革的需要以及人口老龄化,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从1985年的64.02%下降到了2005年的50%。

表 10 1985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居民平均每户人口数及就业人数

年份	平均每户人口数(人)	平均每户就业人数(人)	就业比例(%)
1985	3.53	2.26	64.02
1986	3.49	2.27	65.04
1987	3.42	2.25	65.79
1988	3.41	2.16	63.34
1989	3.4	2.2	64.71
1990	3.37	2.15	63.80
1991	3.4	2.2	64.71
1992	3.28	2.14	65.24
1993	3.21	2.1	65.42
1994	3.31	2.1	63.44
1995	3.2	2.05	64.06
1996	3.2	2	62.50
1997	3.14	1.99	63.38
1998	3.12	1.93	61.86
1999	3.11	1.92	61.74
2000	3.1	1.83	59.03
2001	2.98	1.72	57.72

续表

年份	平均每户人口数(人)	平均每户就业人数(人)	就业比例(%)
2002	2.93	1.53	52.22
2003	2.92	1.51	51.71
2004	2.92	1.48	50.68
2005	2.84	1.42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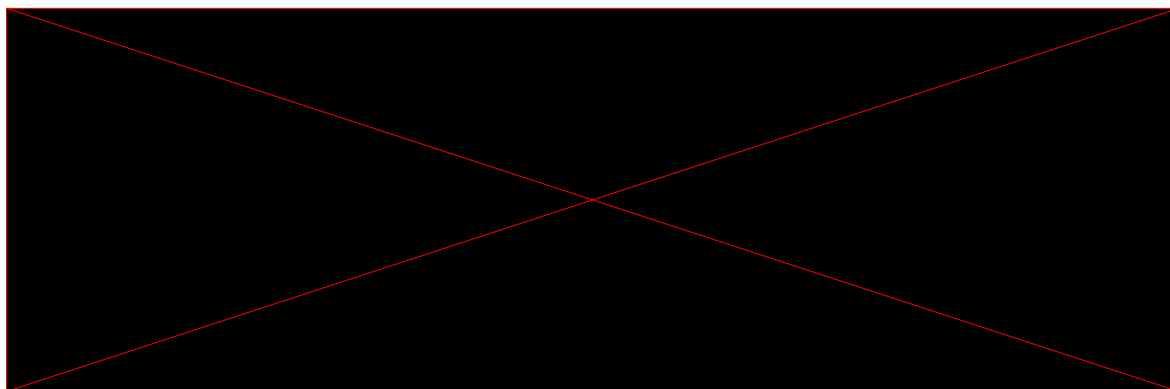


图 10 1985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每户人口及就业人口

2. 就业渠道拓宽,收入来源增多

虽然平均每户就业比例有明显的下降,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城镇就业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1978 年改革开放为城镇经济注入了活力,就业渠道逐年增多,外资私营合资等各种经济类型的单位从无到有,个体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在城镇就业者中比重逐年增大。1985 年,城镇就业者中职工人数为 330.37 万人,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为国营和集体职工,就业形式极为单一。到 2005 年,其他经济类型以及个体劳动者猛增,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数仅有 42.05 万人。

就业渠道的拓宽使城镇居民收入来源逐渐增多。1985 年,城镇居民收入中接近九成为来自国有集体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补贴,其他方面的收入不足十分之一。2005 年,国有集体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

表 11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人口、劳动力、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

项 目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年末总人口(万人)	543.05	574.78	587.96	621.58	660.45
非农业人口(万人)	153.46	169	191.43	226.99	297.54
年末从业人员数(万人)	330.37	363.49	422.55	408.11	481.1
全市生产总值(亿元)	90.49	189.62	762.01	1382.56	2942.65
人均生产总值(元)	1675	3310	12797	22342	44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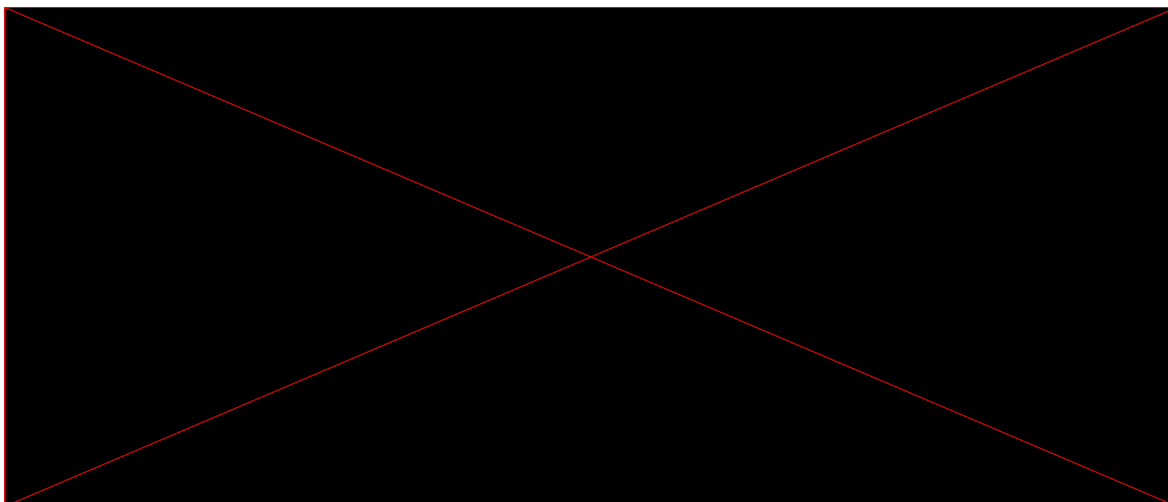


图 11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生产总值

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人们不再仅仅抱着铁饭碗,依靠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工资和补助,而是发挥各种经济形态的优势,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依靠自身才干创造价值与财富的人才。

3. 居民投资意识不断增强,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居民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4 项组成。20 年来,居民收入从 1986 年的 1169 元增长到 2005 年的 18762 元,增长 73%,年均增长 14.89%。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和政府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激励下,自主创业人员的规模日益壮大,城镇居民家庭来源于此的收入扶摇直上,增速列各项之首,富民为先的战略思想得到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使居民投资意识不断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随着企业股份制的推行,股票债券等证券发行量的增加,城镇居民的金融活动日趋活跃。2005 年,城镇居民总收入中工薪收入占 69.1%,而该指标在 1985 年为 82.5%,表明居民在工薪收入之外,其他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相比而言,经营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占比都有所提高,特别是经营性收入占比 2005 年比 1986 年提高了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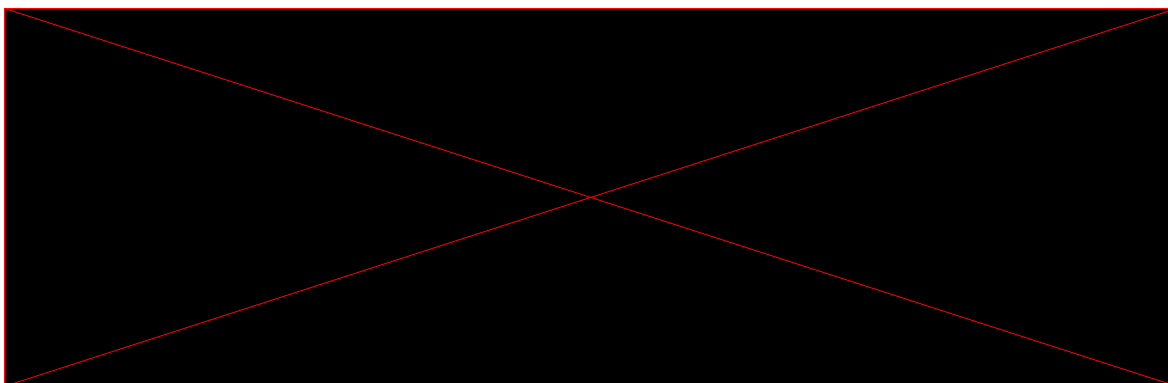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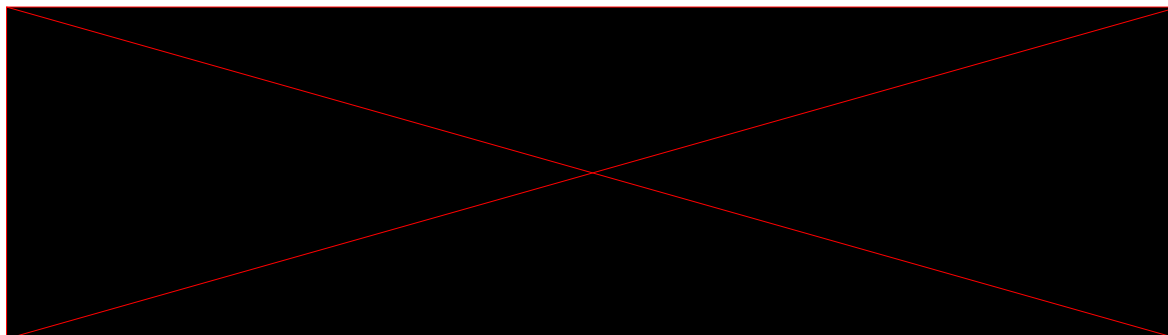


图 12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收入构成

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更为突出地反映在银行存款的变化上。全市居民存款余额从1986年的22.2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2191.6亿元。改革开放之后20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呈几何级数增长。1986年到1994年,存款余额增长了10倍,达到239.4亿元。到2005年,存款余额又增长了10倍。

表 12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居民银行储蓄存款

年份	存款余额(万元)	年份	存款余额(万元)
1986	222110	1996	4638458
1987	302762	1997	5583306
1988	351946	1998	6701158
1989	501592	1999	7425967
1990	697515	2000	7885579
1991	904490	2001	9418400
1992	1144737	2002	11834000
1993	1563328	2003	15899600
1994	2394370	2004	18351700
1995	3423379	2005	21916000



说明:1989年以前数据均为银行机构存贷款,1990年及以后年份数据为调整后的金融机构存贷款,2003年开始金融机构存贷款为本外币合并数据。

图 13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居民银行储蓄存款

4. 杭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005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01元,杭州市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06.7元。在全省11个市中,杭州市居第五位。收入高于杭州市的分别是温州市(19805元)、绍兴市(17516元)以及台州市(19394元)和宁波市(17394元)。从收入增长幅度看,2005年杭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4%,比全省平均水平略高。从收入差额看,杭州市与收入最高的温州市相差最大,为3204元。

表 13 2005 年浙江省各地市生产总值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地 市	生产总值(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杭州市	2942.65	16601	7655
宁波市	2449.31	17394	7810
温州市	1596.35	19805	6845
嘉兴市	1159.66	16189	8007
湖州市	644.25	15375	7288
绍兴市	1447.47	17516	7704
金华市	1063.54	15387	5516
衢州市	329.11	13006	4850
舟山市	280.16	15524	7190
台州市	1251.77	17394	6689
丽水市	305.99	12846	3572

说明:资料来源于浙江省统计信息网 <http://www.zj.stats.gov.cn>。

(二) 农村居民收入特征分析

1. 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出跳跃性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农村在 1978 年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和产品支配权,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在经历了 1978 年至 1984 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期之后,1986 年至 1988 年农民收入进入稳定增长期。1986 年杭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675 元,而 1988 年杭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996 元,平均每年增幅为 13.8%。

1989 年至 1991 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农业比较利益偏低,造成农民增产少增收、甚至不增收的局面,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这三年,农民收入名义上增长 8.2%,但扣除价格增长因素后,实际收入下降。其中,1989 年农民实际收入下降 7.3%,1990 年下降 2.0%,1991 年下降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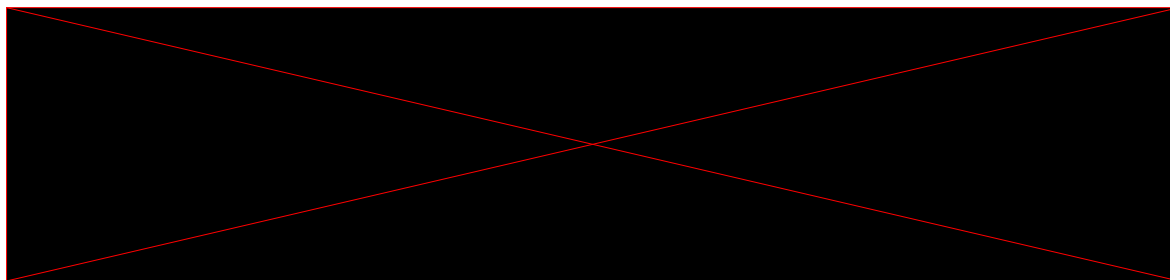


图 14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1992 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契机,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围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同时,国家为了理顺价格体系,

进行了新一轮的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并进一步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1992年至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连上了3个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1年的1308元,1992年的1493元,到1995年越过2000元大关,达2267元,1996年超过3000元大关,达3012元。5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两番多。

表14 1986年—2005年杭州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年份	平均每户人口(人)	平均每户劳动力(人)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元)
1986	4.39	2.88	675
1987	4.34	2.86	820
1988	4.26	2.87	996
1989	4.17	2.85	1117
1990	4.16	2.89	1171
1991	4.03	2.81	1308
1992	4.01	2.81	1493
1993	3.91	2.76	1748
1994	3.85	2.35	2267
1995	3.87	2.3	3012
1996	3.81	2.77	3482
1997	3.87	2.86	3785
1998	3.87	2.88	4006
1999	3.8	2.8	4209
2000	3.61	2.59	4894
2001	3.57	2.53	5330
2002	3.53	2.53	5708
2003	3.48	2.53	6250
2004	3.48	2.54	6950
2005	3.34	2.34	7655

1997年至2003年,农业、农村经济经历了市场化改革。这期间,粮食经市场化改革取消了国家统购,走上了市场;乡镇企业经过改革,大部分由集体转为民营。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稍有减速,但是由于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在全国农民收入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到2003年,人均年收入为6250元,比1995年又翻了一番。

2004年,杭州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位置。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和效益显著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进一步扩大;积极扩大对外输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进一步加大,加上当年社会各界在清欠民工工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外出劳务收入显著增加;农产品

生产全面增产增收,农业出现多年少见的增产增收好形势;主要农副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农民因政策性补贴从再分配中得到的转移性收入明显增长;调整了农业税税率,2004年全市农业税降低3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按调整后税额20%计征,农村税费负担减免政策逐步落实到位,农民负担大幅度下降。加法减法一起做,大大地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由于政策好、天帮忙、市场活、人努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喜人,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50元,增加了700元,增长11.2%。

2005年,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进一步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人均纯收入达到7655元,比2004年增加705元,增长10.1%。“十五”期间,随着杭州市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5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7655元,比2000年增长56.4%,年均增长9.4%;其中,来自二、三产业的为6396元,比2000年增长70.1%,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76.8%上升到83.6%。在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2.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1986年至2005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收入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农民收入结构逐渐由以农业为主转向农业与非农业产业并举,且非农产业收入趋于强化,农民收入结构日趋优化。1990年,农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份额仅为35.2%,到了2005年降至26.8%。而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比重逐年增大,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1990年,农民人均家庭财产性收入几乎没有或很少,2005年已达人均313元,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表15 199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和纯收入

单位:元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全年总收入	1451	3734	5467	6326	6670	6968	7765	9874
全年纯收入	1171	3012	4894	5330	5708	6250	6950	7655
基本收入	1330	3541	4924	5670	5951	6516	7343	8648
劳动者的报酬收入	255	1111	2284	2810	3219	3579	3887	4317
家庭经营收入	1075	2430	2640	2860	2732	2937	3456	4331
农业收入	412	841	1135	1274	1111	949	1327	2048
林业收入	27	176	79	82	98	259	206	401
牧业收入	255	492	427	436	341	385	429	400
渔业收入	31	30	35	48	43	34	45	238
工业收入	26	139	293	297	291	293	325	506
建筑业收入	9	96	114	119	162	211	231	29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收入	25	168	182	213	220	328	391	623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收入	21	146	167	152	190	245	250	505
社会服务业收入	34	73	82	116	141	103	98	164

续表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188	268	126	124	135	130	154	147
转移性收入	100	102	349	447	416	280	237	621
在外人口寄回或带回	2	6	23	37	47	61	57	120
农村外部亲友赠送	3	11	8	8	13	21	14	172
财产性收入	21	98	194	209	303	172	185	605
土地征用补偿收入	—	8	112	122	140	148	149	313

3. 外出务工收入保持稳定

1985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给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加之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种植业生产效益下降,农民纷纷走出家门从事劳务,务工收入逐年增加。但是由于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与其他各省相比,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并没有显著增长。2000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人均293元,占收入比重为6%。2005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人均达到506元,占收入比重为6.61%,与2000年基本持平。相反,杭州成为农民打工族的主要务工场所。2005年末,全市暂住人口为218.88万人,比上年的187.56万人净增31.32万人,增长16.7%,但增幅比上年下降2.1个百分点。其中,市区暂住人口为195.11万人,比上年的168.85万人净增26.26万人,增长15.55%,增幅比上年下降3.05个百分点。

4. 大力发展城市农业,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增强

杭州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不断创新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科技兴农”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积极推进都市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优势农业、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进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村经济综合实力增强,呈现农业增效、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的可喜局面。

2005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9.48亿元,与2000年相比年均增长8.6%。农林牧渔业内部产业格局发生变化,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59.2%、9%、21.7%和10.1%演变为53.2%、10.9%、23.2%和12.7%,农业比重下降6个百分点,林业、牧业和渔业比重分别上升1.9个、1.5个和2.6个百分点。全市六大优势产业和五大特色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6.6%提高到2005年的67.8%;粮经种植比由2000年的64.4:35.6调整为2005年的46.8:53.2,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城市、平原、山区三大农业圈层格局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整体效益明显提高。

种植业结构调整。2005年,全市蔬菜总产量和总产值分别达到309.32万吨、35.77亿元,比2000年增长42.7%和31.2%,年均增长7.4%和5.6%;蔬菜产值占全市种植业产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0.2%提高到31.5%,成为种植业的第一大产业。花卉苗木持续增长。2005年,全市花卉苗木播种面积3.36亿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5.8倍,年均增长42.1%;实现花卉苗木产值22.47亿元,比2000年增长3倍,年均增长31.6%。水果产量突破50万吨。2005年,全市水果总

产量 52.55 万吨,比 2000 年增长 73.1%,年均增长 11.6%;实现水果产值 11.26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116.4%,年均增长 16.7%。茶叶生产继续增值。2005 年,全市茶叶总产量为 2.56 万吨,比 2000 年增长 3.2%;实现茶叶产值 12.93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77.8%,年均增长 12.2%。

林业经济快速发展。“十五”期间,全市完成造林更新面积 3.07 亿平方米,建设绿色通道里程 916 千米,实施生态公益林建设 56.67 亿平方米,涌现出一批“省级绿色小城镇”和“全国绿化千佳村”,森林覆盖率达 62.8%,比“九五”期末提高 0.9 个百分点。林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2005 年,全市实现林业产值 23.30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69%,年均增长 11.1%。在林业产值中,竹业产值 12.44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87.5%,年均增长 13.4%;干果产值 5.18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103.8%,年均增长 15.3%。

养殖业生产持续增长。2005 年,全市实现养殖业产值 76.67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66.6%,年均增长 10.7%;肉类、禽蛋产量分别达到 30.74 万吨、9.87 万吨,比 2000 年分别增长 21.8%、62.0%,年均分别增长 4%、10.1%;节粮型畜禽产值 14.62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28.2%,年均增长 5.1%;蚕茧产值 3.40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81.0%,年均增长 12.6%。水产养殖保持良好势头。2005 年,全市淡水产品总产量达 14.78 万吨,比 2000 年增长 50.4%,年均增长 8.5%;渔业产值 27.08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97.4%,年均增长 14.6%。

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科技兴农”步伐明显加快。“十五”期间,杭州市围绕发展都市农业,加大农业投入,加快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至 2005 年末,全市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67 家,其中年销售亿元以上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 46 家;建立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316 家。

5.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农村稳定

“十五”期间,杭州市切实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积极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施乡村通达工程,抓好农村教育培训,深化“49100”帮扶工程,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科技文化信息服务,强化农村生态建设,逐步解决农村行路难、保障难、看病难、住房难、饮水难等问题。五年间,全市完成 91 个示范村、642 个整治村的建设任务,对 1708 户农村贫困家庭的危房进行了改造,帮助 50 万农民解决了饮水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2%,培训各类农民近 50 万余人,转移就业 8.1 万人。2005 年,全市普遍建立了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低保”标准在每月 130 元以上;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乡镇覆盖率达 100%,农民参保率为 89.6%,参保农民平均受益率达 20.7%,居全省第一位;全市通乡镇公路的等级率和硬化率达 100%;列入帮扶工程的 49 个乡镇和 100 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4409 元和 3761 元。农村文化信息服务体系日渐完善,全市 90.2% 的行政村开通有线电视,78% 的村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点。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一)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1992 年及以前,杭州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 1.64:1~1.73:1,1991 年及以前收入差额在 1000 元以内。1993 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93 年至 1998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2.01:1~2.32:1,1999 年至 2000 年有所缩小,1992 年至 2000 年收入差额在 5000 元以下。2001 年以后,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 2.04:1~2.17:1,2001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

额超过 5000 元,2005 年收入差额达到 8946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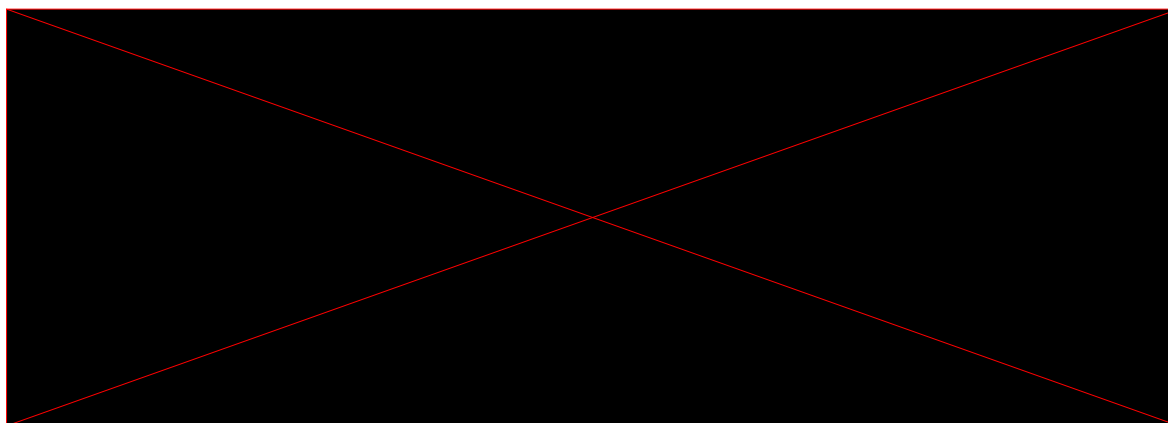


图 15 1985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 16 1985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年份	城市是农村的倍数(倍)	城市比农村高(元)
1985	1.64	402
1986	1.74	496
1987	1.54	440
1988	1.57	569
1989	1.58	647
1990	1.69	813
1991	1.63	820
1992	1.73	1087
1993	2.02	1777
1994	2.32	2982
1995	2.09	3289
1996	2.07	3724
1997	2.09	4111
1998	2.11	4459
1999	1.98	4503
2000	1.98	4774
2001	2.04	5567
2002	2.06	6070
2003	2.06	6648

续表

年份	城市是农村的倍数(倍)	城市比农村高(元)
2004	2.10	7615
2005	2.17	8946

(二) 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异

衡量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状况最重要、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运用基尼系数的大小来分析收入差异状况时,国际上一般认为:0.2 以下为绝对平均,0.2 ~ 0.3 为比较平均,0.3 ~ 0.4 表示较为合理,0.4 ~ 0.5 表示差距较大,0.5 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

杭州市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 1997 年以前基本稳定在 0.1293 ~ 0.1999,1998 年至 2002 年呈逐年扩大态势,2003 年有所缩小,从 2004 年开始进一步扩大,2005 年达到 0.3203;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 2000 年至 2005 年均在 0.3 以上,其中 2000 年至 2001 年呈扩大态势,2002 年至 2003 年有所缩小,从 2004 年开始进一步扩大,2005 年扩大到 0.3730。

进入 21 世纪后,“三农”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关注的热点,其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十五”后期,国家制定了逐步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使农民尤其是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靠农业支援工业的格局有望打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正在到来,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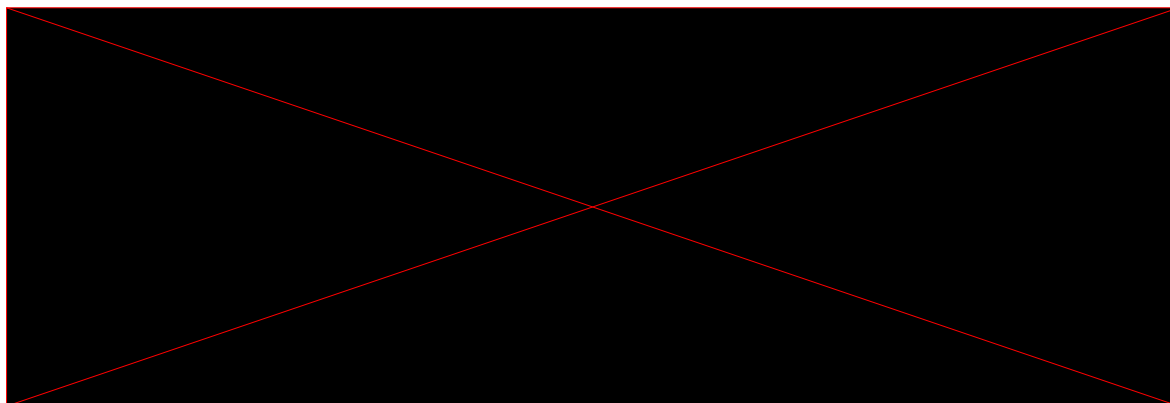


图 16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表 17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年份	城市	农村
1985	0.1293	—
1990	0.1544	—
1991	0.1492	—
1992	0.1663	—

续表

年份	城市	农村
1993	0.1777	—
1994	0.1846	—
1995	0.1848	—
1996	0.1999	—
1997	0.1953	—
1998	0.2175	—
1999	0.2213	—
2000	0.2368	0.3520
2001	0.2348	0.3687
2002	0.3407	0.3643
2003	0.2670	0.3593
2004	0.2914	0.3599
2005	0.3203	0.3730

第二部分 城乡居民消费

杭州的城市特色是什么?许多对杭州比较了解、熟悉的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环境优美、经济活跃、文化繁荣,是一个很适宜生活的城市。“人间天堂”作为一种现实中的理想,其真正含义也在于此。

杭州城市特色表现在经济运行上,即形成围绕日常生活服务和消费的产业特色。工业中,以生产最终消费品为主、精致轻型的轻工、丝绸、化工、医药、机械、家电等门类比较齐全。旅游业上,娱乐、休闲观光、人文、会展等互相渗透,形成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文化休闲旅游特色。西博会以生活日用品展销为主,“博中求精”的要求体现了适宜生活的特色。

这些都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日常消费中。消费是指城乡居民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是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社会消费的70%~80%,居民消费对市场的导向作用日益增强。因此,正确把握居民的消费结构,了解居民对消费需求的变动规律,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档次和生活质量,更可以根据居民的消费结构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概述

据杭州城市居民家庭多年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服务性消费支出逐年增大,生活质量日益提高。

表 18 1990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家庭总支出及消费支出

单位:元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城 市	总支出	1774.08	6531.96	9169.32	10092.68	12084.52	12812.55	14139.42	17260.06
	消费性支出	1685.28	5558.62	7789.68	8967.8	9214.59	9949.76	11212.78	13437.58
农 村	总支出	1224	3457	3789	4757	5354	5982	6503	9874
	消费性支出	923	2373	3020	3479	3957	4578	4993	6004

图 17 给出了 1990 年至 2005 年主要年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从图中可看出,城市居民消费占支出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由 1990 年的 94.99% 降到 2005 年的 77.85%。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有一定波动,2000 年达到最高点 79.70%,2005 年达到最低点 60.81%。比较城镇和农村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城市消费支出比重始终高于农村。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间,城乡间居民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差距不大,而在其他的年份则基本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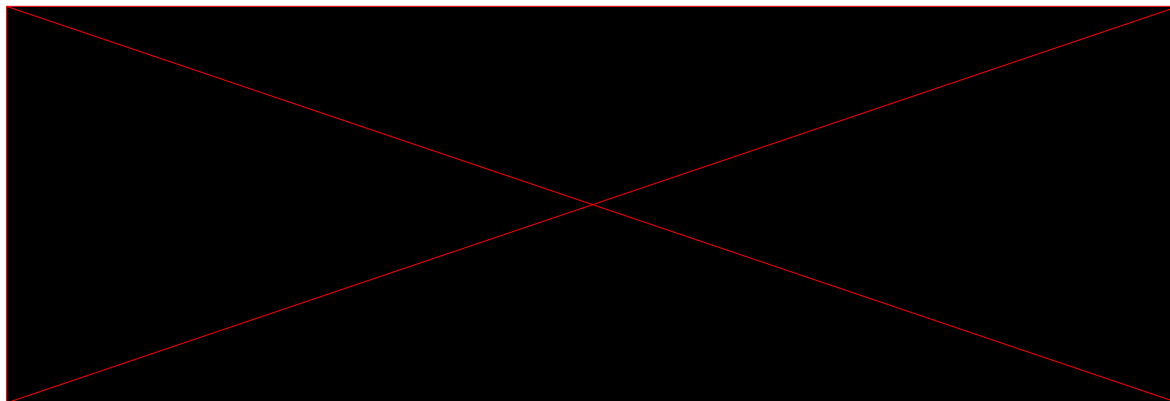


图 17 1990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衡量物价总水平的主要指数。经国务院批准,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这一指数改换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①。而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相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除了反映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外,还反映服务价格的变动,即居民消费价格不仅包括消费者日常购买消费品的价格,还包括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的价格。因此,采用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物价总水平,能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市场价格的实际变动状况。

^①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

表 19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 = 100)

年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986	106	106.1
1987	110.5	111.3
1988	121.9	123.4
1989	117.8	118.2
1990	104.6	104.4
1991	107.2	106.9
1992	110.4	110.2
1993	121.4	117.3
1994	121.5	118.8
1995	116.5	113.3
1996	110.5	107.2
1997	106.7	102.4
1998	101.8	99.8
1999	100.4	98.2
2000	100.8	98.3
2001	99.5	95.3
2002	98.8	97.9
2003	99.5	98.1
2004	102.5	101.6
2005	101.7	100.3

从表 19 中可以看出:1985 年至 1988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走高,1988 年达到 121.9。这一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大幅上涨,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通货膨胀。1989 年,政府加强宏观调控。1990 年,过热的经济降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大幅回落,比 1988 年低 17.3 个百分点。1992 年,市场化价格改革取向更加明晰,价格总水平开始回升,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1994 年,达到 121.5,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通货膨胀。1995 年,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渐回落,商品价格变普遍上涨为有涨有落,成功实现了价格总水平的“软着陆”。经历了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1998 年以后,价格总水平温和波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 100 左右,最大振幅为 2.5%,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2003 年以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止跌转稳,温和上涨。

二、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性分析

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个人商品及服务八大类。20 年间,八大类消费水平有了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个人商品及服务和城市居民居住消费增长较快,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上升,吃、穿、用和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增长较缓,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1986年以后,城乡居民生活由最基本的吃、穿、用和农村居住消费不断向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城市居住消费升级。表20给出了1986年至2005年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增长及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

表20 1985年—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各项消费增长和结构变动总趋势

项 目	2005年 消费水平(元)		1986年—2005年 每年递增(%)		2005年 消费结构(%)		2005年比1985年 上升或下降(百分点)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消费性支出	13438	6004	14.40	12.80	100	100	—	—
食品	4682	2145	12.20	10.50	34.80	35.70	-17.20	-18.50
衣着	1299	381	11.70	11.00	9.70	6.30	-5.80	-2.4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674	307	8.20	9.30	5.00	5.10	-10.40	-4.50
医疗保健	983	474	22.30	21.50	7.30	7.90	5.40	6.10
交通和通信	2234	680	26.10	31.10	16.60	11.30	14.20	10.7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970	735	18.60	19.00	14.7	12.20	7.50	8.00
居住	1151	1143	19.30	12.40	8.60	19.00	4.90	-1.20
个人商品和服务	445	139	17.90	19.60	3.30	2.30	1.50	1.60

可以看出,1986年至2005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及其中的八大类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均无明显差异。而从各消费类来看,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年均增长率在八大类中最低,不足10%。在2005年,相对1985年的城乡消费结构中,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所占比例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交通和通信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呈现出超过10%的增长。

图18、图19直观地介绍了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

图18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到,食品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达到34.8%,其次是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分别占16.6%和14.7%。所占比例较低的依次是个人商品和服务3.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5%,医疗保健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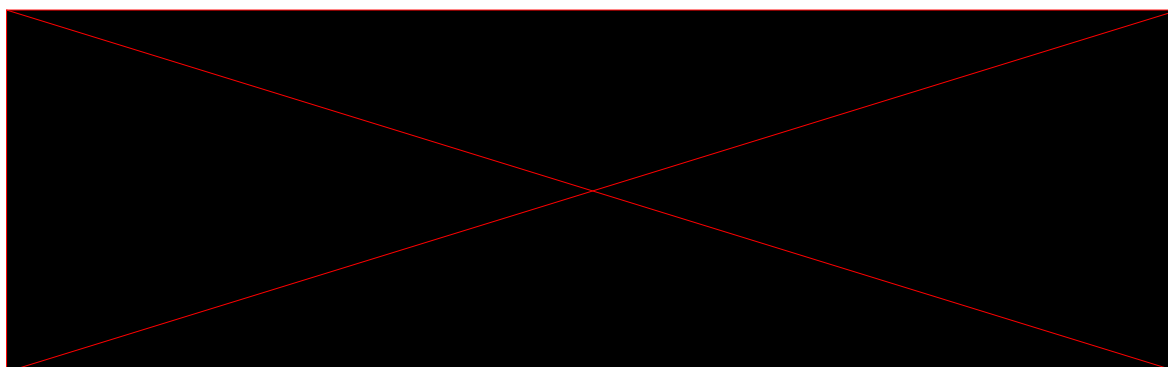


图18 2005年杭州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

图 19 是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发现,2005 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除在居住上的花费外,并无显著差异,居住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中占 8.6%,而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占 19%。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占较高比例的是食品 35.7%,居住 19%,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2.2%。占较低比例的依次是个人商品和服务 2.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1%,衣着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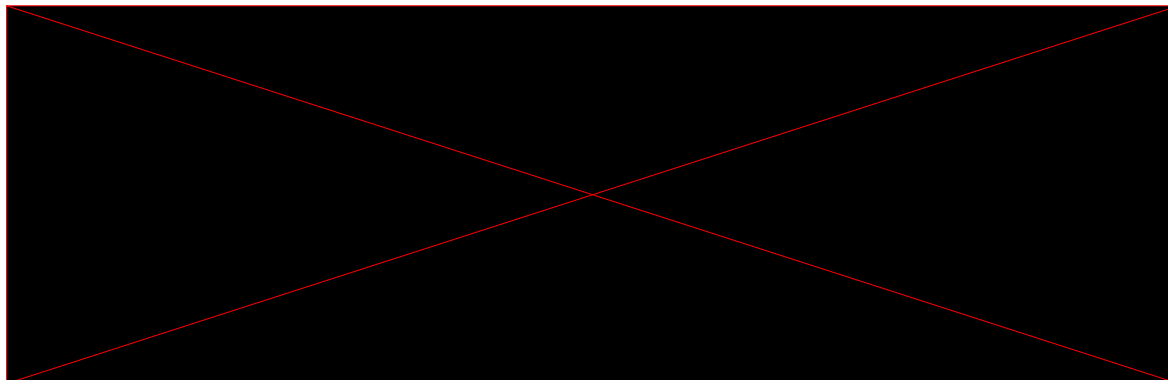


图 19 2005 年杭州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明显加快,改革开放前努力了 30 年的温饱问题在“六五”期间短短几年中得到彻底解决。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摆脱了票证的限制,真正达到丰衣足食的温饱阶段,并开始向小康目标迈进。

表 21、表 22 给出 1990 年至 2005 年主要年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八大类消费情况。

表 21 1990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食品类	916.6	2774	3303	3501	3707	3853	4421	4682
衣着类	225.2	665	645	729.3	836.7	814.7	921.8	1299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56.9	491.5	626.5	944.9	566	584.5	560.8	673.5
医疗保健	34.78	145.1	444.1	628	746.2	873.6	855.4	983.1
交通和通信	30.91	280	547.5	697.5	788.3	958.6	1280	2234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84.5	433.1	1079	1269	1461	1518	1717	1970
居住	87.78	488	701	710.6	807.8	1038	1062	1151
杂项商品和服务	48.67	281.5	442.9	487.7	302	308.5	395.4	445.3

表 22 1990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食品类	525.4	1213	1239	1388	1528	1662	1916	2145
衣着类	61.31	169.2	147	169	213	243	282	38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68.4	154.5	145	159	211	279	263	307
医疗保健	29.72	99.06	182	210	291	316	356	474
交通和通信	8.19	102.2	283	283	350	464	577	68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32.44	155.8	293	409	460	603	656	735
居住	174.1	395.8	618	700	739	900	839	1143
杂项商品和服务	23.1	83.73	128	162	165	111	104	139

1986 年至 2005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都有极大的飞跃。表 23 给出了 1986 年至 2005 年城乡人均消费支出。

表 23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年份	城镇	农村
1986	1072	601
1987	1118	714
1988	1515	925
1989	1615	1011
1990	1685	923
1991	1894	1018
1992	2296	1129
1993	3183	1276
1994	4559	1844
1995	5559	2373
1996	6095	2772
1997	6766	2762
1998	7235	2858
1999	7424	2851
2000	7790	3393
2001	8968	3909
2002	9215	4444

续表

年份	城镇	农村
2003	9950	5142
2004	11213	5608
2005	13438	6004

从表中可以看到,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分别为13438元和6004元,比1986年增加12366元和5403元。

图20则更直观地给出了20年间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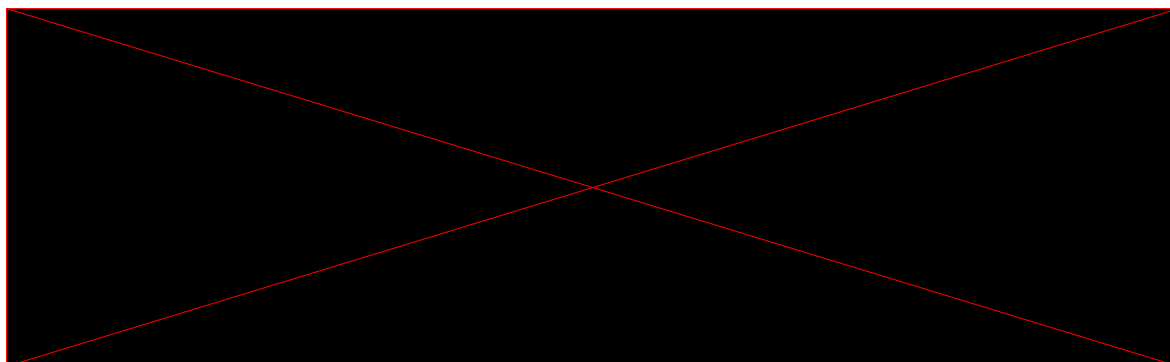


图20 1986年—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随着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度巨幅提高,城乡间消费数值差距也逐渐拉大。

以下将以消费结构的具体分类为主线,分析1986年至2005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消费特征。

(一) 食品类

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居民的饮食水平都是消费水平的重要方面。在衡量食品消费水平时,恩格尔系数^①是世界通用的衡量指标。

1. 恩格尔系数

图21显示,1986年至2005年,杭州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表明居民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改革前30年以及改革初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在57%以上,保持在刚刚脱贫但仍在温饱最低线上徘徊的水平。直到“六五”期间,国家经济实力发展,市场供应日趋繁荣,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198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到51.6%,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历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1992年首次跌落50%大关之后继续下降,1998年达到44.70%。

^① 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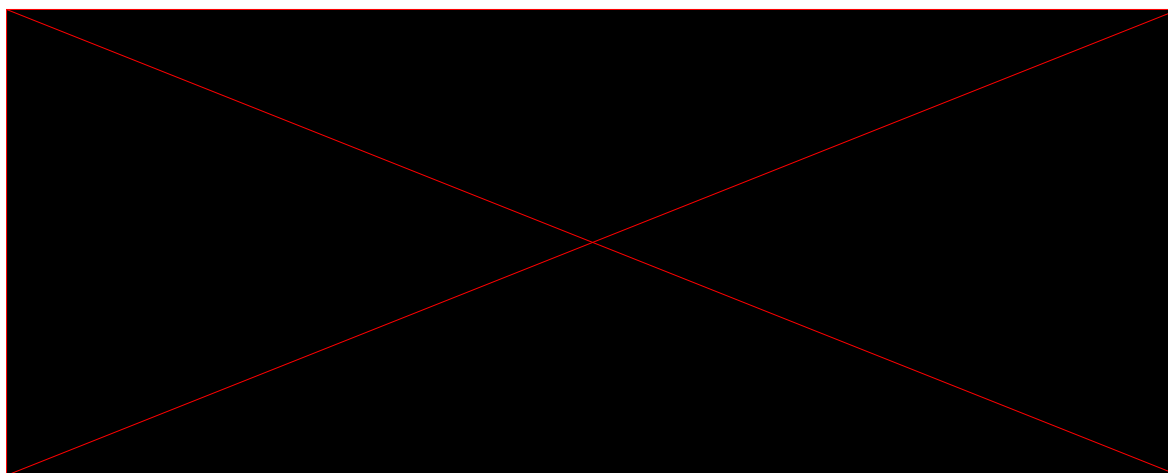


图 21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从 1986 年的 50% 以上到 2005 年的 35% 左右,城乡共同表现是食品类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百分比逐年下降。同时,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相差无异。表 24 给出了 1986 年至 2005 年城乡居民食品类消费占总消费的百分比(恩格尔系数)。

表 24 1986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单位:%

年份	城镇	农村
1986	51.6	51
1987	55.6	50.1
1988	51.8	47.7
1989	55	49.9
1990	54.4	56.9
1991	53.3	54.4
1992	49.9	52.3
1993	47.3	49.4
1994	47.6	50
1995	49.9	51.1
1996	50.2	52.2
1997	46.5	49.3
1998	44.7	46.3
1999	42.2	46.7
2000	42.4	41

续表

年份	城镇	农村
2001	39	39.9
2002	40.2	38.6
2003	38.7	36.3
2004	39.4	37.2
2005	34.8	35.7

2. 食品消费结构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杭州市居民饮食质量不断提高,食品消费更加注重质量。除粮食之外,城乡居民副食品消费量不断增加,更加重视食品营养。吃得好、吃得有营养成为居民家庭的普遍选择。居民家庭日常饮食中,奶及奶制品消费越来越多,食用油的选择也更讲究营养价值。2005年,人均奶及奶制品支出为278元,比上年增长5.9%。主副食品消费量的变化,说明杭州市居民饮食结构继续优化,营养更趋均衡。

此外,杭州市居民饮食服务支出不断攀升,“十五”期间占食品支出的比重接近30%。2005年,城市居民的人均饮食服务支出为1387元,占食品支出的29.6%。

突出的变化还表现在外出用餐增多。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变化,在饭店聚会吃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90年,杭州城市居民人均在外就餐消费额为69.76元,而2005年,人均在外饮食支出为1233元,比上年增长28.1%,是1990年的17.67倍。

表25给出了主要年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及结构。从表中可以看出,城乡食品消费结构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表25 1985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年 消费结构	1991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食品	100%	1009/100%	3303/100%	4682/100%
粮油类	10.2%	89/8.8%	333/10.1%	400/8.5%
肉禽蛋水产品	33.3%	364/36.1%	1073/32.5%	1096/23.4%
蔬菜	7.8%	104/10.3%	303/9.2%	365/7.8%
糖烟酒饮料	13.8%	144/14.3%	502/15.2%	821/17.5%
干鲜瓜果	9.5%	87/8.6%	256/7.8%	335/7.2%
糕点奶及制品	4.9%	53/5.3%	193/5.8%	278/5.9%
饮食服务及其他	20.6%	168/16.7%	643/19.4%	1387/29.6% (其中在外用餐1233/26.3%)

就城市居民食品消费来说,1985年至2005年各类食品消费结构变化不大,各项消费水平均有较高幅度的增长。在前面时间段,肉禽蛋水产品占消费的主要部分,其次是饮食服务及其他、

糖烟酒饮料。而在 2005 年,饮食服务及其他跃升为消费结构的主要部分,其中在外用餐占据很高的比例。1985 年至 2005 年,糕点奶及制品、蔬菜、干鲜瓜果始终占较小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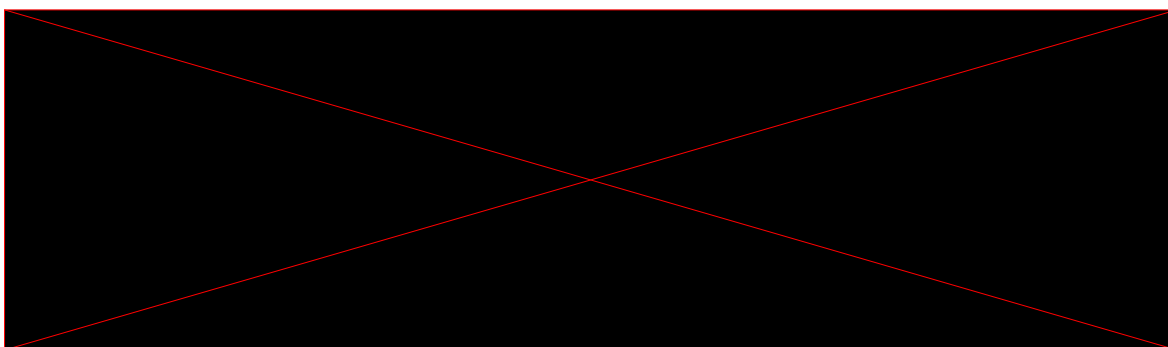


图 22 1985 年杭州市城镇食品消费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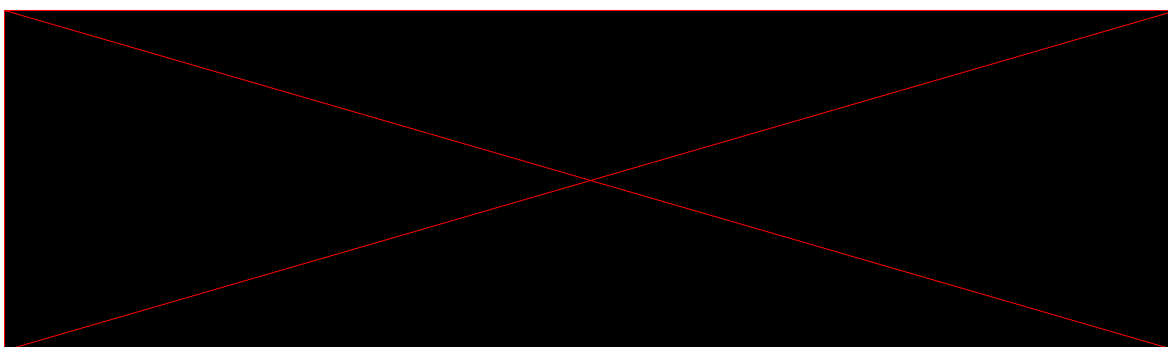


图 23 2005 年杭州市城镇食品消费结构

就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来说,20 年间结构表现出很大的变化。在各类别支出的绝对数量上,除粮油类、饮食服务及其他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外,其余类别消费数额均增长。1985 年,食品消费结构中占前三位的依次是粮油类 30.40%,肉禽蛋水产品 22.80%,蔬菜 21%。后三位的是糕点奶及制品 2.5%,干鲜瓜果 4.5%,饮食服务及其他。而在 2005 年,食品消费结构中位于前三位的依次是肉禽蛋水产品 31.8%,糖烟酒饮料 22.5%,粮油类 12.2%;后三位依次是干鲜瓜果 5.8%,蔬菜 8.3%,糕点奶及制品 8.7%。蔬菜由 1985 年的前三位降为 2005 年的后三位。另外,相对城市居民食品消费而言,农村居民在外就餐所占比例较低,仅为 10.3%。

就农村来说,1985 年至 2005 年,除粮食和酒类的消费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饮料和水产品消费量已经成为两大热点。就城市来说,粮食消费量大幅锐减,鲜菜消费数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余类别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或持平,其中水果类、牛羊肉、家禽、鲜奶、水产品呈倍数增长。

表 26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6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食品	100%	1387/100%	1392/100%	2145/100%
粮油类	30.4%	308/22.2%	266/19.1%	261/12.2%
肉禽蛋水产品	22.8%	358/25.8%	386/27.8%	682/31.8%
蔬菜	21%	116/8.4%	126/9.1%	178/8.3%
糖烟酒饮料	13.5%	219/15.8%	345/24.8%	483/22.5%
干鲜瓜果	4.5%	60/4.3%	87/6.3%	125/5.8%
糕点奶及制品	2.5%	93/6.7%	73/5.2%	188/8.7%
饮食服务及其他	5.30%	232/16.8%	108/7.7%	229/10.7% (其中在外用餐 22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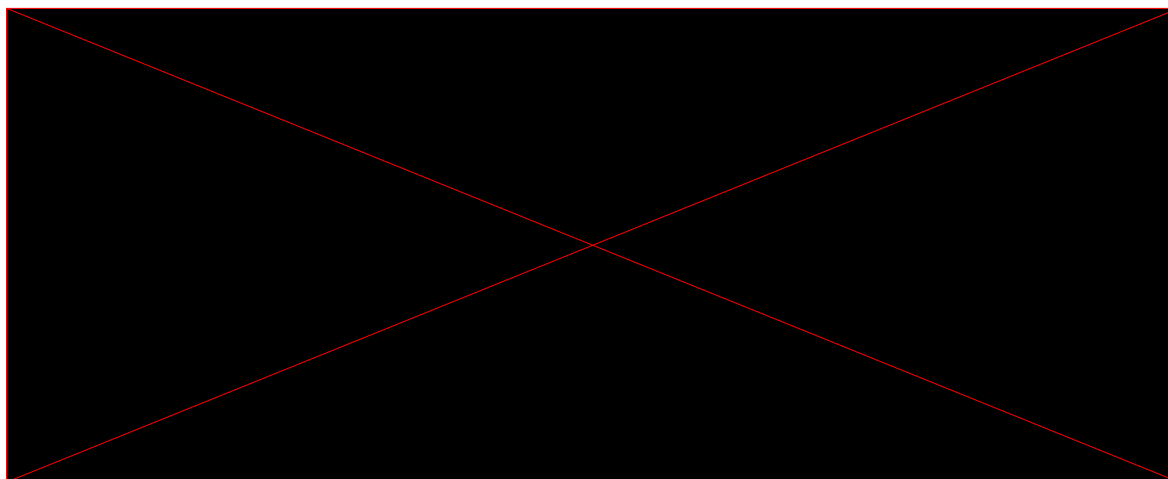


图 24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粮食消费量

从图 24 中可以看出,1985 年至 2005 年,城镇居民粮食消费量有着明显的变化,从 1985 年的人均 530 千克下降为 2005 年的人均 163 千克。这与恩格尔系数所反映的信息一致,即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不仅仅消费粮食,更多的转移到鱼肉蛋奶水果等其他产品,从而使得粮食的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农村,这一指标并不显著,从人均 91 千克下降到 69 千克。这主要由于农村存在自产自销,统计上并不计算在内,所以与城镇居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从图 25 中可以看出,鲜菜类消费品变化则基本相同,农村和城市都有稍微下降的趋势,但是总体消费水平变化不大。这主要与人们饮食习惯的变迁相关。人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时,鱼、肉、蛋、奶、水果等的消费量会有明显的上升,因为对很多家庭而言,这些都是在以前不能够经常消费的,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渐渐熟悉了这些日常产品,消费量也就趋于平衡了。对于新鲜蔬菜,随着人们对健康、绿色食品的要求日益显著,蔬菜的消费量不仅不会下降,而且还会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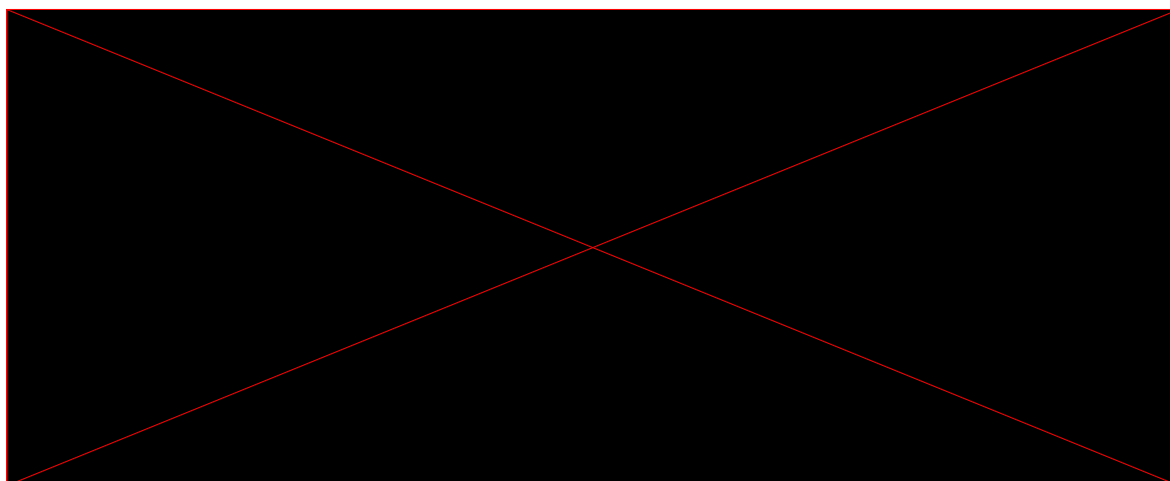


图 25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鲜菜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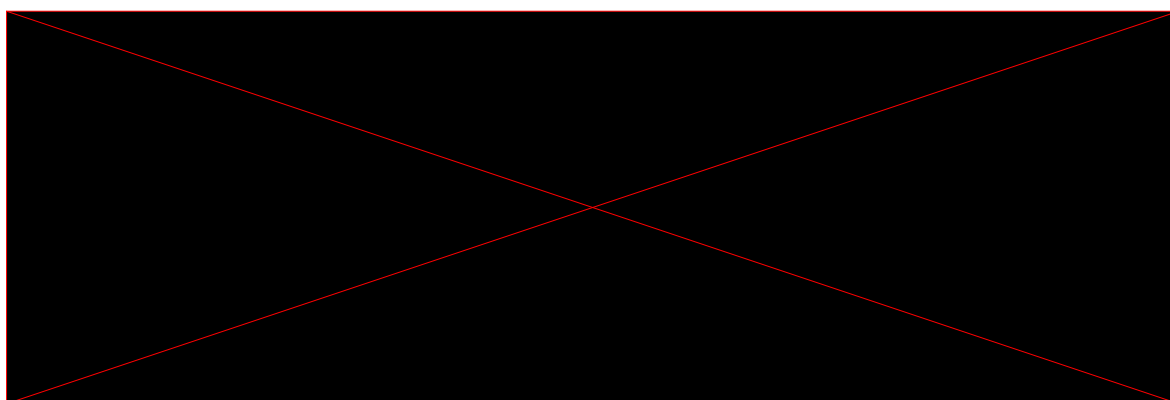


图 26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水果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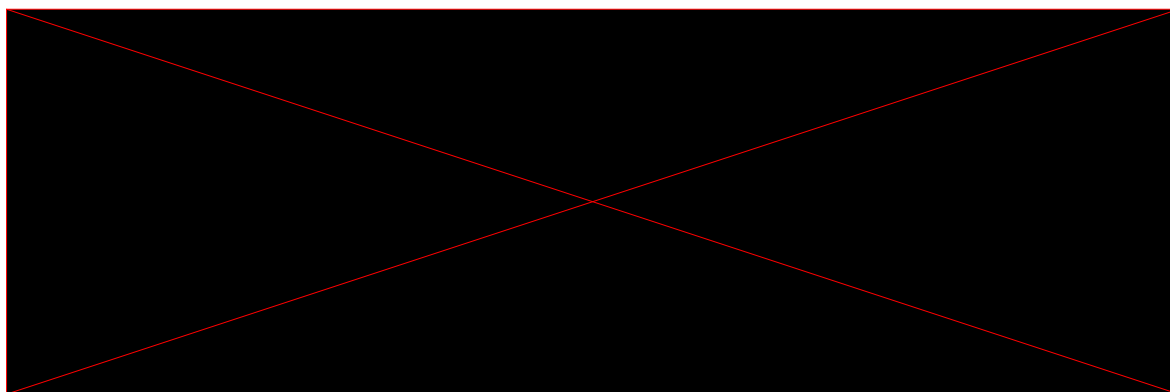


图 27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鲜奶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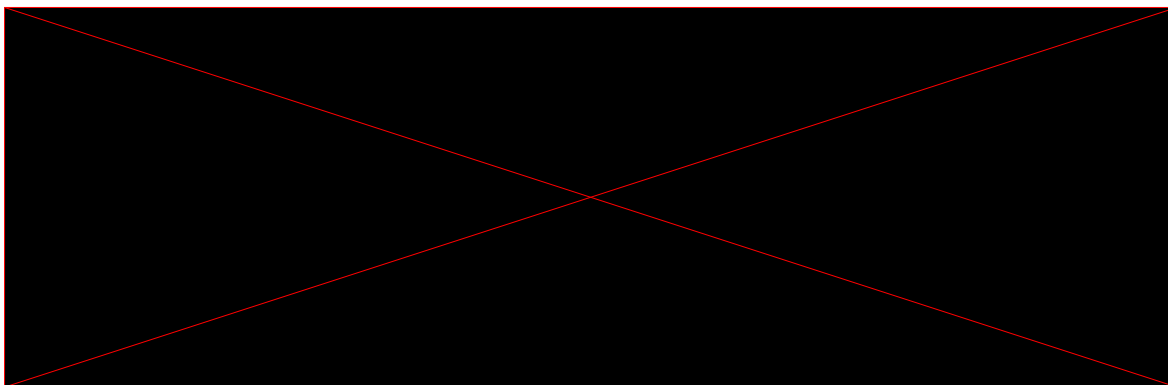


图 28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水产品消费量

图 26、图 27、图 28 对比了城乡居民对水果、鲜奶、水产品消费量的变化。总体趋势是非常显著的,所有的量柱都有明显上升。

1985 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果 55 千克,而 2005 年人均消费水果达到 68.8 千克。而且,从数量中没有反映,但在生活中人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水果的种类远远超过 20 年前,不仅有时令水果,而且有很多跨季节水果,比如冬天的西瓜、夏天的菠萝和香蕉等。由于交通运输的便利,杭州的市场上汇集了从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从国外运来的水果,无论在哪个季节,都可以有多种选择。

农村居民的鲜奶消费量极低,只有极少的人日常消费鲜奶。2005 年,农村人均鲜奶消费量只有 3 千克,而这个数字在城镇为 19.6 千克。当然,引起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饮食习惯,日常饮用新鲜牛奶并没有为很多农村家庭所接受,所以消费量明显过低,不能以此判断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较低。

从水产品的消费量中也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经济不发达,盛产水产品的地方多为农村,因运输力量有限,很多水产品都只能在当地消费。1985 年,城镇居民水产品人均消费量为 1 千克。而随着经济和道路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很多水产品在捕捞后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城市,所以城镇居民水产品的消费量随之提高。2005 年,人均消费水产品 12.8 千克,超过了农村居民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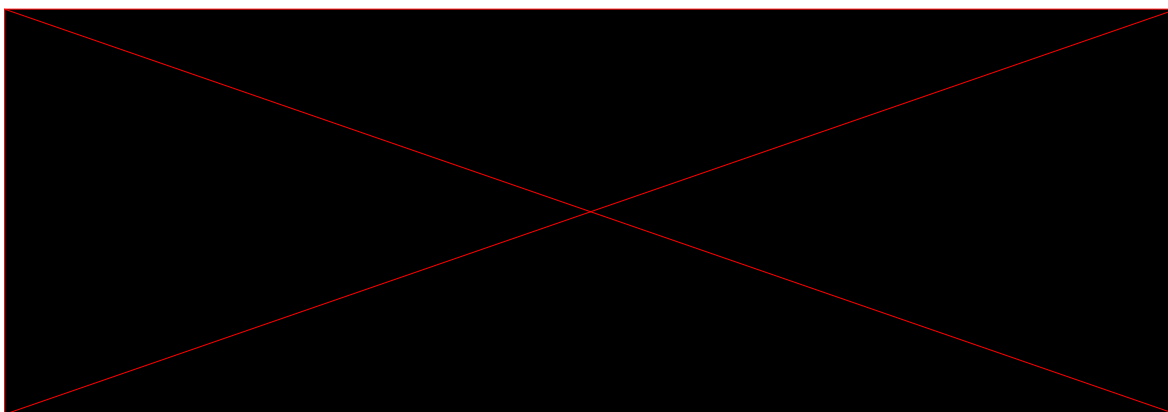


图 29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人均卷烟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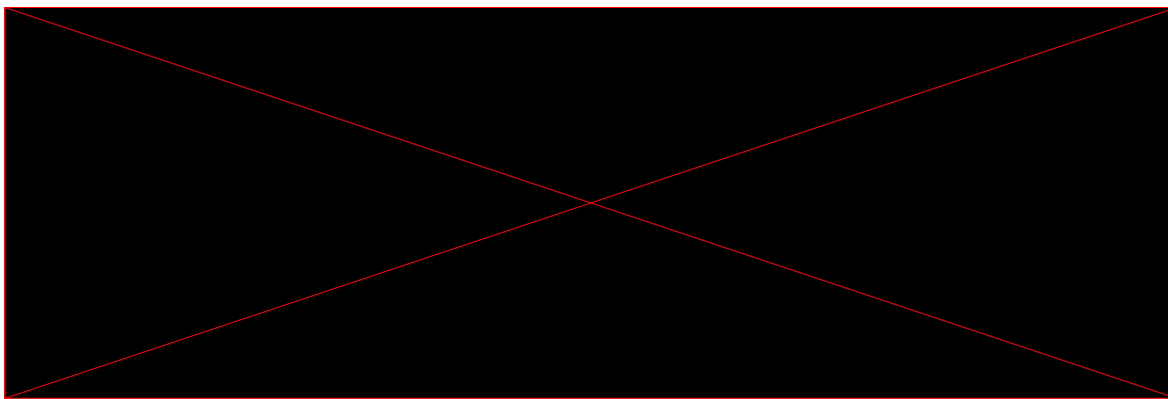


图 30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人均酒消费量

图 29、图 30 是 1985 年至 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卷烟和酒上的消费量对比。

就卷烟而言,农村的人均消费量更高,但是也有所下降,从 1985 年的人均消费 57 盒,下降到 2005 年的人均 44 盒;城市则从 1985 年的人均消费 43 盒,下降到 2005 年的 36.8 盒。

酒是食品消费中比较特别的一类,1985 年至 2005 年,人均年消费量基本没有变化,城市和农村也基本没有差异,除 1991 年由于物价上涨影响了酒的消费量外,其他时间基本在人均 21 千克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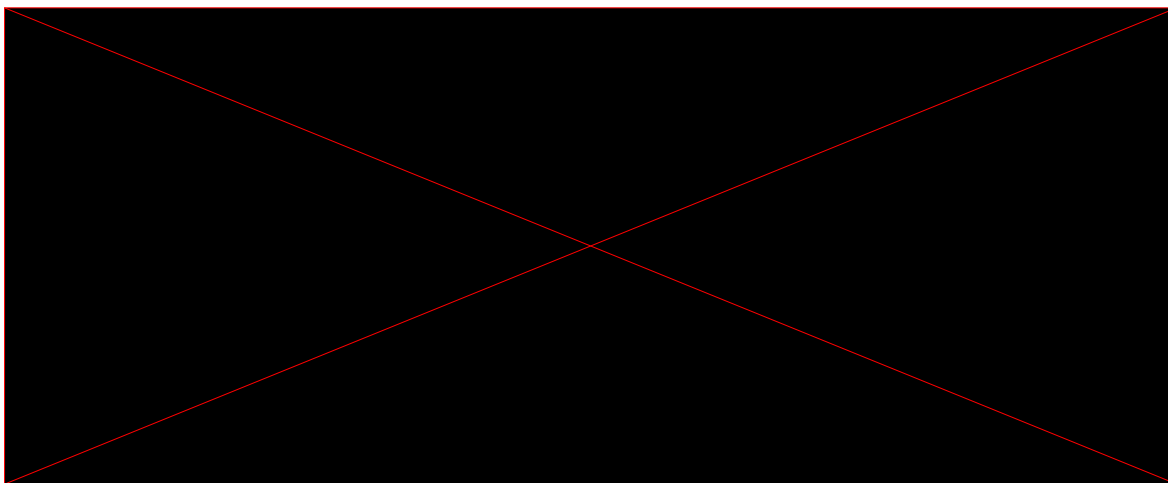


图 31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居民人均饮料消费量

从图 31 可以看出,饮料方面的饮食习惯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改变。1985 年,杭州市人均饮料消费量仅有 0.3 千克。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果汁、可乐等种类繁多的饮料逐渐被人们所接受。2005 年,杭州市人均饮料消费量高达 36.7 千克。

(二) 衣着类

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极为单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当时社会提倡的风气。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各种款式花色的服装为城镇居民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2005年,杭州居民人均年购买服装支出1299元,衣着消费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同时,购买衣料支出有所减少,反映出城镇居民衣着消费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自己动手缝制衣物的比重越来越小。

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浙江民营经济中有一定地位的成衣制造业的发展,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质量有所提高,逐步向中高档、个性化、多样化方面转变,消费更加注重款式、花样,而价格的考虑则是次要因素。近年来,城市居民衣着消费追求时尚,追求品牌,服装消费有高档化、时装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衣着消费增长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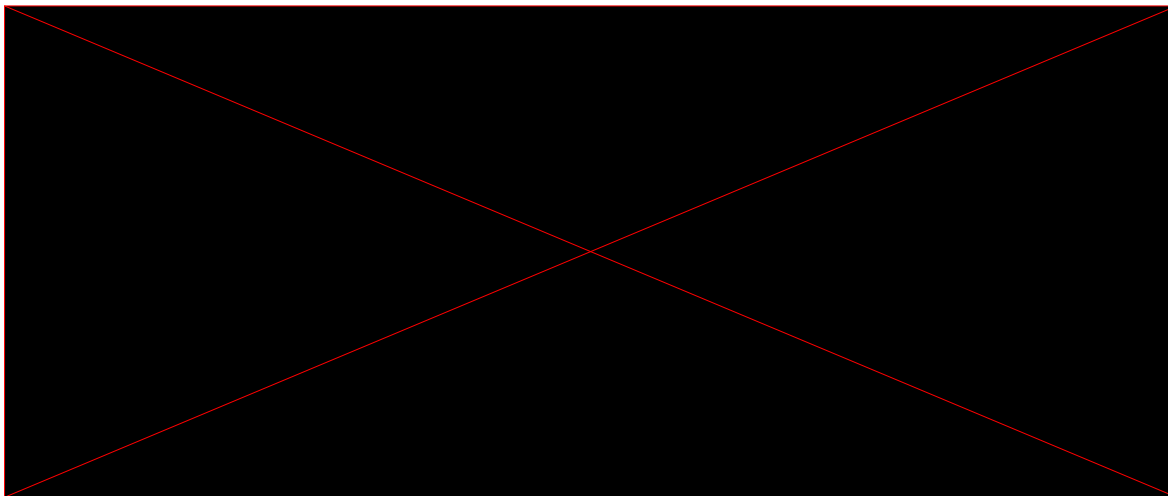


图 32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衣着消费

表 27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衣着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城市消费水平(元)/结构				农村消费水平(元)/结构			
	1985	1991	2000	2005	1985	1996	2000	2005
衣着	100%	277/100%	645/100%	1299/100%	100%	186/100%	169/100%	381/100%
服装	46.30%	156/56.4%	457/70.9%	1009/77.7%	22.7%	91/49.2%	102/60.6%	284/74.5%
材料	27.80%	48/17.3%	19/2.9%	8/0.6%	33.4%	24/12.9%	7/4.1%	2/0.5%
鞋类	12.0%	49/17.8%	132/20.4%	246/19%	12.7%	37/19.7%	41/24.3%	77/20.3%
其他	13.90%	24/8.5%	38/5.9%	34/2.7%	31.2%	34/18.2%	19/11.0%	18/4.7%

说明:1985 年仅有消费结构数据。

在城市,服装消费始终是居民衣着消费的主体,1991年服装消费比重上升到56.4%,居各类衣着消费的第一位。农村1996年上升到49.2%,由1985年以衣着材料消费为主上升到以服装

消费为主。城市1991年、农村1996年人均服装购买量为3.1件、0.91件。此后,成衣化趋势进一步增强,2000年城乡居民服装消费比重上升到70.9%、60.6%,年人均服装消费量为6.8件、1.29件。衣着材料消费下降,这一时期已由温饱阶段的自制成衣转向委托服装店制作成衣。2000年以后,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基本实现了成衣化。2005年,服装消费占衣着消费支出比重城市上升为77.7%,农村上升为74.5%,人均服装购买量分别为9.5件和3.46件。城市居民由1985年的1季不到1件增加到1季2.4件,农村居民由1985年的1季不到1件增加到1季0.87件。总体上看,城乡衣着类消费结构越来越接近。

(三) 交通和通信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节奏加快,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迅速进入居民消费中。

20世纪80年代末期,杭州市城市、农村居民交通消费年递增11.2%和38.9%,占交通与通信消费的比重分别在1991年、1996年下降到84%、76.3%,但仍是城乡居民交通与通信消费的主流。杭州市城市、农村居民的通信消费增长速度则加快,年递增36.6%和69.5%。这一阶段的通信消费主要是邮费。在此期间,杭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1991年每百户拥有量为252辆;农村居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和摩托车,摩托车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年递增32.1%。1991年,农村居民家庭自行车和摩托车每百户拥有量为204辆和15辆。

表 28 1985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交通与通信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目	城市消费水平(元)/结构				农村消费水平(元)/结构			
	1985	1991	2000	2005	1985	1996	2000	2005
合计	100%	46/100%	548/100%	2234/100%	100%	141/100%	204/100%	680/100%
交通	94.80%	38/84%	162/29.7%	1506/67.4%	96.70%	108/76.3%	128/62.6%	388/57.1%
通信	5.20%	7/16%	385/70.3%	728/32.6%	3.30%	33/23.7%	76/37.4%	292/42.9%

20世纪90年代,通信消费成为杭州市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年递增55.3%和23.2%,占交通与通信消费的比重在2000年上升到70.3%和37.4%,城市居民由温饱阶段的以交通消费为主转为以通信消费为主。这一阶段的通信消费主要是通信费。杭州市城乡居民家庭自行车拥有量下降,家用汽车开始进入城市居民家庭,摩托车在农村的普及速度加快。通信工具从无到有,并迅速普及。2000年,杭州市城市、农村居民普通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为95部和46部,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为19部和17部。

21世纪初,杭州市城乡居民交通与通信消费年递增32.5%和27.2%。城市交通消费增长快于通信消费,年递增56.1%,占交通与通信消费的比重在2005年上升到67.4%;农村通信消费增长快于交通消费,年递增30.7%,交通消费比重下降,2005年下降到57.1%,但仍是交通与通信消费的主流。杭州市城乡居民家庭交通工具形成了以自行车为主,摩托车、助力车和家用汽车为辅的格局。家用汽车成为城乡居民消费热点,2005年每百户拥有量为13辆和4辆;通信工具形成了以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为主,以互联网和传真(输)为辅,多样化通信工具并存的格局。其中,移动电话仍是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每百户拥有量年递增56.6%和49%,2005年城市、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79部和125部。2005年,杭州市城市居民每百户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

机、移动电话为 55 部和 3 部,有传真机的家庭占 5%。

表 29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城乡居民交通与通信工具每百户拥有量

项 目	城 市		农 村	
	2000	2005	2000	2005
自行车(辆)	225	145	183	124
家用汽车(辆)	1	13	—	4
摩托车(辆)	—	29	38	73
普通电话(部)	95	100	46	89
移动电话(部)	19	179	17	125
传真机(部)	—	5	—	—

1. 交通消费比重上升,出行方式升级

历史上看,由于受到交通工具的制约,城市的结构较为紧凑,居民出行距离相对较短。城市居民出行方式中,自行车和步行平均占总出行量的 50%~60%,如果不计步行交通方式,自行车出行占 60% 以上。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住宅区也由市中心逐渐向外环线以外拓展延伸,城市辐射范围逐渐扩大,部分居民新购商品房远离市中心。由于居民上班、上学路途延长,出行的方式也随路途的远近而变化,乘公交车、私家车出行的居民有所增加。据专项调查显示,在乘坐公交车、单位班车和私家车上班的居民中,有 64.7% 的居民上班单程距离是在 10 千米以上。

城市辐射范围逐渐扩大和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促使居民出行向多元化发展,优化了居民的出行方式。随着城市交通向多元化格局发展,居民选择出行方式的空间和领域不断扩大,道路交通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人们使用的交通手段日益先进,方式日益便捷。一是助力车以其轻便、省时、省力占据了摩托车的位置,迅速挤入自行车行列,得到了上班族的青睐,拥有量上升。2005 年,居民家庭百户拥有助力车 10.6 辆,比 2002 年增长了 4 倍;而摩托车和自行车拥有量逐年下降,百户拥有摩托车 8.2 辆、自行车 202.5 辆,分别比 2000 年下降 12.8% 和 12%。

据有关抽样调查,2005 年,居民出行选择自行车的占 47.6%,比 2000 年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选择步行的占 24.7%,比 2000 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选择公交车的占 15.2%,比 2000 年提高了 8.8 个百分点;选择出租车的占 2.5%,比 2000 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选择私家车的占 3.1%,比 2000 年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由于 2000 年后部分路段对摩托车实行限行,选择摩托车等其他交通工具仅占 1.7%,比 2000 年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居民出行选择步行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乘坐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的比重呈现上升势头。调查中有 5.2% 的居民由原来骑自行车转为助力车,成为城市居民出行方式新的增长点。

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出行距离在 3 千米以下的步行占 27.4%,自行车占 67.9%;出行距离在 3.1 千米~5 千米的自行车占 94.7%,公交车占 5.3%;出行距离在 5.1 千米~10 千米的自行车占 76.7%,公交车占 16.7%;出行距离在 10.1 千米~15 千米的自行车占 69.2%,公交车占 30.8%;出行距离在 15.1 千米~20 千米的自行车占 29.4%,公交车占 59%;出行距离在 20.1 千米以上的

自行车占9%,公交车占72.7%。从这组调查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居民出行方式基本是根据出行距离的长短来选择的,即出行距离在10千米以内基本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超过10千米的则以乘坐公交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出行距离越长,乘坐公交车的机率越大。

(1)居民乘公交车出行的比重显著上升。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和公共交通业的快速发展,市民出行环境明显改善,为市民出行创造了良好的空间。各级政府本着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大容量快速公共汽车线路,形成方便、快捷、发达的公交网络。2005年前后,公交车发展前景越来越好,逐渐取代自行车的“老大”地位,成为居民出行的主体,机动化趋势显现。市内公共交通支出增长较快。2005年,居民家庭人均市内交通支出为360元,比上年增长22.7%。居民的市内公共交通支出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居民出行追求方便快捷舒适,乘坐快速交通和空调车的次数有所增加。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几十年来,城市居民主要的出行方式是自行车、步行和地面公交,且以自行车为主导方式。自行车出行速度相对较慢,一般为11千米/小时~14千米/小时。21世纪后,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提高和公交行业的快速发展,居民出行趋向个体化和机动化,逐渐由以自行车为主转向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据调查,未来五年居民出行选择自行车的机率为14.8%~48.8%,选择公交车的机率为30%~48.6%,选择出租车的机率为1.1%~23.7%,选择私家车的机率为3%~6%。

随着杭州市快速路、地铁等施工路段的竣工,公交车的运营环境将会进一步改善,车速及客流量将会有较大提高。据了解,公交集团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年客运量8亿人次的目标,公交运营线路数量继续扩增,线路长度达到9000千米,运营车辆达到7000辆,地面公交在市民出行比例上将占主导地位。

另外,至2005年末,全市出租行业共有运营车辆31940辆,年客运量3亿多人次。

(2)汽车进入百姓家。

汽车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标志性商品。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汽车和住房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产品,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阶段。

“九五”时期,汽车开始进入少数高收入家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汽车价格的逐步降低,拥有汽车的家庭逐年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杭州市私家车拥有量超过30万辆。私家车的快速发展,为居民出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而加速居民出行向多样化发展。2005年,居民家庭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9辆,比2002年增长了1.4倍。

2002年,私家小汽车开始进入被调查的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量为0.03辆,2004年增加到2辆,2005年上半年达到4.88辆。2005年居民的“买车热”升温较快,上半年杭州每百户居民家庭共购买家用小轿车0.48辆,购买量同比增长1.7倍,成为居民消费的一大新亮点。从而,促使2005年上半年居民家庭用于交通及通信方面的人均支出同比增长65.0%,达到725.55元。其中,用于交通方面的人均支出为448.53元,同比增长1.3倍。

21世纪后,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汽车进入居民家庭的速度正在加快。汽车消费成为热点。2005年,居民家庭人均购买汽车支出达到458元,比2004年增长25%。家庭汽车的热销及拥有量的增多,还带动车辆用燃料及零配件、交通工具服务支出分别增长45.4%和48.7%。

2. 通信事业迅猛发展,通信消费支出稳步增长

2005年,居民人均用于购买家庭交通工具及相关支出、居民家庭市内通信消费支出均呈两位数增长。通信消费支出的高速增长主要表现在移动电话的快速普及和由此带来的通信消费上。2001年,平均每百户中只有38部移动电话,至2005年底移动电话猛增至120.60部。与此同时,年人均通信消费由2001年的195.10元急升至2005年的318.30元,增长63.10%。从消费状况看,这一费用的增长将会延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通信工具性能、款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互联网、电信等相关服务费价格的逐步下调,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消费欲望,从而使通信消费持续成为杭州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热点。杭州市城调队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杭州城市居民家庭人均交通与通信消费支出达922.99元,比上年增长20.90%;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10.30%,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1) 通信消费支出稳步增长。

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6年,杭州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用于通信方面的消费支出达523.58元,比2005年增长4.80%,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80%,其中用于购买电话机、小灵通、移动电话等通信工具的支出人均均为87.29元,比2005年增长0.80%;用于电信费、邮费等通信服务方面的支出人均均为436.29元,比2005年增长5.60%。同时,由于通信服务提供商竞争的“白热化”,通信服务费增长势头逐步趋缓。

(2) 通信设备普及程度较高。

随着电信事业的发展,通信设施越来越完善,现代通信工具品种繁多,尤其是移动通信,随着移动电话款式的推陈出新和价格下调,部分居民的手机更新频率加快。手机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人们交流的必需品,使用手机通话随处可见,通过短信参加各种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总体上看,通信工具的消费前景依然看好。抽样调查显示,至2006年底,杭州市区居民家庭通信设备普及率达到98.90%,比上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话223.43部,户均达到2部以上,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79.14部,比2005年减少10.1%;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4.29部,比2005年增长20.5%。

(3) 网络用户数量迅速上升。

家用计算机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对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等的原有模式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计算机以更具平民化的特色而逐渐普及,家庭网络信息化已崭露头角。调查显示,至2005年,市区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计算机37.14台,比2004年增长9.2%;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中拥有互联网用户由上年的16户增加到21户,增长31.3%。利用计算机上网聊天、听音乐、玩游戏、找学习资料、看影视剧、收发电子邮件等成为时尚,互联网已日益成为市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四) 娱乐文化服务

1985年至1991年,城市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比重下降,1991年下降到76.1%,仍居各类文化娱乐消费的主体。1996年,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比重上升到74.3%,由以文化娱乐用品消费为主转为以教育消费为主。1991年至2000年,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增长较快,年递增23.5%和36.2%。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城乡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此阶段教育消费成为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主流。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年递增42.7%

和 24.4%，这一阶段的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主要是各类文娱活动费用。2000 年至 2005 年，教育消费仍是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主体。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其中，旅游消费成为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年递增 19.3% 和 24.6%。2005 年，城乡居民观光旅游和团体旅游消费为 422 元和 30 元。

总的来说，城乡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上的消费结构还是有一定差异。

表 30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城市年消费水平(元)/结构				农村年消费水平(元)/结构			
	1985	1991	2000	2005	1985	1996	2000	2005
教育文化娱乐	100%	182/100%	1253/100%	1970/100%	100%	171/100%	318/100%	735/100%
文化娱乐用品	79.70%	139/76.1%	430/34.3%	407/20.7%	78.0%	34/19.8%	72/22.7%	114/15.5%
文化娱乐服务	6.10%	11/5.9%	266/21.2%	520/26.4%	2.80%	10/5.9%	24/7.6%	61/8.3%
教育服务支出	14.20%	33/18.0%	557/44.5%	1043/52.9%	19.20%	127/74.3%	222/69.7%	600/76.2%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居民文化娱乐机电消费品有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照相机和中高档乐器，其中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和照相机成为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城市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98.9%、89.3% 和 71%，农村年递增 33%、12% 和 31.3%。

进入 90 年代后，城乡居民家庭收录机拥有量下降；城市黑白电视机被彩色电视机取代，农村拥有量减少；城市彩色电视机、照相机和录放像机普及速度放慢，农村普及速度仍较快；城市家用计算机、摄像机、影碟机和高级音响成为居民的消费热点，年递增 48.7%、44.2%、41.6% 和 32.8%，家用计算机开始进入农村居民家庭。

21 世纪以后，在城市，黑白电视机被淘汰，彩色电视机继续增加；收录机、照相机、录放像机拥有量下降，高级音响、摄像机、影碟机继续增加，其中普通照相机逐渐被数码相机取代。在农村，黑白电视机、录音机拥有量减少，照相机普及速度加快。家用计算机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2005 年百户拥有量为 75 台和 12 台，年递增 26.7% 和 64.4%。

表 31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机电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

项 目	城 市				农 村			
	1985	1991	2000	2005	1985	1996	2000	2005
黑白电视(台)	87	64	—	—	24	71	57	17
彩色电视机(台)	14	76	147	183	1.7	39	86	141
收录机(台)	50	96	66	38	8.3	29	28	16
照相机(架)	13	38	65	59	0.2	4	7	14
中高档乐器(件)	10	10	7	16	—	—	—	—
录放像机(台)	—	—	38	20	—	—	7	7
高级音响(套)	—	—	29	38	—	—	—	—

续表

项 目	城 市				农 村			
	1985	1991	2000	2005	1985	1996	2000	2005
家用计算机(台)	—	—	23	75	—	—	1	12
影碟机(台)	—	—	54	70	—	—	—	—
摄像机(架)	—	—	3	8	—	—	—	—
健身器材(套)	—	—	—	8	—	—	—	—

表 32 1985 年—2000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个人商品和服务消费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86—1991 年递增	1991 年 消费水平(元) 及结构	1992—2000 年递增	2000 年 消费水平(元) 及结构	1992—2000 消费结构变动 (个百分点)
个人商品及服务	100%	10.4%	28/100%	28.4%	269/100%	—
金银珠宝饰品	56.0%	6.5%	13/46.4%	13.5%	40/15.0%	-30.4
化妆品	5.8%	38.8%	6/21.4%	18.6%	30/11.2%	-11.6
美容	—	—	—	—	8/3.0%	3.0
手表及其他	38.2%	7.1%	9/32.2%	40.3%	191/70.8%	39.0

1986 年至 1991 年,城市居民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10.4%,城市居民金银珠宝饰品占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比重 1991 年下降到 46.4%,仍是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的主体;化妆品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每年以 38.8% 的速度递增。1992 年至 2000 年,城市居民个人商品和服务消费年递增 28.4%,金银珠宝饰品消费增势趋缓,化妆品消费趋热,美容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新领域。2001 年至 2005 年,城市居民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10.6%,化妆品和美容消费成为共同的消费热点,其中包括整容、面部护理、整形、染发和中高档烫发在内的养容消费年递增 52.8%。

表 33 1985 年—2000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个人商品和服务消费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86—1996 年递增	1996 年 消费水平(元) 及结构	1997—2000 年递增	2000 年 消费水平(元) 及结构	1997—2000 消费结构变动 (个百分点)
个人商品及服务	100%	33.2%	91.0/100%	8.7%	127/100%	—
金银珠宝饰品	—	—	18/19.8%	-17.5%	8/6.3%	-13.5
化妆品	—	—	1/1.1%	25.9%	3/2.4%	1.3
美容	—	—	—	—	3/2.4%	2.4
手表及其他	—	30.4%	72/79.1%	11.9%	113/88.9%	9.8

1986年至1996年,农村居民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33.2%,以手表及其他个人用品及服务消费为主,金银珠宝首饰和化妆品消费开始成为农村居民个人消费的新领域。1997年至2000年,农村居民个人商品和服务消费年递增8.7%,金银珠宝首饰消费增势趋缓,化妆品消费趋热,美容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新领域。2000年至2005年,农村居民个人用品和服务消费年递增1.8%,化妆品和美容消费成为共同的消费热点,其中包括整容、面部护理、整形、染发和中高档烫发在内的养容消费年递增30.8%。

发展需求反映了个人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实现个人理想与抱负的愿望和需求。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的资源、条件以及个人对自我发展机会的评价,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反映了发展需求的满足状况。杭州市居民在发展方面的生活质量表现出如下特点:

1.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教育资源与北京、上海相比有所欠缺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公共资源,通过这些场所,居民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且可以获得各类信息,学习到各种知识,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表 34 2004 年三城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数量比较

城市	公共图书馆 (个)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万册/件)	博物馆、纪念馆 (个)
杭州	16	969	28
北京	26	3451	127
上海	28	5852	90

从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博物馆(纪念馆)的数量3个指标来看,杭州市在公共教育资源方面与北京、上海存在较大差距;2004年,杭州市有公共图书馆16个,比北京、上海分别少10个和12个;公共图书馆总藏量969万册(件),远少于北京、上海公共图书馆的总藏量;在博物馆、纪念馆的数量上,杭州市有28个,北京达127个,上海有90个。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的投入,为市民的学习提供更多的渠道和更丰富的物质保证。

2. 文艺演出市场的发展与北京、上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表 35 2001 年—2004 年三城市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场次比较

单位:场次

城市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杭州	3367	3502	2428	2778
北京	8466	9528	8797	8731
上海	11283	11682	14929	13792

表 36 2001 年—2004 年三城市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次比较

单位:万人次

城市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杭州	574.0	435.0	376.0	418.0
北京	1668.9	678.7	586.1	846.4
上海	475.0	516.2	711.1	625.0

表 35、表 36 列出了 2001 年至 2004 年杭州、北京、上海 3 个城市文艺演出市场的基本情况。无论是在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场次还是在观众人次上,杭州都与北京、上海存在较大的差距,只有 2001 年的观众人次多于上海,与北京的差距则尤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了杭州市艺术表演团体有待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居民观赏文艺演出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激发,应使他们的闲暇时间更为充实和丰富多彩。

3. 居民休闲活动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中国从 1995 年 5 月起实行 5 天工作制,居民的闲暇时间增多,闲暇时间所从事的休闲活动成为居民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活动的质量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杭州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的休闲生活围绕消除体力疲劳、缓解工作压力、获取精神慰藉、追求健美等主题,发展出多种形式。

据 2004 年 7 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90% 的受访居民利用休闲时间看书报,47.40% 利用各种设施和场地进行体育锻炼以及到公园散步,21.20% 利用休闲时间上网,其他安排为朋友聚会(17.30%)、旅游度假(6.30%)、走亲戚(6.30%)、到剧院看电影或其他演出以及到博物馆等馆所参观(2.20%)、娱乐场所消费(1.8%)等。杭州市居民的闲暇活动丰富多彩,阅读书报和体育锻炼是其中的主要活动。

(五) 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

1986 年至 1991 年,城市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5.1%,耐用消费品消费比重 1991 年下降到 35.4%,但仍居各类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之首。1992 年至 2000 年,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12.5%。耐用消费品增长速度加快,2000 年比重上升到 52.1% 和 44.6%,成为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的主流。这期间室内装饰品消费成为消费热点,年递增 22.6%。2000 年至 2005 年,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4.3%,耐用消费品消费仍是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的主流;室内装饰品消费仍是居民消费热点,年递增 17.1%。

1985 年至 1996 年,农村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11.2%,1996 年,日用杂品消费比重下降到 39.1%,在各类消费中仍居第一位。1997 年至 2000 年,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8.5%,耐用消费品增长速度加快,2000 年比重上升到 44.6%,成为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的主流。这期间室内装饰品消费成为居民的消费热点,2000 年至 2005 年,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年递增 5.9%,耐用消费品消费仍是农村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的主流;室内装饰品消费仍是城乡居民消费热点,年递增 29.2%。

表 37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1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设备用品及服务	100%	189/100%	545/100%	674/100%
耐用消费品	60.0%	67/35.4%	284/52.1%	316/46.9%
室内装饰品	1.2%	3/1.6%	19/3.5%	42/6.2%
床上用品	4.0%	9/4.8%	45/8.3%	96/14.2%
日用杂品	21.5%	65/34.4%	122/22.4%	162/24.0%
家庭服务及其他	13.4%	45/23.8%	75/13.7%	58/8.6%

表 38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6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设备用品及服务	100%	167/100%	231/100%	307/100%
耐用消费品	11.7%	64/38.5%	103/44.6%	160/52.0%
室内装饰品	—	3/1.8%	6/2.5%	21/6.8%
床上用品	4.4%	11/6.7%	14/6.1%	21/6.9%
日用杂品	83.9%	65/39.1%	79/34.3%	90/29.3%
家庭服务及其他	0.1%	23/13.9%	29/12.5%	15/5.0%

1986 年至 1991 年,城市居民家庭主要设备用品有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电炊具和空调器,其中,洗衣机和电冰箱是消费热点,洗衣机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12.2%,电冰箱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16.2%。1992 年至 2000 年,城市居民家庭洗衣机和电冰箱基本普及,增长速度放慢,空调器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55.1%;淋浴热水器和微波炉迅速进入城市居民家庭,1993 年至 2000 年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15% 和 48.1%。2001 年至 2005 年,城市电风扇继续减少,洗衣机、淋浴热水器和脱排油烟机基本普及,增长速度放慢或下降;空调器向一户多台方向发展,取暖器和饮水机也开始进入城市居民家庭。

1986 年至 1996 年,洗衣机和电冰箱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洗衣机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19%,电冰箱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30%。1997 年至 2000 年,农村居民家庭洗衣机和电冰箱普及速度加快,电风扇普及速度减缓,空调器成为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百户拥有量年递增 68.2%。2001 年至 2005 年,农村电风扇拥有量增长减慢,洗衣机、淋浴热水器和脱排油烟机增长势头强劲,空调器普及速度加快。

居民家庭耐用品在不断更新换代中,由档次较低、普通型向档次较高、发展型和享受型方向发展,而且拥有量不断增多。但由于收入水平不同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高低收入家庭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情况均存在较大差异。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杭州城市居民经历了一次家庭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热潮,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在居民家庭已大范围普及。此后十几年里,虽然百户拥有量的变

化不明显,但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向高档化、高科技化转变。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多开门冰箱、变频节能空调以及层出不穷的个性化小家电更新、提升着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档次。

表 39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家庭设备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

单位:台

项 目	1985	1991	2000	2005
电风扇	173	268	249	248
洗衣机	37	74	96	94
电冰箱	39	96	102	100
空调器	15	36	104	183
脱排油烟机	0	2	73	83
吸尘器	—	—	23	21
微波炉	—	—	39	68
电炊具	—	—	88	101
淋浴热水器	—	—	81	92
取暖器	—	—	—	42
饮水机	—	—	—	65

表 40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家庭设备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

单位:台

项 目	1985	1996	2000	2005
电风扇	54.3	222	258	267
洗衣机	0.2	19	34	62
电冰箱	0.2	30	46	72
空调器	—	1	8	57
脱排油烟机	—	—	17	39
吸尘器	—	—	3	5

(六)居民居住消费

居民居住条件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镇居民每间瓦房或土房住 3 人~5 人的家庭占总户数的 70% 以上,而且房租贵得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逐年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住房设施也相应配套发展。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福利分房的取消、住房的商品化,居住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热点。至 2005 年,杭州市城市居民家庭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1. 居住面积呈递增趋势

居者有其所。杭州市经济发展迅速,市民的收入实实在在得到提升,这为大部分市民实现“安居”梦想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至2005年,杭州城市居民家庭自有房拥有率接近90.0%,每百户中,有14户拥有2套以上住房。

表41 1985年—2000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住房构成

单位:%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1985	1991	2000
4平方米及以下	20.0	11.0	0.0
4平方米~6平方米	21.3	14.0	5.0
6平方米~8平方米	27.3	25.5	22.7
8平方米及以上	31.3	49.5	72.3

据调查,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人均居住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家庭仅有31.3%,1991年上升到49.5%,2000年又扩大到72.3%。而无房户、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拥挤户以及和大儿大女合居一室的不方便户,1985年高达20.0%,1991年下降到11.1%,2000年已经没有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随着居民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出现明显增长态势,房屋的结构也逐渐升级。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筑类型以单元房居多。

杭州市居民居住环境、生活方便程度发生质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市区居民家庭中除了本处住房以外还有14.60%的家庭拥有多套住房,其中有13.8%的家庭除了本处住房外拥有一套住房,0.8%的家庭除了本处住房外拥有二套住房;家庭住房建筑面积大于50平方米的家庭占调查家庭的近八成,家庭住房建筑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家庭只占21%,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25.28平方米。同时,杭州市住房建筑类型中单元房家庭占92.10%、平房家庭占0.8%、简易楼房家庭占7%、独栋配套房占0.10%,大多数居民改善了原来的住房条件,住进了宽敞明亮、配套设施完善的住宅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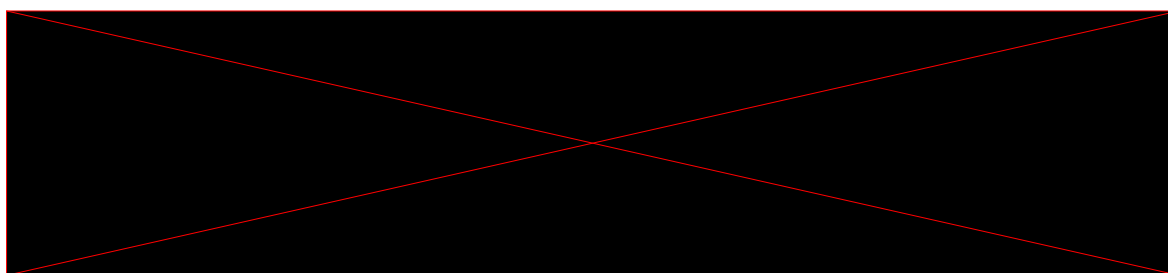


图33 2005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住房结构

住宅建筑类型大有改观,居住在二居室以上的单元式住宅和独栋配套楼房的家庭已达79.10%,比2001年提高了8.8个百分点,而居住普通楼房和平房的家庭则下降了13个百分点。此外,因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以及规范化的物业管理,使得住宅小区内外环境优

美,赛如花园。截至2005年末,有86%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其中二居室为主要户型,占到所有居民住房的49%,而单栋住房的比例提高到5%。

2. 住房质量不断改善

2005年末,在城市居民家庭调查户中,有四成的居民家庭使用管道煤气,近六成的居民家庭使用液化石油气;98.4%的居民家庭有浴室或厕所。有相当部分的家庭住上了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住房的装修水平和绿化设施等不断改善。

住房条件的改善增加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消费21元,其中水电燃料费14元,分别占消费支出的4.60%和3.10%。1998年,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到408元,水电燃料费增加到235元,分别比1981年增长18.4倍和15.8倍,消费比重分别增加到9.4%和5.4%。水电燃料等消费数量逐年增长,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自来水31.2吨,比1992年(1992年以前由于消费比重小,没有分细项调查,下同)增长39.90%;电228.3千瓦时,增长1.1倍;液化石油气15.50千克,增长56.60%;管道煤气29.30立方米,74%的家庭居室内有厕所或浴室,72.60%的家庭使用煤气或液化石油气,41.10%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调或暖气设备,63.80%的家庭安装了电话。38.1%的家庭住房有全部产权,23.90%的家庭住房有部分产权。

本次调查显示:居民家庭在拥有住房产权中,租赁公房的家庭占8.50%,租赁私房的家庭占2%,自建房的家庭占2%,原有私房的家庭占0.70%,商品房的家庭占23.40%,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占0.20%,房改房的家庭占63.20%;在住房管理情况中,有33%的家庭属于社区物业管理,23.50%的家庭属于单位管理,35.90%的家庭属于房管部门管理,7.60%的家庭暂无部门管理。市政府把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作为每年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危旧房改造步伐明显取得进展,二级房地产市场也已初具规模,每年都有许多普通百姓迁入新居,实行规范化管理势在必行。

随着居民对生活 and 居住条件要求的日益提高,房屋装修成为居民圆住房梦的最后环节,居民家庭住房内部设施也越来越齐全。本次调查显示:居民家庭使用坐式抽水马桶厕所的占90.4%,使用蹲式冲水式厕所的占5.60%,使用公共厕所的仅占0.6%,使用其他类型厕所的占3.40%。

住宅设施是居民居住质量提高的显著标志。2005年,有83.30%的家庭住上了厨房、客厅、居室、卫生间一应俱全的配套楼房,比200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住宅内使用自来水的占99.20%,有厕所浴室的占77.20%,有管道煤气的占37.7%,有空调和取暖设备的占72.20%,每百户有固定电话130.8部,分别比2001年上升了1.5、14.1、11.8、38.8、42.5个百分点。

在住房使用主要燃料类型中,使用电的家庭仅占0.30%,使用管道煤气的家庭占56.1%,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家庭占42.70%,使用煤的家庭只占0.90%。

在住房使用主要取暖方式中,使用空调设备的家庭占73%,使用电暖设备的家庭占3.50%,使用暖气设备的家庭只占0.10%,无取暖设备的家庭占23.40%。杭州市实施分时电价后,居民充分利用谷时廉价电力,普及使用电炊具等电器设备。

在住房使用浴室类型中,使用整体浴室的家庭占0.90%,使用淋浴/浴缸的家庭占89.10%,使用其他的家庭占10%。

3. 住宅社区化

进入21世纪后,杭州市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相继兴建了许多新的现代化居民住宅小区,使杭州市的住房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住房建设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也是居民消费的

热点。针对目前仍有一部分居民的住房困难尚待解决,还存在部分下岗、失业等困难群体,以及部分居民家庭因危旧房拆迁而买不起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市政府建造廉价租赁房屋、经济适用房,为部分买房困难的居民提供了方便,许多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不同的程度改善。

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2005年,全市住宅新开工面积984.16万平方米,比2004年增长13.4%;住宅竣工面积630.84万平方米,增长23.0%。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全年新开工经济适用房222.60万平方米(含拆迁安置房),竣工169万平方米(含拆迁安置房),公开销售51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1.40%。农村多层公寓开工100万平方米。至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20.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房屋居住面积达66平方米,分别比2004年末增加2.90平方米和7.10平方米。

住房制度改革后,住宅消费需求一直十分红火。200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购建房支出达1095.9元,比2001年增长80.8%,年均增长16.00%。住房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购买房改房的家庭占44.00%,购买商品房的占30.20%,加上14.10%的原有私房,住房总私有率已达到88.30%,比2001年提升了17.20个百分点。室内装潢日益考究,用材使料精挑细选,居室装潢水平向高档化、宾馆化方向发展。2005年,城镇居民已有2/3装修过,装潢支出比2001年增加了1.86倍,年均增长30%。

4. 居住消费逐步增加

1985年至1991年,城市居民居住消费年递增23.9%。住房消费(不包括购房建房支出,下同)占居住消费比重1991年上升到53.4%,成为城市居民居住消费的主体。这一时期城市居民住房消费主要是房租、维修建筑材料和维修服务费。1992年至2000年,城市居住消费年递增22.9%,随着水、电、燃料价格的不断增长、居民家庭用电量的增加及使用管道煤气和液化气家庭的增多,水电燃料消费迅速增加,年递增25%,占居住消费比重2000年上升到54.3%,成为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的主体。城市居民开始注重住房装修,装潢支出年递增35.1%。这一时期的住房装修主要是在房间地面上铺地板革、瓷砖和地毯等。2001年至2005年,城市居住消费年递增8.0%,住房装修仍是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热点。这一时期的装修以铺实木地板、打造木制橱柜为主,2005年人均住房装潢消费达到300元,年递增30%。随着住宅小区管理的不断完善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增强,居民包括物业管理在内的居住服务消费迅速增加,年递增43.3%。

表 42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居住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1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居住	100%	122/100%	782/100%	1151/100%
住房	41.2%	65/53.4%	347/44.4%	460/40.0%
水电燃料及其他	58.8%	57/46.6%	425/54.3%	627/54.5%
居住服务费	—	—	1.3%	64/5.5%

1985年至1996年,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年递增12.0%。住房消费(包括建房支出,下同)比重1996年下降到74.3%,仍居各项居住消费的首位。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住房消费主要是建房支出。1997年至2000年,农村居住消费年递增16.1%,住房消费继续增加,年递增19.1%,占居住消费

比重 2000 年上升到 82.4%。2001 年至 2005 年,农村居住消费年递增 10.5%。

表 43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水平及结构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6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居住	100%	382/100%	694/100%	1143/100%
住房	79.1%	284/74.3%	572/82.4%	724/63.3%
水电燃料及其他	20.9%	98/25.7%	106/15.3%	187/16.4%

在城市,1991 年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10.7 平方米,年增加 0.16 平方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在 8 平方米及以上的家庭、使用独用自来水的家庭、有卫生设备的家庭、有厨房的家庭和使用液化气的家庭均有明显增加,这一时期城市居民的住房产权以租赁公房为主。

2000 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 10.07 平方米,比 1991 年增加 2.16 平方米,年增加 0.24 平方米,其中 1997 年至 2000 年每年人均增加 0.81 平方米。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在 8 平方米以上的家庭上升到 72.3%,有浴室厕所、独用厨房和独用自来水的家庭上升到 90%、98.3% 和 98.7%,使用液化气和有空调设备的家庭上升到 47% 和 50.3%。使用管道煤气的家庭从无到有,2000 年达到 47%。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发生了重大变化,租赁公房家庭 2000 下降到 37.7%,自有产权家庭上升到 61%。

表 44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住房构成

单位:%

项 目		1985	1991	2000	2005
家庭人均 住房面积	4 平方米及以下	20.0	11.0	0.0	—
	4 平方米~6 平方米	21.3	14.0	5.0	—
	6 平方米~8 平方米	27.3	25.5	22.7	—
	8 平方米及以上	31.3	49.5	72.3	—
自来水 使用	独用自来水	79.3	94.5	98.7	—
	公用自来水	20.7	5.5	1.3	—
卫生设备	无卫生设备	39.3	17.0	2.0	—
	有浴室厕所	48.0	61.5	90.0	—
	有厕所无浴室	1.3	2.5	6.3	—
	公用卫生设备	11.3	19.0	1.7	—
厨房使用	无厨房	5.3	1.0	0.7	—
	独用厨房	76.7	89.0	98.3	—
	公用厨房	18.0	10.0	1.0	—

续表

项 目		1985	1991	2000	2005
燃料使用	管道煤气	0.0	0.0	47.0	—
	液化石油气	35.3	76.0	52.7	—
	煤	64.7	23.0	0.3	—
	其他	0.6	1.0	—	—
住房产权	租赁公房	91.3	96.5	37.7	6.5
	租赁私房	2.0	0.5	1.3	3.0
	自有房	6.7	3.0	61.0	88.5
	其 他	—	—	—	2
房屋户型	普通平房	—	—	—	2.0
	普通楼房	—	—	—	4.0
	一居室	—	—	—	5.0
	二居室	—	—	—	49.0
	三居室	—	—	—	32.0
	独栋	—	—	—	5.0

2005年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20.72平方米,年增加1.17平方米。居住普通平房及其他住房的家庭减少,居住楼房的家庭增加;两居室及以下的家庭减少,三居室及以上的家庭增加。2005年三居室及以上的家庭占40%,比2000年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独栋住宅的家庭为3%。2005年城市居民家庭有88.5%的家庭拥有了私有产权房(房改私房、原有私房和商品房),其中拥有商品房的家庭占33%,比2002年上升23个百分点。

表 45 1985年—2005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住房构成

单位:%

项 目		1985	1996	2000	2005	2005年比2000年上升或下降(个百分点)
房屋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12.2	46.5	64.5	76.7	—
	砖木结构	53.8	33.5	19.8	19.4	—
	其他结构	34.0	20.0	15.7	3.9	—
燃料使用	使用液化气	—	—	40.8	61.1	20.3
	使用煤炭	—	—	0.6	0.3	-0.3
	使用柴草及其他	—	—	58.6	38.6	-20

在农村,1996年人均住房使用面积42.2平方米,年人均增加1.12平方米。住房结构从1985年以砖木结构为主上升到1996年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

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48平方米,1997年至2000年人均每年增加5.8平方米;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上升到 64.5% ;使用液化气的家庭从无到有,2000 年达到 40.8% ,但以柴草及其他为燃料的家庭仍占 58.6% 。

2005 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 66 平方米,比 2000 年增加 18 平方米,年增加 3.6 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住房户上升到 76.7% ;燃料使用由小康阶段的以柴草为主上升到以使用液化气为主,2005 年使用液化气的家庭占 61.1% ,使用柴草的家庭下降到 38% 。

(七) 医疗消费

1986 年至 1991 年,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15%。1991 年,城市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保健用品支出的比重下降到 78.8% ,仍是医疗保健消费的主体。1992 年至 2000 年,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17.2% ,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年递增 30%。这一时期,城市医疗保健消费仍以医疗保健用品消费为主。2001 年至 2005 年,城市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30.5%。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居民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保健用品消费支出增加较多,年递增 15.3% ,占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 2000 年上升到 89.2% 。

1986 年至 1996 年,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27.2%。1996 年,包括诊疗费在内的医疗保健服务消费上升到 70.2% ,成为医疗保健消费的主流。1997 年至 2000 年,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7.6%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年递增 13.7%。这一时期,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服务消费成为主流。2001 年至 2005 年,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年递增 24.9%。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居民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保健用品消费支出增加较多,年递增 45.2% ,占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 2000 年上升到 54.4% 。

表 46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市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1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医疗保健	100%	41/100%	444/100%	983/100%
医疗保健用品	95.3%	32/78.7%	396/89.2%	805/81.9%
医疗保健服务及其他	4.7%	9/21.3%	264/59.5%	535/54.5%

表 47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项 目	1985 年 消费结构	1996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0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2005 年消费水平 (元)/结构
医疗保健	100%	135/100%	329/100%	474/100%
医疗保健用品	75.9%	40/29.8%	179/54.4%	189/40.0%
医疗保健服务及其他	24.4%	95/70.2%	150/45.6%	285/60.0%

三、杭州市居民消费与其他国家、城市的比较

(一) 与部分国家、地区的对比

2005 年,杭州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4468.24 元,按当年平均汇率(1 美元 = 8.1917 元人

民币)折合为1766美元,大体相当于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and 韩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杭州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有如下特点:

一是食品支出比较高,表现在食品、饮料、烟草类,以及饭店和旅馆类支出比重较高。

二是服装和鞋类,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类,以及教育、休闲与文化类的支出比重与发达国家较为相似。

表 48 杭州市和部分国家居民消费支出构成比较

单位:%

国家和地区	年份	食品、饮料和烟草	服装和鞋类	住房、水、电力、气和其他燃料	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信	教育、休闲与文化	饭店和旅馆	其他
杭州	2005	25.6	5.9	11.9	6.1	5.5	16.4	12.9	12.5	3.2
美国	2000	9.3	5.3	16.8	5.1	16.4	13.3	11.4	6.3	16.1
日本	2000	17.3	6.0	25.4	4.6	3.5	12.7	11.9	7.4	11.2
韩国	2001	16.9	3.8	17.6	4.4	8.0	16.6	12.7	7.1	12.9
英国	2001	14.1	5.8	18.0	6.1	1.6	16.9	13.8	11.6	12.1
法国	2001	17.9	4.8	23.5	6.2	3.5	17.4	9.5	7.5	9.7

说明:数据根据《国际统计年鉴》口径推算。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市在私人汽车还没普及的情况下,居民的交通和通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却与私人汽车较为普及的发达国家相若。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杭州居民在通信方面的消费较为超前,另一方面也许表明杭州居民用于交通方面的支出比重偏高。

在资讯设备普及率方面,杭州比较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2005年,杭州城市居民资讯设备如电视机、有线电视、个人计算机、电话主线、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均接近或达到一些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表 49 杭州市和部分国家、地区居民资讯设备普及率比较

国家和地区	年份	电视机 (台/千人)	有线电视 (户/千人)	个人计算机 (台/千人)	电话主线 (条/千人)	移动电话 (部/千人)
杭州	2005	535.9	482.3	293.7	332.3	688.1
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2001	676.6	181.0	416.3	593.3	608.8
香港	2001	504.1	83.8	386.6	579.6	859.0
美国	2001	835.0	256.8	625.0	667.1	450.8
日本	2001	730.0	147.4	348.8	597.1	587.8
韩国	2001	363.3	182.5	256.5	485.7	620.8
英国	2001	950.5	64.1	366.2	588.0	770.4
法国	2001	631.9	54.6	337.0	573.5	605.3

杭州市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有待继续提高。目前,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0%至70%之间,有些国家甚至达到80%。2004年,杭州市居民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30.9%,政府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11.8%,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达到38.2%,投资需求仍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在消费中起主导地位,政府消费处于次要地位,资本投资则保持较低的比例。

表 50 杭州市和部分国家消费支出贡献率比较

单位:%

国家和地区	年份	居民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杭州	2005	30.9	11.8	38.2
美国	2000	68.6	14.4	20.7
日本	2000	56.4	17.5	25.5
韩国	2001	60.5	10.4	26.7
英国	2001	65.8	19.2	17.2
法国	2001	55.1	23.3	20.1

根据对比可以看出,杭州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某些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从社会公平看,杭州市的财富资源分配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杭州市的步伐已踏入发达国家的起步阶段,有较大的升级潜力和空间。但是还应注意,杭州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没有得到完全释放,某些消费行为有待健康地引导,一些社会资源还没能得到充分利用。

(二) 与北京市、上海市的对比分析

据对杭州、北京、上海三城市居民住户的调查结果对比表明,2005年,杭州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4468.24元,分别比北京市、上海市高9.2%、5.0%。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方向不断发生变化,消费支出不断出现新的亮点。消费结构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交通和通信、居住等项目的支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杭州、北京、上海三城市的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已上升为第二大类或第三大类支出项目。2005年,城市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杭州为16.1%,北京为16.5%,上海为16.5%,说明城市居民的消费质量在提高。

从三城市的居民消费结构看,杭州城市居民的食品、交通和通信支出的比重高于北京、上海;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医疗保健支出比重高于杭州、上海;上海城市居民的居住、杂项商品及服务高于北京、杭州,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的比重三城市则差不多。杭州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突出的现象是享受型消费在消费结构中占的比重偏高,而发展型消费占的比重偏低。

表 51 2005 年杭州、北京、上海三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单位:%

项 目	杭州	北京	上海
食品	37.3	31.8	35.9
衣着	6.2	8.9	6.8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2	6.4	5.8
医疗保健	5.8	9.8	5.8
交通和通信	17.2	14.7	14.4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16.1	16.5	16.5
居住	8.9	7.9	10.3
杂项商品与服务	3.3	4.0	4.5

第三部分 居民社会阶层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人均生产总值或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要考察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社会上的相对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农民工及低收入人群等,是否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城市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制度是否完善。第三部分分别从农民、农民工、妇女、儿童、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等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入手,描述20年来相关阶层的生活状况及其变化。

一、农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大批农民走出田垄,在非农产业领域寻找新的脱贫致富商机,推动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崛起,农民收入来源急剧扩大,形成了农民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时期。1985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24元,比1978年增长2.85倍,平均每年递增21.3%。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缩小,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09:1下降到1985年的1.64:1。短短几年间,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至2006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125.1406亿元,比1985年增加8.14倍。农民收入普遍提高,2006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515元,比1985年增长11.61倍,人均住房面积达66.5平方米,比1985年增长1.24倍。农民生活实现由贫困、温饱走向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一) 农民生活的改善

1. 农民负担逐年减轻

按照中央关于“少取、多予、放活”的原则,杭州市在着力整治规范涉农收费,逐步减轻农民负担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2001年,为了整治规范涉农收费,杭州市全面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取消或停止21个涉农收费项目。之后随着中央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全面铺开,杭州市积极稳妥地实施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取消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乡统筹、村提留和劳动积累工、义务

工等农民负担,对在农业计税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只征收农业税,不再征收特产税。通过改革和清理,2003年,农民人均负担减少为46.16元。2004年,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并在全省率先免征农业税,全年仅免征农业税一项,直接为农民减轻负担7058万元,真正实现了农民“零税赋”。2005年,杭州市继续组织开展涉农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清理整顿,全年取消涉农收费4类18项,降低涉农收费标准2类12项,农民费用支出进一步减少,全市农民共减轻经济负担2327万元。

2.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

随着杭州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惠农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广开就业渠道,增加收入来源,使杭州市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升。1986年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75元增长到8515元,增幅为1161.48%。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有131个乡镇、2939个村,分别占总数的72.8%和63.7%;在5000元以上的有88个乡镇、1858个村,分别占总数的48.9%和40.2%。2005年,农民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有113个乡镇、2237个村,分别占总数的48.3%和48.4%;在5000元以上的有59个乡镇、1118个村,分别占总数的25.2%和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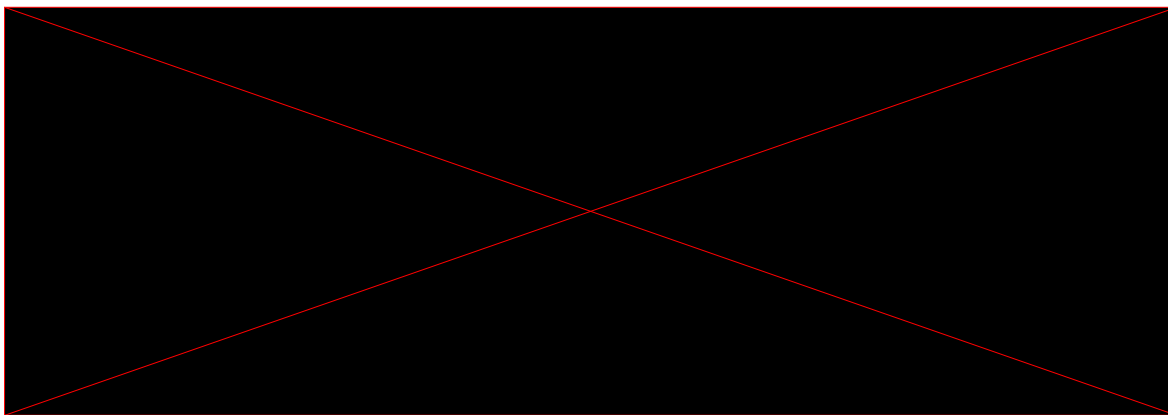


图 34 1986 年—2006 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作为民营经济特别发达的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市农民的收入较全国平均水平提升得更为显著。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397.6元增长到2005年的3254.9元,增幅为718.6%,明显低于杭州市1161.48%的增幅。2005年,杭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5倍。

3. 农民生活质量提高

在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本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反映农村居民基本生活质量的刚性度量。2006年,全市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2203元,衣着消费支出为438元,家庭日用品消费支出为326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319.28%、614.4%、376.6%;恩尔格系数为33.0%。农村居民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更加注重生活质量。1990年,全市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1.3台、洗衣机6.8台、电冰箱12.3台,基本没有空调和家用计算机。2006年,全市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56台,增长1280.5%;洗衣机72台,增长958.8%;电冰箱83台,增长574.8%;空

调 70 台,计算机 19 台。

表 52 1990 年—2006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项 目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自行车(辆)	198.9	209	183	192	184	173	166	124	127
电风扇(台)	143.4	211	258	279	275	281	289	267	291
洗衣机(台)	6.8	14	34	40	43	46	50	62	72
电冰箱(台)	12.3	23	46	50	53	58	63	72	83
摩托车(辆)	1.8	13	38	45	49	54	60	73	80
黑白电视机(台)	60.8	73	57	55	49	42	33	17	13
彩色电视机(台)	11.3	34	86	100	105	115	116	141	156
录像机(台)	—	3	7	7	7	7	8	7	8
收录机(台)	47.7	26	28	29	24	20	21	16	14
照相机(架)	1	4	7	10	9	10	12	14	17
抽油烟机(台)	—	4	17	23	24	26	31	39	49
吸尘器(台)	—	2	3	3	3	3	3	5	6
空调机(台)	—	1	8	12	14	23	30	12	70

(2) 居住条件逐步改善。

农村居民在其基本生活质量得到保障的同时,居住条件正逐步改善。2006 年,杭州市农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大幅增长,人均支出 1469 元,比 1990 年增加 1294.88 元,增长 7.44 倍;全市农民人均住房面积 66.46 平方米,比 1985 年增长 1.24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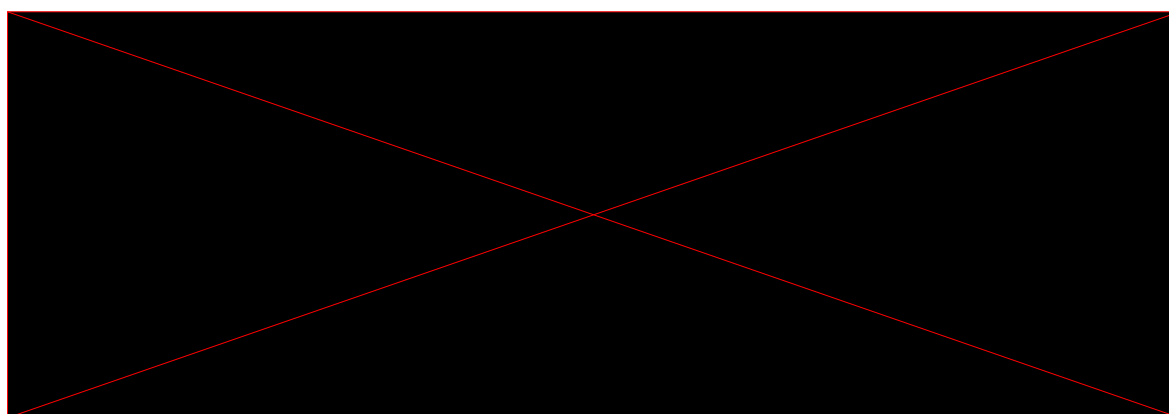


图 35 1985 年—2006 年杭州市农民人均住房面积

(3) 文化教育倍受关注,娱乐生活日趋丰富,医疗保健服务消费略有增长。

2006年,全市农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823元,为1990年的25.3倍,位居八大类消费支出第三位,占农民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2.3%,表明文化教育倍受农民关注,农村娱乐生活正日趋丰富。从构成项目看,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消费支出167元,为1990年的10.67倍。全市农民人均医疗保健服务支出478元,为1990年的16.08倍。

(4)便捷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时尚。

2006年,农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793元,为1990年的92.82倍。全市每百户农村家庭生活用汽车拥有量达7辆,手机和电话每百户为149部、97部。

4. 存在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仍显不足。

尽管各级各部门对农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提高,但从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仍显不足。据统计,2003年至2005年,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农村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0.4%、20.5%、18.8%,总体呈下降趋势,使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比较缓慢,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财政支农虽有较大增长,但倾斜力度远远不够,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基本维持在5%左右;村级集体经济力量较弱,2005年村级经济在10万元以下的有1750个村,占总数的45.3%,1万元以下有550个村,占14.2%,这些村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难以进行有效投入。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投入力度不足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改变。

(2)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

除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外,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事业发展也相对滞后。一是部分农民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民还未从根本上脱贫。二是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因困辍学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大大低于城市;师资缺口大,优秀教师主要聚集在城市,农村中小学普遍缺乏优秀的教育资源;办学条件差,缺少计算机等现代技术设备。三是农村医疗条件较差,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享有10%左右的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执业医师数只有0.55人,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农民医疗服务需求难以充分满足。四是社会保障能力不强,因病致贫、因学致贫情况比较严重,农村社保救助机制有待完善。

(3)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逐年提高,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特殊性制约,导致城市与农村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形成较大落差。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2005年,杭州市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1.98扩大到2.17。消费质量相对较低,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44.7%,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支出占33.8%,比城镇居民41.9%的比重少8.1个百分点。农民生活水平在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生活水平较高的萧山、余杭,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498元、8679元,最低的淳安仅4358元,不到萧山农民收入的一半。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4000元的有9个乡镇、644个村,分别占乡、村总数的5.1%、16.7%。

(4)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

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农村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据农村抽样调查,2005年杭州市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2%,初中文化程度占44.8%,比全市就业人口中二

者的平均比例分别高 5.0 和 5.5 个百分点,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农村劳动力的 16.6% 和 1.4%,二者合计比全市相应程度低 10.5 个百分点,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较全市低 12.1 个百分点。由于文化素质的影响,农村大部分农民掌握的科技知识有限,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产增收。

二、进城务工人员

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当前,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如何,对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的满意程度如何,对有关部门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一) 农民工统计特征分析

1. 总体分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杭州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2000 年以后,杭州市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出现了显著的增长。2000 年,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为 11.19 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12.67%。2003 年,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为 10.63 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13.25%。到 2005 年,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为 22.13 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 21.70%。

表 53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单位农村劳动力使用数

单位:人

年份	总 计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单位	其 他
2000	111897	25642	15308	70947
2001	106817	17836	8661	80320
2002	100929	18785	8659	73485
2003	106533	18738	7439	80356
2004	124950	19675	4275	101000
2005	221271	23056	9086	189129

2. 产业分析

细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言,农村从业人员在三个产业之中分配较为稳定。2005 年,三个产业的农村从业人数分别为 84800 人、77700 人、13900 人,占到总从业人数的 8.0%、7.1%、1.3%。

分行业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最多。以 2005 年为例,三个行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分别为 16.36 万人、12.11 万人、10.73 万人,分别占总从业人数的 16%、1.2%、1.1%,占同行业从业人数的 43.87%、17.39%、31.46%。

(二)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现状

见《杭州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三、妇女

调查数据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

(一)就业情况

在就业方面,2000年以来,杭州女性从业人员的比率一直处在40%左右,较为稳定。

表 54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数

年份	女性从业人数(人)	占总从业人数比(%)
2000	364275	41.41
2001	342230	40.98
2002	322966	40.34
2003	324137	40.32
2004	325711	40.23
2005	407595	40.04

1. 女性职业结构趋于合理

在行业方面,女性从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女性从业的比率大多在40%~60%。值得注意的是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女性从业比率超过60%,超过了男性在该行业的从业比率,也是唯一女性从业比率明显超过男性从业比率的行业。

表 55 2000 年—2005 年杭州市部分行业女性从业情况

年份	批发和零售 贸易、餐饮业		金 融 业		教育、文化艺术及 广播电影电视业		卫生、体育和 社会福利业	
	从业人数 (人)	从业比率 (%)	从业人数 (人)	从业比率 (%)	从业人数 (人)	从业比率 (%)	从业人数 (人)	从业比率 (%)
2000	37216	46.81	18577	53.20	48828	47.42	27863	60.19
2001	29179	46.50	21039	51.60	50513	47.94	28682	60.52
2002	29082	46.25	22984	55.81	52343	47.80	29402	60.44
2003	41341	49.43	18953	53.07	49743	49.57	29636	61.42
2004	40720	50.23	20270	53.41	50157	50.26	30711	62.26
2005	42507	49.93	21324	54.10	53725	51.52	33744	63.64

2. 部分女性就业层次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妇女的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2002年,城镇在业女性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114862人,占总专业技术人员的44.73%。到2005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为137578人,占总专业技术人员的46.89%。与男性相比,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较为显著,占总专业技术人员的百分比也有所提高。

另外,1995年后,女企业家群体发展迅速,但女性创业者的企业规模偏小,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绝大多数女性创业者的企业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占总数的44%,仅有13.4%的企业年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上。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5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排名中,杭州市有59家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但仅有1家是女性创业的企业。

(二) 政治参与方面

在政治参与方面,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女干部配备、培训力度加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通过两级换届,2002年全市党政领导班子中,女干部数量明显增加:13个区、县(市)四套班子均配备女干部;177个乡镇领导班子有172个配备女干部,其中正职27人;50个街道领导班子中有44个配备女干部,其中正职20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女性进班子的比例比上届提高10.8%,达65.4%。市人大代表中,女代表占29.4%;市政协委员中,女委员占29.8%。

2004年,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29.98%,比上届提高3.34个百分点;市级党政班子中有2名女干部,比上届增加1名。市级机关领导班子调整中,共提拔市管局级干部39名,其中女干部9名,占23.1%;提拔党委委员16名,其中女干部4名,占25%。在市级党政部门领导班子中,配备女干部的比重从上年的60.0%提高到66.7%,其中配有正职女干部的比重从上年的8.1%提高到21.7%,分别提高6.7和13.6个百分点。市和区、县(市)联合公选领导干部中,女性占14%。全市13个区、县(市)四套领导班子中有女性领导干部64名,占四套班子领导干部总数的16.9%。

(三) 教育方面(因资料缺少,以下为浙江省的数据)

1. 女性受教育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

调查数据表明,与1990年相比,在18岁~64岁的女性中,2000年文盲比例已从30.1%下降到11.1%,特别是青壮年妇女的文盲率已降至4.9%。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从37.0%上升到50.7%,其中,城镇女性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44.3%,比1990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男女两性的比例差由12.6缩小到9.5。城乡女性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从1.4%上升到3.5%。

2. 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0年,女性平均上学年数为6.1年,比1990年提高了1.4年,与男性的差距由1.9年缩小到1.5年;城镇女性上学年数的均值为8.7年,比男性少1年。随着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青年男女享有教育资源的差距明显缩小。30岁以下女性的平均上学年数,城镇为10.4年,仅比男性少0.3年;农村为7.0年,与男性的差距从1.7年降到了0.9年。

3. 女性享有更多的继续教育机会

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自2003年至2005年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共占

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在接受过培训或进修的女性中,有31.6%是自费参加的,其中城镇女性为41.6%,比城镇男性高4.7个百分点;培训经费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农村女性为36.2%,比男性高6.7个百分点;培训经费由国际项目提供的,农村女性为1.8%,比男性高0.8个百分点。

(四) 健康方面

妇女生育保险水平提高,孕产妇保健服务条件改善,《杭州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得到较好地贯彻实施。以2004年为例,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73.09万人,比上年增长10.5%;孕产妇保健覆盖率为99.4%,比200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91.8%,比2000年提高13.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为93.2%,农村为91.4%,分别比2000年提高11.8%和9.2%。全市住院分娩率为99.4%,比2000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而使孕产妇死亡率从2000年的23.2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10.54/10万,下降了54.6%。

(五) 维权方面

21世纪后,杭州市妇女维权力度一直在不断增强。2000年,妇女发展规划的监测评估体系初步形成实施。全市开展妇女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成立杭州市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着手制订“十五”期间《杭州市妇女发展计划》《杭州市儿童发展计划》。实施“依法维权工程”,对家庭暴力情况进行调研,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妇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建立杭州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和特邀陪审员制度。市妇联与市司法局联合编印《妇女权益法律知识简明读本》,举行法律知识竞赛,会同市人大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专题调查。各级妇联组织和妇女干部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配合公安部门参与“打拐”专项斗争,全市有142名妇联干部参与解救工作,解救被拐妇女145人。妇联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八”妇女节期间,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妇女维权咨询周活动。

2002年,市妇联建立健全社区维权机制,在试点基础上整体推进社区妇女维权。全市有289个社区建立妇女维权站,有工作人员1334人、联络员3516人。开展宣传咨询活动1776次,参与活动8.23万人。设置投诉信箱289个,处理投诉案件1261起,召开联席会议220次。与市公安局共同建立“110”家庭暴力救助中心,形成基层家庭暴力报警网络,及时处理妇女人身侵害事件。全市13个区、县(市)建立110报警中心,受理投诉案件近600起,出警逾500起。

到2005年,杭州市75%的村和91%以上的社区建立了妇女维权站。通过设置投诉信箱、开设妇女热线、设立咨询调解站(谈心室)、建立健全“三项制度”等形式,发挥基层妇女维权站的预警、预报功能,完成由被动等待向主动维权的转变,形成妇联、公安、司法等社会力量合力维权的新机制。介入家庭暴力案例率达100%,市、区两级妇联全年接受家庭暴力投诉102起,投诉率为0.54起/万户,达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A级标准。参与禁毒帮教,组织开展“让我们共同驱赶毒魔”座谈会,对吸毒人员进行面对面爱心帮教,向全市家庭及母亲发出“不让毒品进我家”的倡议。省、市妇联联合开通“心之桥”妇女维权热线,组建近170人的妇女维权志愿者队伍,每周3次为妇女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与司法部门联合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由法律专家坐堂咨询,杭州电台开设律师热线,启动模拟法庭宣传活动。坚持每月两次市妇联领导接待日制度,建立每星期一法律专家咨询日制度,加强信访案件的调处力度,开展法律服务和诉讼代理等。探索妇女维权发言人制度,发布维权工作中重大、典型性侵权问题。

(六) 妇女组织发展

随着妇女维权事业的发展,杭州市的妇女组织也一直在茁壮成长。1999年,全市有乡(镇)、街道妇联组织264个,专(兼)职妇女干部294人;基层妇女代表会6354个,占应建数的98.6%;妇女之家、妇女学校、妇女活动中心等各类妇女活动阵地2270个;党政群机关、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妇委会426个,个体私营企业妇委会9个。

2004年,全市有街道、镇(乡)妇联组织213个,社区妇联组织560个,农村妇代会4116个,党政群机关、民主党派、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妇女委员会308个,妇女之家、妇女学校、妇女活动中心等各类妇女活动阵地4000余个。市妇联下属13个区、县(市)妇联,4个妇女工作委员会和3个直属事业单位。

四、儿童

(一) 卫生保健

杭州市坚持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为重点,优化卫生资源的结构和配置,儿童卫生保健水平明显改善。

1. 新生儿状况

杭州市孕产妇、婴儿生命健康水平全面提高。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由2000年的23.20/10万、9.87‰下降到2005年的9.89/10万、6.6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新生儿疾病筛查日益完善。2005年,全市参与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医疗保健单位从2000年的34家增加到98家,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和出生缺陷监测覆盖率均达到100%。2000年至2005年,通过筛查共发现甲状腺功能低下患儿164例,先天性苯丙酮尿症患者12例。由于及时进行了监测和治疗,患儿们尽早恢复了健康,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2. 儿童患病情况

儿童常见病、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下降。2005年,全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达到92.10%,计划免疫接种率和乙肝疫苗接种率分别达到98.33%和99.31%,7岁以下儿童保健覆盖率达到96.6%,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儿童常见病、传染病的发生。

3.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呈良性发展态势。杭州市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及教育机构逐步完善,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至2005年,市属学校和区、县属中小学已普遍建立儿童心理咨询机构,其中市属学校心理辅导站合格率达72%,92%的市属学校建立了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市七医院儿童心理健康咨询科对青少年心理干预有效率达到88%。

(二) 教育

杭州市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大力实施教育强镇(乡)和名校集团化两大战略,积极破解“上学难”“上好学难”问题,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1. 九年制义务教育高质量普及

2005年,杭州市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达100%,初中毛入学率、初中三年巩固率均达99.99%的高水平,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比例达95.01%,学前三年儿童入园率为96.1%。2000

年至2005年,全市共组建教育集团51个,下属成员单位185个。同时,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保障残疾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至2005年末,杭州市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9.71%。

2.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以公办学校为主、独立设置外来务工子女学校为辅的就学模式初步形成。2002年,国家教育部等部委专门在杭州召开“杭州模式”推广现场会。该模式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至2005年,全市共有独立设置的民工子女学校34所,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9.95万人。

3. 各类教师学历层次明显提高

2005年末,全市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6.06%、99.85%、98.82%、96.95%;小学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79.21%,初中教师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为71%,分别比2000年提高57.3个和41.1个百分点。

4. 家庭教育得到进一步重视

至2005年,杭州市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已全方位构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家长学校办学率分别达到92.3%、89%和85.89%,家长学校合格率达到85%、先进率达到15%,家庭教育知识知晓率达到98%。通过争创示范性家长学校活动,全市命名了66所市级示范家长学校。

(三) 法律保护

杭州市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工作,建立了“资源共享、各界参与、齐抓共管”的社会化维权体系,最大限度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未成年人维权网络渐趋完善

自1994年杭州市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以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组织网络体系逐步完善,纵向初步形成市、区县(市)、街道三级组织网络,横向建立成员单位的联系协调工作机制,初步形成成员单位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的良好工作局面。至2004年9月,全市13个区、县(市)均已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8城区所有的街道(乡镇)也都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得到加强

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有关部门积极探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努力形成教育、疏导、净化和保障相结合的预防体系。每年9月,集中开展全市性的“青少年维权行动月”活动,以“两法一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通过文艺演出、讲演、模拟法庭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切实开展法律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诱因。至2005年,全市中、小学军警校共建率和学生接受普法教育率均为100%,失足青少年帮教好转人数达3470人,好转率为88.5%。

3. 各类专项整治工作形成规模效应

针对现实生活中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黑网吧”、毒品、不健康“口袋本”图书、儿童用品质量和食品卫生、使用童工等突出问题,各相关部门适时开展了“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社区青少年远离毒品行动”、音像图书市场清理整顿、校园周边文化环境集中整治、“六一”儿童用品与食品专项检查、劳动用工专项监察等集中整治清理工作,进一步净化青少年成长的外部环境,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文化氛围。

4. 弱势儿童捐资助学工作稳步推进

为让每一位适龄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杭州市积极推行优质教育平民化、普及化工作。

2005年,在妥善解决困难家庭子女减免学习费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助学金”制度,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资助券实施办法的通知》。自2003年实施“教育券”制度以后,全市共有8.8617万名困难学生接受资助,资助总额达3652万元。各地还开展“春蕾计划”和“爱心助学”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杭州市共为10998名特困学生解决助学资金865万元。

(四) 社会环境

杭州市不断完善对儿童的公共服务,在社会事业发展中优先考虑儿童利益,为儿童健康、快乐发展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1. 校外活动场所拓展青少年发展平台

2003年,杭州市制定《关于加强杭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整合社会资源、拓展活动阵地、丰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实施意见》。“十五”期间,杭州市共投资1.3亿元完成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改扩建工程。全市共建有青少年宫(活动中心)14个,总占地面积11.3万平方米。各校外活动场所本着“社会育人,育社会人”的现代教育理念,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开设了符合青少年兴趣爱好的多方面的培训项目,受到了广大青少年及其家长欢迎,在青少年素质教育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20万人次的青少年接受了各类教育和培训。

2. “雏鹰行动”全面提升青少年素质

1999年底,浙江省少工委与省教育厅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推进雏鹰争章活动的意见》,推进“雏鹰争章”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形化和标准化,优化少先队雏鹰争章活动的外部环境。各地通过组织开展“雏鹰假日小队进社区”“争章实践我能行”等社区雏鹰争章活动和“学校少先队辅导员进社区”“体验美德社区行”等红领巾社团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和社区文化。至2005年底,全市少先队组织已建立雏鹰假日小队5万余支,“雏鹰行动”实施率达99.15%,其中,城市达99.9%,农村达98.4%。数十万名少先队员在参与“雏鹰行动”的亲身实践中得到锻炼,综合素质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3. 少儿频道开播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

2004年10月25日,以“走近孩子、了解孩子、帮助孩子”为宗旨的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正式开播。频道以《动画连连看》《好朋友剧场》《亮眼睛影院》3个板块为晚间节目主体框架,内容涵盖动画片、儿童剧、电影、新闻、教育、益智游戏、科普、综艺等多种形式,率先开设少儿新闻节目《老豇豆有话说》,并自办《教育新周刊》《小伢儿》《快乐学艺》《好朋友直通车》4档栏目,为少年儿童提供增长知识的平台和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

4. 为流浪儿童营造温馨家园

杭州市加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力度,坚持以创建全国一流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目标,以救助保护为基础、以教育管理为根本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强对流浪儿童的教育管理。至2005年底,中心累计救助保护流浪儿童1854名,查清地址由亲属接回的1256人,流出地救助管理站、政府以及民政部门或学校领回的212人,护送回当地的315人,安置17人,对帮助流浪儿童回归社会并健康成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低收入阶层

所谓低收入家庭是指相对于一般水平,收入处于较低层的居民家庭。《杭州统计年鉴》将市

区城市住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排序分成数量均等的5类,即低收入户(20%)、较低收入户(20%)、中间收入户(20%)、较高收入户(20%)、高收入户(20%)。

(一) 低收入家庭的统计分析

1. 收入水平

21世纪后,低收入家庭的年收入水平一直以8%~14%的增长率持续增长。2002年,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为5980.7元。2005年,这一数据增长到8091.78元,年收入增长率为9.68%。虽然低收入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平均水平相比还比较低,一般维持在市区平均水平的40%~50%。从收入构成看,各项收入都与市区平均水平有较大的差距。以2006年为例,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分别为5465.03元、482.74元、73.04元和2903.56元,只相当于市区平均水平的37.88%、43.83%、6.42%和61.77%。

表 56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

年份	20% 低收入家庭 人均年收入(元)	占平均水平比 (%)	年收入增长率 (%)
2002	5980.7	46.32	—
2003	6499.53	46.03	8.68
2004	7377.94	46.31	13.51
2005	8091.78	43.13	9.68

2. 消费情况

低收入家庭由于收入偏低,预期收入不稳定,而刚性支出(食品、教育、居住、社会保障)有增无减,导致消费支出偏低,结构不合理,生活质量不高。

从2002年至2005年的低收入家庭支出状况可以看出:低收入家庭的总支出水平起伏不定,从2002年的7287.3元增长到2003年的8298.38元,而后下降到7860.22元,又上浮到9065.44元。消费性支出在低收入家庭总支出中占的比率很高,一直处于70%~85%。

表 57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

年份	总支出 (元)	消费性支出 (元)	占总支出比 (%)	占平均水平比 (%)
2002	7287.3	5856.44	80.37	63.56
2003	8298.38	6414.97	77.30	64.47
2004	7860.22	6536.67	83.16	58.30
2005	9065.44	7002.14	77.24	52.1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比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可以发现:2002年至2006年,低收入家庭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下,但支出和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2002年,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比收入高出1306.6元,到2006年这一差距缩小到65.0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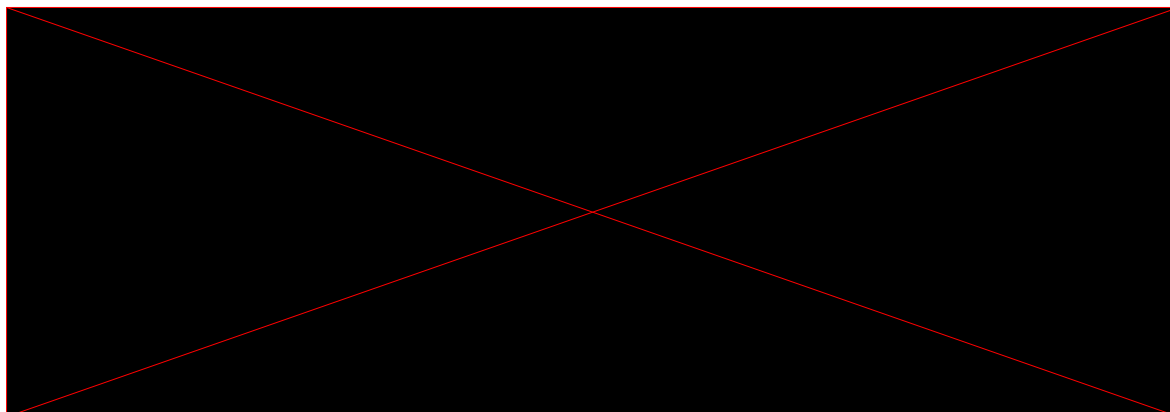


图 36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支出收入差

(1) 食品消费。

2002 年至 2006 年,食品消费金额有所上升,从 2002 年的 2733.27 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3158.45 元,增长了 15.56%。但这并不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实际食品类消费有所增加,很大一部分可能与食品类商品价格的上涨有关。

2002 年至 2006 年,食品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 45%~50%,主要用于满足温饱。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均食品支出在 3000 元上下,比市区平均水平低大约 30%。以 2006 年为例,分析食品支出的构成可以看出: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均购买粮食支出 254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2.75%;购买油脂类支出 72.86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5.60%;购买肉禽及制品支出 490.83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11.54%;购买蛋类支出 48.51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7.46%;购买水产品类支出 364.62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27.18%;购买菜类支出 353.47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12.62%;购买酒和饮料支出 172.66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33.36%;购买干鲜瓜果类支出 228.66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37.50%;在外用餐支出 481.14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62.58%。可见在购买粮油、蛋类等支出时,低收入家庭和市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大,主要的差距体现在外出就餐以及酒和饮料类的消费上。

(2) 衣着消费。

低收入家庭的衣着消费比较低,一般人均支出在 400 元~500 元,占消费类支出的 7% 左右,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50%~60%。以 2006 年为例,低收入家庭的人均衣着消费为 486.67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64.07%。相比食品消费,低收入家庭的衣着消费与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3) 医疗保健消费。

低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条件较差。2002 年至 2006 年,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大约在 400 元左右,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50% 左右。由于收入较低,医药费高,许多低收入居民家庭小病不上医院,大病不敢多花钱。有调查资料显示,有一半的低收入家庭在生病时不会选择及时到医院看病,三分之二的低收入群体认为医药费太贵,五分之一的低收入群体为省钱自己在药店买药。

(4)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消费中,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支出外,用于精神生活的比例很低。2002 年

至 2006 年,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在 1000 元左右,占消费类支出的 15% 左右,是市区平均水平的 50% ~ 60%。教育支出主要集中于子女上学,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知识培训。根据杭州市统计局 2006 年的调查显示,2006 年 1 月至 9 月,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 599 元,比市区平均水平低 43.5%,其中,教育学杂费支出人均 375 元,家教费和培训班费支出人均 116 元,分别比平均水平低 42.2% 和 53.8%。在文化娱乐等精神生活消费方面,低收入居民家庭相对贫乏。2006 年 1 月至 9 月,低收入家庭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人均 103 元,比平均水平低 64.6%,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人均 87 元,比平均水平低 75.8%,其中团体旅游支出低收入家庭人均仅为 39 元,比平均水平低 82.3%。

(5) 居住消费。

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较差,住房改善能力弱。2002 年至 2006 年,城市低收入家庭居住消费人均均为 600 元左右,比平均水平低 50%。除 2003 年居住消费猛增到 862.42 元外,其余年份低收入家庭居住人均消费稳步增加,从 2002 年的 522.92 元增加到 678.47 元,增幅为 29.7%。以 2006 年杭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报告为例,2006 年 1 月至 9 月,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15.82 平方米,比市区平均水平少 5.03 平方米。由于低收入家庭收入低,居住质量相对较差。调查中有 17.4% 的低收入家庭租赁公房,13.2% 仍然住在设备简陋的平房或普通楼房中,38.8% 的居住房没有装修过。

此外,2006 年,低收入家庭人均购买商品住宅及建房支出为 776.75 元,占平均水平的 81.7%。与高收入群体高达 2488.37 元的人均年购买商品住宅及建房支出相比,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的支出仅为高收入群体的 30% 左右。

(6) 家庭设备消费。

表 58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各消费类支出明细

单位:元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合计	5856.44	6414.97	6536.67	7002.14	6552.55	
食 品 类	合计	2733.27	2888.92	3219.13	3274.28	3158.45
	粮食	187.37	197.82	243.78	248.72	254
	油脂类	47.61	56.54	85.35	67.46	72.86
	肉禽及制品	446.29	459.9	552.87	537.51	490.83
	蛋类	44.73	46.24	52.12	50.74	48.51
	水产品类	381.43	364.39	424.3	357.24	364.62
	菜类	308.39	321.97	378.93	346.8	353.47
	酒和饮料	145.68	161.96	172.33	184.33	172.66
	干鲜瓜果类	173.12	189.22	209.44	229.01	228.66
	在外用餐	480.93	507.76	456.73	512.6	481.14
衣着类	401	435.35	397.18	526.54	486.67	

续表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265.48	283.07	229.07	302.31	167.28
医疗保健	434.07	392.33	410.16	608.47	412.9
交通和通信	401.26	499.27	549	520.71	576.79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978.43	922.62	1059.03	1029.17	963.79
居住	522.92	862.42	543.43	607.9	678.47
杂项商品和服务	120.03	130.99	129.68	132.75	108.21

表 59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各项支出占总消费类支出比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合计	46.67	45.03	49.25	46.76	48.20	
食 品 类	粮食	3.20	3.08	3.73	3.55	3.88
	油脂类	0.81	0.88	1.31	0.96	1.11
	肉禽及制品	7.62	7.17	8.46	7.68	7.49
	蛋类	0.76	0.72	0.80	0.72	0.74
	水产品类	6.51	5.68	6.49	5.10	5.56
	菜类	5.27	5.02	5.80	4.95	5.39
	酒和饮料	2.49	2.52	2.64	2.63	2.64
	干鲜瓜果类	2.96	2.95	3.20	3.27	3.49
	在外用餐	8.21	7.92	6.99	7.32	7.34
	衣着类	6.85	6.79	6.08	7.52	7.4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4.53	4.41	3.50	4.32	2.55	
医疗保健	7.41	6.12	6.27	8.69	6.30	
交通和通信	6.85	7.78	8.40	7.44	8.8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6.71	14.38	16.20	14.70	14.71	
居住	8.93	13.44	8.31	8.68	10.35	
杂项商品和服务	2.05	2.04	1.98	1.90	1.65	

低收入群体家庭设备无力更新,享受性消费少。以 2006 年杭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报告为例,2006 年 1 月至 9 月,低收入家庭人均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人均均为 138 元,比平均水平低 65.3%;交通和通信支出人均 441 元,比平均水平低 78.1%;金银饰品、美容等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人均 77 元,比平均水平低 77.4%。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水电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因此用来更新家庭设备及享受性消费的较少。

表 60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各项消费占平均水平比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食 品 类	合计	73.73	74.97	72.81	69.93	65.56
	粮食	96.28	96.10	93.76	99.55	97.25
	油脂类	94.80	91.52	105.44	93.05	94.40
	肉禽及制品	88.34	86.60	94.38	93.60	88.46
	蛋类	93.07	90.56	96.32	91.99	92.54
	水产品类	75.23	72.60	75.28	76.59	72.82
	菜类	86.49	85.44	90.31	95.13	87.38
	酒和饮料	68.82	68.92	66.50	61.76	66.64
	干鲜瓜果类	64.26	68.53	67.61	68.32	62.50
	在外用餐	59.14	63.44	47.45	41.58	37.42
衣着类	47.93	53.44	43.09	40.55	35.9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46.91	48.43	40.85	44.89	28.61	
医疗保健	58.17	44.91	47.95	61.90	46.66	
交通和通信	50.90	52.08	42.89	23.31	20.05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66.99	60.77	61.69	52.24	47.94	
居住	64.73	83.06	51.18	52.83	45.88	
杂项商品和服务	39.75	42.45	32.79	29.81	23.31	

(二) 贫困原因分析

低收入群体的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和生活消费特征,是低收入户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反映,也是低收入原因的折射。造成市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低下、生活困难的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大多数并不是由他们本人身体残疾、健康状况差造成的,而是因为所在企业不景气、生产效益低下,或者企业改制、停产倒闭等导致这些人员失业下岗,给生活带来了困难。

1. 家庭人口多,就业负担重

低收入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家庭平均人口多,有收入人数相对少,就业负担(即每个就业者需要负担的人数)偏重。据 2006 年杭州市统计局的城市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低收入户家庭平均人口为 3.03 人,比市区平均水平(2.81 人)多 0.22 人;有收入人口占家庭人口的比重,低收入户为 64.4%,低于市区平均水平(75.1%)10.7 个百分点;每名就业者的负担系数为 2.39,高于市区平均水平 0.44 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的失业者人数占市区家庭失业者人数的 57%。

2. 文化程度低,就业能力差

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每个人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越高,就业技能和能力就越强,获取工作岗位和高额收入的机会就越多。低收入群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较少。即使就业,大部分人也只能在一般的低报酬岗位就业。据 2006 年杭州市

统计局的市区居民抽样调查显示,低收入群中的就业人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58.3%,高中(中专)占 27.1%,两项合计占 85.4%,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14.6%;高收入群中的就业人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10.6%,高中(中专)占 21.3%,两项合计占 31.9%,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68%,表明高、低收入群中的就业人员文化程度差距甚大。

3. 家庭财产少,收入来源单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家庭收入的来源日趋多元化,家庭财产、资产和经营性收入已成为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补充。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显得比较单一,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额和增长速度远逊于其他收入群。以 2006 年为例,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650.57 元,与高收入群之比为 1:5.06,与 2002 年的 1:5.30 相比有所缩小。2006 年低收入群收入的 61.23% 来自工薪收入,但其工薪收入的人均水平只及高收入家庭的 16.7%。低收入群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人均分别为 482.74 元、73.04 元,而高收入群这两项人均收入分别达 2196.24 元、3267.57 元,两者相差甚远。

(三) 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政策措施

1. 完善最低保障制度

杭州市最低保障制度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城镇低保标准不断提高。2003 年,市政府制定《杭州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市在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2.92 万户、6.04 万人,比 2002 年增加 0.73 万户、1.60 万人。全年支出保障金 4083.59 万元,比 2002 年增加 1545.59 万元。2004 年,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县(市)提高城乡低保标准,萧山区提高农村低保标准,老城区(不含萧山、余杭区,下同)提高城镇低保标准。富阳市城乡低保标准从 195 元、105 元,分别提高到 230 元、135 元;临安市从 194 元、92 元,分别提高到 210 元、120 元;桐庐县从 180 元、90 元,分别提高到 230 元、120 元;建德市从 180 元、80 元,分别提高到 210 元、120 元;淳安县从 180 元、80 元,分别提高到 210 元、130 元;萧山区农村低保标准从 125 元提高到 150 元;市区城镇低保标准从 1 人户 300 元、2 人户 285 元、3 人及 3 人以上户 270 元,分别提高到 320 元、300 元、280 元。

2. 拓宽就业渠道,创造再就业

要解决日益增多的贫困群体的出路问题,根本在于拓宽劳动就业渠道,在强调科技进步、提高产业科技含量的同时,积极支持和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切实搞好再就业工程,教育贫困群体转变择业观念。同时,对于那些不为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的企业,劳动保障部门要依法征缴,保证退休、离岗、下岗失业职工的各种社会保障能予以兑现。要发挥社区组织在再就业中的作用,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在社区居民服务领域再就业的数量。

为此,杭州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做了许多努力。2002 年,全市分流下岗职工 7708 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7.65 万人。全市发放就业援助证 7502 本,开发社区就业岗位 2.65 万个;批准成立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142 个,吸纳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1252 人。2003 年,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以第四次“春风行动”为载体,以落实促进就业再就业各项政策为主线,全面实施就业援助工作;加大就业援助证的发放力度,全年发放就业援助证 9.87 万本,安置持证人员就业 5.33 万人;大力拓宽就业渠道,全市开发社区就业岗位 1.86 万个,成立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137 个,从业人员 1089 人。2004 年,全市劳动保障部门深化就业援助工作,全年举办专场招聘会 184 场,新增公益性岗

位 6558 个,新增机关事业单位勤杂岗位 4514 个;累计创办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431 个,有从业人员 3457 人;全市为失业人员 2.69 万人发放一次性就业援助补助费 7698.9 万元;全年累计发放就业援助证 14.84 万份,其中实现再就业 8.96 万人,持证人员就业率 60.38%,全市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5.37 万人。2005 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 15.51 万个,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3.09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6.09 万人。

3. 建立救助机构,扩大救助范围

2003 年,杭州市制定一系列帮扶救助政策和措施,市区所有社区建立帮扶救助服务站,落实工作人员 369 名,并配置计算机等办公设备。2004 年,全市有 11 个区、县(市)建立了帮扶救助服务中心,到位工作人员 23 名;213 个乡镇(街道)建立帮扶救助服务站,到位工作人员 323 名;所有社区建立帮扶救助服务站,到位工作人员 588 名。

此外,杭州市于 2003 年开始推行的“四级救助圈”属全国首创,有利于实现帮困全覆盖,保障贫困边缘家庭的利益,从根本上缓解因为救助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体现了社会救助的公平和公正。其中,街道(乡镇)救助圈和社区居委会、村级救助圈这两级救助圈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救助形式更加灵活,为更多的困难家庭撑起了温情保护伞。

4. 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问题

杭州市进一步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销售和管理,积极配租廉租房,多管齐下,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

经济适用住房方面,自 2001 年公开销售工作全面开展后,至 2007 年,共组织经济适用住房公开销售 23 次,推出房源 29786 套,总建筑面积 266.03 万平方米,且每年呈递增趋势。与 2001 年相比,2006 年经济适用住房受惠家庭数增幅达到 326%。

廉租房建设方面,2005 年底,杭州市第一次放宽廉租住房准入条件,提高配租标准。实物配租标准从 8 平方米放宽到 10 平方米~11 平方米,租金补贴配租标准从 8 平方米放宽到 11 平方米。据统计,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杭州 4000 多户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难题。

六、高收入阶层

(一) 高收入家庭统计分析

1. 收入水平

表 61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

年份	20% 高收入家庭 人均年收入(元)	占平均水平比 (%)	年收入增长率 (%)
2002	27564.94	213.48	—
2003	29100.17	206.09	5.57
2004	30684.65	192.59	5.44
2005	37293.37	198.78	21.54
2006	43510.39	203.63	16.67

2002年至2005年,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从27564.94元增长到37293.37元,4年增幅为35.29%,其中2005年增长最快,增长率为21.54%。与市区平均水平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普遍在市区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

从收入构成看,高收入家庭的工薪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70%。转移性收入的比例居第二位,不过进入21世纪后比例逐年下降,从26.91%下降到15.47%。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均不足5%。

表 62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工薪收入	67.62	70.76	69.58	78.78
经营净收入	2.35	1.52	4.22	2.65
财产性收入	3.12	2.85	3.05	3.10
转移性收入	26.91	24.87	23.14	15.47

与市区平均水平相比,高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比平均水平高出最多。2002年,高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为市区平均水平的402.68%。可见,高收入家庭收入高主要是由于其财产性收入比其他阶层家庭高出许多。

表 63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各项收入占平均水平比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工薪收入	211.91	214.33	201.43	226.67
经营净收入	149.73	103.52	194.48	95.04
财产性收入	402.68	381.31	374.25	197.26
转移性收入	213.77	187.08	160.79	138.24

2. 消费情况

(1) 总体情况。

表 64 2002—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情况

年份	总支出 (元)	消费性支出 (元)	占总支出比 (%)	占平均水平比 (%)
2002	20873.26	14432.29	69.14	156.62
2003	20688.92	15298.66	73.95	153.76
2004	23800.62	17470.68	73.40	155.81
2005	30724.78	24110.47	78.47	179.43

在支出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总支出逐年增加。2002年,总支出为20873.26元。至2005年,这一数据增长到30724.78元,增幅达47.20%。消费性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70%左右。相较市区平均水平,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性支出高出50%以上,到2005年甚至达到了市区平均水平的179.43%。

(2) 消费类目分析。

细分各消费类支出,可以看出食品类消费仍为比例最大的支出,占到24%~34%。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家庭外出就餐的支出占到了食品类消费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例较高。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衣着消费排在第二、三位。与平均水平相比,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等消费类目普遍比市区平均水平高出60%以上。而食品类消费仅比平均水平高出30%上下。

表 65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各消费类支出明细

单位:元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总合计	14432.29	15298.66	17470.68	24110.47	
食 品 类	合计	5007.44	5634.61	6228.44	6393.95
	粮食	207.38	241.55	242.19	244.18
	油脂类	59.35	76.99	70.92	75.44
	肉禽及制品	581.15	585.98	593	514.66
	蛋类	54.85	54.64	64.1	57.23
	水产品类	621.6	646.79	579.24	532.91
	菜类	408.9	415.69	391.72	405.21
	酒和饮料	293.61	257.84	381.76	325.45
	干鲜瓜果类	363.21	395.47	484.32	464.84
	在外用餐	1342.29	1803.88	2143.86	2463.9
衣着类	1468.42	1479.07	1527.15	2505.57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998.6	950.16	1042.39	1218.98	
医疗保健	1216.1	1458.86	1294.71	1349.04	
交通和通信	1294.91	1670.11	2582.63	6679.44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2608.04	2646.9	2756.39	3178.06	
居住	1387.09	1441.24	1689.47	1979.42	
杂项商品和服务	629.72	644.89	943.34	971.53	

表 66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各项支出占总消费类支出比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食 品 类	合计	33.46	32.73	32.25	25.83
	粮食	1.35	1.36	1.38	1.00
	油脂类	0.33	0.39	0.44	0.29
	肉禽及制品	3.85	3.80	3.35	2.46
	蛋类	0.35	0.36	0.31	0.27
	水产品类	4.43	4.06	3.70	2.40
	菜类	2.75	2.67	2.38	1.62
	酒和饮料	1.90	1.92	1.48	1.58
	干鲜瓜果类	2.70	2.37	2.26	2.01
	在外用餐	8.94	8.77	10.33	8.89
衣着类	10.17	9.67	8.74	10.39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6.92	6.21	5.97	5.06	
医疗保健	8.43	9.54	7.41	5.60	
交通和通信	8.97	10.92	14.78	27.7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8.07	17.30	15.78	13.18	
居住	9.61	9.42	9.67	8.21	
杂项商品和服务	4.36	4.22	5.40	4.03	

表 67 2002 年—2005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各项消费占平均水平比

单位:%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食 品 类	合计	130.27	129.95	127.45	133.02
	粮食	100.32	100.75	92.90	96.94
	油脂类	95.40	96.07	95.11	97.82
	肉禽及制品	110.12	109.43	100.04	103.26
	蛋类	104.00	107.42	100.98	116.21
	水产品类	126.06	123.84	114.75	124.19
	菜类	111.12	108.51	99.07	107.45
	酒和饮料	129.32	124.94	99.49	127.91
	干鲜瓜果类	144.55	131.55	127.67	144.49
	在外用餐	158.61	167.71	187.40	173.92

续表

项 目	2002	2003	2004	2005
衣着类	175.50	181.54	165.67	192.9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76.44	162.56	185.88	180.99
医疗保健	162.98	166.99	151.36	137.23
交通和通信	164.27	174.22	201.78	298.99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78.56	174.36	160.56	161.31
居住	171.71	138.81	159.12	172.02
杂项商品和服务	208.55	209.01	238.55	218.19

(二) 与低收入阶层对比

1. 收入对比

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2002年,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为21584.24元。至2006年,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为34586元,差距增加百分比为25.4%。5年间,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长57.85%,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的49.22%。在收入构成方面,高收入家庭的工薪收入比例和财产性收入比例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而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高于高收入家庭。图37、图38为2006年杭州市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构成情况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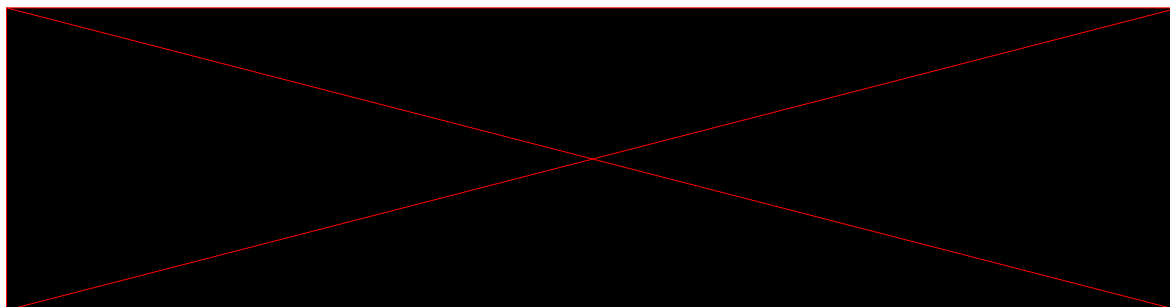


图 37 2006 年杭州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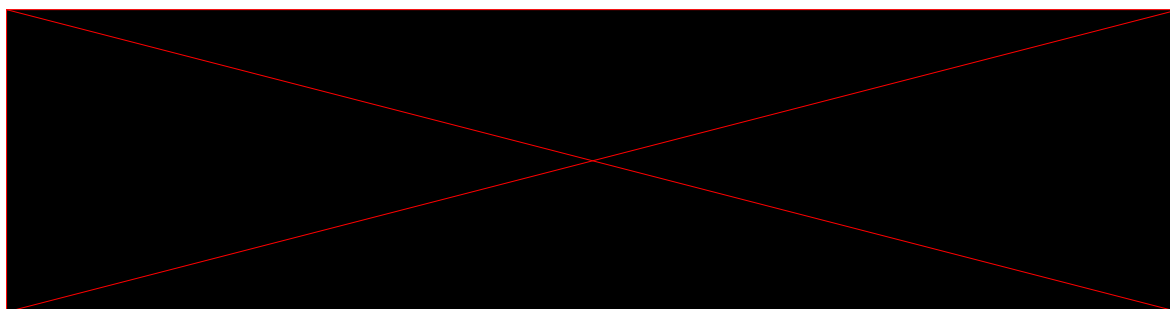


图 38 2006 年杭州市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

2. 消费分析

在支出方面,高低收入家庭支出差额很大,且呈现不断扩大之势。2002年,两者的差距为13585.96元。2006年,差距扩大到28127.74元,大约是2002年差额的2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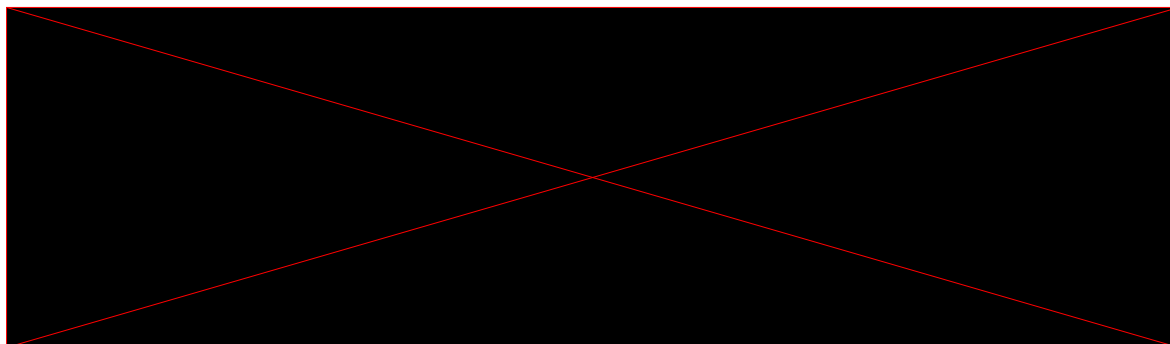


图 39 2002 年—2006 年杭州市高低收入家庭支出差额

考察具体的各项消费,可以发现不同的收入水平导致消费结构的差异。在食品消费方面,低收入家庭2002年至2006年占到了消费性支出的45%~50%,且主要用于满足温饱;高收入家庭则有更多的收入可以用于酒和饮料、干鲜瓜果类以及在外用餐的支出。类似地,高收入家庭在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类消费上也全方位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消费,以2006年为例,高收入家庭支出高于低收入家庭多达7278.45元。

第四部分 居民生活方式

2005年,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对中国大城市幸福感指数的调查中,杭州列居榜首。2005年,杭州市统计局对3000户杭州市居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7.6%的杭州人感到很幸福,比较幸福的占32.0%,幸福程度一般的占47.0%,另有2.7%的人感觉不太幸福,0.7%的人感觉很不幸福。有66.1%的杭州市民对目前的家庭收入表示很满意、比较满意和基本满意;70.6%的市民对自己的居住环境表示很满意、比较满意和基本满意;96.6%的市民认为自己的家庭很和谐幸福、比较和谐幸福和基本和谐幸福。

幸福感指数评价的是不同城市市民对其城市的总体主观感受和诸如人情、交通、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等具体感受。也许,从杭州特有的餐饮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上,可以看出这个“幸福之都”的幸福在哪里。

一、家庭

(一) 家庭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现

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的变化,导致杭州市家庭人口规模比重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表 68 1986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住户平均人口

项 目	1986	1990	2000	2005
调查户数(户)	150	200	300	600
平均每户人口(人)	3.49	3.37	3.1	2.84

1986 年至 2005 年,杭州市住户平均人口逐渐下降,从 1986 年的平均每户 3.49 人下降到平均每户 2.85 人,平均每户人口减少了 0.65 人。这种明显的趋势变化表明了杭州市居民住户的规模在不断缩小。

根据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杭州市区四口之家和三口之家已经唱了主角,分别占家庭户数的 19.91% 和 17.45%。9 年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出现了新的变化。根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杭州市区的三口之家上升到 29.37%,比 1982 年增长 11.92 个百分点,居第一位;四口之家上升到 21.78%,比 1982 年增长 1.87 个百分点,居第二位。

表 69 1982 年、1990 年杭州市区家庭代数统计

单位:%

项 目		1982	1990
一代户	单身户	14.81	6.04
	一对夫妇户	3.76	5.94
	一代户和其他亲属及非亲属	3.65	2.95
	小计	22.22	14.93
二代户	二代户	56.45	57.11
	二代户和其他亲属及非亲属	3.56	3.98
	小计	60.01	61.09
三代户及以上	三代户及以上	16.5	18
	三代户及以上其他亲属及非亲属	1.27	5.98
	小计	17.77	23.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家庭代际变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杭州市家庭代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三代家庭在 1982 年达到 17.77% 的基础上,到 1990 年上升为 23.98%,增加 6.21 个百分点。两代家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1982 年占 60.01%,1990 年占 61.09%。1990 年,杭州市区仅有四代户 4509 户,占 0.5%;五代户只有 1 户。一代户从 1982 年的 22.22% 减少到 1990 年的 14.93%,降低 7.79 个百分点。其中,单身户从 1982 年的 14.81% 下降到 6.04%,降低 8.77 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单身者中多数已成婚,组成了自己的家

庭。

(二) 家庭结构

1. 单身家庭

单身家庭指只有一个人单独生活的家庭。单身家庭有三种形态:一是结婚后配偶死亡或者离异,本人无子女;二是丧偶或离异后,虽有子女但子女不与其共同生活;三是未婚但已独立生活,单身居住。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杭州市区一人户为59861户(不包含有配偶的一人户),其中,未婚的一人户为27925户,占46.65%;丧偶的一人户为26039户,占43.50%;离婚的一人户为4560户,占7.62%。一人户与独身家庭在概念上不完全相同,前者涵盖广,有可能在户籍上是一人户,而实际上可能和父母或其他亲人同居,还有的一人户是未成年子女等。

2. 分居家庭

分居家庭指配偶中的一方在外工作或求学等,使夫妻两人无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家庭类型。分居家庭的形成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社会的安定程度。在战争或社会动乱的状态下,势必会有分居家庭大量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杭州市的分居家庭高达49.5%,即大约一半家庭属于分居家庭。另一个是通婚圈的范围。通婚圈越大,分居家庭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居家庭的数量也会越多。

据1990年对120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杭州市居民结婚时对方居住地在同市的比例从1937年的57.10%上升到1980年以后的93.8%,反映出杭州市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安定,也反映出通婚圈的日益缩小。与邻县、同省、外省通婚的,从1937年的41.2%下降到1980年以后的4.4%。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杭州市区有配偶的一人户有38197人,其中,男性为28255人(户),占73.97%;女性为9942人(户),占26.03%。在年龄上,15岁~34岁的年轻人占28.77%,35岁~59岁的中年人占54.22%,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7.01%。也就是说,分居家庭中,中年人最多,年轻人次之,老年人最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夫妻两地分居的原因与此前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现行的户口管理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跨省市的工作调动和户口迁移在手续上困难颇大。这一方面造成了杭州人通婚圈范围的缩小,居民不愿为解决两地分居的事费力费时,因而尽可能选择与本市人结婚;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已经两地分居的家庭,团聚的难度也加大了。

3. 老年家庭

老年家庭指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个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老年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平均寿命延长有着密切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79年国家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以后,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平均寿命有了提高。1985年杭州人均期望寿命为74.62岁(男72.07岁,女77.08岁),1988年人均期望寿命75.44岁(男73.01岁,女77.80岁),1990年人均期望寿命为74.55岁(男71.68岁,女77.33岁)。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杭州市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02548人。按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人口老化的标准(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杭州市区已初步进入老年型社会。1990年,杭州市区有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户有311213户,占家庭户总数的32.1%,即杭州市区家庭户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老年家庭。其中,有一个60岁以上老人的226636户,有两个60岁以上老人的81959户,有三个及以上60岁以上老人的2618户,分别占有60岁以上老人户的72.82%、26.34%和0.84%。有65岁以上老人的

214723 户,占家庭户总数的 22.15%,即杭州市区家庭户中大约五家中有一家属于 65 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其中,有一个 65 岁以上老人的 174243 户,有两个 65 岁以上老人的 39707 户,有三个及以上 65 岁以上老人的 773 户,分别占 65 岁以上老人户的 81.15%、18.49% 和 0.36%。由此可见,杭州市区家庭中有一个 60 岁以上或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占了大多数。在这些老年家庭中,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相处好的占 43.66%,一般的占 54.71%,差的仅占 1.63%,说明杭州市老年家庭中绝大多数是和睦幸福的。

表 70 1982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老年人口数据

项 目	1982	1990	2000	2005
65 岁以上人口数(万人)	30.5	40.25	60.74	76.72
占总人口比例(%)	5.80	6.79	8.83	10.23

说明:2005 年数据为杭州市 1% 人口抽样调查。

根据 2005 年杭州市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杭州市现阶段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时期。

(1) 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

杭州市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90 年代,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进入 21 世纪,老年人口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从历年人口普查数据看,1982 年人口普查时,杭州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仅为 30.50 万人。至 1990 年人口普查,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40.25 万人,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 19.1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3.74%。2000 年人口普查,65 岁以上人口上升到 60.74 万人,年均增长 5.33%,增幅快于上一个普查期 1.59 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的增长幅度,10 年总人口的增长幅度为 17.95%,而老年人口的增长幅度高达 53.27%。至 2005 年末,全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76.72 万人,比 2000 年增长 26.3%,快于同期总人口增长 17.2 个百分点。

(2)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快速攀升。

根据 2005 年杭州市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到 2005 年 11 月 1 日 0 时,杭州市 0 岁~14 岁少儿人口为 100.83 万人,比重为 13.4%;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103.47 万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76.72 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14.67% 和 10.23%;老少比为 76:100,年龄中位数为 38.28 岁,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快。20 多年里,杭州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资料显示,1982 年至 1990 年,杭州市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 5.8% 上升到 6.79%,仅上升 0.99 个百分点;1990 年至 2000 年,所占比重由 6.79% 提高到 8.83%,上升 2.0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新增 2.11 万人;到 2005 年,所占比重突破 10% 大关,达到了 10.23%,比 2000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

(3) 高龄化趋势明显。

随着生活水平、生活品质的提高以及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杭州市城乡居民预期寿命普遍延长,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比重也在日益上升。2000 年与 1990 年相比,全市高龄人口从 5.10 万人上升到 7.95 万人,增长 55.9%,高于同期老年人口增长 2.63 个百分点,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也从 12.87% 提高到 13.09%。2005 年与 2000 年相比,人口高龄化趋势更加明显,高龄人口从 7.95 万人上升到 11.79 万人,增长 48.3%,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 13.09% 提高到 15.37%。

4. 独生子女家庭

20世纪70年代,中国尚未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少数的家庭类型。根据1990年对杭州市区1200户的抽样调查表明,初婚年代越近,生育数为1个的就越多。生育子女数为1个的家庭,在1980年以后结婚的占96.2%。妇女生育模式从多子女到独生子女,一方面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据1985年对杭州市区家庭的抽样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家庭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即每2个家庭中就有1个是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孩子的年龄越小,生长在独生子女家庭的可能性就越大。在0岁~6岁的小孩中70%为独生子女,7岁~13岁的小孩中48%为独生子女,13岁以上的小孩中独生子女仅占32%。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是一种新的趋势。

二、饮食文化

(一) 杭州饮食文化发展

众所周知,杭州人爱吃、能吃、会吃。杭州餐馆种类繁多,新老杭帮菜、全国各地风味美食、世界各地风情餐厅应有尽有。传统老字号楼外楼、知味观、奎元馆,新杭帮菜张生记、花中城,物美价廉的本地小吃新丰快餐、环境优雅的高档餐厅海鲜工坊等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餐厅适应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经历了长期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后,至2005年,杭州市已形成了区域性的餐饮特点:文教区内以中西式快餐为主,城中心大型餐饮店做出了名气,风景区旅游餐饮方便了游客,南山路一带的夜宵创出了“牌子”。

杭州餐饮业的发展体现了市民对餐饮的需求。1985年底,全市有饮食店8512家,从业人员25921人。其时,杭州人的餐桌口味还比较单一,以传统“杭帮菜”为主,改革开放伊始新建、改建、扩建的楼外楼、山外山、天香楼、海丰西餐社等名店是杭州市餐饮业的主流。1985年后,杭州市从四川、广州、上海等地引进成都小吃、粤式菜点、扬帮素食等多种名菜名点,丰富了饮食文化。杭州人的饮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表 71 1992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在外用餐费用支出

单位:元

项 目	1992	1995	2003	2005
在外用餐费用支出	215.64	368.6	800.37	962.59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从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在外用餐费用支出来看,1980年该指标还未列入《杭州统计年鉴》,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在外用餐还属少数现象。到1992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在外用餐费用支出为215.64元,充分体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95年,该指标的统计数据为368.6元,仅三年时间就增长了70.9%。到2003年,杭州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在外用餐费用支出上升到800.37元。2005年,这个指标达到962.59元,是1995年数据的2.6倍。无论是仅从数字上看,还是与以前的数据相比较,杭州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在外用餐费用支出都属于较高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杭帮菜”成为杭州饮食文化的流行词。最早的一批杭帮菜馆出现在武林

路一带。1994年,花港太子宫、华王宫红极一时,并称“两宫”。1995年,杭大路上的新世界大酒店开业,而后张生记、食为先、喜乐等本地餐馆开始兴起。杭帮菜肴注重原汁原味,烹饪时轻油腻、轻调料,口感鲜嫩、口味纯美,色、香、味俱全。

2001年开始,杭州市民的饮食偏好开始向“家常风味”“本土化”发展,一批地段不好、规模不大、投入不巨的饭店开始备受杭城人的青睐。“本味”“土菜”“家乡菜”“排档价”纷纷出现。同时,一些大规模的杭城名店如顺风、东方渔港、鑫旺阁等各易其主。2001年上半年,杭州关闭或易主的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名店达10家。餐饮店的结构调整显示出杭州市民口味的变化。这一时期,杭州餐饮业发展迅速,仅2002年上半年就实现零售额达25.9亿元,增幅为26.1%。2003年起,据餐饮业经营者反映,公费消费明显减少,商务消费和家庭自费消费相应增加。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大约在3:7左右,家庭餐饮消费成为杭州餐饮消费的主流,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对杭州餐饮行业的多元化需求。2004年,杭州餐饮业年销售额达到83亿元,同比增加37%;年人均消费1380元,是全国人均餐饮消费的两倍多。

2005年,杭州餐饮业零售额从2000年的20亿元增长到100.86亿元,翻了两番多,增长率明显下降,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说明杭州餐饮业从快速增长期进入了一个逐步转型、稳健发展的时期。

(二) 杭州饮食文化特色

近20年的蓬勃发展,使杭州形成了特有的餐饮文化。杭州餐饮与旅游、文化、休闲结合,大、中、小多种规模并重,特色菜肴日趋丰富,体现了杭州市民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

1. 与旅游业结合紧密

景区餐馆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生意也越来越好。藕香居、知味观杨公堤味庄、醉白楼、粤煌阁、花园餐厅、老正兴、龙井草堂等店吸引了众多“吃环境、吃档次”的休闲客;伊家鲜突出杭州古都风格的古杭薰风阁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外宾的眼球;山外山位于植物园门口的小型休闲林语茶庄门庭若市。

2. 特色餐厅打造个性服务

杭州各色文化个性餐厅层出不穷:如伊家鲜的云水餐厅·酒吧,西湖春天、新张生记、金玲珑等店的粤式早午茶。梅家坞农家餐馆的休闲项目增加,很多除了具备一般的农家茶馆特色外,还安放了乒乓球桌,设置了金鱼池,增加了顾客休闲活动的花样。

3. 餐厅结构日益完善

中小型餐馆迅速扩展。2005年,杭州中餐馆中连锁店最多的知味观又开出了4家门店,总数扩展到48家;最有文化色彩的伊家鲜,从3家门店扩展到7家;最引人注目的外婆家,从1家小店扩展到10余家中型店;至于大街小巷形形色色的饮食店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在河东路、百井坊巷、新华路等处,形成了多处餐饮一条街。中小型餐馆比大型餐馆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也比大型餐馆更容易适应餐饮消费不断变化的需求。

4. 特色菜肴日趋丰富

杭州一度是“杭帮菜”一统天下,其他菜系的餐馆无足轻重。21世纪后,这种情况迅速改变。粤菜馆阵容壮大,曾经是杭城唯一粤菜馆的丽府酒楼,2005年在庆春路开出第二家门店;花中城清泰街店装修后,粤菜占据了主打地位。西餐馆、自助餐也越来越受欢迎,天度印度餐厅等异国风味越来越吃香,成为南山路上的一个亮点。除了蜂拥而至的川菜、湘菜等大菜系外,形形色色

的地方特色餐馆也越来越多,如以苏浙小菜为旗帜的玉麒麟,以农家菜为主的宝善村、严州府、戴记农庄,以广东地方菜为主的广合缘,还有各种专门的鱼庄、龙虾馆、保健餐馆等。此外,还有很多迷宗菜馆、无国界餐馆、新潮餐馆等。

三、休闲文化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思文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资讯、交通工具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杭州人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处在 3000 美元~8000 美元的时候,居民的需求就会到达一个跳跃性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会迅速增长。杭州分别于 2001 年、2004 年、2005 年举办了 3 次休闲论坛和休闲大会。

(一) 市民生存状况

1986 年至 2005 年,杭州市人均预期寿命一直呈增长态势。1989 年较 1981 年的 70.28 岁增加 2.72 岁,2000 年较 1989 年增加 2.81 岁,2004 年较 2000 年增加 3.04 岁。考虑数据的间隔时间,无论从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的数量还是增加的速度来看,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杭州市人均预期寿命在迅速提高,这说明居民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表 72 1981 年—2004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单位:岁

项 目	1981	1989	2000	2004
人均预期寿命	70.28	73.00	75.81	78.85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1980 年杭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46.67%,1992 年为 81.23%,综合处理工业固体废物的能力提高近一倍,1995 年继续提高到 88.80%。2003 年、2005 年,杭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93.69%、93.88%。可以说,杭州市基本上可以将工业固体废物完全综合利用,这样既充分利用了资源,也保护了环境,极大地有利于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

表 73 1980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37.82	192.55	227.44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吨)	17.65	156.40	201.96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46.67	81.23	88.80	93.69	93.88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二) 市民休闲方式

杭州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休闲设施。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仅是吸引外地游客

的招牌,也是杭州市民休闲生活的一部分。西湖上破浪的皮划艇、苏堤上慢跑的老者、小区绿地上悠然徜徉的夫妻,都融入秀美的山水风光中,成为景色的一部分。从自然资源看,杭州市拥有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从人文资源看,杭州市是七大古都之一,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从休闲设施看,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公园、广场、活动中心齐全,博物馆、文化馆(站)林立,茶楼、酒吧、宾馆、饭店密布。至2005年底,杭州市以西湖景区为核心,正在形成辐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休闲产业。南山路特色休闲街上,咖啡吧、酒吧、茶楼、艺术画廊林立,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吴山书画院均位于其中,是中外宾客观光、休闲的好去处;清河坊、信义坊是市民享受诸多情调的休闲场所;氡温泉度假村是杭州最高品位的休闲俱乐部,室内外休闲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刘庄、汪庄、黄龙饭店等高级宾馆,全国著名的丝绸、茶叶、南宋官窑、王星记扇、张小泉剪刀、胡庆余堂中药以及印学等12个博物馆,都是具有休闲特色的幽静宝地。生态农业的发展也为休闲提供了条件,杭州市已形成一批集生产、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农业休闲观光园区。

1. 居住休闲

从公园景点个数来看,1980年杭州市仅有8个。1992年增加到30个,是1980年的3.8倍。1995年,数量为83个,仅3年时间增加了1.8倍。2003年,杭州市有108个。到2005年,数量继续增加到184个,是1995年的2.2倍,是1980年的23倍。

表 74 198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公园景点数

单位:个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公园景点	8	30	83	108	184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1980年,杭州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0.017平方米。1992年,该指标上升到0.074平方米,是1980年的4.4倍。1995年,继续上升到0.110平方米,是1992年的1.5倍。2003年,这个指标上升到0.262平方米。到2005年,杭州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已经达到0.388平方米,是1995年的3.5倍,是1980年的22.8倍。可以看出,杭州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增加显著,杭州的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向着国际休闲之都的目标不断挺进。

表 75 198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总人口数(万人)	515.53	582.4	597.96	642.78	660.45
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861300	4300000	6570000	16820000	25640000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	0.017	0.074	0.110	0.262	0.388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2. 娱乐休闲

1980年,杭州市有8个电影院。到1992年,电影院数量较之1980年增加了3个。1992年至

1995年,电影院数量没有变化。2003年,电影院数量上升到19个。到2005年,电影院数量下降到16个,但仍是1980年的2倍。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对于居民休闲活动场所和设施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对于人们休闲活动需求增加的一种正常反映。

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居民的休闲消费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休闲活动场所和设施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表 76 198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电影院数量

单位:个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电影院	8	11	11	19	16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从剧场演出收入来看,1980年,杭州市剧场演出收入有52.2万元。经过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发展,199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4万元,是1980年的2.2倍。到1995年,仅3年时间,剧场演出收入增加到148.4万元。2003年,剧场演出收入继续上升到538万元,是1995年的3.7倍。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1706万元,是10年前的11.5倍,是1980年的32.7倍。杭州市剧场演出收入的显著增加,充分说明杭州居民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参与休闲活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杭州居民在休闲方面的消费也成倍增加,传统的越剧、舶来的交响乐都在社会效应和市场反响上收到较高的回报。

表 77 198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剧场演出收入

单位:万元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剧场演出收入	52.2	114	148.4	538	1706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3. 运动休闲

表 78 1980年—2005年主要年份杭州市县级以上运动竞赛数量

单位:次

项 目	1980	1992	1995	2003	2005
县级以上运动竞赛	111	390	809	1029	1705

说明:资料来源于《杭州统计年鉴》。

从举办县级以上运动竞赛的次数来看,杭州市各级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健康状况,注重通过运动会的形式来宣传全民健身观念,强化全民健康意识。1980年,杭州市举办县级以上运动竞赛111次。1992年,上升到390次,12年时间增加了2.5倍。到1995年,数据上升到809次,仅3年

时间就增加 1.1 倍。2003 年,举办县级以上运动竞赛次数为 1029 次。2005 年,为 1705 次,是 10 年前的 2 倍多。由此可见,在政府的积极领导下,全民健身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极大地促进人民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此外,健身房、瑜伽会馆、网球和羽毛球等俱乐部倍受白领阶层青睐;登山、漂流、野外拓展等户外运动受到年轻人的推崇。

4. 旅游休闲

2005 年,杭州市大力实施“旅游西进”战略,积极推进旅游国际化,旅游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大旅游产业实现增加值 175.84 亿元,比 2004 年增长 12.4%,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5.98%。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 3265.96 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404 亿元,比 2004 年分别增长 8.3% 和 11.9%;接待境外旅游者 151.36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7.58 亿美元,比 2004 年分别增长 22.6% 和 26.8%。全市旅游总收入 465 亿元,同比增长 13.2%。

据城调队对市区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5 年 1 月至 8 月,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10 元,同比增长 15%。收入的增长极大地带动了旅游消费的活跃,1 月至 8 月,市区居民每百人外出旅游人次 75.4 次,同比增长 43.3%;旅游消费人均 410 元,同比增长 13.9%;旅游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 4.5%,同比增加 0.5 个百分点。从市区居民出游的方式看,休博会的召开刺激了居民的旅游消费,自助游消费大幅增加。调查资料显示,1 月至 8 月,市区居民自助游消费人均 214 元,同比增长 2.2 倍,其中,市区居民到休博园等市内游明显增多,达到出游居民的 54%。同时,团体旅游消费趋于减少,消费额同比下降 33.1%。

结 语

1986 年至 2005 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是杭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文化日趋鲜明和城市品位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杭城居民的劳动方式、消费生活、闲暇生活、社会风俗等均发生显著变迁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后,杭州市抓住了发展的重要机遇,迎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健康、长足发展。

未来几年,是杭州从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真正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不是仅仅由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说了算,而是由广大杭州市民是否真正享受发达城市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以及是否拥有相应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来证明。

(蒋岳祥)

杭州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是在我国特定的户口制度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农民工”这一称呼混合了由户口制度所确认的社会制度身份和由劳动分工所确定的职业身份,同时也标明了由劳动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地位。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户籍身份是农民,职业身份是非农行业的从业者,而在劳动关系中则属于受雇者。广义的农民工包括所有户口依然是“农民”、但却主要受雇从业于非农行业的劳动者,即他们囊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以两种主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所有劳动人口:一是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入本地乡镇企业的非农劳动者,二是以“离土又离乡”的方式跨地区转移进入非农行业的农民工务工者。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即取这种涵义。狭义的农民工则单指后者,其中又主要指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务工者。在我国农民工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尽管在开头也提到“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工,但从其整个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其“若干意见”所针对的主要是进城农民工。本研究报告主要是在狭义上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

作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作为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民工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认真应对的,对我国既有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制度构成重大挑战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存在与发展变化,既直接牵涉到亿万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全方位地影响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本报告即以杭州农民工为对象,力图通过对杭州农民工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简史、杭州农民工所做出的经济社会贡献、杭州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现状,以及杭州农民工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等方面的考察分析,全方位地书写出这个既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巨大推动力量、又作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认真应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的群体在杭州的基本表现情态和风貌。

一、杭州市农民工发展历程

由于农民工的出现与发展关涉到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管理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制度,因此,尽管杭州农民工的发展与杭州本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杭州地方政府的政策举措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宏观制度和政策背景,也不可能和全国农民工的变迁发展状况相脱节。特别是由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表现为一个中央向地方逐步放权的过程。因此,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即农民工形成的早期,杭州农民工的发展状况就越是表现得与全国的状况相一致。

关于全国层面上农民工的发展历史,许多研究者往往根据国家有关农民工政策的发展变化

而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有人将其划分为红灯、黄灯、绿灯3个阶段:红灯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83年底,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是从1984年到20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粮食进城,但农民进城在总体上还是违反政府就业、居住等规则的;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800万人的目标,由此迈入了绿灯阶段。^①有人则根据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发展,划分出松绑、控制、引导、扶持这样4个阶段:松绑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是给农民松绑,给农民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等方面的自主权;控制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1年,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制止农民盲目外出异地就业,尽可能减轻农民跨地域流动给城市工作与社会生活造成的波动;引导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1年,国家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将改革开放以后那种自发的农民工流动纳入政策控制和管理的轨道,导向有序流动;扶持阶段是从2002年以后,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行城乡统筹,保护农民工的利益,逐步解决农民工入城的问题。^②也有人将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流动高潮期3个阶段。^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阶段划分方式。不过,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具体阶段的划分互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政策走过了一个从禁止、经过中间的曲折徘徊,而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

应该承认,尽管农民工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我国传统上城乡分割分治的户籍制度与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客观需求这两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但其发展的节奏无疑更直接地受到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影响制约(实际上,政策本身就是以上两种因素作用推动下的产物)。因此,上述这种根据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发展变化,来划分我国农民工发展阶段的方法是可取的。而如上所述,作为我国一个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杭州市农民工的发展固然与杭州本身经济社会的发展、杭州地方政府的政策举措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不可能与全国的宏观制度和政策背景、与全国农民工的变迁发展相脱节。

参照全国的宏观制度和政策背景,以及受此制约的农民工发展状况,结合杭州地方实际,特别是杭州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之政策举措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将过去二十余年中杭州农民工的发展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而通过这4个阶段,大体上可以看出,政府和相关各界对农民工的基本认识,经过了一个从“问题农民工”到“农民工问题”的转变。政府有关农民工的政策,经过了一个从限制到开放、从被动应对到积极引导、从管制为主到服务为先的转变。而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则由主要从事拾遗补阙工作的“游兵散勇”成长为了杭州产业工人的主体,成长为了一个“新产业工人阶层”。

(一)1978年—1988年:从严控到放活,从观望到初潮阶段

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动力,一是来自农村的推力,二是来自城市的拉力。但在不同的时期,这两股力量的作用大小并不一样。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78年至1982年间,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动力,在初期主要是来自农村本身的推力。家庭联产承

① 孙自法、胡鞍钢:《中国存在“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核心》,中新社,2005年3月2日。

② 刘小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60页。

③ 谢建社:《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凸现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大量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中。

可供选择的转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中;二是“离土又离乡”,跨地区转移到城市务工就业。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农民本身的首选是第一种方式,对于第二种方式,绝大多数没有能够被本地乡镇企业吸纳的富余劳动力一开始基本上处于观望犹豫之中,真正勇下决心试水的人,虽然在逐年增长之中,但比之现在,可谓凤毛麟角。而政府的态度更是积极鼓励第一种转移方式,同时严格控制第二种转移方式。如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通过的《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和198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两个文件,都在解开对城镇职工流动的禁锢、鼓励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的同时,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要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兴办社队企业的方式就地安置,不使其涌入城镇,对于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要尽可能清退。在国家的这一基本政策精神下,当时的浙江省和杭州市都采取了措施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城,同时努力清退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浙江省计划委员会和省劳动局于1982年联合下发通知,重点清退农民工。杭州市则于同年直接以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切实做好清退农民工的通知》。在这个时期,政府和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的看待可以说基本上持“问题农民工”的认识,这从当时屡屡以“盲流”来称呼农民工就可以看出。

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城市经济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兼之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人口出生高潮期出生的人口于此时开始进入就业年龄,再加上知青返城的浪潮,当时政府采取的这种严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态度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大量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同样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乡镇企业固然就地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在经过了初期的犹豫观望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下决心试水的人逐渐增多,尤其是那些过去即有外出打工谋生之传统的地区,如浙江省的义乌、东阳、温州等——当时,在全国的许多城市几乎都可以见到来自这些地区的农民打工者的身影,当然也包括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的杭州。这种自发的、客观的态势通常并不是政府的政策举措所能完全遏止的。于是,在农民工发展的这个初期阶段,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是政府严格控制,反复清退,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并不能完全达到目标,进城农民工甚至不减反增。以杭州市而言,如上所述,尽管杭州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下达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切实做好清退农民工的通知》,但是,几年清退下来,杭州农民工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统计,仅市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计划外用工,1984年底比1983年底增加了近3000人,1985年底更比1984年底增加了近1万人,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可以想见,如果再加上其他单位的和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那么,其增长的数量无疑就更可观了。

这种情形,加之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城市就业压力的缓解,促使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放松严格控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九条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要“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尽管措辞非常谨慎,但相比于以前对于农民进城就业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消极限制的态度,这一文件传递了一种相对积极的信息,因此,可以说是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

策变动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此时另有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是:1984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试行条例》,1984年10月由劳动人事部、城建环保部发布的《国营建筑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和使用农村建筑队暂行办法》,1984年12月劳动人事部发布的《交通、运输部门装卸搬运作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和使用承包工试行办法》。对于杭州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第二个文件,因为从那时起,建筑业一直是来杭农民工集中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该文件根据建筑业生产的特点,确定对国营企业需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并肯定“企业根据生产任务的需要,经当地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使用农村建筑队参加施工。”这实际上等于肯定、承认了这个农民工集中的领域使用农民工的合法性。1985年10月,杭州市城乡建委、市劳动局转发了这一文件。值得指出的是,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市劳动局和市城乡建委即已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筑企业从农村招收临时合同工的试行办法》,同样在事实上肯定和承认了建筑业对农民工的使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劳动人事部、城建环保部颁发的文件只是进一步以更权威的方式肯定承认了这种肯定承认。在这期间还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从1985年开始,农村外出劳动力作为统计指标正式纳入统计体系,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这一事实的一个正式承认。

政府政策的这种松动,兼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谨慎试水,政府对一些部门和单位开始“松绑放权”,从而成为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另一动力,即来自城市的拉力也开始初步显示出来。与此同时,那些前几年率先走出农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先行者也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示范效应。在这种条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就杭州而言,尽管缺少精确的数据,但下面几个数据大体上还是可以反映这一基本趋势:1984年底,杭州市全民所有制企业计划外用工为41283人,到1988年底增至81131人;1987年,杭州市区共有农民合同工人约12.3万人,到1988年底增至13.1万人。事实上,还有一对数据也可以反映出在政策松动、城市拉力初步显示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数增长的基本趋势。如上所述,自1985年开始,农村外出劳动力作为统计指标正式纳入统计体系,当年杭州市农村外出劳动力为14.89万人,到1988年增至19.25万人。

由上述基本情况可知,在1978年至1988年间,杭州农民工发展的状况基本和全国层面上的情形相一致;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严格控制到之后的有限度松动放活的转变;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则尽管受到反复清退(事实上,即使在80年代中期以后,清退也没有完全停止,1985年,杭州市劳动局等单位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1982〕200号文件规定的通知》,由此可见政府的松动放活是很“有限度”的),但其规模却基本上一直处于扩大之中。虽然与现在相比,当时的规模微不足道,但相对于在城市经济体制实际上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情况下,那有限的吸纳和管理能力来说,则已显得相当可观了。可以说这是农民工流动的初潮。

(二)1989年—1992年:紧缩停滞阶段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应对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开始了为期3年有余的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与此同时,政府重新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限制。从1989年开始,国家在3年中接连下发了一系列文件:1989年初,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紧急通知》;1990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199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1991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

业雇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这些文件的措辞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状况,即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强化对城市企业单位使用农民工的限制,强调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根本办法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和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与此相应,浙江省政府也下发了一系列相类似的文件。

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杭州市也加强了对农民工的限制,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和措施。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同样下发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或与农民工有关的文件,举其要者,如1989年4月,市政府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招工和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通知》;1990年4月,市劳动局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和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通知》;1990年6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第3号令,颁布《杭州市外来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针对此“规定”的有关内容,市劳动局又分别于同年8月和9月发出《关于发放外来临时工务工许可证的通知》和《关于〈杭州市外来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1990年10月,市政府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1991年10月,市劳动局发出《关于正确掌握企业招工条件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文件的核心精神,一是加强对所谓的“计划外用工”的清退压缩,其中主要针对的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二是加强对从农村招工的限制。而后者又包含了几项具体措施,一是规定可以招用农民工的企业、行业、工种,同时规定:“用工单位需要使用农民工的,应尽可能在本市市区城镇范围内招用,确需使用外来临时工的,应在杭州市所辖县(市)范围内招用。”从而基本上堵住了农民工跨地区进入杭州的渠道。二是从手续程序上强化对企业招用农民工和农民进城务工的管理控制,如建立务工许可证制度。三是着眼于社会稳定和治安需要,杭州市政府分别于1989年4月和1992年5月批转了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外来人口管理的报告》和《关于切实加强外来暂住人员管理工作的报告》,强化对外来(暂住)人口的社会治安管理,其中的重点实际上是对外来农民工的登记管理。

在政府的这一系列紧缩限制举措之下,在1989至1992年间,杭州农民工的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甚至减缩的状态之中。下面几个数字可以反映出这一基本情形:如上所述,1988年,杭州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计划外用工为81131人,到1991年下降为53672人,1992年稍有上升,也仅56747人;1988年,杭州市区共有农民合同工人约13万余人,到1992年杭州市区国有、集体和“其他经济单位”(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总数为9.6万人。还有两个数字也可反映出这一阶段是农民工流动的紧缩停滞时期:1988年,杭州市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劳动力为19.25万人,到1992年下降至12.73万人。

(三)1993年—2000年:规范流动、平稳扩张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一轮高潮,经济体制加速向市场经济转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全面铺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加速。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增长的加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进城务工创造了机会。同时,国家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控制和区别对待,但鉴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改变了前一阶段那种严格限制的政策取向,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规范、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政策措施。农民工的发展开始走出上一阶段的紧缩、徘徊、停滞,而进入了又一个上升扩张的时期。并且,还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集中体现在春运时期的“民工潮”于此时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国家政府的有效规范、引导和管理,兼之经过多年起起伏伏的流动,农民工外出打工过程中的盲目成分本身也在降低,因此,这一阶段的上升扩张基本上可以说是平稳的。

就杭州而言,总体上,这一阶段农民工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首先,改革开放的新一轮热潮带动了杭州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其中,尤以非公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这一点和整个浙江的情形基本一致。非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格局,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不再是农民工就业的唯一部门,非公经济部门迅速显示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强大需求和吸纳能力,并逐步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据统计,1993年,全市国有经济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比上年增长3.6%(市区为5.0%),全市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比上年增长8.2%(市区则下降13.3%),而全市“其他经济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则比上年增长111.3%(市区为97.9%)。当然,在绝对量上,这时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所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仍然远大于“其他经济单位”所使用的数量,但是,到2000年,“其他经济单位”所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就反过来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所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其他经济单位”并非非公经济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只包括了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而这些经济成分并不是非公经济中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各种调查表明,真正农民工集中的非公经济部门是迅速发展中的“城镇私营个体经济”,只不过,城镇私营个体经济部门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迄今还没有正式纳入统计指标。

其次,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的推力,那么,从这个阶段开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差别再次拉大),城市的拉力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显示出来。正是在这种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之下,才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同时,也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拉力和推力,作为我国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所生发的客观力量,彰显出农民工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合乎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求的,是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从而使政府(以及有关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并不是一味人为地阻止所能奏效的。当然,对于在各种配套制度上尚未完全走出传统体制的、还没有充分做好准备的城市来说,“民工潮”的突然涌现确实造成了各种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政府不能无所作为、一味放任,但这时,政府的作为或者说应对方式也不复是一味消极的严控限制,而是规范疏导、宏观调控,目的是使农民工的流动有序化。这一阶段,国家有关部门为规范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促使流动的有序化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其中重要的如1993年,劳动部发布《关于印发〈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城乡协调就业计划”第一期工程〉的通知》;1994年,劳动部发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2000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就业工作的意见》等。与此相应,浙江省和杭州市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引导。就杭州市而言,除了转发国家和省的文件之外,市内出台的较重要的文件有:1995年9月,市劳动局出台(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管理的实施意见》;1996年9月,市人民政府发布第104号令,颁布《杭州市招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1999年3月,市劳动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员务工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所有这些文件有几点共同的基本精神或者说特点。一是,一方面,它们没有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区别对待,如《杭州市招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外来劳动力时,要遵守“先本市后外地,先城镇后农村”的原则,1996年市劳动局还发出通知明确公布了不准和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但另一方面,这些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要“严格限制”或“清退”农民工的字眼。二是,它们建构起了一套管理和调

控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制度,包括外出就业登记卡制度、外来人员就业证制度、向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征收管理资金的制度,以及主要由公安部门执行的以暂住证为中心的暂住人口管理制度等。三是,它们在强调管理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包括就业信息、技能培训以及劳动保护等在内的服务。

第三,在前一阶段,由于对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严格限制,特别是《杭州市外来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基本上堵住了农民工跨地区进入杭州的渠道(作为吸纳农民工主渠道的非公经济尚未真正大规模发展是那时政府能有效控制农民工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杭州市的农民工实际上主要来自本市农村。到这一阶段,尽管如上所说,政府在劳动就业工作中没有放弃“先本市后外地,先城镇后农村”的方针,但是,由于上面所讲的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特别是由于杭州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跨地区来杭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杭州农民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一点从表1的数据对比中可以约略看出。

表1 1993年—2000年杭州市农村外出劳动力和外来务工者人数

单位:万人

项 目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农村外出劳动力	17.27	18.23	19.14	22.36	25.18	25.46	27.05	35.73
外来务工者	19.01	27.78	32.40	35.09	32.02	35.41	39.78	50.06

说明:外出劳动力数据来自于《杭州市统计年鉴》,外来务工者数据来自于杭州市公安局档案室。外来务工者人数中虽包含少量非农民工,但据有关专家估算,公安部门掌握的暂住人口登记率不到70%。因此,实际上外来务工者中的非农民工要少于没有到公安部门登记的外来农民工。

(四)2001年以后:走向城乡统筹、公平流动阶段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逐步解决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的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总结几十年的执政经验,提出要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种宏观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下,农民工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就国家的农民工政策取向而言,开始由前一阶段旨在促使农民工有序流动的管理引导,进一步转向扶持农民工进城就业,具体措施包括:逐步放宽农民工进城条件,降低和逐步撤销农民工进城就业门槛;逐步放松、解除对农民工进城的管制,变管制为救助(在这方面,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起到了催化助推作用),并减少对农民工不必要的管理;逐步统一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在这一时期国家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如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2005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

就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而言,在这一阶段,农民工问题作为我国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的集中表现,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真正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而不再仅仅主要限于政府与

学界。而就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而言,其构成和规模都于此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构成上,随着新一代农民工的进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在逐年提高,与此相应,其平均进城务工年龄有所提高;在规模上,到2006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达到1.3亿人,实际上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

杭州农民工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同样不可能与全国层面的状况完全脱节。当然,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并且其本身在此时也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健康良好的高涨时期,杭州农民工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自身的特点。总体上讲,杭州农民工在这个阶段的基本发展状况和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机制、扶持农民工进城就业、促进公平流动方面,杭州市走在全省甚至全国前列。2001年4月,杭州市劳动局发出《关于进一步简化用人单位招用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废止了1998年市劳动局发布的《关于公布我市不准和限制招用外来劳动力行业和工种的通知》,同时规定杭州市各类单位从2001年起招用外来人员“不需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报用人计划,不再使用杭州市外来人员使用证。用人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需要,自主决定用人数量和工种岗位”。还规定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委托职业介绍机构、参加劳动力交流洽谈会、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到劳动力资源地等途径自主招用所需人员。这些规定大大方便了农民工进杭务工,也拓展了他们进杭的渠道。2004年8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修改〈杭州市外来暂住人员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取消了1998年颁布的原管理条例中不少对外来务工者(其主体是农民工)加以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条款,为统筹就业亮起绿灯。特别是大大淡化了杭州外来人员就业证制度。2004年11月,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发出通知,取消了这一制度,这是杭州市统筹城乡就业、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公平流动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措(国家和省到下一年才有类似举措)。

2005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又率先出台《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基本目标,即到2010年在杭州市区形成比较完善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使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实现安居乐业。具体内容包括:(1)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证制度,列入工资支付保证制度的企业覆盖率达到95%以上,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做到“有收入”。(2)坚持市、区、街道(社区)、企业和个人联动,逐步形成多形式、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体系,做到“有房住”。(3)最大限度扩大义务教育招生规模,保证凡符合有关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能入学,做到“有书读”。(4)完善基本的医疗服务体系,扩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服务,缓解外来务工人员“看病难”问题,做到“有医疗”。(5)适应外来务工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保险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做到“有社保”。(6)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达到70%以上,外来务工党员纳入企业或社区党组织管理,做到“有组织”。《若干意见》的出台是杭州市从整体上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使农民工真正转变为“新杭州人”而加入到“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行列中来的一个标志,在杭州市农民工政策的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由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这种服务、扶持农民工的努力,2007年2月,杭州被评为“最受农民工欢迎城市”。

第二,在农民工群体本身的数量规模上,与此前尽管在总体上呈扩张但在扩张中或多或少有所起伏的情形不同,这个阶段由于杭州市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产生的对外来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由

于上述政府和社会各界扶持、服务农民工的一系列努力,也由于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民工跨省、跨地区流动的扶持,来杭农民工的数量呈现持续迅速扩张的趋势。一方面,农民工作为“新产业工人阶层”已成为杭州产业工人的主体;另一方面,外来农民工已成为杭州农民工的主体。据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2004 年的一个调查统计,在市区进城农民工中,来自浙江省的占 36.9%,而来自外省的占了 63.1%。这一点,从表 2 的数据中同样可以清楚看出。

表 2 2001 年—2005 年杭州市农村外出劳动力和外来务工者人数

单位:万人

项 目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农村外出劳动力	33.93	36.51	38.65	41.02	43.22
外来务工者	64.23	85.19	108.65	117.38	137.59

说明:外出劳动力数据来自于《杭州市统计年鉴》,外来务工者数据来自于杭州市公安局档案室。同样地,外来务工者中的非农民工要少于没有到公安部门登记的外来农民工。

第三,尽管在这一阶段来杭农民工的数量呈现持续迅速扩张的趋势,但和其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杭州的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所谓“民工荒”现象,特别是在每年的年初和年末,由于许多农民工纷纷返乡探亲过年,这一现象更加突出。这表明,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扶持、服务农民工方面已做出了极大努力,但是,为了满足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吸引农民工来杭工作、扶持服务农民工在杭就业、帮助稳定农民工在杭安居乐业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服务农民工工作综述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变革,杭州市政府有关农民工的政策经过了一个从限制到开放、从被动应对到积极引导、从管制为主到服务为先的转变。特别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既有的宏观结构和体制所许可的条件下,为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在就业服务、维权服务、农民工子女就学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组织工作等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使他们更好地在杭州安居乐业。

(一) 就业服务

为确保农民工有正常的经济收入,就业服务工作成为服务农民工的一项最基本工作。在这方面,杭州市出台一系列降低门槛,撤销障碍,破除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以及促进公平就业的举措。同时,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为农民工的就业提供帮扶和服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规范职介,强化就业介绍和信息服务工作。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自发性、具体就业目标的不确定性,20 世纪 90 年代,杭州市涌现许多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民办职业介绍机构。这些机构确实为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不少便利和帮助,但同时也存在着多而乱的问题,特别是在赢利目的的驱使下,常常发生职介机构用虚假信息、空头多头介绍等手段欺骗农民工的现象。针对这种状况,1998 年和 2003 年,杭州市先后成立了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和下沙人力资源交流中心,并在一些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和行业设点,将民营职介机构集中进入场地,实行统一管理,并规范了民营职介机构的运行。措施包括:加强对职介机构负责人的思想和相关

政策法规的教育,同时对职介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制订规章制度,实行介绍信、登记表、收费收据“三统一”;建立民营职业介绍机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制订退款细则等,规范职介操作办法;设立“投诉处”,处理职介机构和求职者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实行计算机管理,职介机构介绍人员均通过计算机来操作运行,保证职业介绍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职介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既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有效帮助,也节省了农民工就业的成本。据统计,至2004年底,通过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达20余万家次,进入市场求职的各类人员近150万人次,成功录用62万余人次,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工。2005年,杭州市由政府牵头,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各界参与,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春风行动”,推出“四批一卡”活动,即向农民工开放一批公共职介机构,推荐一批诚信民办职介机构,表彰一批优秀民办职介机构,打击一批非法职业中介机构,印制并免费发放一张内容包含53个“放心职介服务单位”名单、求职指南、6大块维权注意事项、16个区县(市)劳动监察举报电话等信息的“春风卡”。这些举措,为农民工求职提供了信息便利,进一步改善了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第二,建立城乡统筹就业服务网络。从1999年起,杭州市即按照“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工作模式,着力建立市、区、街道(乡镇)、社区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在此基础上,2003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强街道(乡镇)劳动保障管理站和社区劳动保障服务室建设意见》,把原有的城区就业服务体系扩展到所有县(市),到2003年底,实现了全市8个区、5个县(市)、227个街道(乡镇)、482个社区的就业服务全覆盖。2005年,杭州市进一步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为目标,按照“场地、人员、经费、网络、工作”五到位的总体要求,以完善乡镇劳动保障管理站建设为中心,构建覆盖全市、城乡统筹的劳动就业服务网络 and 平台,为城乡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和各类用人单位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就业服务。

第三,加强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自身素质方面的欠缺是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是就业服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杭州市既重视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职业规范方面的培训,也重视包括基本权益保护、法律常识、城市生活常识等内容在内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方面的培训。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和杭州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成立之初,将职业介绍和培训服务相结合,对农民工开展自愿免费的务工前基础知识培训和安全基础教育培训。从1996年开始,杭州市共青团组织通过“千校百万计划”“职业导航”“送创业指导”“送法制教育”“送文明知识”等活动,为外来青年农民工提供法制、文明素质、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其他如市总工会、市妇联等也都从自身的工作特点出发,或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已有的某些培训计划,或通过专门的活动等不同形式展开对农民工的培训。2004年5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杭州市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实施意见》。同年8月,市政府办公厅又转发《关于加强全市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杭州市针对包括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培训的指导方针和操作方法,使这项工作获得了包括经费在内的更大支持。此后,为加强这项工作,杭州市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积极探索培训机制创新,努力建立“政府主导、个人自愿、市场运作、各方参与”的培训机制,充分发挥技工学校、就业培训中心、职业高中等培训机构的主渠道作用,鼓励用人单位、各类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同时积极探索拓展其他方便灵活的培训渠道,如在建筑工地开设民工学校(这是杭州市的一个创举);建立培训社会化、鉴定集中统一、政府指导监管的培训鉴定互动体制;推广

将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做法;增加培训资金投入(仅2005年,各级财政就投入4000多万元)等。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力地加强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了农民工的素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

(二) 维权服务

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在工作中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是一个事实。有鉴于此,杭州市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保护农民工,维护其正当权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中心,加强对使用农民工的企业的劳动用工管理和监督。为了有效保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依法规范企业的用工制度,2004年和2005年,杭州市劳动保障局先后两次下发《关于在全市组织开展劳动用工情况大检查的通知》,建立劳动年检制度,重点检查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工资的支付情况。除了年检制度,杭州市还采取日常巡察、举报专查、专项监察等方式,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的管理和监督。仅2005年,杭州市共监察检查用人单位3.2万户次,涉及劳动者151.4万人,督促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70004份,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2.6%。

第二,努力解决欠薪问题,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为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2001年初,杭州市政府即发出《关于切实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的通知》,敦促各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把合理支付工资、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依法经营的重要内容。此后,杭州市通过劳动年检制度、专项检查制度等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仅2005年,杭州市就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总计9681.5万元。同时,着力探索和建立以按时足额发放工资为核心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长效机制,如进一步规范企业工资支付制度,大力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拖欠职工工资较为严重的建筑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至2005年末,全市建筑企业职工工资支付保证金达2.4亿元。

第三,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办法,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为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杭州市按照国家 and 省的有关规定,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大、收入较低等特点以及自身条件,积极探索社会保障途径。经过实践和摸索,杭州市着重从工伤、医疗、养老3个方面来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体系。在医疗和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可以选择参与职工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特别针对农民工的、按“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办法推出的医疗和养老保险。无论选择哪一种,企业都必须按规定比例为农民工交纳保险金。在工伤保险方面,杭州市规定凡是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特别是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高风险企业以及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到2010年,要实现全市工伤保险全覆盖。

除了在欠薪、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切实的维权服务外,杭州市还在工时制度和加班费的依法发放、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工伤赔偿、妇女特殊权益的保护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保护和援助。特别是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规的宣传和落实。每年7月,市劳动保障局牵头开展“劳动者权益保护宣传周”大型咨询活动,现场接受咨询,受理投诉,并宣传有关劳动权益的法规知识。

此外,在杭州市为农民工提供的维权服务活动中,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特征。除市劳动保障局外,其他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以及一些志愿者组织等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为农民工维权的行列。其中,市妇联于2005年3月推出“外来流动妇女维权服务日”活动,同年4月又

发出《关于加强在杭外来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市总工会则针对农民工的维权，组织杭州市工会法律志愿服务总队，成为农民工维权的“绿色通道”。

(三) 农民工子女就学服务

能否正常接受义务教育，既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权利，也关系到他们成年以后的生活道路。但是，在现有的基本教育体制下，普遍存在着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杭州市做了一系列努力和尝试，有些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9年1月，杭州市天成小学在江干区成立，是国内第一所以政府管理为主的国有民办民工子弟学校。不久，下城区也成立国有民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杭州市明珠实验学校，一年后又开办了初中部，成为杭州市第一所专门招收民工子弟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杭州市的经验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先后做报道。200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官员库斯汉专程考察杭州市明珠实验学校，随机测查了学生的学业情况，认为该校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正规基础教学的做法是现代全民教育思想的体现，学生学业水平高于国外同年龄段的学生，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2004年11月，杭州市教育局出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就学的暂行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女学校为辅”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使这一问题的解决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标志着农民工子女就学开始正式纳入杭州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在市本级及各区、县(市)都设立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加大了对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公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同时，积极挖掘潜力，统筹、整合既有教育资源，将适龄儿童减少区的闲置教育资源盘活调配，以减轻外来人口聚居区教育部门的压力。此外，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工子女学校，拓展办学渠道。所有这些举措，都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据统计，到2004年底，全市共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8.3万人，占全市在校中小学生总数的12.75%。到2005年底，全市共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9.95万人，接近全市在校中小学生总数的15%；全市有独立设置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34所，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 文化服务

相比于欠薪、子女就学等问题，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显得并不那么突出。但是，近年来，随着“80后”乃至“90后”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农民工所表现出的远远高于他们父辈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得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2004年，文化部发出《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标志着国家开始正式重视这一问题。而杭州市《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则正式将“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了“工作”范围，并提出要“把丰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纳入杭州市‘十一五’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将外来务工人员人均文化活动经费、人均拥有文化设施面积等纳入全市人均文化活动经费、人均拥有文化设施面积体系，做到统一安排”。事实上，早在《意见》出台之前，有关方面已经在为来杭农民工提供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服务，如许多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往往包括文化素质方面的培训，许多民工学校也往往同时是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园地。《意见》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列入了政府工作的规划，当然也进一步加强了这项工作的力度。

在为农民工提供精神文化生活的服务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青团和工会组织。青年农

民工是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主体。为了丰富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创业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杭州市共青团组织一方面积极鼓励并想方设法吸引他们参与针对所有青年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他们的举措活动。1996年7月,团市委下属刊物《今日青年》杂志社创立了全国首家打工者文学社,为外来务工青年提供交流文学创作的平台。1998年4月,团市委、打工者文学社联合举办以“我把杭州当故乡,我为杭城添光彩”为主题的外来务工青年大联欢,并向全市30多万名外来务工青年发出“同创文明,共享欢乐”的倡议。自1996年10月开始,团市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综治办等单位,连续十余年举办6届“杭州市十佳(优秀)来杭创业务工青年”评选活动,宣传和展示外来创业务工青年开拓进取的青春风采。针对外来务工青年交友难的问题,2005年,团市委推出“万名外来青年青春之旅”项目,建立青春之旅交友网,开通交友热线,先后举办“缘聚天堂——来杭创业务工青年元宵大联欢”“我想有个家——来杭创业青年千人交友派对”等多种形式的交友联谊活动。自2005年开始,团市委还在每年5月举办“百对外来青年大型公益集体婚礼”,让外来务工青年感受到“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感受到“品质之城、爱情之都”的浪漫和温暖。除了举办这一系列活动,杭州市共青团组织还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在外来务工青年集聚的工地、企业、园区和社区建立一批能收看电视、阅览图书、电脑上网等的蒲公英文化家园,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杭州市总工会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丰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者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针对适合农民工参加的活动场地少、农民工参加文化娱乐活动难度大的问题,2000年,杭州市总工会在位于黄金地段的工人文化宫开设总面积达2200平方米的外来民工活动室;2005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的“放歌在天堂”外来务工者声乐大赛(自2006年第二届开始与市委宣传部联合);2006年,正式启动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千场电影下基层活动等。

(五) 组织工作

组织化程度低是农民工这一群体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既给农民工自身权益的维护增添了难度,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困难。因此,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不仅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而且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有机化程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正因此,《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才要将“有组织”作为“六有”目标之一。不过,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高,农民工的组织化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杭州市有关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组织化形式,努力将他们吸纳进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

1995年,团市委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总变化,按照党建带团建的总体要求,加强共青团核心组织建设,把基层团建的“三级联创”纳入到基层党建的总体格局之中,努力创新外来务工青年集中领域的团建工作。1999年,杭州市成立了第一个外来人员公寓团组织——江干外海外来人员公寓团组织。进入21世纪以后,杭州市团组织又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加大团组织对外来务工青年的覆盖。这些举措包括开展“组织找团员,团员找组织”的“双找”活动,探索以“以流入地团组织为主,流出地、流入地团组织共建共管”的流动团员团建新模式,建立和实行流动团员登记卡制度、专人联系制度、目标管理及奖惩制度等管理新机制。

2004年,市总工会和市建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意见》,其要旨是积极吸收农民工入会,扩大工会在这个农民工集中领域中的覆盖率。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杭州市总工会积极探索,突破从企业入会的传统单一体制,根据农民工的特征,推行了许多

新的、灵活的人工会方法,吸引、方便农民工入会,包括直接由街道、乡镇工会吸收农民工入会等;同时,也由此创立了许多新的工会组织形式,包括项目工会、楼宇工会、社区工会、村工会、一条街工会、工地工会、美容美发行业工会以及在劳务公司建立工会等。通过这些努力,杭州市农民工加入工会的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2005年,杭州市工会会员总数为1314312人,其中农民工327383人。

除了努力加大团组织、工会组织本身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覆盖率,杭州市工会组织和团组织还积极利用其他渠道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化。2001年,依托杭州市青年人才专修学校成立的全市性外来务工青年培训总校和各分校,以及其他针对农民工的各类培训学校(如建筑工地学校)发挥了值得肯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以上工作不是杭州市为农民工所提供服务的全部,其他还有许多工作,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宿舍建设、廉租公寓建设、爱心门诊、传染病咨询和防治、计划生育服务等,都为农民工在杭州的安居乐业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三、杭州市农民工的经济社会贡献

在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努力为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农民工也为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民工是推动杭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余年中,杭州市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进入21世纪后,杭州的经济增长更是连续获得突破。2000年杭州市人均GDP为2699美元,2001年首度突破3000美元大关,2004年突破4000美元,2005年突破5000美元,达到了5431美元。这种成就的取得,无疑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其中就包括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贡献。

第一,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由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重新配置的特定表现,构成了杭州GDP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许多研究表明,劳动力的部门转移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如世界银行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由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20%。^①而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过去20年中,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其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贡献率为21%。^②另据专家测算,进城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20%。^③以此来考察杭州市的经济增长,在其年均超过10%的GDP增长率中,大约有两个百分点是由农民工形成的劳动力转移所贡献的。

第二,农民工为杭州经济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既提高了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率,也提升了杭州市经济的竞争力。经过多年的扩张,农民工已成为杭州市产业工人的主体,特别是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环境卫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农民工的比重更高。与城市中吃“皇粮”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相比,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要低廉得多。据资料显示,

^① 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② 陈诗达:《2007年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③ 孙景森:《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http://www.365jt.com/html/TechArticleUrban/1220160718417.htm。

与城市户籍员工相比,农民工每月工资至少要相差 600 元。^① 实际上,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和城市户籍职工之间的真实差距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据朱明芬的调查,2005 年,杭州市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仅是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 31.4%。^② 当年杭州市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30580 元,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为 9600 元,两者年平均工资相差超过 20000 元,月平均工资相差超过 1700 元。这还只是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如果再考虑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劳动保护、住房等方面的差距,那么农民工和城市户籍职工的劳动力价格差距还要增大。如果以最少的每月差 600 元计算,2005 年杭州市农民工总数约 137 万人,农民工为杭州经济贡献的超额剩余积累达 82.20 亿元。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也就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其一,如前所述,跟浙江省的整体情况一样,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公经济的发展,而非公经济正是农民工集中的部门,其发展无不大大得益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其二,在杭州市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中,对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 年,进出口总额达 298.7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 100.66 亿美元、出口总额 198.04 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杭州市的经济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因此农民工是杭州市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第三,农民工满足并促进了杭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关于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从第一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水平低向第三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水平高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工业化的初期,一产比重高,二产、三产比重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三产的比重则相应增加。当一产比重降至 10% 左右时,工业化进入了后期实现阶段,此后二产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缓缓下降。从表 3 可以看出,20 多年中,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呈现出一个逐步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

表 3 1985 年—2005 年主要年份杭州市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一产比重	二产比重	三产比重
1985	17.6%	57.6%	24.8%
1990	16.0%	54.2%	29.8%
1995	9.1%	53.8%	37.1%
2000	7.5%	51.3%	41.2%
2005	5.0%	50.9%	44.1%

说明:数据来自《杭州统计年鉴》。

2005 年,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已进入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化的状态。而这种水平较高、比较优

^① 孙景森:《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http://www.365jt.com/html/TechArticleUrban/1220160718417.htm。

^② 朱明芬:《杭州市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现状调查及保障机制研究》,《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 年第 9 期。

化的产业结构之所以能够形成,同样包含着农民工的重要贡献。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流入第二、第三产业,为杭州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解决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用工问题。作为一座国际性的风景旅游城市,杭州对于餐饮、住宿、商场零售、环卫绿化等服务业的劳务供应有着特别的、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农民工,很难满足这样一座国际性旅游城市对服务业的劳务需求。在农民工被动满足杭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需求的同时,也拉动了杭州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 农民工是杭州市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促进者和生力军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还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城市化的最显著表现,是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人口向城市集中聚居。因此,城市化率也就是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往往被看作城市化水平的一个标志。就此而言,农民工进城打工所形成的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一大推动力量。正如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科学学会理事长周干峙在2003年中国城镇发展论坛上所说的那样:“打工仔一只脚在农村,一只脚在城市,对城市化是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城市化的一大创举。”^①

2005年底,杭州市的城市化率为62.1%,已经进入城市化水平中期加速阶段的后期。农民工对杭州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化实际水平和城市质量的提高上。

第一,2005年,杭州市外来务工者为137.59万人,尽管对外来务工者自身而言大都属于“暂住人口”,但对杭州而言,除了春节前后一段时期,基本上是属于常年劳动人口,而且这个数字看来还可能会逐年增加。如果将这个数字也计算进来,那么杭州市的实际城市化率可能超过70%,也就是说,已进入城市化的后期成熟型发展阶段。事实上,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这部分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将率先转化为常住人口。就此而言,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已为杭州市城市化率的迅速提升做好了储备。

第二,农民工对于杭州城市化进程的贡献还在于提高了城市的容纳能力。城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有多少人口的容纳力,否则会形成大量的贫民窟,造成社会治安紊乱等问题,妨碍正常的城市社会生活秩序。就杭州而言,之所以其城市化率能迅速提高,同时基本保持和谐有序的正常社会生活,同样得益于其容纳能力的提高。即使是62.1%的城市化率,也表明杭州必须具备与此相应的城市人口容纳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就包含着农民工的贡献。其一,农民工促进了杭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这是城市容纳能力提高最根本的基础。第二,农民工是杭州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是城市公共服务重要的直接提供者。农民工占杭州一线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的80%以上,在住房建设、交通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保洁、城市绿化等领域中,到处活动着农民工的身影。农民工也是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商业零售服务业等的主要一线从业者,是这些为城市社会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的主要直接提供者。

第三,农民工为提高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的品质,或者说为杭州这座“生活品质之城”的打造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一,大大提高了杭州常住人口或者说“城里人”的生活和工作品质。农民工不仅为“城里人”提供了各种必需的服务,而且在杭州从事的基本上都是最苦、最脏、最累而报酬又低的工作,而原先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就从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体面”的工作。其二,在提

^① 周干峙:《要规划好市内农民、农民工的城市化》,中国新闻网。

高杭州实际城市化水平的同时,农民工所代表的“一只脚在农村,一只脚在城市”的独特城市化方式避免了城市贫民窟的大规模出现。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目前生活、工作在杭州,但却并没有在杭州落户常住,一旦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的收入实在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必要开支,就随时可以返乡回家。其三,农民工的进入缓解了杭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地区面临的一个普遍压力,杭州也不例外。2005年,杭州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10.23%,已步入所谓的“老龄化社会”。当然,这是根据常住人口计算的,没有将农民工计算在内。而在农民工中,青壮年人口是主体,因此,大量青壮年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杭州市的实际老龄化程度,缓解了杭州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优化了杭州人口的年龄结构。

(三) 农民工加强了城乡联系,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来杭农民工在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推动了其来源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第一,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有效方式,缓解了来源地农村的人地矛盾,这可以说是农民工对来源地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消极形式”的贡献。人地矛盾是农村社会其他许多矛盾的导因,而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有的还带着家人一起外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进而也缓解了由这个矛盾引起的其他问题。以杭州市本身的农村而论,2006年,杭州市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0.62亩,但当年杭州市农村外出劳动力为44.12万人(其中约有60%进入杭州市区),对于没有外出的人口而言,相当于新增了27.35万亩耕地。这对于缓解当地的人地矛盾、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第二,增加了来源地农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来源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来源地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制约,要靠农业来增收的空间很狭小,农业至多只够维持农民的温饱生活水平(在包括杭州市在内的江浙农村,仅仅依靠农业的话,恐怕连温饱都困难,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早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已有揭示)。如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使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有进一步地提高,就必须要有其他收入。农民工进城务工开辟了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来源。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务工获得的收入要高于他们在老家务农的收入。据调查,有75.2%的来杭农民工都表示,在杭务工的收入高于在老家可能获得的收入。在农民工获得的这些收入中,除了一部分用于自身在杭州生活的必要开支外,相当一部分(许多人超过其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寄回了老家。调查显示,来杭农民工人均每月寄回老家的金额大约为572.72元,以2005年杭州市农民工137万人计算,则杭州市农民工每年寄回其来源地的资金总额高达7.85亿元。这些资金,一方面直接提高了来源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使其在温饱的基础上,有可能进一步接触、享受现代消费品;另一方面,也为来源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必要的资金。另外,在来杭的农民工中,不乏由“打工仔”成为“老板”而直接回老家投资办企业的人士,就个人的贡献而言,这些“农民工”对来源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无疑就更加突出。

第三,为来源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和积累了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本,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网络。^① 尽管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无论是对于个体的成长、生活、工作、事业成功,还是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它的有无、多寡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

^① 尽管社会资本是近年来广泛地被学界用来解释个人成长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精确界定还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这里采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的定义。

响因素。而农民工走出村庄,来到杭州务工,在拉近了杭州这座现代都市和他们相对落后、闭塞的家乡之间联系的同时,也为他们自身和家乡大大地扩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和积累了社会资本。一方面,他们自身已经成了家乡人们的社会资本。据调查,相当多的来杭农民工是靠先期来杭亲友介绍而获得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的,其比重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 53.6% 和 54.2% (当然,就杭州市需要劳动力的状况而言,这些农民工与其家乡的联系实际上也增加了杭州市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在杭州生活、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既为自己、也为家乡拓展了关系网络,这尤其表现在那些在杭州发展得比较好的农民工身上。事实上,这种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起了农民工家乡某些干部的关注,其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农民工不要忘了在有机会的时候为家乡的发展“牵线搭桥”。

第四,作为沟通城乡的桥梁,农民工为其来源地农村带回了新观念、新技能、新规范,传播了现代城市文明。据调查,在来杭农民工中有 44.6% 表示来杭工作后的几个最大收获中包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有 34.2% 表示包括“改变了观念”,还有 11.4% 表示包括“学到了技术或致富本领”。这些收获,不仅使他们自身经历“现代性”的洗礼,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且当他们回到家乡时,也就不动声色地向其家乡传播了现代先进的城市文明,潜移默化地改造了其家乡中与现代社会不甚合拍的文化意识和观念,包括生育观念、消费观念、教育观念、经营观念等。总之,来杭农民工不仅通过其在杭的工作、生活、学习改造自身,获得了现代性经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家乡人的思想观念,塑造家乡人的现代意识,推动着家乡的现代化,促进家乡的新农村建设,为进一步的城市化准备了能更迅速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力资源。

(四) 农民工推动了体制变革,刺激了制度创新

农民工既是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的重要激发力量。就杭州而言,农民工作为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的重要激发推动因素,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就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完善。20 多年来,杭州市在针对农民工的就业制度方面,大体经历了从最初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到最后以各种积极的就业服务来吸引农民工来杭务工创业质的变化过程。促成变化的原因,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外,农民工顺应这种客观需要而自发地积极寻求各种渠道和机会进城务工,无疑是促使杭州市一次次、一步步调整就业政策和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刺激因素。这种刺激推动着整个就业体制的变革,特别是推动了杭州市城乡一体的就业政策、就业服务、失业登记、用工管理的发展和形成,催化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完善。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目标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需要和体现。

第二,推动了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城乡一元户籍制度的生长形成。农民工这个群体本身是城乡分割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表现出许多不合理、不公平之处,从而不断地促使它做出调整和改革。就杭州市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推出“蓝印户口”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创业者落户杭州开辟了一条小小通道以后,这种传统的户籍制度就一直处于不断地调整松动之中。进入 21 世纪后,从 2002 年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到 2005 年《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逐步实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

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而这种变化,很显然,不仅仅是关涉到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群体所激发和推动的。

第三,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推动了社会保障向一项普遍而基本的公民权利迈进。农民工身处城市,从事的是与“城里人”一样的工作——事实上常常是风险更大的工作——但却享受不到其城里人同事所能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这就大大凸显出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同时,由此所引发的各种实际问题,包括农民工自身基本生活、生命安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治安等等,也在提醒着人们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出调整和改革。进入21世纪以后,杭州市一方面积极探索并努力推进在市域范围内建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又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积极探索和推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制度举措。农民工既可以选择加入不分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五费合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特别针对农民工的、按“低门槛准入、低标准享受”办法推出的有关保险项目。这既照顾到了社会保障作为公民一项基本应享权利的普遍性,也照顾到了农民工的自由选择权,对于建立权利与义务对等、普遍而不失灵活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探索尝试。

第四,除了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3个特别显著的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和壮大及其在工作、生活中所面临和提出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刺激、推动和促进了杭州市其他许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如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合理工资增长机制、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等)、组织制度(特别是工会入会制度)、义务教育制度(“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女学校为辅”解决农民工子女就读问题的基本制度)、政治参与制度(保障农民工享有本地人一样政治权利的制度)等的改革与创新。

总之,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刺激和推动,杭州市的许多相关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向着更具公平性、普遍性和理性特征,以及现代制度文明方向发展的变革。

四、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现状

为了了解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现状,2007年12月,我们对杭州市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并在问卷调查的同时做了一些相关访谈。在调查中,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并经过仔细甄别后获得有效问卷740份。^①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大体如下:

从性别看,男性407人,占55%;女性333人,占45%。

从年龄看,16岁以下(不包括16岁)3人,占0.4%;16岁~25岁314人,占42.4%;26岁~35岁224人,占30.3%;36岁~45岁134人,占18.1%;46岁~55岁50人,占6.8%;55岁以上(不包括55岁)15人,占2.0%。

从来源地看,来自浙江本省的167人,占22.6%;来自外省的573人,占77.4%,所来自的地区包括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南、青海、甘肃、北京、重庆等26个省、自治区、市,其中来自安徽、河南、江西3省的人数较多,分别为141人(占19.1%)、82人(占11.1%)和77人(占10.4%)。

从教育程度看,小学及以下80人,占10.8%;初中249人,占33.6%;高中(含职高和中专)322人,占43.5%;大专56人,占7.6%;本科及以上学历33人,占4.5%。

^① 甄别问卷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它里面回答的内容是否存在明显的矛盾,如寄回家的钱比在杭州挣的钱还多等,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基本上判定它为有效。需要指出的是,在有效问卷中,也存在个别问题没有填写的现象,这不妨碍其他问题的有效性。当然,如果漏填的问题太多(超过10个),也判定为无效问卷。

从中可以看出,在来杭农民工中,男性要略多于女性,年龄上以35岁以下的青年占绝大多数,来源地以来自外省的为绝大多数,教育程度则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与有关方面对全国农民工的调查所得到的数据相比,杭州市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要略高于全国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这与杭州作为风景旅游休闲城市,服务业较为发达有关),年龄结构大体相当,而受教育程度则要高于全国农民工的平均水平。^①

(一) 杭州市农民工的就业与工作

对于农民工来说,参与就业、获得工作是其收入之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其生存的基础,也是其他各项活动的前提。为了系统了解掌握杭州市农民工生存、工作与发展的基本状况,我们不妨从了解杭州市农民工的就业与工作状况开始。

1. 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工种和单位

一个人所投身的行业、所从事的工种以及所供职的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收入和他职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受雇者来说,尤其如此。表4、表5、表6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在行业、工种和供职单位上的分布状况。

表4 杭州市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行 业	百分比
加工制造业	30.4%
建筑业	24.3%
宾馆、餐饮、商业服务业	26.1%
环卫服务业	5.8%
家政服务业	6.5%
交通运输业	3.4%
教育、文化、娱乐业	1.2%
其他	2.2%

表5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种分布

工 种	百分比
一线工人、服务员、营业员	67.9%
普通文职人员	3.7%
基层管理者	9.6%
中层管理者	3.8%
技术、研发、营销人员	7.9%
自己打零工或做小生意	3.6%
其他	3.4%

^① 全国数据参见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10页。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宾馆、餐饮和商业服务业,工种分布主要集中在一线工人、服务员和营业员,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的就业层次还是比较低的,基本上属于传统上所说的“蓝领工人”一类。当然,这也是全国农民工的普遍状况。而对农民工的性别和工种分布进行进一步的交叉分析表明,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层次要较男性农民工更低一些;在一线工人、服务员和营业员中,女性占54.6%,男性占45.4%;而在基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中,女性分别只占28.6%和3.6%,男性则分别占71.4%和96.4%。

表6 杭州市农民工的单位分布

单位性质	百分比
国有企业单位	10.4%
国有事业单位	8.1%
政府部门	0.7%
私营企业	48.2%
小型个体工商户	5.7%
外资或合资企业	22.9%
乡镇或其他集体企业	1.6%
其他	2.3%

表6的数据则表明,私营企业是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去向,其次是外资或合资企业。

2. 杭州市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和就业障碍

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和就业障碍体现了农民工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它既反映出包括劳务介绍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完善程度,也反映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优劣。表7、表8、表9的数据描述了杭州市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基本情形。

表7 杭州市农民工获取杭州就业信息的渠道

渠道	百分比
向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打听	53.6%
从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	5.1%
从市、县劳务市场	12.9%
从电视、报纸、互联网等传播媒介	8.5%
随意闯荡	9.7%
其他	10.1%

表7的数据表明,来杭农民工获取杭州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向先期来杭的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打听,与此同时,来源地的劳务市场在提供就业信息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不过,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获取杭州就业信息的主要渠道进行进一步的交叉分析表

明,教育越低,通过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获取杭州务工信息的比例越高(小学及以下教学程度的以此为获取信息主渠道的占78.8%,初中教育程度的占66.9%);教育程度越高,通过这种途径获取信息的比例越低(大专教育程度的占21.4%;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6.1%)。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从其他各种渠道了解、掌握有关就业的信息。

表8 杭州市农民工在杭州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途径

途 径	百分比
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介绍	54.2%
通过劳务市场	22.6%
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传播媒介	8.5%
通过家乡政府部门统一组织	2.3%
用人单位直接到当地招工	6.5%
其他	5.9%

表9 杭州市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感到的最大障碍

障 碍	百分比
获取求职信息渠道不通畅	15.1%
自身缺乏技术	37.6%
学历太低	29.8%
对农村户口的限制	5.1%
用人单位对外地人的不信任	7.1%
其他	5.3%

与表7所反映的情况相似,表8的数据表明,来杭农民工中,通过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介绍而找到在杭州第一份工作的比例最高,达54.2%,这与全国的情形基本相似;其次则是通过劳务市场,通过这个途径找到在杭州第一份工作的占22.6%,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对全国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所获得的3.2%的水平。^①这表明,前面所说的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规范劳务市场、强化就业介绍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实效的,尽管相比于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介绍这一途径,劳务市场还远非农民工谋职的主渠道。实际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途径的存在本身也在妨碍劳务市场发挥作用。访谈表明,许多农民工之所以没有通过劳务市场找工作,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离家来杭时,有关熟人就已经帮他们联系好了工作,或至少已为他们指了路。还需要指出的是,同样与获取杭州就业信息渠道的情形相似,对杭州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找到在杭州第一份工作的途径进行进一步交叉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由老乡、亲戚或其他熟人介绍而找到工作的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高。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从表9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杭州市农民工的自身感觉中,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是个人自身方面的原因,位居第一的是“自身缺乏技术”,其次是“学历太低”,再次是“获取求职信息渠道不畅通”,而认为主要障碍在于“对农村户口的限制”和“用人单位对外地人的不信任”的只分别占5.1%和7.1%。这表明,在农民工自身的感受中,制度性壁垒已不是他们在杭州就业的主要障碍。

3. 杭州市农民工的职业培训

如上所述,在杭州市农民工的自身感觉中,其求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在于个人自身素质方面,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表10、表11反映的是杭州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基本情况。

表10 杭州市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状况

培 训 状 况	百分比
有	36.4%
无	63.6%

表11 杭州市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原因

原 因	百分比
不知道怎样参加职业培训	26.8%
费用太贵,支付不起	24.9%
没有时间	24.3%
自己不想	13.4%
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举办职业培训太少,报不上名	6.5%
其他	4.2%

由表10可以看出,尽管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但是,在杭州市的农民工中,真正参加过培训的还是少数。进一步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行业以及所供职单位的性质这些因素和参加职业培训的状况进行交叉比较分析发现:第一,女性参加过培训的比例要略高于男性,前者为39.2%,后者为34.3%;第二,大体上,年龄越小参加培训的比例越高,35岁以下的超过40%,35岁以上的不到30%;第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参加培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前者的比例大体是后者的两倍;第四,在行业方面,从事教育、文化、娱乐业的参加培训比例最高,达66.7%。不过,由于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本身比例很低,其高比例对于总体而言意义不大。因此,真正对总体有意义而参加培训比例又较高的是从事宾馆、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比例为52.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女性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要略高于男性农民工,从事宾馆、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中,女性要大大多于男性),再次是从事加工制造业的,为39.5%,参加培训比例最低的是环卫服务业的从业者,仅7.1%;第五,从单位性质看,在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比例最高,为45.6%,其次是在国有企业单位工作

的,为40.3%。

多数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原因当然多种多样。而表11的数据表明,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即“不知道怎样参加职业培训”“费用太贵,支付不起”“没有时间”;而觉得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及相关部门举办职业培训太少,报不上名”的,只有6.5%。这表明,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政府和社会各界除了要努力举办各种培训之外,还需要加强培训的配套措施,包括培训信息的发布、培训费用的进一步降低等。当然,至于如何使农民工“有时间”参加培训,则除了农民工自身要善于安排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保护有关。

4. 杭州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

就业的稳定性是反映就业质量的一个方面。尽管不是越稳定越好,但是,在不存在制度性职业禁锢或束缚(即制度硬性限制就业者更换职业)的前提下,过于频繁地变换职业肯定不是就业质量高的一个表现。表12、表13、表14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方面的基本情况。

表12 杭州市农民工最近两年中换单位的次数

次 数	百分比
0次	46.1%
1次	26.4%
2次	16.8%
3次	5.4%
3次以上	5.3%

表13 杭州市农民工近两年换单位的次数相比于2005年以前的变化

变 化	百分比
换得更多了	11.8%
差不多	52.5%
换得更少了	35.7%

有人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具有临时工的性质。^①从根本上讲,杭州市农民工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况。不过,表12的数据表明,杭州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不仅要好于全国的总体状况^②,而且即使相比于浙江省的总体状况,也还要更好一些。^③而表13的数据则显示,尽管多数人认为近两年换单位的次数跟2005年以前差不多,但是相比于认为近两年“换得更多了”的人,认为“换得更少了”的人要多得多,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从某种意义上正在由“临时工”慢慢转变为“固定工”。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1页。

②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7页。

③ 陈诗达:《2007年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表 14 杭州市农民工换单位的原因(多选)

原 因	百分比
原单位工资太低	58.1%
原单位福利太差	33.8%
原单位经常拖欠工资	10.3%
与原单位同事、领导关系不好	3.6%
被解雇	2.6%
原单位不能发挥自己特长	19.8%
原单位劳动强度太大	20.2%
原单位工作环境太差	17.0%
其他	4.5%

表 14 所反映的是那些在近两年中换过单位的人之所以换单位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因被解雇而不得不重找工作的只占 2.6%,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被动换单位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自己主动换单位,这当然可能跟近年来所谓的“民工荒”已影响到杭州有关;第二,在换单位的原因中,被选择的频次最高的是“原单位工资太低”,其次是“原单位福利太差”,再次是“原单位劳动强度太大”,而选择“原单位工作环境太差”的也有一定的比例,这表明导致杭州市农民工换单位的主要动机还是属于物质方面的(这一点也从下面关于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务工之主要目的的数据中得到印证);第三,有 10.3%的人将“原单位经常拖欠工资”列为换单位的一个原因,这说明,一方面杭州市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这项工作还需继续坚持;第四,有近 20%的人之所以换单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原单位不能发挥自己特长”,由此可见,尽管导致杭州市农民工换单位的主要动机还是出于生理的、安全的低层次需要,但是,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自我实现方面的需要。

5. 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务工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收获

主动换单位的原因通常跟当事人出来工作的目的密切相关(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表 15、表 16 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来杭打工的主要目的和他们对来杭以后主要收获的基本认识。

表 15 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务工的主要目的(多选)

主 要 目 的	百分比
挣更多的钱	63.6%
出来见世面,开眼界	35.7%
学习技术和致富本领	28.4%
寻找发展机会	52.5%
让家乡人刮目相看	4.7%
其他	6.4%

从表 15 可以看出,选择“挣更多的钱”的频次最高,达 63.6%;其次是“寻找发展机会”,为 52.5%;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学习技术和致富本领”作为来杭工作的一个主要目的。这表明,对于农民工来说,直接挣钱是最主要的目的,这与上面关于换单位原因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不过,上述数据也表明,今天的杭州农民工很重视自身未来的发展,除了眼前的直接收入,也很注重赚钱能力、本领的获取和培养。而如果说,无论是直接挣钱,还是学习挣钱的本领,乃至自身未来的发展,这些目的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的话,那么,有 35.5%的人将“见世面、开眼界”作为来杭务工的一个主要目的,则表明农民工的追求中也同样包含着非功利的、审美的方面。

将表 15 的数据进一步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这些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除了在“出来见世面、开眼界”这项选择上,有 42.0%的女性选择了此项,而男性选择此项的只有 30.7%。第二,在年龄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年龄越大,选择“挣更多的钱”作为主要目的的比例越高,从“16 岁以下”一直到“55 岁以上”6 个年龄组选择这一答案的比例分别是 33.3%、52.4%、61.2%、80.6%、94.0% 和 86.7%;此外,“16 岁~25 岁”和“26 岁~36 岁”这两个年龄组选择“寻找发展机会”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分别为 62.9% 和 63.4%。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教育程度越高,选择“挣更多的钱”的比例越低,从“小学及以下”一直到“本科及以上”5 个教育程度组做此选择的比例分别为 80.0%、73.9%、57.0%、50.0% 和 33.3%;其二,大体上,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出来见世面、开眼界”的比例越低,教育程度由低到高 5 个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是 41.3%、34.9%、37.7%、30.4% 和 18.2%;其三,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寻找发展机会”的比例越高,五个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是 16.3%、39.0%、63.9%、76.8% 和 90.9%。

表 16 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务工后的主要收获(多选)

主 要 收 获	百分比
增加了经济收入	52.6%
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44.6%
改变了观念	34.2%
结识了更多的人,建立了更多的社会关系	33.6%
学到了技术或致富本领	11.4%
找到了能更好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	14.8%
其他	6.5%

再来看表 16,在关于到杭后主要收获的各选择项中,选择“增加了经济收入”的频次最高,其次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再次是“改变了观念”和“结识了更多的人,建立了更多的社会关系”。与上面所说的来杭务工目的相比,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在有关主要收获的认识上,杭州市农民工更多地选择了那些非功利性的方面,至少是那些不具直接功利性的方面。

对表 16 的数据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这些变量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第一,从性别看,男性中选择“增加了经济收入”的比例要高于女性,前者为 57.6%,后者为 46.5%;与此相反,男性中选择“改变了观念”的比例则要低于女性,前者为 27.6%;后者为 42.3%;此外,选择“学到

了技术或致富本领”和“找到了能更好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的,均为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其余几项则不存在明显差别。第二,从年龄看,如果撇开“16岁以下”和“55岁以上”两个小样本年龄组,则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年龄越大,选择“增加了经济收入”的比例越高,从“16岁~25岁”一直到“46岁~55岁”4个年龄组的比例分别为35.8%、56.1%、72.2%和86.0%;其二,大体上,年龄越大,选择“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的比例也相应越高,4个年龄组的比例依次为44.7%、37.2%、47.4%和72.0%;其三,年龄越大,选择“改变了观念”的比例越低,4个年龄组的比例依次为44.1%、33.2%、24.1%和14.0%;其四,年龄越大,选择“结识了更多的人,建立了更多的社会关系”的比例越低,4个组的比例分别为42.8%、30.9%、24.1%和24.0%。从中大体可以看出,年龄越大,越看重已经获得的;而年龄越小,则越注重有助于其今后发展的“资本”。第三,从教育程度看,值得注意的有:其一,大体上,教育程度越低,选择“增加了经济收入”和“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的比例越高,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5个组做此两项选择的比例依次分别为75.0%、60.9%、47.5%、25.9%、30.3%和48.8%、50.0%、42.2%、38.9%、27.3%;其二,选择“改变了观念”的,以高中和大专教育程度者比例最高,分别为43.2%和42.6%;其三,选择“结识了更多的人,建立了更多的社会关系”的,以教育程度最高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两组的比例居高,分别为59.3%和45.5%;其四,教育程度越高,选择“找到了能更好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的比例越高,5个组做此选择的比例分别为5.0%、11.3%、15.2%、31.5%和33.3%。

6. 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满意度

如上所述,增加收入是绝大多数来杭农民工(实际上也是各地农民工)出来打工的一个最主要目的,也是多数农民工出来打工后的最主要收获。实际上,即使是那些没有把增加收入看作是主要目的的人,也并不表示他们不关心收入,而只表明他们除此之外还有更高的关怀。表17、表18、表19、表20的数据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收入方面的基本情况。

表 17 杭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

月 收 入	百分比
1000 元及以下	29.4%
1001 元~2000 元	53.6%
2001 元~3000 元	11.6%
3001 元~4000 元	3.0%
4001 元~5000 元	1.6%
5001 元及以上	0.8%
平均月收入	1690.87 元

表 18 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期望值

月收入期望值	百分比
1000 元及以下	6.8%
1001 元~2000 元	51.1%

续表

月收入期望值	百分比
2001 元 ~ 3000 元	23.5%
3001 元 ~ 4000 元	5.6%
4001 元 ~ 5000 元	8.0%
5001 元及以上	5.0%
平均月收入期望值	2608.63 元

表 19 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变化(与留在家乡的人相比)

变 化	百分比
大幅度提高	8.5%
有所提高	66.7%
没什么变化	22.6%
不仅没提高还有所下降	2.2%

表 20 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变化(与前几年相比)

变 化	百分比
有明显提升	19.2%
有提升,但不明显	53.3%
没什么变化	23.7%
不仅没有提升,还下降了	3.8%

表 17 的数据显示,杭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 1690.87 元,月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者占 29.4%,在 1001 元 ~ 2000 元者占 53.6%。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杭州市农民工收入水平相比全国以及浙江省的总体状况,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据 2005 年对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农民工的调查,月均收入在 500 元以下者为 11.6%,在 501 元 ~ 800 元者为 31.0%,在 801 元 ~ 1200 元者为 31.9%,在 1201 元 ~ 1500 元者为 13.6%,1501 元以上者为 11.9%。^①另据 2006 年对浙江全省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月均收入为 1217.73 元。^②

对表 17 的数据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均值比较分析表明,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这些变量上均有明显差别。在性别方面,男性要高于女性;在年龄方面,“26 岁 ~ 35 岁”年龄组的收入最高,其次为“36 岁 ~ 46 岁”年龄组;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见表 21、表 22、表 23)^③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29 页。

② 陈诗达:《2007 年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第 309 页。

③ 均已考虑标准误的情况,且 P 值均符合要求。下同。

表 21 杭州市农民工收入的性别差异

性别	人数	人均月收入(元)
男	406	1963.89
女	330	1355.55
总体	736	1690.87

表 22 杭州市农民工收入的年龄差异

年龄组	人数	人均月收入(元)
16岁(以下不含16岁)	3	1566.67
16岁~25岁	311	1501.93
26岁~35岁	224	1985.67
36岁~45岁	134	1697.69
46岁~55岁	50	1587.80
55岁以上(不含55岁)	15	1513.33
总体	737	1690.87

表 23 杭州市农民工收入的教育程度差异

教育程度	人数	人均月收入(元)
小学及以下	79	1262.53
初中	248	1460.08
高中(含中专、职高)	322	1661.12
大专	56	2336.61
本科及以上	32	3706.25
总体	737	1690.87

影响一个人对自己收入满意度的(关于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满意度状况,见表24)除了他的实际收入或者说绝对收入水平,还有他的相对收入水平,即通过比较而得出的收入水平。比较得有比较的对象:他可以将自己的实际收入与自己的收入期望值比较,可以将自己的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比较,也可以把自己现在的收入与过去的收入进行比较。

表18的数据反映的是农民工对自己收入的期望值,也即他期望自己能挣得的月收入水平。从表中可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平均的月收入期望值为2608.63元;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月收入期望值都落在1000元~3000元这个区间中,其中又尤其以落在1000元~2000元之间者居多。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对自己收入的期望是很理性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能力、现实处境以及目前已达到的收入水平等因素的正视和理性分析之上的。对表18的数据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对表17的数据进行相应分析得出的结果基

本一致,只是在年龄方面,尽管“26岁~35岁”年龄组依然是平均期望值最高的,但期望值次高的不是“36岁~45岁”这一年龄组,而是“16岁以下”这一年龄组。不过,由于“16岁以下”组样本过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相对收入水平的另一个来源是将自己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进行比较。表19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将自己的打工收入与留在老家的人进行比较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可以想象,调查对象在表达时会不自觉地有所保留,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人(75.2%)还是认为,通过来杭打工,其收入比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有了提高,甚至大幅度的提高。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否则就很难理解把增加收入作为主要目的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杭务工。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2.2%)觉得来杭打工后,其收入反而下降了。不过,通过有关访谈了解到,这一般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有的是因为来杭的时间不长,还处在不适应之中,有的则是因为诸如家庭问题等消极方面的原因才出来打工的。

表20显示的是杭州市农民工感受中近几年来收入的变化状况,也就是通过将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与以前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相对收入水平。由表中可得知,绝大多数人(72.5%)认为,近年来在杭州打工的收入有了提升,甚至明显的提升。

绝对收入水平和通过各种比较——与自己的期望值比、与别人的收入比、与自己前几年的收入水平比——而获得的相对收入水平,最终形成人们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表24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自己工作收入满意度的总体状况。由表中数据可知,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满意度基本上属于一种正常的情态^①。而如果将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满意度状况和全国的情形相比,则可以发现,前者的情况要略好于后者,但相差不大。据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4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全国农民工对工作收入表示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的的比例分别是3.1%、22.3%、52.7%、19.1%和2.8%。^②

表 24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满意度

满 意 度	百分比
很满意	6.5%
比较满意	23.6%
一般	50.0%
不太满意	17.5%
很不满意	2.4%

通过给不同程度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赋值,分别赋予“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以1分、2分、3分、4分、5分的分值,即分值越高,满意度越低,并进一步按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在性

^① 所谓“正常的情态”,是指在一个经济运行正常的社会中,就业者的收入满意度往往大体呈现出一种正态分布,即很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一般是极少数,而最多的往往是满意度“一般”的人。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满意度状况正呈现出这种情形。

^②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2页。

别方面,杭州市男性农民工的收入满意度要高于女性,前者的平均分值为 2.80,后者的平均分值为 2.93。第二,在年龄方面,撇开“16 岁以下”组不算(因样本很小,故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则杭州市农民工呈现出年龄越大,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的现象,从“16 岁~25 岁”一直到“55 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3.05 分、2.90 分、2.62 分、2.34 分和 2.07 分。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2.39 分、2.81 分、2.99 分、2.91 分和 2.97 分,从中可以看出,在各教育程度组中占农民工总数比例最高的高中组对于工作收入的满意度相对偏低,其次则是“本科及以上”组。

7.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关系

职工的工作关系是影响其对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表 25 和表 26 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与上司、与一同工作的同事之间的基本关系状况。

表 25 杭州市农民工与上司的关系状况

关系状况	百分比
很融洽	16.5%
比较融洽	36.1%
一般	46.6%
比较糟糕	0.8%
很糟糕	0.0%

表 26 杭州市农民工与同事的关系状况

关系状况	百分比
很融洽	26.5%
比较融洽	46.2%
一般	26.5%
比较糟糕	0.3%
很糟糕	0.4%

从表 25 和表 26 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无论是与上司还是与其他普通同事的关系,应该说都是比较好的,这反映在只有极个别的人(不足 1%)认为自己与上司或同事的关系属于“比较糟糕”或“很糟糕”,而认为自己与上司或同事的关系属于“很融洽”或“比较融洽”的则均要超过半数。而相比之下,杭州市农民工与普通同事的关系又要更好于他们与上司的关系。这也很好理解,地位的接近本身通常就能自然地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别赋予从“很融洽”一直到“很糟糕”这 5 种不同的关系以 1 分到 5 分的不同分值(分值越高,关系越差),进而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与上司、与同事的关系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性别、年龄两个变量上,杭州市农民工与上司、与同事的关系不存在明显差别。但是,在教育程度方面,大体上,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要略好于教育程度比较低的,

而其中尤以大专文化程度者为最好;在与上司的关系方面,从“小学及以下”一直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2.32 分、2.45 分、2.28 分、2.04 分和 2.18 分;在与同事的关系方面,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2.05 分、2.17 分、1.92 分、1.84 分和 2.06 分。这表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也比较善于协调和周围人的关系。而这和上面提到的一个情形似乎也可以隐隐相互印证,即在来杭务工的主要收获方面,选择“结识了更多的人,建立了更多的社会关系”的,也以教育程度最高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两组的比例居高。

8.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在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关系以及通过工作而得到的其他收获等等因素,最终都会体现为人们对工作的综合满意程度。表 27、表 28、表 29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其所从事工作的满意程度方面的大体情况。

表 27 杭州市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的喜欢程度

喜 欢 程 度	百分比
很喜欢	18.9%
比较喜欢	33.2%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谋生的一只“饭碗”	39.4%
不太喜欢	7.8%
很不喜欢	0.7%

表 28 杭州市农民工对工作感到最满意的方面(多选)

最满意的因素	百分比
收入较高	17.4%
福利较好	17.7%
上司的尊重	20.7%
同事的友善	54.4%
工作环境条件好	40.7%
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相符	18.5%
其他	3.3%
总频次	172.6%

表 29 杭州市农民工对工作感到最不满意的方面(多选)

最不满的因素	百分比
工资太低	42.9%
工作环境条件差	23.2%
工作能力得不到认可	22.3%

续表

最不满的因素	百分比
上司的苛待	13.9%
同事间的矛盾	6.9%
拖欠工资	9.3%
工作本身与自己兴趣特长不符	14.4%
其他	11.4%
总频次	144.2%

表 27 的数据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尽管在各选择项中,“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谋生的一只‘饭碗’”这一项被选择的频次最高。但是,若将选择“很喜欢”和“比较喜欢”这两项的频次相加,则其选择频次之和就要显著高于前者,更要远远高于选择“不太喜欢”和“很不喜欢”的频次之和。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对于其从事工作的认同程度是比较高的。这和早几年一些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在“生存论”视角下(即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就是为了生存)描绘的农民工与其工作的关系^①有很大的不同。其二,选择“不太喜欢”和“很不喜欢”的加起来也只有 8.5%。这表明,在杭州市农民工中,真正从内心里实际上拒斥所从事的工作、但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的只是极少数人。值得一提的是,表 17 的数据和笔者于 2006 年所主持的一项关于杭州市外来务工者(实际上就是农民工)幸福感状况的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基本一致:在那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对所从事工作表示“非常喜欢”“比较喜欢”“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谋生的一只‘饭碗’”“不太喜欢”“很不喜欢”的比例依次分别为 16%、38%、39%、4%、3%。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导致对工作之喜欢或不喜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表 17 的数据看作是杭州市农民工对其所从事工作之综合满意度的体现。

通过给不同的喜欢程度分别赋予 1 分到 5 分的分值(分值越高,对工作的喜欢度越低),并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喜欢度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杭州市男女农民工对所从事之工作的喜欢度不存在明显差别;第二,在年龄方面,呈现出年龄越大,越喜欢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现象,从“16 岁以下”(因样本过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际上可以撇开不算)一直到“55 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平均分依次依次为 2.67 分、2.50 分、2.38 分、2.20 分、2.16 分和 2.13 分;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占杭州市农民工总数比例最高的高中教育程度者和次高的初中教育程度者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喜欢认同程度相对偏低,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平均分依次依次为 1.96 分、2.44 分、2.46 分、2.27 分和 2.36 分。

表 28 和表 29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最满意的因素和最不满意的因素,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值得注意之点。第一,上述两表显示,杭州市农民工对最满意的因素的选择总频次(172.6%)要明显高于对最不满的因素的选择总频次。这表明,在总体上,让杭州

^①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周大明:《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市农民工感到满意的因素要多于让他们感到不满的因素。第二,让杭州市农民工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最满意的因素中,选择频次居于第一位的是“同事的友善”,其次是“工作环境条件好”,再次是“上司的尊重”;让杭州市农民工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最不满意的因素中,选择频次居于首位的是“工资太低”,其次是“工作环境条件差”,再次是“工作能力得不到承认”。从中可以看出,对杭州市农民工来说,尽管“工作环境条件”同时出现在令其感到满意和不满的因素之中,但是,相对而言,令其满意的因素更多地与工作的条件与环境(物理的、社会的)有关,而令其不满的则更多地与工作的待遇和回报(物质的、精神的)有关。第三,尽管与“同事的友善”“工资太低”等因素相比选择的频次不是太高,但是,在令其最满意的因素中,选择“上司的尊重”和“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相符”的分别达到 20.7% 和 18.5%,在令其最不满意的因素中,选择“工作能力得不到认可”和“工作本身与自己兴趣特长不符”分别达到 22.3% 和 14.4%。这表明,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不仅仅只是关注“生存”,同时也已开始马斯洛所说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了。这和前面表 14、表 16 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基本一致的。

对表 28 的数据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各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最满意的因素中选择“收入较高”和“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相符”的频次较高,有 20.9% 和 22.4% 的男性农民工选择了这两项,相应地只有 13.1% 和 13.8% 的女性农民工选择这两项;相反,在“同事的友善”和“工作环境条件好”这两项上,则是女性比男性选择频次高,有 59.3% 和 48.7% 的女性农民工选择了这两项,相应地只有 50.2% 和 34.3% 的男性农民工选择这两项。第二,在年龄方面,撇开不具统计学意义的“16 岁以下”组,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年龄越大,选择“收入较高”为最满意因素的频次越高,从“16 岁~25 岁”一直到“55 岁以上”各组中选择该项的比例依次为 11.3%、12.3%、28.8%、38.8% 和 53.3%;其二,大体上(除了“46 岁~55 岁”组),年龄越大,选择“同事的友善”为最满意因素的频次越低,5 个组中选择该项的比例依次为 61.1%、50.7%、43.2%、62.0% 和 40.0%;其三,在年龄较大的“46 岁~55 岁”和“55 岁以上”两组中,选择“工作本身与自己兴趣特长相符”为最满意因素的比例明显要远低于总体平均数,分别只有 2.0% 和 6.7%。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点:其一,教育程度越高,选择“收入较高”为最满意因素的比例越低,从“小学及以下”一直到“本科及以上”各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42.3%、18.2%、12.7%、12.5% 和 6.1%;其二,大体上(除了“小学及以下”组),教育程度越高,选择“福利较好”为最满意因素的比例越高,5 个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17.9%、12.6%、18.7%、21.4% 和 39.4%;其三,大体上(除了“本科及以上”组),教育程度越高,选择“上司的尊重”为最满意因素的比例越高,5 个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12.8%、19.8%、21.5%、33.9% 和 15.2%;其四,基本上,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相符”为最满意因素的比例越高,5 个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6.4%、17.8%、17.7%、26.8%、45.5%。

对表 29 的数据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各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后则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工资太低”为最不满意因素的,女性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男性,有 50.6% 的女性做此选择,而男性中只有 36.4%,这和上面所说的杭州市男性农民工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要高于女性是一致的;与此相反,选择“工作环境条件差”和“工作能力得不到认可”为最不满意因素的,男性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女性,分别有 27.3% 和 25.5% 的男性做此选择,而只有 18.2% 和 18.5% 的女性做此选择。第二,在年龄方面,除开不具统计学意义的“16 岁以下”组,则

以下几点比较引人注目:其一,年龄较大的“46岁~55岁”和“55岁以上”两组选择“工作能力得不到认可”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其他各组,分别只占本组总人数的8.7%和6.7%,而其他各组都要超过20%;其二,选择“上司的苛待”为最不满意因素的,年龄最小、也是占农民工总数比例最高的“16岁~25岁”组要明显高于其余各组,该组中有19.7%的人作此选择,而其余各组除了“26岁~35岁”组为10.6%,其他均不到10%;其三,选择“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不相符”为最不满意因素的,同样也是“16岁~25岁”组比例最高,该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为19.4%。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其一,选择“工资太低”为最不满意因素的,以占杭州市农民工之绝大多数的“初中组”和“高中组”的频次为最高,在这两组中分别有42.3%和48.4%做此选择,其余各组则基本上都在35%以下;其二,大体上,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工作能力得不到认可”为最不满意因素的比例越高,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的各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14.3%、21.2%、18.6%、29.1%和30.0%;其三,教育程度越高,选择“拖欠工资”为最不满意因素的比例越低,5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分别为13.0%、11.2%、7.9%、7.3%和3.3%;其四,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工作本身与自己的兴趣特长不相符”为最不满意因素的比例越高,5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2.6%、10.4%、16.7%、27.3%和30.0%。

(二) 杭州市农民工的劳动和社会保障

就业与工作状况所体现的,主要是农民工与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既体现出他们在市场中的现实地位和发展前景,也体现出他们作为以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市民社会成员不受任何歧视性法规、政策的限制而自由地进入市场的权利的发展状况。不过,从理论和理念上讲,农民工不仅仅只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成员,他还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也即,他还是“公民”。作为公民,他除了拥有一些基本的消极的权利,如上面所说的不受任何歧视性法规、政策的限制而自由地进入市场的权利,而且,从应该的角度讲,他还和其他所有公民一样,享有一系列更为积极的权利,如当其在市场中遭受不公平待遇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时,获得国家、政府提供的各种保护、福利的权利。对于国家和各级政府来说,维护这些权利就成为其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国家或者说政府也许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幸福”,但是,必须尽可能确保每个公民“免于不幸”,“免于不幸”正是设置这些权利的基本立足点。而接下来所要考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所体现的,就是农民工和这些比较积极的权利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在这些权利上的发展状况。

1. 杭州市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建立

劳动关系的建立,是劳动者获得法律所规定的劳动保护的前提。表30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与所就业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状况。

表30 杭州市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的状况

劳动关系状况	有	没有
有没有被单位扣押证件	9.3%	90.7%
进入现单位时有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57.4%	42.6%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一些企业为了稳定农民工队伍,当然更为了加强对农民工的控

制,在招用农民工时有违法扣押他们证件的现象,如身份证、暂住证等。对此,媒体上已屡有曝光。从表 30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杭州市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情况是比较好的,没有被单位扣押证件的农民工占 90.7%,被扣押证件的只有 9.3%。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情况要好于 2005 年有人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所获知的情况。在该次调查中,总体上被扣押证件的比例为 14.7%,珠江三角洲为 14.2%,长江三角洲为 13.6%。^① 不过,在肯定杭州市农民工在证件扣押方面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本次调查中,还有 9.3% 的农民工被单位扣押证件。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权益关系的法律形式,是双方——在弱劳动强资本的条件下,实际上主要是劳方——正当权益受到法律和制度保护的前提,也是一旦发生劳动纠纷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从表 30 中的数据可以知道,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有 42.6% 的人没有与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尽管这个数据所表明的情況要好于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该次调查所得出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53.0%,但其中有 15.2% 只是口头约定,没有正式书面合同;^②也要好于 2005 年有人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所获知的情况,根据该次调查,有 52% 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另有 3.7% 的农民工不清楚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③ 然而,有 42.6% 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表明有 42.6% 的农民工是在一种不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情况下就业的,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其正当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维护。据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工作人员介绍,一些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劳动纠纷之所以难以解决,农民工的维权之所以比较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建立劳动关系时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等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在性别上,男性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54.8%,女性为 60.4%;第二,在年龄上,除开不具统计学意义的“16 岁以下”组,大体上呈现年龄越大,合同签订率越低的状况,从“16 岁~25 岁”一直到“55 岁以上”各组的合同签订率分别为 62.0%、66.4%、48.1%、28.0% 和 20.0%;第三,在教育程度上,则明显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分别为 35.4%、46.9%、65.7%、71.4% 和 81.8%;第四,从所从事行业看,加工制造业的从业者劳动合同签订率最高,为 81.0%,其次是宾馆、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者,为 61.3%,其余各行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均不到半数,而其中最低的是家政服务业,为 27.7%;第五,从所就业的单位性质看,劳动合同签订率最高的是外资或合资企业,为 83.4%,其次是国有企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分别为 79.2% 和 61.7%。

2. 杭州市农民工的自我维权意识

有没有良好的自我维权意识,是影响一个人的正当权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因素。而自我维权意识首先、并且最显著地体现在对自己应享的正当合法权益的认识了解上。表 31 和表 32 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情况。

从数据可知,杭州市农民工对与自己的正当权益紧密相关的有关规定、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

① 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5 页。

②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593 页。

③ 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88 页。

是比较有限的。

表 31 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最低工资规定的了解状况

是否知道杭州市最低工资规定	百分比
知道	46.9%
不知道	53.1%

表 32 杭州市农民工对与自身权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状况

法 律 法 规	很熟悉	了解一点	听说过	没听说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7.3%	55.7%	29.7%	7.3%
《浙江省工资支付条例》	4.9%	33.1%	31.8%	3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条例》	3.5%	20.0%	30.6%	4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8%	23.5%	37.5%	36.1%
《劳动保险条例》	4.5%	33.7%	32.6%	2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法》	5.9%	29.6%	30.4%	34.1%
《工伤保险条例》	5.4%	32.2%	31.8%	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4.6%	23.0%	28.2%	4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1.2%	35.0%	26.2%	27.6%

从表 31 可看出,只有不到一半的杭州市农民工知道杭州市的最低工资规定。这就导致有不少农民工在其工资(在法定劳动时间内)实际上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的情况下,也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已受到侵犯。进一步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这些变量就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最低工资规定的了解程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性别上,男性农民工表示知道最低工资规定的为 44.7%,女性为 49.5%;在年龄上,撇开“16 岁以下”组,大体呈现年龄越大,对最低工资规定了解越少的趋势,从“16 岁~25 岁”一直到“55 岁以上”各组表示知道最低工资规定的比例依次为 50.5%、54.7%、38.8%、22.0% 和 0.0%;从教育程度看,则呈现出初中以下表示知道最低工资规定者均不足 40%,而高中以上者表示知道者均超过 50% 的显著差异。

表 32 显示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从中可以看到,除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表示“很熟悉”和“了解一点”的共有 63.0%,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表示“很熟悉”和“了解一点”的共有 46.2%,其余的两者相加均不足 40%。

为了进一步说明杭州市农民工对相关法律的了解程度,我们不妨对不同的了解程度予以赋值,分别赋予“很熟悉”“了解一点”“听说过”“没听说过”以 1 分、2 分、3 分、4 分的分值,得分越高,了解程度越低,再计算杭州市农民工在上面所列每一项法律法规上的平均得分,则可以发现,杭州市农民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之了解程度的得分在 3 分以上,即处于“听说过”和“没听说过”之间;对其余各项法律法规之了解程度均在 2 分~3 分,并且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得分都更靠近3分,也就是说其了解程度基本处在“了解一点”和“听说过”之间,并且基本上更靠近“听说过”(见表33)。这一情形在总体上尽管要比有人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所做的相应调查所获知的情况要略好些^①,但应该说还是不尽人意的。

表 33 杭州市农民工对有关法律法规了解程度的平均得分

法 律 法 规	平均得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2.37
《浙江省工资支付条例》	2.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条例》	3.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3.07
《劳动保险条例》	2.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法》	2.93
《工伤保险条例》	2.88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70

进一步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在性别方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法》《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了解上,男性农民工要好于女性,在其余各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上,男女农民工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龄上,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在对各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大体上均呈现出年龄越大,了解程度越低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几项法律、法规上,如《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法》《工伤保险条例》,“55岁以上”年龄组的了解程度反而又有所上升);在教育程度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对各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除了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了解程度上,本科及以上学历者要略略输于大专文化程度者之外,在对其余各项法律法规的了解上,均明显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了解程度越深的趋势。

总的来说,杭州市农民工的自我维权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而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自我维权意识之间的关系而言,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在自我维权意识上的差别不显著;在年龄和教育程度方面,年龄与自我维权意识大体呈反相关;而教育程度则与自我维权意识呈正相关。

3.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资发放状况

农民工工资是否按时足额发放,是农民工权益有无受到侵害的集中表现,也是最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表34、表35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这方面的状况。

从表34的数据可知,杭州市农民工在工资被拖欠方面的情况是比较好的。66.8%的被调查者在杭州没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16.1%只是很少被拖欠,两者相加达到82.9%,而回答“经常被

^① 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拖欠”的只有 1.6%。这表明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上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这一点,从表 34 关于近年来杭州市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的情况变化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 2005 年之前来杭务工的农民工中,尽管 58.3% 的人认为现在的状况与 2005 年之前差不多(如果设想这部分人在 2005 年之前即没有或很少有被欠薪的经历,这事实上是很正常的),但认为现在相比于 2005 年之前欠薪状况“改善了”的,高达 40.1%,要远远高于认为现在反而“更差了”的 1.7%。

表 34 杭州市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

工资拖欠状况		百分比
在杭州工作期间,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	经常拖欠	1.6%
	有时拖欠	15.5%
	很少拖欠	16.1%
	没拖欠过	66.8%
与 2005 年前相比,在工资按时发放方面的情况变化(限 2005 年前即来杭者填写)	改善了	40.1%
	差不多	58.3%
	更差了	1.7%

表 35 杭州市农民工加班工资发放状况

加班及工资发放状况		百分比
杭州市农民工被要求加班情况	经常	25.1%
	偶尔	43.5%
	很少	18.9%
	没有	12.5%
杭州市农民工加班工资发放情况	没有加班工资	27.2%
	按本人标准工资 100% 发放	33.1%
	发放标准在本人标准工资 100% ~ 150%	20.9%
	发放标准在本人标准工资 150% ~ 200%	9.1%
	发放标准超过本人标准工资 200%	1.4%
	其他	8.3%

杭州市农民工在遭遇欠薪方面的情况相对较好,这一点,从另一个情况也可以得到佐证。有人考察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在内的几十个城市,都发生过农民工为“讨薪”而自杀(包括真实自杀和做出自杀姿态)的现象,但不包括杭州。^①

^① 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乡村中国评论》第 2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通过给工资拖欠的不同状况赋值,分别赋予“经常拖欠”“有时拖欠”“很少拖欠”和“没拖欠过”以1分、2分、3分、4分的分值,分值越高,情况越好,并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状况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发现除了在性别上,男女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女性要好于男性,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则不存在显著差别。

工资发放状况除了体现在工资有没有被拖欠,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加班工资的发放情况。从表35的第一组数据可知,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只有12.5%称没有被要求加过班,25.1%称经常要加班,43.5%称偶尔要加班。这表明,在农民工中,加班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加班工资的发放情况又如何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在正常工作日加班,加班工资的发放标准应该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150%;在法定休息日加班,加班工资的发放标准应该不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200%;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加班工资的发放标准应该不低于本人标准工资的300%。而从表35的第二组数据可知,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27.2%的人根本没有加班工资,33.1%的人加班工资只按本人标准工资的100%发放,加班工资的发放标准在本人工资标准150%以上的总共只有10.5%。另有8.3%的人选择了“其他”,而进一步考察这“其他”究系何指,则除了极个别的人说明是调休或超过本人标准工资的300%之外,绝大多数都不足本人标准的100%。由此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在获得法定的足额加班工资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4.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保护

法定工作时间或者说休息权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又一个方面。表36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工作时间的状况。

表 36 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时间

工 作 时 间		百分比
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加班除外)	8小时以下	7.9%
	8小时	28.0%
	8小时~10小时	35.5%
	10小时~12小时	18.6%
	12小时以上	10.0%
每周休息几天?	2天	24.7%
	1天	28.7%
	有,但平均在1天以下	17.1%
	没有休息日	29.5%

由表36的数据可知,从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看,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有64.1%超过8小时,也即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而从每周的休息天数看,有46.6%的杭州市农民工每周休息时间不足一天,即低于法定休息天数的最低线。

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性别上,杭州市男女农民工在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别,但在每周休息天数

上,则存在差异,女性的情况要好于男性,前者选择平均每周休息“2天”“1天”“1天以下”“没有休息日”的百分比依次为28.3%、34.0%、13.3%、24.4%,后者则相应为21.7%、24.4%、20.2%、33.7%。第二,年龄上,撇开不具统计学意义的“16岁以下”组,则在每天工作时间内,除了“16岁~25岁”组,其余各组不存在明显区别,而“16岁~25岁”组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则要明显长于其他组,该组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以下”“8小时”“8小时~10小时”“10小时~12小时”“12小时以上”的百分比分别为4.8%、31.3%、24.9%、24.3%和14.7%;在每周休息天数上,则明显呈现出年龄越大,每周休息天数越少的趋势:从“16岁~25岁”一直到“55岁以上”各组选择每周休息“2天”和“1天”的百分比分别依次为:30.6%和31.8%、26.6%和29.3%、15.7%和26.9%、12.0%和18.0%、0%和0%,而选择“1天以下”和“没有休息日”的百分比则依次分别为:16.9%和20.7%、21.2%和23.0%、13.4%和44.0%、12.0%和58.0%、17.1%和86.7%。第三,教育程度上,在每天工作时间方面,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大专”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组要明显好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其他各组,前者选择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百分比均要超过50%,而后者均不足40%;在每周休息天数方面,则明显呈现教育程度越高,周平均休息天数越多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选择每周休息“2天”和“1天”的百分比分别依次为10.0%和21.3%、15.3%和21.0%、31.1%和36.0%、30.9%和38.2%、57.6%和18.2%,而选择“1天以下”和“没有休息日”的百分比分别依次为21.3%和47.5%、19.8%和44.0%、13.7%和19.3%、18.2%和12.7%、18.2%和6.1%。

工作时间关系到劳动者的正当休息权问题,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劳动者身体保护的一个方面。表37、表38则直接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在工作中的身体保护状况。

表37 杭州市农民工的定期体检和女性“三期”保护状况

身体保护状况		百分比
工作单位有没有给定期身体检查?	有定期检查	37.2%
	只在上岗前进行过检查	31.1%
	从来没进行过检查	31.7%
单位对女性“三期”(经期、孕期、哺乳期)有无特殊保护?(限女性回答)	有	33.7%
	没有	66.3%

从表37的第一组数据可知,杭州市农民工获得定期体检、只在上岗前进行过体检和从来没有进行过体检的比例大约为各占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不容乐观。据2005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4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在全国层面上,有47.2%的农民工有定期身体检查。^①

通过给“有定期检查”“只在上岗前进行过检查”“从来没有进行过检查”分别赋予1分、2分、3分的分值,分值越高,定期体检方面的情况越差,并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所从事的行业诸变量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第一,在性别方面,女性获得定期体检的情况要好于男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4页。

性,前者的平均分为 1.74 分,后者为 2.12 分。第二,在年龄方面,撇开“16 岁以下”组,则大体上呈现年龄越大,获得定期检查的情况越不尽人意的趋势,从“16 岁~25 岁”一直到“55 岁以上”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1.82 分、1.79 分、2.17 分、2.56 分、2.67 分。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则明显呈现教育程度越高,获得定期体检的情况越好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平均分依次分别为 2.37 分、2.11 分、1.79 分、1.70 分、1.61 分。第四,在所从事行业方面,则“加工制造业”“宾馆餐饮商业服务业”“教育文化娱乐业”要明显好于其他各个行业,这三个行业的平均分分别为 1.58 分、1.63 分、1.67 分,而其余各行业的平均分都要超过 2 分。

从表 37 的第二组数据可以看出,杭州市女性农民工在获得“三期”特别保护方面同样不尽人意。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处于“经期”“孕期”“哺乳期”时可以获得相应的保护。而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则显示,51.7% 女性农民工可以在孕期依法享受特殊保护。^① 进一步就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行业这两个变量对女性的“三期”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从教育程度看,明显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享受保护越好的情况,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女性农民工中获得“三期”保护的比例依次分别为 18.2%、22.4%、36.9%、63.6% 和 88.9%;从行业看,撇开总共只有 3 位接受调查的女性从业者的“教育文化娱乐业”,则是“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女性提供“三期”保护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47.9% 和 40.7%,其余各行业均不足 30%。

表 38 杭州市农民工职业伤害及赔偿情况

职业伤害及赔偿情况		百分比
来杭工作后有没有受到过职业伤害(工伤、职业病等)?	有	13.0%
	没有	87.0%
如果受到过职业伤害,有没有得到赔偿?	自己没有申请赔偿,也没得到赔偿	43.2%
	申请要求赔偿,但没有得到	24.2%
	自己没有主动申请,但得到了	12.6%
	自己申请赔偿了,也得到了	20.0%

表 38 所反映的是职业伤害和职业伤害赔偿的情况。从其中的第一组数据可以得知,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 13% 的人称曾受到过职业伤害。从绝对数看,这个比例是不低的,尽管其中受伤害的程度有重有轻。不过,与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所得的数据相比,杭州市农民工在职业伤害方面的情况还算比较好。据那次调查,全国层面上农民工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的比例为 22.9%,大大高于杭州市的比例。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行业等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职业伤害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除了在性别方面男性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前者受到过职业伤害的比例(16.1%)要明显高于后者(9.1%),其他在年龄、教育程度、行业等方面没有发现系统性的明显区别。

表 38 的第二组数据反映了职业伤害赔偿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受到职业伤害的杭州市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05 页。

农民工中,总共有 32.6% 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 20% 是经主动申请而获得的,另有 12.6% 是未经申请而获得的。还有 24.2% 的人虽申请了,却没有获得赔偿。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半数的人在受到职业伤害以后没有主动要求赔偿(没有要求赔偿也没有得到赔偿 43.2%,没有要求赔偿但得到了赔偿 1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之自我维权意识的薄弱。具体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人是觉得所受伤害并不严重,不值得费时费力去要求赔偿;有的人是担心要求赔偿会导致丢掉工作等。

5. 杭州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险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各界近年来倍加瞩目的问题。表 39 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方面的基本情况。

表 39 杭州市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状况

参加社会保险情况		百分比
所在单位有没有为农民工交社会保险金?	有	45.0%
	没有	40.4%
	不知道	14.7%
如果交了,则是哪一年交的?	2000 年以前(含 2000 年)	2.8%
	2005 年之前(含 2005 年)	31.2%
	2005 年以后	66.0%
如果交了,是社会保险中的哪些险种?(多选)	工伤保险	48.0%
	失业保险	46.5%
	医疗保险	76.4%
	养老保险	75.2%
	生育保险	20.5%
	不知道	8.2%
农民工自己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最主要原因	不知道怎样参加	51.1%
	单位不让参加	13.2%
	要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保险费太高负担不起	19.2%
	担心拿不到保险金	9.3%
	其他	7.1%

从表 39 的第一组数据可知,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 45.0% 的人已由所在单位为其交过社会保险,40.4% 的人其所在单位没有为其交任何种类的社会保险,另有的 14.7% 人不知道其所在单位有没有为其交社会保险。

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等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所在单位有没有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除了在性别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年龄方面,大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大,单位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越低的情形,撇开“16 岁以下”组,从“16 岁~25

岁”到“55 岁以上”各组农民工的所在单位为其参保的比例依次为 51.1%、54.1%、29.3%、24.0% 和 0.0%；在教育程度方面,基本呈现教育程度越高,单位为其参保的比例越高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所在单位为其参保的比例依次是 27.8%、25.3%、56.7%、67.9% 和 81.8%；在所从事行业方面,则是从事加工制造业的农民工其单位为其参保的比例最高,为 72.3%,其余的除了宾馆、餐饮和商业服务业为 46.6%,接近 50%,此外均不到 40%。

表 39 的第三组数据反映的是,在已由所在单位为其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中,其所参加的社会保险种类。可以看到,在 5 种社会保险中,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76.4% 和 75.2% (占农民工总数的 34.3% 和 33.8%),这与前述杭州市着重从医疗、养老、工伤 3 个方面来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表 39 的最后一组数据所反映的是那些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保的主要原因。在各项原因中,选择比例最高的是“不知道怎样参加”,达 51.1%；其次是“要自己承担的那部分保险费太高负担不起”,为 19.2%；再次是“单位不让参加”和“担心拿不到保险金”,分别为 13.2% 和 9.3%。

(三) 杭州市农民工的个人及家庭生活状况

就业与工作状况集中体现了农民工与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反映了农民工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映了在国家和政府的法规、政策之介入干预下的农民工与所工作的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个人及家庭生活所体现的则是农民工与自身、与家人的关系,所描述的是农民工最基本的生活情况。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及家庭生活的状况是农民工生活质量之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

1. 杭州市农民工的基本日常生活及开支

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也是最琐碎的,体现在大大小小的各个方面。不过,从婚姻、居住、生病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日常基本开支几个方面,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表 40、表 41、表 42、表 43 所反映的就是杭州市农民工这些方面的基本情况。

表 40 杭州市农民工的婚姻状况

婚 姻 状 况		百分比
目前的婚姻状况	已婚	51.0%
	未婚	46.4%
	离异	2.0%
	丧偶	0.5%
如果是已婚,则配偶现在何处?	在老家	35.5%
	和您同在杭州打工,且住在一起	51.2%
	和您同在杭州打工,但没住在一起	6.6%
	在其他地方打工	6.6%

从表 40 的第一组数据可知,在杭州市农民工中,除了少数离异、丧偶的之外,已婚的占 51.0%,未婚的占 46.4%。这和杭州市农民工中有 73.1% 的人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口这一年龄

结构特征是相应的。进一步就性别这一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婚姻状况进行比较,发现在男性农民工中,已婚的占 55.8%,未婚的占 40.3%;在女性农民工中,已婚的占 45.5%,未婚的占 54.1%。也就是说,在来杭的农民工中,女性未婚的比例较男性稍高。鉴于已婚和未婚对于一个人之观念、心态、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影响,故男女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差异颇可注意。

对于已婚者来说,是否与配偶住在一起无疑是影响其婚姻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表 40 的第二组数据所反映的正是杭州市农民工这方面的情况。从中可知,在已婚的杭州市农民工中,51.2%的配偶与其一起在杭州务工,且居住在一起;另有 6.6%的配偶与其同在杭州务工,但限于条件而没有居住在一起;其他 42.1%则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其中 35.5%配偶在老家,6.6%则在其他地方务工。

表 41 杭州市农民工的居住状况

居 住 状 况		百分比
解决居住问题的途径	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48.0%
	自己租房	45.1%
	自己买房	3.0%
	住在亲戚家或老乡、朋友那里	1.6%
	其他	2.3%
居住面积	5 平方米以下(含 5 平方米)	43.3%
	5 平方米~10 平方米(含 10 平方米)	35.4%
	10 平方米~15 平方米(含 15 平方米)	9.3%
	15 平方米~20 平方米(含 20 平方米)	8.0%
	20 平方米以上	4.0%
人均居住面积	8.81 平方米	

已婚而与配偶分居,这不能不影响到婚姻生活的质量,久而久之,甚至可能影响到婚姻本身。当然,分居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根据访谈所了解的情况,主要的基本上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而在这些客观原因中,最主要的首推居住方面的原因。

近年来,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或者说居住权问题已引起多方面的关注^①,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5 年 12 月出台了《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将“有房住”列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主要目标。而表 41 所反映的就是杭州市农民工目前实际居住的基本状况。从其第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在解决居住问题的途径方面,48.0%是由单位提供集体宿舍,45.1%是自己租房,这与各地的情形基本相似;而颇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 3.0%是通过自己买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但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应该说,这是不容易的。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15 页~416 页;严行方:《农民工阶层》,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 年,第 45 页~66 页。

进一步就所从事的行业这一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的方式进行交叉比较,可以发现,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中,有 76.3% 是由单位提供集体宿舍^①;从事加工制造业的,有 55.2% 由单位提供集体宿舍;其余除了环卫服务业从业者有 35.7% 由单位提供集体宿舍,此外由单位提供集体宿舍的均不足 30%。这表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与其解决居住问题的方式是有联系的。

表 41 的第二组数据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从中可以看到,43.3% 的杭州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在 5 平方米以下(含 5 平方米),35.4% 在 5 平方米到 10 平方米之间(含 10 平方米),两者相加达到 78.7%;而人均居住面积超过 20 平方米的仅 4.0%。全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8.81 平方米。应该说,如果与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所得到的人均居住面积约 7 平方米的数据相比,杭州市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要略高些。^②

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杭州市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进行均值比较,可以发现,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在人均居住面积上不存在明显差别;在年龄方面,撇开“16 岁以下”组,则相比之下 46 岁以上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明显偏低;从“16 岁~25 岁”到“55 岁以上”各组的平均居住面积依次分别为 8.11 平方米、10.31 平方米、9.12 平方米、6.81 平方米、5.69 平方米;在教育程度方面,明显呈现教育程度越高,人均居住面积越大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人均居住面积依次分别为 6.31 平方米、7.93 平方米、9.04 平方米、11.27 平方米、15.74 平方米。

表 42 杭州市农民工生病后的处理方式

处 理 方 式	百分比
立刻去看医生	26.4%
自己买一点药吃	63.3%
能拖则拖,能扛则扛	8.0%
其他	2.3%

表 42 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病后处理方式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表示得病后会立刻去看医生的只有 26.4%,大多数(63.3%)则选择自己买一点药吃,另有 8.0% 的人则更是“能拖则拖,能扛则扛”。和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全国农民工调查所反映的情况以及 2006 年有人对浙江全省农民工进行的相应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相比,杭州市农民工在病后就医方面的情况相对要差一些,而在“拖”的方面,则相对要好一些。^③

^① 主要是在建筑工地旁临时建的简易宿舍。不过,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杭州市建筑工地的这些临时简易宿舍建设得比较规范,出现在其他某些地区的,如施工现场与生活区没有隔离措施、用彩条布搭设简易宿舍、宿舍净高度不到 2.4 米、宿舍未设置窗户等情况(见《有块地方搁下铺盖就没人管了》,《工人日报》,2006 年 7 月 30 日),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出现。

^②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16 页。

^③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615 页;陈诗达:《2007 年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年,第 316 页。

不过,从总体上看,情形是不容乐观的。病后“能拖则拖,能扛则扛”或不经医生检查、不经医嘱而自己吃药,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导致身体的败坏和体质的下降。

围绕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进一步就病后处理方式做交叉分析后发现,在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因素上,杭州市农民工在病后处理方式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而在教育程度这个因素上,则明显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选择病后即刻去看医生的比例也越高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中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分别为 18.8%、24.8%、25.8%、40.0%、40.6%。

表 43 杭州市农民工的生活开支状况

生 活 开 支 状 况		百分比
人均每月开支状况	500 元以下(含 500 元)	27.2%
	500 元~1000 元(含 1000 元)	49.4%
	1000 元~1500 元(含 1500 元)	15.3%
	1500 元~2000 元(含 2000 元)	5.7%
	2000 元以上	2.4%
人均每月开支数及构成	人均月总开支	904.9 元
	伙食	419.6 元
	居住	192.6 元
	通信	108.7 元
	自身教育和文化消费	118.8 元
月均带回或寄回老家的钱	0 元	20.7%
	0 元~500 元(含 500 元)	40.3%
	500 元~1000 元(含 1000 元)	30.2%
	1000 元以上	8.8%
人均每月寄回金额	572.7 元	

婚姻生活、居住状况、病后处理方式各从一个侧面描画了杭州市农民工的基本日常生活,而日常消费开支则综合地反映出其日常生活的基本状况。表 43 所反映的就是杭州市农民工这方面的基本情况。从其第一组数据可知,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人均每月生活总开支为 904.9 元,其中,用于伙食 419.6 元,用于居住 192.6 元,用于通信 108.7 元,用于自身的教育和文化消费 118.8 元。从这组数据看,杭州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开支是比较高的。据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农民工调查,在总体层面上,男性农民工月平均支出为 685.4 元,女性农民工为 607 元。^①另据 2005 年有人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的月平均总开支仅为 480.83 元,其中用于伙食 162.32 元,用于居住 83.24 元,用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2 页。

于通信 59.80 元。^①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杭州市农民工在日常消费开支上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固然与这两年全国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关,但是,与杭州市本身消费水平在全国城市中相对较高无疑也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伙食、居住属于没有什么自由选择余地的必需支出,通信属于半自由半必需的支出,那么,自身的教育和文化消费则属于自由选择程度相对较高的支出,即他可以有这方面的消费,也可以没有。而杭州市农民工中,尽管有 26.1% 的人没有任何用于自身教育和文化消费的支出,但是平均在这方面的支出则达到 118.8 元/人·月,无论是相比于农民工的收入和总体支出,还是相比于全国农民工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总体水平,其数额应该说都是相当不低的^②,同时,它也相当程度地降低了杭州市农民工的恩格尔系数,改写了杭州市农民工生活水平的表征。^③

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各变量就杭州市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开支进行均值比较,可以发现,在性别上,男性农民工的人均月开支要高于女性农民工;在年龄方面,“25 岁~36 岁”年龄组的人均月开支最高,而“46 岁~55 岁”和“56 岁以上”两组的人均月开支明显偏低;在教育程度方面,则明显呈现出教育程度越高,人均月开支越高的趋势。(见表 44)

表 44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农民工的人均每月开支

类 别		人均月开支(元)
性别	男	954.22
	女	842.54
年龄	16 岁以下(不含 16 岁)	833.33
	16 岁~25 岁	860.25
	26 岁~35 岁	1117.37
	36 岁~45 岁	812.22
	46 岁~55 岁	564.29
	55 岁以上(不含 55 岁)	623.3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594.94
	初中	746.17
	高中(含中专、职高)	956.37
	大专	1219.64
	本科及以上	1809.09

表 43 的第二组数据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给家里带钱或寄钱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有 20.7% 没有带钱或寄钱回老家,40.3% 平均每月给老家带钱或寄钱在 0 元

① 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9 页。

②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 页。

③ 从上述数据可以算出,杭州市农民工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 $419.6/904.9 \times 100\% = 44.2\%$ 。

~500元,30.2%在500元~1000元,8.8%在1000元以上。杭州市农民工人均每月寄回或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72.7元。这些数据表明杭州市农民工寄回或带回老家的金额是比较大的。据2005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4个市为样本的农民工调查,42.6%的农民工没有向老家寄钱,39.1%所寄金额每月在0元~500元,15.1%在500元~1000元,3.2%在1000元以上。^①另据2005年有人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所做的调查,农民工的每月人均寄回老家的金额为284.23元。^②即使考虑到这两年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从而能够带回老家的钱也有所增长,但这个增长肯定也不能拉平上述数据所反映的差距。

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各变量就杭州市农民工带回老家的金额进行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在性别方面,男性要明显高于女性,前者每月人均寄回老家的金额为676.99元,后者为439.97元;在年龄方面,撇开“16岁以下”组,从“16岁~25岁”到“55岁以上”各组每月人均寄回老家的金额依次分别为494.01元、605.32元、650.27元、705.00元、586.67元;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统计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寄回老家的金额上没有明显差异。

2. 杭州市农民工的休闲文化生活

休闲和文化生活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个人生活质量的又一重要表征。上面已经提到,杭州市农民工用于自身教育和文化消费的人均月支出为118.8元,应该说,相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总体状况而言,这个数字是不低的。不过,支出水平固然与实际生活状况密切相关,但不等于实际生活状况,支出高也不等于实际生活质量高。表45、表46、表47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在休闲文化生活方面的实际状况和感受。

表45 杭州市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多选)

消 遣 方 式	百分比
看电视	71.1%
打牌、搓麻将等	10.1%
喝酒聊天	11.4%
逛街	35.5%
逛公园风景区	11.6%
看电影	5.5%
看闲书(报纸、杂志、小说等)	32.2%
睡觉	51.2%
学习(包括上培训班)	10.0%
上网	28.1%

表45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主要消遣方式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最普遍的业余消遣方式是“看电视”,有71.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其次是“睡觉”,51.2%的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② 刘林平等:《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9页。

人选择了此项;再次是“逛街”,做此选择的占接受调查农民工的 35.5%;排在第四和第五的是“看闲书”和“上网”,选择这两项的百分比分别为 32.2% 和 28.1%。这一排序与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和华中师范大学于 2005 年 9 月联合进行的“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所获得的结果相比出入不大。据该次调查,农民工消遣方式中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睡觉、看电视、聊天、读书看报、打牌搓麻将。^①

表 46 杭州市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状况

文 化 生 活 状 况	百分比	
过去一年中周围是否有你可以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	经常有	4.9%
	时常有	7.3%
	偶尔有	30.6%
	极少有	21.7%
	没有	35.5%
相比于 2005 年以前,这类活动是变多了还是更少了(限 2005 年以前即来杭工作者填写)	增多了	17.4%
	差不多	69.7%
	变少了	12.9%
有没有杭州公共图书馆的借阅证?	有	11.5%
	想办一张,但不知怎么办	31.9%
	去办过,但图书馆不让办	1.5%
	自己没想过办	55.0%
来杭以后有没有参加过成人学历教育	有	9.6%
	想参加但没有时间精力	30.9%
	想参加但交不起学费	11.0%
	没有也没想过	48.5%

表 47 杭州市农民工在空闲时有没有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感

感 受	百分比
经常有	13.4%
时常有	22.8%
偶尔有	39.1%
很少有	16.1%
从未有过	8.6%

^①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 页。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农民工业余主要消遣方式的文化含量是比较低的,这当然是全国普遍的状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读书和上网进入了杭州市农民工主要消遣方式的前五位,这无疑和农民工本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关,同时也预示着农民工文化品位的提高。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诸变量对杭州市农民工业余消遣方式偏好做比较分析发现:性别方面,在“看电视”“逛街”这两项上,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大的偏好,两者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分别为76.5%、52.4%和66.6%、21.6%;在“打牌搓麻将”“喝酒聊天”“学习”“上网”这几项上,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两者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分别为16.5%、16.5%、12.8%、31.0%和2.4%、5.1%、6.6%、24.7%;在其余方面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年龄方面,除开“16岁以下”组,比较突出的是,其一,年龄越小,喜欢逛街的人越多,从“16岁~25岁”到“55岁以上”各组中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是44.6%、38.8%、20.9%、12.0%和6.7%;其二,大体上,年龄越小,选择以读书作为主要消遣方式的人越多,从小到大各组中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为38.9%、33.0%、33.0%、16.0%和20.0%;其三,大体上,年龄越大,选择以睡觉作为度过空闲时间主要方式的人越多,从小到大各组中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是45.5%、46.9%、59.7%、78.0%和73.3%;其四,年龄越小,以上网为主要消遣方式的人越多,从小到大各组中做此选择的百分比分别为42.0%、25.0%、11.9%、6.0%和0%;在其余各项上,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差异,不过在总体上,年龄最大的两组选择积极主动消遣方式的比例相对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其一,选择“看电视”作为主要消遣方式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两组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3组,从“小学及以下”起5个组中做此选择的百分比依次为72.5%、73.5%、73.6%、57.1%和48.5%;其二,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喝酒聊天”“睡觉”作为主要消遣休闲方式的比例越低,从“小学及以下”起5个组中选择此两项的百分比分别依次为28.8%、15.7%、5.6%、5.4%、3.0%和70.0%、58.2%、47.8%、33.9%、15.2%;其三,教育程度越高,基本上选择以“学习”“上网”作为主要消遣方式的的比例越高:从“小学及以下”起5个组中选择此两项的百分比分别依次为6.3%、5.2%、9.3%、25.0%、36.4%和0.0%、10.4%、37.3%、69.6%、69.7%;其四,选择以看书为主要消遣方式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组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其他各组,为18.8%,其余各组则都超过30%;在其余各项上,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系统性差别。

表45的数据从总体上笼统地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是怎样打发空闲时间的,而表46则旨在进一步描述杭州市农民工相对更积极的文化生活情况。第一组数据反映的是可供农民工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可以就近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相当有限的。35.5%的被调查者回答根本没有这类活动,21.7%回答极少有这类活动,回答经常有、时常有的加起来也不过12.1%。这表明,尽管像杭州市政府、市总工会等各界为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做了很大努力,但其供给离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还有相当差距。这一点从访谈了解到的情况中也反映出来。不少农民工反映,尽管杭州市有不少针对外来务工创业者的文化活动,有的还很有影响,如“放歌在天堂”,但真正能让农民工广泛参与的却并不多。表46的第二组数据反映了近年来这类文化活动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相比于2005年之前,尽管认为这类活动现在“增多了”的被调查者要略多于认为“变少了”的,但是,绝大多数(69.7%)则认为没什么变化。

表46的第三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对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杭州市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开放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到,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或与其一同在杭的家人)中,有11.5%拥有杭州公共图书馆的借阅证;有

31.9%想办一张,却不知怎么办;有1.5%表示去办过,但图书馆不让办;而55.0%则表示自己没想过要办。

表46的最后一组数据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后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成人学历教育的情况。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真正参加过(包括正在参加)成人学历教育的只有9.6%,但主观上想参加却由于时间、精力、费用等原因而未能参加的却共有41.9%,这表明杭州市农民工的求知动机是比较旺盛的。这当然与新一代农民工的成长有关,同时也与杭州市农民工本身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高中以上者占55.5%)从而为进一步求学打下了基础有关。

最后,表47的数据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空闲时的主观感受。从中可以看到,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36.2%的人在空闲时“经常有”或“时常有”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感觉,而“很少有”或“从未有过”这种感受的则只有24.7%。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杭州市农民工在业余休闲文化生活方面是存在欠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消极情绪,一方面直接表征了农民工休闲生活质量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则很容易导致农民工转而从一些消极的、甚至不良的行为中去寻求排遣。

通过给空闲时是否会产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这种感受的不同情况赋值,分别赋予“经常有”一直到“从未有过”以1分到5分的分值,分值越高,主观感受越好,则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平均得分为2.84分。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这些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空闲时的主观感受情况进行均值比较,则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在这方面的感受上不存在明显差异;第二,在年龄方面,除开“16岁以下”组,则明显呈现年龄越大,这方面的主观感觉越好的趋势:从小到大5个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依次为2.61分、2.91分、3.00分、3.34分、3.53分;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从“小学及以下”起5个组的得分依次为3.20分、2.94分、2.61分、3.16分、2.88分。可以看出,主观感觉最好的是“小学及以下”组,其次是“大专”组,而最差的是人数最多的“高中”组,并且也只有高中组,得分低于2.84分这一总体平均值。

3. 杭州市农民工的子女教育

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是社会各界所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杭州市政府和有关方面所着力要解决的问题。着眼于农民工子女本身,则就学问题是关系到其基本权利、同时也关系到其成年以后生活道路和生活品质的问题;而着眼于其父母,则子女的就学问题又是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48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基本情况。

表48的第一组数据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接受调查的有学龄子女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71.9%的子女都未能与其一起来杭学习,而只能在老家就读,这一水平与2005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4个市为样本的农民工调查所获得的结果基本持平。^①这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学龄子女至少不能和父母双亲中的一方生活在一起,这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农民工本人,都是其生活中一个一定程度上的缺憾,同时,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健康成长也肯定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第二,有6.8%的人称自己处于学龄阶段的孩子没有上学,即处于失学状态,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第三,在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中,其子女来杭就读者占21.2%,其中,进入公办学校者9.5%,不到所有来杭就读者的一半。这表明,尽管杭州市确立和实施的是“以公办学校为主,民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35页。

工子弟学校为辅”逐步解决外来务工者子女在杭就学问题的方针,但是,在公办学校吸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方面,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这一点,如果联系表 48 的第三组数据就更明显了:尽管按规定,外来务工者就读公办学校原则上不需交借读费,但是调查表明,在实际就读杭州市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中,有 60% 都交了借读费,不交的只有 40%。

表 48 的第二组数据反映的是那些在杭州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来杭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2005 年以前(含 2005 年)来杭的占 53.6%,2005 年以后(即 2006 年、2007 年两年)来杭的占 46.4%。进一步细考来杭的具体年份,则 2001 年来杭者占 3.6%,2003 年占 10.7%,2004 年 17.9%,2005 年 21.4%,2006 年 19.6%,2007 年 26.8%。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子女实际来杭就读的比例还比较低,但是,从总体趋势看,来杭就读的人数在逐年增长。

表 48 的最后一组数据反映的是那些没有来杭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之所以没来的主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在所罗列的这些原因中,占据第一位的是“学费太贵”,有一半以上(50.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其次是“担心孩子中途换地方换学校,反而影响学习”,19.1%的人选择了此项;再次是“找不到接受的学校”,13.2%选择了此项;还有 6.9%的人选择了“孩子不愿意来”。在上述各项原因中,第一、第三项主要属于教育供给方的原因,第二、第四项则是需求方的原因。显然,影响农民工子女来杭就读的原因主要存在于教育供给方。

表 48 杭州市农民工子女就读情况

子女就读情况		百分比
在何处上学(有学龄子女者填写)?	在杭州公办学校上学	9.5%
	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4.9%
	在杭州的民办学校上学	6.8%
	在老家上学	71.9%
	没有上学	6.8%
如果子女在杭州上学,那么是哪年来杭州的?	2005 年以前(含 2005 年)	53.6%
	2005 年以后	46.4%
如果子女在杭州公办学校上学,则有没有交借读费?	交了	60.0%
	没有交	40.0%
如果子女没来杭州上学,主要原因是:	孩子不愿意来	6.9%
	学费太贵	50.5%
	担心孩子受到歧视	1.5%
	找不到接受的学校	13.2%
	担心孩子中途换地方换学校,反而影响学习	19.1%
	其他	8.8%

(四) 杭州市农民工的社会生活

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常常被等同于一个人的社交生活,这里则将其他一些社会参

与活动,如参与工会组织的情况、参与选举活动的情况等也包括在内。这种广义的社会生活,反映的是一个人在经济关系之外对于社会的融入,或者说参与介入程度。表 49、表 50、表 51、表 52、表 53 所反映的就是杭州市农民工在这种广义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基本状况。

表 49 杭州市农民工参与工会组织的状况

参 与 工 会 组 织 情 况		百分比
有没有参加工会组织?	有	17.8%
	没有	82.2%
如果参加了,则是哪一年参加的?	2005 年以前(含 2005 年)	39.7%
	2005 年以后	60.3%
如果没有参加,则原因是:	单位没有工会组织	28.4%
	不知道怎样参加	40.1%
	单位不让参加	4.3%
	自己不想参加	15.0%
	其他	12.2%

从表 49 的第一组数据可知,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加入了工会组织的只占 17.8%。这个数据相比于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农民工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要略高些,据该次调查,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为 13.2%^①。但如结合表 49 的第二组数据来分析,则杭州市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情况实际比不上全国水平。因为在这 17.8% 的加入了工会的农民工中,有 60.3% 是在 2005 年之后加入的。如果只算到 2005 年,杭州市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还不到 10%。

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所从事行业对杭州市农民工加入工会的状况做交叉比较,发现:第一,在性别上,男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情况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第二,在年龄上,除开“16 岁以下”组,大体上,年龄越大,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越低,从“16 岁~25 岁”起各组加入工会的比例依次为 20.4%、20.6%、11.2%、8.0%、6.7%;第三,在教育程度上,基本上呈现教育程度越高,加入工会的比例也越高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起各组加入工会的比例依次为 8.8%、8.5%、21.4%、38.2%、39.4%;第四,在所从事的行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工从业者最多的 3 个行业即“加工制造业”“宾馆、餐饮、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中,农民工加入工会情况最好的是“加工制造业”(38.0%),其次是“建筑业”(10.2%),再次是“宾馆、餐饮、商业服务业”(7.4%)。

表 49 的第三组数据反映的是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的主要原因。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绝大多数农民工之所以没有参加工会,并非主观上没有参加的动机,真正自己不想参加的只有 15.0%。其二,那些主观上有参加愿望的农民工之所以没有真正加入工会,首要的原因是“不知道怎样参加”,有 40.1% 的人选择了此项;其次是“单位没有工会组织”,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第 601 页。

有 28.8% 的人选择了此项。实际上,在进一步的访谈中了解到,那些回答单位没有工会组织中,有不少是“不知道”单位有工会组织,而即使单位确实没有工会组织,如果真想加入的话,也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会组织可以参加,如社区工会、街道工会、项目工会、楼宇工会等。因此,没有加入工会的真正最主要原因还是“不知道怎样参加”。由此也表明,工会组织本身在向农民工显示自身、宣传解释自身方面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

表 50 杭州市农民工参与选举情况

参 与 选 举 情 况		百分比
来杭后,有没有参加过杭州当地的任何选举活动(如工会选举、社区居委会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等)	有	9.6%
	没有	90.4%
来杭后,有没有参加过家乡的选举活动(如村委会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等)	有	18.4%
	没有	81.6%

表 50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来杭工作以后参加杭州当地和家乡选举活动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过杭州当地选举活动的只有 9.6%,参加过家乡选举活动的比例要高些,但也只有 18.4%。而如果不论参加的是杭州当地还是家乡的选举,则进一步的统计显示,来杭以后参加过选举活动的比例为 23.9%,是非常低的。如果将参与选举的状况看作是政治参与的一个表征,那么,杭州市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很低的。

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诸因素进一步对杭州市农民工参与选举活动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农民工参与当地和家乡选举活动的特点。首先,在参与杭州当地的选举活动方面:第一,在性别和年龄上,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在参与杭州当地的选举活动上没有明显差异;第二,在教育程度上,基本上呈现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杭州当地选举活动的比例越高的趋势,从“小学及以下”起各组中参与过杭州当地选举的比例依次为 6.3%、4.9%、10.2%、20.0%、30.3%。其次,在参与家乡的选举活动方面:第一,在性别上,男性农民工参加过家乡选举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两者的比例分别为 21.1% 和 14.8%;第二,在年龄上,则位于中间的“26 岁~35 岁”“36 岁~45 岁”“46 岁~55 岁”这 3 组参与过选举的比例明显要高于其他各组,除开“16 岁以下”组,从小到大各组参加过家乡选举的比例依次为 9.9%、24.1%、24.6%、34.0%、6.7%;第三,在教育程度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参与家乡选举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总的来说,表 49、表 50 的数据表明,杭州市农民工无论从组织参与来看,还是从参与有组织的公共事务来看,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社会游离状态。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在表 51 中看出来。

表 51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所求助的对象,从中可以看出,正式的组织或机构,除了其所在的工作单位,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进入杭州市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求助的视野。当然,这种游离状态也是农民工的一种普遍状况。但是普遍并不表明不值得重视,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生活和有机地融入社会来说,还是对于社会管理来说,这种游离状态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表 51 杭州市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求助对象

求 助 对 象	百分比
亲友	56.2%
朋友	58.1%
老乡	47.6%
工作单位	25.1%
同事	35.4%
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7.2%
有关社会团体	1.4%
家乡政府有关部门	0.7%
其他	1.8%

表 52 杭州市农民工与杭州本地人的关系(融入杭州社会的状况)

融 入 杭 州 社 会 情 况		百分比
与杭州本地人的关系如何	相处十分融洽	10.0%
	还可以	58.9%
	没什么接触	25.3%
	不太被他们接纳	4.7%
	很不受欢迎	1.1%
有没有感到来自本地人的歧视	经常有	4.6%
	时常有	7.2%
	偶尔有	26.6%
	极少有	27.3%
	没有	34.3%
平时的主要交往对象	老乡	28.8%
	当地人	6.1%
	工友同事	54.5%
	除了工作交往,没有什么别的社会交往	7.2%
	其他	3.4%

表 52 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与杭州本地人的关系状况,也即杭州市农民工在心理情感、社会交往上融入杭州社会的状况。第一组数据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农民工在主观认知上认为自己与杭州本地人的关系是比较好的,认为自己与杭州本地人“相处十分融洽”和“还可以”的比例加起来达 69.9%,而认为自己“不太被接纳”和“很不受欢迎”的比例加起来只

有 5.8% ;其二,在总体上肯定关系较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有 25.3% 的被调查者回答与杭州本地人没有什么接触,不管这种“没有接触”是出于什么具体原因,其本身都表明这些人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的、游离于杭州本地社会的状态。

进一步就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各因素对表 52 的第一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主观感觉与杭州本地人的关系上均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52 的第二组数据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杭州本地人的歧视。回答“极少有”和“没有”这种感受的合计占 61.6% ,远高于回答“经常有”和“时常有”两者相加的 11.8% 。进一步给不同的感受赋值,分别赋予“经常有”到“没有”以 1 分到 5 分的值,分值越高,感受越好,则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的平均得分为 3.80 分,即处于“偶尔有”和“极少有”之间而更接近于“极少有”。这表明在这方面杭州市农民工至少在主观感受上是比较好的。当然,主观感受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农民工本身的自我评价、主观预期、敏感性等,但至少不能说与杭州人越来越大的包容性无关,而杭州人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包容性,则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杭州人”本身的内涵已远超“老杭州人”的范围,而是包容了许许多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新杭州人”有很大关系。

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杭州市农民工对于歧视的感受状况作均值比较,可以发现,第一,就性别而言,女性农民工要比男性农民工相对更经常地感受到这种歧视,男女农民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93 和 3.62 ;第二,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在对歧视的感受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就教育程度而言,“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组对于歧视的感受明显要好于其他各组,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各组的平均得分依次为 4.20 分、3.62 分、3.84 分、3.77 分、3.76 分。这种差异的产生,显然更多与当事人本身在自我评价、主观预期、敏感性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如果说,表 52 的第一、第二两组数据主要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上反映出杭州市农民工融入杭州当地社会的状况,那么,其第三组数据则从一个相对客观的方面,即农民工日常交往的对象上,反映了他们的融入程度。从中可以看到,多数农民工的主要交往对象是“工友同事”,有 54.5%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其次是“老乡”,有 28.8% 的人选择了此项;选择杭州当地人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只占 6.1% 。当然,工友同事中也有杭州当地人,但无疑主要是与其一样的农民工,而“老乡”的情况,无疑也同样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与上面所说的主观感受相比,从日常主要交往对象所反映出来的杭州市农民工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要显得弱得多。基本上,农民工的主要交往对象局限在农民工圈子之内。当然,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但是,一种好的社会生活状态应该是在分的同时,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又有正常的交往沟通,而不是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而杭州市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与杭州当地社会的关系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油在水”的状况。事实上,上面所说的主观感受之所以比较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状况不无关系;没有多少交往,至少也就没有多少负面的感受。

进一步围绕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诸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的主要交往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第一,在性别方面,不同性别的农民工在交往对象上没有明显的区别。第二,就年龄而言,除开“16 岁以下”组,则较明显的区别是,36 岁以上的 3 组选择以“老乡”为主要交往对象的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从小到大各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是 23.6% 、23.3% 、43.3% 、42.0% 、46.7% 。与此相反,选择以“工友同事”为主要交往对象的,36 岁以上的 3 组则明显低于其他两组,从小到大各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是 58.3% 、58.7% 、44.8% 、42.0% 、46.7% 。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其一,教育程度越高,以“老乡”为主要交往对象的比例越低,按教育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各组做此选

择的比例依次为 48.8%、36.9%、23.3%、10.9%、3.0%；其二，大体上，教育程度越高，以当地人为主要交往对象的比例越高，各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0.0%、7.2%、5.6%、9.1%、12.1%；其三，大体上，教育程度越高，以工友同事为主要交往对象的相应较高，各组做此选择的比例依次为 46.3%、44.2%、60.2%、70.9%、69.7%。

表 53 杭州市农民工定居杭州的打算

定 居 杭 州 的 打 算		百分比
有没有打算在杭州安家定居	没想过	42.1%
	想过,但觉得困难很大	46.7%
	想过,并相信可以实现	7.0%
	已经定居下来	4.1%
你觉得影响农民工在杭州定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制度上的障碍(如户籍制度)	14.6%
	农民工自身素质	12.7%
	来自本地人的排斥、歧视	2.5%
	住房问题无法解决	65.7%
	其他	4.5%

如果说,表 52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在社会生活方面融入杭州当地社会的现状,表 53 则反映了他们对于融入或者说扎根当地社会的打算和预期。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对于在杭州定居安家的信心指数是比较低的。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除了已经在杭州定居下来的 4.1%,想在杭州安家定居、并相信能够实现的只有 7.0%,而想过在杭州安家定居、但觉得困难很大的则有 46.7%。这表明,杭州市本身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主观上希望在杭州安家定居的农民工达到 53.7%,如果再加上已经定居的 4.1%,则达到 57.8%。这个数字要明显高于 2005 年以北京、深圳、苏州、成都 4 个市为样本的农民工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据该次调查,想长期留在所务工城市安家立业的农民工只占被调查总数的 30.3%。^①但是,真要实现这个“安家梦”,则又觉得困难重重。实际上,即使另外那些表示没想过要在杭州定居的 42.1% 的受访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的事实也不全是真的不想,而是因为觉得定居的难度实在太太大而“不敢想”。

通过给关于在杭州安家定居的不同想法赋值,分别赋予“没想过”一直到“已经定居下来”以 1 到 4 分的分值,分值越高,定居的打算和信心越强,并进一步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各因素对杭州市农民工有关定居杭州的打算和信心做均值比较,可以发现: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在定居杭州的打算信心上没有明显区别;在年龄方面,除开“16 岁以下”组,则年龄较大的两组在这方面的打算信心明显较弱,从小到大各年龄组的平均得分依次为 1.77 分、1.87 分、1.62 分、1.28 分、1.33 分;就教育程度而言,则明显呈现教育程度越高,在杭州安家定居的打算信心越强的趋势,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各组的平均得分依次为 1.30 分、1.59 分、1.80 分、2.09 分、2.55 分。

^① 郑功成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第 664 页。

(五) 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的满意度

尽管杭州未必是如今在杭农民工们未来的扎根之所,但却无疑是他们今天工作生息的最主要舞台。对于杭州市的满意度,既是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现状的一个方面,也是杭州市农民工未来发展的一个表征。而表 54、表 55、表 56、表 57 则或直接或间接、或具体或笼统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基本状况。

表 54 杭州市农民工继续来杭务工意向

继续来杭务工意向		百分比
是第一次来杭务工还是已多次来杭务工?	第一次	54.7%
	已多次来杭	45.3%
明年是否继续来杭工作?	会	85.7%
	不想来了	14.3%

表 54 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是否第一次来杭以及是否打算下一年继续来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间接地体现出他们对于杭州的满意度。因为,如果真正对杭州市很不满意,那么,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种余地对今天的农民工来说还是存在的——他就不太可能多次来杭或选择继续来杭。从表 54 的第一组数据可以得知,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回答已多次来杭务工的占 45.3%,另有 54.7% 回答为第一次来杭务工。需要说明的是,从进一步的访谈中了解到,在那些回答为第一次来杭务工的人当中,有不少事实上并不是“第一年”来杭务工,而是自从来杭以后,除了回家探亲,就再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打工,因此,如果将“第一次”严格理解为“第一年”,那么,已多次来杭的比例还要高不少。这一点,实际上从表 54 的第二组数据也可以间接地得到印证: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表示下一年将继续来杭工作的达到 85.7%,表示不想再来了的只有 14.3%。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杭州市对于外来农民工的吸引力,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喻示了杭州市农民工就业和杭州市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稳定性。

表 55 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最满意的方面和最希望当地政府为外来务工者做的事

满意方面及希望		百分比
对杭州市最满意的方面(可多选,但限三项以内)	治安稳定	59.3%
	不歧视外来务工人员	19.5%
	收入比较高	21.8%
	工作机会较多	43.4%
	社会文化生活比较丰富	19.1%
	政府给外来务工人员的福利较好	10.9%
	单位在劳动保障方面做得比较好	19.8%
	其他	3.7%

续表

满 意 方 面 及 希 望		百分比
最希望当地政府为外来务工者做的事(可多选,但限3项以内)	加强治安	36.0%
	搞好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50.2%
	加强对外来务工者的劳动权利保护	41.4%
	提高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水平	61.0%
	增加就业机会	25.8%
	改善社会风气,改变当地人对外务工者的歧视与排斥	10.4%
	丰富外来务工者的业余文化生活	13.3%
	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就学问题	15.7%
	提供廉租房	32.2%
	其他	1.6%

表 55 的两组数据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于杭州市最满意的方面和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需要指出的是,与下面表 56 所罗列的“经济发展”“依法办事”等各项内容相比,表 55 所列的各项内容更加以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中心而不是以杭州市为中心,也就是说,更加紧密地围绕农民工这个特定群体的现实需要和关切。从第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对于杭州市最满意的方面,按照选择频次从高到低排列,在总共 8 项选择中居于前 4 位的依次是“治安稳定”“工作机会较多”“收入比较高”“单位在劳动保障方面做得比较好”;不过,选择前两项的比例要远远高于选择后两项的,分别有 59.3% 和 43.4%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治安稳定”和“工作机会较多”,而选择“收入比较高”和“单位在劳动保障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则分别只有 21.8% 和 19.8%。

从表 55 的第二组数据可以看出,杭州市农民工最希望政府为其做的事,同样按选择频次由高到低排列,在总共 10 项选择中位居前 5 位的分别是:第一,“提高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水平”,有 61.0%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第二,“搞好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有 50.2%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第三,“加强对外来务工者的劳动权利保护”,41.4% 选择了此项;第四,“加强治安”,36.0% 选择了此项;第五,“提供廉租房”,32.2% 选择了此项。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其一,农民工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更主要的是他们最关心的事,而不是他们最不满意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某方面的满意与否对他们是否期望政府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没有影响),同时,他们“最满意”的方面,也不是他们已“满足”的方面,因此,杭州市农民工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和他们最满意的方面才会存在明显的重叠或交叉;其二,在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中,选择“解决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就学问题”的只占被调查者的 15.7%,没有进入前 5 位,但必须注意,这实际上和下述情况紧密相关,即一般只有那些有学龄期孩子的农民工才会关心子女就学这个问题,而在接受调查的杭州市农民工中,有学龄期孩子的只占 35.5%。

表 56 所反映的是杭州市农民工对于杭州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状况的满意度,或者说,对于杭州市这些方面的主观感受或评价。如上所述,本表所列的各项内容不像表 55 那样紧紧围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需求与关切,而更主要地着眼于杭州市本身的发展,这也是本表数据所呈现的满意度排序会与表 55 所呈现的排序稍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表中数据可知,杭州市农民

工对于杭州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感受评价是比较不错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于表征杭州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状况的各个选择项,接受调查的农民工选择“很满意”和“较满意”的百分比之和均要远远高于选择“较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百分比之和。

表 56 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各方面的满意度

方 面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不知道
经济发展	28.3%	48.1%	18.6%	0.3%	0.4%	4.3%
依法办事	13.3%	32.3%	35.8%	5.3%	3.0%	10.3%
交通状况	15.1%	28.2%	36.9%	12.5%	3.5%	3.8%
社会治安	21.3%	34.7%	31.1%	6.6%	3.8%	2.4%
环境保护	26.6%	41.2%	26.5%	3.3%	0.8%	1.6%
人口管理	12.2%	30.8%	37.3%	4.9%	2.2%	12.6%
社会风气	13.5%	36.4%	33.7%	6.1%	2.7%	7.6%
子女教育	8.7%	19.8%	32.2%	5.2%	1.9%	32.3%
文物保护	16.8%	28.0%	21.8%	1.9%	1.2%	30.3%
文化生活	14.4%	26.7%	36.3%	3.7%	1.9%	17.0%
劳动技能培训	10.6%	21.8%	35.0%	6.7%	3.0%	23.0%
医疗状况	12.2%	28.8%	31.3%	7.6%	5.3%	14.7%
环境卫生	25.0%	40.4%	27.7%	3.3%	1.0%	2.7%
就业状况	12.4%	31.8%	42.7%	4.8%	2.4%	6.0%

如果进一步给“很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这 5 项选择分别赋予 1 分~5 分的分值(排除“不知道”这一选择),分值越高,满意度越低,进而计算各项的满意度平均值,则可以发现:其一,杭州市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按农民工对其的满意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环境卫生”、“文物保护”、“社会治安”、“文化生活”、“社会风气”、“依法办事”和“人口管理”(并列)、“就业状况”、“医疗状况”和“子女教育”(并列)、“交通状况”、“劳动技能培训”;其二,上述各项中,除了“经济发展”的平均得分为 1.92 分,表明农民工对其的满意度在“很满意”和“较满意”之间而更接近于“较满意”,其余各项平均得分都在 2 分~3 分,而其中除了“劳动技能培训”“医疗状况”“子女受教育状况”“就业状况”的平均得分在 2.50 分以上(含 2.50 分),其余各项平均分都小于 2.50 分,表明满意度在“较满意”和“一般”之间,而更接近于“较满意”。(见表 57)

表 57 杭州市农民工对杭州市各方面满意度平均得分

方 面	平均分
经济发展	1.92
依法办事	2.47

续表

方 面	平均分
交通状况	2.60
社会治安	2.36
环境保护	2.09
人口管理	2.47
社会风气	2.44
子女教育	2.59
文物保护	2.18
文化生活	2.42
劳动技能培训	2.61
医疗状况	2.59
环境卫生	2.12
就业状况	2.50

表 58 杭州市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杭州生活、工作的总体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百分比
很满意	11.4%
比较满意	47.2%
一般	38.1%
不太满意	2.3%
不满意	0.9%

最后,表 58 反映了杭州市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杭州生活、工作的总体感受。从中可以看出,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比例达到 58.6%,远远超出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 3.2%。假如进一步按与上述相同的方式分别给“很满意”到“不满意”赋予 1 分~5 分的分值,分值越高,满意度越低,进而就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杭州市农民工就自己在杭生活、工作的总体感受做均值比较,则可以发现:第一,杭州市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杭工作、生活之总体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 2.34 分,表明其满意度在“比较满意”和“一般”之间,但更接近于“比较满意”;第二,就性别而言,男女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杭生活、工作之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异;第三,就年龄而言,除开“16 岁以下”组,从小到大各组平均得分依次为 2.50 分、2.34 分、2.15 分、1.88 分、2.27 分,大体上呈现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的情形(“55 岁以上”同样为小样本组);第四,就教育程度而言,从“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及以上”各组的平均得分依次为 1.96 分、2.35 分、2.42 分、2.37 分、2.45 分,教育程度最低的“小学及以下”组对于自己在杭工作、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五、杭州市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就业与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个人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对杭州市的满意度这5个方面,我们梳理了2007年所做的杭州市农民工调查的结果,展示了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现状。在梳理中,还不时地将调查数据与所获得的反映其他地区农民工之生存和发展状况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总体上看,与全国或其他地区的农民工相比,杭州市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也并不否认在某些方面,杭州市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也存在不如意的地方。不过,要切实地认识、论定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状况,弄清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单单看杭州市农民工自身的现状,也不能单单将这种现状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做对照,还需要参照农民工自身的客观需求,参照农民工作为公民所拥有的、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定应享权利,参照杭州市其他一般市民的状况,来考察审视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现状。接下来,总结略述一下杭州市农民工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就业与工作方面

1. 就业障碍:(1)尽管在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认知中,属于自身素质方面的因素已取代户籍身份这种制度性壁垒而成为就业的主要障碍。但事实上,这种制度性障碍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突出地体现在农民工实际上都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求职。(2)如果说,在农民工自己的主观认知中,自身素质上的欠缺已成为其就业的主要障碍,那么,参加职业培训无疑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杭州市尽管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目前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这一点,既可以从杭州市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状况中看出,也可以从杭州市农民工对于杭州市“劳动技能培训”的满意度位居表56所列之“经济发展”“依法办事”等14个项目之末中看出。(3)杭州市农民工顺利就业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提供和获取就业信息的正式渠道不够通畅。

2. 从农民工来杭务工的目的、中途换工作的原因、对工作感到满意或不满意的因素等方面可以看出,增加经济收入是其来杭务工的最基本动机。应该说,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相比,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是相对较高的,杭州市农民工对于工资收入的满意度也是较好的。但是,如果将杭州市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与其主观期望值比,则两者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果将杭州市农民工的实际平均收入与杭州市城镇单位职工的实际平均收入相比,则两者的差距就更大;而如果将杭州市农民工的收入与杭州市的消费水平相比,则绝大多数农民工显然还无法获得有“品质”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在杭州市农民工最希望政府为他们做的事中,“提高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水平”会位居首位的原因。

3. 农民工来杭务工的首要动机无疑是物质性、经济性的,但是,从务工的目的、中途换工作的原因、对工作感到满意或不满意的因素等方面可以看出,在杭州市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中,已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不仅仅只是“渴望生存”或“寻求生存”,同时也渴望承认、寻求发展。而社会各界包括学界、政府部门、企业等,对于农民工这方面需求的认识是不足的,从而准备也是不足的,相应地,农民工的这种需要或者说追求常常就不太容易得到满足。

(二) 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

1. 在建立劳动关系时,杭州市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比例,尽管与全国或其他一些地区的水平比相对较高,但就其绝对值而言还是很低的,签订率只有57.4%,表明有

42. 6%的农民工是在一种不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情况下就业的。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其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维护。

2. 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农民工的自我维权意识是比较薄弱的,这既体现在上面所说的正式劳动合同签订率的低下上,也体现在杭州市农民工对于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之了解认识的微弱上。这表明,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普法活动,提高其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还任重而道远。

3. 在劳动和工作过程中,尽管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欠薪问题在杭州市农民工中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参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在劳动权益保护的其他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大多数农民工都未能按法定标准获得加班费;相当多的农民工没有获得过单位安排的任何身体检查,尤其是大多数女性农民工没有获得法定的女性劳动者“三期”(孕期、哺乳期、经期)保护;相当多的农民工在受到职业伤害后未能得到赔偿。

4. 在社会保障方面,尽管杭州市政府在建立适合农民工这个群体特征的社会保险制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很低,已由单位为其交纳社会保险金的只有45.0%,40.4%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为其交任何种类的社会保险,另有14.7%则不知道其所在单位有没有为其交社会保险。除此之外,从广义的社会保障范畴来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非缴费性的农民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项目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三) 个人及家庭日常生活方面

1. 在杭州市农民工中,有大约一半的已婚者处于两处分居状态,这不能不影响到其婚姻生活的质量,久而久之,还可能影响到婚姻本身。导致分居的原因有多方面,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客观因素是住房问题。应该说,与全国或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杭州市农民工的居住状况是比较可以的,但与杭州市本地居民的居住条件相比,则差距极大。仅就面积而言,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就不足杭州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三分之一,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房屋及配套生活设施,则两者的差距就更大。大多数农民工都将住房问题看作是他们真正融入杭州的最大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为什么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将“提供廉租房”列作最希望杭州市政府为他们做的实事之一的原因。

2. 与全国或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民工相比,杭州市农民工的消费支出是相当高的,根据调查,杭州市农工人均每月消费支出突破了900元。但是相对于杭州市的消费水平,或者与杭州市居民的消费支出(2007年杭州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241元/月)相比,则又显示出相当的差距。特别是还有近30%的农民工月均消费支出不到500元。

3. 杭州市农民工的体质状况不容乐观,经测试,体质“优良”的不足10%,而不合格的则高达25.4%,不合格率为公务员的2.5倍。体质的弱化与多种因素相关,如劳动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劳动保护、因经济拮据而营养不良等,而得病后没能得到妥善处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 休闲文化生活存在明显欠缺:从总体上看,杭州市农民工业余主要消遣方式的文化含量较低;尽管杭州市政府、市总工会等各界为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做了很大努力,并且还创立了某些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如“放歌在天堂”,但真正能让广大农民工广泛参与的活动却不多;绝大多数农民工没能很好地利用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有相当多的农民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在业余时经常或时常有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极的情绪,一方面直接表征了农民工休闲文化生活质量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则很容易导致农民工转而从一些消极

的、甚至不良的行为中去寻求排遣。

5. 子女就学问题依然严峻:着眼于农民工子女本身,就学问题是关系到其基本权利、同时也关系到其成年以后生活道路和生活品质的问题;而着眼于其父母,则子女的就学问题又是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达到使农民工子女也像杭州本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在杭州“有书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四) 社会生活方面

1. 尽管近年来杭州市工会组织在发展农民工入会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杭州市农民工的入会率依然很低,不足 20%;此外,杭州市农民工自来杭以后,无论是对于杭州当地的任何相关的选举活动,还是对于家乡的任何相关的选举活动,参与率都极低,前者不足 10%,后者不足 20%;再者,在农民工自身遇到困难之时,一些正式的社会组织机构也没有进入他们求助的视野。凡此种种表明,无论从组织参与来看,还是从参与有组织的正式活动或公共事务来看,农民工都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社会游离状态。而无论是对于农民工本身的生活和有机地融入社会来说,还是对于社会管理来说,这种游离状态都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2. 尽管从杭州市农民工的主观感知看,他们和杭州本地人的关系,或者说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但是,从其平时实际社会交往的对象可以看出,他们和当地人、当地社会的关系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彼此隔绝的状态。

3. 在融入杭州社会的未来预期方面,也即对于安家扎根杭州的打算和期望方面,杭州市农民工表现出对杭州的认同度较高,但对自己最终能够扎根杭州的信心指数则严重不足的状况。而影响其信心指数,也即妨碍其安家扎根杭州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则是“住房问题无法解决”。从最直观的角度看,这表明至少在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认识中,融入杭州社会的主要障碍已来自市场性排斥而非基于户籍身份的制度性排斥,但实际上,制度性的排斥对造成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劣势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相比于全国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农民工,杭州市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相对较好,但是,如果参照公民法定应享权利标准下的“应然”,参照杭州市当地市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参照农民工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杭州市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依然面临着种种问题。

杭州市正在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理念下稳步发展,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均已认识到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应该纳入打造“生活品质之城”这一理念所关照的视野。但是上述种种问题表明,要使农民工真正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全面融入杭州社会,与当地市民一样共创、进而平等地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各种现代文明成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当然,必须看到,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从根本上讲离不开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改革,这种“最终解决”实际上意味着由这种改革所导致的户籍身份意义上的“农民的终结”以及相应的“农民工的终结”。显而易见,这需要全国一盘棋式的行动,杭州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种行动。

六、附录:农民工典型个案访谈实录

(一) 李月元

李月元,男,1980年生,甘肃人,2000年来杭务工,至今已8个年头。曾获“杭州市职工职业

道德十佳标兵”“2007年杭州生活品质主题点评年度人物”“浙江省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杭州市创业新星”等荣誉称号。现为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知味观一楼餐厅服务主管。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李主管,你好!来前我们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你在杭州已工作打拼了整八年。在这八年中,你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称号。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这一系列的荣誉称号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李月元(以下简称李):最看重哪一个?这很难说。实际上,可以说,我对每一个都同样珍惜看重。我觉得每一个荣誉都是单位和杭州人民对我的承认和鼓励,也是对自己这些年辛苦努力的一个交代回报。一定要说出最看重的一个,有点让人为难。

访:看来跟每个人一样,你对自己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同样珍惜,都看作是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就请你跟我们简单谈谈你在杭州的这八年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可以吗?

李:好!我最初是2000年来杭打工的。我的老家在西北农村,同这里相比,那里的日子相当艰苦贫困。我是经过老乡介绍引荐,进入知味观的,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单位。因此,这是我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至今唯一的一份工作。在知味观,一开始是大堂服务员,就是做些清理餐具、收拾餐桌、搞好餐厅日常卫生之类的服务工作。大概因为我工作比较认真——这也是因为老家的艰苦日子使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手脚也比较麻利吧,过了半年,我就被升为餐厅领班。这就要求我不仅自己个人要干好,还要带好班,要把其他服务员的工作带领好。过了两年,也就是2003年,可能是因为看到我比较能吃苦耐劳,也比较勤于钻研业务,而且两年多时间的领班做得也算称职,领导又给了我一个锻炼机会,就是到知味观下面的食品工厂管理季节性食品的生产。季节性食品就是像清明的团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春节时的八宝饭之类,每到时令节日快到的时候,企业就派我过去抓这些东西的生产。由于季节性食品只能热卖一阵,工作强度是很大的,而且工人都是临时性的,挺难管理。不过一来二去,我也适应得挺好,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样锻炼了三年,到2006年,企业给了我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我做主管,负责管理知味观一楼大厅的服务工作,一直到现在。在工作方面,我在杭州的经历大体就是这样。

访:从你的叙述听来,我觉得你这一路走来挺顺的,短短七年不到的时间,就从一名服务员走到了主管的岗位。能谈谈你觉得你为什么能这样顺吗?

李:我也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确实,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我也很喜欢杭州这座城市,这里的风景真是太漂亮了,我很希望自己能在杭州站住脚,因此,我工作很认真,不怕吃苦,也比较肯动脑子钻研业务。我很注重给自己充电,自学过餐饮英语,也学过管理学方面的知识,还考上了餐饮服务的高级资格。这些对于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知道,许多外来务工者也很努力,工作也很认真,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大都没像我这样“顺”。因此,说到我为什么会这样“顺”,得感谢我的单位,领导没有因我是外地人而对我另样看待,反而培养我,给我锻炼的机会、发展的平台。同事也常常帮助我,支持我的工作。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想,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能不能在杭州留下来都可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获得今天这些荣誉和成绩了。因此,倒不是有意说好听的,我现在做事一般也总要先从单位的角度想一下,而且,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变故的话,我也打算长期在这里做下去。

访:你很知恩图报。能再和我们聊聊生活方面的情况吗,如收入状况、工余活动等?

李:我们企业给外来务工者的待遇还是不错的,企业给我们交了“五金”,我现在已经交了8年的社会保险了。至于收入,随着职务的晋升也是一路增长,几年前的年收入是两万元多一点,去年增长到近7万元了。

访:哦,7万元?那不少了。

李:是的。老实说,我自己也非常满意了。在我的老家,这样的收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至于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我一般不太一个人闲在宿舍里。常干的事主要有两项。一是去新华书店,去那里看看书、充充电、长长知识。另外,我参加了志愿反扒队,是一名义务反扒队员。我很喜欢这项活动,不仅因为这是一项公益活动,对社会有意义,而且对我来说,还有另一个作用。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务工者,有时难免会感到寂寞无聊,而它能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无聊感、空虚感。同时,参加志愿反扒队,也使我与杭州本地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帮助我更好地融入杭州。当然,现在成家了,工作之余就出去得少多了。

访:说到成家,今年3月1日你在杭州举办了婚礼,就在这知味观举行的,听说在婚宴上来了许多“杭州亲戚”,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杭州亲戚”?

李:尽管我是一名外来务工者,但来杭7年多了,自然也就结识了许多本地人,并且和其中不少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因此,我感觉在杭州有很多的“亲人”。能结识这些杭州的亲朋好友,主要是由于工作的关系。干我们这行的,每天要服务很大数量的顾客,知味观又是百年老店,来这里的顾客除了观光游客外,很大一部分是杭州本地的老顾客,像有一对年近八旬的杭州老夫妻,每天晨练后都会到知味观来吃早点,时间一长,他们就与我熟悉了。两位老人很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时常告诉我要对得起父母的期望、领导的培养,既要有理想抱负,又要踏踏实实。从这对老人身上,我能感受到一种长辈对晚辈的亲情和关怀。另外还有企业的领导、同事,市总工会的领导等,他们都很关心我、帮助我,慢慢地,在我心里也就不仅仅只是把他们当作我的领导、同事了。再一个是在工余生活中,我也接触交往到不少杭州本地人,像我的房东,我们的联系不仅仅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还有亲情的温暖。比如天下雨了,他们会把我晾在户外的衣服收进屋,逢年过节做了好吃的会叫我过去,这些虽然是生活上的细节,但却让我感到家的温暖。

访:看得出你和杭州本地人的关系蛮融洽。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在你来杭州的这8年中,有没有感到过杭州人对于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和排斥?

李:来杭这8年,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杭州人是蛮友好、蛮包容的,杭州这个城市是很善待外来务工者的。当然,我也遇到过个别杭州人瞧不起外来务工者的情况,特别是在早几年,现在好多了。不过,我倒也觉得,有时本地人反感外来务工者,也并不一定全是本地人的问题。外来务工者多来自农村,在一些生活习惯上和城市生活不太适应,有时还可能影响市容市貌,如大街上打赤膊、随地吐痰等,这就免不了可能要引起别人反感。我觉得,外来务工者要真正进入城市生活,固然需要城里人的包容接纳,但自己也需要努力改变,适应城市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去这8年中就经过了这么一个改变、适应的过程。

访:不能否认,你适应得很成功。作为一名外来务工者,你觉得对自己在杭州工作生活构成最大障碍的是什么?

李:最大的障碍,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属于制度方面的户口。外来务工人员人在杭州,户籍还在老家,这对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比如我今年结婚要办结婚证,我和我老婆户口都不在杭州,于是杭州的民政部门就不给办这个证,说只有两个人中有一个人的户口在杭州本地才能在当地登记。没办法,我们只能回一趟甘肃老家办结婚证。户籍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买房、子女上学等都是。要是政府能在户籍制度上再松松绑的话,我们肯定能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甚至,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杭州人,不再是外来务工者了。再一个构成障碍的方面属于自己个人方面的原因,就是我的学历,我现在是知味观一楼主管,但我只有初中文凭,这显然与我的工作很不相称,所以,如果在未来我要获得更大的事业发展,学历一定要提上去。我曾经报名参加过成人学历考试,但由于工作时间紧张,没能坚持下来。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五年内拿到大专文凭,这就要靠我自己挤时间了。每想到这,我有时就觉得挺难的。

访:谈谈你对杭州这个城市的总体印象,包括政府和社会各界,有没有令你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李:说真的,我觉得杭州市政府为外来务工者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像今年春节期间,杭州滞留了大批外来民工,很多民工都已经把租房给退了,但却由于灾害天气回不了家,多亏市政府采取了措施,及时开辟了很多滞留民工服务点,为广大民工提供住宿等各种服务。还有市总工会,把关爱外来民工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实在,比如每年都会举办“外来民工同吃年夜饭”活动,去年更是达到了100桌的规模,虽然不可能包括所有在杭民工,但这一活动让我们感受到杭州各级领导对我们的关爱和重视。至于杭州这座城市,当然更没话说啦,城市建设好。西湖风景就更用不着我来说啦!

访:最后,能不能从你个人出发,谈谈你最希望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为外来务工者做什么事?

李:好。作为一名外来务工者,我想就政府对于外来务工者的文化休闲服务这一方面提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期盼。上面说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但同样能感到外来打工群体在异地他乡生存发展的不容易。很多打工者与务工城市的关系仅仅止于打工挣钱的关系,而难以获得城市社会的公共服务。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外来务工者来杭务工,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他们除了关注经济物质方面的收益,还更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如何满足他们这种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我觉得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考虑。前面我讲过,我参加志愿反扒队,固然是想做一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想借此消除有时免不了会有的空虚无聊。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参加反扒队呵。我想,政府和社会应该多做一些事来满足外来务工者的休闲和精神文化需求。可以针对外来务工者的特点多举办一些可以广泛参与的活动,提供一些免费的或者比较便宜的休闲活动场所和设施。确实,市中心有工人文化宫,应该说,这是比较好的文化服务设施,我们单位的大部分员工在工余都会去那里打打乒乓球,打打台球,看看报纸,这些休闲活动或是免费的,或是我们打工者负担得起的,但这样的场所和设施太少了,特别是在外来务工者聚居的郊区,几乎根本没有这一类的文化休闲场所和设施。外来务工者健康的休闲和文化精神需

求得不到满足,既不利于外来务工者自身素质的提升,也会给社会治安、城市品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希望杭州政府和社会各界能不能为满足外来务工者的休闲和文化精神需求再多做些实事。是不是可以在外来务工者聚居的地方开设几个文化休闲点,这样工人们工余时就能过去打球、看看电影、读读报纸,有益身心又积极向上,还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顺带在那里办些职业培训班,像关于电焊技术、厨艺、法律常识、生活技能等,都可以办班,讲课的老师可以到大学请,也可以邀请在一线岗位上经验丰富的师傅。这样,外来务工者就可以在闲暇之余获得学习、提升素质。我相信,这样的文化服务场所,肯定可以成为外来务工者的精神文化家园。

(二) 徐文财

徐文财,男,1976年生,籍贯江西,1994年来杭务工,至今14个年头。目前担任“草根之家”网站的管理员。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徐先生,您好。据了解您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来到了杭州,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杭州这个城市找工作?

徐文财(以下简称“徐”):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出来的,至于要去哪个城市也没有多想,就觉得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就和朋友一起来了。既然来了,就在这里做了,也不想换地方了。

访:可以具体说说来杭14年的工作历程吗?

徐:我来杭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服装厂里当一线工人,我在辞职之前一直都是在这个厂里工作的。我做了三年一线工人,然后就当上了组长,后来又被提升为车间管理,但是后来我这个车间管理做得很不舒服,就向上面领导反映下调,最后还是受不了,干脆就辞职了。从2006年开始,我建立了一个网站,就是“草根之家”,是一个为我们外来民工开设的一起交流平台作用的网站,我自己当网站的管理员,一直到现在。

访:感觉您的这段经历很特别,当时您在服装厂里已经是进入管理层了,可以说在工作上已经是有所成就了,为什么您还会选择辞职?

徐:因为我当车间管理的时候感觉很郁闷。车间管理的工作就是帮助厂领导管理工人,我自己是从工人做上来的,我知道当工人有多辛苦。一个服装厂的一线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度是你无法想象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很普遍的,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时间要长达16个小时,连正常的睡眠都没有办法保证。而且如果工人们把10个小时的工作在9个小时内完成,厂领导不会考虑提前收工,他们就觉得工人们之前没有认真工作,认为工人们在规定时间内还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不管工人们多么卖力地工作,他们都得不到额外的休息时间。有时候厂领导要求我让工人们加班,这就是我这个车间管理的职责,但是我自己心里不想再给这些工人加重负担了。那个时候的我就是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夹在厂领导和工人之间,这使我感到非常矛盾,所以在最后我选择了辞职。

访:您辞职以后自己开设了“草根之家”这个网站,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建设这样一个网站?

徐:在服装厂工作的这段时间,我亲身体会到作为一个民工的辛苦。“草根之家”网站就是想为像我一样的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个栖息地,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诉说的地方。这个网站也许并不能在实质上帮助他们,但是可以在精神上让他们有一个依靠。而且,虽然我们民工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但我看到周围的打工者中也有人才,“草根之家”就是想把我们的智慧集中起来。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什么,但是很多的力量聚积起来,也许就可以让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访:您在建立“草根之家”网站时有没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有条件上网的民工有限,能够访问这个网站的人不多?

徐: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问我。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新浪网上发过一个帖子,问有多少民工是可以上网的,结果在很短时间里就有大量回帖,都是民工网友回的,他们甚至还问“有多少民工是不上网的?”其实现在很多民工都会上网,主要的途径是在网吧上网,我敢说现在网吧里80%的顾客都是民工。现在“草根之家”每天的访问量都维持在1500人次左右,有很多人关心和支持这个网站,并且也有很多志愿者积极地参加网站举办的活动,我很感激他们。

访:到目前为止,“草根之家”都举办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徐:在“草根之家”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举办过一个叫“健康平安,和谐快乐”的倡议活动。当时我们举着写有这个倡议的旗帜,到西湖边的宝石山上喊口号。随着活动的进行,加入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每一个加入的人我们都会送他一面小旗,我们的口号越喊越响,大家都非常兴奋。“健康平安,和谐快乐”这八个字也是网站的宗旨,代表了我们外来打工者对生活的期望。我们还举办过“草根文化艺术节”,表演者都是看到网站通告后自愿来进行义务表演的。本来春节联欢晚会上很受欢迎的“千手观音”也要来义演,但是活动场地的管理人员担心安全问题,坚持要请保安人员,但我们没有这个经费请保安,最后很遗憾没办法让“千手观音”来。还有就是去年我们举办的“民工春晚”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当晚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到场进行了报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所有的活动都是由志愿者参与组织起来的,所以活动的举办受到了很大限制。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经常性地举办活动,所以没办法得到媒体的长期关注,这也是我们感到比较困难的地方。

访:我在网站首页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公益创业”这样一个概念,请问该网站自身就属于“公益创业”的性质吗?“公益”与创业所需要的“收益”不会产生矛盾吗?

徐:“草根之家”可以说是公益创业性质的。公益创业与收益创业有着本质的不同。“草根之家”上没有像其他一些小网站上时常会出现的不良广告,我们不会为了几个广告费把这片净土给污染了。“草根之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我们的活动经费一方面由我自己垫付,另一方面是靠活动参与者自愿提供的帮助。我创立这个网站是为了能帮助民工兄弟们,而一个网站要运作起来,资金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的资金来源于各方志愿者,用之于网站的服务对象,即外来务工者。我们网站创业所集结的资金完全是用于公益事业的,这是公益创业与一般以收益为目的的创业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实,“草根之家”只是致力于搭建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民工朋友们可以互相倾诉,互相帮助,而想要帮助民工群体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可以找到一个提供给他们帮助

的快捷有效的渠道。

访:您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打算?

徐:我会继续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草根之家”网站的管理中,希望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梦想的平台,通过它做到资源的整合,使其成为外来打工者的精神家园。当然网络只是我设想中的一个方面,现在我正在寻找合适的场所用于开设“草根之家”的实体活动室。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室的开办,人们可以面对面地交流,达到网络所没法达到的沟通效果。另外,上次获得成功的“草根文化艺术节”我也打算继续办下去,争取成立一个艺术团,使艺术节成为每年一次的定期活动。总之,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团体,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引起社会各界对民工生活处境的关注。

访:您对民工群体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加上您的亲身经历,您认为从总体来看杭州民工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他们最需要什么帮助?

徐:这个问题要比较来看。在杭州打工的民工生活条件和其他省市相比,算是很不错了,这个大家都是承认的。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杭州人的排外感觉比较少,各方面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但是拿杭州民工和杭州市民的生活条件相比,那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别的行业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但就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服装业来说,民工的工作强度太大了,有90%以上的民工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也是“草根之家”把“健康”放在网站宗旨第一位的原因。外来打工者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没有保障。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是最缺乏竞争力的弱势群体,他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放弃很多的保障,压低自己的身价。而这些对于他们的将来是很不利的,因为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弱,加上年轻时候过度的劳累,当他们失去劳动力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来源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就是工作之余得不到精神享受的问题。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工友把自己平时存的1000元工钱都拿去买了一只手机,我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一笔钱去买手机,他告诉我说因为钱攒起来不知道该去哪里花。这不是说民工的工资太多了没地方花,而是能够为民工提供娱乐的地方太少了,业余生活太单调了。我们艺术团有一次想到一个工地里做义务演出,但是工地管理就是不让我们去表演,在他们看来,民工只是干活的机器,是不需要娱乐的,我们去只会制造乱子。但事实上是,民工也是人,人都需要精神上的享受,这是不可以再被社会忽略了的。

访:对于保障这个问题,杭州市政府也先后颁发过一些相关政策和规定来为民工的生活提供保障,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怎么样?

徐: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相关政策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就拿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来说,你知道要使自己的子女在杭州读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我知道的就有:暂住证一年,固定公司合同,长期的房屋租赁等。有些条件我在杭州待了14年了都不一定能够满足,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民工享受到了这项政策。还有“五金”,企业为民工交“五金”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局限性就在于民工工作的流动性是很大的,一旦民工离开一个单位,他的“五金”保障就全没了,而民工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好几年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常见的。

访:那么在您看来,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为外来务工者做些什么呢?

徐:我觉得,为了更好地帮助民工群体,政府应该放开对社会团体的管理。政府是一个庞大的运作机构,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对于某一方面事务的管理也许不如专门的社会团体来得快捷有效。我的意思是,像“草根之家”这样的社会团体可以更为直接的帮助外来打工者,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拥有这个团体,并对其加以指导,具体事务交给我们去办。有了政府的承认和帮助,我们就可以扩大规模,增加社会影响力,吸引各企业和有心社会人士的注意,通过他们的帮助使杭州民工的生活得到有效改善。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样做还可以提高企业招工的竞争力,增进社会安定,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办法。还有,现在杭州民工生活的一大压力就是不断上涨的房租,这迫使我认识的很多民工朋友不断地向城市边缘地带搬家。不光是房价,现在几乎所有的物价都在不断上涨,但是民工的工资却不见涨,这就导致了民工的生存负担不断加重。在这个方面,我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适当提高民工的收入,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三) 丘顺根

丘顺根,男,1965年生,建德人,1993年来杭务工,至今15个年头。目前担任杭州卷烟厂的送水工,负责全厂2000人的日常用水。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丘先生,您好!据了解今年已经是您来杭务工的第15个年头了,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15年中的经历吗?

丘顺根(以下简称“丘”):我以前在老家建德那里是做农活的,当过3年兵,退伍后继续在老家做农活。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可以说是为了改善生活吧,决定到杭州来打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一家牛奶公司当送奶员的,这份工作我做了半年多。由于家里的原因又回到建德做了半年农活,之后还是回到了杭州找工作,这次我进入了杭州卷烟厂。在烟厂里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包括搬运香烟包装箱和处理香烟残次品等,现在主要是负责送水,干的都是力气活。虽然我在厂里的工作只是一个送水工,但是全厂只有我一个送水的,2000多人的日常饮水都得靠我,肩上的责任还是很重的。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现在。

访:您对现在的工作状况还满意吗?

丘:还可以吧,主要是收入还比较稳定。像我这样没什么技术特长、靠力气干活的,有这点钱赚已经比较满足了。厂里的工作氛围很好,不会因为你是农民工就有人看不起你,厂里人的饮用水都是我送的,很多人都认识我,对我还是很友好的。厂里也从来没有出现新闻里经常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从2006年开始,厂里还给我们农民工交“五金”。以前我都是做一天算一天工钱,其他都没有的,现在有了“五金”,我感觉生活更加有保障了,这个政策真的很好。

访:在杭州的生活还好吗?

丘:生活还不错的。现在的工作收入很稳定,所以生活不需要担惊受怕,杭州是个很休闲的地方,在这里生活感觉很轻松。现在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听到的也越来越多,心里越来越踏实了。我和我老婆都是在这里打工的,两个人的工资和奖金加起来一个月有2000多元,再说我们平时也不怎么花钱,这些工资除了吃饭和交房租以外都是存起来给小孩读书用的。

访:说到小孩,对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丘:是个女孩,她去年考上了杭州的浙江工业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呢,现在读大一,我和她妈妈都很高兴!她原来是在建德读书的,我们平时要上班,没办法回去看她,每年就是她放假的时候来杭州看看我们,现在她考到杭州来念书,我们一家人都在一个城市里了,三个人可以住在一间屋子里,感觉家的味道又浓了点了,呵呵。

访:原来已经是大学生了啊,那可要恭喜您了!您刚才说家的味道更浓了,在杭州安家的感觉怎么样?

丘:我在杭州生活了十多年了,感觉杭州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以前一个人来大城市打工的时候,开始感觉很孤单的,但是杭州人对我都很友好,也让我感觉不是那么孤单了。后来老婆也来杭州打工了,现在女儿也考到杭州来了,虽然她平时是住在学校里的,但是每个礼拜五都回来的。我们在烟厂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面积不大,但是一家人住着就有“家”的感觉。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家对杭州已经很熟悉了,已经可以融入杭州的生活当中去了,和自己在建德的老家比,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而且现在农民工都有“五金”了,厂里的效益也好,感觉生活更稳定了,这些都满好的。总的感觉就是杭州很适合居住。

访:很高兴您对杭州有这么好的评价,那平时下班以后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呢?

丘:娱乐活动啊,平常晚上我不是太爱出门的,基本上就是在家里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还有就是阅读,我特别喜欢看历史小说,经常去图书馆借这种类型的书来看。周末的话,有时会一家人去景区逛逛,杭州免费开放的公园还是很多的,像柳浪闻莺、杨公堤、杭州花圃这些地方,风景都很不错,我们都很喜欢去玩。

访:您来杭州已经15个年头了,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愿意一直留在杭州工作呢?

丘:以前在建德老家的时候,平时就是种种庄稼什么的,生活安逸是安逸的,饭也能够吃饱,但是我想让小孩好好读书,想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决定出来,到大城市去打工。杭州是我出来打工到的第一个城市,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为什么要来杭州,就觉得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刚开始来到这个城市,感觉还是很陌生的,但是后来在这里做做,发现这个城市还是很不错的,也开始慢慢习惯在这里生活,工作也稳定下来了,就不想再东奔西跑了。我觉得杭州的环境真的很好,西湖周围的风景区都很漂亮,房子也越造越漂亮,大城市么,呵呵。还有杭州的人也很好,这么多年下来,我就感觉杭州人还是很和气的,我在厂里遇到什么困难会有人给我帮忙,基本上没有人会瞧不起我们农民工,这点我感觉很不错的。我在杭州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对杭州已经很熟悉了,已经有一种亲切感了,现在我们一家在这个城市团聚了,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女儿也可以在这里读重点大学,我感觉很欣慰的。既然现在一家人都在这里了,我当然是要一直留在杭州的。

访:您既然决定一直留在杭州,那么您对今后在杭州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丘:我自己的规划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做好现在这份工作。前段时间有两个工人违反了厂里

的规定被解雇了,是两个年轻人,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会一直做好自己这份工作,因为做事情要负责任,我是送水工,像我现在这个年龄能做几年就做几年了,这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要好好送水,全厂那么多人要喝水,这个工作不能马虎。其实现在我们夫妻两个省吃俭用,就是在供我们的女儿读书,现在她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以后希望能有出息。我们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就是希望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我女儿现在的条件就比我那个时候强多了,她现在有文化了,以后不会再像我一样靠力气活赚钱了,她用脑子赚钱,以后生活会更轻松、更好。我希望她毕业以后可以在杭州找一份好工作,好好生活。

访:希望您的女儿早日成才,您一家在杭州的生活越来越好。您住在杭州这么长时间了,在工作生活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丘:困难也是有的。我没什么文化,来城里打工只能干干力气活,前几年年轻的时候还行,现在我岁数也大了,扛起水桶来没几年前那么轻松了,我现在是担心以后要是扛不动水桶了,那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现在这个年纪也考不上什么大学了,呵呵,就希望可以学点技术,以后老了也可以做做技术活。还有,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这个房子也足够了,可是现在一家三口人住在这里总觉得还是挤了一点,现在女儿上大学要花钱,也没办法租更大的房子,只能将就着住,这是我们家目前最大的实际困难吧。

访:最后,作为一个在杭工作了15年的“老资格”,您希望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为外来务工人员做些什么?

丘:呵呵,这个我不太知道怎么说的。

访:其实就是从您的切身体会出发,谈谈您在杭州的生活有什么需要具体改善的地方?

丘:需要改善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我是自己租的房子,大概30个平方米的样子,自己条件有限也没办法租很大的地方,我觉得像我现在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还是有点挤的,就是在住房问题上政府能不能帮帮忙。我们也不是想住很大的房子,就是可不可以有稍微宽敞一点的,一家人住着不那么挤的,租金可以优惠一些的房子。对我们农民工来讲,最大的开销就是这个房子的租金了,而且现在我女儿读大学的学费也是一个压力,如果可以为我们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最实在的帮助了。对了,还有现在像我这样靠干力气活赚钱的农民工有很多的,以前我有个机会可以当卡车司机,工资待遇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是那个时候考驾照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那个机会。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政府能够为我们农民工办一些类似技术培训班这样的,让我们有机会学到一些实用的技术,可以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发展。

(四) 金臣封

金臣封,男,1981年生,籍贯义乌,2002年来杭务工,目前职务为杭州某拍卖行的业务部经理。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金先生您好。据我之前的了解,您是1981年出生的,算是80后的年轻一代,而您离开家乡来到杭州工作已经有6年了,是什么原因使您决定这么年轻就到外地工

作呢?

金臣封(以下简称“金”):是这样的,以前我在义乌的工作是在一家饮水机店里当伙计,这份工作很空闲,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就一直做了两年。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家杭州公司的招聘广告,说是需要招聘一名司机,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是觉得应该趁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到外面去闯闯,加上我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印象一直都不错,所以就辞了老家的工作来杭州应聘了。

访:可以具体谈谈这几年来在杭州的发展吗?

金:好的。刚才说了,2002年我初次来到杭州就是为了应聘一个司机的职位,招聘单位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家拍卖公司。当时给我面试的是公司的董事长,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之前也没有准备,就凭感觉回答,结果令他非常满意,于是我顺利地成了董事长的司机。我当了一年的司机,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说是逐渐受到了董事长的器重吧,于是有一天我被转到了公司的业务部,成了一名业务员。跑业务这份工作我认为比较适合我做的,虽然平时非常辛苦,但是每一次业务上的成功都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由于我在跑业务方面的表现,我被提升为业务部经理,也就是我现在的职务。

访:来杭才短短6年的时间,您的职位就从一名司机升到了一名部门经理,在一般外来务工者中,算得上成功了。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心得吗?

金:成功还远算不上。但是如果说在工作方面的经验的话,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那就是勤奋和机遇。我现在很庆幸当初我看了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来到了杭州,要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遇的话,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充实的生活。还有就是勤奋,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行,勤奋都是相当重要的。我在当司机的时候,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杭州市区的路线弄清楚了,另外我刚成为业务员的时候,对拍卖行的业务工作是完全陌生的,可以说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当时我就对自己讲:你得学啊!我是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和不断的学习,慢慢摸索跑业务的套路,最后才能把握住这个职务的。在我的工作生涯中,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就是我的董事长,他一直都比较信任我。其实这就和做人有关系,做人要真诚,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这在工作中也相当重要。

访:您的这番话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那您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吗?对于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打算?

金:其实我对现在的工作是不太满意的。拍卖行业曾经是一个朝阳行业,但是这些年我做下来的感觉是,它正在向夕阳产业转变,前景并不十分乐观。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自己单干,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访:义乌也是一个很适合创业的地方,您会考虑回老家创业吗?

金:应该不会,要创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在杭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机的确是不小的,我以前的一些同学现在都是身家好几百万的老板了。但我不光是看中杭州的商机,更看重的是杭州的环境。创业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生活,套用杭州的一句口号,是为了

提高“生活品质”。前几年我回义乌参加过一次同学会,感觉和那些同学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他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金钱,喜欢互相攀比,你今天开宝马,我明天一定要开奔驰。我认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杭州的环境不一样,人不一样。我也认识一些收入不菲的杭州人,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开的也是一些很普通的车子,对他们来说,赚钱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自己过上更好更充实的生活。我很欣赏杭州人的这种生活观念,我也很向往这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在杭州这个大环境中产生的,在义乌是用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体会到的。

访:相信您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您刚才说到自己在杭州的生活很充实,具体说说您的生活是怎样充实的?

金:首先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我是在杭州认识她的,当时我还在当司机。我们经过几年的发展,最终在2005年结了婚,杭州对我们来说还真的是爱情之都呢,呵呵。现在她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有一个60平方米的小家,感觉生活的充实就源于这个小家。还有就是杭州这个城市所具有的独特的休闲生活态度也感染了我,有时生活可以放慢节奏,给自己留点时间享受生活,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样自然就感到活得充实了。

访:快要当爸爸了啊,恭喜您了!平时有些什么业余爱好吗?

金:业余爱好还是很多的,比如看电影、上网、打乒乓、喝酒聊天交朋友、唱歌、打麻将等。其实也不全算是爱好,其中有一些也是跑业务所必备的技能。像我原来从来不打麻将的,但是有一次谈业务的时候需要会打麻将,于是就学了,现在平时也偶尔搓两把消遣消遣。还有唱歌也是,出去跑业务的,到KTV唱歌几乎是必备的技能,像我这样不爱唱歌的人现在也能唱几首了。

访:您在杭州这么多年了,谈谈对杭州这个城市的总体印象好吗?

金:我对杭州的总体印象挺好的,真的。杭州的居住环境很不错,绿化做得很到位,卫生条件好,治安环境也不错,感觉社会很安定。特别是绿化,杭州人很重视绿化,我看到过好几次了,如果要在杭州砍一棵树,那是比造一栋房子还难,正因为这样,杭州的绿化才这么好,环境才这么好。还有就是一个人文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你们杭州人自己可能对西湖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对我来讲,西湖真的是一处很珍贵的风景和人文遗产,这种风景在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我对杭州人的感觉也很不错,总体来说杭州人还是很友善的。个人感觉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有几次我的钥匙插在家门上忘拔了,都是邻居好心帮我把钥匙拔下来替我保管的。另外通过媒体的报道,我感觉杭州市政府在为市民办实事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12345”这样的电话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实际意义的。媒体的监督也做得不错,经常可以看到曝光的新闻,对于一些事件的跟踪也基本上是有始有终的。

访:那您在杭州的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房价太高。杭州的房价这几年的涨幅实在是太大了,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房子,要不就是突破自己可以承担的贷款底线买房,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房奴,生活质量那是根本不用提了。我现在每个月的基本收入,不算业务提成的话是5000元左右,但是我和我妻子的全部收入加起来,要想在杭州贷款买房,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上个礼拜我还去公司对面的楼盘问了一

下价格,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400万元,3万多元一个平方米。当然我只是随便询问一下,但是这已经很能体现杭州现在的房价水平了。虽然我已经在杭州成立了的家庭,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但是也许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吧,我总是认为如果我在杭州没有自己的房子,感觉就是没有在杭州这个城市扎根,这对我在杭州的长期发展也是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另外杭州的交通状况比以前糟糕,我平时上下班路上都会遇到高峰期,那叫一个堵啊,有时车子根本就没法动,高架桥都变成停车场了。但是交通和住房比起来还是小问题,杭州的居住环境各方面都很不错,就是房价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访:那么最后请问您觉得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做些什么呢?

金:那还是一个住房问题,希望杭州市政府予以更多的重视,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使得很多人在杭州买房的梦想都化为了泡影,事实上这会限制很多人才在杭州的发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买房是一件必做的大事,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才觉得踏实,才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扎了根。现在杭州的房价使大量来杭州发展的外地人无法买房,我想其中很多人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心里还缺乏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我在杭州生活了6年,在这里成立了我自己的家庭,在各方面我都融入了杭州这个城市,但是有时我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因为我没有一个合适的住处。虽然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我觉得一些所谓的打压房价还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并没有为普通老百姓减轻买房压力,买得起房的人照样买好几套房,买不起的人还是连一套房都买不起。杭州的居住环境是我见过最好的,我也很希望可以一直安心留在这里发展,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实实在在地减轻我在杭州安家的压力。

(五) 王兴柱

王兴柱,男,安徽长丰县人,1988年来杭州,就业于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至今已逾20个年头。现为该公司电工班班长。曾获1998年西湖区第一届外来十佳青年,1999年杭州市第二届十佳外来青年,2005年“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以下简称“创争”)活动杭州市知识型职工标兵、浙江省知识型职工标兵、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以及2006年全国知识型职工标兵和中华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为此,他和妻儿被特批了杭州市户口,并在市区购买了100平方米的住房,真正融入了杭州市。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王师傅您好!我们从杭州市总工会那里了解到您。希望能允许我们对您做一个访谈。

王兴柱(以下简称“王”):可以,可以。

访:那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好吗?

王:我是1988年来到杭州的,也算得上是第一代外来务工者了。初中刚毕业,我就被父亲从安徽老家拉到杭州,说是来“学个技术”。那时我大伯刚从杭州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退休没多久,于是就把我介绍到那儿。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因为是外省人,所以编制为临时工,只是当学徒而已。

访:这么说来,您到杭州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能走到今天真不容易。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

难吗?

王:那肯定是有过的。特别是我刚到的那一年,当学徒,工资很低。而且当时粮食又很紧张,生活过得特别辛苦,我打过退堂鼓,想回家种地算了。好在当时有很多人支持、帮助我,包括我的同事、领导、师傅还有我的家人。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从老家寄来大米给我当补给,途中运送时间就花了好几个月。再加上同事、师傅帮忙换了一些本地粮票,那段时间总算熬过来了。除了粮食紧张,生活上比较困难之外,我当时还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语言不通。上班第一天,我就懵了,周围同事们“叽里呱啦”讲的全是杭州话,一句也听不懂。我当时还是学徒,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师傅和同事,但因为交流困难,所以对我的专业学习和生活都造成了障碍。说到这儿我又得提到我的师傅,多亏了他,那时候天天教我说杭州话。在师傅的帮助下,不到一年,我就已经能和别人自由沟通了。如今,我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别人都分辨不出我是外地人。刚来那几年,每年回家探亲总会引来乡亲们的一片质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的情况,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心疼我,怕我在外面受苦,都劝我回家。好在当时我意志坚定,要不然现在就没机会坐在您们面前了,哈哈!

访:看来每个成功的人都是要经过一番磨炼的。您现在已经是技师了,还取得了很多荣誉,这中间肯定也付出了不少辛苦。

王:我是1988年来到杭州的,刚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徒。我觉得自己只有初中学历,又是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挺自卑,于是一天到晚跟在师傅后面学,不懂就问。那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就待在宿舍看书、学习、研究电路图。集体宿舍里只有我一个安徽人,没有老乡,这使得我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学习。我的师傅看我对学习的兴趣这么大,就积极地帮助我,一有空就教我看图纸,并把我介绍到其他的师傅那里学习技术。这样的结果是我的技术学得比较全面扎实,而不是只局限在某一方面。那段时间的潜心学习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这样的生活坚持6年,到了1994年,我正式当上了班长。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领导看我比较好学肯干,已经把我列为培养对象,负责一些日常的管理事务,参与到班组长的工作中去。1995年,当时的项目经理替我报名参加水电预决算上岗培训,其实这对我一个初中生来说,听课都累。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就窝在家里看书,后来老师一张嘴我就知道要说什么了。那时候我天天晚上去学校报到,不懂就问老师,几乎所有老师都认识我了。最后,一举通过了全国统考。我一直对自己的学历比较自卑,觉得初中学历实在是太低,所以总想找机会给自己充充电。1997年的时候,我又报考了浙江水利电力专修学校,考前我买了一堆的参考书复习。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居然被我考上了!可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我们公司接到好多个大项目,接连忙了5年,只好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学习进修机会。1994年到1999年是最忙的几年,做了很多个大工程,包括杭州游泳健身中心、下沙中萃可口可乐公司、杭甬高速公路指挥中心、杭州卷烟厂办公楼等。其中杭州游泳健身中心还获得了“鲁班奖”呢!2003年,我通过考评直接获得了高级技工上岗证,一般人都需要先考中级。现在我已经是技师了,并且享受着工程师的待遇。预计到2009年的时候有望报考高级技师。

访:回头看您这20年的经历,真是又有辛苦又充满收获。从一名小学徒到今天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级技工,您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从您的叙述中,我看得出,在您的成长路上一直都有很多人在帮助您,像您的师傅、领导、同事们。他们对您的影响一定非常大吧?

王:是啊。可以说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一路走来碰到很多好人,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我师傅,当我被指定成为他的徒弟那天起,他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我。对我的关心不止在业务技术的学习上,更是在生活的各方面给予我极大帮助。回想我刚来杭州时,一句杭州话也不懂,都是师傅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地教我。刚来那会儿,老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有自卑感,所以虽然师傅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可我总是不敢去。有一次,恰逢过端午节,师傅知道我一个人,就叫我晚上到他们家去吃晚饭,一起过端午节。可我还是因为自卑没有去。结果第二天,师傅带来一袋粽子,“勒令”我吃掉。当时我感动得几乎落泪。从师傅的“严厉”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后来我结婚了,我爱人随我一同来杭州,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必须得回老家。那时我甚至都动摇了,考虑是否要一起回去,因为分居两地很辛苦,在杭州工作总是要牵挂家中的情况。师傅得知了这个情况后,立刻叫师娘托关系帮我爱人找了一份工作,这才使我们稳定下来。后来的生活中,师傅师娘一直帮助我们努力融入杭州生活,包括教我爱人学做各种杭州菜,平时拉拉家常什么的。关系亲得就如同父母和子女一样。除了师傅师娘,还有其他很多人对我们帮助很大,比如房东。我们买房子之前一共租了两户人家,都很好。记得租第二户时,我的儿子刚出世,我和我爱人都在上班,没人照顾他,房东奶奶便自愿要求照顾我儿子。可以说,我的儿子是她一手带大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一家人了,平时逢年过节都会聚在一起。而且巧的是,房东奶奶的孙子后来成了我徒弟,这又更加使我们亲上加亲了。虽然我刚来杭州的时候除了大伯,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可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多“杭州亲戚”。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大,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多机会,使我能够一展拳脚。真的很感谢他们,一路走来对我帮助很多。

访:您真的是很幸运,碰见了这么多热心帮助您的人,使您的每一步都走得这么顺,现在的您,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面融入杭州了。但另一方面,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到杭州这么久,有没有感到过杭州人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和偏见?

王:刚来杭州的时候有过,那时能明显感受到旁边的本地人眼神当中透露的看不起,那时心里挺难过的。不过后来就好了。我站在客观的立场讲,这个问题还是得一分为二看的。外来务工者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比如说话大声、光膀子上街等,因为毕竟生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性上会有差异,城里人对此不了解,容易引起偏见。总的来说,我觉得杭州在这一点上相对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严重的现象。

访:您在杭州打拼这么多年,到如今也算个成功人士了,有没有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王:经验倒谈不上,只是有一些想法吧。我觉得作为一名外来务工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谦虚好学、求上进。也许这也是所有工作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吧。回想当初我刚来杭州的时候,什么都不懂,靠的就是肯学肯问肯下功夫。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没什么玩的地方,再加上我个人原因,所以下班我便看书钻研技术,一有学习的机会我就上,平时则跟在师傅身边积极学习。我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一直以来,看书都是我的爱好,说到这儿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刚结婚那会儿,因为牵挂家中老小,所以打过退堂鼓想不干算了,回家去。那回家能干什么呢?我想到了养猪。于是我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很多关于养猪的书,回家仔细研究,一段时间之后,居然被我摸索出了一套门路,自己配出了一种养猪饲料。后来决定留下来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不久我父亲想养猪,我便通过电话把我那套方子告诉了我父亲,他照样配了饲

养,发现效果果然很好。所以当初我如果回家养猪,弄不好现在已经成养猪专业户了。我说这个事情是想说明这么一点:凡事只要下苦功夫,肯学肯钻,没有办不好的。学习真的是非常重要,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况且我们现在都还年轻,好好学肯定会有出息的。总是会听见同行们抱怨说现在徒弟难带,一代不如一代,再这么下去,将来安装这一行的人才要青黄不接了。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你们首先要明确一点:想学到、学好一门技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有吃苦耐劳精神,不能说放弃就放弃。我有些时候想不明白:现在条件这么好,跟我们当初比真的是天差地别,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好好学呢?这让我很困惑,有些时候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也许是现在这个世界太丰富多彩了,大家的心也比以前浮了,想的东西也多,自然就静不下心来好好学了。

访:说得真好。看书学习是一种自我提高的很好方式,这样才能不断进步,跟上时代的步伐。听说您现在还在学习写论文和打电脑,能跟我们谈谈吗?

王:呵呵,见笑了。我始终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很快,再不学习怕跟不上。所以前些年买了电脑,跟着我儿子学,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电脑老师了。我主要就是学学打字,上网查资料等。学这些也是想帮助我写论文。我的论文其实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总结和想法而已。现在正在写的一篇是关于探询一种班组管理模式的,当前这种模式还在试验阶段,如果成功的话,可以进行推广。要知道,班组是工程队最基本最核心的组织,所以非常重要。我自己一直有看报纸和剪报的习惯,每天至少看两份报纸,比如《钱江晚报》《工人日报》《都市快报》等。有时看到好的文章,就把他们剪下来收集,再在每次班组例会上挑几篇读给徒弟们听,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因为我认为培养徒弟不仅是要训练他们的技能,更应该重视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我把这些年自己总结的这些经验写到论文中去,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为这个圈子里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吧。

访:您真是爱钻研的人,对工作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您还想继续干下去吗?有没有想过要换一行试试看?

王:换行业肯定是不行了,一个是因为年纪大了,换行业恐怕来不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电工这一行,干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不过,我倒设想过在不改行的前提下转换一下工作领域,比如向管理层靠拢。这么些年的工作让我多少攒下些经验,再加上年龄的增长,不适宜一直在一线工地继续干下去。所以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进入管理层。

访:说了这么多您的个人经历,我们对您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正是由于众多像您这样辛勤工作、积极向上的外来务工者,才有了杭州今天的繁荣和兴旺。这是你们对杭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现在我想问一下另一方面,在您看来,你们外出务工对家乡的经济有没有什么影响?

王:我认为有的,而且这种影响还是积极的。一方面我们外出打工,赚的钱肯定比在老家要多,能够补给老家的家人。另一方面,通常一个地方一人外出,会带动一批人外出。比如我,带过的老家徒弟已经不下30人了,其中20多个已经回老家,在这个行业干得很出色,主要是因为他们到杭州来学到了比较精湛的技术,回家之后便成了同行业中的佼佼者。这样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肯定是很大的。

访:这样看来,外来务工者不仅丰富了自己,发展了务工所在地的经济,同时也反哺了家乡,真是一举数得啊。听了您的叙述,我能感觉到您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是比较满意的。但一定还有很多外来务工者并没有取得像您这样的成功,走得也不是很顺。所以我们想请您站在外来务工者的立场谈谈你们希望杭州政府做些什么。

王:首先当然就是希望就业不要受到歧视。其次是住房方面。对打工的人来说,是否有杭州户口区别很大。希望政府能对外来务工者开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我建议,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制度:外来务工者在杭州工作达一定年限后便可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改善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问题,对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还有就是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外来务工者的孩子在杭州上学普遍要交赞助费,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说有专门为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但说实话,教育质量比不上其他公办学校,师资力量方面也有所欠缺。而且在民工子弟学校待久了,不利于孩子接触本地同龄人,这样不仅会助长他们的自卑感,而且阻碍了他们融入杭州生活。民工子弟学校在布局方面也不是很合理,常会出现因为太远而上不了学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说说外来务工者的技能培训问题。现在已经有民工学校了,外来务工者可以到那里接受培训,这是个进步。但在真正落实方面还是有待加强的,最好能避免出现应付性的“临时培训”现象。

访:您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相信杭州市政府在接下来几年内会往这些方面努力的。最后,再谈谈您对杭州的总体印象吧。

王:杭州很大,环境很好,风景很漂亮。平时休息日,我除了在家看书之外,会陪我儿子一起去爬爬山,享受西湖美景。而且杭州很干净,治安又好,这些都让我感到很满意。更何况我19岁就离家来杭州,至今已20年了,在杭州生活的时间比在老家都长,所以,杭州也算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六) 缪坤

缪坤,男,1963年生,安徽天长市人,1991年来杭务工,至今17个年头,从经营小吃店起家,主营餐饮业,目前待业中。

访谈员(以下简称“访”):缪先生,您好。我了解到您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杭州了,请问您当初是由于什么原因从家乡来到杭州呢?

缪坤(以下简称“缪”):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1990年的时候,我的家乡发了一场大水,我家里的房子都被冲掉了。当时我就在想,家乡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搬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杭州有一些亲戚,他们愿意接待我和我的家人,使我感觉自己来杭州的话还有一个依靠。所以也可以说是由于机缘巧合,我才来到了杭州这个城市吧。

访:可以谈一下您这17年以来在杭州发展的经历吗?

缪:刚到杭州的时候想自己找工作,但是我在杭州的亲戚给了我一些帮助,包括一些启动资金,让我可以走上创业的道路。由于当时我在创业方面还是一个门外汉,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再加上那个时候资金很有限,我就想从比较简单的小吃店做起。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河坊街那

里开了一家很小的餐馆,当然那个时候的河坊街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这么商业,地段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这家小餐馆我经营了3年,然后转手给了别人,有了初步的资金积累,我开始尝试转向别的行业。1994年的时候,我承包了武林广场的一个小旅馆,但也许是我经验还不够,没有做好,8个月后我又把这个旅馆转让给了别人。经过这次的挫折,我思考了一下,决定还是做回我比较有经验的餐饮业,于是1995年我在凤起路上承包了一栋楼,开起了“昆仑大酒店”。“昆仑大酒店”开得还比较顺利,但就在我的事业刚进入正轨的时候,碰上了凤起路拆迁,我不得不另外找地方继续开我的酒店,这次搬迁使我遭受了较大的损失。1999年,我在梅花碑开了一家饭店,还是叫“昆仑大酒店”,我想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出影响力。但是之后的几年饭店一直处于不亏不盈的状态,于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再次将它转手。之后2005年到2006年,我又在四季青承包了店面,但是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目前我处于暂时待业的状态,我想自己冷静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同时这段时间也给了我一个市场调研的机会,我想理性地选择将来发展的行业。

访:在外来务工人员中,走上创业这条道路的人很少,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业的?

缪:其实很多外地来杭州打工的,他们没办法走上创业的道路,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创业的条件。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要不是当时在杭州的亲戚愿意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也没有可能一开始就自己创业的。至于我本人为什么选择创业这条路,首先我有亲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就是有了创业的基本条件,还有我也觉得创业比较适合自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最大好处,就是工作上比较自由,当然我感觉前途也好一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但要看到的是,创业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各种意外的因素都有可能碰到。回想起我刚开始开小餐馆时候的艰辛,还有就是凤起路拆迁给我带来的损失,我很庆幸自己都挺过来了。

访:从您刚才的叙述中听得出来创业的艰辛,可以谈谈您在这些年的创业过程中都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缪:先拿我最早在河坊街的那家小餐馆说吧。那个时候我刚到杭州不久,说话还带着很浓重的乡音,虽然我现在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但比起那个时候来已经是好得多了。普通话说不好,也不太听得懂,这就给经营餐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段时间我最苦恼的就是听不太明白客人的要求,不知道他们要点什么菜,而我向他们推荐菜的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种状况客人当然不会满意,这对我餐馆的名声不太好。我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调整,才把我这个满口的乡音给纠正过来。后来在凤起路刚开始办“昆仑大酒店”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做的小餐馆是小本生意,后来做旅馆又没有盈利,我的这个资金一下子就周转不过来了,到处筹集资金来维持饭店的运作,我是硬生生挺过来的。但是饭店的情况刚有所好转就遇到了拆迁这种事情,当时感觉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那是很沮丧的。现在餐饮业的竞争很激烈,以后肯定还会越来越激烈,我之所以暂时待业,就是在想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继续搞餐饮业还是换行做其他的行业?创业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可以说是一边当老板一边当学徒,有很多东西我都是从不懂到慢慢弄懂。再说现在新事物更新多快啊,我不去学习新的东西,不去做市场调研,那怎么行?

访:请您就亲身经历来评价一下杭州市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创业环境?

缪:这个怎么说呢?杭州市政府是有一些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创业者的,但是我做的东西规模都不是很大,基本上享受不到政策上的优惠。我觉得市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像我这样做小生意的创业者很难享受到政府的优惠。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是,毕竟外来民工像我这样选择创业并且有条件创业的实在是太少了。当然从总体创业环境来看,杭州市还是很开放的一个城市,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多机会。在杭州市的竞争是很激烈,但是竞争也相对比较公平,这点是很重要的。

访: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家庭状况吗?

缪:好的。我和我妻子目前住在杭州,我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现在是在读大三,小儿子在读一个交通职高。

访:您平时都有一些什么业余爱好?

缪:像我就喜欢打打保龄球,平时没事到处走走散散步,偶尔唱唱(卡拉)OK,到时候打打牌什么的。杭州的娱乐活动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要花钱,高消费的地方我还是去不起。

访:您对杭州这个城市的总体印象怎么样?

缪:我感觉杭州总体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杭州环境好,风景好,很适合人居住。令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杭州的树很多,一般道路两旁都有一排一排的树,人生活在城市里,可以看到那么多树心情就会好。杭州还给人一种很文明的感觉,这主要还是杭州人都比较讲文明。走在杭州的大街上,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人很少见的,买什么东西的话,人们都会自觉地排队。这种事情是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出市民素质的不一样。

访:是什么原因使您17年来一直留在杭州?

缪:主要是现在人际关系都在杭州。像我们做生意的,人际关系是很看重的,很多业务往来的话是熟人心里有底的,不是熟人的话就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这些人际关系都是长年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再说“昆仑大酒店”经营了这么些年,已经积累了一些口碑,稍微有点名气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品牌在杭州餐饮界打响。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这个品牌,都是在杭州创造的,如果我离开杭州到其他地方发展,这些都要从头开始。杭州环境还不错,我也在这里住这么多年了,离开这里的话又这么麻烦,那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访:最后请您谈谈您希望杭州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缪:我就是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为像我这样有志于在杭州创业发展的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些帮助,让我们可以更顺利地在杭州创立自己的事业,同时我们也可以为杭州市创造价值。我自己主要是做餐饮业的,我相信我的饭店可以提供美味的食物,让杭州市民和游客的胃口得到满足,这也算是一种贡献吧。民工来杭州打工不容易,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一些想自己当老板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我运气比较好,刚开始有人相助,使我有一个相对顺利的开端,但是我又要说到拆迁这类事情对我的打击还是有的。具体来说,我就是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制订一些相关的政策,可以有利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杭工作、创业。还有就是以前我的小孩在读书方面遇到些

问题。我原本是希望让小孩在杭州的学校读书的,但是当时由于有很多条件限制,使我的小孩没办法留在杭州读书。现在的情况可能好些了,但外地人的小孩想要在杭州读书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这方面希望杭州市政府可以多帮帮忙。

(主体部分执笔:王小章;附录部分执笔:朱独道、陈姣姣、王婷艳)

新时期杭州社区党建工作

杭州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早。1992年,第一次全国社区建设研讨会在杭州召开。1994年,全国第一个社区建设研究会在杭州成立。1996年,全国第一部社区建设理论专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在杭州完成。1999年,第一次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会议在杭州举行。2000年以后,杭州市加大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努力构筑“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的城市管理体制,在社区建设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成效。2001年5月,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杭州市考察社区工作。随后几年来,市委坚持按照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示范、全国领先”要求,紧密结合杭州实际,使得社区党建工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杭州市社区党建发展历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杭州市历届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努力探索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杭州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

从1986年民政部首倡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服务到1991年的五年时间里,社区服务取得长足发展。社区服务在让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实惠的过程中,其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接受,并且带动了其他社区工作的产生,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社区服务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民政部于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课题,得到许多城市的积极响应。

为了探索社区建设思路,民政部选择杭州市上城区和下城区作为试点城区。1991年,杭州市委下发《加强街道居民区党建工作的意见》,明确街道党委的地位、职责和居民区党支部的职责,并对加强街道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和居民区党支部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1992年,第一次全国社区建设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以理论研讨为主,同时又是对1991年、1992年社区建设的工作总结会、经验交流会和1993年社区建设工作的动员布置会,除了对社区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内涵和外延、目标、原则、方法等基本形成共识外,最大的收获是回答了“社区建设管理体制”的构建问题:区政府是社区建设的上级领导机关;街道办事处既是领导者,也是具体组织者;区政府职能部门是社区建设某方面工作的主管部门;市以上民政部门是社区建设的指导机关。同年,杭州市委下发了《关于将街道党委改为街道工作委员会的意见》,对街道党工委的地位、作用和基本任务、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等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杭州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加强居民区党支部建设的意见》,对居民区党支部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3年,杭州市社区建设不仅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93年5月,社会活动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专程到下城区考察,对杭州市的社区建设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1994年,市委七届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意见》,提出街道居民区党的建设要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管理为重点、街道居民区工作为基础、“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城区工作指导方针进行。1995年,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在全市街道党组织中开展“凝聚力工程”活动的意见》。此后,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内容的“凝聚力工程”在各城区普遍开展。处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第一线的街道党组织大胆探索,从实际出发,提出“街道大党建”的工作思路,打破条块分割,广泛开展了街企共建、居企共建、军民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借助辖区单位的力量推进街道党建工作。

这一时期城市基层党的建设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区党建,但已经具有社区党建的雏形。与传统的街道党建相比,它具有明显的特点:街道党组织在社区建设、管理、服务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街道党组织成为社区工作中的责任主体,这为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核心;城市基层党建的内容有了新拓展,跳出了原有的纯党务工作圈子,把党的建设与解决社区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基层党建的依靠对象得到充实,社区单位和社区在职党员、流动党员逐步成为推动城市基层党的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力量。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接着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的大政方针基本敲定。按中央领导的话讲,就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发展思路已经有了,只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就行了;城市怎么办?城市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怎样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此事必须很好地进行研究,要求民政部和中央组织部一起尽快拿出方案。从客观实际看,中央对城市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随着城市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基层政权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都逐渐显露了出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将如何面对,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克服这些困难,就成了摆在城市各级党政领导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学术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提出了“社区党建”这一新的概念。1996年,下城区艮山街道首先引入这一概念,与辖区22家单位共同组建“艮山街道社区党建联席会”,迈出了社区党建工作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社区党建联席会围绕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年终召开总结交流会,请社区单位介绍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的好经验,并对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表彰,逐步形成了整合社区资源的重要议事机构。

以此为标志,杭州市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步入了开拓创新和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城市基层党建也具备了构成社区党建的多个要素特征:一是组织结构的网络化。全市逐步建立起以“社区党建指导委员会”“社区党建联席会”“社区党建协调小组”为载体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组织网络。二是工作方式的社会化。逐步形成了以“协调、服务”为主要特点的运行机制,从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单位的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出发,充分挖掘社区资源,组织和引导社区单位开展理论探讨、参与社区建设,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三是活动载体的多样化。在党员教育管理上,各街道、社区党组织通过“党员奉献服务队”“墙门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等活动载体,组织社区单位和在职党员开展各种社区建设、服务活动。各级党组织在社区广泛开展了以思想工作联做、共育“四有”新人,公益事业联办、共建服务设施,生活环境联建、共创文明社区,文体活动联抓、共同陶冶情操为内容的“四联四共”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城市党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四是工作范畴的扩大化。1999年,市委下发《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把分布在城市社区的各类新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党建纳入社区党建工作范

畴,努力消除党建工作空白点。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切实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来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分离出来,很多事情要靠街道、居委会来做。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民办机构在街道社区落户,离退休人员、待业人员、外地务工人员大量进入社区,社区成了各类矛盾反映比较敏感的汇聚地。搞好社区党的建设,实质就是打牢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社区党的建设是一个新课题。……社区党建工作,首先要做到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凡是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要从城市社区的特点出发,围绕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服务、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等来积极开展党建工作。”江泽民的讲话,对杭州市的社区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杭州市的社区党建工作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时期,重点解决了4个问题。

1. 明确社区党建的工作目标

2000年9月,市委召开社区党建工作会议,做出全面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的决定,并在同月下发《关于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社区党建的具体工作目标:即凡有人群的地方必须有党的工作,凡有党员的地方必须有党的组织,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必须有党的活动,凡有党的活动的地方必须有成效。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明显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明显加强,社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明显加强。

2. 强化社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杭州市委组织部制定下发《关于企业干部党员退休后党的组织关系转移到居住地党组织的实施意见》,逐步将企业退休干部党员的组织关系转移到居住地党组织,进一步充实社区党建的力量。制定下发《关于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若干规定》,要求市级机关、区级机关及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党员,到各自居住的社区党组织报到,填写《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登记表》,并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参与各项社区建设服务工作,加强在职党员的双向管理力度。

3. 调整社区居委会的规模

市委从巩固社区党建的基础出发,大胆改革和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新体制,将原来的全市5个城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30个街道下属的586个居民区,根据社区的特性和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合并调整为275个功能型、单位型、小区型和板块型社区。

4. 加强社区党组织的队伍建设

市委坚持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同步组建的原则,在新建社区中建立社区党总支。按照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群众威信高、年富力强的标准,通过招聘、下派、留用等途径,选好配强党总支书记,较好地解决了原来的支书队伍年龄大、文化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市委还积极在上城区进行试点,出台《社区党组织工作细则》,对社区党组织的地位、职责、设置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加强和巩固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200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到杭州考察工作,深入到天水街道社区和采荷小区、湖畔花园居民小区调查研究,并发表了题为《把为民服务作为社区一切工作出发点》的讲话,对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杭州市社区党

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提高阶段。考察结束后,杭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传达和贯彻。随后,市委制定下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社区党建的意见》,把讲话精神体现在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之中。几年来,市委坚持按照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和“全省示范、全国领先”要求,紧密结合杭州实际,紧紧抓住围绕中心、强化核心、抓好队伍、搞好共建4个重点,不断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努力改革创新,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后,省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再次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考察浙江社区建设时的讲话精神,制定《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指导纲要(2003—2010)》,对全省城市社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强调:“重视社区建设,就是重视城市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重视社区党建,就是重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全省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记在心里,落到实处。”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把加强社区党建工作作为推进社区建设、加强和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来抓,党建工作的重心下移,覆盖面不断扩大,基本实现了“一社区一支部(党委、党总支)”的目标,党组织在社区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2003年,市委、市政府抓住城市基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的契机,大胆创新党在城市社区的组织体制,在100名党员以上的社区建立党委的同时,针对转入社区的党员不断增加,不少社区党委所辖的党支部规模偏大、党员人数偏多,不利于党组织开展活动的新情况,推广了下城区“楼道建支部”的做法,按照地域相邻、人文相近、就近方便的原则,以20名左右的党员为单位组建楼道党支部。楼道党支部建立以后,立足于为居民群众办急事、难事、实事、好事、新事,普遍开展“四亮相”工作,即亮党员身份、亮服务岗位、亮义务责任、亮工作措施,实现党的基层组织进楼道、党的教育活动进楼道、党的作用发挥进楼道、党的先锋形象进楼道,有效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拓宽了社区党建工作的覆盖面。这一做法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充分肯定。

200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再次到杭州视察工作,走进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参观社区建设,了解社区在服务居民、加强党建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梁舜华等社区居民亲切交谈。他说,楼道党支部建得好,不仅把党员凝聚在了一起,而且为社区居民做了许多好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胡锦涛对杭州社区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重要指示,让全市社区党建工作者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创新思路、继续做好基层党建工作的信心与决心。

9月14日,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杭州下城区王马社区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①工作法,做法很好,要一件件抓实,确实取得成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批示:“我市应认真落实赵书记批示精神,推

^① 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六必到,即党员思想波动必到、党员志愿服务必到、党员困难病重必到、社区突发事件必到、邻里矛盾纠纷必到、邻里守望互助必到。六必访,即困难群众每月必访、独居老人每月必访、残疾家庭每月必访、流动党员每月必访、失业人员每月必访、其他重点帮扶人员每月必访。八必报,即公共设施损坏必报、背街小巷不洁必报、发现新增孕妇必报、外来人员流入必报、居民病重住院必报、居民房屋出租必报、有不安全隐患必报、有不稳定因素必报。

广‘王马’经验,切实加强社区建设。”

在中央、省、市各级领导的指引下,杭州市社区党组织抓住创建省级党建示范社区的契机,认真学习王马社区的工作经验,以服务居民为重点,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不断丰富服务群众的内容,不断深化服务群众的载体,不断完善党员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着力推进社区党建各项工作。上城区湖滨街道东平巷社区的“红色港湾”,为凝聚党员、服务群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下城区朝晖街道结合实际,推出了“春风常驻”帮扶救助、党员五级服务联络员、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爱心超市”以及“凝心聚力”工程,拉近了群众与党员之间的距离;天水街道发挥自身优势,在社区党建中导入 ISO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社会工作党委社区工作站,组织开展楼宇党委、社区与辖区单位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进一步激发了辖区内党员认领公益岗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长庆街道全面推广王马社区“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和“十条为民服务线”^①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新时期杭州市社区党建的主要成就与经验总结

中共十六大后,市委、市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努力加强社区党建,进一步拓展社区服务领域,扩大居民参与渠道,推动“和谐社区”“和谐杭州”的全面发展。

(一) 主要成就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以后至2007年的五年间,市委、市政府“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取得阶段性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经济发展方面,全市生产总值由1568亿元增至344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3029美元增至6505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城市水平。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增长2.6倍,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共同推进;城乡建设方面,通过实施城市化战略,形成市域一小时半交通圈,城市发展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市域网络化大都市雏形初现;名城强市建设方面,杭州在全省率先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综合科技实力保持全省第一位,人均预期寿命达78.9岁,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精神深入人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杭州跻身中国“十大品牌城市”行列,排名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第二位,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1689元和9549元;社会政治建设方面,杭州市连续4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2006年人民群众对杭州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达95.2%。此外,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社区党建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1. 社区党建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基本形成

在探索发展社区党建工作中,市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学习和借鉴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先后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方面的措施。市委主要领导多次在全市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专题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对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各城区在市委统一部署下,按照有利于服务和管理,有利于资源开发,有利于社区自治的原则,以原有居民区为基础,以地缘关系、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科学合理地对全市居民区进行调整定位,将

^① 十条为民服务线:党员先锋服务线、环境美化服务线、平安秩序服务线、医疗计生服务线、文体教育服务线、帮扶救助服务线、居家养老服务线、助残扶残服务线、就业指导服务线、公共危机服务线。

居民委员会改称为社区居委会。同时,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有关规定,全市各社区都成立了党组织,构建了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组织体系。在社区党建的探索实践中,按“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要求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思路,打破社区与社区单位党组织条块分割的状况,逐步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社区党员为主体,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的社区党建工作机制。把党建工作对象向社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延伸,把党建工作重心向社区共建和社区管理服务转移,把党建工作触角向“三新”组织^①和社区各阶层拓展,使社区党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2. 社区工作者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在社区调整中,各城区按照“人员缩减、待遇提高、素质优化”的原则,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区街机关下派、适当选择留用等办法选拔社区工作者。经过竞争上岗和民主选举,调整充实一大批社区工作者。据统计,全市各城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 797 人,占社区工作者总数的 48%。区街下派 165 人,占社区工作者总数的 10%。原有留用 695 人,占社区工作者总数的 42%。全市社区工作者由原来的 2395 人,减少到 1657 人,净减 738 人。平均年龄 40 岁,其中 30 岁以下的 244 人,占总数的 14.7%;31 岁~50 岁的 1175 人,占总数的 70.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467 人,占总数的 28.2%(其中研究生 2 名、本科生 13 名);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 851 人,占总数的 51.4%。党员 606 人,占总数的 36.6%;共青团员 118 人,占总数的 7.1%。社区女工作者 1247 人,占总数的 75.3%。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年龄、文化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整体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

3. 社区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一是党的基层组织向“三新组织”延伸。在全市有 3 名以上正式党员的 2070 家非公有制企业中,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比例达 82.3%。在 50 人以上职工的非公企业中,党员总数从 1999 年底的 10696 人增加到 18681 人,净增 7985 人。在 100 人以上职工的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比例达到 90.4%。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全市 16 所民办全日制学校已全部建立党组织,60 所成人业余学校正在抓紧建立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在社会团体中,全市被核准登记的 72 个自然科学类学会(协会、研究会)分别完成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二是市、区群团和科协工作向社区延伸。在市、区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城区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社区组建工、青、妇、科协等群团组织工作,积极组织广大工会会员、团员青年、协会会员开展各具特色、生动活泼的社区建设活动。三是党建工作向社区单位在职党员延伸。全市有 35202 名在职党员到社区登记报到,占应报到人数的 76%,其中市、区机关 5394 名,报到率达到 100%。各城区建立了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的《双向联系登记册》,广大在职党员在社区亮身份、树形象、做贡献,在社区和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4. 社区党建的硬件设施有所改善

2002 年至 2007 年,市委、市政府加大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在人、财、物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按每 400 户左右配备 1 名专职社区工作者,人员已经全部到位。社区建设经费(含工作经费和社区干部的津贴)按每百户 8000 元计算,由市、区两级财政各 50% 足额拨付。社区党组织

^① “三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群众组织。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新群众组织是指公民按照个人情趣、爱好、专业和特长自发结成组织开展活动,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民间组织。

活动经费按上年党员年报为基准,每名党员核定30元,其中10元从上级下拨的党费中开支,其余在财政下拨的社区经费中列支。每个社区按照每100户30平方米配置设立“五室三站二栏一校一场所”,^①约有40%的社区平均达300平方米以上。其中社区党建活动室不少于50平方米,全市已有229个社区党员活动室,占社区总数的85.1%。社区硬件配套设施的逐步到位,为开展社区党建工作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5. 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加强

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各种形式的党员服务组织,全方位、多岗位开展文明创建和为群众生活服务活动。各城区根据社区党员的特点和群众的需求,陆续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中心,党员互助与奉献服务小分队,党员专业服务小组(参政议事组、信息提供组、宣传教育组、扶贫帮困组、治安巡逻组、民事调研组、环境卫生组、文化娱乐组)等组织。据统计,全市已建有2560支党员志愿者队伍,有5.5万名党员自愿参加其中。设置党员奉献“雷锋角”、墙门党员责任区和党员维系社区先锋岗,“实话实说”意见箱和便民联系箱,广泛开展“凝聚力工程”“幸福工程”“希望工程”“党员十旗百岗”“千名在职党员社区奉献日”“千名党员情系社区走访”“社区民意大征集”和“树好党员一面旗”(用我的时间认一个岗位、献一计之长、做一份贡献)、“四进家门”(法律进家、医疗进家、绿化进家、教育进家)、“五个一”(当好一名联络员、带好一幢居民楼、帮好一家困难户、出好一个金点子、办好一件社区事)活动。同时,各城区在社区党建工作中,抓典型、带一般,认真总结和推广一批先进社区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这些活动的开展调动和激发了社区党员的积极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充分发挥了党员在社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6. 社区资源的整合功能逐步得到发挥

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城区的社区共建工作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做到了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制度办事。至2007年,全市30个街道、140个新建社区与1074个省、市、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驻杭部队结成了共建对子和党建对子,形成了上下联动、运作有效的共建网络。市、区、街三级先后做出“配套、调整、收回、置换、购租”以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无偿或低偿向社区开放服务设施等项规定,采取了“调查核实、督促落实、限期到位”的措施,使社区“五室三站二栏一校一场所”的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有了根本保证。有条件的社区还与共建单位共同建成了一批社区党建基地、社区市民学院、社区服务中心、文化健身场所。部分社区在社区单位的资助下,设立了“社区建设基金”和“凝聚力工程基金”,为社区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公益事业提供了资金保证。

(二) 经验总结

1. 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对社区党建产生直接的推动力量

200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来到杭州,对社区党建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2002年下半年开始,省委对1992个社区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底数,综合分析,初步确定了创建对象,明确目标和措施,制订计划和方案。为推动工作,省委书记习近平把西湖区翠苑一区作为联系点,结合杭州市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工作,先后3次前往

^① 五室三站二栏一校一场所:即社区居委会办公室、社区党建活动室、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室、社区警务室、多功能文化室,社区生活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计生服务站,居务(财务)公开栏、宣传栏,市民学校和文化健身活动集聚场所。

调研,其他省委领导也经常深入社区检查指导工作。在省委重视和领导带动下,全省各地都建立了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并明确职责、分工,由市、县(市、区)委书记负总责,分管副书记具体负责社区党建工作,并建立领导联系指导社区建设工作制度,每位党委、政府领导联系一个街道、一个社区,指导、协调所联街道、社区搞好社区建设和党建工作。同时,进一步落实社区党建工作责任制,明确县(市、区)委书记为抓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街道党工委书记是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在党委班子中由一名副书记专门分管社区党建工作。全省共建立了117个市领导联系点和854个县(市、区)领导联系点,有力地促进了调查研究与典型培育工作的展开。

2008年的9月11日,在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指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市民的“娘家”,是党在城市的工作基础和执政基础。此前,为了全面推进杭州市的和谐社区建设,先后出台《杭州市社区建设十一五规划(2006—2010)》《关于开展创建“杭州市和谐社区”活动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到2010年全市85%以上的社区要达到“和谐社区”的标准。其中,在“探索社区管理新体制”方面,要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社区建立党的社会工作组织,强化党对社区两新组织的管理,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社区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同时完善民主自治功能,健全和完善社区居民(成员代表)会议制度、社区议事协商制度、考核评议制度以及‘四会’等制度。加快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发挥楼宇自治会作用”。

2. 新时期社区党建将党的宗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杭州市社区党建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点。

首先,杭州市社区党组织在工作实践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研究本社区居民的关注点。社区党组织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的种种信息集中到社区党组织内,再经过社区党组织的梳理,理出居民的关切点,并以此把社区各项工作逐步引导到解决居民这些关切点上来。如洁莲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内成立“社情民意气象站”,由社区内的老党员、老干部及热心居民出任民意信息员,在及时掌握居民生活状况以及各类矛盾隐患的基础上,做到提前介入、提前处置,及时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又如莲花社区于2004年初在社区内建立议事亭,以“议家事——家和万事兴,议国事——国泰民安,议天下事——和平共处”为出发点,让居民通过此渠道参“政”议事,提出意见、建议并帮助解决。这种工作方式,既实践了党的群众路线,又使得社区服务摆脱了以往在管理主义“顾客”隐喻的特殊语境下,由社区单方面决定种类、品质与数量的困境,增进了社区群众对社区服务的参与和选择权力。

第二,杭州市社区党组织采取共产党员带头示范的办法,兼用社区党建的一些新型组织载体,来推动社区各种力量共同为民服务。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发动自己组织中的各类党员设立“党员奉献服务队”“共产党员先锋岗”等载体形式,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带动社区全体成员、单位投身社区服务工作。如下城区王马社区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工作法,这种创新思路的基层党建工作做法,紧紧围绕为民服务,充分发挥了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党组织与社区成员、社区单位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对社区成员和社区单位的强制约束。所以,一些社区的党组织积极设立社区党建联席会、在职党员服务中心、流动党员管理站等协调管理机构,组织社区单位和成员积极跟随社区党组织从事社区服务。如长庆街道党工委和吴牙社区党委启动了“2

+1”党建志愿者服务进楼宇的活动。党建志愿者“2+1”工作机制,是指一名社区党务工作者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党员和一名党建志愿者共同联系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或楼宇中一层楼面的企业。同时,社区以丰富的党员资源为基础,以加强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目标,通过招募,建立以社区离退休党员为主体的党建志愿者队伍,为非公企业服务,协助规范企业党务工作,促进非公企业党建上台阶、上水平,推动企业“三个文明”建设。

第三,杭州市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组织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凸显城市社区的服务型功能。当前,中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正面临着两大制度变迁的挑战,其一是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弱化,其二是伴随着单位制影响式微而掀起的社区建设运动。虽然这种双向度的制度变迁名义上都是指向全能国家的弱化和自治的加强,不过从社会整合的要求出发,国家仍然必须通过其设置在社区的党组织体系和行政体系维护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影响。然而,在现有的法律中,社区居委会的性质被规定为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如此一来,在社区居委会这一组织类型上,可以看到它所具有的“双重代理人”身份:一是代表国家(基层政权)向居民(社会)传递国家意志,一是代表居民(社会)向国家(基层政权)表达意见。这种“双重代理人”特质使社区居委会的运作在社区中呈现出非常特殊的景观。由于社区居委会在某些时候更多倾向于扮演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因此它或多或少带有行政的色彩。2004年2月,温家宝在中央党校指出:“社会服务这项任务太重要了,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说,包括社区居委会在内的,一切拥有行政权力的部门都要确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在这个问题上,杭州市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传递的组织末梢,积极促进社区各项职能的“服务化”转型。如下城区针对新建小区居民群体以中青年上班族为主,因工作时间与社区办公时间冲突致使办理事务不便的实际,在现代城社区等新建小区推出“办事预约服务”机制,即小区居民可以通过电话或当面预约的形式,事先告知社区工作者需办理的事项和时间(包括双休日和晚上),社区工作者在受理预约登记的同时,详细告知居民办事程序和所需携带的相关证件,确保居民在预约时间内能一次办结需办事项。为推动该项便民服务机制长效开展,社区相应制定“预约服务”制度,并通过在社区内设置温馨提示牌,在每个楼道公布24小时社区服务电话号码,扩大群众知晓度;同时,针对部分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还推出了“预约上门服务”等亲情化服务项目。该项便民服务机制的推出既方便了居民,提高了办事效率,更增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联系。

3. 新时期社区党建在“政党现代化”的目标下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

社区党组织是社会中的党组织,它不同于传统的、附着于单位的党组织,是一种全新的党的建设。因此,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社区党建工作,这是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党与时俱进实现“政党现代化”的需要。

首先,杭州市社区党组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做好社区党员的接转、管理、教育、服务工作。虽然在理论上,社区党建要求社区内的所有党员都纳入相应的党组织开展正常活动,但事实上有很多党员并没有主动到社区党组织报到,离开时也没有及时注销。在如何有效掌握辖区党员的问题上,杭州市社区党组织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新办法。如江干区采荷街道党工委整合辖区内资源,建立了“阳光家园”党员活动中心。以中心为依托,成立了“阳光家园·流动党员之家”,把流动党员纳入社区管理和服,使流动党员融入社区,找到了新“家”。在组织保障方面,阳光家园设立了“流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站”,制定了《流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制度》,对流动党员实行分类接转。对单个的流动党员,凭流动党员活动证接转组织关系,就近、就便编入党的组织,使流

动党员能够及时参加组织生活;对一些流出地相对集中的流动党员,通过与流出地党组织联系,成建制接转流动党员,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社区党组织及时组织、指导他们开展党的活动。在教育管理方面,“阳光家园”建立了流动党员、困难党员、党员先锋队(志愿者)信息库,开通在线教育,开展网上组织生活等,使流动党员与社区党员同步接受党组织管理。在服务帮扶方面,流动党员凭流动党员活动证可在“阳光家园”和社区党员服务站参加“阳光讲坛”主题沙龙、参观党建党史展览、阅览书籍报刊及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街道还设立了困难流动党员专项帮扶基金,根据流动党员信息库记载情况,对困难党员进行帮扶,并通过组织结对和个人结对两种方式,使流动党员能尽快适应新“家”、融入新“家”。

其次,杭州市社区党组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理顺与辖区内单位党组织的关系,共同促进社区党建的健康发展。从理论上讲,参与社区建设的单位党组织在党的关系上接受双重领导,既接受“条”的领导,也应接受所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在实践中,社区党组织和单位党组织之间,仍然存在对接的问题。杭州市社区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许多创新的做法。如施家花园社区与市药监局党委联合建立党建促进会,吸纳辖区内的浙江海事局、市交通局、浙江野风集团有限公司等机关单位、学校和非公企业为成员,请省委党校协作,共同研究、促进社区党建工作。社区党建促进会是由社区党委发起,共建单位和辖区各单位党组织共同组成的横向联合组织,它的特点在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目的是探索新时期社区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形成强大的政治合力,凝聚广大党员、群众共同参与,以提高社区党建水平。

第三,杭州市社区党组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的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运作体系,使得社区党建工作不因人员变动而发生“质量”波动。如天水社区党建引进 ISO 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每项工作“说到的要做到,做到的要有效,有效的要鉴证”。因此,党建质量目标和方针以及社区党建的 28 个工作门类都按要求编制了岗位“作业指导书”。工作是什么,如何开展工作,怎样留下有效记录便于验证等,在这上面写得清楚明白。拿楼道党支部工作来说,原来党支部书记就是召集党员开会、学习,隔三岔五地给居民做点好事,工作好坏有很大“弹性”。积极性高、肯动脑筋的书记,工作就上去了,有的则不尽如人意。而新制定的“作业指导书”对楼道党支部的工作程序做出了详细而刚性的规定:支委会必须每月一次,发展党员要履行 6 个工作环节等。党支部还必须做好《党支部工作年度计划》《党课记录》等 17 项记录,留待年终对工作质量的鉴证。无形的东西有形了——引进 ISO 9000 体系后,社区党委的工作方法被固化下来,变得更科学、更有效率。

第四,杭州市社区党组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社区党员队伍建设,从抓自身建设入手,不断提高党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社区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人。2001 年以后,杭州紧紧围绕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注重选人、用人、育人和留人机制,初步建立起一支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一方面,切实保障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一方面,规范用人管理体制,多渠道开展理论培训、岗位培训和学历培训。上城区和下城区被确定为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试验区。2007 年,全市有 600 余人通过了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全市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不到 40 岁,文化程度高中、大专以上的占 88%,党员占 47%。此外,社区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595 个社区建立了志愿服务站,涌现出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2600 余支,注册社区志愿者 16 万人。

(胡承槐、王 侃)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 (美)彼得·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3. 方明、王莹:《观察社会的视角——社区新论》,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4. G·D·米切尔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5. R·E·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6. 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
8. 袁方:《社会学百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文件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社区党的建设的意见》(杭州市委)。
3.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4. 《加强街道居民区党建工作的意见》(杭州市委)。
5. 《关于将街道党委改为街道工作委员会的意见》(杭州市委)。
6. 《关于加强居民区党支部建设的意见》(杭州市委组织部)。
7. 《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杭州市委)。
8. 《关于在全市街道党组织中开展“凝聚力工程”活动的意见》(杭州市委)。
9. 《关于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杭州市委)。
10. 《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指导纲要(2003—2010)》。

三、调研座谈纪要

1. 《施家花园社区座谈纪要》。
2. 《白荡海社区座谈纪要》。
3. 《采荷小区座谈纪要》。
4. 《湖畔花园居民小区座谈纪要》。
5. 《西溪街道座谈纪要》。

杭州历史纪略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春秋	未见记载		越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 494 年)			吴
周敬王三十年 (前 339 年)			越
周显王三十五年 (前 334 年)			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 (前 222 年)	钱唐县	未见记载	会稽郡
汉高祖五年正月 (前 202 年)	钱唐县		楚王国
汉高祖六年春 (前 201 年)	钱唐县		荆王国
汉高祖十二年 (前 195 年)	钱唐县		吴王国
汉前元四年(前 153 年)	钱唐县		属会稽郡、隶江 都国
汉元狩二年(前 121 年)	钱唐县(会稽郡西部 都尉治)		会稽郡
汉元封五年(前 106 年)	钱唐县		属会稽郡、隶扬 州刺史部
汉元始四年(公 元 4 年)	泉亭县(由钱唐县改 名)		同上
汉建武元年(25 年)	钱唐县(复名)		同上
汉建武六年(30 年)	余杭县(钱唐县并入)		同上
汉永建四年(129 年)	余杭县		属吴郡
汉光和二年(179 年)同上	钱唐县(一说 107 年—125 年间复置)		同上

续表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三国	钱唐县(吴郡都尉治)	未见记载	属吴国,隶扬州
两晋	钱唐县		属吴郡,隶扬州
南朝宋大明三年 (459年)	钱唐县		属吴郡,隶王畿
南朝宋大明八年 (464年)	钱唐县		属吴郡,隶扬州
南朝梁太清三年 (549年)	临江郡(升钱唐县而成,不久即废)		吴州
南朝陈祯明元年 (587年)	钱唐郡(郡治钱唐县)	辖钱唐、富阳、新城、於潜4县	同上
隋开皇九年(589年)	杭州(州治余杭县)	辖钱唐、盐官、余杭、富阳、於潜5县	—
隋开皇十年(590年)	杭州(州治钱唐县)	同上	—
隋仁寿二年(602年)	杭州总管府(州治钱唐县)	辖钱唐、盐官、余杭、富阳、於潜、武康、桐庐7县	—
隋仁寿三年(603年)	杭州	辖钱唐、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武康6县	—
隋大业三年(607年)	余杭郡(郡治钱唐县)	同上	—
隋大业十四年 (618年)	余杭郡	辖钱唐、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武康、新城7县	—
唐武德四年(621年)	杭州(州治改名钱塘县)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新城6县	—
唐武德七年(624年)	杭州,州治钱塘县	辖钱塘、余杭、富阳3县	—
唐武德八年(625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4县	—
唐贞观元年(627年)	杭州	同上	江南道
唐贞观四年(630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5县	同上
唐永淳元年(682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新城6县	同上
唐武后垂拱二年 (686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新城、紫溪7县	同上

续表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唐武后垂拱四年 (688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新城、紫溪、临水 8县	同上
唐武周万岁通天 元年(696年)	杭州	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新城、紫溪、临 水、武隆9县	同上
唐开元二十一年 (733年)	杭州	同上	江南东道
唐天宝元年(742 年)	余杭郡(郡治钱塘县)	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紫溪、临 水、唐山9县	同上
唐乾元元年(758 年)	杭州(州治钱塘县)	同上	浙江西道
唐大历二年(767 年)	杭州	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临水7县	同上
唐长庆元年(821 年)	杭州	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临水、唐山 8县	同上
唐乾宁五年(光 化元年、898年)	杭州(为镇海军治)	同上	同上
唐光化二年(899 年)	杭州(升为都督府)	同上	同上
唐光化三年(900 年)	杭州	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临安、唐 山、桐庐9县	同上
后梁开平二年 (908年)	杭州(改为大都督府)	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临安、唐 山、桐庐、武康10县	同上
后梁龙德二年 (922年)	杭州(州治钱江县、钱 塘县)	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桐庐、於潜、安 国、新登、金昌、武康11县	同上
后梁龙德三年 (923年)	杭州(为吴越国都)	同上	同上
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	杭州(州治钱塘县、钱 江县)	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於潜、安国、新 登、金昌9县。	同上
宋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	杭州(州治钱塘县、仁 和县)	辖钱塘、仁和、盐官、余杭、富春、於潜、安国、新 登、金昌9县。	同上
宋淳化四年(993 年)	杭州	同上	两浙道
宋淳化五年(994 年)	杭州(改为宁海军治)	同上	废两浙道
宋至道三年(997 年)	杭州(为两浙路治)	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於潜、新城、盐官、临 安、昌化9县	两浙路

续表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宋 建 炎 三 年 (1129 年)	临安府(府治钱塘县、 仁和县,又称行在所)	同上	同上
宋 绍 兴 二 年 (1132 年)	临安府(为浙西路治)	同上	浙西路
宋 绍 兴 八 年 (1138 年)	临安府(为南宋都城, 治所钱塘、仁和两县 升赤县(京都))	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盐 官、昌化 9 县	同上
元 至 元 十 三 年 (宋 德 祐 二 年、 1276 年)	临安府(设两浙都督 府(后改为安抚司))	同上	—
元 至 元 十 四 年 (1277 年)	杭州	同上	—
元 至 元 十 五 年 (1278 年)	杭州路(设总管府,路 治钱塘县、仁和县)	同上	—
元 至 元 二 十 一 年 (1284 年)	杭州路(为江淮行省 治)	同上	江淮行省
元 至 元 二 十 二 年 (1285 年)	杭州路(为江浙行省 治)	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 8 县和海宁州	江浙行省
元 至 正 二 十 六 年 (1366 年)	杭州府(府治钱塘县、 仁和县,为浙江等处 行中书省治)	同上	浙江等处行中 书省
明 洪 武 九 年 (1376 年)	杭州府(为浙江布政 司治所)	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昌 化、海宁 9 县	属浙江布政司 杭严道
清 顺 治 二 年 (1645 年)	杭州府(为浙江巡抚 驻地)	同上	—
清 康 熙 元 年 (1662 年)	杭州府(为浙江行省 治)	同上	浙江行省
清 雍 正 四 年 (1726 年)	杭州府	同上	属杭嘉湖道、隶 浙江行省
清 乾 隆 十 九 年 (1754 年)	杭州府(为杭嘉湖道 治)	同上	同上
清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1773 年)	杭州府	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 8 县和海宁州	同上
清 宣 统 三 年 (1911 年)	杭州府	辖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 6 县和海宁 州	同上
民 国 元 年 2 月 (1912 年)	杭县(为浙江省会所 在地)	—	直属浙江省

续表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民国 3 年 (1914 年)	杭县 (为钱塘道尹驻地)	—	属钱塘道、隶浙江省
民国 16 年 (1927 年) 5 月	杭州市 (10 月市下设区)	辖城区、西湖、江干、会堡、湖墅、皋塘 6 区	撤钱塘道, 由浙江省直辖
民国 19 年 (1930 年)	杭州市	辖 13 个区 (第一区至第十三区)	浙江省
民国 23 年 (1934 年)	杭州市	辖 8 个区 (第一区至第八区)	同上
民国 24 年 (1935 年)	杭州市	辖 8 个区 (第一区至第八区)	同上
民国 26 年 (1937 年) 12 月 24 日	杭州市	辖 7 个区 (第一区至第七区)	沦陷区
民国 34 年 (1945 年)	杭州市	辖 8 个区 (第一区至第八区)	浙江省
民国 36 年 (1947 年) 5 月	杭州市	辖 8 个区 (第一区至第八区)	同上
1949 年 5 月 3 日	杭州市 (为浙江省会)	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 8 区	同上
1950 年 6 月	杭州市	辖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 5 区	同上
1951 年 12 月	杭州市	辖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 5 区和杭县	同上
1952 年 11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笕桥、艮山、上塘、古荡 10 区	同上
1955 年 5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笕桥、艮山、上塘 9 区	同上
1956 年	杭州市	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 6 区	同上
1957 年 4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	同上
1957 年 9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和杭县	同上
1958 年 4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 笕桥、临平、塘栖、三墩、上泗 5 郊区	同上
1958 年 12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和萧山县、富阳县	同上
1959 年 2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西湖 4 区和萧山县、富阳县, 置半山联社、拱墅联社	同上
1960 年	杭州市	设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 5 个人民公社和钱塘人民公社联社, 及桐庐县、临安县、萧山县	同上

续表

年 代	名 称	辖 区	隶 属
1961 年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 5 区和临安、余杭、桐庐、富阳、萧山 5 县	同上
1963 年 5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 7 县	同上
1985 年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 6 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 7 县	同上
1987 年 11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 6 区和余杭、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 6 县,萧山市	同上
1990 年 1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余杭、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 6 县,萧山市	同上
1992 年 4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余杭、富阳、桐庐、临安、淳安 5 县,萧山、建德 2 市	同上
1994 年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 5 区,桐庐、临安、淳安 3 县,萧山、建德、富阳、余杭 4 市	同上
1996 年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 6 区,桐庐、淳安 2 县,萧山、建德、富阳、余杭、临安 5 市	同上
2001 年 2 月	杭州市	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 8 区,桐庐、淳安 2 县,建德、富阳、临安 3 市	同上
2008 年底	杭州市	同上	同上

本表仅反映杭州市建置沿革的大致经过,未详之处请参考《杭州市志》第一卷建置沿革篇。